上海红工司

沈福祥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童 年

第二章 走进社会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第五章 上 访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第七章 抄家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第九章 密 谋

第十章 拉大旗

第十一章　承认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自 序

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是上海第二大工人群众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红工”）的组织部长。写这本书，绝非是炫耀自己，而是为了忠实记录历史。

红工有四十万之众，它的参加者都是临时工、外包工，是我国在特殊历史阶段中造成的大批“临时公民”，是工人阶级中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最底层。因此，红工“造反”，天然地是为了争民主、求生存，而不会是其它造反组成织的“夺权”。但是，“造反”并没有改变临时工、外包工受歧视的地位，反而倍受王洪文、张春桥的欺骗、利用、迫害。红工司被中央强令解散，只存在了 100 天，不像其它造反队、红卫兵是在几年中逐渐淡出。因此，红工的历史呈现出它特有的形态。

上海在文革中的重要一页——红工司的历史，我有义务把它记录下来，奉献给后人研究，我把它视为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幸好，我不是胸无点墨的人，又处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因此，从 1988 年开始，经历了一十六个春秋，终于完成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书，它记下我的成长，记下“临时公民”们“造反”的兴衰，记下当时和现在我对文革的思考。

我完成了历史使命，如释重负。

第一章 童 年

上 学

我很小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那是一九四七年，我虚岁六岁，被母亲牵着手送进了学校，学校叫“市立引南小学”，座落在一大片坟地和墓地之中，它的南面是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横卧的小石桥，过桥是连片的民房，大多是屋檐只有齐胸高的本地房子。

这里的地名叫沈家滩，沈家滩只是杨树浦的一个小角落，横贯东西的杨树浦路从中穿过，马路中央横卧着四根铁轨，来回行驶着从杨树浦通向外滩、顶上拖着一根“辫子”的八路有轨电车，车分二节互不相通。前面一节和后面一节的车票略有差别，前面的车厢稍贵一些，后面的拖车便宜一点，乘后面的一般是一些乡下人、小贩和工人，家境稍好些的就乘前面一节，人就这么分出了贵贱。这种电车车厢的坐位是顺着车厢二边铺开，乘客们互相挨着坐成两排，后来的人就站在中间手握把手面向窗外。那时的电车是不太挤的，要不了几站就能有座位，绝对没有现在大上海那种一平方米挤十几个人的景象。当卖票的把铁栅门一拉，一声哨响从后面传来。电车就轰轰隆隆开走了，站立驾驶的司机不时用脚踩着叮叮当当的车铃，警告行人车辆让开，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

马路对面，矗立着高高低低冷冰冰毫无生气的厂房，最西面是英国人开办的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中间是日本人开办的大康纱厂。虽然六十年代著名沪剧《星星之火》中的包身工，描述的是沪西的日本纱厂，但在这里沪东地区也有好几家这样的“东洋”纱厂，也有大量从苏北农村来的小姑娘——小珍珠们，当上了悲惨的包身工。这些包身工后来成了家，生儿育女，儿女又继续在工厂做工，依旧过着悲惨的生活。她们始终操着一口苏北话，她们的后代也操同样语言，在杨树浦形成了一个苏北人聚居的社会。大康纱厂的东面是美国人办的电灯厂，即现在的杨树浦发电厂。在电影“战上海”中，国民党军队要炸掉发电厂，工人们在地下党领导下奋起保卫工厂，在千钧一发之间，解放军打进来了，电厂终于投入了人民的怀抱。电影中的这段历史情节和外景地就是指这里。再向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出过王洪文而名扬全国的国棉十七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也是日本人开的。

学校的东面、西面、北面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犹如电影《城南旧事》中的荒草园，但更为荒芜、可怕。在半个世纪前上海人的心目中，杨树浦是那么的遥远和荒凉，被人称为“化人滩”，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坟山、外露的棺材、尸骨、骷髅和丢弃的出生才几天的婴儿，有死的也有活的。北面的胡家宅墙门间外数步，就是一个高大的坟墓，在坟墓与墙门间之间是一口水井，井旁有洗衣的淘米洗菜的，显得生气勃勃，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杨树浦的活人就这么蜷缩在低矮的本地房子里与荒滩、坟墓里的尸骨比邻而居，阳宅阴宅参差相依，人鬼共居。

传说在民国初期，上海几家大银行销毁陈旧残破的钞票，就选这荒坟野地的沈家滩作为烧毁场地。久而久之，那时当地的沈姓居民与动手焚烧的人串通一气做了手脚，在事后的纸灰中扒出尚未烧尽的成捆的纸币而发了财。在这样一片荒凉可怕的野地中，我们学校的二层楼校舍高高地雄视着四周。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的近二年中，我读的是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这二年的小学生活，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沉闷。因为我的年龄太小了，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度过，一点也没有活泼的童年乐趣可言。每天早上在操场上立正排队，升青天白日的国旗，唱沉闷的"三民主义"国歌，唱的歌词我一点不懂，老师也不教，只知跟着大同学立正站直，小嘴里糊里糊涂地哼哼，哼了二年还是糊涂，没有明白。

那时上课是件可怕事情：回答不出提问或背不出书要立壁角，字写得不端正、算术题做错了要打手心。有一天，算术先生——那时老师称先生——发怒了，凡是回家作业上错了一道题的就用戒尺打一记手心，我错了二道，就该打二记。我恐惧地望着先生，忐忑不安地等着先生叫我的名字。我看有的同学被打时的哭叫声，我更害怕了。终于轮到我了，我记着顽皮同学——经常挨打的同学向我传授的经验，伸出了我的小手，把手用力伸直，同时屏气，据说这样不痛，但还是吓得闭上了眼睛，戒尺打了下来，真的还算好，手心麻辣辣的，还不至于哭。尽管这样也使我见了这一寸二分宽的木尺而害怕，惟恐再次挨打。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打手心，让我终生难忘。

比打手心更可怕的是在嘴的四周用毛笔沾上红墨水画"红圈圈"，那是对最最顽皮的孩子即"屡教不改"者才使用的，（在廿世纪文明时代，竟然从古代黥刑、墨面、刺字刑罚引伸而来的人格丑辱处罚。）虽然我不是最最顽皮的，但当看到别的同学嘴巴四周的红圈圈后，我对学校的恐惧心理达到了顶点。那时我最怕走过先生的办公室，怕见到先生。

有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赖学，被母亲硬是抱着去上学，我一路上大哭大叫不愿去，一路的挣扎和哭叫都无济于事，眼看着学校已经近了，我怕同学看见了拍手唱"赖学精，书抱掼到屋头顶"的儿歌来取笑我，更怕见到我的先生，就央求母亲放下我，表示愿意自己走着去上学，在母亲的押送下，我还是被送进了最可怕的先生的办公室，从此我再也不敢赖学了。

在这样的环境读书，无丝毫乐趣，从早上低声唱"三民主义"开始，压抑的空气就几乎让人闷死，上课就盼着早点下课，早点放学。挨到下午最后一节课要放学了，开始唱"先生同学，明朝会……"时，歌声才唱得响亮起来，精神起来，当同学们一面唱一面向先生、向同学互相鞠躬："明朝会，好朋友"，唱毕，背上书包一溜小跑奔出了学校，像小鸟飞出鸟笼似的头也不回。

快解放了

在我读二年级下时，春天已经来临。

一天突然来了一帮警察，把教高年级的一位女老师抓走了，同时把在寝室陪老师的女同学也抓走了。全校顿时乱糟糟的，先生吓得连课也不上了，我们这些小同学，就随着大同学，上上下下的跑，先跑到楼上看被抓女先生的寝室，一片凌乱。又到楼梯半腰处，听高年级同学讲，一位男先生就是从这里半楼梯翻上厕所的屋顶，再跳到外面的菜地，穿过乱坟"落荒而逃"，才没有被抓走。大同学又讲，警察是来抓共产党的，这二位先生是共产党所以要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要被捉？警察不是专捉坏人的吗？难道先生是坏人吗？如果先生是坏人，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都哭得那样伤心呢？教我们班的女先生为什么害怕得连课也不上呢？我幼小的心灵中升起了一连串问题，后来我留心听大人们的闲谈，说什么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共产主妻，更是莫明其妙。

不久，"共产党要来了"，"快解放了"的传闻不断在我们小孩的耳边回响。

什么叫解放？不懂，问大人，一声断喝："小囡家，多问点啥！"我想大人大概也讲不清。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店家全关门打烊不再营业，学校也关门不上课了，我们小孩被关在家中，那真闷得慌啊！我家的店伙计们却很高兴，时时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有一种神秘的兴奋溢于言表。

那时，我父亲是在江宁路的二纺机厂开汽车的，每天用卡车把杨树浦的工人送去上班、下班又把他们送回，晚上把车停在家附近，有时就停在家门口。母亲由同乡帮助在家开了一爿米店，收了三名同乡小学徒，他们喊我父亲为先生，也就自然成了我的师兄。一天，我的父亲连同汽车被国民党抓伕。起初我对"抓伕"不懂，很害怕，后来逐渐明白了什么叫抓伕：我父亲被驱赶到复兴岛，用汽车往返把国民党伤兵送到我家附近的劳工医院——解放后叫杨浦中心医院。包扎后，再送到眉州路的陆军医院，三天三夜的连续奔波，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被放回来。

而我的家中呢？被一群国民党兵包围后，硬是被打开店门，把麻袋抢劫一空，装进泥土在十字路口筑起了工事，我们的店堂里也住进了不少兵，他们日夜站岗——尽管行人几乎已经绝迹。一天，看到他们把两个行路的老人扣下了，因为这二人是操山东口音的，就硬说他们是共产党的探子。这二人拿出身份证，说明他们不是共产党，是为了什么事一定要通过这

里。不行！他们下跪求情，还是不行！最后那个排长说放走一个吧，扣下了另一个老人，尽管他一再跪下磕头，仍然没用。一个老人走了，另一个老人泪流满面地蹲在地上。

我好可怜这人啊！我好恨那排长，既然他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恶作剧硬是把他们俩人拆散呢？过了半天班长才把他放了，这一件事，使我也盼望早日解放。

人们开始听到了远远的炮声，传说共产党已经解放了浦东，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也越来越兴奋。邻居中有一家“逃难”到上海——那时杨树浦的人称市中心为上海。5 月 25 日打电话来说，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上海，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好，邻居家的女儿还在电话中把刚学来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唱了一遍——那女儿就是陪女老师一起被抓进警察局的女同学之一，后来被她父亲请人保释出来。

人们奔走相告，人们兴奋地议论着，期待着，啊！这女学生在电话里的歌声向人们送来了春天的信息。歌声告诉人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歌声告诉人们，上海，已经解放了，解放，离我们杨树浦只有一步之遥。黑暗的，腐败的国民党就要倒台了，这消息很快在弄堂里传开，大人们兴奋地在议论，在等待，在翘首以盼，盼望解放军，盼望解放，盼望那令人神往的民主政府和“好喜欢”的新生活。大人们都神秘地猜想，这女学生也许早就偷偷地干了革命，跟女共产党老师学会了这首歌。大人们对她是多么地羡慕，多么地佩服！

后来，这位邻居的女儿，这位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是解放和解放区生活的信使，幸福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然而时隔一年，她被打成反革命，押送到山东劳改。她的父亲被划为右派。然后，过了悠悠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改变，年迈的父亲和满脸皱纹的她才被平反昭雪。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是她当初打电话时绝对无法想到的吧！

自从那女学生的电话来过之后，弄堂里的人渐渐走了出来，大人放松了对我们小孩的管束，我们小孩在家门口东瞧西望的。人们不再害怕那些国民党的丘八了，而那些丘八也对人们客气了不少。前几天警察局隔壁的工专（解放后的电力专科学校）的一些大学生还在贴骂共产党的标语。有一张标语的字我认识，说什么“朱毛不死，天下大乱”。现在，对这些背时的标语已无人理会。人们在欣喜而悄悄地相互说：“快了！快了！”

解 放

五月廿七日，天阴沉沉的，太阳钻进了云层，马路上虽然行人不多，但毕竟可以看到有人了。在弄堂里，家门口，不时有人三三两两地在盼望着什么，在平静中等待。上午近十点时，楼下的大兵们却一口一个“老板，老板”喊着上来，把我父亲的衣服全要走了，他们把父亲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再套上军服，惶惶不安似丧家之犬，丝毫没有准备抵抗的士气，往日对老百姓的一张张凶脸不见了，态度和善多了。这时在马路边的居民增多了，胆子也大了，有人大着胆子向一名手握颜色小旗的排长问：“共军什么时候来呀？”那丘八竟非常平静地说：“下午两点钟。”

这消息很快给传开了，人们已经忘记了这是在战争状态之中，没有恐惧，没有害怕，有的只是期盼和无可名状的兴奋。到了下午我也随着大人们站在家门口的马路边，看着那些丘八忙乱地走进走出，快二点了，突然在南面杨树浦路煤气厂厂门口出现了一大群穿便衣的人，这里的国民党大兵们立刻乱作一团。这时从北面警察局方向开来一辆吉普车，到了我们这里十字路口的碉堡前停下，一军官对排长说了些什么，又上去几个兵立在车门的二旁，向穿便衣的人群开了过去。车子一到煤气厂门口，就被便衣们缴了枪。我们这里的大人小孩看得真切，有人连呼：“缴枪了！缴枪了！”

很快，吉普车掉头开了回来。这时有人高喊：“快看，换白旗投降了。”我抬头一看这边碉堡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换上了白旗，那些大兵们在惊慌逃命时没忘了先挂白旗，有的兵以最快的动作脱下罩在外面的军服，丢下枪，没有便衣的也丢下武器仓惶向北逃窜。

这时吉普车已经来到我家门前，从车上跳下的全是工人，他们的左手臂上戴着黄色的臂章，原来是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工人保安队，他们认识我的父亲，喊着：“老沈，老沈！”并给我父亲一只黄色的袖章，要我父亲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去收缴残敌的武器装备。我父亲喜出望外，开上卡车就随着他们向北驰去，忙得不亦乐乎。这不是拉伕，而是自愿的，大家都是自己人么！解放了么!工人当家作主了么！

后来听父亲说，他早有所闻这些人是共产党，他们经常向我父亲邮寄共产党的宣传品，有时父亲也为他们开车干些事。解放后，父亲厂里的两个同事找上门来借钱，我父亲借给他们了。想不到他们是借了钱后作路费逃到香港去了，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工福会理事。这下我父亲倒了霉了！再加上我叔父为生活去了台湾，两件事理所当然地栽进了父亲的档案，然后，又理所当然从我父亲的档案中“移植”到我做儿子的档案里，说是我父亲资助他们随蒋匪帮潜逃台湾，而那段帮助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却一个字也不见于我和父亲的档案中。档案，就像一把筛子，专门把人们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污点”秘密记载下来，锁进一只只铁皮柜，成为“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把柄”，一旦“需要”，就可以用来致人于死地，多少人就因为这种历史垃圾式的档案断送了前程。

不多时，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待雨小些而尚未停止时，大家迫不及待要去看解放军，我跟随着我的一位师兄，兴高采烈，欢呼雀跃着冒雨走向杨树浦路上的沈家滩，只见在马路旁民房的屋檐下，坐满了解放军，他们双腿打着绷带，脚穿布鞋，混身湿透，没有雨具，有的只有一块黄色的油布，与国民党士兵一比，土得多了。哦！我看见了解放军，看见了解放！

我心中别提有多么新鲜，多么高兴了！

这时，大康纱厂食堂送来了一箩箩热气腾腾的大米饭，这些可敬的战士们就在雨中，在屋檐下，大口大口的吞咽着，想必他们已经饿坏了。在他们的周围站满了好奇的、兴奋的市民，有的人家请解放军进屋休息、不要在雨中吃饭，这些可敬的战士都婉言谢绝了。刚从国民党士兵下解放出来的市民们，看到这样强烈的对比，无不啧啧称奇。有的老人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军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的老人说，这些兵真是好人啊！

雨过天晴，太阳出来了，热辣辣地照在身上，使人们的情绪一下热了起来，正在这时从工专出来一队大学生，他们唱着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前两天仅仅由那位女学生从电话中悄悄传来的歌声，今天已经响彻云天。杨树浦解放了！穷人解放了，我们翻身了，民主生活就要开始了！大学生们欢呼雀跃，高呼口号，有的在马路旁张贴红红绿绿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我想起了前几天工专的大学生张贴骂共产党的标语，而今天工专的大学生在欢迎解放军，难道大学生中也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坏人和好人之分么？

这时只听一声哨响，解放军战士齐齐整整排成二列横队，好不威武雄壮啊！一名身背驳壳枪，枪柄上飘着红绿绸布的军官，在队列前一声口令，带着队伍走了，嗬！真神气啊！

马路上热闹得很，人们全从家中涌了出来，从来还没有这么热闹过，人们还从来没有这么畅开心扉说话，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一些苏北老人把在家乡曾经看到新四军的故事告诉大家：共产党分田分地，人人有地种，人人有饭吃。他们一遍遍说得痛快，人们一遍遍听，听得高兴。我们小孩则到处奔跑撒欢，仿佛要把这几天失去的自由一下子在今天补回来。我们学着大人的样高喊，解放了！解放了！逢人夸耀：我看见了解放军，我看见了解放军，欢快地向家中奔去。

突然，在我家门口的马路上，人们骚动起来，大家向北面警察局方向张望，原来一大批国民党军队的丘八们排着队伍被解放军押走了。他们低着头走着，身上没有了往日不离身的枪，也没了往日的骄横，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有人认出了曾驻在我家的兵，指着说："这两个人最凶了。哼！也被俘虏了。"这二人听到后，把头垂得更低了。

"俘虏"？什么叫俘虏？我急切地问路旁的大人，我觉得今天学到的新名词太多了，一切都那么新鲜！也是从这一天，我萌发和树立了我对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由衷的爱戴和敬仰。

我兴奋地回到家中，这时我家的店堂内，已经没有了国民党军队和武器，我的师兄们正在打扫，他们告诉我，父亲刚才开着车，同工人保安队一起把武器装备全运走了。我看到从帐台下面扫出来的垃圾中，有一只装一节电池的电筒，想必是那些丘八们遗留下的，我的师兄们就玩了起来，他们说这是从美国运来的美国货。电筒很精致，不是金属的，而是那时老百姓没有见过的塑料，师兄三人觉得希罕好玩，谁也想要这只电筒，谁也不肯相让，大师兄

就慷慨地把它送给了我，我真开心啊！

吃了晚饭，奔了一天的我好累啊！但特别兴奋不想睡，尽管天已经完全黑了好一会，马路上人来人往，一反前段时期不见人影只见大兵身影的情景。我们小孩还在疯啊闹的。这时突然来了几个工人，他们戴着黄臂章，要检查我家，盘问我们是不是藏下了国民党的枪，我的师兄们向他们说：已经全运走了。他们不信，我母亲也解释一番，他们还是不信，而且好凶，一定要上楼搜查。我母亲挡不住，只得让他们上楼。他们没搜到武器，就命令母亲打开衣橱和衣箱，蛮横地乱翻。正在这时，我父亲回来了，告诉他们武器的确已经运走了，一面说一面把自己的黄袖章拿给他们看，说明自己是属于同一保安队的。这些人连说：自己人，自己人，误会了，误会了。一面说一面很快下楼走了。我站在楼梯口，望着他们想：他们是共产党吗？为什么这样凶啊？非要拿出黄袖章才能好好说话吗？解放了，对好人不应该这样凶，共产党是不会这样的。这时我白天的兴奋消失殆尽，我觉得两眼酸酸的，只想睡，上了床很快就睡着了。

“二•六”轰炸

学校很快恢复了上课。上课的第一天，校长把我们召集到操场上，宣布现在解放了，不准体罚，不准用戒尺打手心，不准画红圈圈，不准立壁角，不准打人、骂人。同学们静静地把话听完，继而马上活跃起来。哦！我们也解放了，真正的解放了，再也不用见到先生害怕了！

确实，打这以后，再也看不到那根木头戒尺了。学校中没有了体罚，只有欢乐，先生和同学们起劲地唱歌，扭秧歌，打腰鼓。那随着南下大军而带来的西北黄土高原老解放区的质朴的艺术，使人们尽情地渲泄，尽情地欢呼，尽情地享受解放的欢乐。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久就被打乱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上海轰炸骚扰。

我们学校离发电厂不远，飞机来前，发电厂、大康纱厂屋顶上的警报器就拉起了尖厉的警报。先是预备警报，不到几分钟，就是紧急警报，表示飞机快到头顶上了。待飞机飞走后，就拉起解除警报。

每次空袭，警报一拉响，老师就马上要我们回家。后来，次数一多，不用老师说，一听警报响，我们收起书，背上书包就奔出了校门。有时预备警报没有拉，直接就拉紧急警报，这真急人呀！我就与同学直接穿过北面的荒草园回家，这样可以近一半路。荒草园平时走的

人少，小路太狭窄，天热又穿短裤，人在其中狂奔，大腿小腿被一种茎上有细锯齿的野草割出一条条红印，慢慢地渗出血来，一出汗，腌着伤口，辣辣地疼！跑到家就随家里人再向北面逃。这时马路上的人成群结队，一律向北跑，尽可能远离发电厂和煤气厂，因为这是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目标。

逃过平凉路，有时就在警察公寓——解放后改称隆昌公寓的地下室里躲一躲，有时一直跑下去，跑过白林寺，就是大片农田，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安全地带了。

空袭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段时间天天拉警报，这是台湾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的高潮——一九五 0 年二月六日的前后。

二月六日的轰炸，对上海人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那天，杨树浦发电厂的三号锅炉被炸，上海部分地区成了没有电的世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六”轰炸。

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中，我们学校离轰炸的目标实在太近，学校决定关闭，把我们这些学生，迁到区中心小学念书。区中心小学离家远了，离发电厂就更远了。学校的屋顶就有一个警报器，警报一拉响，老师就组织学生下楼，在底层或操场上，只是不再逃散，大家静候警报解除再上课，学习环境还是不安定。

“二•六轰炸”后，在我家的附近有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的阵地，国民党飞机不敢作低空轰炸，只能像乌鸦似地在高空盘旋，高射炮射上去的炮弹在飞机的机身下和机身四周绽开朵朵白云，过几秒钟后才传来“啪啪啪啪”清脆的爆炸声。我们好奇地昂首在马路上看热闹，再也不逃难了，再也不怕飞机的轰炸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的解放军击落了一架国民党飞机，坠毁在浦东。国民党飞机来的次数逐渐减少，形势越来越平和，我们重又迁回自己的学校，那座落在荒地中的引南小学。

第一次受批判

这时的我，读三年级的时候，受到了后来称之为的“批判”。

当时我只有八、九岁。刚感受到解放的欢乐，不用怕老师的体罚了。但精神上却开始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因为，转到中心小学读书，离家远了，有时我父亲就用厂里的大卡车把附近的一群学生连我一起送到学校，随后再送工人上班。于是我被老师斥责为：资产阶级少爷，上学要汽车送。

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父亲送的不是我一个，而是附近不同年级的一大群同学，为什么只有我是资产阶级少爷，而他们却不是呢？我默默地受老师的训斥。我当时还不懂，家庭的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这样几次被训斥后，我就要求父亲不要再送我们了。不过，这还没有完。因为离家远了，学生都是自带午饭的，中午就拿出饭盒啃冷饭吃。在我们吃饭时，我们的老师就是喜欢看同学们吃的是什么菜，细细地、一个个的问过去、看过去。因为是天热也为方便，我每天的菜大多是一只咸蛋，我的老师认为我的菜要比别的同学好，总要鄙视地说上一句："资产阶级少爷。"我经常受到这样的训斥，在班级里抬不起头，逐渐变成一个孤独、沉默的学生。

后来，整个社会和学校开始搞阶级教育，用各种形式反复宣传教育谁养活谁的主题，有一首通俗的用上海话演唱的歌，唱得妇孺皆知，人人能够上口："地主不劳动呀，全靠我伲种地养活，呒没我伲来种田，天上不会落白米……。"这种简单而淳朴的阶级教育深深打动了简单而淳朴的穷苦百姓，拨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且埋下仇恨的种子。我终于明白了，我遭受批判——老师的训斥是因为我母亲开了一爿小米店之故，我的家庭也成了剥削阶级的家庭。

通过反复的宣传教育，工人家庭的子女日益显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感到压抑和自卑。我开始憎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的母亲到快解放时要开店呢？不然我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家庭，我就不会受岐视了。在以后的凡是填登记表的家庭出身一栏，我总是顽强地坚持填"工人"，因为我父亲是工人嘛！为什么别的同学的出身是随父亲，而我的出身要随母亲呢？

不幸的是，我父亲厂里动员他去支援东北老解放区。有人对他说："东北冷得手一摸耳朵，耳朵就掉下来，一摸鼻子，鼻子就掉下来。"他听信了这种无稽之谈，怕厂里的军代表进一步找他谈话动员他去，竟轻率地辞职不干了。他这一辞职不打紧，非但他丢掉了工作，丢掉了"工人"这个光荣成份，更要紧的是使我，他的儿子失去了获得"工人"这个光荣的家庭出身的权利。

父亲回家后不多时，查出患了肺结核病。他患病十年，家中可变卖的东西全变卖了，甚至连电钟也卖了，家境一贫如洗，而我的家庭出身一栏，却始终在资产阶级家庭和小业主家庭两种成分中摇摆，成了我以后几十年沉重的无形枷锁，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是怀疑的对象，"专政"的铁拳高高地在你头顶举起。在我的前半生，这一魔影时时处处徘徊在我的身前身后。

我幼小的心灵中，努力想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我羡慕那些工人家庭的同学，但又无可奈何。那时我不可能预料到家庭出身的"不好"要影响我一辈子，因此我当时并无太大的痛楚，并且，幼小的我在共产党正统的教育下，在一次次的运动中，把自己塑造成共产党所需

要的好学生。

抓 特 务

老师在课堂上不断地灌输革命思想，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要我们痛恨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又让幼小的心灵，明白中国被侵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的卖国行径造成的，蒋匪帮——蒋介石也是一个卖国贼，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后来又投靠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残害百姓，蒋匪帮逃到台湾，派特务到大陆搞破坏，等等等等。在老师讲的故事中，抓特务的情节，是故事的中心和高潮。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喊得热血沸腾。整个社会的宣传，老师的教育，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全成了金科玉律。

一天，我们做完了早操，一位姓鲍的老师向操场上的全校学生发了一通演说，要同学们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说我们学校离发电厂近，发电厂是特务破坏的目标，而我们学校也是破坏的目标，我们刚才不是升了国旗吗？我们学校升了国旗，特务一看就知道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提防特务的破坏。他的一本正经、风声鹤唳的发言，使我们刹时紧张起来。故事中的特务离我们太遥远了，而今天鲍老师说的事就将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天真幼稚的小学生真的被鼓动起来了。

几天后，回家吃了午饭，几个同学一路玩耍去学校，在荒草园的南头，校舍已经在望，操场上的五星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这时，一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拍拍我的头：“小弟弟！那有国旗的地方是学校对吗？”同学抢着回答：“是呀！”他又问：“是什么学校呀？”

什么！“国旗”？“学校”？啊呀！这人是特务！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我们这里的人有谁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对！他一定是特务。我马上与同学咬起了耳朵：“这人是特务。”前两天老师正儿八经的讲话，马上在同学们耳旁回响，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同学们附和着说：“对，对，是特务。”有的说：“看，鬼头鬼脑的，走路的样子也像。”有的指着他的背影说：“你看，他走路也在看我们的学校。”我们小声地跟在后面议论着，越看越像。有人发出了口令：“快去报告老师！”

我们一路狂奔，穿过荒草园，气喘嘘嘘地奔进学校，气急败坏地告诉老师：“快去抓特务！”老师要我们把话讲清楚，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说了一遍经过。老师不易察觉地一笑：“好了，你们回教室去上课吧！”我们很泄气，明明是特务嘛！为什么不去捉？我这人真转不过弯来，耿耿于怀好几天。所以到了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有忘记。

现在想想也真可笑。那个姓鲍的老师是一位不任课的事务老师，偶而代代课。校长或教导主任在操场上讲话后，他总喜欢在最后也插上一段话。此公喜好杯中之物，常可在吃晚饭时，看见他在附近的小饭店吃酒，在我家弄堂口的小饭店中也经常有他的身影。他负责学校里老师的伙食。附近的米店，是他常去光顾的地方，我家的米店，他也常来，经常拖欠米款，欠久了就调一爿米店。现在回忆起来，那天他谬言大发时，兴许隔夜的酒没有醒呢！害得我这个当年天真的小孩，到了步入老年时，还在惦记这位可爱的老师。

没当成少年英雄，遗憾了好一阵子。

骷髅没有转

抓不到真特务，我们就玩抓特务的游戏，玩打仗的游戏。学校北面的荒草园，就是我们的“战场”，泥块是我们双方的武器，扔过来，扔过去。昏天黑地地玩上一个下午。春天在这里放风筝，骑水牛，在水沟里捉鱼，捞蝌蚪。有时就玩“吃包饭”——那是由稍大的孩子领头，跳越菜田边的水沟，一个个鱼贯跟着跳到水沟的对岸，领头的为显示自己，不断升级，拣宽的水沟跳，当跳越到对岸后，必引来一阵欢呼。伙伴们也一个个纵身飞越过去了，剩下一、二个胆小的在沟边徘徊，在大家的催促下，退后几步，快步奔跑跳将起来，只听扑通一声，这名胆小者，滑入水沟，大家就哄然大笑，笑够了，就帮助哭丧着脸的同伴，就地在水沟中洗清裤子、鞋袜，或者干脆不洗，让太阳晒、身子焐、干了再把泥巴搓去。伙伴们是很讲义气的，一起陪着这倒霉蛋，直到弄得基本上看不出破绽，让他回家不挨骂。

这样的游戏我们经常玩，为了提高惊险的程度，我们就盼着大冷天的到来。大冷天水沟结冰了，领头的孩子首先踏冰跃上对岸，后面的也一个个从冰上走过去，胆小的越是走在后面越倒霉，刷拉拉一阵响，这时赶快用力一跃，可能仅仅湿了棉鞋。如果跳得不及时，那就惨了。冰水里的伙伴爬上岸后，大家把他护送到避风向阳处，拾点干草枯枝点把火，把衣服烤干些再回家。

有一天几个领头的大孩子，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本领和胆量，说出一个更大胆更富刺激的提议：

在民间有一种传说：在骷髅的七孔各放入一粒黄豆，随后对着骷髅撒泡尿，这个骷髅就会转动起来，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但谁也没有看到过，有的说是真的，有的说这是迷信。争论归争论，谁也不敢试一试。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坟墓、棺材、骷髅，虽然习以为常，但要做如此出格的游戏，惧怕的心理还是存在的。那时，夏天夜间，小孩子经常围着大人听鬼的故事，越听越怕，总觉得背后一股凉气袭来，赶快往人堆中间坐。现在要动手玩这把戏还真怕。

那天没人响应，也就说说罢了，可是不干心里又痒痒。经过几天“密谋”之后，大家互相约定，要干，每个人都要参加，谁也不能当孬种。为了怕骷髅转起来后被追上，我们选定一个四面有水沟环绕的坟墓，坍蹋的一边露出了已经败坏的棺材，尸骨已经随手可拿。一旦转动起来，大家就跳水沟逃跑，大家相信骷髅是跳不过水沟的。然后胆量最大的几个人做了分工：一个从棺材中捧出骷髅头来，另一个放黄豆，最后一个是撒尿，其余的人必须站在这三人的周围，不许离得远。

这三位英雄被簇拥着到了坟旁，按着程序开始做了，这时胆小的就开始逃离，一个个跳到水沟另一边观看。这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胆量，在得意之余，倒也不计较我们这些人的怕死行径。第一个完成了他的任务，第二个小心翼翼地逐孔放了黄豆，第三个刚要撒尿，隔岸观“火”的人中不知谁恶作剧地大叫一声：“看！动了！”吓得这三人马上转身，飞也似的跳过来。一阵紧张后，发觉那个骷髅纹丝不动，才发觉上当，“哈哈……。”一阵哄笑，一阵相互的嘲弄。

当然，对于这样的结局，大家是不满足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家极希望看到转动起来的骷髅。一位平时大家公认的英雄，被推了出来，在大家的鼓动下，“英雄气概”大大激发，一个箭步跳将过去，不负众望地开始撒尿。大家并住气，紧张地等待奇迹出现。“英雄”刚洒上几滴尿，却马上转身就逃。大家看见他一逃，也哗的一下转身而逃。

狂奔了几十米，又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回过头去发觉并没有发生什么。那个撒尿的英雄在水沟边招招手，大家又回到原地。经过这一来二去，恐惧的心理，减去大半，三四个人重又跳了过去，重新开始撒尿。不动。再撒。这时不管谁再高喊“动了！”也吓唬不了人。有人朝骷髅扔了块泥巴，骷髅只轻轻摇了摇。干脆再踢上一脚，也不见异样，嗬！原来这是迷信，什么鬼呀！神啊！全是瞎说！

这一天的游戏，在我心里种下了无神论的种子。

马 戏

每年夏天，在这荒草地上，总有马戏团来演出，他们竖起高高的旗杆——那是演“三上吊”节目用的；他们平整场地，围起布围栏——让外面的人看不见。在白布外面，相隔三公尺又拦起一层绳网，再派年迈的老头在中间看守。当然，这些防范措施全是对付我们小孩的，不让我们看白戏。

傍晚，落日的余辉映照荒草园，马戏团的人马从演出场地出动了。前面洋鼓洋号，一面“花家马戏团”的旗帜诱人地招展，在旗下的是几匹高大的白马，上面骑着马戏团的演员，有演“三上吊”的小姑娘，也有最受欢迎的小丑演员，他们频频招手向人致意。这一行人缓缓在附近的几条马路上绕上一个大圆圈，催促人们快去看马戏。待这一行人游行回来后，离开场的时间就不远了。

大人壹角伍分、小人壹角，买着筹子就能进门。我们这些小孩那能每天有一角零用钱啊！然而这马戏是那样的吸引人，能不看吗？当那开场的洋鼓洋号一响，心就痒痒的。于是我们就在场子的外围徜徉，一待有可乘之机就贴地钻进去。然而，看守的老头越来越精，他们分头把守，我们能得手的机会越来越难，连着几天，我们被看守老头盯死了进不了场。只听场内的马在奔跑，观众在齐声喝采，心里的痒啊！好难受！

有的伙伴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大家把身上仅有的一分二分钱全交出来，凑成一角钱，选出一个人，把钱交给他，大家隐藏在选定的地点，只见他敏捷地钻进第一道绳网围子，当他去掀布围子时，看守老头一声大喝，冲上去抓他，他一骨碌沿着布围子向另一头跑去，把老头引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时一声令下我们从隐藏地点“全线出击”，撩起绳网，贴地钻进去，再飞快冲到布围子底部、一猫腰、钻进去。成功了！我们在场子里欢快地笑了起来。不多会儿，被抓的小伙伴也前来会合——他被拉住胳膊，押送出场外，马上用一角钱买了筹子，堂堂正正地进场。

我们占据了最好的位置。马戏开场了，几匹马在场中奔跑，演员做着各种技巧表演。接着又是叠罗汉，睏钉板——人仰面睡在上百只尖尖的铁钉上，胸前肚上压一块六、七公分厚、半人长的石板！两个彪形大汉抡起大锤一阵猛敲，把石敲碎，石下的大汉一下绷起来，碎石块散满一地，他抱拳向观众致意。还有窜刀架、钻火圈……这一系列的惊险表演，让人心惊肉跳，也让人开怀大笑——扮演小丑的演员在做惊险动作时，装出胆小怕死的样子，做滑稽幽默的动作，引来阵阵笑声。

最后，“三上吊”的节目开始了，演员在高空的旗杆上做各种动作，一个小姑娘在高空悠来荡去，维系着身体的却是她的长发辫。长发承担了她的全身重量，在夜空的映衬下，娇健的身影在星空飞舞，让人惊叹、让人揪心，突然小姑娘垂直从高空坠落——人们“轰”的一声惊呼！小姑娘却一骨碌翻身跃起，脆脆地响起一声“哎”！向观众谢幕致意——原来这是精彩的压台戏，让人一场虚惊、一身冷汗，马戏结束了。

乐 园

在整个暑假，黄浦江中复兴岛是我们另一个乐园。

岛的北端，有复兴岛公园，人迹罕至，传说蒋介石临逃离上海时就住在公园北头的小洋房内。这时的小洋房成了公园的阅览室，放上几份报纸、期刊供游人悠闲地阅读。我们这伙顽童只顾到处乱奔，专事捣乱的勾当。公园的南面树高林密，游人更少，男女恋人就在这里互偎互依谈情说爱，我们就悄悄地钻进树丛中，从不同方向慢慢逼近，两手捏好泥团，一声令下，泥弹横飞，打得一对情人衬衣上泥渍斑斑，快快地离开，我们就开怀大笑。没有玩具，没有父母的溺爱，我们是一群无人管束的野孩子，对恋人来说是恶作剧，对我们来说是乐趣。除了公园更富童趣的冒险，那就是在黄浦江戏水、游泳。

过了定海桥，现在的轮渡码头在解放初还是一片滩地，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水草毕现。我们把身上的短裤汗衫脱下堆在岸边，由胆小不敢下水的伙伴看着，光着屁股走下去，靠岸边有一条小河样的水沟，宽约五、六米，淌过水沟，走进一片长满碧绿水草、野茨菇的滩地，再前行几十公尺才到真正的江边。江边泊着数不清的木排。江水拍打着木排，在齐腰深的水中，浪接着浪，把我们的身子前后推摇，淡淡的一股鱼腥味迎面扑来，阵阵欢笑声、呼喊声、江面驶过船舶的汽笛声，这里真是集声、色、味于一体的水上乐园啊！

不会游泳的，赶快拨拢一大堆水草，上半身趴在这堆水草上，双脚齐上齐下地扑通、扑通地打水，这样练出来的就是“狗爬式”。会游泳的，就爬上木排、到木排的外侧去游，胆大的从木排上跳下水，向江心游去。游够了，闹累了，就看人家在水底摸“黄先”——我不知道这二字怎么写，它是比海瓜子稍大，比蛤蜊小得多的软体动物，和豆腐烧汤，鲜得很。看得手痒也就在水中的泥地上摸起来，这东西很多，很快就能摸上一米袋。

突然，听得一声喊：“警察来了！”抬头一看，一艘白色的汽艇向我们开来，这是水上警察的巡逻艇。我们立时慌乱起来，连游带爬地奔上堤岸，一看，管衣服的小伙伴不知到那里去了，大家就在自己人的衣堆中，找到自己的衣裤就穿。遥望江中，远在江心游泳的人被巡逻艇带走了，这几人被送上停泊在江面的铁驳船上，让他在毒日下曝晒，铁甲板被太阳晒得烫脚，人在上面站着，只得不停地踏步，让人哭笑不得。经过这番体罚，巡逻艇把人送到定海桥下安全上岸。现在想想是挺有意思的。

汽艇追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涨潮。

大伙忘情地玩耍的时候，有经验的大孩子一串惊呼：“涨潮了！快！涨潮了！”大家抬头一看，只见从下游处，有一条白线，那是汹涌潮流形成的一排白浪，气势汹汹地扑来，大家马上向百米处的岸边狼狈逃窜，跑得快的，穿过水草地时，水还没有涨上来，但到了岸边的五、六公尺宽的小河时，水流已经比原来涨高了，水流湍急，但只要冲过小河，马上可以上岸。可是跑得慢的，特别是还不知道已经涨潮，当发觉别人大都已经上岸才向岸边跑来时，这就糟了。这时水草已经被大潮淹没，只露些许叶尖在水面，人在水中慌不择路，往往滑进

园形的水坑中，就有灭顶之灾，这是非常可怕的。过了草滩，就到了近岸的小河，这时小河已经成了一条“天险”，无法趟水过河了，会游的尚不困难，几个扑通就闹过来了。不会游泳的就急得大哭，这时岸上的小伙伴，急中生智，大叫：“抓水草过来！”原先学游泳用的水草随着潮水向岸边漂来，比比皆是，随手抓起一堆水草，趴在上面，用劲地打水，也就化险为夷了。虽然有死亡的威胁，但我们还是要去，每年都去，因为这里毕竟是乐园，童年的乐园。

暑假一过，我们这批顽童又被“束缚”在板凳上，欢乐的，无忧无虑的气氛没有了，眼前全是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老师爱国主义的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了，老师教我们阅读报纸，每天读报上胜利的消息。老师动情地讲，我们认真地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越来越憎恨“美国鬼子”，越来越敬仰志愿军——最可爱的人。我把报上的连环画和漫画剪下，贴成一本“小人书”，爱不择手。我痛恨卖臭牛肉给志愿军的奸商，对卖假药使志愿军失去生命的奸商王康年更是咬牙切齿。人民政府枪毙了这两个奸商，我们都拍手称快。

学校组织每个同学给志愿军写慰问信。我曾经同时与几位战士通了好长时间的信。我当时写的内容是简单的，无非是希望叔叔在前方英勇杀敌。我们省下零用钱，捐献飞机大炮，让叔叔在前方打美国鬼子，我要努力学习，长大了要当志愿军，也要亲手打美国鬼子，等等。同学们也都这样写。我们头脑中受的教育是如此的正统、规范、划一，以致使每个面貌、性别不同的幼童，在严肃的命题面前，笔下流出的是同样真诚、热烈而空洞的口号，同样缺乏个性，但又充满激情的话语。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长大。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由衷地信仰和崇敬。

第二章 走进社会

江南小镇

我的初中三年学习生活是在半免和全免学费的困难中渡过的，父亲辞职后长期的肺结核病，使他不可能重新就业，母亲每月四十八元的菲薄工资不可能养活全家六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长子，我清楚地明白，继续升学已不现实了。一九五七年，我初中毕业后，辍学

踏进了社会。是年，我虚岁十六。

命运注定我的生活是坎坷不平的。经过一年不安定的就业生活，在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我在当时区劳动科（以后的区劳动局）组织的失业工人生产自救性质的生产组中工作，生产胶木制品。这时的上海兴起了一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我们这种生产自救小组正是被动员的对象。

作为在上海生活的人，对去边远的回族聚居地区的宁夏，怀有一种恐惧感，但一旦被动员了，又不能不去。这种压力来自二方面：一种是政治上的和行政上的压力，你不敢不去；另一种是失业的威胁。你如果顶住了前一种压力，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失业，意味着没有饭吃，这是顶现实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

对失业的恐惧，是当代青年根本无法理解和感受的。这也是两代的“代沟”。正因为这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人对当时临时工起来造反，提出“要工作、要吃饭、要转正”的口号，百般不解，甚至产生误解和歧视，而我的上一代人对失业的认识则比我这一代人更深、更为恐惧。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又要打破“铁饭碗”，意味着失业的危机又开始潜伏，并且事实上出现了不少“隐性失业”大军。那么，从社会上笼罩着失业的阴影到人人都不知失业为何物，算不算社会文明的进步呢？现在又出现失业危机是不是倒退呢？这实在是两个一两句话很难说清的问题。我看到，三十多年中，在铸就“铁饭碗”，使人人有饭吃的同时，也使人们滋生了强大的惰性，它啃啮着我们中华民族本可傲视世界的勤劳品质；但是失业过多，会造成大量赤贫阶层，进而贫富悬殊，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国民党的倒台和这不无关系。也许，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有“铁饭碗”，也不能有过多的失业。要驾驭这一对矛盾的两方面，是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面临的难题之一。

在这股动员去宁夏的热潮中，幸运的是我们这批人被抛向了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市镇，它真可说是一个繁华的江南市镇。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被改编成电影，主人公从上海逃难到乡下的码头外景地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说这个市镇繁华，当然是相对而言，在我们上海人眼里，它是极清极静的。这里河道纵横，每条街傍着一条清彻见底的市河，河水缓缓地流淌，河上横跨着美丽的石拱桥。站在一座桥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另一座桥，全镇有几十座这样的石拱桥，在全盛时期曾有“七十二座半”的美称，那半座三孔石拱桥是由于它一头跨在邻县的土地上，本县只统辖半座，故有此半数的称谓。市河每隔一段距离，都有石阶下到水面的河埠头，是居民淘米、洗菜、洗衣、取水和木船傍岸后上岸的地方。

镇的出口处为四个东、南、西、北栅头，在西面的就称为西栅头，出了栅头就是郊外了。放眼望去，是大片的桑树地和稻田，高处为桑田，纸处为稻田。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蚕桑产地，五十年代电影《蚕桑姑娘》的外景地就选在这里。

从船码头下船后踏上十几级石阶，顺着街走去，映入眼底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平房和二层楼房，没有新屋，更没有现代楼宇，色彩单调，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是一个灰色的世界。

当地只有一台微不足道的小型柴油发电机，到了天黑了才开动，它的容量太小了，实在不够这市镇的需要，发出的电只能把灯泡燃成一丝红线，所以即使有了收音机，也不能使用，每天听不到广播，也见不到当天的报纸，报纸都是几天前的，而且只是办公室才有，大部分人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想去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猛然从喧闹的大城市来到这里静寂的灰色世界里，不免有一种失落感，犹如自己被时代抛上了一座孤岛，与整个世界隔绝了。

这里的河水，静静地、慢吞吞地向东流去。河里有用手摇橹的农船，在运河有扬起风帆的运输船，无风时则靠人在河岸上用肩背拉着绳索沉重地爬行。这里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当地人连自行车也没有见过。

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我与一名同伴在河埠头洗衣服，在清彻的河水中揉搓衣服，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和默默地倒映在水中的岸边竹园和凋谢的桃树，这江南水乡的静谧，让我一下还不能马上适应。不由我对同伴有感而发："已经几天没有看报和听广播了，这里太闭塞了。我们真的是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的地方了。这里是世外桃源啊!"我没有想到，为了这么一句话，我差点闯下大祸。我才明白，这片土地，不是世外桃源。

第 一 课

我所在的厂是有二百多人的公私合营厂，在这一派田园式自然经济的古老市镇中，具有这样的规模可算是大厂了。这个厂是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高潮时，把一些私营作坊合并起来形成的。当初那些作坊，用当地产的蚕丝，搓成乐器上用的丝弦。这些小老板们，名义上是私方人员，实际上丧失了经营工厂的权力，同普通工人一样，靠出卖劳动力，拿工资维持生计。

这个厂名义上还有私方厂长，姓鲁，平头短发，慈眉善目，笑口常开，逢人就笑，一副忠厚相。对厂中的事务不加任何议论，也不参加厂中的任何活动。他在厂中的时间，还比不上在县里学习的时间长，或者调他到外面做一些临时性突击工作，所以他这厂长实在是名存实亡。

据一姓周的私方人员对我说，鲁厂长谨小慎微的为人之道是在五七年反右斗争后形成的，过去他可不是这样，他原来性格开朗，喜欢用歇后语开玩笑，而且自己编了不少适合当地当时的歇后语。如到北面的南浔镇去办点事，早上乘上小火轮，当天可打一个来回，再吃上一顿点心，一元钱也用不完，所以他就说：“一元钱到南浔，一钱难尽。”谐音一言难尽。比喻有的事情一言难尽，一时讲不清的意思。还有一个“六月里穿棉鞋热脚难过”，谐音日脚难过，即北方话日子难过。为了这两个歇后语，差点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这次政治风暴锉去了这位鲁厂长的开朗和幽默，他再也不敢随便讲话了，只能用笑来掩饰他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用“嗯，啊！”来打发日子。

要说右派份子，在厂中确有一个，也是私方人员。此人成了厂里的“贱民”：身穿一身破旧的中山服，一脸的枯稿之菜色，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笑容。厂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全是他干，小心翼翼地干，尽力地干，得到的是没完没了的训斥。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在你面前“示范”，能不令这位私方厂长胆颤心惊么！这位私方厂长能奢望有职有权，与公方厂长平起平坐么？

公方厂长姓李，厂中唯一的党员，米店学徒出身，五短身材，精明强干，一副大麻脸、其麻点之多像天上星星，无法数清。加上瘦，尖嘴猴腮、鹰爪鼻，脸上的麻点就显得更深、更大。全厂事无巨细，均由其指挥过问，一旦谁办事不合他意，必遭其一顿斥责，让人无所适从，完全是颐指气使的封建家长式领导，使人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在这位厂长面前只能表现出唯唯喏喏、恭顺驯服的样子，差点就没有做出打千唱：“喳”。而那位麻脸厂长，则露出一脸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感到：我是正确的化身，你们是我的臣民，我，权力的象征，手握“生杀大权”，敢不听我的吗？你们必须绝对的服从！

厂长权威的象征，还表现在每天的晚上七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作一、二小时的报告，几乎天天如此，不准请假，也无人敢于违抗，到时每人从家中（我们上海来的则从楼上的宿舍）乖乖地汇集到食堂听滔滔不绝的废话。时间不长，我们年青人就耐不住了，坐在后面的顾自谈我们的“山海经”，但往往遭到一顿怒骂，而我必是其中之一。大约一年后，陆续调来了几位党员，又调来了一位书记，这位厂长才收敛一些，开始有点笑脸了，待人也和气点了，我着实被迷惑了一阵，哪里能识破这是为了拢络人心，以对抗书记的权力呢？

从外表上看，那位新到的书记与厂长刚好成反比，此人讲话和声细气，双眼眯成一条缝地瞧人，让人感到他是在笑。他不当面训人，讲话也算和善，你有时顶撞了他，他也不计较，似乎是个大好人。但这人专在背地作文章，在你档案里偷偷地添上几笔，使你终生受用。他抓住机会时就一定给你穿“小鞋”，而当事者，还木知木觉，把他当好人，感恩不尽。此人爱好越剧，爱哼上几句尹桂芳的尹调，确实迷住了一些女人，这时的他，色迷迷的双眼，眯缝得更细了。他不是当地人，家在县城，他独身一人住厂里，远离我们的宿舍。他的办公室兼作卧室，是全厂其他男性的禁地，时常从紧闭的门窗隙缝中，飘出缕缕“十八相送”的男女声对唱。谁心中都明白，男人们谁也不敢前去靠近。唯一获准进去的男性是一位在大跃进时进厂的农民，此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回乡种田，日后能转成个城镇居民，便常在回家后，带来鸡鸭鱼肉，烧好后送去孝敬。这位书记在后来的几年中，官运亨通，越升越高，在文革中，成了镇党委书记。

面对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我感到失望、苦闷，我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刚从学校门出来，在我的脑海里，闪动的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和做人的标准榜样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卓娅；董存瑞，黄继光。我的思想还没有从这些英雄形象的光环中走出来，对社会根本没有了解和认识。

在一次学习会上，我天真、单纯地向厂长——党的化身，倾诉心中的徬徨和困惑："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党和上海的党不一样。"实际上上海的社会真正怎样？我同样不了解，我还刚刚踏进社会啊，实际上我心目中的上海的共产党，亦是我从书本上，从党的宣传、小说、电影里看到的那振臂一挥，"共产党员，跟我冲啊"的英雄形象。

不等我的话讲完，厂长的麻脸就阴沉了下来，可我还全然没有醒悟？还在倾诉我的心里话，直到我讲完了，厂长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开，我才感到有些不妙。事后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这位厂长一个个把我们同去的上海人找去谈话，收集我的"劣迹"，意欲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但实在没有劣迹可寻，而且我们同去的上海人反而一致向厂长求情，要他念我年幼无知，才作罢了。这位好心的阿姨，劝我今后少说话，在领导面前要讲好听的，不能这样讲真心话。

但她并没有把我唤醒。

这就是我踏进社会的第一堂课。

大 跃 进

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在那只注重产值、产量的年代里，在这样封建家长式领导的工厂里，工人的劳动环境是极端恶劣的，其劳动强度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这家厂的胶木制品是纽扣（这种胶木纽扣在九十年代几乎绝迹）是胶木行业中最苦最累的活儿，另外还生产拉线开关。压钮扣完全靠人力，加热不是煤气，也不用电——在当地是不可能的。最初用炭加热，由于大跃进，炭供应不上就用木柴，烧起来满屋烟熏火燎，后来又改煤球。那时工人还不懂环境保护知识，还不懂废气对人体极大的伤害，只知整天在高温下作业，热不可耐，大冷天只穿一件衬衣还出汗。大热天就更苦了，汗从头上流到脚上，脚在木拖板上直打滑——我们上班时，为贪凉快和节约，都穿木拖鞋上班——从来没有听说有防暑降温这档子事，也不知什么是劳动保护。人就这么熬过一天又一天。

由于晚上的照明电只能燃红灯丝，照明就用打气的汽油灯，但由于丝做的灯罩质量太差，用不了多时就坏，谁也不想多化时间去摆弄这灯而影响完成生产指标，就直接燃烧煤油，用燃出的火焰来照明，在烟熏火燎之下，在这样半明半灭的照明条件下，我的双眼视力越来越差，到了中年老年，我成了个“半瞎子”。再上恶劣的劳动环境、极度的体力消耗，对健康的摧残，使我成了满身是病的“半条命”。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没有怨言，也没有怠工现象。如果用九十年代人的眼光来衡量，这简直是不可思义的。这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推动的呢？是由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桥的共产主义宣传？还是为了求生存、要吃饭，不能失去就业机会？抑或是中国百姓习惯了忍辱负重，习惯了服从？我说不明白，但当时的工人确实非常老实地劳动着。

善良的人们，得到的报酬又是多少呢？在这厂中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十多元近四十元，刚进厂的青年只有廿六元，我的五十八元的工资，属“高薪阶层”了，（也只几个人而已）面对这样微薄的工资收入，谁也没有、也不敢提出非议，谁也没有想到过这就是新的剥削。

可不是吗？我们共产党已经推翻了国民党，推翻了吃人的剥削制度，消灭了万恶的剥削阶级，自然，我们工厂就和全国一样不可能存在剥削。我们工厂属于全民所有（虽然工人们都说不出自己占了多少份额），尽管我们汗流浃背，烟熏火燎，筋疲力尽，像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作坊工人，而且也只拿着仅够糊口的工资，但我们制度先进，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的生产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因此就不存在剥削。生产的利润，厂长、书记会把它们上交给国家，贡献给革命，用来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苦人，让他们像我们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种生产热情，到了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更加极度地高涨起来。之后，经过反复折腾的政治动乱，中国的时代列车终于驶入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国外信息不断传入，人们的眼界不断开阔。经过简单的、朴素的，然而又是极具说服力的横向比较后，“我们国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人”的理论，在年青人中失去了市场，导致工人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在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浪费达到惊人的地步（当然官僚主义泛滥造成的指挥失当所产生的浪费更大），这种浪费在“反正不是我口袋里的，是国家的”心态下，心安理得地让金钱往阴沟流淌。随着对共产主义的怀疑（这是文化大革命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更由于改革的锋芒不能触及或指向政治体制的领域，消极怠工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不少工厂生产设备失于检修，工人工作态度马虎，在原材料方面大手大脚，质量普遍下降。这同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阶级用破坏机器来反抗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剥削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没有剥削，没有剩余价值，那么我们的劳动价值又是什么呢？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在大跃进年代，我们的厂是怎样在创造“价值”的呢？

在政治的推动下，全国上下一片浮夸风，常常要放“高产卫星”。高产与优质这对矛盾中，不注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是无法统一的。但我们为了满足放“卫星”，只有上逼下做，不顾产品质量，只要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就是“先进”，我就连续得过几次的季度和年度“先进”。（这样的业绩，不知在我的档案中是否记上，即使记上，认为你坏了，要抓你的“辫子”，要给你穿“小鞋”、下“地狱”时可以一笔勾销。）

这位精明的厂长，为了不断向上级表功，又想出一个绝招，把三班倒的工人进行重新组合，把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一个“青年突击班”，其它两班以中年人为主。青年人单纯、好鼓动，他就充分利用青年人争强好胜，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使“青年突击班”一鼓作气创出了成倍翻番的“高产卫星”，回过头来，再对其它两班施加压力，按此产量跟上。这种不断的“竞赛”搞得众人筋疲力尽。顺便提一句：不管干多少，工资是不变的，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在五十年代，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不奇怪，我要特别提及的，让人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事情，我们厂长的“专利发明”——“八小时劈半工作制”。

八小时劈半工作制

麻脸厂长对热火朝天的竞赛还不满足，他太精明了，他敏锐地发现，在八小时的重体力手工劳动中，前四小时的体力相对充沛，产量必定高于体力下降的后四小时，于是他又想出了新的绝招：把八小时工作时间劈成两个四小时，两次上班，即上班四小时后，休息八小时，再上四小时班，再休息八小时。逼使工人绷紧你的全身神经，用出所有的力气，在每天的两个四小时内，有充沛的精力，每分钟不松劲，像绷紧的发条一样运转，周而复始。

这样一来，连吃饭的时间也被剥夺了——本来三班倒的工人八小时工作中包括了中间半小时吃饭时间，现在是四小时了，总不能还让你停下来吃饭吧！好！这等于一天三班增加了九十分钟的工作量。到了星期日，是全厂休息日。机器是停止运转了，机器休息了，人却规定要检修和清洁机器不得休息。而且这半天的劳动是义务的、无偿的。

我实在要感叹，感叹这位厂长发明的“八小时劈半工作制”！这种工作制比资本家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二十世纪初叶，西方工业革命时，曾经出现过著名的科学管理制度，“泰罗制”。泰罗把最熟练工人的操作用高速摄影机摄下，分析他们的必要动作和多余动作，然后将本来就不多的多余动作剔除，使工人的操作凝炼为必要动作的结晶，将工人变成一架精确的机器，在不增加机器设备、投资的情况下，使生产力提高了一倍以上，使剩余价值的剥削达到极限。从此，靠延长工时来榨取血汗，让位于提高效率。

列宁在肯定泰罗制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的同时，又指出它是血腥的管理方法。但是，西方的泰罗，如果面对这位麻脸厂长的发明，就只能瞠目结舌，自惭形秽，甘拜下风，钻到地下去。你看，他用劈成两半的八小时，成倍提高了工作效能，而且使你挑不出刺，说不出话。真的，他太仁慈了！他无意推翻全世界工人阶级以血的代价斗争得来的八小时工作制，用不着动用电影这个劳什子，不必费心思研究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是“必要”的，更不用化投资改善机器设备和生产条件，他只不过灵机一动，把八小时劈成两半儿，并没有侵占，也无意侵占工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你二十四小时中工作八小时，工作时间是一昼夜的三分之一，我十二小时中工作四小时时，工作时间也是“半昼夜”的三分之一，工时并没有延长嘛！把八小时劈成两半，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真可惜！这位厂长投胎投错了，他要是早生四十年，他要是生在西方，泰罗将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这种反常的作息制度，使工人们在每个昼夜中一会儿白天干，一会儿晚上干，一会晚上睡，一会儿白天睡，人的“生物钟”被完全打乱，白天、黑夜不分。天天这样连轴转，甚至连日期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混混沌沌地吃饭、混混沌沌地出苦力、混混沌沌地睡觉，什么理想、知识全都忘却。知识在这里没有用，理想更是可笑的词儿。人，只是一头牲畜，罩住双眼围着石磨一圈又一圈无限止地转、转、转……

在这样劳累、单调、乏味的生活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天，我走过街上的照相馆，忽然想起，这里白天没有电，没有灯光照明，他们是如何拍照的呢？好奇心驱使我，何不也去照一张相呢？进去一看，原来摄影在楼上，屋顶是玻璃天棚、利用日光再加两面大镜子的反光来照像的。

几天后，我去取回我的照片，打开纸袋，照片上的人不是我。我对坐在柜台后的姑娘说：“这不是我！你拿错照片了”。她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对我看了一眼，瞪大一双疑惑的眼眼看着我，久久地看着我，她像在看一个精神病人一样不安地看着我。

怎么啦？我再接过照片，仔细辨认一番，啊！照片上的人是我么？

是的，这是我！但已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模样的人了！憔悴、疲惫的脸庞，年龄足足要大上十岁！这是怎么回事？是洗印的毛病吗？再看看照片，照片印得蛮清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那姑娘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了。我拿了照片，马上逃也似的离开了照相馆，回到宿舍，我找人借了面镜子，与照片一对，是了！明白无误，是我“老”了！

在大自然中

春天来了！这里的春天有特殊的魅力。

走出厂区，天地豁然开朗。极目西眺，雾气蒙罩的天边，一抹远山如黛。绿色的田野上，流淌着三条美丽的小河，左面的一条不知名，右面的一条也不知名，但她身上横跨着一座雄伟的大石桥，河对岸是邻县，所谓的“半座”桥，就是指它。这两条小河，夹着中间的笤溪，在这里会合，三股清流汇成一片辽阔的水面，形成一个粼粼的湖泊。河水稍事休息后，恋恋地分别向东向南，流入市镇，成为市河，倒映出江南水乡一片片房屋的黑瓦、粉墙、石阶、映出那明清风格的高高的风火墙，映出一座又一座的石拱桥和桥上穿红戴绿的村姑，桥下悠然摇过的农船……啊！好一幅如诗如梦的山水画！好一个使人忘却忧愁、烦恼的伊甸园！

我们一群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男女，尽管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劳动、生活，但青春的活力是任何力量压抑不住的，我们在星期日相约后，到西栅头的船埠头借上一两只船。（这些船是农民上镇后，系泊在船埠头的。）大家嘻嘻哈哈地跳上船去，会摇橹的抢先摇起来。最后一个上船的，先要在岸上用脚将船头一点，待船离岸荡开时，才不慌不忙地一个箭步轻轻跃到船上，以显身手不凡。

小船自在地扭摆着，载着满船的年轻人，载着满船的欢笑，洋溢着满船的青春活力，向湖心摇去。这时有人吹起了口琴，琴声在水面上飘散开去，显得格外悦耳，在大家的邀请下，善唱的姑娘在一阵忸怩之后，放开喉咙唱起了歌，这时琴声、歌声使我们把一切人世间的烦恼全忘却了。

船进入飘着一片菱的水域，人们随手扯起菱叶，拉出长长的一串菱的茎叶，最后是一只只弯角菱，这时的菱角已经发芽，我们忘乎所以地把菱角咬开大口吃起来。当然，这种勾当只有我们男孩子才干，姑娘们只是抿着嘴笑，看我们大嚼。

这时，船因为无人在摇，失去动力，随风顺水被搁到岸边，有人一声喊：“大家吃桑果子去噢！”在一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里，往岸上跳，往桑树地里钻。这里是蚕乡，桑树经过人工着意的修剪，只有一人高，树干长到齐胸高的地方，分成三个或四个椏枝，斜刺里向上长去，再往上一尺多，就是“桑拳”——一枝椏长到这里形成拳头大小的疙瘩，上面“伤痕”累累，正因为有“伤痕”，年复一年，桑拳越长越大。春天桑拳上抽出新芽，长出手指粗细的嫩枝，枝条上再长出硕大无比的桑叶。我说桑叶硕大，绝不是形容，因为这里的桑叶的确要比手掌大得多。采桑叶时，用特制的大剪刀，在桑拳上，齐根剪下枝条，于是在这里又形成新的伤痕，过后在旁再萌生出新芽、抽枝、再长出桑叶。剪下的桑枝，被成捆送到蚕室，摘下桑叶喂蚕，留下的桑枝烧成炭，用作蚕室加温。

桑树林纵横成行，间距一样，齐刷刷地排起长阵，一望无际，椏枝的高低和方向在同一的水平线上，整齐划一，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桑果子并不是每棵树上都有的，只有少数的桑树才有，有个别的树上，桑果子特多，桑果子大得几乎像天津红枣。

我们一上岸，桑树林里顿时洋溢出一片笑声，大家在寻找一棵中意的树，把桑果子往嘴里塞。如果谁找到一棵树上结满又大又紫、紫得发黑的桑果子——只有这样的果子才甜。就大喊大叫、招呼同伴们过来，但往往效果不大。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领地“，有自己钟爱的桑树，直吃得嘴巴、牙齿发紫发黑才肯罢休，尤其是我这个人大城市来的，吃相最难看，虽然众人善意地取笑，我却不愿放弃这难逢的好时光，要不是朋友们向我发出警告：“多吃要泻肚子的”，我是决不会罢休的。而那些姑娘们，只是挑上一颗文文雅雅地尝尝，以保持姿态和面庞的俊俏，哪能像我们男孩，吃得满嘴发紫，那不羞死人了？

吃够了，闹够了，是该回去了。

回到船上，觉得累了，大家的笑声少了，不再打闹，只是静静地坐着。会摇橹的已经没了抢着摇船的劲，互相推诿。

摇船的默默地摇，撸帮发出沉闷的嗯吱、嗯吱声，船越摇越快，船下的水“卜、卜、卜”欢快地拍打着船头。人们在经过刚才的一阵呼喊、奔跑、打闹后，混身发热。此时南风习习，好不爽快！再脱下鞋袜，把脚伸向水中，沁人心肺的凉意透了上来，顿时脑清心宁。“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春江水暖，河水已不象冬天那般刺骨了。

夏天，这里更是我们青年人的天下，天还没有大热，我们就跳进河里游泳，水是绿的，但夏天的绿与冬天的绿绝不一样。夏天雨水丰沛，整个河床满满当当，溢出一片草绿；冬天雨水少，水位低、河滩阔、水流缓，清彻见底，透出一股凉森森的浅绿。每当春雨连绵，西山流下的桃花汛浩荡东来，汇到桥洞处，形成湍流，人在桥下逆流游泳，只能在原地扑腾，时间一长，坚持不住，就被冲到下游，这就应了“不进则退”的古训。人在生活、学习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真理，不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逆流中游一游，马上就能体会到。青年时代的我，能在数次失败后，将养气力，拚力一搏，一下冲过桥洞，虽然化了极大气力，但得胜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人到中年之后，回首往昔，每每叹息“在逆流中前进”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和个中甜酸苦辣之味。

那小镇辖有半座的三孔大桥是我们练习跳水的好去处。这里的朋友们是不会跳水的，而从小在江湾游泳池尝试过三米跳板的我，当然要在他们面前充充英雄好汉了！我先潜游到桥洞底部，仔细地搜索一番，确证水下没有石块和木桩之类危险物，又充分估计了水深，就游上岸，爬上桥栏，纵身从最高的桥栏上跳下。表演引来了一阵喝彩声，我的朋友们也开始往下跳下。

这里的鱼真多啊！桥洞水急，鱼儿偏喜逆水而游，到了这里就欢快地蹦出水面，这些都是几斤重的大鱼，令人惊奇。我不喜钓鱼，这里也不见有人钓鱼，但我们喜欢摸蚌。我们带上一根长长的竹竿，借一只用浆的小船，一人在后艄划，另一人在船头划，直向三河交汇处

的湖面而去。到了水深合适处，用力地竹竿插入河底，再把小船系住。跳入水中，在船的四周潜入水底，在河底一面游，一面用双手摸河底淤泥中的蚌。哎！很有趣！蚌在水底是直立的，一半插在泥里，一半露在水中。更奇怪的是，只要摸到河蚌，就不止一只两只，附近一片往往有几十只，大概河蚌也不甘寂寞，喜欢群居吧！这时就左手往右手的胳肢窝夹一只，右手往左手的胳肢窝夹一只，再双手各握二只，脚在河底一蹬，直向水面窜去，窜出水面，踏水游向船边，刚举手把蚌向船中扔去，却把胳肢窝的一只漏下水去，引得自己发笑。于是潜入水底再摸。毫不费力，就可把船底铺满。

那时水质还没有被工业和农药污染，至少，问题还没有突出。河中的鱼虾确实多，有时我们随便拿上一根竹筷、一根棉线、一团饭粒，用铁丝弯成一只钩子，穿上一粒米饭，就在市河的浜岸边钓虾。坐在河岸石条上，能在清洌的水中看到一条条半透明的虾。它们在河岸用石块垒起的缝隙中用八条细细的腿慢慢地进进退退，游进游出，或者身子一躬一弹，闪出好远，煞是好玩。虾是很傻、很贪吃的，见到饭粒，扑上来就咬，竹筷一拎就是一条，要不了一小时，一大碗活蹦乱跳的虾就到手了。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工业的发展，农药的使用，环保意识的薄弱。我想快乐的渔夫生活是不可能再重现了。

青年人的朝气是不易磨灭的，青年人的精力总是旺盛的，尽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我们总能找到乐趣，与童年时代一样，我们的乐园是大自然，白天我们能够去划船、吃桑果、游泳、跳水、钓虾，夜晚，我们到农村的竹园去张网捕鸟，一网可捕几只，多时一网几十只，这时，欢乐把一切烦恼全忘却了。

然而，这些欢乐毕竟是暂时的，一旦脱离了大自然的怀抱，走进灰暗的厂房，站在隆隆作响的机器旁，看到麻脸厂长和笑面虎书记的脸，进行长时间的无味的劳作，或听着枯燥乏味的报告，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像小鸟被关进了牢笼。

我病倒了

一天， 我病了，病得不轻，一天之中腹泻十几次，我只得去人民公社的卫生院。

这个卫生院的大门两边的墙上是巨幅的宣传标语，进门的照壁是一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宣传画。（这种画是当时的时代产物，装饰意味很强，常被制成壁画。）上面绘制了想象中的将来的公社景象：在公社的田野里一派五谷丰收的金黄色，拖拉机在轰鸣，上空是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河中的轮船在行驶，美丽的石拱桥变成了单调的水泥桥，桥上有汽车在飞奔。中景和近景是将来的市镇：笔直宽阔的大街，汽车来往穿梭，十字街口有百货楼、邮电局、银行、医院，围绕大街的是片片“火柴盒”似的二层楼房。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天堂”，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这对从不出门，大部份从未看到过汽车、火车的农

民和市镇上的居民来说，是一幅美好的乌托邦。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医院，只分内外二科，但环境非常整洁，在门诊室的后面，还有住院病房。我向医生诉说症状，开了化验单，之后开了处方同时开了病假证明。

我拖着软弱的身子，步履蹒跚地回到厂里，惴惴不安地把病假单交给我的班长——青年突击班的班长，一个姓戴的青年。我的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以往我患了感冒，有几分热度，把病假单给他的时候，他总是为难地把病假单还给我，要我再坚持坚持。而今天，我实在不可能坚持，如果他仍然不准，那怎么办？幸好，这次他没有把病假单退回我。

我独自一人躺在宿舍的床上，时而起身走向百步外的厕所。这里的所谓厕所，实际是几个人并坐的茅坑，市镇上的茅坑一分二间，在进口的门洞处（之所以称它为“门洞”，是因为它没有门）赫然写着男厕所和女厕所，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当地的农村妇女包括年青妇女需要方便时，全不理会厕所的男女之分。说她们不识字吧！可是明明看到有男人正在方便，她们也会在你的贴近处，裤子一脱，一屁股在你边上坐下。我刚到这里时，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时，就像碰到妖怪似的逃走。后经打听，这里的农村妇女是没有这些禁忌的，习以为常后，就见怪不怪了，但我总感到不自在，如坐针毡。

在床上躺了三四天了，腹泻不见痊愈，只是无力地躺着。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以往我感冒了，人感到乏力，只要睡上半天，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是，这次要命的腹泻，竟把人搞垮了。实际上，我之躺倒，不完全是腹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特别重的体力消耗，是把人累垮的。我昏昏地睡去，昏昏地醒来。现在才懂这实际是严重脱水后的虚脱，神志不清了。到了吃饭时光，饿了就挣扎着去食堂吃一点，有时昏昏地“睡”过了开饭时间，也就算了。那时真不懂，连开水也不知道喝，不要说吊针补液了，我就这样昏昏沉沉“睡”过了这三、四天。

人醒着，却无力起床，原来身强力壮的我，竟一病至如此地步，我望着房顶，转而望望我对面的空床，那张床是一个姓陈的睡的。他参过军，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后来在县公安局工作。为何调离公安局到我们厂里做工人，他讳莫如深，不置一词，人倒是挺老实，不善言词，讲起话来，稍有口吃。老婆跟他离婚了，为何离婚更是不愿提起，有人提起他老婆，他常显露出痛苦的样子。看来此人的生活道路必很坎坷。我们二人的床之间打横的那只床是一同从上海来的一个姓崔的青年。另外在靠门处还有三张床。

我们这房间，时有小偷小摸的现象发生，少了饭菜票啦，少了几元钱啦。但偷也偷得挺“小家子气”，从不把你的钱钞一扫而光，只是抽去几元，饭菜票也是抽去一点。在这间房中，声言少了钱钞次数最多的是那姓崔的，每次发现偷窃现象时总少不了他哇哇大叫：“我也少了……。”而我这个马大哈，从来不清楚口袋里还剩多少钱。工资发下后，给家中寄回

点钱，买足一个月的饭菜票，余下的就胡乱化去，常约上几个要好的朋友在饭店聚餐，那年月只要三、五元钱，就能吃得酒足饭饱。有时“劈硬柴”，有时轮流做东。因为对自己口袋里的钱从来不去清点，所以常常到了下半月口袋里没有钱了，才意识到没钱化了。这样的单身生活也许给了小偷不少可乘之机，而我却木然无知。对有人咋呼少了钱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话虽如此说，但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总是唠唠叨叨说丢了东西，总感到不是滋味。但有什么办法？这可恶的小偷，搞得房间里人人自危，相互猜疑。而外房间的人，望而却步，谁也不敢来串门。

一天，对床姓陈的忽然兴奋地对我说：“我买了几十只鸡蛋，发觉每天要少两只，我也不敢说，怕说了大家心里不愉快。”他说到这里，我心里一沉，这鬼地方还能住下去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兴奋。但他丝毫没有发现我的不快，仍笑着说：“我抓到了小偷。”

好啊，我一听，真大快人心，这可恶的小偷！我迫不及待地问：“哦？是谁？”他快活地笑着说：“昨天半夜里被我发现的，是老鼠！”我不免有些失望，但我马上对老鼠会偷鸡蛋大惑不解，要他进一步详说。他故意卖关子，笑着说：“今天晚上你不要睡得太死，大约一点钟时老鼠就会来了。”他指了指床下放鸡蛋的小缸。我们相约到时互相喊醒。

那晚的上半夜，我没有睡着，真想看看这一希罕的老鼠偷鸡蛋，它是怎么偷的呢？我的对床也没有睡着，我们俩人的竹床不断格吱格吱的响，老鼠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我们熬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都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

吃了早饭后，我要他检查小缸内的鸡蛋，他数了数，说少了一只，嗨！怎么睡死了呢！

到了晚上，我对他说，今天可要留心啊！他笑笑说：“我会喊你的。”

果然，我又睡着了。

半夜，他轻轻地把我喊醒说：“老鼠已经来过了，不要出声，马上就会再来的。”

我一下兴奋起来，睡意顿消。轻轻翻身侧卧，以最佳的视角，努力瞪着双眼，看着床底下，大气也不敢出。从西边的窗户照进一缕月光，在地板上刷出一条柔柔的白色，他床下的东西依稀可辩。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突然，他轻轻地说：“来了！”我双眼努力搜索，什么也

没有，我心里责怪他，何必要说“来了”？这一叫，老鼠的听觉多灵敏，这不又吓跑了吗？

可是老鼠也太猖狂了，一只老鼠走走停停地从西面过来了，在床前走了几个来回，一下窜上了放鸡蛋的缸边上，这时另一只老鼠不知从什么方向也窜了过来，这两只老鼠一下隐没在小缸内，不多时，突然见一只老鼠滚出小缸，定睛一看，这只老鼠四脚朝天，怀抱着一只鸡蛋，另一只老鼠灵巧地窜下来，咬起怀抱鸡蛋者的尾巴，拖着就走，一眨眼就消失在黑暗中。哦！老鼠偷鸡蛋，原来如此！这鬼精灵，真不愧是很高级的哺乳动物，很会动脑筋，偷鸡蛋的方法果真和故事里讲的一模一样。

偷鸡蛋的小偷真像大白了。但偷钱、偷饭票的小偷是谁呢……？

我竟被怀疑是贼

我卧床不起已经有四、五天了，这天一屋子人忽然十分沉默，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搭理谁。我还是昏昏地睡着。我感到孤独，感到悲哀，思念上海的父亲、母亲、弟弟们。这里的一切太冷酷了，这里没有我的亲人，谁也不可能来照顾我，我被人遗忘了。软弱无力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厄运马上降临到我的头上来了。

在全屋人沉默的第二天晚上，那个姓戴的班长，突然光临我的床边，他阴沉着脸，要我起床跟他走。我说：“已经是晚上了，有什么事？”他说：“你到了就会明白的。”我望望同房间的人，他们都背朝着我默不作声，仿佛我是一个传染病人。这凝重的空气，使我意识到出什么事了，我默默地穿衣，跟着他走了。

他把我领到人保干事高××的办公室，一声不响地走出去拉上了门。办公室内只有我同姓高的俩人。他拉长了音调，故意慢条斯理地问：“你生病了，是什么病啊？几天了？”我回答了他。他又问：“大家上班了，宿舍里就你一个人了？”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听后，联系这二天同房间大伙阴沉的脸，意识到事情的全部内涵。我平静地说：“我不知道。”

他睁着一双三角眼，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皱起二条纹路，嘿嘿地冷笑二声，旋即又模仿电影里经验老到的侦察员，点起了一支烟。仍然拉长了声腔问：“你对面床睡的是谁啊？”他明知道还要问，我没有搭理他。他只好自己说：“陈××放在床底箱子里的钱少了二十元，

你知道吗？”

果然要问失窃的事了！

他睁着小小的三角眼盯着我，冷冷的眼光在我的脸上扫视。

我感到情况对我很不利：因为这几天我一直躺在床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间比谁都多。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除了吃饭、去厕所离开外，确实是独自一人在房间的时间最多。会不会是在吃饭的时间，小偷乘机作案呢！这小偷是谁？

我在这样紧张而混乱地思索的时候，他嘴角浮出阴险的笑意说：“我们领导已经找了每个人谈话，我们领导已经掌握了证据，作案人员只能是你。你要争取主动，坦白交待，这是你唯一生路。”

我辩白道：“我从来没有拿过人家的东西。会不会是我去吃饭的时候……”

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我们已经排过队了，你要放明白点，不要错过坦白的机会。”

我一听，混身的血直往头脑上涌，我一生清清白白，他竟要我“坦白”！我想冲上去对他大喊：“你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你凭什么诬谄好人！”但是，我站不起来，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刹时间，奔腾的血液撞得我的心脏狂跳，四肢颤抖，我紧握着双拳，说不出话。

高干事看着我这副模样，好不得意地威胁我说：“你现在先回去，好好想想，不要自作聪明，这对你没有好处！”

我好不容易站起来，转身就走。回宿舍后一看，大家都已睡下。我也默默脱衣睡下。其实，谁也没有睡着。那姓陈的不断在翻身，在长吁短叹。是啊！对他来说，这二十元钱，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往少这么二、三元钱也算了，谁也没有正式报案，而现在一下子偷了他二十元钱，他能不长吁短叹么？而其他的“嫌疑犯”却还没有这份叹气的权利，只能出闷气、上心事的份了。

第二天，姓高的又找我去审问，他又加上一条，说那姓崔的也少了十元钱，这三十元钱一定是我偷的。

我已经比较冷静了，以克制的态度，耐心对他说，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但我也明白，我

没有有力的事实和证据来证明我的清白。在那个时代以及后来很长的时间里，被怀疑有罪的人不能自己证明清白，那就是“不清白”的。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是我独自一人在房间，作案的机会比任何人都多，我脱不了干系。我的体力支持不了这种折磨，我软弱无力地坐着，头脑昏昏的，随他们去吧！

晚上，又继续审问我。姓高的不耐烦了，开始用强硬的口气，时不时拍桌子威胁我，要我交待。这一来也激怒了我，我也用强硬的口吻说：“你这样逼我交待，我要上杭州上北京去告你！”

他一拍桌子，气得大怒：“好！你再不交待，我们领导就把你关起来！”

我说：“你关吧！总有一天我会出来的，那时我再告你不迟。”

他听了，鼻子里哼了两声，换了一种慢悠悠但更具威胁的声调说：“你怎么告呀！我们送你去劳动教养。”

我一听，心头涌起一股酸楚。我想起了在刚进厂时，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一时把心中的苦闷向领导，也就是向党，向党的化身倾诉，当时只是想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然而，结果却是要被送去劳动教养，这里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一样啊！他们歪曲了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我要控告他们！我要向党中央反映他们的胡作非为！这些人是混进共产党内的坏人。我已经止不住眼眶中的热泪，委曲地、无声地哭了起来。

那姓高的，以为我开始害怕了，他拿起一迭纸扔给我，要我写交待，随后走了出去。

我一人在这房间中，对这两天遭受的不公正愤怒不已！我要大喊，我要大叫：“我是清白的！”但我明白，他们不会听我的申诉，这里的领导不是好人，我还是要求他们把我关起来得了！到了公安局派出所，就可以讲得清楚了，他们是会为我搞清楚的。

那时的我多天真啊！把天下的事想得多简单啊！这不奇怪，我心中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形象是崇高神圣的。这里的一切，不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上海的共产党就不是这样的！我这样坚定地认为。

过了好久，姓高的来了，看到扔给我的纸上什么也没写，就不放我回宿舍，继续逼我承认。我筋疲力尽，实在支持不住，有气无力地说：“你既然认为是我偷的，那就把我送派出所吧！我实在吃不消这样的折磨了。公安局一定会搞清楚的。”

他听了竟高兴起来："好！你的态度有了转变。只要你交待了，我就为你保密，不告诉任何人。"他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告诉你吧！我们领导已经掌握了证据。你是在星期三晚上七时到八时偷的。你好好想想，还是交待的好，交待了什么事也没有了。"他在向我诱供了。他的三角眼显得更为阴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走了几个来回，一转身关上门，走出去了。

天哪！我要求关到派出所都不答应，我没有办法洗清自己了。我软弱无力，一阵晕眩。电灯发出幽幽的黄色光晕，更增加了这间空房的悲凉气氛。我昏昏沉沉的，好像置身在小时玩耍的墓地里，我们几人把一只骷髅从破败的棺材中拿出来，放进了七粒黄豆，一个同学刚撒起尿来，那骷髅立时转动起来，向我滚过来，越滚越大，向我当头压来，我努力一挣，啊！还是昏黄的电灯。我泪眼模糊，昏黄的灯光外有一圈光环，像骷髅洞开的大口扑上来吞噬我，我一点不害怕，我倒希望这是真的。然而，眼前出现的是灯光，不再是骷髅。

死！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吧！我望着屋梁，眼泪不住地流淌，上吊吧！电灯更为昏黄模糊，还是赶快动作吧，一死了之，离开这恼人的世界！

这时我的面前，浮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弟弟们的身影。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亲人，我心中涌起无穷酸楚。但决心既下，内心反倒很快平静下来。我长叹一声："唉——我为什么会到这倒霉的地方来？当时要留在上海多好啊！"

这时，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桑树林，我和同伴们在桑树林里嘻笑追逐，抢着桑葚吃，我找到的桑树上结满了硕大饱满、紫得发黑的桑葚，一咬一颗，真甜啊！我左右手同时摘，大把往口中塞。突然我的舌尖像针扎似的一阵刺痛，我哇哇大叫，同伴马上奔了过来，我吐着舌头，比划着。他们一见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才从我的舌尖上捉下一只大黑蚂蚁来。再一看树上的桑葚上有不少蚂蚁在吮吸甜汁。这棵桑树上的果子确实太甜了，吸引了那么多的蚂蚁。

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片桃树林，满树怒放的桃花，竞相开放，粉红色的一片，充满了生机。啊！这令人心醉的春天，令人留恋的春天！

刹那间，眼前的一切消失殆尽，还是空空的房间，还是一根根赭红色的房梁，还是昏暗的一盏电灯……。猛然电灯一跳，比原来亮了许多。我的头脑也突然一醒：星期三晚上，星期三晚上……不知怎么的，我的头脑变得出奇的清晰，脑细胞的记忆库中跳出星期三晚上的情景来。

洗 雪

星期三，我晚饭只吃了二两粥，头重脚轻地回到楼上宿舍倒头睡下。六点多钟，班长派人来叫我去参加班组学习。我说："我连走都走不动，我不去了，请你替我请假。"那人走后，不多会又回来，为难地说："不准请假，说要传达县委精神，每个人都要参加。"我很生气，我病得这样，领导一个也没有来看过我，开会倒没有忘记，一定要参加。

我没好气地说："我走不动，也坐不住，我不去！"说得那人为难地站着。班长进来了，他狐假虎威地说："李厂长说了，这个会不准请假，每个人一定要参加。"我还是不愿起床。他没好气地说："要请假，你自己去向李厂长请。"说完他并不走，一直立在我的床边，实际上是催我快快起来。我只得起床跟着走了。

到了食堂（是全厂开大会的地方），与往常不同的是，不是听厂长的报告，而是分组传达文件，然后进行讨论。这时其它的班组已经在传达文件了，而我们这班组在靠门口的地方坐着等我们三个人。

我很不情愿地坐了下来。他们在念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全没有去听，只是昏昏沉沉地坐着，无力地靠在墙上。不知什么时候散会了，我随着大家回楼上的宿舍……

想到这里，我不禁眼睛一亮！命不该绝，我不用去死了！完全不用去死了！我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全班的人都能证明我——星期三晚上我和大家在一起！

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我静静地等待那个姓高的人保干事的到来。我等了很久，迟迟不见他的出现，我有点忍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幻想着怎样到省里去控告、去上访，控告、上访的时候，我应当怎么怎么说。

好不容易，这家伙终于开门进来，随着一股酒气冲进我的鼻腔。他似乎很得意，拿着几张纸对我扬了扬，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胸有成竹抢先说："我是清白的，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没有……。"

我的话尚未讲完，他的脸马上拉长了，凶狠地说："你这样顽固，对你是不利的。"他又扬了扬手中的纸，"看来，我们领导只能打报告送你去劳动教养了。"

我平静地说："你拿出证据来。"

他恼怒地说："你敢先写下保证，具结你没有偷吗？"

我迫不及待地说："好，我写。"我拿过纸张，急速写了一行字，写完扔给他。他看了看，一拍桌子说："你这样死硬，这对你没有好处，你要明白，"他把我写的纸拿起又扔下，"这对你会加重处理的。"

我大声而坚定地说："快把你的证据拿出来!"

他恶狠狠地说："拿出证据后，你就别想走了。我们马上把你铐起来送派出所。"

我毫无畏惧地说："我不怕，你肯定拿不出证据，你是在诬陷好人。"

"有人看到你偷的，你在星期三晚上七时到八时之间偷的。"

"是谁看到了？叫他出来对证。"

他支支唔唔说："陈××星期三吃晚饭后，钱还在的，有人看见你拿了。"他还在拿这个子虚乌有的人来吓唬人。

不必多费口舌了，我再也按捺不住愤怒："你敢把这时间也写下来吗？"我怕他赖帐。他当然不肯写下来。他还是说："在星期三有人看见的。"

我说："你以后不要赖帐，我现在记录下来，到时我要向各报社写信控告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他没有料到我会如此强硬，竟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又接着说："星期三我明明参加了开会，是戴××硬逼我去开会的，那天是传达县委精神，我们全班的人都在场，都可以证明。"

他怔了一怔。我又把星期三晚上参加班组会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他还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这时我抓住了理，不顾一切地同他大吵起来，把这两天的冤屈和愤怒一古脑儿地倾泻出来。我口口声声说要去告发他，控告他。我望着他阴沉而奸险的脸，真想狠狠地对准他的脸揍他一顿，这个比我矮小的恶鬼，一定经不起我的一拳，准能让他仰面倒下。我愤怒到极点，我不知道后来是如何离开那空房间，回到我的床上。

我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究竟是应该庆幸呢？还是要痛哭一场。我混身酸痛，乏力地躺着，连翻一下身都不想动，望着昏黄的灯光，懒得关灯，脑袋沉沉的，不一会就睡着了。

以后的几天，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再来找我。我按捺不住了，我找李厂长，我说我要写信控告那高干事。厂长淡淡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你没有偷就算了，还要怎样？你写了信又怎样呢？"

是啊！老百姓能把领导怎么样呢？不需要证据，只要有怀疑，"组织"上就可以把你审个天昏地暗，而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需要自己拿出证据。如果拿不出，那——对不起——罪名成立了！等着你的将是严酷的命运，领导上就多了一份"政绩"，因为他又抓了一个坏人。你的这份冤屈，这个污辱，也许要等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有洗刷的机会（尽管可能还留着尾巴）。然而到那时，你的青丝已染成了灰发，皱纹早布满了脸庞，时光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机会失去了，你不得不退回人生起跑线重新开始。你要找原来处理你的人算帐么？他也许早就因为"政绩赫然"而官居高位了，你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他，他也会双手把你亲切地按在沙发上说："你看，现在不是一切都改正了吗？你平反的事情，还是我插手替你办的呢！我们要丢弃前嫌向前看嘛！"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什么？他是"公仆"，你是"主人"，主人哪能心胸狭窄，老是怪罪仆人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的错误，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啊！历史！你这用血与火、汗与泪、悲与欢写下的文明，是这样强大而顽固，总能使新鲜的事物，甚至革命发生异化，使其背离初衷，使其只能盘旋着前进。当五星红旗升起时，踌躇满志的领导者也许不会料到有些人很快就用猜忌的目光审视着原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百姓，用卑劣的手段整治群众，把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和革命的拥护者推出行列，打入"另册"，使人民火热的革命热情渐渐冷却，直至产生八十年代的信仰危机。

一天，一直闷闷不乐的陈，高兴地对我说：他要调回他的家乡去工作了，手续已经办好，明天就要走了。我真替他高兴，是该离开这鬼地方。我由衷地说："好啊！明天乘什么时候的轮船，我送送你。"他说："不用了，我走的时候，你正上早班。这样吧！我现在理理东西，等会吃了晚饭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好吗？"

晚饭后，我们沿着河边散步，他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我要回家乡去了，我的老婆已

经同我复婚。”哦！怪不得他这样开心。

我不合时宜地问他：“你怎么会调到这里来的啊？”他那明朗的脸一下子阴郁起来，口吃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我很后悔不该问他。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了一段路。他拾起一块小瓦片块往河里打了个水飘，一下飞出去很远，他又高兴起来：“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从头开始!”我那时年青，不懂“从头开始”是什么意思。但我明白，他肯定有一段辛酸的往事。这个老实人一定吃过大亏。他突然停下来，意味深长地说：“我被偷了二十元钱，那个崔××也跟着说少了十元钱。但是，后来我又一次被偷了钱，但我没有声张，那一次崔××就没有说少了钱。”

当时，我并没有领会他的暗示。

抓 小 偷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使我至今难忘的事。

有一姓汤的青年，父母双亡，微薄的二十六元工资，要供养年迈的祖母，是够艰难的。一天他报告说，他发下的工资被人偷去了十五元。这下姓高的人保干事又忙开了。

与汤同睡一房的是个有名的老实人。因为这房间小，就他们两人。这位人保干事就把那老实人找去逼他交待。老实人只会大叫冤枉。这次人保干事认为房间里只睡两人，准是他偷的，就把他铐了起来送派出所，那老实人一路哭，一路大叫冤枉。

这老实人被关到第十天，那姓汤的却向人保干事交待说，他的钱没有失窃，是他谎报被偷。姓汤的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当时厂里硬性规定，每人必须参加银行储蓄，不管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一律在每个月的工资中扣除。眼看要过年了，他没有钱给年迈的祖母过年，实在无法，就谎报钱被偷了，这样可以得到厂里出的证明，到银行取出他未到期的零存整取的存款，以解燃眉之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领导压根就没有考虑他的生活困难而发慈悲，开张证明，却弄出一桩案子，害得同屋的老实人在大冷天被关十天，受冻挨饿。他天良发现，于心不忍，只好实说了。

老实人吃了十天冤枉官司总算放了出来，那姓汤的自然被工友们骂得狗血喷头。但谁也不敢去骂骂那个姓高的人保干事，也不想一想根源是出在哪里。

我倒还看重那姓汤的，他毕竟是无意伤害了他人，他敢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使别人免于继续含冤，还是挺有良心的。真正可恶的是手中有权的人，仅仅是凭主观想像就把人关了十天。更可恶的，是他怀疑那老实人一定会偷钱的另一条荒谬的逻辑推理：那老实人新近装了一只“一灯机”（就是只有一只电子管的最低级的收音机，用耳机听，比“矿石机”稳定和灵敏度高）于是，现成的逻辑推理就成立了：装收音机要花钱，花钱就必定要偷。

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推理来办案的人，竟然能居于人事保卫的位置上，实在令人失望！

厂里发生这两件事后，领导的威信扫地。这种专横的、视人的尊严予不顾、侵犯人身权利的行径，激起了大家的不满，对于这些愚蠢的官僚，工人们嗤之以鼻，但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议论，而且只能在相知相好的伙伴之中才敢讲一讲。

贼没抓住，东西却丢得更多了。

我们在生产中各人保管使用的材料、工具也不断发现短缺，小偷小摸的行为从宿舍发展到生产中来了。于是，工人们在恼火之余，自发地留心起来，决心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出出这口恶气。时间一长，大家的目光一致射向了那个陈在临调走时，曾意味深长地暗示过我的崔某身上。我的几位好友告诉我，我病倒时的那个星期三被硬是拉去开会，开会中间崔某曾中途离开过，工友们断定是他偷的，接下来又贼喊捉贼，声称自己也少了十元钱。

但捉贼要捉赃，工人们是不会贸然行事的，大家约定一定要把他的贼手揪住，大家在等待着时机。

一天，又发现少了工具，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肯定是崔偷走了。可是，证据呢？我们可不能做没有证据的事。

我的好朋友吕提供了重要情况，他说：“崔的床下不是有一只大的货物木箱吗？这箱子他配上了铰练和锁，他把偷的东西全放在里面。”

大伙急问：“你怎么知道？”

吕说："有天，崔把车间里的两只灯泡放进去时，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偷眼一看，他箱子里满满的都是东西，全是我们平时少掉的东西。"

我一听就冲动起来，想起了吃过的苦头，再也压制不住了。我头脑简单，什么也没有去想，拿起工具，就往宿舍奔。我的朋友们也不顾生产，跟着我一起冲向宿舍。我冲到崔的床边，一把拖出箱子，把锁撬开，打开盖子。好哇！什么东西都有，全是我们平时少了的东西，大家全明白了。

这时，崔气急败坏地冲进来。

他来晚了，他望着打开的箱子，不知所措。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怒不可遏地说："这些东西是你偷的呢！原来我们房间里的贼是你啊！今天总算被抓住了。"

他在惊魂稍定之后，又使出他的贼喊捉贼的惯用伎俩："你私自翻我的箱子，你就是贼。"我一听他骂我，气愤极了，对准他丑恶的脸就是一拳。他这时还嘴硬，但毕竟怕挨打，用手臂护住头部："你翻我的东西就是贼。"

这时闻声而来的人更多了，我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些东西全是厂里的东西。"我抖落几样东西给众人看，"谁是真正的贼，现在真相大白了。"

他厚着脸皮说："你是贼。"

我被再一次激怒了："好！是贼就该打！我打你这个贼！"我挥起拳头，对着他的头一阵乱打，他双手抱头，一路鼠窜逃下楼去，我不顾一切地追打，追到下面的天井处，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和厂长闻讯迎了上来。崔就往书记的背后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又是一拳。

书记忙说："不准打，什么事？"一面用身子护住崔。

对于这个书记，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我看不惯他专好在女人堆里鬼混，喜听小报告，把逢承拍马的人拢为红人，而崔也是他的红人之一。

崔某，只读过小学几年书，据他说很小的时候从山东到上海，家庭出身倒是贫农，按共产党的阶级路线来说，他是好出身。但他行动鬼祟，经常向书记打小报告，因此深得笑面虎书记的垂青，而工人们却不理睬他。我这时自认抓住了证据，有恃无恐，当着他的面，打了

他的狗。今天既然他来了，我就把大伙捉偷的过程冲他讲了一遍。

这时，崔畏缩在书记的背后，狗仗人势，又指着我骂，我冲上去还要打。

书记发话了："不准打！有我书记在，你敢再打打看！"

厂长也来了，在旁不说也不拉。

书记故意闪开身子又说一句："你再敢打打看？"这分明是说"谅你不敢撒野"。我什么也不顾了，冲上一步，用足全身的力气，对准那张丑恶的惯于逢迎的脸狠狠地一拳。

崔被打出几丈远，仰天倒地连翻了几个滚，趴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地哭。几个胆大的工人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笑面虎书记倒恼羞成怒了，气急败坏地大叫："你当着领导的面，竟敢打人，你还有没有领导？你这是无法无天！我要处分你，我要你检查承认错误。"我说："要我检查可以，那你先处理小偷。"那书记问："他偷的东西呢？"我说："在楼上。"

有人忙说："在这里，在这里！"原来已经有人把崔隐藏赃物的箱子抬下来了。

那笑面虎书记连看也不看，却大声说："这都是厂里东西，还在厂里，这不是偷。"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怎么能这样颠倒黑白，这还是共产党书记吗！我气得大叫："我要到杭州，到北京去告你们。"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

我出了一口恶气。同伴们也出了一口恶气。那个搅得全厂不安的小偷被揪出来了。他虽然得到了书记的庇护，但书记拙劣的包庇反而使领导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我激动而自豪，我头抬得高，胸挺得直，步迈得大，一身正气。的确，自从这次事件之后，我在工人兄弟姐妹的心中，树立了不小的威信。但是，年青无知的我，却不懂得这件使领导难堪的事，为我自己种下了祸根。

这事的结局是不了了之。他们对崔既不调查，也不处理，真正的贼就这样轻轻地放过，对我却暗地下毒手。几年后，我回上海要求区劳动局安排工作，我的请求一直遭到拒绝，我

只得用信访的形式，向市劳动局要求工作，信件转到区劳动局。一天，工作人员上门访问，他对我说："我们从你的档案里看到，你在外地时，一贯打人，目无领导。"言下之意，因为你一贯打人，我们就不能安排工作。

天哪！我成了"一贯打人、目无领导！"这就是档案的威力！这个卑鄙的书记，不敢面对光明和正义，不敢承认错误，只能怀着阴暗的心理，在你的档案中设下"暗器"，毁你一辈子。更可悲的是，在档案里胡写一通，信口雌黄，却不受法律或党纪的约束和制裁。大概没有人因为利用档案陷害人而被判处陷害罪的；同样可悲的是，当事人更是一点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星半点，也毫无用处。因为你无处可讲，也没有任何机关有责任或者有胆量抹去或修改先前写下的结论。任何单位在使用你前对你考察，总是相信你以前"组织上"的结论，而不相信你的辨白。可以说，利用档案陷害人，是一种特务手段！

惯用这种手段的笑面虎书记，在人格上要比那因无意而伤害了老实人的汤某低下得多，我真不知道，在那小镇的三年中，那位书记还在我档案里写下了别的什么可怕的语言。

等苏联老大哥

我这样的一身正气哪里来？学校的教育，书本的教育，也就是共产党的教育，但是一旦用到实践中去，就不一定行得通。我虽然自尊心特强，嫉恶如仇，但在"抓小偷"的过程中表现了年青人的不成熟，为自己埋下后患。

学生时代，受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不算少，中国百年来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屈辱的历史，激起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强烈爱国热情。"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让人义愤填膺。我有一次轻率的举动，差点为自己找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从这"爱国热情"上发生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吧！我回上海，那次走杭州换火车，买的是晚上六、七点钟从杭州城站始发到上海的火车票。因为乘沪杭线的火车次数多了，发现凡上海始发到杭州的或者杭州始发到上海的列车，总挂有一节软席的车厢，我们这些买了硬席车票的是可以进去坐的。尽管列车员大喊这里是软席，把大多数旅客吓跑了，但我们这些老出门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自顾坐下，闭目养神，车一开，什么事也没有。查票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递上你的三元三角二分的硬席车票，不必畏畏缩缩地怕人罚你的票。坐得舒适、安静，出的是硬席票价，何乐而不为？

所以，这次回上海，我也是这样，特意找了这节车厢。上车时，列车员不让上，说是软席，我昂起头，连看也不看她一眼，自管上车。

车厢内空空的，只有五、六个中年男乘客坐在一起，似乎他们是一伙的。我随便坐下，在我的后面不断有人上车，也不断有人被挡住或赶走，但还是有十几个人硬是像我一样坐下不走了。

开车时间早过了，车没有开，出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时间过了一小时，车还没开。这时来了三、四个列车员，来赶我们这些人走，人被一个个赶走了。只剩下我和早于我的五、六个的那伙人，我看到列车员从没有去赶过他们，我就硬是不走。见我坚持不走，他们就退出去了，望着她们的身影，我好不得意。

不一会她们又返回来，原来她们把列车长请来了。列车长来到我的面前，要我出示车票，我大方地把车票递了过去。正在这时车下来了一批蓝眼高鼻的外国人，他们在中国陪同人员前呼后拥下纷纷落座，列车启动了。

列车长对我说："这节是软席车，是给外宾苏联专家乘坐的，你必须到后面车厢去。"

我这时才明白列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是为了等这些"苏联老大哥"。我们这些中国人就这么不值钱吗？为什么不能坐自己国家的车？"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感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的自尊心、好胜心，驱使着我这头脑简单胆大妄为的无知青年。

我傲慢地说："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与外国人同坐一节车厢？"

列车长怔怔地对我看了半天，劝说我："这是软席，你是硬席车票。"

我气愤地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还有中国人的气味没有？"

他脸似乎红了红，尴尬得很，半天才说："那你要补软席票的差价。"

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二话不说，潇洒地掏出一张拾元票面的递了过去。他接过钱要我稍候。转身向那早于我上车的五、六个汉子耳语了一阵（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了列车长的身后）。

列车长走了，其中的三人就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旁边，他们对我审视了半天。大家默默

地坐着。

我定神一想：糟了！这几人一定是公安局的“便衣”，恐怕要有麻烦！

不一会儿，列车员给我送来补的软席票和找下的几角零钱，票价之贵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没关系，咬咬牙，争气不争财嘛！于是，我化了几倍的钱，在这三名“便衣”的保护下，默默地坐到上海，自始至终我们没有开过口。他们尽于职守，没有离我一步。我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鲁莽，太鲁莽了！幸好！他们识不透我的身份，大概我的一身从旧货店——淮海路“国旧”淘来的人字呢长大衣，气度不凡，懵住了他们。

第二次住院

恶劣的生产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我不甘落人后的性格，在三年中摧垮了我的身体，我不时吐血，终于又住进了医院。

这次住的医院，不是公社卫生院，而有幸住进了县医院——县第三人民医院。这个医院是解放后成立的。原来的天主教教堂就是医院的院址。这是一座西洋式普通二层建筑，一进门，迎面墙上的十字架还可以见到，进入昔日的教堂，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内粉刷已经脱落，露出难看的砖墙。医院北面是花园，冬青树已经多年没有修剪过，参差不齐，有的已经枯死。光秃秃的花坛中已经踏成平地，横七坚八拉起的绳上晾着衣服，几棵大树被锯倒在地，满目荒芜。只有北端墙边几棵大树长得郁郁葱葱，让人觉得舒服一些。在绿荫的遮掩下有两间平房，现在成了医院的手术室。一个月中难得用上几次，仅仅做绝育结扎手术和阑尾炎切除之类的小手术。

我的病房在二楼东头的一间小房间中，只有两张病床，我的病友是年青的乡村小学校长。知书识礼，相当和善。全院只有不多的几名病人，门诊病人也不多，医院全天静静的，到了晚上更是寂静。

在宁静的环境下，我得到了很好的休养。

白天我和那位校长看书。我那时对西欧文学很感兴趣，那位校长也特别喜爱，他的书一

大选，任我选择，看完后，谈谈心得体会，投机得很。在这个市镇上，镇工会办了图书馆，但借书的人不多，有些有文学价值的书无人知晓，也无人借阅，我真为这些书惋惜。但这也好，我可以尽情地在瑰丽的文学宝库里浏览。我对英国狄更斯的作品，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等世界名著美美地饱览了一番。在未住院前，只能断断续续、匆匆忙忙地看。躺在病床上就可以整天看，一本接一本看，而且可以平心静气，认真地读。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病假工资，付掉住院的饭费，也足足有余了，我一门心思养病读书，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是我三年来最安定、最逍遥舒适的生活。

住院快两个月了，我沉浸在书的海洋中，漾溢在书友的友情中。然而好景不长，我的苦难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一天，厂里来人通知回厂开会，说要传达中央文件，一定要我回厂参加。我想什么会呀，非要病人参加。

到了厂里，一听是传达中央的“八字方针”，在反反复复的文件声中，我只记住了六个字：调整、充实、提高，漏记了“巩固”。这时（一九六一年）的全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竭泽而渔的“大跃进”已结出了苦果，天灾叠加到人祸之上，迫使在六一年用“大调整”结束了“大跃进”。照我的理解，所谓调整，就是要收缩国民经济的建设规模。我们这个县、这个厂也要把在大跃进中过热的膨胀收缩下来，说白了我们厂必须“调整”一批人回家。会上宣布在大跃进年代从农村中抽来的农民要重新回乡种田。（事实上在六0年已经有一批人回乡了。）同时宣布我们上海来的人不属调整对象。我听了也不在意，这时我们上海来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大多已经辞职回上海了。

我的一个同来的好友姓王，由于看不惯这些领导，也已被调到长兴的煤矿去了。（这个煤矿是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它的煤层极薄，不到一公尺，人只能爬着开采，根本无法直身。这位好友白天在地下爬行，不远的巷道，就有犯人们在劳作。晚上，他与劳改犯一样，也失去了自由，因为四周的山上全是警卫部队。夜晚中，无法分辨民工和犯人，谁也不愿遭到误伤，只得龟缩在工棚中，挨过单调乏味的生活，直到61年以后，才结束。）还有一位知识分子，曾在48年去台湾谋生，在报社当编辑，后来在50年转道香港回大陆。平时他自恃清高，对这些领导不肯俯就，在工作中终于触怒了这些“公仆”，以莫须有的台湾来的“特务”进行审查，开会批判，搞臭了，搞得这些公仆们满意了，最后宣布开除，他被迫回上海。还有那曾劝我少说话的好心的阿姨，因为同当地的一位未婚男青年比较讲得来，领导认为发展下去有“乱搞”的可能，也被打发回上海。

被搞得最惨的是一位搞供销的上海人，他在为厂里承接业务、找寻原材料方面出了不少力。像我们这个完全依赖上海的外地小厂，生存是颇不容易的，尤其是在58年大跃进年代，要在国家计划之外搞到原料，是很了不起的事。此人还为厂里找到了各工种的技术工人，撑起了工厂的技术骨架。可以这样说，厂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他当属头功。

在工厂逐步走上轨道后，到了该“烹狗”的时候了。他大部分时间驻上海，一天突然奉召回厂，到厂没几小时，立即遭到逮捕，传出消息是有经济问题，又听说被判三年徒刑。那么应该是铁证如山了。想不到几个月后他又突然出现，他神情诅丧地向我们几个上海来的人诉说被捕后送县里反复审查，查不出什么经济罪行，现在又把他释放了。他是来厂里论理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大家明白，厂里无非是用此手段赶他走，用心太卑鄙！

这时我们上海来的只剩下四、五个人了。现在该轮到我了，我在上次“打人”事件后，严重触犯了领导的“威信”，该是“穿小鞋”的时候了。

在传达中央文件的会后没几天，又通知我回厂，书记要找我谈话，踏进他的办公室，他露出笑容，阴阳怪气地说：“恭喜你啊！你可以回上海去了。你是在上海大城市生活的，你的家在上海，我们这小地方埋没了你，怪可惜的。”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我们厂贯彻中央的八字方针，要调整一批人，你是本厂第一批调整名单中的一员。”

我一听不觉怔住了，我说：“前几天开会，厂长不是宣布过，我们上海来的人不属调整的对象吗？”

这位“公仆”的笑容是吝啬的，只要“主人”稍稍不听他的摆布，他的脸马上就搭拉下来。果然，他蛮横地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他的阴不阴、阳不阳的语调，一下把我激怒了。他竟说这是党支部的决定，明明在向我说：孤家说了算。我的心一下收紧了。

我明白他开始公开向我报复了，我预感一股不祥的阴云向我袭来，我不能轻易地答应，我就说：“现在我在住院治疗，至少要等我的病好了之后再谈吧！”他却毫无人性地说：“我看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

我反驳说：“好不好不是由你说的，该由医生决定。”

他竟然说：“你想赖在医院装病啊！我们领导已经决定，你是被调整回家的人。”

在笑面虎这些话语的刺激下，我自忖，这个鬼地方早就该走了，回上海后总会有工作做的，我年轻怕什么？但转念一想，户口呢？怎么办？这玩意出上海容易，进上海可就难了。于是我说：“是你们要我走的，你也宣布了我在第一批人员名单之中，但你必须保证我的户口能报进上海，因为上海的户口是很难报进的。”

他听了略微一怔，一丝不易觉察的奸笑从他脸上掠过，马上换成伪善的笑："这当然，我们组织决定的，一定会安排的，我们会有材料到上海的，这你可以放心。"他又友好地说："你可以回医院去了，好好养病，等病好了，再走吧!"

他这 180 度的转变后面，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我还没有学会觉察。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的脑中已经塞满了上海，上海，回家，回家。哦！可以回家了！可以离开这个充满邪恶的地方，离开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我高兴地到宿舍里去转了转，向我的朋友们宣布了这一消息，大家也为我高兴了一阵。我的心已经飞向上海。

善良的李医生

回医院后，我计划了一下，我的病基本上是在好转，再检查一下，住上一、二个星期就走吧。

隔了一天，我的主治医生，一位善良、温和的女医生把我请到了她的办公室。她对我看了看，面露难色地说："你要回上海了吗？"

"是的。"

"你厂里去过了？"

"我去过了，书记已经找我谈过了。"

"你同意了？"

我回答："是啊！同意了。"

她沉默起来，似乎在想什么问题，反复翻看着我的病历。半晌，她又细言软语地说："本来我还要对你治疗一个疗程，现在你们厂里来过人了，要你出院。我看你是不是明天去杭州一次，我给你三、四天的时间，到大医院去检查一下。"

我心想，这书记心真狠啊！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借医生的手来逼我走了。我要强地说："李医生，谢谢你！你为我治好了病，看来没有问题了，血早就止住了，我想杭州不必去了，要检查治疗我就在上海治疗吧！"

我不能为难好心的李医生，我又说："李医生，请你办出院手续吧！"

"现在就办？"她吃惊地问。

"对，现在就办吧！"

李医生在为我办出院手续时说："我给你多开一些药吧！现在还能报销，回上海可要自费了。"她一面开处方又一面叮嘱我一定要按时服药。

我实在被感动了，她是多么善良的人啊！她实际上已经发现了我吐血的病症非同寻常。出于高尚的医德，她想为我彻底观察治疗，但我厂里那位伪君子来催我出院，又使她为难，因此要我去杭州检查，想用医院的检查结果，争取为我继续住院治疗。我真弄不明白，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有的那么坏，那么凶恶奸险？有的那么好，那么柔顺善良？而坏人为什么经常能居于领导岗位，由他们去主宰好人的命运呢？

我面对这位圣洁的女医生，说了世上最简单的两个字："谢谢……。"

她轻轻摇了摇头，继续写处方，要我千万不能大意，一定按时服药，有什么情况，马上去医院。

当这一切办妥后，她又说："这几天护士小张要到上海探亲，你什么时候走，事先通知我。是不是你们一起走，路上也好照应。"我听了笑了起来，我的病没问题，到上海路又不远，四小时乘船，三小时火车，充其量一天的时间，一个小伙子怕什么，我就说："不会有事的，用不着。"她说："你的肺部看来是没有问题了，但支气管扩张极易出血，你的疗程又没有结束，我怕你在路上累了，又吐血了怎么办？"我连连摇头："不会的，不会的。"

李医生听了也摇摇头笑着说："不会最好。我看还是一起走。小张去探亲时把小孩也带走，一个女同志带着小孩，东西一定很多，你不是可以照顾她了吗？你们互相照顾不是很好吗？"我一听是呀！我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我明白，这是李医生有意这样讲，用意还是怕我路上吐血。护士小张工作很认真，终日笑嘻嘻的，待我们病人很好。他的丈夫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厂医。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她去上海探亲，我确实应该为她做些什么，在路上帮她一把，尤其是船到长安镇后，从船码头到火车站，足足有二、三里路，一个女同志抱着小

孩，拖着行李包裹，能不帮吗？

遗憾的是，护士小张先走了，我没帮上忙。事后李医生说："后来考虑到你回上海不再来了，行李铺盖什么东西都要带走，再要你照顾她，会更加重你的负担，再说，她爱人来信催她，她等不及，先走了。"

我不无懊恼地说："我东西全由船托运到上海了，是空身一人走呀！"

李医生笑笑说："她人已走了，你自己保重吧！路上千万要当心。"

我告别了善良的李医生。她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这里，我向她祝福！祝福她一生平安！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我同室的校长病友，直到我离开，我也没有机会同他告别。我临出院那几天，他去杭州医院检查了，而我同李医生告别时，这位病友下乡去看他的学校去了。这位勤奋好学的乡村小学的老师，热爱教育事业的年轻校长，我至今怀念他。我也祝福他！

狐 仙

我等待着最后的手续——我的户口迁移证。我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给我办好，我也不急。真的要离开了，还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这里的领导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他们是一些毫无人性的家伙。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榨取了我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他们最大限度地进行剥削。

也许他们会说：我们哪里剥削工人了？我们不是拿国家发的工资吗？你们创造的利润一分也没有装进我们的腰包，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呀！

是的，他们之所以随随便便废除工人们应有的权利，像政府规定的劳动保护、探亲假等等，逼使工人们像一头头畜牲般劳动，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和利润，当然不是，也不能是为了发财，他们是为了升官！工人们越是拚命干，他们越是官运亨通，权力越大，随之财富也越多。所以，他们对有才能的，或者稍有不驯服的就视作大逆不道，进行迫害。我从解放那天开始，到离开这个工厂为止，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并没有动摇，而是忠诚拥护和跟随，我觉得今天受到这样不公正的遭遇，是混进党内的坏人一手遮天造成的，他们的所作所

为败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但是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在我刚进厂时，全厂仅厂长一人是党员，后来调来了一位复员军人，姓王的党员。当然，他成了我们的班长，我们对他非常敬畏，工作更为勤恳小心，奉他为我们的楷模，我们的领头人。但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发现他做夜班不时打瞌睡，有时实在控制不住，干脆停下工作，闭目休息。时间长了，他还曾对我说这里的工作太苦太累。这一切让我们这些青年人感到不可思议。

目睹他的表现后，我们开始从未有过的懈怠。在老王（我们称他老王）的带领下，我们常常在夜班时玩各种花样的游戏。到了天快亮人最难受时，大家干脆停下手中之活，休息片刻或者游戏。

我们这厂的厂房是过去的民房。这些房子年代久远，保持了明清风格。从大门开始，到最后面共有“九进”之深，也就是有九个厅，每个厅前都有天井。原来的主人看来必定是大户官宦人家，据说去了台湾。由于房屋太多太久远，一直流传有“狐仙”不时出现，狐仙是一位白胡子的老公公，人们深信不疑。

每当有人说看见狐仙出现，是怎么怎么的，闹得人心惶惶时，必被厂长训得狗血喷头。据说为此厂长也害了一场大病。

一天下半夜，大家开始困倦了，我们翻出新花样游戏了。有人提出谁敢上有“狐仙”出现的楼中去，谁就是最大胆的人。

我说：“聊斋我看了几遍，狐狸精是没有的，这是人编造出来的。”

众人马上哄了起来：既然是没有狐仙鬼神，你敢上去吗。

我一向争强好胜，不甘受大家的奚落，极想上去露一手。但说实在的，要我一人上去确实害怕。在进退两难之间，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妙计。我说：“老王（他实在不是“老”王，才二十多岁）是当过兵的，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信奉的是无神论，不会相信迷信的。我同老王一起上楼，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大家齐声叫好。

我对老王的“将军”，把他逼进了死胡同：他绝不可能明白表露害怕心理，否则同他的党员称号不相容，他在这尴尬的境地下，拉扯了半天只得说：“好！我也不相信，我同你一起上去。”我们马上欢呼起来，一起向那幢楼走去。

在路上老王悄悄对我说："上去时，你走在头里，我在后面。"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要带头。"他说："是你先提出的，应该是你在前面。"

我扭不过他，就说："好，我在前面，但下楼时也是我在前面。"

大家在下面天井里观看我们两位英雄登楼。

众人到了那座传说有狐仙出现的楼前，我在前，他在后，在黑暗中壮着胆摸索着上楼梯。刚走到楼梯的拐角处，只听头顶上方的楼上"哗啦"一声巨响，吓得我大叫一声"妈呀"，扭头就逃。老王在后面是双手张开拉住两边扶手上楼的，这时我就低头从他的手臂下往楼下逃，他猛地抓住我，一个转身，欲抢先下去，我们俩人在半楼梯上扭在一起，难解难分，一起连滚带爬，逃了下来。

这时只听到众人一片哄笑声，有的奚落我的"大胆"，有的问我看到白胡子老公公了吗？我这时才明白他们是在捉弄我。原来，他们事先作了准备，当我们上楼时，有人把准备好的东西，从天井里丢上房顶，发出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唬我们。

从这次游戏，我对党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也会感到苦和累，也要游戏，也要舒服的享受。

自从调来几位党员，又调来一位书记后，生产反而下降了，在生产上的"老油条"现象反倒是从这些党员身上开始的，牢骚怪话也是他们敢讲。涉世不深的我，大惑不解。神话开始破灭了。

第三章 户口迁移记

"小 鞋"

在等待户口迁移证的一个星期中，我心中升起莫名的惆怅，这里的山山水水是多么令人留恋。我每天走上石拱桥，抚摸着石栏，这里是我向同伴们一显身手的跳水台。我眺望那朦胧如带的西山，对一直未能去莫干山游玩，去探究那桃花汛源头的幽深而遗憾。我动情地看着三河交汇处的如镜湖面，那里似乎传来同伴们青春的歌声，我独自在桑树林中踯躅，无心摘那累累的桑果，这一棵棵树下，曾留下我和同伴们追逐嬉闹的印迹。回首向古朴热闹的小镇望去，那里有与我衣食同行的伙伴和朋友，有简陋的宿舍，破旧的车间和燃成一丝红线的电灯，有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悲欢喜怒……。

啊！快要离开这里了，所有的记忆统统涌上心头，无论是好是坏，是悲是喜，刹那间都变得如此宝贵，变得令人难割难舍。哦！亲爱的小镇，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走进社会的第一课堂，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你们是我终生难忘的亲人。

支部书记终于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露出似笑非笑的面容把户口迁移证交给了我。我一看呆住了，在迁移原因一栏中赫然写着“辞职”两字。我责问他：“不是你逼我走的吗？我什么时候提出辞职了？”

他阴阳怪气地说：“是你要求辞职，我们同意你辞职，让你回上海不是很好吗！我们这里的共产党与上海的不一样，不是你说的吗？”

我真的急了，我说：“你们让我走，我可以走，但你必须把户口迁移证重新开一张，这样的迁移证，我的户口是报不进的。上次你是怎么对我讲的？”

他得意地阴笑起来，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你与本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你赖下去也没有用。”

好个笑面虎！化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搞了这么一个阴谋，一个圈套，对付我这个年青人。你们身为人民的“公仆”，却处处断绝工人的生路，你那奸诈、多疑、狭隘的内心怎么配作共产党人！这美丽的小镇有了你们这样的人，实在是个耻辱。对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理可讲？“赖下去”的字眼太伤我的自尊心了，年少气盛的我轻率地说：“离了这里就没饭吃了吗？走就走!”我拿起户口迁移证，气呼呼地走了。

怪谁呢？是我自己向他提供报复我的办法：在上次的谈话时，是我自己告诉他上海户口难于报进的，这不是明明向他提示了吗？使得他知道在迁移证上做手脚，最终完成他的打击报复的目的。怪不得他当时在听我说上海户口难报的时候，露出了一丝奸笑！唉！我这个直筒子、鲁莽的人哪！

我预感到前途茫茫，心情坏透了。我的朋友们默默地把我送上码头，在候船的时候，黯然神伤的我们望着大运河默不作声。我再三请他们回去，朋友摇头不走，直到我上船，我们才沉闷地挥手告别。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我回到了上海。父亲已经在六 0 年病故，弟兄四人靠母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无法维持生计，我一到家马上感受到生活的重担，感到母亲在生活的重负下沉重的喘息。我必须马上工作！我必须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没有户口就不能工作，户口是第一要紧的。第二天我就去派出所，要求申报户口。

户口迁移证竟被弄丢了！

我找到我家地段的户籍警，他姓肖，一位相当年青的户籍警，我把我回来的经过，如实地叙述了一遍。他没有提出任何责难，收下我的户口迁移证，爽气地说："我马上送分局户籍科，要有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批下来。你回去，等半个月再来。"

想不到竟这样顺利！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我高兴地离开派出所。我一天天的等，到第十五天我满怀希望地去派出所找这位年青的肖同志，他见了我扔下一句话："你再等半个月。"二话不说，扭头就上楼了。

在焦急之中又等了半个月，我到派出所找这位肖同志，值班民警回答是：人不在。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每天去，回答总是说不在。后来又被告知：肖同志调走了。我急了，我问值班民警，那我的户口怎么办？回答是冷冷的："不知道！"那么新的民警是谁呢？回答也是"不知道"！我一听呆了半天也回不过神来，我忧心忡忡地往家走，有什么办法呢？

一眨眼，我回到上海已经两个月了，可我的户口却石沉大海，焦急的心情，去向谁倾诉啊！

一天去派出所，总算得到"新来的民警姓陈"这一信息，但我还是没有见到人。老天保佑，有一天我见到了这位陈姓民警，此人戴一副眼镜，人很瘦小，斯文而又严肃，难得从他的脸上见到笑容。他问我找他什么事，我像在大海中游泳的人看到陆地一样赶紧把我的情况叙说了一遍，并紧接着说明我是"八字方针"调整回上海的，说我辞职不符实情，是打击报复。我竹筒倒豆子，把实情如实说了，期盼着他的回答。

他第一句话是："现在户口冻结了。"

我一听急了，简直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回上海已经两个多月了，肖同志当时并没有这样说，是在你所说的开始冻结之前。肖同志说送分局户籍科批的，只要半个月，后来又说再半个月，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

陈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上海户口已经冻结，你的户口不可能报进。现在倒流回上海的人不少，都是怕艰苦从外地逃回上海来的，好儿女应志在四方嘛！"

我说："我回上海，不是我要回上海，而是领导逼我回上海的，我与人家的情况不同。再说我在的地方是全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生活要比青海、宁夏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不存在怕艰苦逃回上海的情况，我讲的一切你可以调查。"

他双眉紧锁，已经不耐烦，挥了挥手说："你回去，你回去，你说的情况我们要调查的，我们会向浙江联系的。"我语塞，也无法，只得离开。

我焦燥地在街上走着，烈日晒得我混身冒汗。在外地，遇到一些不快的事，我总是将上海与之对比，总觉得上海的党，上海的干部是有水平的，是通情达理的，如果回到上海，我将会看到国家机关的廉洁、公正、热情、高效，将会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在两个多月报户口的过程中，派出所的同志办事这么拖拉，投射在我身上的眼光是那么冷漠、无情。难道上海也变了么？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忽然想起何不去劳动局走走呢？我到了杨浦区劳动局，我向接待的同志说："我原是区劳动科领导下的'生产自救'组织的工人，曾是你们黄同志管的，五八年秋天我们这个生产组全部去了浙江。"

那位同志点了点头说："这情况我知道的。"

我接下去把被逼回沪的情况向他叙说了一遍。听完，他表态说："你们这批人差不多全回上海了，这情况我们是了解的，浙江原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你已经回来了，我们会给你重新安排工作。你户口报好了吗？"

我说："就是户口还没有报进呀！"接着我把去派出所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说："你请派出所的同志在明天十点钟打个电话给我。"他抄了一个分机号码给我，"我

在这个电话分机边等，我们会把情况向派出所说明的。”

久旱逢甘露，在我面前显露出生机。我千恩万谢这位同志，顾不上吃饭，马上折回到派出所找陈同志。我守在派出所，直等到下午上班时，把此情况向他汇报，请他在明天十点钟打电话。不料他冷若冰霜地说：“我们派出所没有必要打电话给劳动局。”我恳求他，请他打电话，那怕听听情况也好。他不愿听，径直往里走。我拦住他，恳求他，想把电话号码给他。他厌烦极了。我把号码勉强塞到他手中。他头也不回地往里走去。我茫然地呆在原地。

第三天我又去了劳动局，找到那位同志。他告诉我派出所没有电话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我就说请他打电话给派出所。他摇摇头，笑着说，他不能主动打电话，只能是派出所来电话。他见我茫然，于是补充说，他只能做到这样，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对于进一步帮助解决我的问题已经无能为力。

以后我再去找他，他开始避而不见。报户口的希望又破灭了。

我不能怪他，他是劳动局的，不管报户口的事，能主动请派出所给他打电话就很不错了。他不能主动为我向派出所介绍情况，突破森严的部门权限壁垒，招来麻烦。我惊讶的是那位陈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劳神拨个电话呢？为什么对我一个百姓这么厌恶呢？他的职责是什么呢？

我春天回上海，转眼夏天也快过去。我报不进户口，劳动局当然就法无安排工作，我一无工资，二无口粮，这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微薄的工资更难支撑这一贫如洗的家。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天，陈同志找我。在派出所里，他严肃的脸比平时更显刻板，努力做出一付庄重的模样，向我宣布——犹如向死刑犯宣布：“你单位的做法是错误的，你的户口是绝不可能报进上海的。你必须去原单位复职。”

他总算承认我不是逃回上海的，错误是领导造成的，但要一个百姓纠正领导的错误，不是显得滑稽吗？

贫困、饥饿交加的我，别无选择，在陈同志威严的命令下，我顺从地说：“回上海不是我要回，现在你陈同志要我回去复职我也同意，只是我原单位领导……”陈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我们会安排的，你什么时候去？”我说：“等几天我母亲发了工资，有了路费就走。”他说：“去前你来一次，我们派出所有一份公函给你带去，凭此你就可以前去复职。”

陈同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怎么办呢？户口报不进就报不进吧！回原单位就回原单位吧！我一横心，打点简单的行装，几天后我去找陈同志，我一到派出所，值班民警打电话进去，他立即就出来见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见了我，先难得地笑了笑，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今天半夜就走。他把一封信函交给我，装出一付和善的样子对我说什么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工作，每月发了工资要寄回家抚养弟弟们，减轻你母亲的负担，等等等等。我点点头："是的，是的。"他越发讲得兴头上。我只得再点头称是，实在熬不住了，我看了看他给我封好的信件问："陈同志，我去复职了，我的户口迁移证在里面吗？"既要我回去复职，那么我原来的户口迁移证必须带走。

"啊！你的户口迁移证？"他吃了一惊，失去了平时的严肃。本来他严肃的表情给人一种政府部门办事人员认真的印象，现在一下子全消失了。

他的表情反而使我吃一惊，"是啊！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交给肖同志了，他说马上向分局送，半个月就会批下来的，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他这时已镇静下来，恢复了常态。他说："你等一等。"他匆匆到他的办公室去找我的户口迁移证。等了半天，他——一位政府公安机关、管理上千人户籍的警员——出来对我说："你的户口迁移证找不到，你暂时别去了。"

啊——天哪！原来如此！我的户口迁移证竟被他们弄丢了！

复 职 路

前面那个青年民警，把我慎而又慎交给他的，我视为生命的一纸户口迁移证，大大咧咧往抽屉里一塞，轻轻巧巧地拖了半个月又半个月，直到调走也想不起给我半个字的回音，接下来那位姓陈的民警，也根本听不进我的诉说与辩解，同样轻轻巧巧地"冻结"了我的户口，哪怕劳动局愿意向他提供情况，他也懒得拿起电话机，然后冷酷地将我推出上海。这两位民警，为什么不想想人民的国家机关应当为百姓"服务"？为什么对人没有一点同情心？为什么丧失了人类应有的"人情味"？难道"人情味"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在"你的户口迁移证找不到，你暂时别去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下，我暂时留下"待命"。乘此"软档"之机，我提出要求批粮食定量给我。61 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

时，副食品奇缺，粮食特别紧张，居民的粮食计划定量远远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大家在挨饿。我在这几个月中，由于户口没有报进，油粮关系也就无法跟着报进，口粮就没有。所以我赶紧乘此机会，要求陈同志批粮食。他由于理亏无法找借口拒绝，只得在我的油粮关系迁移证上签半个月的定量，我再去粮食管理所申请、批上 12．5 市斤，然后去粮店购买。以后为吃饭的定量，我饱尝辛酸的泪水，这是后话。

一个月后，我从陈同志的手中拿到了原来的户口迁移证（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找到的）。于是我拿上派出所封口的介绍公函踏上了回去复职的路。

当我坐下半夜的火车，在沪杭线的长安镇下车时，天蒙蒙亮。秋天到了，天凉了，从暖烘烘的车厢里出来，被迎面凉风一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我在僻静的小路上走着，就我一个人。从火车上下来的其他十几位乘客很快消失在沉睡的街巷。我独自偶偶而行，向船码头走去。登上即将开航的小轮船，船舱里稀稀拉拉坐了一些乘客，我在最里面的座位上坐下。

船开了，我不禁感到一丝悲哀，命运真会捉弄我，我又回到这个鬼地方了。但不回来，我怎么生活呢？我不仅是单身一人，我是长子，我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啊！但是，我将面临何种结果呢？要求复职，必定会遭到拒绝。如果这样，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下意识想起派出所的信函，我猜不出里面写了些什么，它总是管用的吧！这时，我觉得揣着这封公函好像怀揣着我的命运。唉！听天由命吧！令人摆布吧！

上午十点多钟，我坐在这位“越剧迷”的支部书记面前。

他毫无表情地接过我递给他的信函，慢条斯理地拆开信封，看完后他冷冷地说：“你与本厂已无任何关系，谈不上什么复职问题。”

我挺直胸膛，傲视着这只：“笑面虎”说：“上海的派出所和劳动局都明确表示，你们的作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是有关方面根据政策要我回原单位复职。这不是你我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他竟然耍赖地说：“你不是很会讲话吗？你到北京告状好了。”

我明白再讲下去也是多余的。对这种无赖已没有什么政策和道理可言，我就说：“那你把你的意见批上，我回上海可以有个交待。”

他蛮横无理地说：“你与本厂无任何关系，我不必写什么意见。”一面把派出所的信函丢了过来。

我马上立起身，拿起这些纸张转身就走。他问我：“你去哪里？”

“我去看看老朋友。”

“你不是本厂的人，不准在厂里过夜。”

好一个无心无肺的家伙！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出办公室。

与这位书记的态度截然相反，工友们对我热情而亲切，他们不停地问长问短，对我的处境极为关切。他们告诉我，李厂长与这位书记不和，已被挤走，调到县城的电厂了。他们劝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否则即使复职了，今后仍在他手中，穿小鞋的日子长着呢！

稍年长的给我出主意：上海进不了，这里又不容，不妨去县里找李厂长，请他帮忙安排一个工作。我听了有点犹豫。他们又说，李厂长还提起过你，说过几句赞扬的话。

我脑中浮起抓小偷的那一幕，那天虽然李厂长和书记一同把我挡住，但公开庇护小偷的是书记，李自始至终没有开口。看来李厂长此人，还不像书记此人一味暗中作弄人。为了生活，就去试试看吧！再说在这里生活了三年，还从没有去过县城，反正化几角钱的来回船钱也承受得起。

好事者又说，原来厂里的“歪头李”——也是从上海来的——也调县城工作了，你可以找他，晚上住宿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我匆匆告别了这些好友，在船码头附近的小饭店吃了一碗面，乘上去县城的轮船。

二小时的路程很快到了。这是一个绿水环抱的美丽县城，县城中有两座苍翠的小山，县城的西面群山连绵，风景绝好。我面对风景如画的县城，却无丝毫游兴。我在歪头李处吃了晚饭后，无情无绪地倒头躺下。

他帮我数落缺德的支部书记，也抖出他的不满。他已经五十开外的年纪，由于歪头驼背，没有女人肯嫁他，单身一人。他原是修理袜机的技工，在抗日战争时，从上海到台湾谋生，那时台湾尚处于日本统治，进入台湾还要持护照什么的。抗战胜利后，他所在袜厂倒闭（日本人回国），他失业回上海，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在五八年我们厂发展针织车间时，他被招募到这里，（比我稍早一点），仍干他的袜机修理工。这时他的月工资是六十元，是市镇上的高薪阶层了，一个寡妇嫁给了他，他总算有了家。在我回上海的这几个月中，针织车间下马，他被调到县城，离开了他那刚建不久的家，在县城借了一间房，又过起他的单身生活。后来听说六二年他所在的厂又下马，他被不顾死活的领导一脚踢开——他失业了。一个快近六十岁的残疾老工人，而且这时已经有家室拖累的他，生活如何过啊！此后他的生死不明，我想他总逃不出悲惨的结局。

疲惫不堪的我，对我自己的遭遇已经麻不木仁，我不想同歪头李谈下去，在他的唠叨声中，我呼呼入睡。半夜醒来，大概是二、三点钟吧，再也无法入睡，思前想后，真是好不凄凉。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天稍亮，我就轻手轻脚出了门，爬上了附近的小山。绿水在山脚下绕上一圈后向远方流去。晨雾在山腰缕缕飘荡，苍翠欲滴的树林，时隐时现。整座山峰像披上了一袭雪白的婚纱，登上山顶，远眺四周的山村田野，阵阵秋风迎面吹来，寒意使我打了个激灵。虽然"风景这边独好"，但我回到了我的现实世界，我还要找工作，我还要为生存去奔波，我无心观景匆忙下山。

回到住处，歪头李不在。等他回来后，才知道他已去找过李厂长。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李厂长在参加县里的学习，没有时间同我碰面，捎话来说，他目前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我听了并不感到意外，但必竟也是一个打击。我怔怔地看着老李。老李也要去上班了，我匆匆话别，乘上轮船回上海。

不久李厂长写来一封信，对于没有能见面，表示歉意，更对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最后要我振作起来，要相信情况会好转的。

他的来信多少带来了一些人情味，使我萌生一丝感激之情。

一年后，我尚在临时户口的生涯中挣扎，为了口粮受尽了折磨，一月数次去派出所，以求得在我的粮油迁移证的背面批上五天十天的粮食，但不知怎么搞的，维系着我生命的这张要命的纸，却莫明其妙地不见了，一连几天翻遍了家中的所有角落，就是不见。没有这张纸，我就不能去派出所批粮食，就要挨饿，真是性命交关啊！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了李厂长，我去信，倾诉了我在上海的困难岁月。很快，通过他的关系，给我补来了一张油粮迁移证，同时写来一封充满人情味的信，在危难中，我得

到了他的帮助，一扫对他的怨恨心理。

李厂长的变化，可能与他的处境有关。此时的他，已被排挤出厂，无职无权，远离家庭。这样，他对干部中的倾轧和明争暗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也从他人的不幸中看到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于是，对人生有了一点顿悟，使人性有了些许复苏。

但，这是失去权力后的变化，一旦权力恢复，又将是何种面目呢？我说不准。

临时户口

我重又回到上海，把复职不成的经过如实向派出所陈同志汇报。他听后，要我在家等待，由他出公函联系。我心中明白，是不可能有什么名堂的，事后也果然无下文。我的“临时户口”。的生涯从此正式开始。

所谓的“临时户口”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大跃进的年代，上海大批的青壮年被动员或者自动报名去了大西北等边疆地区，也有的是从上海的企业中抽调技术工人去了外省，支援内地建设。他们大都怀着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满腔热情，气吞山河地离开大上海，虽然对外地的艰苦思想准备不足，但还可以忍受，或者说可以适应，可是“三年自然灾害”使生活倍加艰难，工厂生产规模压缩，部分人自然要“吃不起苦，逃回上海”。

另有一部分人在“地方保护主义”下，理所当然地被精简，一推了之，回你的上海老家去吧！

按照上海的眼光来看，这批人就是“倒流回沪人员”，增加了上海的压力。

这时的上海也在精简，动员在职职工回乡种田。如果这些“倒流”的人员来上海，上海这几年疏散人口的工作岂不是白做了？

中央的精简政策，使各地互相把人赶来赶去，苦的是平民百姓。“临时户口”的形成，是大跃进的恶果，从更为广泛的全国来说，大跃进迫使大自然给了中国三年灾荒的报复，而

受其恶果吃苦的人，就是全国的老百姓。

这里记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后的农村生活：

六 0 年夏天，我回上海做了阑尾炎的切除手术。出院后我就回我工作的小镇。下船后，发现市镇的街道异样地清静，商店打佯停止营业，街上少人走动。厂内也是静悄悄的停止生产。出了什么事？原来，各行各业，全部被动员下乡去“双抢”——抢收、抢种。要赶在“立秋”前收入早稻，插下晚稻的秧。我也被立即赶去下乡。

我们几个青年人被分在一块九亩地的稻田内割稻。割稻理应放干田内的水，但生产队长却不准放水，让我们在水中割稻。这块田的蚂蝗特别多，叮得我们双腿鲜血直流，每隔几分钟就得提起小腿，拍打可怕的蚂蝗，一条腿上有时多至七、八条在同时吸血。割稻、脱粒、翻地、插秧，在这田中我们遭了一星期的罪。而农民呢？他们不肯下田劳动，在队长的催逼下，他们下田了，队长派人在路口桥头守住，不许农民回家。而农民也自有办法，就在地头大睡！管你什么农时不农时，任其稻谷倒伏在水中发芽。

为了完成双抢任务，公社就把镇上的居民赶到乡下帮助农民抢收抢种。从来没有种过田的我们，其插秧质量和以后的收成是可想而知的。能说是天灾么？

“临时户口”的临时公民们，仅仅是全国受苦人群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也仅仅是大城市中的现象。“临时户口”的生活是极为艰难的。如果说全国老百姓的苦难是一重的，那么临时户口——临时公民就要承受双重的重荷。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有稳固的职业和工资收入，他们所受的苦难是吃不饱和营养不良，好歹还能苦捱日子。而临时户口们就更苦了，没有职业——不像在开放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可以做生意赚钱，那时没有职业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就没有饭吃。就只能从家人可怜的饭碗中舀出一勺来苟延日子。

“临时户口”生活的艰难，首先在粮食供应上，即在每天吃饭的口粮上反映出来。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定量供应，标准始终不变，到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紧张，每人每月供应的计划肉类少得可怜（不足一市斤），连蔬菜也计划供应，最紧张时每人每天仅有二市两的蔬菜，食油每月只有二两半。人的肚中没有“油水”，人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仅靠粮食定量（每人每月 25 斤）远远不够人体的消耗，时时处于一种饥饿状态，人人都生活在恐慌之中，而我的处境就更为困苦！

正常的常住户口，其粮食、油、副食品等计划供应，是一次性永久办妥的，按季发放，凭票或凭卡供应，不必每月去办手续。而我是“临时户口”，却要每月数次去派出所找陈同志，只有凭他签发的申报临时户口的天数，再到粮管所按所签的天数，核发粮食定量。

刁 难

不知陈同志工作上是否有长进，我只知道他在给我签发口粮时，立刻显出刁难人的本事。他给我十天一签，比如写上“3 日－13 日临时户口十天”，但是，13 日已是第十一天，这样，我十一天只有十天的口粮。第二次再去签，他就顺延一天签成“14 日——24 日临时户口十天”，这样，24 日又是我的“无粮日”。

他是公安人员，不会不知道整十天应该写成 3 日——12 日，13 日——22 日，但他故作无知，用这种方法克扣我可怜的口粮。为什么呢？兴许是职业使他捉弄人惯了？兴许是逼我离开上海？但我能到哪里去呢？

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他指出了这种简单的算术错误。他听了扳着脸，一言不发，虽然纠正了这种算术错误，但变本加厉地改成五天一签，使我更加麻烦。而且如果碰到该去签的日子是星期日，我在星期一找他签粮时，他绝不“溯及以往”，把过了的星期日算上，一定要从星期一起算，这就增加一天无口粮的日子。更可气的是，他经常同门口值班的同志故意串通，说他人不在，使我这一天的口粮又落空。甚至他会一连几天“人不在”，我就更慌了。

我终于不信值班的人所说的“人不在”，我就硬等，一等就是半天，在穿堂风的过道里，西北风不一会就使我混身发冷，脚趾发麻发痛，寒气透过棉衣，混身热气全无，止不住瑟瑟发抖。更令人寒心的是。走进走出的户籍警，从不正面看人，最多斜着脸看上一眼，一副不屑一顾的神色，在他们的脸上找不到丝毫的同情与怜悯，比这严冬的西北风还冷，冷得叫人心脏也要发痛。

我以麻木的神色、呆滞的目光，看着他们进进出出，我所急切等待的陈同志却一直不露面，时间长了偶尔也有民警问我你找谁啊？这时那个在门口值班室内的女民警就会抢着小声与他说上几句，再扁扁嘴，显出一付鄙夷的样子，那民警听后，一声不响对我瞥一眼就走，这是对下贱人多余人的一瞥，它像利剑一样刺伤了我的自尊。

在这冰冷的过道里，我成了印度的贱民。我的心在淌血，我不明白以民主、平等、自由为口号的革命在成功后，为什么这么快就制造了这么多的不平等？我也不明白取得政权前充满活力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了冷漠无情的衙门。有时我受不了那女民警不时飘来的藐视眼光，愤愤地扭头就走。在马路上，我想完了，这一天的口粮完了。

完就完了吧！

我明白，为了生存，第二天我还得走进这冰冷的派出所，忍受屈辱，求得可怜的几斤定量。不过我改变了方法，在早上七时一过就去派出所门口恭候这位大人。我成功了。一个小时就办成一件大事，少受了半天罪，很高兴。

可是不久我又被愚弄了。这位陈大人被我几次“拦轿”成功后，马上变了新招。

一天，我还是七点一过就到派出所，直等到快九点了还不见陈的人影，问问那传达室的女民警照例是爱理不理的白眼，我只得再耐心等。等急了，再小心翼翼地问。她半天才回答说不知道。

我这半天白等了。下午是不必去等的，他不是开会就是外出，我从未在下午找到过他。

第二天再去。奇怪！还是等不到人。我寻思了半天，噢，有了，他从分局的大门进去了，没有走派出所的门上班。我这地区的派出所是和公安分局连在一起的，从分局的门进来，可以拐到派出所。

为了对付我这区区小民，为了不让我方便地得到应得的口粮，他一个堂堂的国家干部为什么这样处心积虑地刁难我呢？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更不敢与他争辩，为什么他要这样整我呢？我真是百思——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同志整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住的弄堂只有四十来户人家，他整材料送去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就有四人。四人帮跨台后，这四个人的错案、冤案才得以平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这时已经调至法院工作。给这些人的平反工作恰恰是他主持的。这不由使人想起抗战胜利后，有些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接收大员”的滑稽镜头。

他没有中国古代一位官员在错判了案犯死刑之后，以自缢谢罪的勇气，他只是对受尽冤屈的当事人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作出猫哭老鼠的同情，但是他没有忘记在平反判决书中，给当事人留下一条永远也割不掉的“尾巴”，让你明白：过去抓你是对的（你的确有错有罪），现在平反也是对的（这是一种恩典），迫害人的人却永远是正确的化身。他仍然当他的法官，而且也永远用不着具有日本相扑裁判那种在腰间插一柄剑，如果裁判错误，即用以自尽的自律胆量。

我的这番回话使他感到索然无味，他打了个哈欠把我搁在一边，管自与另一民警有一句没有一句地闲聊起来。刚才的紧张气氛消失了，我就留心他们的谈话。从他们的谈话我才明白，陈是轮到值班，闲得无聊就把我从热被窝中叫来，用这种突然的审讯来吓唬我，想用这

种他们惯用的哄、骗、吓的手法，榨出问题来，把我顺便送进监狱。

在这温暖的屋子里，我开始感到困倦，不觉打起瞌睡来。待到醒来，天已破晓，他们看来也瞌睡刚醒。陈见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就挥了挥手："你回去吧！"就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一样，他大概觉得这是例行公事，理应如此。

那五十年代，百姓没有看过现在这么多的外国影视片，我只隐约听老师说过有个国家牛奶、小麦多了就往海里倒，却不知那个国家警察进入民宅竟有啰哩啰嗦的法律手续，更不知法律与牛奶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反正当时我觉得陈同志深夜把我带到派出所审一个晚上是挺正常的，绝不会想到法律啊，人权啊之类的事。

中西法律文化发展大约是不同的。古希腊从奴隶制起就有"元老院"，实行奴隶共和制，元老们（奴隶主）大家讨论了才算数，共和习惯由来久矣。中国从夏、商奴隶制开始则就是君主说了算，虽然泱泱汉、唐、宋、明都有律、令、科、比，或律、令、格、式，或律、令、格、敕等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每朝每代都将帝王发布的"令""敕"作为高于"律"的法，随意改律、破律，个人独裁久矣。

待到新中国成立，废除了《六法全书》后，法律就成了零零散散的政令、条例、政策。悠悠三十年后，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新中国方才有了第一部刑法典。那天晚上也许是"习惯久矣"之故，理所当然我就被这小小的户籍警无缘无故地"侵犯"了一次人权而并不觉吃亏。

在陈同志"你走吧！"的命令下，我忙不迭地滚出派出所，深吸了一口冬日清晨鲜冷的空气，庆幸没有被抓住"辫子"，好像获得了大赦。

也难怪陈同志，他也没有看过那么多西方影视，自然不知道他的行为是侵犯了人权，而且不管他是出于升官或是别的什么动机，他那政治鹰犬般的警惕总是可嘉的，并且也确实挖出了"敌人"——尽管后来都平反了。

陈同志不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放过我，兴许是他特殊的嗅觉告诉他，我这样一个没有工作而又爱看书，善思考的人不会是驯服工具，在他看来必定是个危险份子。于是他又变换了方法对我搞突然袭击。

矿石机惹个祸

每天去图书馆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看书可以使我暂时忘却痛苦和不幸，增加知识和见识，真可谓其乐无穷！然而那时的报纸、期刊很少很少，在一个月中，不可能每天有各种期刊供我阅读，有的藏书我又错不到手，只有等到新的期刊来了我才能重新埋进知识的海洋中去。在新的期刊没有来时，就只能在家待上几天。

闲得发慌的时候，我就帮里弄食堂干点装水电的活，东西坏了帮助修理修理。一天从食堂拆下十几公尺报废的电线，我要回来，萌发了装一只矿石机的想法。

那时我家没有收音机（有收音机的家庭很少）。有了矿石机可以听听每天的广播书场——苏州评弹，听听音乐。人在这样冷酷的环境中对生活还不至于绝望时，总还要改善一下，放松放松，美化生活大概是人的天性吧！

现在矿石机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它不用任何电源，只要按简单的线路把一只现成买来的，用硬纸糊起来的线圈一只单联和一颗矿石连起来，就可以用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当地电台的广播节目了。但还必须在屋顶上树起长长的天线。我的天线拉了十几公尺长！从远远的马路上看起来比有的人家蜘网式天线气派多了。

一天下午，我躺在三层阁我的床上，收听广播书场的评弹节目，突然陈同志和另一姓朱的女户籍警，像两条蛇似的，无声无息出现在我的面前，陈一下扑上来，把我塞在耳朵上的耳机夺去，往自己的耳中塞。

我马上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我很坦然地往边上让一让，离矿石机远一点，好让他明白，我现在是在听什么，也好让你们试一试，看看这简陋的机器能否收听“敌台”。

陈听了几分钟，又对矿石机仔细端详了半天，好不失望地放了下来。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扯了一阵。

陈果然不死心，不断拨弄检查我的矿石机，像在研究一只伪装得很好的定时炸弹。而朱则东看西看，问我天线是怎样拉起来的，又是怎样装矿石机的，言不由衷地夸奖说“你真聪明”等等的话。陈把我的矿石机折腾了一阵，没有结果，与朱悻悻地走了。

可气的是，他们为了这只可怜的矿石机竟几次三番地到我家搞突然袭击。有时晚上来，有时我人不在，他们也上楼翻弄，每次的结果当然是令他们失望的，我暗暗讥笑他们：一个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矿石机收音机能收什么“敌台”呀！真是无知得不能再无知了！“猛然间，我混身一激灵——他们虽然查不出什么，但会不会昧着良心打上一份报告就此把我抓起来送劳教、劳改呢？

算了，我也怕了，把矿石机拆了，天线也拆了，何必自找麻烦自找罪受呢！

果然在几年后，文革中我被批斗审查时，造反派说我一贯收听敌台，刷出的大幅标语称为我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想必这是陈同志的功劳，在我的档案里抹上了这终生洗不掉的“污点”。

感谢矿石机那可怜的灵敏度，使我躲过了一次灾难。可是，我眼看弄堂里的几位青年被陈硬是用极荒唐的理由送进牢狱，劳改的劳改，劳教的劳教：

这些人是无辜的。有一位青年在闲得发慌时，以青年人的顽皮，把人家刷好的马桶一只只踢翻，最糟的是他跳将起来撕里弄委员会张贴的已陈旧的标语，以夸耀自己眼明手快，就此闯下大祸，“积极”的里弄干部把这些“劣迹”汇报给陈，被送教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只得火烛小心，不敢“乱说乱动”，唯恐被抓住一些小辫子而被送上“断头台”。

走街串巷为生计

谨小慎微，固然可以避祸，但是，我报不上户口，就无法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怎么吃饭呢？

三年大灾荒后期，铁板一样的政策裂开了一条缝——十六铺开放了“自由市场”。尽管在偌大的上海只有这一丝缝隙，但已经是绝大的新闻了，况且名称又冠以那样吸引人而又让人颤栗的两个字——自由！是啊，自由——这个在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时，曾像燧石那样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信念之火的词汇，百姓已经非常陌生了，或者说已经使人心惊肉跳，讳莫如深望而生畏了。

尽管“自由”是老师批评学生，干部批评工人常用的贬义词，但是十六铺的“自由市场”还是繁荣的，在自由市场上只要有钱，鱼、肉和各种时新蔬菜都能买到。

虽然政策只是极为有限地松动了一下，但各种修修补补的行当可以公开活动了。为了吃饭，为了养家活口，我串家走巷红着脸学着叫喊起来：“修电灯——自来水！”在一阵讨价还

价后，为了三角五角极为低兼的手工费化上一、二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查找陈旧的电灯线路上的毛病。

这样的活儿，必竟不多，一天走下来人辛苦得很，钱又挣不到。整天不在家，那位陈大人不知了我的去向，肯定不放心，万一追究起来我如何说得清呢？我灵机一动，在弄堂口的电线杆上挂起一块牌子："装修水电"。果然有人找上门来。本地区的里弄生产组、幼儿园、托儿所的活儿全由我包了。但活还是不多，大多时间闲着，但人却不能走开，图书馆也去不成了，挣不了几个钱，损失倒挺大的。唉！文化生活上损失就损失吧！否则肚皮怎么才能填饱呢？

姐夫从北方买来一只简单的织袜机，让我加工袜子来赚钱糊口。在三年困难期间，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匮乏，什么都要凭证凭票供应，门类繁多的证、券成了市民购买生活必需品不可或缺的凭证，每人每年的布票仅二市尺，这就成了国外赖以嘲笑的所谓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口实。脚上穿的袜子当然也是计划供应的紧张商品。那时袜子是棉纱织成，穿两、三个月，一双袜子就破了洞，城市的人总不能赤着脚穿鞋呀！但每户计划供应的用来缝缝补补的棉线尚相对有剩余。这就给善于动脑子的上海人带来了一种机会，上海开始有人用织袜机在市区公开代客加工。四到五只线团能摇成一双短统的袜子，收加工费二角五分。我很就掌握了这门简单的技术，生意竟然不错，一个月可有四、五十元的收入，最好时能有五、六十元。

我没有临街店面，只能在楼上家里干，为了与在马路边有门面房子的同行竞争，我把织单一颜色的袜机，改成织双色有图案的袜子，果然赢得了妇女们的青睐，生意红火起来。一家人共同劳动，弟弟们放学后也帮我把一只只线团摇到筒管上去（这一简单劳动工序的机器是我用农村古老的纺棉花的纺车改装的。）

这是一段困难的岁月，一家人为了区区几十元钱辛苦地劳作。但这又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小小的陋室中充满了纺车的"吱扭"声、织袜的"沙沙"声和母亲、兄弟的欢笑声。贫苦中，一家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我爱护弟弟，弟弟们也尊重我。每天能吃上粗茶淡饭，人人能穿上补丁衣服，整个家洋溢着幸福和温馨。但是现在弟兄们天各一方（其中一个去了美国，又惨死国外。），相互不再理解各人的思想情趣和为人。每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忙着各自的事。唉！我真怀念那段纯真和睦的家庭生活啊！

这样相对安定的生活大约过了一年。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这期间，那位陈大人再也没有来折磨我，或许是经过了多次的"考验"，我没有犯什么错？或许是我有了"职业"，没有时间去干"反革命分子"的事，他放心了？也可能是折磨我最严峻的时候，我曾服毒自杀过，以死来同他抗争，他怕承担责任，而放松了对我的迫害？（这段经历，回忆起来太痛苦了。我不想用笔墨写下来，就前面这些回忆，也使我痛苦不已，时时搁笔，待平静几天后，始能陆续写下去。）或者他虽然没有能将我投进监狱，但已在我的档案里写上了"偷听敌台嫌疑"、"研究毛泽东思想动机可疑"之类的文字，足以毁我一生，因此，他认为目的达到了？或许，各种因素都有?

陈同志的“良苦用心”

也许陈同志在粮食问题上刁难我已经腻歪了，他本能地更想把我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好使他的管段中被判刑、劳教的人更多，从而政绩更加“蜚然”，有更多的提升机会。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肆无忌惮的巨响把四邻全吵醒了。我想不出哪个亲友会在深夜这样来敲门找我。我披衣而起，赶快下楼去开门，门口站着一脸庄严的陈同志，要我立即跟着他走。

我当时仅披着一件棉衣，下身只穿着短裤，我说，那让我上去穿好衣服走吧！我不等他答应，匆匆上楼穿衣，我仅对母亲说了声陈同志找我，就下楼随他走了。

我们默默地走路，我猜不透他为什么深更半夜把我拖起来。管他呢！我心中坦然地想：“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我不怕鬼，但是，这敲门的不是鬼。

我只好跟他走，寒风吹在身上彻骨的冷。幸好派出所离家不远，很快就走到了。

进了派出所，那位大人往办公桌后一坐，顺手把一件棉大衣往身上一裹，身子往后一靠，双脚跷在桌面上，一改平时斯文，露出流气的本相。我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让我坐，我不敢贸然就坐。当然，更不敢，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去质问他凭什么深夜私扰民宅。浑身发冷，止不住的发抖，不觉望着他裹在身上的棉大衣。他的脚不时抖上几抖，逍遥得意地审视着他的猎物。

几分钟后，他终于开口了：“知道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到派出所来吗？”

“不知道。”

他故作姿态说：“不知道？你干了坏事赶快交待，要老老实实坦白交待。”

我惊讶地说："我每天老老实实在家，从来不做坏事。"

他冷冷地说："哼！那你为什么发抖？你做了坏事，怕了才发抖！"

我争辩说："我刚从热被窝中被你叫出来，天这么冷，是冷得发抖，并非做了什么坏事而怕得发抖。"

他一下跳了起来，拍桌子大吼："你竟敢不交待，这对你没有好处！"

我冷静地反问："我有什么可以交待的？"

他继续哇哇大叫一阵。我则以沉默来对付他。大概他自己也感到无趣，重又坐下，怔怔地看着我，半天，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那你把在家做了什么事，每天又去了哪里写下来。"他把几张纸扔在我面前说："你老实点，全写下来。"

我找了只椅子，就坐在他面前写了起来：

上午干家务，烧饭，下午去图书馆看书看报。

他看了这廖廖一行字倒不嫌我写得少，反而很感兴趣，问道："你都看些什么书啊？"

我说凡是图书馆出借的各种报纸和期刊我都看。他又问我看后有什么感想？我说没有感想，增加点知识，消磨时光而已。他想了想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期刊？我对他说我看的都是一些科普类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航空知识》、《旅行家》。他又问，其它的呢？我说还有就是《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萌芽》、《译文》。他又问看些什么报纸呢？我说图书馆内全国各省市的报纸都有，我都看一点。他还是紧追不放问我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我明白他的用意，回答道：没有感想，看过就算。

他问不出什么，但还不死心，又问我看些什么书啊？我就对他说，我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办不成借书证，所以借不到书看。我想，这家伙今天非要抓住我的把柄不可，但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这样的回答他，他一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完全把我当一个反革命份子在对待，我必竟是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教育的青年，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我热爱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是我的生活道路。一种委曲的情绪使我对他说："我最近在看毛泽东选集，在认真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一下来劲了，露出难得的细微笑容："好呀！是该好好学习，你做学习笔记吗？"马上又迫不及待地问："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

我轻松而据实回答："我从来不做笔记的。"

他显然失望了，装作不无婉惜的样子说："学毛选要认真学，把学习心得记下来，这样有好处。"

我心中暗笑——这位陈同志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了：让我白纸黑字地写下学习心得，然后抓住把柄往死里打。也许那几个被整的人就是他用这种政治公式送进"大墙"的呢？

对他的建议式的"关怀"，是必须表态的，我自然地说，"我哪里有毛选呢？我只能每次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看半天。"

我的回答也是实情。的确，那时普通百姓不可能得到毛选，不像文革中人手一套或几套。在阅览室翻翻看看，做什么笔记呢？再说我读书确实很懒，从不做笔记和写心得体会。老实说，我还不能算是在学毛选，只是看毛主席如何指挥解放战争的一些文章，当历史书看罢了。

他装出一付和善的样子，循循善诱，要我以后一定要做笔记写心得体会，我只得不断点头称是。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他又几次催促我写心得。我为了应付，只得小心翼翼地写了一些，自认绝对没有把柄可抓，才交给了他。他如获至宝，一把抓起来，看也不看塞进口袋就走，不知他拿回如何研究的。事后我也淡忘了。

不料事隔几年，在文革中我被审查时，厂里的造反派加给我的一条罪名竟是：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逼我交待研究的动机和目的（文革中，"动机"和"目的"是凶险的贬义词）。

可见这必是陈同志留下的"杰作"。一定是他把我写的东西塞进了档案，但在其中又找不到"把柄"，于是"妙笔生花"写上类似"此人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研究，其动机值得怀疑"之类的话。厂里的造反派看了，便加上我一条罪名。

我的天哪！如果我写的东西稍有疏忽，他就能直接送我进大牢，但我写的东西实在无刺

可挑，竟又变成“动机可疑”，这可叫人怎么活呀！

让我们再回到那冬夜的“审问”中吧！他看看一时无辫可抓，但又不死心，又试探地问：“那你是怎么想起要学毛选的呢”——他在摸我的动机了。我认真地说：“我在浙江三年，工作是认真的，多次评上过先进生产者，但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结局呢？我总结了我这三年，我认为是我没有很好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的家庭出身不是一个纯无产阶级家庭，在我身上有不少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一定要努力改造思想。”

第四章 临时公民的外延

户口政策开了一条缝

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户口政策紧闭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些比我晚回上海的人，趁机挤了进去。我的左邻小宁波，原从上海动员去江西新余钢铁厂，他最先报进户口，很快按排了工作——在军工路的某厂作临时工。我的右舍是五八年动员去宁夏的胡姓一家，继小宁波之后不久亦全家挤进了户口大门。

这位胡姓居民，原籍苏北，父辈很早就去了日本，靠一把理发刀在异乡谋生。他生于日本，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全家从日本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他迁到我家的隔壁，开了一爿小小的洗衣店。他们在家时常用日本话交谈，日语相当流利。只有他回国后讨的老婆不会讲日语。

洗衣店生意清淡，一家人实在混不下了，夫妻俩人就去杨浦中心医院洗病人服和病床床单。夫妻俩就住在医院太平间的隔壁，艰辛地劳动。一九五六年的公私合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转机，相反医院的病人服倒不给他们洗了。守着门可罗雀的洗衣店生活更为拮据。五八年，他们和一批小业主被动员去宁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家“倒流”回上海，但上海已没有他们的“家”，只得在弄堂口的过街楼下栖身，最后总算被他要回了原来房子的灶披间（即厨房），一家四口（两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成了五口）倦缩在五、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总算有了一个“家”。生活的来源就靠在日本 NHK 电台工作的堂姐接济，每次寄来的二万日元和一点旧衣服，还要在哥哥和侄子间分配，闹出不少矛盾。

那个小宁波尖嘴猴腮，形容猥琐，靠着老婆生活，是个典型的市侩，很遭邻人鄙视。但

他的老婆却是我们这一带弄堂里出名的美人儿，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鼻梁挺拔，眉间天生一颗美人痣，喜穿一身合体的旗袍，行、立、坐、卧，婀娜多姿，活脱一个西洋美女。

小宁波并非是这美人的原配丈夫。这美人原来嫁给了一位南下干部山东人，此干部在油漆厂任科长。小宁波和这女人同在针织厂工作，一直垂涎她的美色。在小宁波过着油头小光棍的生活时，经常厚着脸皮到这山东人家串门作客，山东人倒很好客，经常与他一起喝酒，但小宁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喝酒之间利用山东大汉对工作中的不满，有意识地撩拨这位南下干部的一些牢骚话，小宁波用心记下并添油加酱向上级检举。这位南下干部，这位耿直的山东大汉终于中了小宁波的奸计，被送进大牢。小宁波乘机占有了这个美人并挑唆她同山东大汉离婚。

工人和邻居同情山东大汉的无辜，憎恨小宁波的奸诈，出于义愤，一群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上门捉奸。但是，在政治问题重于一切，只重抓反革命而不论公理的社会中，这些可敬的爱打抱不平的工人只能空忙一阵。最终这女人与山东大汉离婚，小宁波与之结婚，“合法地”占有了她。山东大汉出狱后，被迫带着大女儿黯然离开上海回了山东原籍。小宁波照单全收，接管了房子、家俱、老婆、孩子，成了现成的丈夫、父亲。

小女儿成了小宁波的继女，小宁波对此女儿非打即骂，丝毫没有父女之情。不久，小宁波自己的儿子出生了，这个被视为“拖油瓶”的女儿更成了小宁波的使唤丫头。因此邻居们对这个卑鄙小人更加恨得咬牙切齿。

要说那位“西洋美女”的身世也是很苦的，她从小由于家贫，父母把她送了人，但不久养父养母双亡，于是她做了童工。六三年亲生母亲通过组织找到了这位从小离散的女儿，此时女儿已成了小宁波的老婆。小宁波出于自私，百般阻挠她认自己的亲娘，使她的处境格外悲惨。可怜这个天生丽质的女人，由于过分贫寒的经历，使她不可能具有稍高一点的文化知识和女人起码的独立意识，否则那小宁波即使能设计陷害那位南下干部，也不见得能摧残这朵鲜花。

邻里中有这样的一个卑鄙小人，我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只得小心从事，尽可能免生口舌是非，极力当心他在陈同志前打我的“小报告”。但话虽如此说，我这人心直口快，难免不漏出一些消极悲观的话，成了他打小报告的材料。

对那位胡，我的话就说得多一些，我们时常在一起闲聊。他多次提出要教我日语，说我年轻，不该浪费光阴，学一门外语，总会有用的。我听了不以为然，在那个时代，懂外语就等于里通外国呀。再说也毫无用处，他本人的经历不就是很好的例证吗？得了吧！我不去为自己添麻烦了。我以笨为借口谢绝了他的好意。在同他的交往中，我也时时告诫自己要小心。果然，有天陈带着人来抄了他的家，把人抓走了。我庆幸我的小心，他的被捕没有给我带来麻烦。

过了几个月，他又奇迹般的回来了，而且回来那几天他还显得特别高兴。后来他陆续告诉我他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捕他的罪名是贪污。在被捕时，派出所抄了他的家，但未获罪证。他关在公安分局两个月的日子里，用家传的理发手艺，为被抓的人犯剃光头，总算没吃什么苦。后来宁夏方面的公安局来人把他押走了，在北京转车时他乘机逃了回来。动机是妻子怀孕已经足月，要临盆了，他要回家看看妻儿。火车快近上海了，他不敢在上海的北站下车，唯恐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住，就在近郊的南翔车站下车。下车时已近半夜，他在漆黑的公路上向上海市区奔走，越走越怕，不走更怕。天亮时回到市区，又不敢回自己的家，白天在马路上流浪了一天。黑夜到自己的哥哥家，由侄子把妻子叫来，见到了出生不久的女儿，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夜。两天后，他又被抓了进去，一直押到了宁夏。据他说，这次还好，问题搞清楚了，他没有罪，是被错抓的。乘此机会，在宁夏，他提出了一家人的户口问题。原来，他一家人回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倒流”，即什么户口迁移证都没有，只光身回来几个人。因为抓错了他，就开恩给了他一家的户口迁移证，成了上海的“袋袋户口”。所谓“袋袋户口”，就是户口迁移证是有的。但迁进地的公安派出所不接受，只得放在自己的口袋中。

也许是把胡抓抓放放，派出所觉得多少委曲了他，胡的户口在小宁波之后不久也解决了，很快被安排进一毛纺厂做临时工。

地区里的临时户口——袋袋户口差不多全解决了，结束了最苦难的生活，而我为什么还遥遥无期？我便去找陈同志说理，他冷冷地一句话：“根据政策，你不可以报进户口。”

我倒噎一口冷气，那么是什么政策呢？对不起！小民是不可以问的，于是小民们也都不敢问，因为小民是无权明瞭“政策”的具体内容的——怎么可以让小民看中央和地方各级的“红头文件”呢？于是，“政策”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政策”允许的，地方和基层的小吏也可予以曲解，甚至用“政策”二字作大棒，打得你晕头转向而至死不知“政策”究竟为何物。

不过小民们也揣摸出一个道理：户口政策的紧缩或松动，是和经济状况连在一起的。这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于是户口也就随着松动，劳动就业就有了可能。我明白，这时陈同志在故意刁难，有意把我的户口压下。我不明白的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生活，从未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未敢半点得罪陈，为什么他却一直这样压制我，迫害我，不给我生存的权利呢？

进了聋哑、盲人福利工厂

这时在我家附近有一爿福利工厂开始创办，要收聋哑人和盲人，由身体健全的人组织他们进行生产，产品是低压电器开关之类。由一马姓妇女任厂长，因为她的子女都在部队，她人缘挺好，故大家都尊称她“光荣妈妈”。她打听到我对胶木件压制是内行，就上门来聘请我任技术指导，允诺由她出面去派出打交道，解决我的户口问题。我想，我同陈已经无话可说了，由单位出面，或许是一条生路，我欣然同意，马上就上班。

到残疾人工厂去上班，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平常的，但对此时的我，却是获得了新生！我又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我又可以过大家一样的生活！我将不是一个“临时公民”了！这种滋味，别人怎么能领会呀！我从心底感谢这位慈善的“光荣妈妈”。

踏进工厂大门，我兴奋又新鲜，虽然这工作我是内行，但眼下要带的徒弟却不一般，他们是盲人、聋哑人。开始我真担心这些人如何能胜任和做好这些需要眼睛和耳朵的工作呢？不料几天下来，发觉这些人非但聪明，而且做得比常人还要好！

这家福利工厂属区民政局管理，挂的是地方国营的牌子，全民所有制。设备是简陋的，但也有少数设备蛮不错。有些设备是无偿地从其它国营厂调拨而来，比如有台压机是用油泵液压的，就是由“光荣妈妈”——马厂长，带我去医学模型厂，经我看过认为可以使用才调拨来的。这台油泵压机在当时算是很先进了，我从未使用过，它可以摆脱繁重体力劳动，有几部车床也很好。

我在胶木件的压制车间负责教这些盲人、聋哑人如何熟练生产。第一天我真不知如何入手才好，首先我按盲人与聋哑人的其身体条件来分工。厂里的盲人以前大多数是敲着小堂锣，串街走巷，靠算命维持生计，他们大都是因为生了天花或其它疾病，自小双目失明，或双眼仅有一些微弱的光感。在解放前，盲人的出路只有一条：从师学“艺”——相命之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不断破除迷信，这些人非但生计受到冲击，而且人们觉得他们是江湖骗子，最后干脆不许存在!遂由政府办了不少福利工厂，按排这些人就业，用汗水滌去旧社会的遗迹，真正自食其力。

我发现盲人往往“夫妻双盲”，按他们的话说，没办法，“龙嫁龙，凤嫁凤”，盲人只好嫁盲人了。盲人之中也不乏富裕之人，有一中年之人，算命之术高于辈中之人，算得极准，故生意兴隆，收入颇丰。但树大也招风，成了取缔算命先生的重点对象，无奈只得进厂工作。此人善于察言“观”色，逢到有人问及算命之事，就用一套背熟的新江湖诀应付：“算命是封建迷信，是坑人骗人的，骗人钱财。我有罪，我向人民政府认罪，一定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使我有了工作的机会，有了饭吃……。”一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作他的护身符。

相处日久，发觉此人甚是厌恶枯燥的体力劳动，在没有领导和积极份子在场时，常流露

出怀念昔日的荣耀生涯。最初他对我甚是敬畏，时时要牵出他那一套令人生厌的大道理来应付，久之知道我不是什么干部，也不是正式的工人，就放松了警戒之心，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就轻松随和。有天，我问他算命是真的么？他侧耳静听周围动静，确知没有其他人，就没有背他的“新江湖诀”，而是颇为自得地说：“算命也是一套学问，是非常讲究的。”

我少年气盛，把无神论思想拿出来同他辩论，我说你们算命时，不就是套人家的话，揣摸对方的心理状态，用模凌两可的话来迎合对方，让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吗？他争辩说不是这样的。我就把他在大会上自己对自己揭发批判的发言抬出来：“不是你自己说的么？说算命时，如何套人言语，步步入港，使人深信不疑。”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不谈这些，不谈这些。”虽明知在会上他是编就一套东西来搪塞对他的批判，蒙混过关，并可以成为破除迷信、自加讨伐获得新生的盲人，我仍紧追不舍：“命是没有的，如果确有命可算的话，你能知道你会有今天的一步吗？以后你的命又会如何呢？”他默然不答，似乎在想些什么，又不便同我这冒失的青年斗下去。

我越发得意：“你们算命先生的生意可算是金生意。”他一听“金生意”不由一震，侧耳静听，我继续说：“在江湖上你们这一行是无本的卖买，全凭一张铁口，说得人家服服帖帖把钱交给你们，所以这行当在江湖上列在第一位，称金生意。”

他毫不掩饰他的吃惊神色，似乎在猜，我年纪轻轻的如何会知道江湖上的“行话”。

我更为得意地说：“你们算命先生在江湖上飘泊跑码头，有一套‘切口’，比如有人问你今天生意可好，赚了几元钱，你必定用切口回答，”我有意卖弄我仅有的一点“江湖经”：“比如数字 12345 的发音，用切口就是留、越、汪、折、中。”他听到此更显吃惊，我就越是得意：“你们的一套我全知道，我也走过江湖跑过码头，见识的算命先生不少，全是骗人的，什么命不命的，全是假的。”

他什么也不说，他一定认为我这人是个危险份子，比什么人都危险。我见他不再开口，也泄气了，收场吧！还是回头说盲人与聋哑人的分工吧！

这些盲人的命确实够苦的，由于失明只能安排他们做下手出苦力，而聋哑人就作上手师傅的活，用敲击发出的响声，向盲人发号施令，盲人听命于他。就这样，盲人、聋哑人结成对子，但他们协调得太好了，完成了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工作。

厂中趣事

这些既聋又哑的哑巴非常聪明，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从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他们的眼睛是那样的明彻清亮，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看出他的思想和语言，不必看手势就能明了。他们完全用眼睛观察人，观察社会和自然界，看得那样的精细和深刻。他们虽然生活在无声世界中，但是他们的双眼却正确无误地洞察一切细微的变化和突发事件。对！"洞察"这词用在聋哑人的身上是最确切不过了。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在静寂的空间，专心致志地学习掌握工作的技艺。

这些哑巴要比盲人年青得多，他们没有盲人只能走算命这条路的痛苦经历，没有盲人的复杂心理和对人生的认识深度。对算命先生来说，算命毕竟是一件轻松的行当，出了名的，生活过得更为优裕。聋哑人的人生道路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被人民政府绝了生计的对立情绪。这些哑巴又很年青，在共产党的关怀下，他们清一色毕业于聋哑学校，有一定的文化，受到党的正统教育，他们真诚地相信是党是人民政府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就业环境，给了他们就业机会，所以他们工作态度非常主动、认真，掌握技能时间之短，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少费不少劲。

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和谐的劳动集体，但盲人与聋哑人思想交流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语言"翻译，成了交流的"桥梁。

这些交流的内容必然是肤浅的甚至是庸俗的。因为盲人几乎都不识字，他们的世界又是那样狭小可怜，因此他们的知识极端贫乏，盲人嘴中时时露出是他们的浅薄和庸俗。聋哑人受过教育，他们可以看书，能从书本中接受知识和了解世界，他们处在知识的海洋中，对自然界的认识要比盲人大为广阔而接近于常人。

青年哑巴用手势和写字，向我表示他们对盲人善意的嘲笑和同情，嘲笑盲人太可怜，什么也看不到，瞎摸一气，对这世界一点也不了解,用盲人摸象的典故来证明盲人的可怜和可悲。我笑着用言语再讲给盲人听，盲人则反唇相讥，盲人说：我们盲人虽然是瞎子看不见，但夫妻在床上，却可以有说有讲，是多么的快乐，你们哑巴夫妻关灯上床，什么也看不见，打手势没有用，话又不会讲，还不是瞎摸一气？不是比我们盲人更可恼吗？

他们这种内容粗鄙，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相互嘲笑，使我止不住哈哈大笑。通常这样的一番"唇"枪舌剑后，是一场稍长时间的沉默，盲人打起瞌睡，受到聋哑人的白眼，当然，瞎子看不到。

我在沉闷中沉思起来：他们都是残疾人，他们或看不见，或听不见说不出，是够可怜的，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我这能看、能听、能讲话的健全人不也一样可怜吗？我们虽有健全的双眼，却被人蒙住了双眼，看不到真正的世界；我们枉有健全的双耳，却听不到世界真切的声音；我们白长了一张口，却说不出自己想说的话。我们摄取的是失真、变形的信息，我们说出的是违心的话，我们的思想只能在脑海中痛苦地翻滚而不能冲出来，我们不是比盲人、聋

哑人更可怜吗？

在这个小社会中，千万不能称呼盲人为瞎子，这种轻蔑的称呼是不礼貌的，即使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时也不能这样叫，否则盲人就会到光荣妈妈前告状，直到光荣妈妈当着他们的面批评了你，他们才作罢，不然就会无休无止地唠叨。如果你认为哑巴们反正听不见，可以随便说一声哑子，那你就错了。如果有谁面对聋哑人冲口说了“哑子”这一字眼，他们马上可以从你的面部表情和当时的场景，以及你口唇形状上敏锐地猜出你说了轻蔑他们的“哑子”这字眼，他们也会张大嘴巴，激动地比划着向光荣妈妈告状，也要你受到批评才肯罢休。

在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盲人、聋哑人的人格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为了能够正确地与聋哑人进行交谈，必须学习哑语——手势，每天午饭后的半小时休息时间里，一位从聋哑学校调来的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在黑板上写好今天要学习的词汇，一个一个地打手势示范，教我们这些正常的人。有时也把聋哑人一起集合拢来学习，这多半是要教他们新词汇了。实际大多是政治上的新名词。当时报上出一篇重要政治文章，必要大张旗鼓宣传学习的，老师就把这些常用的新出的政治用语编成新的手语教给大家。（我想这些手语大概是全国统一的，由上面发下来的。）

在我们学哑语的时候，我常看到有这么一位盲人，每天在“看”书，一本厚厚的大大的盲文书搁在他的膝盖上，双手的手指在突出的由点组成的符号上摸索。他略微扬起头，双目平“视”，从指尖的触觉中获取的信息，迅速传给了失明的双眼，使他“看见”了这个世界，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盲人。

在这个小社会中，也经常要开会学习。开会是有趣的：主持会议的人“发言”，必须一面不断地打手势——哑语——让聋哑人“看”明白，一面还要“配音”让盲人们听明白，好似联合国开会的同步翻译。由于开会学习这么费劲，所以开会一般不会太长，否则“发言”人受不了，太累了。

我是半途进厂的，手语基础远不及他人，仅靠中午的时间学习也远远不够，我就抓紧时间向聋哑人学习。我写出要学的词，请他们打手势，我学。其中有一青年聋哑人就向我提出，要我教他说话，作为教我打手势的回报。我吓了一跳，我怎么能教会他说话呢？虽然我知道哑巴不会讲话是因为他在没有学会语言前先失了听力，也就失去了学习说话的可能，但现在仍然是没有听力的情况下，我如何教他呢？

我茫然地望着他，他拉着我的手急切地喊：“毛主席万岁！”我听出来了！这不是在说话，是在用喉咙逼出来的，是嘶哑地喊出来的，或者说是用气流硬压迫声带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分辩出，是“毛主席万岁”！我很惊讶，他是怎么会说的，他热切地望着我，等我的反应。

我伸出大姆指，连连点头。他马上显出高兴样子。随即我也比划起来，指指我的口唇和舌头，连写带比划，告诉他口唇和舌头要如何配合，一面一个字一个字发音示范给他看（这里只能说看）。

不多一会他学会了口唇的变化，发音越来越准。但我始终没能教会他怎么使用舌头，以减去令人不舒服的撕裂声。他却欣喜万分，一下跳起来，朝我真诚地笑，却没有明白我对发出的嘶哑声很不满意。他一面哇哇乱叫，一面指手划脚，连蹦带跳地去“告诉”他的同伴，他成功了——他也会说话了！

肥皂泡又破了

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了解了我的同事们，其中一位四十多岁的车床师傅，技术高超，车、钳、铇样样拿得起，厂里的机修活他一人全包了。

在中午休息时他告诉我，他曾到过日本的冲绳。那是在二次大战后，美军从上海招了一批工人去冲绳建造美国的军事基地。他又说他到好几家厂工作过，现在被马厂长调来，他说这里很好，工厂是有发展前途的，劝我安下心来，就在这里正式工作下去。

我想，一个走过不少工厂的技术工人对工厂的评价必定是准确的。

我当然想正式工作下去，这里的一切我已经适应，已经熟悉，离家又近，只有三、五分钟的路，工作又是我熟悉的，我满腔热忱投入厂中，认真地带领徒弟，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我还真诚地希望工厂发展，对将来的发展充满了幻想，我对这些幻想，几乎到了想入非非的程度。我把我的命运已经与工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忘记了我自己——我是一个临时公民，还没有户口，是个“黑人”。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已经在这里不少天数了，一天，我看到他们发第二次工资（我还一分钱没拿到）。但我并不介意，干得很欢，心情舒畅，自我感觉良好。春天已经来了，我的心中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快中午了，我正在认真地工作。这是一套新的模具（准备生产新的胶木压制件），我在试模：校正用粉量，调试温度和压制时间，我们这一行在一只新的模具接到手后，必须是技术熟练的师傅凭经验先试出来。同时检验模具师傅开出的模具是否合理，是否能正式投入生产。如果模具需要改进，则提出改进的意见。如果一次成功，就把试压时的用粉量、温度、

时间定下来，作为工艺标准，交给这些已经初步掌握要领的聋哑人操作。

我在顶真地操作着，想尽快地把完整的工艺定下来，争取在当天正式投入生产。我的徒弟，一个英俊的聋哑小伙子，已经急不可耐地试着要坐下来操作，看我还是不放心马上交给他，已经面露不悦，用手比划：伸出小指“说”我小心眼，瞧不起他。

正在这时，有人来对我说光荣妈妈要我去办公室。我匆匆地向我的徒弟交待了操作的注意事项，这英俊的小伙子高兴地坐了下去，哇哇叫了一遍，用手比划要我放心。

我走进办公室，光荣妈妈——马厂长正在看什么东西，见我来了，取下老花镜，要我坐下，我坐下等待她开口。她却闷了一会，似乎在找什么合适的用语。过了一会她说：“我同你母亲是老朋友了，你在这里工作出了不少力，辛苦了，大家对你印象很好，胶木车间在你的努力下，已经开始正常投入生产了。今天我们都在发工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给你发工资。”

她说了这么一番“序言”，略一停顿，见我没有反应，艰难地转了话题说：“我们这里工资都很低，像你这样有技术的工人，也只有四十八元一个月。”

四十八元，工资是太低了一点，瞎子、哑子拿的工资也快接近这数字了，我猜测她叫我来是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别嫌这里的工资低。我就坦然地静静地听着。

她又说下去：“我们这里是地方国营的厂，是民政局领导的厂，是有前途的，只是工资低了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上面定下的。”她停了下来，等待我开口。

我老实地说：“四十八元是太低了，有技术与没技术一样，这不合理。”她为难地说：“这是上面规定的。”她说完后不再说下去，我也不响，等待她的下文。

她见我还不开口，就说：“你是临时户口，你在这里工作，你们里弄里反映很大，说我们福利厂用临时户口的人工作，一直反映到区民政局……。”

我一听，血直往上涌，这太气人了！我是一个临时公民，没有户口的“黑人”，我是一个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人，一个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人，不及哇哇叫喊的聋哑人！我犯了什么罪？这是我的过错吗？这是谁造成的？公理何在？我为什么没有尊严、人权！只有屈辱的纪录？

我不知她又絮絮叨叨地还说了些什么。片刻，我才回过神来，平静地说："光荣妈妈，你不必为难，我今天就走，我走了，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是尽义务的，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光荣妈妈难过地顺势说："我们考虑，补贴总是要给的，我们这里工资小，大家差不多都是四十八元……。"

我突然明白了！光荣妈妈不忍心先说出"上面"不准我这个"黑人"在厂里工作的话，她想用四十八元的低工资来让我自己提出嫌工资低，不愿干下去，以保全我的面子和自尊。没想到我的社会主义觉悟使我傻里傻气地只说四十八元不合理而并没有说不愿干。她万般无奈只得将上头的意思委婉而清楚地表达出来。光荣妈妈，真难为您了！您曾许诺出面向派出所交涉解决我的户口问题，您给了我工作的机会，使我的生活充满希望，但是您怎么能想到这些好心非但办不到，反而使您处于两难境地？

我打断了她的话，我说："我不能让你做难人，我已经说了，我尽义务不拿一分钱，这样你对上面也可以交待得过去了。我是临时户口，但临时户口到厂里来尽义务总可以的吧！省得他们有闲话让您为难。就这样定了。"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串串在阳光下泛出美丽色彩的肥皂泡被无情的风一吹，一个个破灭了。我的这段生活，就像肥皂泡一样结束了。我这个有技术又肯干的工人，又被赶出了第二家应当是工人当家作主的工厂。

再见了，好心而勤劳的光荣妈妈！再见了，我为之付出心血的工厂！再见了，可爱、可怜的聋哑盲人兄弟姐妹！我不能再为你们做事了，我不能在这里为国家出力了。再见！愿你们好自为之。

第五章 上 访

"仇大姐"

我重新回到了临时公民应该坐的位子上。我的希望，我的美丽的七彩梦，犹如缤纷皂泡一般破灭了。

是谁直接从中施加了压力，把我赶出厂门呢？只有那位陈大人了，只有他有此权力，以官方的名义向光荣妈妈施加压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光荣妈妈所说的“里弄里有人反映临时户口怎么也可以有工作”，这个“有人”那一定是弄堂里的小组长之类的里弄大姐了。

这位里弄大姐是一个文盲，长得又高又大、又黑又粗，有时喜欢露出满口的“金牙”笑，让人看了难受。大热天穿着短裤抱着婴孩在马路边转悠乘凉，不时把婴儿连同上衣一起往上提，就露出了肚脐眼。走累了，干脆在上街沿面朝马路往地下一坐，黑黝黝的大腿八字排开，丝毫不理会人家侧目而视，大家也习以为常，丝毫引不起男人们什么非份的念头。

她丈夫在弄堂里的一家车木工场做工（丈夫的小工场公私合营后并到大厂）。五十年代她才从海门乡下来上海，在工场的三层阁中安了家。平心而论，这对夫妻为人不坏，在邻居中并无恶名。按党的阶级路线划分家庭出身是贫农（是一个极好的出身），丈夫又在公私合营后的工厂中入了党。于是这位一字不识的农妇，成了可以依靠的对象，被陈大人扶为里弄干部，管起了这条被他们称之为“复杂”的弄堂。所谓“复杂”，是因为小业主，小资产者的家庭为数不少，还有汉奸的家属和大流氓的家属居住在这里。像她这样的苦出身，确实屈指可数，这位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仇大姐”就成了我们弄堂里响当当的左派，里弄干部非她莫属了。没有文化不识字没有关系，首先要的是阶级仇恨。

自这位仇大姐上任后，陈大人有什么话或找我谈话，就通过她来传话和召见。仇大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看她的脸色马上就可以猜出这次召见是凶是吉。

她对陈大人的一言一行唯命是从，有“朴素的阶级感情”，陈同志是党和政府的化身，“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里弄工作，把里弄里的点滴小事，毫不分析地及时汇报给陈同志，对于我这样的“临时户口”更是要积极地汇报一举一动了。

这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加强信访工作，做好党和群众血肉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读来使人感动，更坚定了我热爱共产党的信念。我确信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我个人的遭遇是下面的基层干部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他们把党群关系搞坏了，是他们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我要向党的上层机构反映我的不幸遭遇。

我并不是光靠一篇文章来坚定信念的，在这二、三年的时间内，我跑图书馆的时间是那样的多，科普杂志、文艺小说充实了我的文化素养，我浏览了各种报刊，开始学习党的《红旗》和毛选，中苏开始公开论战的“一评”到“九评”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这阶段的学习，把我从小接受的共产党教育向理论升华，使我从思想深处接受了共产党的一切信仰。然而面对现实，面对不幸遭遇，我又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有时会一度疑惑，但我自己说服自己，认为这大概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对革命的不坚定性的表现吧（现在想想多么可笑，我这么穷苦的人竟自作多情地和小资产阶级挂钩）！总的来说我确是接受了共产党的理论，面对我个人的遭遇，面对台湾蒋介石的叫嚣反攻大陆，面对国际上“帝修反的大合唱”，面对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并没有使我抛弃对共产党的信任。这一时期（61 年－64 年）的学习，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基础上我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我们的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中央是正确的，坏就坏在下面基层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我个人的遭遇就是明证。

我周围的“临时户口中”陆续报进了户口，而我却一直被拒之于门外。“光荣妈妈”为我努力过，但也未果。论条件和实际情况，陈同志毫无理由这样做，我同他之间没有私人的恩怨，他为什么要这样处处为难于我呢？我要向上级领导部门申诉。我认为越是上面越是正确，我寄希望于党的上层机构，我选择上海市委作为我上访的部门。

第一次信访

我拿起了笔，把我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突出写了我被骗回沪的经过，说明不是我自己要回沪的，并非是逃回上海。

信寄出后，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结果。我计算了时间：上面收到了信，必定要调查核实，向浙江方面去信了解，向我所在地区查询，最后再答覆我，这没有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意想不到的是，只几天我就收到了上海市委信访部门的复信。嗬！这以快，我拿着信封好一阵子高兴，赶快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狭长的铅印的统一制就的复信：

×××同志，你于×月×日寄来的信，已被编为×××号，你所反映的情况，已转有关部门……。

我呆呆地看着这狭长的纸条，心里一阵发凉。我把信访工作想得太完美了。寥寥数语，不禁大失所望。我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没办法，只能再等几天。我的临时户口又快到期了，去看陈同志如何说吧！

以往，我去找他，提出别人的户口已在陆续解决，我的户口何时可以解决，他总是极不耐烦地说:“你的情况与别人的不同,根据政策不能在上海报进户口。”后来为了我少去找他，就发发慈悲，对我申报临时户口口粮的日期不再是五天十天的批了，而是一个月一批，赶快打发我走。

这次我到派出所，电话打进去后，他一反常态，很快就出来见我。他不待我开口中，伸手把我手中的油粮迁移证接过，很快在我的迁移证的背面（背面早就签满了日期和盖满派出所的长方形的小公章，后来就再贴附一张白纸，以满足一年数十次的签注）非常爽气地批了一个月。他那神态，似乎让人感到他是那样的同情人，充满了人情味，似乎在说：“我这样一个月的一批，我的恩赐你可要领情啊！”

然而我并不领情，要是在以前，他五天一批时，突然批一个月，那我定会感恩不尽，今天我却绝不感谢他！我等着不走，我要等待他表示如何对待我的上访信。

果然，他板着脸说：“你写给市委的信已经转给了我。”他对我看了一眼，好像在得意地说：瞧！有什么用？不管你写到那一级，还不是转到我的手中？你翻不出我的掌心！他的脸色显出唯我独尊的冷峻，接下去说：“按照政策，根据你的情况，你的户口不能报进上海。”

他就是党和政府的化身，他说的话就是政策，对于他专横无理的话，这三年来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争辩，他是不会发善心的，也不会倾听我的申诉。我只能相信上级，我只能寄希望于市委，我这样默默地想着。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大概认为我已被镇住了，转身欲走。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陈同志，根据我的什么情况才我使我不能报户口，请你讲一讲。”他略一愣，回避了我的提问，扔给我一句说烂了的话：“你只有回原单位复职。”

回家后，我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上次的信写得太简单。我还要上访！这次我要详细地把去浙江的过程和如何被迫回沪,回沪后的遭遇及去浙江复职而又复职不成的经过全写出来！

第二次信访

笔在飞快地书写，三年来的痛苦、愤懑从笔尖下痛快流淌。最后，我悲愤地写道："如果上级领导同志认为我反映的情况是虚假的，那么请你们派人去调查，只要调查出有一句话是虚假的，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劳改'算了，这种生活我受够了。"顺着悲愤激越的思路，我历数派出所陈同志如何克扣我的定量；如何半夜对我恐吓。

我写得痛快淋漓，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如果说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的恳求，这第二封信则是悲凉的呼喊！我读了几遍一吐为快的信，心理得到了暂时的满足。

第二封信发出后，将近一个月才收到信访办公室的复信。在统一格式的铅印复信后面还有如下一段钢笔字：

你的来信已经转杨浦分局户籍科，由他们解决你的户口问题。

我激动地连看了几遍。从复信的时间来推断，信访部门已经做了一些调查工作，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一转了之；再从统一格式的铅印后面加上一段填写的内容来分析，我的户口可以解决，而且明确由户籍科解决。我这样分析了一番，这二十多字无异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使我由衷地感到上级党是能认真听取平民百姓的呼吁，能够为平民百姓办事的。

这封简短的复信抚慰了我，我恢复了自信与乐观。我想既然是由户籍科解决，我何不直接找分局户籍科呢？我带上我的户口迁移证——袋袋中的户口，兴冲冲地到了分局大门口，向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警察说明来因。可那老警察却不放我进，说：解决户口到派出所，这里是分局。我就把市委信访办的复信捧出来，把这份我视为"圣旨"的复信送上去。可他扫了一眼之后，往我的手中一塞："去！去去！到派出所去。"

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急得手捧"圣旨"说："信上写明是由分局户籍科解决的嘛。"为了证明这封信的份量，我把市委信访办等字样指给他看："这是市委给我的信啊！"这位警察却不屑一顾。

他这种态度绝不是对中共上海市委的不恭，大概对于这种例行的公文看得实在太多了，似乎在嘲笑我这不谙世事的小伙子竟然拿出鸡毛当令箭。他顾自踱起了方步，把我丢在一边，好像没有我这么个人存在。

我站在分局门口呆了半天，看看手中的复信，"中共上海市委"的字样映入我的眼帘，感到一阵心痛！我这个平民百姓，粗识文墨，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自认是学习和了解的。中共上海市委这样一个党的高级机关，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是那样的崇高和神圣，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里，一个小小的门卫却可以不屑一顾。不论谁都明白，我手中的复信，是共产党关心群众、体察民情的像征，是加强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是为了修补由

于一系列官僚行为而产生的党群关系、政群关系的裂痕，是为了把因为官僚主义而对党有对立情绪的群众重新团结到党的身边来。而由于这小小的门卫的举动，重又把我与党的距离拉了开来。

当时的我并没有明白这么许多的道理，只是对这位警察觉得可恨。他为什么不放我进！而从直觉中，又觉得他不是坏人。可不是么，这时他在我面前站定，和善地说："户口问题只有到派出所去，找你的户籍警去。"

我不是不明白的，我还是手拿"圣旨"说我的理由。他听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不是我不给你进去啊！"他的手伸向电话机，要通了户籍科，对着话筒低低地讲着话。放下话筒，摇了摇头："你还是去派出所吧！"他又潇洒地踱起了方步。我不得不走了。

兜了一个大圈子，我还得回到原点，找陈同志。

还得去找陈同志？我不愿去找陈！我相信陈也不愿见到我。但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去见他。面对现实，我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求他。

他满脸不悦，但又装出豁达的态度来敷衍我。他以公事公办的表情说："你的信，我们研究了，你向上面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至于你反映我个人的一些言词，我不计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们谅解你的处境。"他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听这口气，他倒成了正人君子。然后他话锋一转："在我们地区临时户口不是你一个人，解决了你的户口，其他人又会如何呢？

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报户口不是根据政策条件吗？这跟人多人少有什么关系？我能不能报是我的事，别人能不能报是别人的事，解决我的户口，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其实说穿了，这些手中有权的基层干部，一个有权的户籍民警，在拒绝你的正当要求时，开口政策，闭口政策，用政策来封你的嘴。但是一旦政策允许，可以报进户口时，这些人却又不愿把政策的恩惠赐于人，似乎我们这些临时公民能正当地报进户口，是占了什么额外的便宜，而他们反而损失了什么利益，便混身不舒服。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脑中是否装着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否还记得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否想到过他们这样做是剥夺了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

大概没有人能够怀疑革命开始时宗旨的纯洁和目标的正确，否则何以能够唤醒亿万民众呢？但是，在推翻了腐朽的政权之后，怎样把"为人民服务"溶化在施政过程中，却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平心而论，共产党在进城的二十余年内，并没有像历代农民革命军那样迅速腐败，这有赖于党的核心高层有着一群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着足够远大的眼光。在入城之前即告诫全党全军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入城后又发动了主要是针对官员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其它运动，因此，共产党干部自身是廉洁的，他们中极少有人利用权力中饱私囊。

可惜，革命不仅是为了廉洁自身，而是为了造福于人。虽然革命推翻了包括“封建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但是，在有二千多年封建王朝历史的中华大地，封建这个幽灵仍然在徘徊。进城的“子弟”兵成了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地位的变换使他们不由自主地使自己坐在施恩者的位置上。他们绝大多数是勤恳办事的，但即使如此，放下锄头或放羊鞭拿起枪杆，而如今又放下枪杆握起“印把子”的他们，也与封建社会“父母官”抑或“老爷官”有一种十分相似的意识：

一个是“拿国家薪水”；

一个是“拿皇上俸银”。

因此，历史使他们不可能树立“我是民众供养的，我必须为民众办事”的意识，百姓对干部就更不会有理直气壮的“你是我们供养的，你必须为我办事”的非份之想。这样，尽管当初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在各种机构的名字前冠以“人民”的字样，然而封建衙门的作风仍然慢慢滋长，机关效率低下，态度冷漠，法治和民主建立不起来，党和政府威信下降，革命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五十年代初期的民心，到今天荡然无存。

更可惜的是，人们只看到这仅仅是一种官僚作风（单纯官僚作风并不难纠正），而没有看到它的根源在于被打倒的封建主义并没有灰飞烟灭，由此而带来官员在意识上的落后并导致后来行为上的大量腐败。

在中国，一个政权怎样才能不去继承封建主义的衣钵，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面对陈同志用不让我报户口来阻挡更多的人报户口的奇谈怪论，我又能够说些什么呢？当时我只能说：“其他人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人有各人的情况，现在政策允许可以报进户口了，我的户口应该报进，不解决是没有道理的，”我有市委信访办的复信，上面明明没有不能报进户口的字句。这给我壮了胆，我理直气壮地这样说了。

陈听了我的话，不反驳，也不明确说不能报的理由，他习惯而熟练地用含混的官腔说：“什么时候政策允许了，会解决你的户口问题的。”

他仍然用这样的空中楼阁来蒙骗和拖延，使我的努力又一次落空。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我还要为我自己争取生存权利。我下定决心去市委上访而不是信访。

去市委上访

我要当面听一听，我的户口能不能解决，要摸一摸那神秘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政策。至少要知道这个对我玄而又玄的“政策”是否允许我申报户口。如果摸下来是可以报户口的，那么我就要“上面”压“下面”一定要解决我的问题。我希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

但是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不能太乐观，如果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他必定是一般的干部）也是像我以往那样，把我反映的情况向下一转了事，我不还是在深渊中挣扎吗？

在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中，我看到，苏联的市委书记或者相当级别的干部在每星期中有一天，是专门接待公民的日子。往往那些上访的公民久拖不决的请求，一旦在接见日碰到了市级的领导，只要一个电话，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暗下决心，如果接待人员不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赖着不走，就说我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了（虽然我是总要准备几角钱的车费），逼大人物出来。

从“下只角”杨树浦到华山路、延安西路口的市委接待室，几乎斜穿整个市区，为了省下五分、一角的车钱，我仔细地计算着车程，乘一段车，走一段路，再转乘下一辆车，结果耽误了时间，到华山路已经是中午。我就在接待室外面的延安路上走来走去消磨时间，等待下午的接待时间。忽然我看到接待室的门并没有关严。我想进去坐一坐，让发酸发麻的双脚休息一会。

轻轻地推开门，里面静静的，有二、三位工作人员在伏案工作。我正迟疑地探头张望，立即有一位同志站起来，客气地询问我有什么事。就这么一立、一问，立刻让我感受到一股暖意。这是我从未碰见过的，我拘慬胆却的心情，立即放松下来。

我把信访室给我的编着号的复信递过去。他一看，立即进去把一位手端饭碗的同志请了出来。显然这位同志在吃午饭。但他拿着我的复信，客气地请我坐下，问我午饭吃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在我们这里吃吧！我可以到食堂去打一份饭给你。

我大受感动——同样是国家机关，在派出所我为了能申报临时户口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定量，不得不从早上开始恭候户籍警大驾，有时一直要饿着肚子等到他们吃了中午饭，谁也不屑于问一声：你吃了没有。市委同志的话使我顿时双眼模糊，只知一股劲地说：“不！不!”那位同志见我真的不吃，就说：”那请稍候，我把剩下的饭吃了后就来接待你。”

我默默地坐着，原先准备好要耍赖的一套全忘了。这时的我，处在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之中；我完全被接待人员的真情融化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位同志已匆匆地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迭材料，坐在我的对面，翻阅一下说："我们已经与你所在的分局户籍科联系，请他们解决……。"

我马上打断了他的话，抢着叙说："我们派出所陈同志还是拒绝我的要求，不准我的户口报进上海……。"

我说："我拿了你们的信，去分局户籍科，他们连大门也不让我进，要我去派出所。"他听了默不作声。我继续叙述："我只得去找派出所的陈同志，他再一次的拒绝我的请求，至于为什么不能申报户口，依据是什么，他从未同我说过。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家中还有几个弟弟要我养活，为什么不给我报进户口，不给我工作的权利?"

愤愤不平的我这时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我把踏进社会后的不幸遭遇统统倾泻出来。过去的生活，一幕幕地再现，止不住的辛酸往事，这几年的委曲、屈辱从我的嘴中倾泻出来。禁闭的闸门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不禁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痛快。他静静地听着。

他静静地听，对我就够了。

我吐尽了苦水，结束我的叙述时说："我在信中写的和今天说的，如果有半点不实，我甘愿去'劳改'。"这时，他才平静地对我安慰道："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过。我们已与浙江你的原单位联系过，他们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你回原单位已经不可能，上海应该为你作妥当的安置。请你再坐一会，我打电话给你地区联系。"他进里面去打电话了。

我的心止不住一阵狂跳！因为这位干部平静而简洁的话已经作了明确的表态。我的户口可以报进上海了！意想不到！真意想不到！竟然这么顺利，我的户口问题的解决竟是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无法相信。

不太长的时间。他出来，依然简洁地对我说："已经同你所在地区联系过了，他们会给你解决的。"接着他又安慰我一番，一直把我送出接待室，送到马路上。

我依依不舍地与他挥手告别，向这位政策水平高，办事干练，言语简洁，富有同情心的人民公仆（这样的人才是人民的公仆！）挥手告别。他也立在门口，一直望着我，久久没有

进门，我再三挥手致意，直到我走出很远，他才回身进门。我一个人走在静静的延安西路上（那时这里的马路是安静的），脚步轻快，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真是难忘的一天！

这难忘的一天，使我更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稍有的一点动摇荡然无存。我坚信：共产党是正确的，上级党的领导是英明的。我把在学生时代接受的共产党宣传教育与在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作了对比，得出结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下面的基层干部却把事情搞糟了。或许他们是为了想向上爬，才不惜牺牲公民的利益甚至公民的生命来满足当官升官的欲望；或者为了表现自己的正确，在执行政策时宁左勿右，其结果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破坏了党的光辉形象。

这一天难忘的感受，促成了我日后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从市委信访接待办公室回来，我想我的户口可以很快解决了。但我万万想不到又经历了两个"半个月"的折磨。

派出所的那位陈大人，还是一个字——拖。我每次去找他，他都有稀奇古怪的官腔来应付，令人哭笑不得。实在拖不过去了，就说已经报分局户籍科批了，你等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又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再来搪塞一番，再让你等上半个月。我真不知用什么词汇才能正确表述他的所作所为：报复？迫害？草菅人命？还是官僚主义？

我也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每次谈话后，我立即回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尽可能做到与原话不差分毫，在他拖了一个月不给我办理手续之后，我马上寄给市委信访室的那位同志，让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基层的户籍警是如何作弄人的。

这一招果然有效！现在轮到陈同志来找我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再不要写信给市委信访室了，你的户口保证在半个月内给你报进。"

我好不开心啊！我说："这是你逼出来的。你今天的谈话，我还是要写下来的，我还是要寄的。"他的脸涨出一片潮红，央求道："你不要再写信了。这次保证给你报进户口，我马上就办，送户籍科去批。你不要再写信了。"他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和傲慢，用近乎祈求的目光看着我。一阵快感从我的胸中油然升起，俯视着他那矮小的个头，我多少出了一点三年来所受的气。

我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说："如果这次半个月还是不给我报进户口，我还是要向市委写信反映的。"他连连点头说："这次一定给你解决，一定给你解决，我保证等半个月，一定有喜讯给你。"

三年来，这是我与陈的谈话中唯一的一次,他没有凌驾于人的谈话,一次地位平等的谈话。

这最后一次的“半个月”终于过完了。那天，陈和一位女民警（以后这位女民警就接任陈的工作）上门来找我。他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告诉你一件大喜事，这是你最大最大的喜事。根据党的政策，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和实际，你的户口已经批下来了，批准你的户口报进上海。”继而他笑容消失了，换上严肃的面容来给我“加尾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也是你在地区的教育下有了一定的认识，今后你要努力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你的家庭出身，并不是一个纯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你要彻底改造你本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后面他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请。我的视线模糊。只见他们端坐在我面前，威严的大盖帽在我的面前晃动。我似乎明白了：我之所以能报进户口，是他们的恩赐，而不是我应有的权利。

申报户口的“马拉松”终于跑完了，临时户口的生涯终于结束了。结束得意味深长。

陈同志说这是喜事。只是喜事为什么硬要压我三年呢？而且让报和不让报都是根据“政策”，那么这“政策”究竟是什么呢？我这“当家作主”的人民一份子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我只看到市委信访办的电话起了作用。

陈同志总算为我做了他该做的事。却又一脸严肃的教导我，说这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让我别忘了这是他施于我的恩典。他还特地敲打我，要我记住自己不是无产阶级，要老实地改造世界观，云云。这种巧妙地警告当事人“你有尾巴”的做法确是高明。后来他给别人——那些由他送进劳改队的人——平反，也给每个人留了一条“尾巴”，以证明他原来的做法是对的。

陈同志不认错。

后来，不认错的不止是他个人。

我不知该喜还是该悲。

第六章 投入党的怀抱

我成了被争夺的人

户口，户口，这恼人的户口解决后，我成了一个被人争夺的对象。

福利厂光荣妈妈请我正式去工作。地区同一里弄的一个生产组也拉我去工作。这个生产组有近 30 人，是五八年时，在解放妇女口号下，成立起来以缝缝补补为主的一个缝纫生产组，后来生产人造革的童鞋。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成为过去，物资慢慢丰富，人造革的童鞋已无人问津，失了市场，就意味着这个生产组停工，每人每天可怜的七、八角工资（还无任何医疗劳保待遇）也无法开支。

我面临的选择是：一边是已经走上正轨的国有企业——残疾人福利工厂，我只要平平稳稳地上班，每月工资四十几元还有医疗劳保待遇；一边是需要挽救的生产组——要啥没啥一穷二白，如果我去，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使生产组走出深渊，获得发展。

处于绝境的生产组的里弄大姐们，知道我有办厂经验，一次次来我家恳求。

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能施展我的才能。我自信能够挽救她们，而且心里觉得，既然她们诚意请求，我就有责任去。

我用少得可怜的三百元资金，开始了创业历程。

我首先在虬江路旧货市场化一百元买下两台旧的小型压机。然后自己做水泥工，排压机底脚；自己做电工，排线路，绕电热丝。我是急性子，这些工作我马不停蹄，一气呵成。我又通过过去的老关系，承接到大工厂的加工业务，于是一个小小的工厂像模像样了。接下来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教会了原来只会缝纫的里弄大姐们操作机器。

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着，一人顶着几个人的活儿，常常在半夜被这些里弄大姐叫醒，揉着惺松的睡眼，起来抢修损坏的模具。这时的我无师自通，我利用去大厂跑业务的机会，下车间，只要是被我瞧过一眼的活，回来后就能自己边做边学边会。我从虬江路又买进一部报废的车床，买了几本车工、钳工的书，在大厂的车间里我多看多思，很快学到车床的技术，自己开车床，自己磨车刀，以修理损坏的模具；一手“三脚猫”的钳工活，也得心应手，什么

模具也难不倒我。

对外我又是一个大忙人，要跑几爿大厂，联系业务。这时的我，只想多接业务，扩大生产，添置设备，待积累一定资金后，走出加工业务的低水平，生产自己的电器产品，不用再仰承大厂的鼻息。为此目的我毫无保留地工作着，不想名利，不计得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工厂发展了，原来的厂房已经不够了，上级主管单位——区手工业局作出决定，把工厂迁往浦东，把浦东的庆宁寺划给我们作厂房。

庆宁寺亦称高庙，在上海颇有名气。里面的几位和尚就做我们的职工，他们脱下袈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时已经是一九六五年，宗教政策在向左偏斜，这些和尚无可奈何地拱手把寺庙交出。我成了“接收人员”，风风火火带着二十多个青年开进去。大殿完全按我的要求，挖了不少坑，安装了机器。又嫌寺院的山门太土，一点没有工厂的气派，一挥手带人拆了，把门开大，按我的设计改成大铁门，从大门到车间（原来的大殿）铺上水泥路。这样一改变，稍稍改去一些宗教寺庙的味道。

我把住在大殿东面的当家和尚一家（和尚是山东人，妻子是镇海人，原是尼姑，她云游到上海，受了解放的思潮，尼姑嫁和尚，作了夫妻，生育一子）赶到大殿后面去，再用墙隔开，彻底赶出庙外。我似乎成了改变和尚命运的大官，我这个什么鬼神也不信的无神论者，努力扫除旧的一切，尽可能把这个寺院改造成工厂的模样。

一个颇为像样的工厂创建成功了，而我的命运却又要我走上另一条生活之路。

工厂搬迁到浦东后，通过这前后一年多的生产，资金积累了，生产发展了，加工业务稳固，一切走上了轨道。我这个“开国功臣”，不善逢迎拍马，生性鲠直，又有一股傲气。在这个“女儿国”内，我看不惯那掌权女人的那股“媚态”。我没有心机，也不懂去如何争地位。这女人利用我这性格，处处制造事端，以搬掉我这“开国功臣”独享大功，好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六五年秋，我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离开了这家厂，于是，我这个大傻瓜把开创的基业供手留给了别人，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付之东流。

恶人总是先告状的。地区劳动调配站听了她一面之词，把我一直压了七个月不给分配工作。在这七个月中，没有了收入，我又陷入不可自拔的苦海之中。

山雨欲来

闲得发慌的我，每天下午跑沪东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和区图书馆。全国各地的报刊我每天必看，不知不觉我的注意力被引向了政治，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这种感觉是模糊的，说不清楚的。我兴趣从西欧文学转向学习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进而又看起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中苏关系急剧紧张且表面化，这时我把我党的“一评”至“九评”的文章集中进行阅读，这中苏之间的公开论战，吸引了我，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政党为何会反目的呢？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就从上述这些著作中寻找答案，可是才疏学浅的我并没有能找到答案，只得不了了之，放弃了这种努力。

这时报刊上的政治空气越发紧张，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内。在六五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当初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我重新把这篇文章读了几遍，文章的最后部分让人吃惊：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我简单的头脑也被这紧张的空气搞得绷起了阶级斗争的弦。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真有那么一些“牛鬼蛇神”在翻案？他们希望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是谁呢？

不久，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从批北京的一本《燕山夜话》开始，把矛头指向“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我明白了，牛鬼蛇神利益的代表人物果真在党内！后来，报上批“大毒草”的文章越来越多，使我越发感到要出什么事了。

报上风云涌动，预示着中国的大地上要演出一场大革命。而我自己的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通过我的努力，最后由区劳动局安排进上海绒布厂做临时工，开始了我的“临兄”生涯（上海的临时工队伍庞大无比，临时工们把自己称为“临兄”，带有自嘲的意味），结束了我

七个月沉闷的生活。

这是一家有二、三千人的中型厂，由织布和印染两大部分组成。虽还挂着公私合营的牌子，实际是全民所有性质。它原来的老板是泰兴人，解放前后抽逃资金去了台湾，这厂就由军代表接管后维持生产。

我在六六年五月初进这家厂。是时，该厂已专业生产灯芯绒和绒布。我被分配在漂染车间，相比我过去的八小时手脚不停的手工操作，目前的工作就显得轻松了。我在岗位上勤恳地工作着，不时还帮助其它岗位上的女工们，我的工作态度，获得大家的好评。我通过这几个月的学习和总结了我过去几年的遭遇之后，自认为是我没有党组织的关怀，至使自己失去前进的方向。不是吗？我在浦东的那个厂是没有党组织的，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造成了我的今天。现在我进了大厂，一定要积极工作，靠拢党组织。而这家厂刚完成了“四清”，政治空气非常浓，党团组织非常活跃，我的表现很受到团支书和党支书的注意。

由于我刚进厂，人头不熟，我业余时间活动还在厂外，我跑图书馆，看各地的报刊。《海瑞罢官》已被批得体无完肤，看着对《燕山夜话》雪片般飞来的批判文章，我与我的朋友们（全是廿岁出头的青年）感到兴奋，但又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与己无关的心情，大家只是把手头的报纸进行传阅，兴奋地议论一番，当然我们的头脑非常简单，真诚地完全按照批判文章的调子议论，认为文化界就是有那么一些胆大妄为的文人，在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毛主席唱反调，以前我们为什么看不出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论调呢？我们的政治觉悟真是太低了！嗅觉太迟钝了！

我们很认真地设法借来《海瑞罢官》、《燕山夜话》这两本书，争相传阅，想认真地分析批判。但是看了以后，我们抓抓脑袋，感到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什么有的文章说的道理蛮对啊？于是我们再重新看报上的批判文章，经批判文章一点，就认识到这些书确实是大毒草，我们不能识别香花毒草那是我们的“水平”太低。一天一位朋友从部队借来一本红塑面的《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红宝书”，外国人称之为“小红书”、“红色圣经”的书），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家以神秘和虔诚的心情，互相传阅起来，传到我的手中，我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阅下去，陡然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近了，他的话说得多好啊！

这些话都是我以前没有看到和听到的，他是处处为我们人民群众说话啊！这些领袖的指示和语录，过去为什么不给我们群众看啊？这里肯定有问题。我断定在文艺界确有如批判文章所揭示的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在与毛主席唱反调。我们这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完全被鼓动起来。

正在这时有一部电影《三进山城》在上映，我们看了后，一股不可遏制的政治辨别欲在我们心中迸发，我们几个青年对照毛主席语录，热烈地讨论起来，找了电影中不少岔子。我连夜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对照语录，拼拼凑凑地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主要运用这样几条语

录：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接着，我指出这部电影突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抹杀了党的领导，违反了毛主席的“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重大原则。大笔一挥把此电影划入“大毒草”之列。我在第二天上班时，到厂部宣传科，要求审阅后，给予投寄报刊发表。为此还大大得意了一阵子，自认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自认为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经过多年的磨炼才明白，报刊上要批判谁，批判什么作品，都是有背景、有来头的，不是你看出了问题就可以批判的。（在文革的后期，这部电影最早被拿出来上映。）于是人们明白批判一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要打倒某一个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作打人的棍子，就作品本身来说，无所谓“香花”、“毒草”。

在我第一次运用语录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一段段的语录很为“实用”。要批一个事件或某人的一句话，只要在有关的栏目内，找出一段针对性的语录，就可作为武器去“揭露”或抨击他人。从此之后，在我以后写的大字报中，就娴熟地运用开了。事实上，这一大发明，也并非是我一人的独创和专利。在以后的文革中“革命群众”也都不约而同地操起了这一“伟大的发明”。在中国大地上，在特定的政治土壤中，必定盛行这种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

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从中央下达到地方和每个基层单位，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各单位都组织了学习和讨论。毛主席倡导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充分地运用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成了行动的指南。

这时厂内大道两旁及车间的墙上，都认真地用油漆刷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标语，毛主席

的诗词中的词句和语录也刷上了墙头。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地参加，我认为这是靠拢组织的表现。不久我们厂也同社会上一样，进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阶段。党组织要求每个革命群众拿起笔写大字报，积极地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党员和积极份子的带头下，“革命群众”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和与党一条心，也纷纷刷出大字报，表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很快从原先并无具体目标的表态变得具有攻击性，把平时有意见的和自己闹不和的人的一言一行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揭发，而被揭发批判的人，也马上贴出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进行反击，相互揭发问题。有的大字报揭发个人的隐私：“某某人生活腐化”；“某某人与某某人乱搞男女关系”，这样庸俗不堪的大字报可以吸引全厂的人来观看，人头攒动，不时发出哄笑之声。有的大字报内容无甚新奇，但文笔泼辣、尖锐，引经据典（语录）正确，也能吸引人观看。当时，单位里这样大字报贴得越多，越表明这个部门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后来写大字报时，大字报的报头必要引一段毛主席语录，后来改称为“最高指示”，在最高指示四字下引一段大字报内容需要的，能打倒对方的语录，下一行才是引人注目或者说耸人听闻的标题，接下来才是正文。正文中必定以毛主席语录或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二报一刊）社论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作为攻击对方的武器。

在这一场场的混战背后，往往有“战斗组”在操纵。“战斗组”直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其成员由党支部指定组成，每班一个“战斗组”，由党员为骨干，加上党支部信任的群众积极分子组成。当然，并非每个党员都受到信任。在我们班有一个姓刘的党员，因为他同“四清”中清出的一个“小集团”成员有一些瓜葛，而这小集团又成了这次文革挨整的对象，这刘姓党员被清除出战斗组。我的表现已经受到党支部的重视，再加上能动动笔的人太少，我就荣幸地被指定成了战斗组的成员。每天就不必上岗位工作，上班后就按照上面的意图，组织写某人的大字报。譬如在我们班有一许师傅，他的历史中，为了生活，在学生意时曾有一段同日本人接触的历史，并能讲几句日语。在“四清”时曾搞过他，但认为没有搞清，这次就要把他揭发出来。战斗组排出同他接近的人名单，找这些人谈话，动员揭发问题，写出大字报，他平时的一言一行的情况被一张张大字报“揭发”出来。大多数情况是由战斗组找人谈话后，由战斗组执笔。他有一女徒弟，战斗组就每天找她谈话，在谈话中一旦露出一些认为可以上纲的材料，就马上组织出一篇大字报，这当中掺入的“水份”是大量的，只要能罗织或“吓得死人”的内容，能吸引人看，就算一张有“份量”的大字报。于是乎大字报规模不断上升，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大字报一经贴出后，党委便组织专人进行抄写，集中后送交党委，所以凡是被大字报点到名的人，都是很紧张的，唯恐被塞入档案到运动后期受到处理，必定要为自己辩护，或者进而揭发他人表明自己的“进步”。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群众斗群众。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二报一刊社论发表后，战斗组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明显。大字报的内容和对象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党委的领导下，支部按上面的意图和指示运动群众。每天或一段时期内，提出挨批的名单，要我们这些“秀才”组织批判文章，找有关人员谈话，把平时的言行和“四清”时揭出的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为“照妖镜”，根据毛主席语录，拼凑出一篇篇大字报，把一盆盆污水泼向群众。

可怜的车间主任

一天，支部书记记召集开会，气氛紧张神秘，这次要揭发批判的是我们车间的车间主任。

这对大家震动很大，怎么要批党内的干部？

他姓王，名福康，出身于沪上有名的资本家家庭，父亲是新光内衣厂的老板。（即生产“司麦脱”名牌衬衫的新光厂）。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地下党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积极投身革命活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狱后，他进入“光中染织厂”（上海绒布厂的前身）学生意。他彻底摆脱“小开”的身份，与工人打成一片，很受工友的喜爱与尊重。不久解放了，父亲去了香港，在香港设厂，他却与资产阶级家庭彻底决裂，留下来，继续在厂里当工人，并参加了共产党，日夜在工厂里积极工作。他与一个苦出身的纺织女工相恋结婚，夫妻俩都是共产党员。可说是完全无产阶级化了。

他酷爱歌咏，有音乐天赋，他指挥的我们上海绒布厂歌咏队是每届上海总工会组织的工人歌咏比赛中的佼佼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他的这个爱好在文革中也被罗织成一条罪状：

解放前夕，染织厂的资本家张迭生逃往香港。解放后，染织厂进驻了军代表，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光中染织厂重又开工，工人有了生活保障。而这时这个张老板，却又回上海来。共产党从统战政策出发，组织工人欢迎他重新回来经营工厂。当时场面搞得非常热闹，工人们有组织地在马路两旁夹道鼓掌，并由王福康组织的一支歌咏队唱歌欢迎，歌词和旋律全是他创作。毫无疑问，这一切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而文革开始，这段历史当然地成了一条罪状。由上面定性，称他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大字报罗织他的罪状是：为资本家歌功颂德，为资本家搽脂抹粉，欢迎资本家重新来剥削工人，这是其剥削阶级本性的大暴露，等等。大字报又把他积极工作，讨工人为老婆，说成是他混进党内的手段，等等。

大字报一篇篇抛出，但“事实”就是那么一点点，文章的水份再多，仅仅是增加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而已。他事实上确实没有干过什么离经叛道的坏事。于是上面感到“份量”还不够，今天把我们战斗组的几个人召集起来开会，由党委书记亲自来打气，要求我们能写出有份量的大字报（所谓有“份量”就是能致人于死地的能彻底把人打倒的“高质量”大字报）。但我们感到已经尽了力，没有材料可写了。有一个党员提出请党委抛一些档案材料给我们，党委书记连说抛档案不可以，一面这样说，一面就走了。这么一来，会议也就开不下去了，大家或抽烟，或谈笑。

我很纳闷，这会倒底还开不开，揭发车间主任的大字报还写不写，怎么写？看看大家轻松的样子，我真不知他们心中是怎样想的。忽然，有人来了，带来了上面抛出的材料。来人神秘地说：“他曾经想杀毛主席!”

啊!!! 竟敢杀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真罪该万死啊！这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的内心真是恶毒之极。

来人又说，今天抛这一点点材料。言下之意这个阶级异己份子的材料为数不少，这一惊人的材料和党委的信息，让人震惊，也让人愤怒。我和团支书两人马上动笔，一张所谓有份量的大字报很快泡制出来，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事后我才慢慢知道，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

不知怎么搞的，他得了精神分裂症，病情很严重。后来一只眼睛出了毛病，如不开刀摘除，另一只眼也将受其影响将会瞎掉，无奈之下，只得摘除，装上一只假眼。在这期间，他有天做梦，梦见自己去杀毛主席。醒来后，他害怕极了，越害怕，越是乱梦不断。第二天他以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之忠诚，如实地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梦境。

不想数年后，这令人发笑的坦白，却毁了他的一生，差点送了一条命。

在教堂中，有专门让人跪在地上向小间里的神父忏悔的地方。千百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善男信女倾吐过自己内心可耻的邪念，甚至是犯罪的动机，以求得指点和解脱。但是，人们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神父将这些隐私抛撒出去，使人们获罪或难堪。只有在《牛虻》这部小说中，才有神父蒙泰里尼充当卑鄙告密者的情节。但那是艺术虚构。如今，这位对共产党虔诚的中层干部遇到的是残酷的现实。

文革中，“告密的神父”不止我们厂有。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自己向组织交心的事，为什么竟被记录在档案里？这个组织为什么竟是这等心胸？只是由于文革，这些可怕的文字才被抛出来，成为一颗要命的炸弹。那么，假如没有文革呢？这些可怕的文字不也是一剂慢性致命的砒霜吗？

令人遗憾的是，运动后期销毁的整人“黑材料”，只是在档案里抄录的“副本”，人们在欢跃中看着这些“黑材料”在火焰中化为纸灰飞扬时，也许没有想到，它们的“正本”还安然潜伏在神秘的档案袋中。

令人欣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各种单位才根据中央的指示，真正开始清理档案，扫除了这些档案垃圾。希望这种清理在今后成为多余。

令人担心的是，几十年下来左的做法，可能会在某些干部心理中形成定势，变成顽固的怪癖，一旦不让使用，就会像唐僧丢失了紧箍咒般混身不自在。

对车间主任这张有“份量”的大字报炮制出来后，彻底决定了他的命运，根据他的资本家家庭出身，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的大帽，就此扣在他的头上，他的干部职务被撤消——罢官靠边。在惊恐之中，不久旧病复发病假数年。而他的妻子（车间的支部书记）也受累被罢官。在大兴抄家之风时，他家中也被抄，在抄家中发现了一坛陈年老酒，在厂内举办的“吸血鬼”的抄家物品陈列展览会上，把这坛老酒列为展品说明词，就上纲说这是“变天酒”。什么叫变天酒呢？其推理过程很“简洁”：

这是酿造在解放前夕的陈年老酒，酒是在喜庆时才喝的，不喝是因为没有值得庆祝的事，藏了那么多年是他在等待国民党重返大陆统治，庆祝变天时才喝，所以这是变天酒。

事隔三十八年，王福康当时挨这张大字报当头一棒的情景，还清晰地在我眼前晃动。

他这天正在车间忙忙碌碌地安排生产，做梦也不知大祸临头。他被支书叫去看大字报，他丧魂落魄地站在这张够他死一万次的大字报前，呆呆地站立了许久。大字报像一颗重磅炸弹大爆炸，巨大的冲击波一下把他击倒。在批斗会上，他失神的一只肉眼，失去了光泽，丧失了生命，像另一只假眼一样一转不转，死死的，定定地瞪视着令人窒息的世界，如鱼摊上死鱼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的面孔在抽搐，内心的绞痛和无法辩白使他欲哭无泪。如果他仅仅被头脑简单、不明真像的群众批斗，那还说得过去，但他却是在运动开始不久，被他党内的领导、党内的同志出卖的。如果与地下斗争时叛徒的出卖作比较的话，现在的出卖要卑鄙得多，因为这些领导并没有面对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酷刑。如果说，精神分裂症顾名思义是头脑发生分裂的话，那么他的头脑一定分裂成了信仰和现实两大半，这分裂成两半的脑袋将会无休止地“斗争”下去，终有一天取得彻底的平衡，那时世界将是另外一个样了。

红卫兵杀向社会

在这疯狂整人的夏天，我这个典型的在党的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被这狂热的政治空气完全鼓动起来，我成了一个激进的忠实工具，盲目地按党的要求无情地整人，丝毫没

有尊重被整的人的人格，狂热地认为这是在干一件前所未有的革命，是把混入党内的和混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革命、坏份子揪出来，是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需要，这是时代赋于我们当代革命青年光荣的历史使命。我把这历史使命同我的经历结合起来，正因为党内混进了这些人，所以出现了我这几年来的苦难生活，为了今后不再出现我过去的苦难遭遇，我当然要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在党组织的支配下，我热衷于收集材料，按上面定的调子和材料，以不真实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依照报上的批判文章的模式，对被整的对象无限上纲上线，把对象无情地划为“阶级敌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整人，现在我反省自己和观察他人，明白一个人在组织的信任下，被当成工具整人时，就失去回顾与前瞻的能力，不会想到将来自己被整时将会如何，所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各种人物在舞台上演戏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总是有人充当整人的和挨整的角色。中国历史就这么走马灯似地转圈。

各企、事业单位这场昏天黑地的大字报混战，被中央的一篇社论斥之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刹那间，这场混战停止了，闹哄哄的局面一下沉寂下来。没事可干的“战斗组”成员，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于是机器轰鸣起来，永无尽止的布疋从我的头顶倾泻而下，我努力搜寻有无疵布产生。做罢早班做夜班，似乎忘却了“腥风血雨”般的大字报混战。

一天，在沉睡中突然被锣鼓声敲醒，传来了口号声和唱歌声。为什么事游行？我马上起床，冲到马路边去看。街上走过一队队的红卫兵，他们都是大学生，臂戴红色的“红卫兵”袖章，激动地高呼口号，他们打出的横幅上赫然写着“造反有理”。

“造反”？！我一时不能马上反应过来，造反！有古以来，这是要杀头的，这是造谁的反？又一批游行队伍走到了面前，领队的红卫兵领头高唱，队伍也随着激昂地唱起了歌：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啊！这是毛主席语录歌，啊！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带领着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随着雄壮的歌声，仿佛我的热血也将沸腾，从心底里涌起一股激情，世界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即将来临。红卫兵又在高唱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是创造新世界的主人！青年人的自豪感油然而升。

在一只巨手的指引下，大中学校里的学生纷纷组织起“红卫兵”杀向社会，开始了大规模的扫“四旧”运动，重又燃起烈火。红卫兵们首先对上海的大小马路的路名发起扫荡，把路牌贴上红卫兵们自己起的新路名。一时，反帝路、反修路、红卫路重重叠叠，让人不知所

措，商店的店名也受到冲击，一刹那，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店、名店的招牌被覆上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气十足的店名。稍后扫“四旧”的目标开始转向人，以人的衣着为目标发动了“革命”，把展露爱美之心的服装，一律斥指为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经过十多年的政治风雨和棉布的计划供应，大陆人民的衣着，已经异常朴素和简单。但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在这朴素简单的服装中总是有爱美的灵感在闪动。对“奇装异服”的扫荡，首当其冲的是青年妇女，烫发被禁止，小裤脚管被禁止，时值盛夏，在繁华的闹市中心的马路上，有的妇女的裤管被红卫兵小将当众强行剪开。这样的极左过火行动，立即在大上海迅速传开，一时红卫兵的权威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

红卫兵重又提出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的“红色恐怖”，并且将其升温为“红色恐怖万岁”，将革命的目标转向有过剥削史的资产阶级——资本家。从北京来串连、煽风点火的红卫兵，按上海市委提供的沪上有名的大资本家的名单和地址（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出卖行径）逐户抄家，名为扫“四旧”，实际是把资本家的所有财产：房屋、文物古玩、金银珠宝、现款全部剥夺，转为国家所有，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全部被冻结，资本家的定息停止领取。继北京红卫兵之后，上海各系统各行业，有组织有领导地以工矿企业红卫兵的名义，披上民意的伪装，对本单位的资本家进行抄家，抄家在上海全面展开。二报一刊虽然始终没有直接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对红卫兵的行动给予极高的评价，一再肯定这种明火执仗的行动，“好得很”，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词句被无穷地制造出来。

如火如荼的抄家，使资本家们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厂的革命行动比外面要晚上二、三天。

这一天的下午，各车间各部门的支部在党委的组织领导下，挑选信得过的人员，按事先的分工，登上卡车驰向本厂资本家的住所。

第七章 抄家

神秘而神圣的行动

我做中班，刚吃了晚饭，支部书记通知我到党委报到，我匆匆前去，只见会议室内，已经集中了不少人，有人在匆忙地制作红袖章，用毛笔蘸着黄漆写上仿毛字体——“红卫兵”三字，待稍干后，发给每人一只。带队的是党员干部，他们的神态严肃而神秘，言语不多，只小声地宣布一些抄家行动必要的纪律，然后分配来人分乘几辆大卡车执行抄家任务。我被分配去抄俞志超总工程师的家。登上车后一看，其他全是外车间的人，我都不认识。大家是第一次戴上红卫兵袖章，都沉浸在执行革命任务的神圣庄严气氛中，互相也只是小声地交谈几句，就默不作声了。我更感到自豪，因为支部书记只安排了我一个临时工参加抄家行列，我的内心十分兴奋，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加入了革命行列，将要亲自对剥削阶级采取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青年，北伐战争的将士，井岗山上的工农武装，苏区的赤卫队，长征的红军，抗击日冠的八路军、新四军，蒋管区冲向敌人水龙、警棍的游行队伍，奔向延安宝塔山的热血青年，他们当时所怀的心情，大概和我现在一样吧！

我们的车穿过市中心，来到了东湖电影院附近的一条幽静的马路上，在一弄口停下。这弄内的住宅全是三层花园小洋楼。我们被带进总工程师家中。进门是厨房，楼下左首的一间是客厅，右首的一间是书房。二楼是总工程师夫妻俩人的卧室和起居室。三楼是他们的小儿子使用，一间作为卧室，一间是书房，朝北的一间放着一张钳桌台，上面有台钳和手摇钻床，卫生间被改装成暗房，散乱地放着全套的放大机和印相设备。

我们对整幢房屋浏览一番后，把他们一家三人集中到二楼的卧室内训话。这是一间很宽大的卧室，床前放着一只六角形的暗蓝色日本陶瓷烟缸，缸内燃着木炭。而床头却又是一只落地风扇在不停地摇着头（那时上海寻常人家大多数没有风扇，落地风扇更是稀罕）。我很纳闷，八月里的大热天，我们全穿着汗衫，有的还穿着短西裤，他们为什么一面升火取暖，一面又要开电扇纳凉呢？

我好奇地指指烟缸问俞工程师。他陪着小心对我说：“我老婆是日本人，她有病。”好奇怪的病。有人在身后咕了一句：“神经病”。

我别转身朝那个站在床前的日本女人看了看。她低着头，白皙的圆脸惊惶不安，她始终没有开口讲过话。我们在他们面前围成一圈，好奇地看着这个日本女人和她的小儿子，小儿子站在她身边，一付黑边眼镜衬着白脸，透出一付俊美的书卷气。事后知道，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进大学（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可能被大学录取），在家已经一年了。

这时由带队干部进行训话，他们三人低着头，老实地听着，最后我们七嘴八舌要他们把属于“四旧”的东西交出来。工程师说：“已经整理两天了，把属于‘四旧’的东西已经处理和烧掉了。”

这下他倒霉了，人群中发出怒吼！说他是销毁和转移剥削罪证，要他老实交待动机，烧掉了一些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低着头说："都是书，都是书……"

打家劫舍

我们的领队一声令下，大家分头开始到各楼面去查抄起来。翻箱的，开大橱的，一阵忙乱后，不时从各个房间传出一些惊讶的欢呼。几十分钟后，大家把现钞、存单、首饰，全部集中到二楼。粗粗一算现金和存单已经有几万元了，但我们的领队表示不满，认为他肯定还有隐藏的财宝，又把他们训了一顿，然后要总工程师随着我们到底楼搜。

在厨房里我们指着一些容器问他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不知道，我们打开一看，都是吃的东西。我们就指责他：倒底是资产阶级，自己家里放着吃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吃的东西。他只得低头唯唯称是。我一想也难怪，这些事全是佣人干的，他当然不知道。

这时有人把两桶标着外文的罐头拿到他面前，问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我们这些工人土包子不懂，也就不信，说他是说谎，要他打开给我们看，他不肯，再三说是做冰琪凌的原料。越是这样，我们越是生疑，他不肯干，我们用刀硬是砍开来，一看果然是一些咖啡色的粉末粒子。我们一哄而散。他肉痛地捡起来，用手指沾着唾沫和粉末放到嘴里啧啧地尝着，连喊："可惜，可惜。"一面小心地放回橱里。

过一会有人翻到半大箱整条的香烟，是光荣牌。大家惊叹不已，认为倒底是有钞票人家，香烟是整箱往家搬。仔细一想，这个资本家也够节约的，（那时上海的一般工人抽二角八分一包的飞马牌，这是大多数的一般消费，经济困难的"老枪"就抽一角多的劳动牌和七分钱的生产牌，有钱则抽前门和牡丹，光荣牌是三角二分一包，在前门、牡丹之下了。）既能省钱，又整箱地买，保住了体面——这个高级住宅区人的体面。

底楼的抄检，在闹哄哄中一无所获，大家重又回到二楼。领队的召集几个党员商量一阵后，宣布召开批斗会。一家三口人重又低着头站在大家的面前。

刚拉开架子在批斗，党委书记悄悄地来到房门外。有人发现了，喊了一声："范书记"，他急忙摇手，指指里面小声说："不要响。"以免暴露他的到来，不能让资本家知道他在指挥一切。他在门外轻声地问了问情况，对大家鼓励了几句，又对领队耳语一阵，匆匆而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斗志更为旺盛，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批斗起来。要总工程师交待他的剥削发家史。他操着略带绍兴口音的上海话："我的父亲也是苦出身……"

话未落音，人群中爆出一声："放屁！你也是苦出身？苦出身住得起洋房？能够到日本去留学？完全是在放毒！"有人高喝一声："说呀！说下去！"他低着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他战战兢兢地说："是苦出身呀，父亲是裁缝，"为了证明他没有说谎，他拈了拈撂在地上的一张放大的镶在镜框中的照片说："这就是我已经故世的父亲，"照片上的老人的确是面容枯槁、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正用一付愁苦的样子，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总工程师哽咽着说下去："他省吃俭用供我去读书……。"

"放毒！放毒！"众人大声怒斥，不准他说是苦出身。工程师一时不知所措，几乎是带着哭声，嗫嚅："他是个穷裁缝，一针一线……，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他就死了……。"工程师痛苦地注视着地下的照片。

人们一下沉默起来，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倒成了追悼会了。人啊！人的天性。

突然有人把地下的照片拿起来，一下重重的敲击，把镜框的玻璃击得粉碎。人们一下惊醒过来，七嘴八舌地指着工程师说："你这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快交待你罪恶的发家史。"

一脸惊惶的工程师连连低头弯腰："是！是！到了日本留学后，一面做工，一面读书，后来一家工厂的老板看我为人老实，把女儿给我做老婆，要我留在日本，但我还是回国来报效国家……"

"放屁！又在放毒，你是报效国民党！"

他一时惊慌失措，不知怎么答："我……，我……"他想不出自己怎样报效了国民党。

有人高声喊了起来："快讲下去，交待发家史。"这下反而解了他的围，他又点头弯腰地叙述起来："是！是！回国后，我同时在三家厂当工程师，积下一些钱后，我在浦东买下地皮，订购了一套机器准备自己开厂……。"

"自己剥削做资本家！"人群中爆出一句"标准解释"。

"是，是，结果厂还没有开，上海解放了……。"

这气势吓人的批斗会，把那日本女人吓坏了，在众人的怒吼声中，她不时恐惧地看一看

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又慢慢地低下头，她混身发抖，最后她开始摇晃起来，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惊吓，这样的折磨。她咕咕浓浓地说了几句话。我们谁也听不懂，想来是日本话。她丈夫一听马上抬起头，发现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在摇晃，连忙把她扶住，以乞求的神态说："我老婆说吃不消了，要求躺下休息一下。"（这时已经下半夜了，从我们进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

有人高声说："不行！"有人附和说："就是不给她休息，以前日本人杀中国人杀了多少！"工程师在哀求："她有病，她真的有病，让她坐一会再斗她吧……" 可是谁也不开口说同意她休息。

那日本女人摇晃得更厉害了，要不是她丈夫和儿子扶着，一定要倒下来了。那日本女人又说了几句日本话，工程师无奈地低下了头，沉默了好一会，他说："我有罪，有罪，我有黄金藏起来，我愿意交出来。"说着他就把人领到卫生间去，伸手从抽水马桶的水箱内，拿出了一包用塑料袋子仔细包扎的"小黄鱼"——过去上海人对一两一块的黄金的称呼。他用双手，抖抖簌簌地捧给了领队。大家争相来看这一袋黄金，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黄金，都要见识一下，你传给我，我传给他，托在手中沉甸甸的，约有几斤重。

他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得了我们停止对他一家的批斗，让那日本女人躺到床上。我们感到胜利，但并未停止抄家行动，一个个像贪得无厌的财迷，反而认为他必然还有更多的财富隐藏了起来，为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更为仔细的搜检。这时领队命我与另一人，钻进三层楼的泥满平顶上去检查，我打着手电，另一人跟着我，穿过尘封的顶棚，低着头，从这头穿过那头，满身灰尘的我，摇头告诉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正在这时，有人在二楼大声喊了起来："快来看！快来看！这里发现秘密。"

我们奔着涌进二楼的起居室。在东墙靠窗处，经人指点，发现墙上有一小孔，仔细辩认，是一很小的钥匙孔，用手指弹一弹墙壁，发出沉闷的金属声。最先发现秘密的人不无得意地说："里面肯定有黄金或者更值钱的东西。"大家兴奋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秘密收藏财富的地方。有人立即把工程师叫来，要他交出钥匙，他回答说没有钥匙。可谁也不相信。说他里面藏有"变天帐"，有的说里面藏有手枪。

这下他急下："这房子我买进时就没有这里的钥匙。"他一面把买房契约从翻得一地的纸堆中捡了出来，语无伦次地说是在民国哪一年，从哪人手里买进的，又是谁做的中人，以此来证明他确实没有钥匙，更不知道里面究竟有何物。有人从三楼放有钳桌的房中取来了镩头、凿子等工具，那个最先发现"金库"的人，抢过工具敲打起来。工程师心痛地瞧着，墙上很快出现了被破坏后的裂缝和凹陷处的砖头。几个人轮流敲啊！撬啊！费了好大的劲，门始终打不开，最后总算从墙上撬下一只不大的铁盒子，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铁盒的门砸开，一看空空的，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众人泄了气，一哄而散。

资本家女儿的日记

时针已经指向下半夜三点钟了，大家已经显出倦意，对抄家不再感到兴趣，有的人在沙发上打瞌睡。我也觉得有些累，坐下休息。面前的一只装光荣牌香烟的大盒子吸引了我，这只空盒子装着半盒子的照片，地上也散满一地的照片，百无聊赖的我随便翻看起来，都是他们自己拍的，光是为他家的那只全身乌黑的猫就拍了几十张各种场合或姿势的照片。三楼不是有暗房吗？这些照片必是他家小儿子的杰作了。看来这些照片已经主人挑栋过，凡是“犯禁”的可能已经烧去，剩下这些照片就集中在这只纸盒中，供我们前来“抄家”。

我信手翻来，望着这些与我毫不相干的照片，不由感叹起来，这一大盒照片该要化去多少钱啊！我们工人难得拍一次照相，即使是有摄影爱好的，也是“穷白相”：先买处理的胶卷，处理的印相纸和放大纸，（凡过期的胶卷，过期的相纸和放大纸卖出来就称处理的，价格极为低廉，只有原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自己配药水，如果买已经用过的显影药水，那就更便宜。定影药水就更省事了，用大苏打溶化了就成。就是这样的精打细算的“穷白相”一次，也要花去近十元钱，相当于好几天的工资。印相和放大的设备就更简陋了，全是自己敲打出来“土制”品。唉！我们工人的生活真不能和资本家比。

我这样默默地想着。翻照片厌倦了，又翻起了地上的一些日记簿。一本日记簿上秀丽的字迹引起了我的注意，逐页翻过去，原来是工程师的女儿在上海时记的日记。嗬！够进步的，什么要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啊！要争取入团啊！要建设新中国啊！等等。五十年代一个在党的教育下的青年活脱脱展现在眼前。

我又从散乱在地上的信件中知道，这位女青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去了日本，这位工程师的大儿子和女儿在日本读书，留在身边的就是一个小儿子。我想，原来那样要求进步的青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终于经受不住考验，逃走了，逃到外国去了，这个可诅咒的资产阶级家庭。时光逝去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敢肯定地说那位资本家女儿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语，是她发自肺腑的声音。如果在那时能让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子女对祖国的忠诚得以实现，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何等地了得！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声誉是何等地高尚！

其他的工友也散在各处对各种物品翻弄着、品评着，不时发出惊叹声，因为花园洋房的住宅平均一个人要有三个房间，而我们往往是一家子挤在一间房中。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上海“下只角”的工人所能想像的方法、语言和政治观点加以评论，把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我们工人的生活加以比较，我们每个人很自然得出如下的结论：资产阶级所过的生活是“吸血虫”的生活，是我们工人养活了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吸了我们工人的血，无产阶级是该起来造反抄资本家的家，共产主义就是要把这些“吸血鬼”打翻在地，改变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拉下来与我们平等。

事实上抄家以后，这些资产阶级的财富、金钱统被抄走了，居住的住房面积急剧减少，有的甚至被“扫地出门”赶出了自己舒适的家园，只带走少数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定息被停止领取，工资被减少到几十元，同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相差无几。这位工程师每月的工资从四百元下降到六十多元，但他的妻子和小儿子却要他养活，生活就很苦了，要比一般工人家庭差一些，因为一般工人家庭就业的人要多。

我敢断定，当时谁也不会考虑：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把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拉下来，而是应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让广大工农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让每个人享受应该享受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

护 照

这时从我的身后传来紧张的压低嗓门的声音：“看！护照。”

另一人的声音：“是日本护照。”

“不！是中国护照。”

我回过头去，原来是两位工友从满地散乱的纸张中发现了一本护照，正在争抢翻看，我也被吸引过去，其他人也拥了过来。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的特定社会里，平民百姓对于护照是太陌生了。我们这些“打家劫舍”的英雄们，确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全都感到新奇、神秘。我伸手去抢护照来看，那两人中的高个子很不情愿地交给了我。这是一本中日两国签发的具有双重国籍身份的公民护照。（八十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加入居住国国籍。）上面记载的是总工程师的小儿子，上面有他的中国姓名和日本姓名。我还没有翻完又有人从我的手中夺去，就这样从这人手中传到那人手中，等到众人失去新奇感后，这本护照就重被扔到地上，在“废纸”堆中闪耀着绚丽的色彩。

我继续翻看各种纸张，以此消磨时间，而高个子却一直百无聊赖地闲坐在我的对面，心不在焉地东翻西翻，不时把护照拾起扔下。当我起身去卫生间再回来坐下时，那长子不见了，护照也不见了。事隔几个月后，总工程师曾向造反队要求归还护照。他当然再也要不到那份护照了。

天亮了，我跑到下面的花园里去走走，空气真新鲜啊！从充满衣物和陈旧的纸张发出的陈年霉味的房间中，走到花园里，感到晨风特别清凉和惬意，一夜的疲劳全消除了，面对这不调和的宁静和绿色，似乎使人感到隔夜的“阶级斗争”是那样的遥远。

在领队的安排下，大家分批到马路对面的点心店去买大饼油条吃，再加三分钱一碗的豆浆，填饱了肚子。稍事休息后，由领队和几个党员把那些现金、存单、金银首饰和那包黄金登记造册后，装在一只买菜的上海人称为“杭州篮”的竹篮内，满满的一篮子。

文革中，抄家是大陆普通的现象，然而上海许许多多组织的抄家竟然能在野蛮的“打家劫舍”中不忘记将财物登记造册，并让资本家签字，显出一星点儿可怜的文明与法制，也许是与众不同的奇特现象。这大概是由于解放前上海的殖民化程度较深，现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人们心中印下了深厚的制度习惯：上海人上班守时，风雨雾雪无阻；上海车辆遵守交通秩序；上海人办事细节考虑周密；上海的企业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等等。所以，抄了家，得了财，自然就要造册登记。这些册子在后来归还财产时，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时有人来通知，厂里的卡车来接我们回去了，领队把我和另外二人留了下来，要我们看管这一家人。他们则带着一篮子财宝走了。

怜 悯

这场扫“四旧”的抄家行动，名为扫“四旧”，而“四旧”本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实际上抄走的全是金银财宝，赤裸裸地掠夺资产阶级的一切，撕毁了自己提出的统一战线口号，这时的资产阶级，已不是什么同盟军，不是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时候，一点遮羞布也不用了。

整幢房子顿时静了下来。我对我的两个比我更年青的同伴说：“我们三人不应分开，不能单独行动，免得发生不愉快的事，说不清楚。”可他们不时走开，只留下我一人与资产阶级在一起。我非常恼火，只得到处去找他们。那两个人一个在三楼东翻西捡，另一个在底楼东翻西看，见了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跟我走，但不一会他们又不见了。算了，我只得放弃明哲保身的措施，让他们去吧！

大批打家劫舍的英雄们走了，只留下三名“绿林好汉”，现在这幢洋房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三比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无时不在，面对挡不住的诱惑，二名好汉已被邪恶牵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一名。在这间屋子里，力量对比已成一比三。我望着他们

一家三人，面对狼籍满地的衣物、物品、书籍、照片、信件、文件，不禁使我惆怅、不安，对他们产生了莫明的怜悯。

他们三人站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到难堪，大家都是人么。夜里还左得可爱的我，一个虔诚的、狂热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时却动摇了"阶级立场"。我思忖了一番，对总工程师说："为了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你的老婆可以上床去休息。"我没有忘了在"人道主义"面前冠以"革命"，披上红色的外衣。

那工程师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总算醒过来了，忙不迭地说："谢谢！谢谢！"对我一躬到底地道谢后把那呆若木鸡的日本老婆扶上床，又对日本老婆说了几句日本话。那日本女人躺好了后，他又老老实实站在我的面前。

我指着满地的人参和其它我不知名的补品和药材说："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他很快地执行了我的命令，蹲在地上，收起那些人参时用嘴吹去上面的灰尘，一面轻轻咕哝："可惜呀！可惜。"当他把这些药材补品用盛器收妥后，没有忘记我并没有让他自己处理，便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我。

我威严地说："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给你有病的老婆吃吧！"我还是特意加重了"革命"二字的语气。

他听后双手微微一抖，反应过来后，马上又是九十度的一躬到底连声道谢，以极为迅速的动作收藏起来。

我对那个有日本血统的青年看了一眼：匀称的身材，白净的肤色，理着平顶头（大概是为了应付"扫四旧"而理的吧），衬出他的干净利落，脸上戴着副黑边的眼镜，显露出他的日本血统。他双手垂在二侧，目不斜视立在我的面前。这小子，一夜还没有挪动过身子呢！

我装出严厉的样子对他说："怎么？还要我来收拾屋子？你们这些寄生虫、吸血鬼！该劳动劳动了。"我踱了几步又说："至于这些东西么，你们自己处理。"

他干起来，不时来请示对收拾起来的物品作何处理？我故意不耐烦地说："不是对你们说了吗？自己处理！"我特意强调了自己处理。到了这时，他们父子俩似乎领会了我对他们的关照，不时对我鞠躬，那种日本人的鞠躬。

我看着他们父子两人满头大汗地收拾，我的同伴还是没有出现，我想算了，我正可借此

机会对他们发发慈悲。

这时那个青年指着满地的照片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收起来，他快捷地收拢成一堆，又要来问我。我知道他对摄影的爱好，这些照片化了不少心血，不等他开口，就说：“你自己收起来吧！”

他原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闪即逝、不易察觉的微笑，随即以极为敏捷的动作，把所有的照片，放入原来盛照片的香烟盒子内，随后站到我的面前以标准的日本人的鞠躬道谢。

我对他们的不时鞠躬，感到不自在，正好我的同伴之一出现在门口，我马上大声呵叱起来：“你是中国人吗？”

他一惊，抬起头瞪着迷惑的眼睛看着我，期期艾艾地说：“是中国人……”

“那为什么要学日本人的样子？不准这样！”我厉声训了一阵后，指着那盒照片：“还不赶快拿走？”

他利索地把那盒照片端走了。

我转身故意埋怨同伴：“我们三人不应走散，不是大家说好的吗？”他不响。我接下说去说：“赶快把他找来，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突然，门铃响了，他跑下去开门，我也跟着下去。总工程师也跟着我们下楼。一位中年妇女走进来。

女 佣 人

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她是这家主人雇佣的保姆，她每天在这时来上班，她一面把手中拎着的一篮菜放下，一面小声地问我，她该不该继续为他们一家服务。

我指了指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厨房，大声说："你先把厨房间整理好，接下去按你们原来讲定的情况照常去做。"

她马上利索地干开了。那随后跟下来的工程师对我投来感激的一瞥，走上楼去。

那位中年妇女向我唠叨起来，她告诉我，她每天为主人家买菜，随后上门打扫卫生、烧饭，每天做上午这几小时，烧好午饭后就回家。

她前后瞧了瞧，当确信主人家不在，便讨好地向我揭发主人，她说她主人很有钱，他们早在两天前就得到弄内隔壁人家在抄家的消息，主人和他的小儿子就开始把很多东西烧掉，他儿子还把很多书和纸卖到废品回收站去了。她又凑近我，几乎把嘴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真的，他们很有钱，一定把值钱的东西全藏起来了，你们抄家来晚了。"她的惋惜和揭发没完没了。

如果我没有参加抄家，那么我一定会把这个女佣的行为视为革命行动。但是，这一夜下来，却使我对她的这番表演十分厌倦。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是因为资本家夫妻的可怜？是因为这场不平等的较量？是因为胜利得来太容易？是因为破四旧却没收了金银财宝？是因为资本家女儿的日记中真诚的革命词语？是因为这女佣有点落井下石？是因为第一次抄家便有人并非为革命而翻翻找找？……，我说不清楚。我总觉得刚戴上袖章登车出发时那股神圣纯洁庄严的气概迅速地消退了。我不想再听她说下去。事后我知道，我们厂里在当天夜里第二次组织人再去抄这位总工程师家时，她已参加了批斗工程师的行列。

我在书房找到了二位工友，看来他们在等我。我坐下后对这二位"好汉"说："我们已经一夜没有睡了，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完呢？不如我打电话到厂里去请示一下该怎么办？"他们点头同意。

我用装在楼梯转角处的电话，打到厂里总机，接通了党委。我说："我们是到俞志超家的，已经一夜没睡了，其他人早已回厂，我们三人被留了下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电话里传来："怎么你们还在他家？你们马上回厂，把俞志超带到厂里来。"我很高兴，可以马上离开这个使人难堪的地方了。

可敬的总工程师

我对两个同伴传达了党委办公室的指示，他们也很高兴。我又说："我们在书房里好好查查，有什么'四旧'的东西。"他们乐意地接受了我的号令，马上行动起来，我也认真地在主人肯定已经清理过的书籍中，一本本地翻。把古旧的书籍定为"四旧"，挑出几十本。我迂腐而固执地认为，扫"四旧"应当扫这些东西，我把它们捆成二迭，准备带回厂里。

忽然，我发现有几本线装书，我认为这一定是"四旧"。但打开封套一看，傻眼了，原来是线装本的毛泽东选集，印刷和装订非常精美，与古籍书一模一样，（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看到。）毛泽东选集怎能作"四旧"，赶快虔诚地送到书橱里去摆整齐。

拎着两迭书，押着资本家，我们上路了。在马路上，他以那在文革中特有的挨斗姿势弯腰低头在前面走，我们三人在后押送。是的，在革命群众面前，昨夜他一直是以这样的姿势被斗的。我想，这种斗人和被斗的形式是如何发明并被大家很快接受和传开的呢？

瘦小的身形伛偻着腰低着头的工程师，不时偷偷瞧着两边，大概是怕被熟人看见吧！确实有行人好奇地停下看着我们这一行四人，用手指指点点，把我也搞得有些不安。我就对他说，你不用低头了。他对我看了一眼，就直起了腰。我也自在了一点。

到了东湖电影院附近的车站，我们上了四十九路公共汽车，他掏钱要为我们买票。我说不必了，我们可以报销。几站后换乘十七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在进厂门前还有近二百公尺路，他一下车就"自觉"地低着头，我轻声说不用弯腰低头。待走到工厂的大门口，我才威严地说："把头低下来！"我们押着他，在门卫的注视下，走进工厂的大门。迎面一幅白纸黑字、粗犷有力的标语，赫然跃入眼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股萧杀之气凉入骨髓，虽然是大热天。

工程师的小儿子，在文革中结婚，他们舒适的住房不再归他们所有，成了国家的公房，被安排住进了几户人家，工程师一家蜗居在斗室之中，这幢安静整洁的花园洋房成了大杂院。

十年后，文革结束，中国封闭的社会，稍稍向世界开了一条缝。日本有一个代表团访华，工程师在日本的儿女托代表团成员来沪访问时顺便看望父亲。代表团通过上海的外事部门，提出要上门看望俞志超。这等于给有关部门出了一道难题，也急坏了工程师。他的家实在不能让代表团成员上门，只得约在国际饭店见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很懂得家丑不可外扬的。有关部门很快"落实了政策"，把整幢房子归还给工程师，厂里派出工人，限时限刻把洋房里里外外整修一新，工程师在家中接待了接踵而来的第二个日本代表团。

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一家人去日本定居，但工程师的日本老婆却未能回到日本，她已在

文革中病死在上海。工程师人在日本，却每年不时把国外的印染科技情报资料翻译后寄回上海的厂里。啊！可敬的俞总工程师，痴心不改的炎黄子孙，在经受了那么多屈辱和苦难之后，仍然没有忘记报效祖国，为了祖国的经济繁荣和富强，他尽了力。他对祖国母亲没有怨和恨，有的是绵绵不绝的亲情和挚爱。我不知道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别的民族，能有中华民族这样对祖国执着的痴情！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史无前例的大串连

红卫兵运动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风起云涌。北京的红卫兵带着最新的信息和造反精神涌向全国，全国的红卫兵涌向北京，又涌向各大、中城市。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汽车，各城市组织起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极度超载的列车碾压着铁轨，把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来回装载、播撒。学生们天然地互相鼓动，饥渴地相互学习，毫无顾忌地对各地党政机关发起冲击，煽起华夏大地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焰，烘烤着越来越热的政治空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数次接见、检阅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小将，把红卫兵运动掀起一个又一个的狂潮，红卫兵们又扑向各地，又向当权派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造反。

学生们可以自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受任何部门和领导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刊印和散发传单，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毛泽东原本的意图是通过红卫兵运动，用学生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夺回既失的权力，把刘少奇、邓小平打倒，达到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使毛泽东这样做有苏联赫鲁晓夫的上台这一重大的国际因素，他把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的步履艰辛的改革视为修正主义，他把耗尽心血医治大跃进创伤的国家其他领导人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这样想，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那时人人都听到这么一个说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人的身上。

第三代？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吧！记得当时我听到支部书记传达和批判这句话时，觉得象是听了什么巫师的咒语，有一种难言的恐惧，唯恐自己言行不慎而被人说“变修了”，好像杜勒斯讲的第三代就是我。果然，支书又说：第一代，第二代老革命家是保险的，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枪林弹雨，苦大仇深，问题就在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儿子、孙子们。但大出所料的是，修正主义竟然出在第一代，而且在后来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时，有好几大段的关于接班人内容，那是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的批示，里面说到了赫鲁晓夫和睡在身边的赫鲁

晓夫。批示用了排比式的写法，文字激越有力，斩钉截铁，显示出铲除修正主义的坚定信念，让杜勒斯的预言破产，他有十足的信心。他把杜勒斯的预言视为挑战。他奋起应战。

战争开始了。战场在中国。

因此，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杜勒斯挑起的。

工人分成两派

一九一九年，北京的“五四”运动，仅仅有学生一千余人，就使中国的政坛发生了巨大的震动。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运动，则唤起了全国数千万的学生，它完全可以很快达到毛的战略目的而鸣金收兵。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六六年的学生运动像历次学生运动一样，成了引发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如火山爆发，无法阻挡。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欲罢不能，文革动乱遂历经十年，在他离世后方告结束。

工人运动随红卫兵运动勃然而起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群众基础的。十七年来，人民对民主的要求，从未真正得到过。目不暇接的政治运动反而一层层将百姓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如果说五七年的“反右”，仅仅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或者说是每个单位按比例划右派，但到了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就不仅是针对少数人了。在高压政策下，基层的干部在执行过程中，必定变本加厉，搞人人过关，人人“下楼洗澡”。人们反复经历不公正的遭遇，个性在重压下严重扭曲，长期以来，郁闷、不满和对民主的响往，都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学生运动奇迹般的发展鼓起了工人阶级追求民主的勇气，北京来的红卫兵堂而皇之地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和“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口号，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越来越红。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士有了敢于起来争民主、走上社会的胆识。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一个例证。

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在全国发表，是一纸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本单位“走资派”造反的号召书。红卫兵在上海的一些大厂中进行串连，给燥动的工人群众注入了催化剂，原来一些受到运动冲击的工人（也不乏一些热血青年工人）纷纷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向本单位的党政领导造反，写大字报，揭发领导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背十六条、对工人实施围攻和压制镇压群众的“罪行”。

这时的国棉十七厂正进驻着“工作队”，在搞“四清”运动。

在这种时刻仍在搞四清，按原定的步骤，不合时宜地执行上面过时的指示，不作灵活的应变，简直是一种迟钝的机械化运作（如果文革开始后，停止各单位的四清运动，停止派驻和撤出工作队，或许文革的历史就要改写）。人人过关，人人自危的“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要求是那样的冰炭不容，逼使群众的四清工作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矛头直指工作队长施惠珍（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有打就有保，于是在厂内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派之间的大字报战。

保皇派以党团员、积极分子为主，受党组织工作队的支持的操纵，忠于党组织和工作队。造反派是以王洪文为首的“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

当时各造反派组织中不乏爱发牢骚，调皮捣蛋或者思想品质有点问题的人，平时他们总是运动的“对象”，现在也仍为领导和保守组织所侧目，王洪文的“永忠队”当然不能例外。但是王洪文带着十多人搞了一次北京之行，回到上海后，在上棉十七厂北工场沿杨树浦路的墙上贴出大字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流畅的文笔，叙说了他们在京受到毛主席的检阅，“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大字报从标题到用词，力图使一次几乎人人都能得到的天安门广场大检阅，变成北京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单独召见和首肯。王洪文巧妙地达到了暂时缓解保守派组织巨大压力的目的，趁势鼓动群众起来造工作队的反。

“SOS”招祸

在北工场厂房的最高处，有一幅标语为“SOS”，这是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别出心裁地向串连的红卫兵和外界的革命群众“呼救”。那时十七厂发生大辩论时，确实有不少外单位的人参加，帮助造反派。

这一洋派洋文的“SOS”标语简练而有新意，但它当然地招来了大祸，保守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以极左的字句，极力上纲上线，说他们造反派是用国际求救信号 SOS 向从国棉十七厂附近的定海桥复兴岛上岸的国际海员求救，也就是向外国人求救，向帝、修、反求救！吓人的大帽接连向造反派头上扣去，造反派玩火烧身，只好与保皇派进行大字报的生死搏斗。

六六年十一月初，上海十几家有相同情况的厂，在北京红卫兵的串连和支持下，终于走到一起开始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引发了文革全面铺开。跨行业的统一的地方性工人组织的成立，可能大大出乎毛的意外，因为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只能成立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而且只能领导本单位的运动（各单位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清一色由党组织信得过的人

组成，可以统一进退号令)，这样，形势一发而不可收，一场全面的“内战”终于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固然有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但是，如果没有亿万群众积极的、自发的投入与参与，这场运动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烧成一片燎原之势。

第九章 密 谋

黎 某

开始，上海只有极少数厂像十七厂那样闹得不可开交，绝大多数厂的运动出奇的冷清。前段时间破四旧、抄家的热闹已成过眼烟云。因为此时各厂的党组织失却了如何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指示。按照中央十六条的要求，由党委拟定名单成立的本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开展活动，在随后的造反浪潮中自然夭折了。

我们厂也是这样，运动已经停顿，每天生产十分正常。在这风雨欲来的盛夏，我与同事黎伯昂开始熟识。

他是广东番禺人，在家与父母家人讲一口广东话，为人孤僻，不愿合群，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他在平洗车出布的岗位上工作。工作时不同任何人交谈来往，在管好自己的布箱之余，只顾解一道又一道的数学题（七三年中美建交后，他又默背英文单词），他另一个兴趣爱好是能奕一手稳健的象棋，在厂里可称王称霸，是厂里象棋队的顶梁柱，在纺织系统也小有名气。他最奇的嗜好是积攒钱，对每一分钱的使用都要掂一掂，节省非凡，积下了一笔可观的存款，到了四十多岁才结婚，而且是悄悄的结婚，谁也不知，省下一笔发喜糖的费用，婚后几年直到五十岁出头不曾生育，存款越来越多，却还是以存单数字的增加为最大的乐趣，这些都是多余的后话。

他在五八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安徽大学数学系，没有前去报到，却在建设大西北的美好愿望下，前去青海驻沪办事处的门前排队报名，背上行李去了青海西宁市，安排在工厂中做工。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草原劳动，过着艰苦和饥饿的生活，饿极了连草原上的老鼠也去抓来吃。最后，他终于扔掉了一切生活用品，只身逃回上海，照例过了一段临时户口的生活后，被分配到驳船上当临时工。船队航行在长江之中，终日单调地与几名老船工在乏味

枯燥的小船上打发时日。抬头是飘着白云的青天，低头是茫茫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面对的就是老船工的谈吃、谈女人，终于又把他吓跑了，被分配到这个厂里做临时工。

我们是通过大字报认识的。不知怎么的，他也被卷进了“群众斗群众”的大字报混战之中，我读了他的大字报，文笔流畅，如他文笔的人在我们车间工人中委实不多。我打听下来，他也是临时工，我就有意识地找他交谈，进而开始熟识，交流思想。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相同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多岁，有相同的经历，要求改变现状，改变旧的一套，迎接新世界的到来，我们完全被当时的宣传和红卫兵的行动鼓动起来了，相比起来，我比他更为激进。

我的家离国棉十七厂很近，我经常去看他们的大字报，受到的影响就更大、更直接，从他们的大字报中看到他们受到的压制，联系到我过去经历的痛苦遭遇，我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多么英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必要的及时的，既然党内存在一条又粗又黑的黑线，有修正主义，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就必然是反对毛主席的。正因为这些人歪曲党的政策，对群众实行压制，才使我过去遇到这些痛苦。这次运动就是要造这些人的反。

面对厂里冷清的局面，我想把十七厂的火点燃到本厂来。我就把十七厂的大字报内容讲给他听，拉他一起去十七厂看大字报。

他劝我放弃这念头，他说：“这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要费很大的精力，我们不如搞‘临兄’自己的事吧！”

“临兄”就是临时工，顾名思义是临时雇佣的工人，相对企业的固定工来说这些人是少数，随时有被解雇失业的威胁，流动性大，到了一个新单位后，在工资、劳保、政治等待遇上与固定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临时工与固定工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的距离，导致工人之间形成一种若隐若现的等级，使临时工成了低人一等的工人。在企业中不管知不知道某个临时工的姓名，贯常以“临时工”呼之，这就有意无意地带有轻蔑的成份了。工人之间这种工资、劳保等方面的经济、政治待遇差别，对临时工的有意无意的蔑称，究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歧视。所以，“临时工”这一称呼为临时工们所忌讳。忌讳归忌讳，总脱不出“临时”的命，在这个人为划定的圈子内，总得有一个称呼吧！“临兄”这个既自嘲又平等，带着浓重的江湖味，带着十足的人情味，体现兄弟之间互怜互爱的称呼，被临时工们接受和广泛使用，就像在六十年代文革中冲杀的红卫兵们（日后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生），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后自称“插兄”“插妹”一样。此等称呼倒是一脉相承，个中苦涩，非局外人所能体味和理解的。

他继续做我的工作：“我们临兄被人瞧不起，受到歧视，没有人的尊严，我们与固定工的待遇也不同，我们不如搞我们自己的事。”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细想也不尽然。我到这个厂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们要紧跟形势，把握斗争大方向，现在是斗走资派。别看厂里冷冷清清，这把火迟早要烧起来。"我把我对运动发展的估计和感觉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新的阶段，这把火一定要烧到各单位的领导层，是整治那些漠视群众利益、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的时候了，现在是毛主席给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是伟大领袖在撑人民的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的时候了，人民的新天地到来了！

我的这番话没能动摇他，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要干我们自己的事，只有我们自己起来，才能争取我们临兄做人的平等权利。他继续动情地讲述其他单位受歧视而只能忍气吞声的事例。他又一次提起人的尊严，用认真的目光注视着我。

"尊严"！这两个字似乎是那样的陌生和抽象，但又真实地撞击着我的心扉，过去几年的经历，屈辱而痛苦的经历，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又说，像十七厂那样搞，与我们临兄关系不大，我们还是搞我们的事，这是实实在在的。

我心想，靠我一个人去十七厂串连，一个人回来到厂里煽风鼓动，实在是单枪匹马，势孤力单。厂里的情况我也并不熟悉，我哪有把火点起来的这等能量呢？也罢！我们就在本厂搞我们临时工的大事吧！

这一转变，也许根本改变了我大半生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两人又把我同班的丁胜成拉了进来。丁欣然同意参加，三人就开始商讨我们的行动：

先写出一篇批判临时工制度的文章。如何写，写什么，各人谈了不少。我们列举了不少事实和不合理现象，但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诸如固定工发毛主席语录，而临时工却不发，这是剥夺了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权利；诸如把临时工排斥在党团组织之外；诸如剥夺了临时工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因此要求争取同固定工一样的待遇，等等，而真正该讲的事，却一条也不能讲。

商定了内容后，又决定各人回去写一篇批判文章，明天碰头后，按各人的文章，由黎执笔汇总统稿，黎当仁不让，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按时交出了文章，再过了一天，黎就拿出了汇总稿，我们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来。

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冠冕堂皇的套话，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是对于实质性的问题却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临时工们最怕的就是解雇，失业！对这个问题，我们三人都明白，决不能赤裸裸地提出。唉！文章只能这样做了。文章的后半部是黎的观点，他用了不少笔墨，大声疾呼要争回临时工做人的尊严，这才是文章的真正观点。

我看完后，有点怕，我提出：“我们公开提出要求人的尊严，这与当前的政治空气很不合拍，是否会带来麻烦？”事实上十七年来从不提倡人的尊严，从教育小学生开始就不允许发展人的个性，把人人都变成一个个呆板的螺丝钉。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黎提出人的尊严，实质就是争取人权。

丁胜成一听我的话，马上收去笑容，抢着再把稿纸看了一遍，指着稿纸连声说：有问题！有问题。他掏出香烟开始抽烟，眼睛巴搭巴搭看着天花板。

黎有点激动地说：“我们临兄受人歧视，处处不平等，连起码的人的尊严也没有，还谈得上什么其它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连这一点也怕受到围攻，那我们根本不用动笔了。”

丁一言不发，抽烟，在一旁深思。

我一拍桌子：“好吧！就按你的稿子定下来，我们准备招架吧！等待大家出大字报围攻，批我们为大毒草，开始一场论战！”

“废旧战斗组”

厂里的大字报水平我是有数的，肯出来写写的就这水平，我和黎伯昂两人足可以应付自如，绰绰有余。这时的政治空气，已打破了十七年的压抑和沉闷，有点敢说敢讲了，再说黎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要想揪我们的辫子也休想！我拟了标题“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公开信”。我与黎伯昂商量，决定一份投寄上海解放日报，一份就在厂内用大字报形式张贴。我腾抄寄报社的那份，黎用笔抄写大字报。丁胜成还是不断抽他的烟。

我的那份抄妥，在署名时发生了麻烦。

丁胜成转弯抹角地迟迟不肯签。我火了："你害怕了？"他吞吞吐吐只得承认是害怕了，后又干脆表示不参加。我和黎伯昂表示不同意，木已成舟，都写好了岂能半途退出？可他就是不肯签名。黎说不签名就不签名吧，要我把丁胜成的名字写上去。我马上写了丁胜成三个字。丁急了，就从黎的手中拿走了他自己写的原稿。他的意图很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上面追查起来，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至少他可以把自己的原稿拿出来，证明他当初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没有签名。这胆小鬼，随他去吧！我们两人对丁嘲笑了一番。他这时反而活跃起来，不再愁眉苦脸地抽香烟，饶有兴味地看黎伯昂抄完大字报。

大字报结尾照例三呼万岁。在落款处黎伯昂不假思索署上"废旧战斗组"。从他从容的态度来看他似乎是早已定好了这一名称。

我一看急了："你什么名称不可以用？偏偏要用'废旧'，这太难听了。因为在上海各区都有回收废旧物资的公司，遍布各街道的废品回收站。废旧，废旧，似乎我们这个废旧战斗组的成员都是废物，被人嘲笑起来生路也没有，很容易被人用来攻击、嘲笑。"

黎却自信地说："文化大革命扫'四旧'，就是'废除四旧'嘛，我们要废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说："这废旧一词就实质来说是不错的，但终要被人曲解，想到废旧物资上去，何不改为'立新'，取'扫四旧、立四新'之意呢。"

丁马上附和："对！对对！用立新好！"

可这位黎老兄独断独行，不肯动笔修改。我只得又退一步，说："那么用废旧立新战斗组吧！"

自命不凡的黎，把笔一扔，坚持张贴出去。

果不其然，有几份大字报出来批驳了，嘲笑我们是废物，说我们是为个人利益。但是这几份大字报并没有抓住要害，没有在人的尊严方面来做文章，不知是他们水平太低看不出来，还是被"废旧"这明显的可笑之处岔开了注意力。等了几天不见有其他的大字报出来，眼前这几张大字报的水准太差劲，我们就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予理睬。

这时传来消息，外滩劳动局门口有临时工书写的大字报。我同黎就一头扎进了外滩的论战。

外滩的大字报海洋

外滩，是上海的象征，它荟萃了欧美各国建筑的风格，有世界建筑博物馆的美称，外滩也是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在这心脏地区，可看到上海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动向。我们走上外白渡桥——已被红卫兵小将改名为“反帝桥”——就可以看到昔日外滩已被淹没在大字报的海洋中。走过英国代办处，渐近纺织局的地方，墙上开始出现各种大字报，过了南京路口，大字报的密度明显提高，每幢大厦花岗石墙壁一人多高的地方已经被大字报和标语贴得再也没有空隙，有的大厦的墙上已经无法再贴了，就把大字报贴到四、五公尺的高处，高仰起头才能看。一眼向南望去，直到延安路外滩，每幢楼房已被高低参差，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复贴得面目全非，犹如在一件华贵的外套上，贴上了各种杂乱无章的补丁，把外滩的建筑群搞得丑陋不堪。

这时外滩的大字报大多数是上海红卫兵和工厂企业造反派张贴的，它们替代了运动初期北京红卫兵张贴的风靡全国的诸如“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血统论的对联，鼓吹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和“自来红万岁”等标语、传单。

在纺织局大楼的墙上赫然在目的是国棉十七厂炮轰工作队的大字报。另外还有如“良工阀门厂的黑幕”之类的传单。上海的造反大火已经燃烧起来。

这就是进入六六年秋天的外滩，这就是进入六六年秋天的上海。

走过南京路到了福州路外滩，这里是上海市人委和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市人委的牌子在文革后不再出现），中共市委的牌子只是挂挂而已，办公地点不在这里。这所大厦在解放前是英国人的汇丰银行，大门两旁是两只铜铸的雄狮，一左一右蹲伏在大门口，神态是那么的威武。在我念小学时到外滩去玩，走过那里总要爬上去嬉戏一番，跨上它的背，低头看看狮子，似乎自己比狮子更为威武，久久不愿下来。到了稍大点的年纪，走过那里不好意思骑跨上去，但总要伸出手去抚摸一番，先从狮尾顺着背部到头部，再抚摸铜狮的前爪，再走到另一只狮子前，从前爪、头部、背部、到后尾。一对铜狮被行路人抚摸得光亮照人，尤其铜狮的前爪，在上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当初这对铜狮或许仅仅是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来摆设，就像我们中国人住宅的大门两旁

有一对石狮一样，并不含有什么政治意味（或许倒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影响了外国人），因此，解放后外滩象征殖民主义的铜象被拽倒之时，这一对造型精美的铜狮写实雕塑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陪伴着两位解放军战士。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这对铜狮成了外地来的红卫兵斗争的对象，他们贴出大字报勒令政府搬掉它，毁掉它，说它是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象征。先来的红卫兵轰过后，后来的人云亦云，强烈程度一批更甚一批。我于是在铜狮前稍停，观察红卫兵们对铜狮的态度，只见他们走到铜狮前，也是抚摸着铜狮，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微笑，满足了童心的乐趣，随后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勒令”走了。我感到遗憾，没有亲眼看到张贴“勒令”的那些革命小将，他们是不是也抚摸过铜狮呢？他们的童心泯灭了没有？不久，这两尊本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铜狮，就从这座大厦门前消失了。我想，如果革命再彻底下去，何不把外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整个外滩全部炸光呢？更可笑的是，小将们把大厦圆形屋顶上的避雷针也称之为怪物，也“勒令”政府拆除。市委只得用平和语调出了告示，说明它是避雷针，是为了保护大厦不被雷电击中的避雷针，而不是什么怪物，红卫兵们这才作罢。

现在想想真有些后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候，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怎么竟会由这些愚昧无知的孩子们充当横行霸道的革命主力军？是谁造就了这样的一代人？几次中国农村土地革命风暴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同样情景？抑或更甚？

大概在九十年代后期，两只铜狮又在原处出现了。听说它们是复制品，真品珍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我心里一阵高兴，幸亏当初楼里的工作人员只是把它们搬走，放在了什么仓库里，才未被砸烂或者熔化，否则这两件艺术品就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无独有偶，这座楼里在九十年代后期“发现”了精美绝伦而又大气磅礴的壁画，那是解放初工作人员接受了要把壁画铲除的指令后，巧妙地在画上复盖上一层东西而保存了下来。我想，保存壁画和保存铜狮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或同一群人）呢？很可能是的。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智者，他们才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他们在世界发狂的时候，是多么冷静、督智。

面对这些光怪陆离的大字板，我们匆匆而过，折回到汉口路外滩的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的大厦前，朝东的黑色墙面的最佳位置上，已经糊满了大字板，是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炮轰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现在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

好位置没了，一张临兄们的大字板就只得贴在四、五公尺的“高空”。

一张《为什么》的大字板

这份大字板的形式是用为什么的提问式，来批判临时工制度，提的问题很尖锐，面也广，一共提了十四个为什么，落款是上海一家毛巾厂的临时工。

他们用提为什么的形式，要比我们的大字板聪明，这样可以少冒风险，不易被抓诠辫子。但是看的人却感到问题提得尖锐、实在、痛快，因此吸引了许多人驻足仰头，下面十七厂的大字板看的人反而少了。因为临时工大字板的"为什么"直接触及了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真正独立思考的"造反"行为。问出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之后，有什么后果，谁也说不清楚，不像十七厂包括大部分红卫兵们的造反大字板，说的是报刊上和大字板上已经说烂了的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已经由党中央和毛主席认可，并且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写的人看上去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实际上是在保险箱里蹦蹦跳跳，安全系数百分之百。

这张临兄的大字板不同。临时工自己起来造临时工制度的反，绝不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目标、意义和内容之中。而临时工、临时工制度、临时工们遭受的种种不平待遇，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是发生在身旁的现实生活，看得见、摸得着，事实就发生你的家人、亲友之中，于是，人们就要关心这张大字报，猜测作者今后的命运，关心事态的发展，围驻观看的人自然就多。人们在这张大字报上感受到一种"真造反"的气息。

什么是真造反？陈胜、吴广是真造反；攻打巴士底狱是真造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青年巨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是真造反；井冈山武装割据，偏要再升起一个太阳给老蒋看看是真造反。真造反是离经叛道，是独立思考。可是，由首席发动几亿之众去反对老二（刘少奇）、老七（邓小平总书记排在第七位），反对后来的老三（陶铸），反对再后来的老二（林彪），并支持学生、工人、农民和对本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头，也算是"造反"吗？这不由使人联想起斯大林、朱元璋。只不过这两人是秘密地干，而文革却是沸沸扬扬地征讨，造成一种大民主气氛。

这样的"造反"必然使亿万造反大军都高举一面本来就高举着的共同的旗帜，誓死保卫它，并四处寻找敌人，或干脆凭空臆造敌人。不久的后来打派仗的双方也都高举着它，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和存在下去的必需条件，并且按照"红色司令"的战略步署去攻城陷池，而那些被攻打的城池也都无一例外地插着红色司令的旗帜。

但是，临时工造临时工制度的反却不同，他们尽管可以宣称自己也高举着人所共举的大旗，而且确实是要维护它，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以外的经济问题。中国人知道，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奏，共产党一开始的罢工斗争就是先以经济口号取得民心转而指向反动统治的。因此，建国后，经济问题就成了大忌大讳。不用说十七年里，就连文革中，谁也不提中国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以免招来大祸。反过来，经济问题还是"刘、邓"的罪状之一。运动中不少人劝我放弃造反，也就是这个理儿。如果不是文革初期大民主气氛，鼓动人敢说敢讲，恐怕临时工的苦难情况还会埋没几十年而不为世人了解。

可是，这张《为什么》的大字报向广大市民群众掀开了临时工苦难世界的一个角，闯进了禁区。这几位勇敢的临时工真的要造反了！这恐怕是制造假造反的人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他们早就料到了，料到"牛鬼蛇神"会"趁乱出笼"。不过很奇怪，六六年冬天江青在接见临时工组织代表时，却被临时工们的诉说感动得流了泪，并表态支持云云，她竟没有看出这些人造反的指向有些与众不同，大概她还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政治上的洞察力还不怎么样吧！但是，经验老到的人毕竟是看出来了，于是毫不费力地抓起"经济主义"的大帽子扣过来，最终扑灭了这场真革命的火焰。民主这个希罕的禁果，尝一尝可以，你当真能吃么？

这十个为什么，道出了临时工长久压抑在心中的话，在当时多少使人感受到些须民主，有些人马上表示赞同。这些人大概十有八九是临时工。也有的看了，被这直率的提问吓坏了，唯恐被人发现，马上逃也似的走开。有一对夫妻，男的看了又看，不忍离去，女的吓坏了，把自己的丈夫连推带搡地拖走了。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那些可爱的小将们看了却露出鄙夷之色，不屑一顾，轻飘飘地走了。小将们对这张大字报的轻蔑使我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奋笔写下《共产党宣言》，代表无产阶级向旧世界宣战，首先要有对无产者悲惨处境的同情吧？老一辈革命者当初是热血青年的时候参加共产党、八路军，不也是要改变无产者悲惨的处境吗？但是为什么在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却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临时工失去了同情心呢？为什么他们竟有如此敏锐而冷酷的政治嗅觉呢？为什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大字板，立刻能嗅出与"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味儿，而且绝对不再去问几个为什么，坚信上面红色司令部的指示绝对正确呢？他们在学校里读的是什么书？是什么样的教育使他们泯灭了人性？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血管里流淌的果真是热血吗？这样的一代青年，和二战时期的德国青年有多少不同？

在人头攒动中的我和黎伯昂心情激动，觉得意犹未尽，一时技痒，也要说上几句。黎说我们也写上一张吧！这正合我的心意，马上表示赞同。可是在这外滩，那来的纸张笔墨呢？我们灵机一动，何不到近在咫尺的纺织局里去讨纸张笔墨呢？我们马上快步回头进了纺织局大门。

我们贴在外滩的第一张大字报

在大门内专为文革设立的接待室内，一位中年女同志热情站起来接待我们，请我们坐下，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面带笑容询问我们是哪个厂的。我回答了她。她说："噢！上绒厂。"便更为亲切地问："你们要向局党委反映什么问题？"同时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我告诉她，请给我们白纸和笔墨，我们自己写大字报。她听了一愣，稍停说："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你们谈，我们可以向上转达。"我坚持说，我们要自己写。她不厌其烦地说：

“反映什么问题你们谈，我们可以为你们写大字报。”

我说：“不必了，谢谢！不麻烦你们了，我们在这里自己写。”

至此，她只得说：“你们的工作证带来吗？我可以给你们纸和笔。”我坦然出示了我的“临时工作证”——临时公民的临时工作证，她接过手一看，嘴角轻轻地一撇，对自己咕了一句：“噢，临时工。”不屑地把临时工作证还给了我，转身走了出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一股怒气冲上心头。她嘴角轻轻的一撇和轻轻的一句“噢，临时工”，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凭这眼前的一幕，对临时工制度的反造定了！女同志拿来了纸和笔墨，放在我们面前的台子上，对谁也不看一眼，走出门时又“呯”的一声把门碰上。

这也好，我们正不需外人在场，我们可以自在地讨论，怀着刚才的不平，很快由黎把稿子拟好，我们也采用“为什么”的形式，提了十个为什么，提得更为尖锐，突出人的尊严。受了刚才一幕的刺激，我们在大字报上大胆地署上了我们的厂名——上海绒布厂。我们已经亮过相，无须隐讳！

刚把大字报写好，那位女同志进来了，她见我们已经在收拾，就说：“你们把大字报交给我，我们给你们张贴。”她一面说，一面不容分辩地走上来拿，一看是针对临时工制度的问题，嘴一扁，别转身又走了出去。因为这不是针对公司和纺织局的大字报，而是不屑一顾的临时工们写的东西。真太气人了！

我不客气地说：“喂！把余下的纸笔拿走。”顺手拎起屋子里的浆糊桶，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到了劳动局门口，我们匆匆贴大字报，上面在刷，下面就有人围拢来看，人越围越多。我们匆匆刷好，匆匆离去，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家。

第二天，急不可耐的我，不顾夜班的疲劳，睡了一会儿，就直奔外滩，直奔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门口去看我们昨天贴出的大字报，看它的命运如何？是否被人撕去了，是否被人覆盖了。被人撕去的可能较小，当时似乎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刚贴出的革命的大字板是不准撕去的，只能覆盖。如果没有被覆盖，那么群众反应如何？有人要看我们的大字报吗？

我远远看去，市总工会的门口围着不少人，有人在看，有人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议。贴近一看，我们的大字报完整无损，在大字报行间空白处被人用钢笔写了不少字。

有反对的：

“这是为私造反——去他妈的蛋！一红卫兵。”

“转移斗争大方向，罪该万死！——红卫兵”

有赞同的：

“你们道出了临时工、外包工的苦难和不平，向你们致敬！——临时工。”

有拥护的：

“你们写出了我们临时工的心里话，说出了我们的苦难遭遇，坚决拥护。”

其中有一条的书写者大胆地署上了厂名和姓名——马仁来。

我看后马上把厂名、姓名抄下来，欣喜地给那位勇敢者写去了一封串连信，表示我们要联合起来，加强联系。此信石沉大海。后来我们造反取得合法地位后，在总部我碰到了马仁来，在一阵惊喜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回信。他说没有收到我的信。由于这层在大字报上的文字之交，我就安排他在组织部内工作。一天，他突然收到了迟到的串连信。从我投寄到他收到，中间相隔了一个多月，可见我们的串连信被“有关部门”扣下，我们在外滩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和监视。如果文革的发展是另一个模样，那么我们这些人极有可能很快就成了阶下囚。

这时，黎得到一份湖南长沙市大信织布厂署名“萌芽”小组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的作者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以毛主席的著作中的观点和立场，对临时工制度给以系统的批判。我们看后认为立场鲜明，立论正确，也较全面地阐述了临时工制度的问题，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这份传单最大的优点或者说聪明之处，就是从主席的著作中找理论依据，为废除临时工制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外地已经动起来了，而且动得比上海早，这对我们真是非凡的鼓舞。黎把此传单用大字报转抄了一遍，张贴于劳动局门口，大字报的最后一行写上“上海绒布厂废旧战斗组转抄”，以期把火燃得更旺。我们这份大字报又被南京的一红卫兵组织抄去翻印后，在江浙两省更广泛地转抄、翻印，对江浙两省的临时工造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地成立了不少临时工组

织，这是后话。

自然而然，市总工会和劳动局的门口成了临时工们张贴大字报批判临时工制度的阵地，也成了临时工们串连聚会的场合，影响越来越大，临时工队伍中的凝聚力开始形成，并吸引了一些人和红卫兵。同时反对我们的大字报也相继出现。有大字报攻击我们说：临时工队伍的形成是由于个人怕艰苦的生活而从外地逃回来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逃兵，是本人的私心造成的。言下之意是咎由自取，活该！这样武断的大字报，以偏概全的结论，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论战，不少人贴出大字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批驳"逃兵论"。他们中有的并非自身的原因而返回上海，有的从学校出来后，成了失学失业的"社会青年"，再被劳动部门安排做临时工。被劳动部门称为"闲散劳动力"（不称为失业者，因为那时在我国不承认有失业）。这部分人正是国家推行的"两种劳动制度"的产物。（当时写大字报的双方谁也不知有两种劳动制度。）组成临时工劳动大军的人员庞杂，文化层次高低悬殊，从大学毕业到仅识几个字的半文盲，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怎么能用逃兵一词来概括呢？

在对"逃兵"围剿和反围剿的论战中，其中一份大字报的作者以流畅的文笔，有力的事实向公众揭示：自己在何年参军，在何地服役，何年因病退伍后被安排做临时工。这份大字报给"逃兵"论者当头一棒。社会上都知道，政府对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是非常重视的，军官和士兵复员返伍后，工作安排都很好，不会安排去做临时工。连我看了一时也迷惑不解，竟有此事？事实上在那时，确有一批因病退伍的军人（不是复员军人）被一反常规地安排。这张大字报的反响巨大，很快招来"杀手"们的攻击，说他蛊惑人心，伪造自己的历史，是个招摇撞骗的政治扒手，还嘲笑他不但是个逃兵，而且是个不敢署名的胆小鬼。

和姚红接头

攻击激怒了这位勇士，他马上回敬了一份泼辣的大字报："你们是英雄，你们为什么不去外地建设社会主义呢？为什么不去艰苦的地方呢？你们一天也没有去过，你们比'逃兵'更为可耻！"他又针对"杀手"们不承认临时工有不平等遭遇和受歧视，根本不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失业现象，大声批驳道："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敢不敢辞去你的固定工职务，加入我们'临兄'的队伍中来呢？"最后，他勇敢地署上了"上海汽车电器厂姚红"。

这份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讫今为止再也没有一张大字报能望其项背，它掀起了外滩这场有关临时工的大字报论战中，最热烈、影响最大的一次高潮，对日后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形成，意义深远。

我渴望面见这位临兄中的英雄，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为防信落入"有关部门"之手，我故意写道：我与你存在不同意见，要与你商榷，希望约地点辩论。

很快，他回了一封信给我：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说得太客气了……。我的觉悟很低，对问题看法难免有不正确和不全面的地方，我倒很希望你能来信直率的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以帮助我使我提高觉悟。

“至于约地点辩论，我想就不必了，我们工作都很忙，而且我的健康又很不如意，每晚放工，除休息外，再无精力从事其它活动；况且我是笨嘴拙舌的，很不善辩——如果你要我参加辩论，我一定是输给你的。我在总工会门口贴大字报，总的愿望只有一个：不做临时工。在这个前提下，我以为我的大字报内容不会有甚么大是大非的问题的。如果我们进行辩论，我想不论我们辩论得如何有声色，不论是你胜或是我胜，我们临时工始终还是临时工，临时工决不可能在‘我和你’的辩论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如果你一定坚持要辩论，那么建议你用大字报形式，在总工会门口辩，我既然敢贴大字报，就不会惧怕任何人的责难和批评——如果有人要扣我反革命的帽子，我也不怕！有人建议我去当农民，我很干脆用小字报回答他：你为什么不去当农民？

“还是让我们在工作中多化些有价值的时间和精力吧！

“祝好！

“谢谢！

姚红 66.10.27”

姚的来信，使我欣喜若狂！他流畅的文笔、洗练的措词、敏捷的思路、有见地的论点，令我对他更为敬重。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姚红在信中的文字，即便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也是上乘的。我更急于要见到他。与黎商讨后，我们决定在外滩的黄浦公园门口约定碰头。我兴奋地去信告诉他：辩论只是托词，我们希望与他联系上。信中我表示了我的敬佩之情，希望与他见面，共同商讨如何把火燃得更旺。我们请他在公园门口，在约定的时间，左手握一张报纸，以便我们互认。

信发出了，我和黎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到达。

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天的下午，没有风，金色的阳光从枯黄的枝叶间暖熔熔地洒向地面，江边的游人不断，从 48 路 42 路终点站下车的行人不时走过。好一个日朗风平的秋日，如果

不向外滩的大厦墙上的大字报大幅标语看的话，这里真是一个情侣约会的好地方。

我在周围兜了一圈，没有发现有手握报纸的人，我对附近游荡的人，逐一进行辩别和分析，也没有发现想像中的姚红。于是，我就和黎安心地坐在林荫道的长凳上，注意观察新出现的人。

约定的时间到了，只见在我们面前不远靠江堤处，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在对我们注视了一番后，从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中拿出一张报纸，把报纸卷了卷，用左手故意对我们这里扬一扬，转身背着手向防汛墙边上靠去，若无其事地眺望着江景。我马上站起来，装着闲逛的样子，也向防汛墙靠去。

我远远地在他侧面对他打量：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是我们想象中的姚红，在他反背的左手握着一份报纸中，还夹着我给他的信封。噢！他真仔细，设想得这么周到。我马上回身，走到黎的面前小声说："是他，手中还有我写给他的信封，我们快上去。"我从衣袋中拿出他给我的信和报纸，一卷，快步向他走去。

走到防汛墙边，他感觉到我们向他走去，转过身来。我把手中的报纸对他扬了扬，他也把报纸和信封伸向前来。

我马上踏上一步："姚红，你好！"他伸出右手热情地与我握手。我对自己作了介绍，又把黎向他介绍。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的身材要比我高大一点，一副斯文相，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言语不多，正象他信中所说"不善辩"，不是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相对说话来说，他的文才更好。我们坐在林荫道下的长凳上，热枕地谈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他对自己所做，谈得极少，几乎只有我们在谈。他似乎有些矜持——开始我是这样感觉的。

突然间，我发觉刚见面时的热情已经从他脸上退尽，代之而起的是骄矜之气，礼貌后面透出一股冷漠。交谈十几分钟后，他突然立起来礼貌地向我们告别，说他要去上班了，今后加强联系，然后挎着他洗得发白的军用帆布包匆匆而去。他为什么走了？我不知道。望着他的背影我们两人愣了半天，来时的兴奋消失殆尽。

起风了，一阵风过，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飘落而下，一丝凉意袭来，冬天快要来临了。

有临时工游行？！

六六年十月下半月，在秋天的阳光下，市总工会劳动局门口来自不同单位的临兄们经过大字报刀光剑影的较量，确实热闹了一阵子，这里成了临兄们聚会的场所。我当然是这个聚会的常客。大家互不相识，只要表明自己的临兄身份，陌生感马上消除，谈话就会热烈，就像大革命时遇上红军、八路军的时候，报一声贫农，马上能得到信任，马上能参军一样。大家交换各种信息，谈各人的见解和感受。你发言也行，只听不讲也行，不想听马上走你的路也悉听尊便，就像树林中的一群鸟，忽聚忽散，毫无纪律约束。

这时谁也无法预料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下去将是一个甚么样的局面，下一步做点啥谁也不明白。就我来说，仅是希望通过大字报，唤起大家共同投入这场运动，把废除临时工制度的呼声形成一股洪流、造成声势，引起政府重视，希望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不再有失业之苦，仅此而已。

六六年文革的形势的确是瞬息万变的。就在我们同姚红会面后的那二天吧，在总工会门口的聚会中，有人说在南京路上有临时工的游行队伍。

哦！有这等事？我问这人：是什么时间？是你亲眼所见？他什么也说不清，说也是听来的。围听的人群一下泄了劲。

想想也是不可能，解放十七年来，群众能自发地组织游行么？一切的游行都是官方组织的，虽说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但谁都知道是怎么会事儿。平时对领导稍有不满发点牢骚，或者说些俏皮的笑话就有可能在什么运动中被抓送去劳改。在五十年代初，厂里有人说了一句“（苏联）老大哥的钢笔像油条”，讽喻苏联人的东西粗笨，这人就被送去劳改。厂里有一领导干部，受到全厂职工尤其是老职工的痛恨，他把五十年代初，全厂工人应该加到工资中的饭贴扣掉了，而且这干部平时为人太坏。工人们虽恨，但敢怒不敢言。炉子间的一位烧大炉的无锡人实在气不过，把这位干部养的一只鹅偷偷捉来杀了煮了吃，结果被发现，于是这位大炉间工人被扣上莫须有罪名，送到青海改造，直到七十年代末在大平反的高潮中，才受到平反的“殊荣”。人们对“反右”还记忆犹新，“红色恐怖万岁”的声音还在耳旁轰鸣，工人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在南京路上，能让人想像吗？——不可思议！

然而，让人确信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有一中年人证实说：他亲眼看到了游行队伍，昨天他看到了，而且今天上午他也看到了游行队伍，在南京路上打着横幅，呼喊着口号，他用坚定的口气说是临时工在游行。

这消息太出乎意料！也太让人振奋了！我进一步向他了解情况，可是他再也说不清了。

我脑中一直在想：他们是谁？谁组织的？他们的胆子竟会这么大！结果又会怎样？正在大家热烈议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有人把一位青年连推带请送到了我的面前。人们的目光全投向了他。

那人大概是跑得急了，气喘喘嘘嘘地说，“他们是苏州来的临时工，”为了证实他的消息可靠，他接着说：“我参加了他们的游行，我刚从他们那里来，苏州方面的临兄要我拉一些上海的临兄去支援他们。他们在打听上海贴大字报的人，希望取得联系。”

在我边上有人指着我插了一句：“他就是写大字报的人。”

被送到我面前的青年不等我开口，就向我说起游行者的情况来：他们是苏州的临时工，有二百多人，他们在苏州成立了临时工组织、来上海找华东局造反已经几天了，要求华东局承认。起初华东局并不接见他们，后来又对他们的要求迟迟不给答覆，所以苏州临时工们在南京路上游行，期望在上海造成声势，向华东局施加压力。这时特别希望得到上海临时工的支持。这青年又说，他是受他们二百多人之请，特地赶来外滩拉人去支援的。

那位青年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

四周的群众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

很显然，他们把我视为他们的领头人了。周围一时很静，人们在等待我的决定。

我感到惶惑而不知所措，我那时才二十四岁，还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等我作出决断。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明白，历史已经把我推举到一个关口，如果我慷慨激昂地振臂一呼，率众而去，推波助澜，那么，也许一支队伍就此拉起，山头就此树立，上海临时工造反的形态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

可是我没有像小说、电影里的历史人物一样先知先觉、成竹在胸，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小声与黎商议起来，因为黎长我二、三岁，也比我有学问。我们两个都被好奇心驱使着，一拍即合。于是我对四周的群众扫视了一下。

群众安静地在期待着我发号施令。

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鼓励人心的演说，我怯声怯气地说："那，大家就一起跟着去吧！"

和苏州临时工会面

那青年在前面带路，我生平第一次在上百人的簇拥下，快步行走在马路上，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样带领这些人，我只知道默默地走路。在福建路上的一家旅馆前，那青年停下来说："到了，就这里。"

我抬头一看是"大方饭店"，门口拉着一条红布横幅，表明他们是苏州临时工，要砸烂临时工制度，另有几面红旗在飘拂。那青年被门口的几个苏州人一眼认了出来，青年人对他们说了几句话，苏州人迎了上来，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他们呼起口号："向上海的临时工学习！向上海的临时工致敬！"虽然只有几个人，显得有些零落，却令人振奋和感动，同样也使我有些不习惯。

我们被苏州人引到楼上的一间房中，那青年向苏州人说我、黎伯昂，还有我同厂的临兄李国成三人是外滩贴大字报的人。他们请我们坐下。我们三人坦然落座，苏州人又请我的"随从们"——外滩跟来的人也进房间，可是谁也不肯进来。是谦让怕挤不进那么多人？还是怕事做一个旁观者？反正他们就是不愿进来，只在门口立着。这些追随者已经不及原来的一半了，有些人在半路上溜了，有些人在旅馆下面就没有上来，而剩下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也都走光，只有我们三人始终陪随苏州人"造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成立组织的念头，没有这份野心。轻易地放弃了一次利用苏州人创造的契机，组织上海的临时工造反组织，自感没有能力对已经聚集在我周围的人去进行有目的串连和鼓动，我连这些人的姓名都没有问过。这和后来的造反高潮中，只要有几个人肯跟你走，就可以自立山头，占山为王，自成一个组织相比，是极大的反差。

在苏州人的面前，我们三人中当然又是我出面，黎伯昂不善言词，尤其是社会公众场合；李国成忠厚老实、胸无点墨，我们戏称他为"草包"，他也不生气，忠心地跟我们跑。在苏州人眼中我是一个头儿了，他们很快把他们的头头请了出来，此人只有一米六十左右，言谈举止处处透出一个中年人的精明。我们谈话时，不时有人来向他请示和指拨，可以看出他在这群人中威信极高。但从事无巨细都由他处理和指拨来看，他又是一个不会用人的头儿。

我说了一句要大胆用人去分管各项工作的话，他打发了几拨人后，接上我的话头，用嘶哑的声音摇摇头说没有办法，手下人不得力，又说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睡觉，喉咙喊哑了。

他叫人拿出他们印制的传单。我翻了一下，其中也有我们在外滩的大字报的转抄件。我很兴奋，我们对临时工制度的观点是一致的，临时工的心是相通的。

他呷了几口茶，继续用沙哑的声音介绍他们在苏州造反的过程：

他们已经在苏州成立了临时工的组织，是苏州市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依据“十六条”文件规定要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运动，所以组织的名称，谨慎地用“苏州市临时工文化革命委员会”，避免被套上非法组织的帽子，（可见其良苦用心，显出这位中年头头的老成。）他在“十六条”“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中被推为文革主任。他们在苏州当然不可能得到苏州市委的承认，无奈之下就向华东局——中共中央派出机构所在地的上海进发，由于这个组织是在一位老成的中年汉子的领导下，以及临时工特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可能作出惊天动地的拦截火车的举动，而是小心地选择了步行。好在苏州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两天就走到了，同时用步行表明了他们的革命决心。但到达上海后，华东局并不重视，不接见，不安排住宿。他们就在南京路上游行，施加压力后，才安排他们在“大方饭店”住宿和吃饭，在旅馆顶楼的会场，华东局接见了全体代表听取意见，但派出的干部级别不高，只是一般干部。看来华东局对待苏州人的策略是在打“太极拳”，慢慢地拖。双方僵持着。因此，苏州的临时工多么需要我们的支持啊！

我实事求是地把前一段时间的大字报情况介绍了一番，对他们说，实际上我们上海还处在舆论宣传的阶段，还没有形成组织，你们苏州比我们走得快了几步，已经成立了初具规模的组织，要求当局的承认，走到了争取合法地位的实施阶段。

他们并没有冷静地分析上海临时工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两地之间的差距，那中年人对我们的期望值太高，要我们立刻组织队伍支援他们，参加明天上午的游行和下午的华东局干部的接见。对于那位苏州头头的要求，我很为难，我们还没有组织起来，我到哪里去拉人参加游行呢？我能行吗？我还根本不知如何“造反”，思想模糊一片，绝没有成立组织的一丁点儿的念头，更不用说自立为王拉一个山头出来造反。但是，苏州“临兄”们的困难，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哪！

第二天上午，我和黎、李二人先到外滩，作了动员，好歹有几十人跟着我们三人去参加苏州人的游行。但是到了大方饭店门口，已有一半人在半路溜走了，等苏州人整顿好队伍，打起横幅向南京路而去时，我们的人又溜走了一部分人，只有推着自行车的十几个上海临兄们跟着队伍走。

说真的，游行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只是推着自行车，带着这十几辆自行车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与其说参加游行，倒不如说是在“看”他们游行。

说实在话，游行并不成功，稀稀拉拉的队伍，嘶哑的、又是软糯的苏州口音的口号，怎么也造不出声势。苏州人似乎也意识到这点，只在附近的南京路上兜了不大的圈子就草草收场。

下午，华东局的接见，对我来说充满了新奇的感觉：怎样进行？形式是怎样的？

苏州人的失败

到时间了，苏州人领我们三人走进顶楼的会场。这小型会场已经坐满了苏州人，苏州人的大小头头全坐在台上。他们把我们三人也请在台上就座，正式宣布我们为上海临时工的代表。这真是天晓得！我们三人只能代表我们自己。

尽管苏州人在饭店门口拉出横幅标语，呼吁上海人参加他们的造反行列，参加他们的大会。但上海人太精明了，上海人在观望，在窥测政治方向和动静，参加者廖廖无几，即使参加，也只是看上一会儿就走。但我们三人自始至终陪到了最后。

主席台的正中坐着苏州人的头头——那位中年人，他旁边坐的是华东局派来的一位干部，职务不高，大约只是一般的科员。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东方红”，会议主持人选读几条毛主席语录，高呼一阵口号，很快把会议的气氛掀起来，那位苏州头头手持讲稿，控诉临时工制度的罪行，说它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行的修正主义产物，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剥夺临时工的政治权利。因此，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已经组织起来的苏州市临时工组织要求华东局承认。接下来请华东局的同志发言。

那位干部以平缓的口气、刻板的声调，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对他们的要求不予支持，劝说他们回苏州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表态，是意料之中的。接着又一位苏州人上台，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控诉苏州市委压制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步行来上海向华东局上访。

于是，一方要求取得承认，一方不支持、不承认。二、三百人对一个人，局面就这样僵峙着。苏州人无休无止上台控诉、高呼口号、高唱语录歌，或者用语录作为武器，整段整段的念语录。而华东局的干部稳坐台上，不为所动，你们要我发言我就是坚持重申那两句话，不越雷池半步。这边苏州人就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没日没夜地继续下去。

会议开到了午夜时分。我希望能早点结束这无休无止的“造反”。这时，华东局派来一位中年女干部，她的到来，给台上的头头们带来一丝希望，期盼能够打破僵局，下面的群众也开始振作起精神，盼望能解决问题。所以，当女干部宣布中央有最新指示时，全场振奋，马上用雄壮的口号声表示欢迎。

女干部开始宣读，这是一份电话记录稿、是中共中央在晚上九时多发出的电话指示，这份电话记录的前半段肯定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表示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应予支持，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后半段以坚定明确的语句指示：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按行业、系统成立的组织名称应以协会的名称为好，革命群众应回到各自的单位去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电话记录一宣读完，会场的气氛明显降温，会场的后面，开始有人离开。台上的头头们一阵交头接耳后，苏州人针锋相对地提问：这是中央的什么文件？要求出示正式红头文件。那女干部说，这是电话记录稿，是刚接到的中共中央电话指示。头头们不甘心就此罢休，以没有书面的正式文件为由，对记录稿表示怀疑，宣布这是个大阴谋，继续把会议开下去，呼口号、念语录，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让这毫无意义的局面僵持下去。

这时华东局的那位女同志坐到我的右侧，她小声地对我做起工作，她问我在那里工作，当知道我是上海的，她对我特别套近乎。她首先对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她说：“对于临时工的情况，以前的确一点不了解。”我就对她说：“在政治上临时工是一点地位也没有的，就拿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语录来说，临时工就没有份，被剥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而且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今天，是更不应该的。”

“竟然有这样的事!”她作非常吃惊状，马上拿出记事本作记录，并问我：“你在哪一家厂？”

我报了我的厂名。我说：“这不是一家厂的个别现象，我们整个纺织系统和我知道的单位的临时工都不发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全市性的现象。”

她认真地做记录。

我接下去说：“临时工还不准参加一些会议，不能同正式职工一样参加政治学习。不过我们厂这情况倒没有。还有，临时工得不到党组织的关怀，不能入团、入党。”

她飞快地写着。

我更来劲了，我说："临时工所受的歧视处处存在，不仅仅在政治上，有的临时工对领导稍有不顺，提提意见，等待他的命运就是被辞退。临时工在经济上更是不平等，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劳动强度，工资比固定工少，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劳保，生了病，请病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有了大病，病假一长，只有被辞退的一条路，这样，临时工的生老病死就没有保障，临时工最怕的也是这，人老了，怎么办？临时工被辞退后，地区的劳动调配一时不安排新的工作单位，这就是失业，没有收入，这生活怎么过？"

说到这里，我显得有些激动，不是么？我曾在家等待了七个月才获得新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意味着要饿肚子！

女干部飞快记录的笔停了下来，她抬起头，瞪大双眼，用充满着同情的（看得出来，她现在的吃惊与同情是真诚的）语气向我提问，针对我刚才说的，要我详细地、具体地谈，甚至连具体的数字也问到，如每天的工资男临时工一元八角，女临时工一天一元六角也问到。我就把一个临时工如何被安排，什么部门安排，在工厂的一般遭遇，又如何被辞退，又再安排这一过程，作了系统的、详细的叙述，把临时工的辛酸和痛苦呈现在她的面前。

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惊奇地发现，她像个外国人似的什么都不知道，不时提出极其简单的问题，她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不了解了。我只得不嫌其烦地尽可能讲得细致，让她了解得透彻一些。她直言不讳地说：对临时工的生活一点也不了解，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听到这些情况。

她真诚的态度，使我从经济角度毫无忌讳地评击临时工制度：我们怕失业，我们不要做临时工，我们要求平等的生活！

然而眼前无休无止的发言和贴在外滩墙上的大字报，谁都忌讳谈经济，怕被扣上为私造反的帽子，大家都拣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来讲，全国、全党、全军的政治格调使大家在造反时都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

那位女干部听我把话谈完后，合上记录本，认真地说："今天反映的问题，我们以前确实不了解，我一定带回去向中央反映。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她扫视一下会场，把话锋打入眼前的问题："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组织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任何人不能违背。"

她把中共中央电话记录稿递给我。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是啊！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天亮时，苏州人大会结束，无果而终。

我第一次参加所谓的造反，既兴奋又感到必须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向外界宣传，扩大影响。要让外界知道，华东局派出的干部已经接见了我们，答应把临时工制度存在的问题向中央反映，存在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表明临时工已经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早上，我把此想法告诉了黎，我要小李去买一令白纸来。我很快拟就一份传单，客观地报导了这里发生的情况，同时把中央的电话指示也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向苏州人借来钢板、刻笔、腊纸，自己动手刻印传单。这是我在文革中唯一一份由我自己动手撰稿和刻写的一张传单。印好后就拿到外滩去散发，苏州人也要去一些。

突然，苏州人的头头把我找去，对我的传单大为光火，指责我不该把中央电话记录刻印出来，说我破坏了他们的斗志和行动，把我斥之为临时工的叛徒，叛变了他们，出卖了他们。他宣布这次来上海的行动已经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我的这份传单。他气冲冲地要人去通知他的手下头头召开紧急会议。只几分钟，他正式下令撤回苏州。

我默默地听着他的指责，我不明白我错在哪里。当时我太老实、太单纯了。大概搞政治运动是应该蒙骗群众的，不能让群众知道全过程和真象的吧！中央的电话记录是当众宣读的，我只是写了出来，难道他们失败的责任该由我来负吗？

我并不认为我们失败了。不是已经通过这样的造反，使下情上达了吗？这不就是造反的目的吗？

那头头到底是人到中年，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指责一番，失败不是他领导不力，不是苏州人造成的，而是上海人造成的，乘此下台阶下令回苏州。他是聪明的，他明白同中央是不能斗的，这样硬僵下去，绝不可能由于一个小小苏州的二三百名临时工而改变中央的决心。从后来的安亭事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苏州人撤回去了。我们就这样不愉快地分了手。我照样去上我的班。

在这段时间内，上海的另一群人酝酿着更大的行动，我却一点不知。

第十章 拉大旗

静安文化馆

十一月九日,我早班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三十一棉纺厂,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

庆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

又一幅标语号召人们去文化广场参加成立大会。

我猜想这一定是有十七厂参加的。中央不准成立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他们在冲这个禁令，而且规模好大，在文化广场。苏州人的天地实在太小，那么人多势众会怎么样呢？我很想去看看。

我徘徊在长阳路上……

还是回家吧！

工总司的成立，像在黄浦江里丢进一块石头，没有掀起大浪，没有产生连锁反应，很快就被偌大的上海淹没了。这得“归功”于新闻媒介的严格控制。报纸、电台不张扬，大部分市民们怎么会知道呢？

第二天，秋雨连绵，临时工聚集和张贴大字报的总工会门口显得有些冷清，往日的人群不见了，墙上的大字报经过连夜的秋雨浸泡，有的已被风吹得掀起半边，有的墨汁溶化字迹模糊，好像热潮已经过去，不会再掀起新的浪潮了。

我在总工会门口游荡，失落感在我心头闷闷地压着，就这样？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吗？我望着黎伯昂写的大字报，它快要掉了，我趁它还没有完全吹落前，恋恋不舍地再看上一眼，心里想，能在外滩贴上我们的大字报，说出一些想说的话，真不容易啊！但我们的努力会有

结果么？

我失望地转身欲走，突然发现在左上角不显眼的地方有一张“海报”映入我的眼帘：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临时工外包工合同工制度大会

落款是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地点在乌鲁木齐中路459号，静安文化馆。

我反复扫了几遍落款——“上海市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我精神为之一振，竟然已经成立了组织！而且海报贴在这里，十有八九是临时工的组织！这时在我身后有几个人停留在看这张海报，终于慢慢集起了十多人的一群，对这张海报议论起来，虽然没有往日的热闹，但总算有了一点生气。各种信息开始交流传播。

没有新闻媒介的传播，人们就靠这样的方式传递信息。

有人说：工总司已经在昨天成立，由于市委不承认，几千人已经到北站，上北京控告。这是传到我耳中有关工总司的第一条消息。

又有人介绍起这张海报的来历：这个静安文化馆现在已经是上海市委的接待站，那里有郊县的农民在造反，他们是亦工亦农的“四六工”。市区的临时工也有参加的，这个总部大概就是这些人组织起来的。

什么“四六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由农民参加，我想这大概同我们不搭界。

又有人说：“农民归农民造反，临时工也有人在搞，这几天临兄们都往那里跑。”

原来如此！怪不得这里没有了人群。我思忖了一下：去北站？不！北站不是我去的地方。去乌鲁木齐中路吧！那里才是我去的地方。

原来在这几天，上海临时工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静安区这条洁净的马路上。这里的“主力部队”是郊县“亦工亦农”的农民，他们由公社、大队组成工程队或者别的什么队在市区的一些大企业中修造厂房搞基建，这些农民在农忙时回去抢收抢种，农闲时开进市区，劳动收入六成归集体，四成归个人，故称为“四六工”。文化革命造反了，他们敢说话了，说这是剥削，要取消这种剥削制度。他们聚集起来，已经在市委接待站造反好几天。市委接待站安排他们在文化馆的剧场里住，他们就依此为“大本营”，没日没夜的“造反”，其形式与我看到的苏州人一样。上海市区的一些临时工参加了他们的造反。与其说是互相支持，倒不如

说是相互利用。这些临兄们比我有眼光，比我聪明，我绝没有想到利用苏州人，而他们却想到也做到了，他们利用农民的那股势力，正式拉大旗造反了。

“测字摊”时期

静安文化馆内有一个狭长的简陋剧场，座位是一排排的长条椅。在检票人站立检票的地方，放着一张课桌，就这样的一张课桌，起到了联络全市临时工的作用，吸引和凝聚了临时工，一个组织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一重大的举动是得到农民兄弟的同意才摆放的，临时工则以支持农民造反作为回报，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两群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这张课桌全天有人值班，值班人员不固定，也不预先安排，谁有空，谁热心，谁就来。有人来接班了，原先的人就去吃饭，回家或者去上班，完全自觉自愿。值班人的职责是向来访者宣传、鼓动，向来访者介绍这里的情况。来访者也带来各种信息与大家在这里交流。

值班人的面前还放着一本白报纸装订的登记簿，请来访者登记，当然也有来访者不敢留名的。这本登记簿的设置，显然是为了联络，以备组织人员时起到“联络图”的作用，这又是一个聪明的作法。

大多数来访者都倾诉了自己的遭遇，要求反掉这个制度，不做临时工。不少来访者已经被辞退，失业在家。有的是得罪了某方面的人，长期不安排工作；有的是因为在单位中提意见得罪领导被解雇；有的是被道德品质恶劣的人嫁祸而代人受过被解雇，等等等等。

临时工们的诉说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挣扎在温饱线以下，他们要推翻临时工制度，求温饱。

求温饱，在解放十七年后的上海大都市，这是多么本份的要求！这是多么低级的标准！临时工是人，是工人阶级，他们中不乏优秀分子，只是统统被人为地划入“另册”，成为产业工人中境遇更差的一个阶层，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连处在“一百步”地位上的正式工，都有不少人瞧不起这些处在“五十步”地位上的阶级兄弟。现在，为了反掉这“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距，是多么的艰难！

在这静安文化馆的一角，看不到市委接待人员，这里是我们临兄的世界。人们前来倾诉不平或不幸，围在四周倾听的陌路人因为也都有相同遭遇和经历，时常陪下一掬伤心泪。这时，如果值班的接待人善于口才，一定能鼓动起大家，这些来访的群众就会成为日后的基本

群众，或成为骨干力量。

我看到这些自发的接待人员确实做得像模像样，发挥得淋沥尽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确实把群众凝聚了起来。当然，这种初级的串连形式，只能达到相互同情、鼓动的作用，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来访者心中也明白，这里并不是立刻解决疾苦的地方，只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限度的民主，他们才愿意到这里来，把心中的苦水倒一倒，把心中的郁闷说一说，人人抱着希望，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通过“造反”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来访者一批又一批，接待人坐在桌后，与来访者相对而坐，用好言抚慰，用空头的许诺，鼓起人们的希望，犹如算命先生算了过去、预测将来、让人往好里想。这样的接待，后来我们戏称为“摆测字摊”，称这几天为摆测字摊时期。

这里的工作秩序井然，想出如此绝妙无比的方法，使分散在全市的临时工们有了一个稳定的聚会地点，团结了一大批群众，为组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我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得出结论，这里一定有人在指挥！然而，这一切是谁在组织指挥的呢？

足智多谋的老杨

我渐渐地与值班的接待人员搞熟了，开始参加他们的工作。

里面的会场内不时爆发出口号声，似乎气氛还非常火爆！我想进去看看，但守门的农民兄弟却挡着驾。算了，不看也罢，这种场面我也经历过。

过了一段时间，半天，从会场内走出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身穿学生装，戴一副眼镜，学生模样，胸别着“大会主席团”的红绸带，他同门口的值班人员交待了一些话，又匆匆进入高呼口号的会场。另一位值班人员指着他的背影说：“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又过了一会儿，里面的会，大概高潮已过，吃饭的时间也早过去了，络续有人出来，其中一个是戴红绸带的青年，他同另一位也戴眼镜的一起在同值班人谈话。旁边有人把我向他们两人介绍，说我是在外滩贴大字报的人，还参加过苏州人造反。

我们三人互通了姓名。

那学生模样的姓费，费敏璋，另一三十多岁的姓殷，殷庆宝。嘿！我们三人全戴眼镜，但他两人给人的印象是十足的书生，费尤甚，他外貌忠厚老实，厚厚的嘴唇，大概不太善于口才。殷的相貌英俊潇洒，从镜片后流出一股老于世故的眼光。

费握住我的手，说外滩的大字报他看过了，现在外滩的毛泽东思想新工人总部的海报是他书写的。

那殷庆宝把头略微抬一抬说："听说过外滩的大字报。"又用手划拉一圈说："这里的一摊子是我们两人搞起来的。"一副居高临下的得意。他又问了我一些情况，我据实说了。言谈中他处处以老大自居，我也不介意。实际上前阶段我们在外滩的工作是做了舆论准备，为他们打下了基础，而他们的海报在我们的大字报上面一贴，全市的临时工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中路来了。

这时已经形成一个态势，那就是两股势力已经会合，到了形成组织的前夜。但当时我尚未觉察，也没有拉队伍、树山头的念头。

经过两天繁忙和琐碎的工作，我观察到，这里的领头人，并非是他们两人。费、殷只是台前人物，在后面指挥的真正领头人是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称他老杨。

老杨的威信极高，他一到，这些人全向他围拢来，汇报一天来发生的情况，领受他的安排和指挥，大家再分头按他的要求自觉地努力地去做。毫无疑问，我的出现和我的情况，一定有人向他汇报过，他们可能在商量什么时候接纳我。我从不靠上去，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看出，他们在考察我、观察我，老杨的目光不时在注视着我。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天了。傍晚，他们围在老杨身边商量问题时，我依然忙我的。过了一会儿，杨把我找到一起讨论。从这时开始，他们不再把我当外人，遇事必有我参加商讨了。我成了其中一员。

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人，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尤其是扑朔迷离，令人迷惑不解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知该如何办，完全凭一股热情和冲动，跟着政治的大潮，随波逐流。唯有老杨这个足智多谋的中年人，在出主意指挥大家，受到大家心悦诚服的拥戴。

老杨。从大伙儿对他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出工人兄弟对他的敬佩。因为工人之间一般互相

直呼姓名，对稍年长的则称为某师傅，只有对受尊崇的人才称呼为老杨、老王、老李。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秀郎架近视眼镜，白净的面孔，翩翩学者风度。他受到大家的拥戴，他也尊重别人，遇事总是低着头思忖再三，然后抬起头，说出他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然后他把所有意见分析、比较、权衡、归纳后，再把他的最后决定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执行。我们对他的敬佩，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的决定一下，我们就马上分头去办。有时候在紧急关头难下决心，而我们又说不出道道来，他就低头抽烟，随便在什么地方一坐，进行思考，一旦决心下定，就召集我们，或者找有关的人面授机宜，立即付之实施。

后来我们正式拉大旗造反时，也像苏州人那样在台上鼓动群众公开演讲，但老杨从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一直是名符其实的后台和幕后指挥。老杨，可以说是一个摇羽毛扇的领袖。

他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她即使在文革中刚扫过四旧的特定环境中也很着意修饰她的外貌和衣着。当然她的刻意打扮是颇费一番心血的：既要满足一个女人爱美的心理，又要能被红卫兵和这个大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社会所容忍。那时的妇女，是一律的齐耳短发，已经不允许烫发，但她还是留着似烫非烫的长发，配上她美丽的脸蛋和秀气的鼻子，是那样的贴切和自然，真不知她是如何摆弄的。

他们夫妇俩优雅的都市型知识分子的气质，使他们与我们工人有显著的不同。老杨的身世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从他的举止行为和外表可以推断，绝不会是响当当的三代贫下中农或者工人出身。按文化大革命中的对血统的要求，他当然不能出头露面，只能在后面指挥。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胆识啊！

他们夫妻的生活一定十分和美，有次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一个俊俏的女孩，在秋风秋雨中为他送来雨衣，老杨送她们走时，两人情意绵绵的话别，女儿的娇憨之态，这组镜头多么富有生活的气息和诗情画意啊！然而我们进行的却是一场风云变幻、前途未卜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两者相比是多么的不和谐、不协调啊！

成立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准备

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的爆发，这些构成了我们临时工在市委接待站造反的大背景。造反的烽火已经遍地燃烧，群众的惧怕心理日益减弱，我们的串连鼓动工作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有关安亭事件的信息不断传来，安亭事件是反革命行动还是革命行动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的传单战中争得不亦乐乎。

一天，送来一张安亭事件真象之类的铅印传单，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一，这张传单是铅印的，说明传单的制作者有一定的背景和实力，因为这时传单绝大多数是油印，铅印的极少；其二，它的落款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临时工委员会”。这说明在工总司的这次安亭事件中也有临时工参加。

大家争相传阅这张传单，我的感觉是我们并不孤单，这张传单给了我们鼓舞和信心。随着我们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随我们的群众越来越多，每天的接待工作已不是摆一张“测字摊”可以胜任。更为可喜的是来访者已经成群结队而来，登记表很快装订成厚厚的一册。人们不再是仅仅来诉苦，而是表现出反掉临时工制度的强烈愿望。每天前来的熟面孔越来越多，基本群众已经形成，以接待人员和基本群众中的骨干形成的一套工作班子已经可以经受考验，成立自己的组织的内部条件已经具备。

这时工总司已经从安亭回到上海市区，张春桥签署的承认工总司五条要求，被翻印成无数的传单，广泛印发传遍上海，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的工人组织已经得到承认，他们的领袖人物王洪文已经家喻户晓，外部条件对我们已经相当有利。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老杨召集筹备会议，决定第二天成立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名称仿照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至于加上“外包工”三个字，是因为外包工是比临时工的待遇还要差的工人，一般外包工归自己所在的街道管理，由街道派到某一工厂做最重最脏的活，街道与工厂结算，街道再发工资给外包工，并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对外包工来说，同样一天的工资要比临时工少，同企业不发生经济上的关系，连最起码的看病医药费都没有地方报销，工作班子中的费敏璋就是外包工。

老杨把人员理了理，进行分工，首先我们在华山路延安路口借得一中学的操场作为召开成立大会的场所，并派人四处张贴成立大会的海报。

我接到老杨的又一个具体指示是布置会场。

我不知道如何布置会场，我去看了操场后，真不晓得如何入手，要什么缺什么。但有一点我是必须要办到的，那就是照明灯光。我们的会是在晚上。老杨的考虑是对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样来的人可以尽可能的多，否则在白天让临时工、外包工离开生产岗位来开会就太困难了。我费了不少努力，碰了不少壁，总算用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附近的一个小厂借得一串几十只国庆节使用的彩色灯泡和电线，带着人在操场上布置起来，看起来虽然有点气氛，但显然还嫌少了一点，亮度也不够，但总比漆黑一团好多了，将就点吧！我自己已经很满意了。

老杨又给我一个指示：前去工总司取得联络，谋求他们的支持，邀请王洪文出席我们的

成立大会。

这时，安亭事件已经响彻全国。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的代表，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了上海市委，“先斩后奏”，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字，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安亭事件为革命行动。这样的“先斩后奏”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肯定。（张春桥敢于这样做，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京时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能压就压，压不下就“招抚”的便宜行事的指示。这可以从中央的电话指示：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以及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制止安亭事件看出，本意是想压。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做法，所以并没有出什么正式的中央文件或用中央“二报一刊”表明中央反对成立跨行业组织的态度。文革开展半年来，中央的态度和指导运动的发展一向是用中央二报一刊来指引群众运动的。但在安亭事件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第二个可能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做足了文章，刘少奇、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吃足了苦头。因此在对待群众组织的问题上，不敢贸然行事，态度就不够明朗。张春桥完全揣摸了毛主席的心思，搭准了主席的脉搏，才敢先斩后奏。现在想来，第一种可能要大得多，因为主席可能觉得需要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至于冲破中央一贯主张的“跨行业”的限制，对于主席来说是小菜一碟，他老人家是贯于“出奇兵”的。张春桥恐怕没有先斩后奏的狗胆，他更大的可能，是按主席的“战略布署”走了一步棋。确切地说：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批示，是主席走的一步棋。

工总司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批人已经回沪，自任司令。王洪文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我能请到他吗？他能不歧视我们临时工吗？他们成立是在白天，在文化广场，而我们……太寒酸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带着这艰巨的任务，骑着自行车去请这位工人领袖。

去请王洪文

刚回沪的王洪文把总部设在巨鹿路上的一幢小洋房里。这幢洋房是原上海有名的恶霸陈小毛的公馆。他的小老婆多，公馆也多，巨鹿路的公馆是其中之一。陈小毛是上海蜜蜂（BB）绒线厂英国老板的代理人，解放后该厂改名为国毛十七厂、与国棉十七厂相邻。在杨树浦，陈小毛的名气极响，是杨树浦一霸，在他的工厂里，受到玩弄和侮辱的工人姐妹为数不少，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收回了工厂，在公审恶霸陈小毛的大会上，受他欺凌的姐妹们争先上台，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诉了他的罪恶。在镇压枪毙陈小毛父子两人时，成千上万的人争相涌到公判行刑地，争睹恶霸陈小毛父子恶贯满盈的下场，上海人民拍手称快，曾轰动上海。“枪毙陈小毛”成了说唱演员烩炙人口的唱段，在电台播放了很长一段日子。

有人向我提供了这座昔日的公馆——今日工总司所在地的确切门牌号码，我按址走进了公馆。

红卫兵抄家时留在墙上的标语还历历在目，在上二楼的楼梯转角处一条要陈小毛后代划清界线的标语特别醒目（看来在文革前，陈小毛的后代还住在这里）。走上二楼，走道上和房间里比比皆是毛笔直接书写在墙上的标语："打倒吸血鬼"，"必须低头认罪，老实交待剥削罪行"等等，歪歪扭扭地涂在墙上，到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杂乱。说它是"司令部"吧，没有军营的森严和规整，说它是机关吧，它乱烘烘的，与这典雅的花园洋房是那样不相称，似乎这些戴着造反队袖章的人还在抄家。

我在这样的氛围中上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人阻拦我，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王洪文。在二楼我拉住一位青年，请他指点谁是王洪文。他匆匆对我看了一眼："头头全在下面，你到下面去找。"我下了楼，向各房间张望，谁是王洪文呢？我又拉住一人问。他头也不回："在楼上。"我再上楼，巧得很，在走道上又碰到起先询问的人，他说："在下面门口的一群人都是头头。"

哦！他又一次顺口地称为首的人物为"头头"，我觉得十分新鲜，"头头"这个称呼从这以后在上海流行了十年，甚至现在也有人拾起来用一下，泛指什么主任什么长。大概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称自己的为首人物为"头领"，于是千百年后工人造反大军便出现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称呼。

他们的头头在门口？是的，我在进门时，在人行道上是有七、八个人在讲着什么，王洪文就在其中？

我重又下楼，走到门口，那群人还在，我上前就问："哪位是王洪文？"

他们停止谈话，都朝我看。

我身边的一人问我："你是哪里的？找他有什么事？"

我一时语塞，我怎么回答呢？我不善交际，性子又急，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临时工造反，已经在乌鲁木齐路 459 号组织起人马，决定在今天晚上成立造反司令部，请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

那人顿了一顿，指着中间的一位中年人说："他也是头头，你找他谈吧。"说完就向门内走去。

这中年人身穿铁路制服，把我上下又打量了一番。我重又说了一遍我来的目的。

我的话没有使他们出现一丝热情，他们不可一世地看着我。那穿铁路服的对门内看了一眼，冷冷地说："王洪文不在。"

我说："我们是在晚上开成立大会，请你转告他，请他在晚上出席我们的大会。"

他傲慢地说："他今天一天都不在。"

我明白，工总司的地位已经稳固，根本不用把我们放在眼里，没有必要答应我们的要求。看着他们高傲和冷漠的态度，我真想马上离开，可是想到老杨奕这步请工总司参加的棋子，是想借工总司以壮我们的声威。我只得退一步央求他："那么就请你代表工总司参加大会，支持我们组织成立吧！"

他转身欲走，说："我很忙，没有空参加。"

我拦住他："我们都是工人组织，是一家人，一家人总要支持一家人的么！"他说："真的很忙，没有空参加。"他边说边走。我只得再退一步："那么请你安排其他同志参加行不行？"

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不耐烦地对旁边一年青人说："你去参加吧！"讲完这话，就把我丢下，自顾走进门去。那个年青人就是我日后才知道名姓的王腓利，他也欲走。我只得拦住他，请他参加。他急于要走，可又被我缠住，只得说："我们都很忙，我们到晚上再派人参加吧！"

这时门口的人都已走光了，他也走了进去，把我凉在门外，可是我还是相信他们会派人参加的，因为怎么拦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回去对老杨复命道：工总司会派人参加的。

但那天晚上工总司根本没有人来。

成立前的时刻

忙乱的白天很快过去。这是杂乱无章的一天，大家全在纷乱的事务中忙。老杨指派各人去干各人的事,我仅是一个热心的跑腿,尽全力干分配给我的工作。在这筹备策划的过程中，老杨心中怎么盘算的，他同殷、费是否有什么计划我不得而知，给我总的印象是不见得有什么核心成员在一起计议，全是老杨一人在思考，在出主意，然后在他合乎潮流的推动下，在大家的帮衬下，事件就一步步演进。

我们所处的地位,讲得俗气点是“小老婆”养的,所以我们的造反一踏进社会就受歧视，没有背景，一直到解散为止，始终没有背景。不象工总司的产生，先有红卫兵首都三司的串连和直接派人参与、策划，而首都三司又是直通中央文革的。在三司的支持下，上海的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召开了预备会议,而正式的成立大会是在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文化广场召开，其声势相当显赫，在曹狄秋拒绝到场的情况下，工总司北上控告，但是列车在安亭停止前进，从正线上被拉到岔道上搁置起来。这无疑激怒了造反派，因为造反的工人们实在是无退路了。如果回来，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但上海市委低估了造反派，被逼上了“梁山”的造反派们只能是“一反到底”了！他们干脆把铁路上的所有客货列车全部拦下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沪宁铁路全线瘫痪，这种不怕杀头不怕死，一不做、二不休的真正造反行动，到底还是把巨人们镇住了，或者说侥幸地赢了。应该说，这时全国工人阶级已经普遍行动起来了，不单单是上海，不仅是上海安亭的这几千人，面对全国的民主烽火，镇压不是好办法。本来把全国的学生、工人发动起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纵观全局，我们这群临时工造反，更是在轨道的外面的列车，这是在当局需要的“造反有理”的形势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是当局不希望的，因此，我们没有背景，自始至终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们只能在业余时间，半公开地活动，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承受“你们为私造反”的误解，要同时应付两方面的“战斗”——同上面的压力“战斗”和社会的歧视“战斗”。所以我们从造反伊始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横站。

离晚上开会的时间还有两小时，一切已经就绪，就等时间快快到来。

静静的等待真让人心焦，尽管我们派出了不少人去张贴海报，我自己也从市区的西南部——乌鲁木齐路，斜穿市区到东北角——沪东工人文化宫贴出了海报，以扩大影响，争取工业最为集中的杨浦区的力量，但心中仍默默地担心：晚上是否会有很多的人来参加呢？人的多少可是决定今天成败的关键啊！对于这一点，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我看看老杨，他也一反常态，显得坐立不安，一枝接一枝地抽烟。果然，他来回踱步之后，询问派出去贴海报的人，贴在什么地方？贴了几张？哪个哪个区的闹市地段是否去贴了？接着又问我会场的灯接通试过没有？还重新问起我去工总司的情况。他听我回答后又默默地抽了一枝烟，对我说：“这里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去负责会场的事吧！晚上用电非常重要，再带人去检查一下。工总司那边我再另派人去请请看。”

我买了些干点，草草吃了权作夜饭，早早地来到华山路的中学门口，我们的人已经到了一些，但都是像我一样做具体工作的跑腿，老杨和殷、费却一个也不见。我走进校门先检查操场中篮球架上我下午带人拉起的几十盏彩色电灯，虽然我告诉老杨万无一失，但我这时却担心被人搞坏，到天黑要用的时候不亮那才糟呢！我叫原先安装的人推闸试试，灯是亮的。我还是不放心，天快要黑了，干脆叫它开着算了！

我环视四周，这中学的操场不很大，在教学楼前，面对操场有只约两公尺见方的木头台子，显然是学生做早操时领操用的，今天就权充作我们的讲台了。在领操台上方我们拉起了一盏一百支光的灯。遗憾的很，没有扩音器。这实在没有办法，我们跑了不少地方，找了多少人都借不到一套扩音器材！今天只能这样了。

天色渐暗，快六点钟了。校门外已经聚集起不少人，也有人开始进入校门站在操场上。我厂的黎、李也来了，还拉了几位，连丁胜成这个胆小的人也拉来了。同厂工友的到来更让我高兴。丁说，已经来了一会了，在外面的马路上看了半天，才进来的。我吓唬他：“今天你来参加，当心把你打成反革命！”他听了只是讪讪地笑道：“附近的马路上有很多临兄在观望，又不是我一个人。”

这些胆小鬼！

我真为这些大男人害臊，因为操场上聚集的人群大多是妇女，而外面马路上却是男人的世界。两相比较不禁使我想起“巾帼英雄”这四个字。在这里妇女不仅是顶“半爿天”而是一爿天罗！

这些不让须眉的巾帼，使操场热闹起来，熙攘的人群很自然的分成了好多群，或交流信息，或打听消息，或围成一圈，专注地听别人在讲着什么，刚才还冷清的操场，一下子涌来了那么多的人，真出人意料，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但是另一颗心却又悬了起来：老杨和殷、费到这时还不见踪影，他们怎么啦？

现场只有我们这些天跑腿的和“摆测字摊”的“先生”们在忙里忙外，他们大多守在门口，成了当然的大会工作人员，把人群往里引，动员马路上的人群进校。他们不时向我传递外面的情况，催我赶快按时开会。越是这样，我越焦急。他们也很快注意到：老杨和殷、费都不出现。伙伴中年龄稍大、老于世故的大概开始意识到什么了，他们沉默起来，冷静地在观察着、注视着我。我万分焦急：这些头头到这时还不出现，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啊！

门口的工作人员（姑且这么称呼吧！）把一个人领到我的面前，指着我说：“你找他！他也是头头。”

理小平头的“京片子”

我也是头头？！在这吉凶未卜的操场上，我俨然成了头头！我环顾四周，还是不见老杨，也不见费、殷。

我问：“看见老杨他们没有？”

“没有看见。”他匆匆回到他的门口去了。

我只得权充头头了。我打量来人：此人很年青，大概小我二、三岁，微黑的肤色、小平头，干净利落，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透出一股锐气。他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国语，老气横秋地问我：“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一听心中不免警觉起来，此人一上来就打听我们的负责人，他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会不会是上面派来的密探？

“这里没有负责人，全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我反问：“你是哪里来的？”

他说他也是临时工。

我对他心存疑虑，而且极端反感。我的反感不是没有道理，他老气横秋，指手划脚，提出不少问题和指责，什么开会怎么能没有扩大机啦，灯光太暗啦，准备工作不足、现场混乱啦，等等等等指责了一遍，又问起大会的程序，又说如果是他的话，组织工作又该怎么怎么样，什么事又该怎么怎么做。

起初，我还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地敷衍他几句，然而随着他的指责越来越多，我的反感越来越大，同样他对我也很不满意，我干脆就不再答理他。他就自顾走到人群中去了。不料，很快在他周围人越聚越多，圈子在不断扩大，他的“京片子”的魅力真大啊！一些妇女紧紧地围着他，专注地听他讲话，不时爆发出应和声和赞叹，他妈的！这小子真能蛊惑人心。

这小子一口纯正的国语，还没有听他讲过上海话，他是上海人吗？不像。他是临时工么？

也不像，太年青了，从他的气质来看，一点不像工人。他是来破坏今天的大会？是市委派来的人？他究竟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呢？

正在我想去听听那“京片子”讲些什么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又把一人引来见我，这人戴着一副眼镜，年龄要比我大几岁，一见面就以含混不清的语调、急吼吼地说要见头头，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很急，我要见你们的头头，你们的头头呢……”他那急燥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事。我说：“你讲好了。”领他进来的人指着我说：“他就是头头。”他这才说出一句话来：“我要参加今天的大会。”我一听，笑了：“那你就参加吧！”此人还是在我身边绕，绕了半天就是这一句话。他又问：在什么地方参加，什么时间开始。我说就在这操场上，马上开始。他又急急地说要参加我们的组织。

这人怎么拉，真会绕！大概有神经病吧！我不想浪费时间，努力想甩了他，可他就是粘着我喋喋不休，我走哪，他跟到哪。我心中急的是老杨他们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出来？身边这讨厌的家伙腻歪透了。我干脆对他说：“你来了，就是参加了，你还要缠着我干什么呀？”

他一边自顾自地嘟哝，一边掏出一张纸给我看。我拿过来一看，是一张铅印的介绍信，白纸黑字：兹由钱贵芳同志前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厂文化革命委员会。

真稀奇！我们这些人都是瞒着本单位的领导，偷偷前来参加活动的，现在外面马路上的大批人还不敢进来，而眼前这人却持有官方铅印的介绍信！他来是得到官方同意的，或者说是官方派来的！对这人不由我不起疑心！

这人还是绕劲十足。从他喋喋不休，神经质的话语中，我终于弄清了他的真正意图：此人要参加进我们的“领导班子”。对于这神经质的人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不客气地把他推开。

但是，这人凭着他的绕劲，到后来还是钻进了我们的“常委班子”当上了后勤部长，这是后话。

一波三折的成立大会

经过和这两人的两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天早已暗了下来，一串彩色灯泡发出的暗淡的灯光已经发挥作用。我朝全场扫视了一眼，人来得可真不少，操场上黑压压一大片，已经把大半个操场占满了。人群的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坦然地、毫无畏惧地在等待着；男性“革命群众”三三两两地在操场的四周，更多的还是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他们在“轧苗头”，观察是

否有危险，随时准备远离。这些善观风头的狡黠的男人，胆小如鼠的男人！

不知从什么地方括起了一股风，说今天晚上这里已经有公安局的人，要抓反革命了！

风一吹，草就动，散落在四周的男人开始向校门口流动。这些兔崽子，竟然这样胆小。我走到门口去，要工作人员不要放人出去，但这么一来更糟，引起一阵更大的骚动。我厂里的丁胜成吓得脸都变色了，他溜到我的面前神色慌张地说："马上要抓人了，快走!"面对这情况我只得无奈地下令让这些大男人向外走。

幸好操场上的女将们（我要由衷地尊称她们为女将）并没有波动，仍在喳喳地交谈着，是她们不明白危险的存在，还是她们对追求自身的解放，争取真正男女平等的经济地位的动力在支持她们？我不清楚。面对女将们毫无畏惧的精神，我真高兴啊！由于妇女们的稳定，慢慢地，人流又开始向操场上汇拢。

时间已经不早，我们的头头们呢？

不能再拖了，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我不知所措，只见那个理小平头、双眼炯炯有神的青年跳上台来，他用动听的普通话先背诵了一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醇厚的男中音，迷倒了在场的妇女，在他三言两语的鼓动下，全场跟着他唱起了这首语录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整齐响亮，居然在场上涌起了一股热浪，把涣散的人心完全捏起来了，把观望、游移的人全部吸引住了。语录歌一首接一首的唱，在每首语录歌的间歇，他还领头高呼口号，气氛已经相当的浓烈。这个头开得真好，意想不到的好！可是我们的头头们呢？

我终于在人群的后面找见了老杨，他手拿一只手提包，与费、殷在紧张地谈话。

老杨一见我，神色紧张地指了指那台上的"小平头"问："他是谁？哪里来的？怎么大会被他操纵了？"我对他们迟迟不出现的不悦全忘了，把这一段时间出现的群众不稳定情绪和连续出现两个来历不明的人全向他汇报了，他越听神情越凝重。

他沉思片刻，把手一挥，对费说："开始吧!"转而又说："客气点，把那人请来。"

费敏璋走上木台，把那青年请了下来。又在没有扩音器的情况下，宣布大会开始，全场高唱《东方红》，又读了两段语录，再慷慨激昂地念准备好的发言稿。非常明显，他的上海普通话，要比那"京片子"逊色多了，但下面的群众毕竟感受到大会的气氛，效果还不错。

操场的一角，人群的后面，老杨正在盘问那个青年——"小平头"。小平头显得非常老

实，向老杨介绍自己，他姓王，今年 22 岁，原在煤炭文工团当过演员（怪不得普通话好，又会表演），在本市一厂中当临时工，家住闸北区。

台上的发言在按计划进行。突然间，灯灭了！全场一片黑暗。人群顿时一阵骚动，而楼上的几只教室内的灯却亮着，从教室的窗口伸出两只扩音大喇叭（白天我根本没有发现扩音喇叭）哇啦哇啦响起来："我们是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领袖又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今天的会是一个黑会，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会。要谨防一小撮政治扒手，这是为私造反……。我们严正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

操场上的人群更加不安地骚动。只见从楼上的各个窗口不少红卫兵们伸出头来，不知从那个窗口飘撒下雪片样的传单。我拾起一看，是油印的传单，内容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很明显这是当局预先布置的，否则这些传单不可能这么快刻印出来，而且传单的文章也绝不可能是这些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娃娃所能组织出来的。

这一来，局面大乱，有人开始向大门外跑去，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在这危急关头，只见那个小王——理小平头的京片子跳上木台对楼上高喊："你们这些兔崽子，你们下来辩论，你们敢不敢辩论！"在窗口的这些红卫兵们，只是静静地、好奇地看着我们，并不答话。很可能这些红卫兵什么都不知道。但上面的扩音器还在无休无止地高喊阶级斗争，阶级敌人。

那个好样的小王，马上领头高呼口号，把上面的声音压了下去。双方对峙着。

操场上我们的队伍已经散去大半，尤其是男人们全溜了，我奔到马路上一看，路上也不见他们的人影。我又回到里面，操场漆黑一片。会是没法开下去了，只听见小王漂亮高亢的声音。他在整队，在号召人们到外面去游行。人群秩序井然地退出学校，很快在外面的马路上把队伍整好。

到市委去造反

老杨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把一包东西交给我，神态既紧张又严肃地说："这些都是接待时的登记名册，你要像爱护生命一样保管好，绝不能被当权派得去，否则后果太危险了。"

我顿时兴奋起来，这册登记簿上，登记的人数已逾千名，姓名、单位、地址大多非常详细，如果造反失败，打反革命，只要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这些人全逃不掉。这太重要了！

我双手接过登记册，心中升起一种悲壮、神圣的使命感，就像小说、电影中革命先驱者们做地下工作面临重大、紧急关头时的感觉一样，我认为老杨对我的信任超过了对任何人的信任。我这年轻单纯的马前卒非常自豪，我决心以更大的热忱投入到这场生死未卜的造反中去。

我怀抱名册，冲到队伍的前面，和小王、殷庆宝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领着队伍行走在华山路上。

空空荡荡的马路上，行走着我们这三、五百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的队伍，在队伍后面拖着一、二百公尺的尾巴，那是稀稀拉拉的自行车队和步行者，清一色是男性，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

队伍在小王的带领下，唱着歌，呼着口号，还真有点像游行的样子。时间已经很晚了，马路上行人稀少，什么影响也没有，但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如果就这样散去，几天来的努力全白费了，接下去怎么办？我人在走路，头脑中飞快地想着，怎么办？怎么办？

又是小王，他这时说：到市委造反去。说着把队伍拉向市委。延安西路二百号就在眼前，（这里就是我二年前来过的市委信访接待室。）很快我们就停在市委的门前。信访接待室的门紧闭着，整幢大楼黑黝黝的，几乎不见灯光。我们的队伍就在大楼前的马路上停下。周围是那样静寂，大楼内似乎没有生物存在，我想这不跟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游行一样吗？这里不可能有人，我们今晚怎么办呢？怎样结局呢？

小王开始领头高呼口号，在静静的马路上，整齐的口号声划破夜空。整个城市已经沉睡，刚才还紧张的形势，已经烟消云散，面对这黑黝黝的大楼，我们好像在旷野里对着星空大喊大叫，谁也不会来干涉和理睬。

意外的是，市委的门竟然无声无息地开了。从那扇小门中出来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人，他什么也不问，自我介绍说他是市委接待人员，示意我们随他到市委接待站去。队伍发出一声欢呼，想不到这么快就得到接待。我们把队伍调头随着他拉向乌鲁木齐路 459 号，这位接待人员把我们领到原先郊县农民的会场，也就是我们“摆测字”摊的那个会场。

原先在里面的农民工已经剩下不多，我们的队伍一哄而进，把整个会场坐得满满当当，这些农民只得退出去。他们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出卖了他们，又指名道姓大骂费敏璋，因为费曾是他们的主席团成员。他们造反至今内部发生了分裂，坚持斗争的已经是少数，这些少数派在我们面前大骂一通后，向我们流着泪告别，痛惜他们的分裂，痛惜长达一星期多的白天黑夜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睁着熬红的双眼，疲惫不堪地整理东西，临别时，竟友好地告诫我们要团结一致，不要上市委的当，不要闹分裂，随后悲切地离开了。想不到这些农民“四

六工”的头头竟然能有这么冷静的头脑。

现在看来，那位市委接待人员领我们到乌鲁木齐中路 459 号，的确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安顿了我们，一方面又挤走了农民。可以想见当这位瘦小的接待人员，在空落落的房子里听到马路上的口号而打电话请示的时候，电话的另一头必定是经验老到的人。当然，预先总是不想安顿的，于是在学校的楼房里会突然出现预先埋伏的“红卫兵”，撒下预先印好的传单。大约他们估计这么一吓唬，我们这些“乌合之众”就作鸟兽散了。但既然我们没有被轰散，又游走到市委门口，那么只好把我们安顿到静安文化馆，又正好用来赶走“四六工”。

异常兴奋的我们，高兴地坐下来。对我们来说，总算有了一块根据地，向前跨了半步，无异是得到了市委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至少承认我们是谈判对手。从心理上来说，从灯光暗淡的操场露天开会，受红卫兵的扩音器、传单的骚扰，从空旷的大街上对着黑灯瞎火的市委呼口号，到现在安坐在文化馆相对正规的剧场里，毕竟给人一种安全感。曾经动摇的和观望的群众也跟着踏进会场，尽管这些人不够坚定，但只要会场内人坐满，就能对市委形成人多势众的压力。

先有组织后有头头

从整个会场来看，坐在前半部分的，是坚定的基本群众，后半部分就是一些动动摇摇的人，他们进进出出的频率很高。虽然剧场里群众的总数保持在一定数量，实际上是在不断更替的，不断有人参加进来，也不断有人离开会场去上班，也有回家吃饭的，过了半天一天又来了。而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也就是被群众认为我们是头头的人，就非常艰苦了，家住得近的，像殷庆宝就住在长乐路，几分钟能到家，可以溜回去吃上热饭热菜，家住远的就回不去。我的家太远了，没有人比我更远的，在这八、九天中，我没有回过家，也没有合过眼，每天靠吃大饼油条阳春面充饥。更要命的是在这造反的日子里我脚穿雨鞋，天晴了我也无法回家更换。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已经宣布成立司令部，也就是宣布成立了组织，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坐下来认真地讨论如何行动，如何开展工作，更没有把领导班子确定下来，也没有具体的分工，一切还像“摆测字摊”时那样，由老杨指挥。

到了这时，领导这支造反队伍的老杨仍不公开出面，他一直在台上的幕后（真正意义上的舞台的天幕后面）指挥。如果说有领导班子或者有司令部的话，剧场的舞台就是我们的司令部，幕布后面是真正的指挥机关。这真是非常奇怪，非常独特的一次造反，是先有组织后有领导班子的一次造反，大概在全国所有的造反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吧！不过，推想大革命时代各种组织、党派兴起，当初也必然是乱哄哄的，只是后来得了势，由御用文人写一写，

才变得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起来。

那个领我们进入市委接待站会场的瘦小的市委工作人员，理着一个和尚头（头发留得极短），一付忠厚老实相，极像一个浦东大老倌，他沉默寡言，出言谨慎，反复强调他是一般工作人员，一般干部，他可以把我们的要求向上传达和反映，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权力。

局面就这样僵持下去，我们的造反就在口号和唱语录歌中没日没夜地进行下去，他也就这样时隐时现地日夜陪伴着我们，直到我们被承认后，组织正式成立，在最初的日子里，他被正式明确是市委与我们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员，经费就由他传给我们，我们的要求也通过他上达。

这几天，在台上幕前的小王出足了风头，他的一口流利纯正的国语是那样的动听，善于宣传鼓动的口才，即兴的演说博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他是演员出身，懂得同台下的交流，在发言中经常向台下发问，比如："我们的革命行动对不对啊？"下面会响起震雷般的回答："对！""我们要不要造临时工制度的反？"又是雷鸣般的回答："要！"他在台上"表演"半天，群众的情绪始终热烈饱满，他的"剧场效果"就是这么好。换了费敏璋上台，"剧场效果"就差多了，他在上面发言鼓动总是离不开发言稿，下面反应并不热烈，领呼口号稀稀拉拉，造不起声势。

如果说我们这一千多人有一套领导班子的话，或者说原先在工作的一套人马就算是领导班子的话，这个小王还不是班子的成员，他是直到开大会的时候才挤进来的，我们对他的身份还不放心，对他存有戒备。但经过一天一夜，他已经在群众中树立了他的领袖形象，他明白，形势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他，他就开始独断独行，不再把老杨的指挥放在眼里。

这一来老杨开始有所顾忌了，老杨召集费、殷等几人商议，也把我召集在内，我们在幕布后，听取老杨的指示。中心议题是要把领导权抓过来，要费再度主持会场，立即把王撤下来。

小王被喊到后台，费敏璋上台主持。小王很快意识到我们这伙"核心人物"对他的冷淡、敌意和不信任，他灰溜溜地坐在角落边，一声不吭。在大家不注意的当儿，他消失了。

这时全场的情绪在费的笨拙表演下，立时冷却下去，出现危机。我向台下看去，群众已不足半数，反应冷淡，大有夭折的危险。老杨急了，他权衡再三后，决定重新启用小王。他马上派人满场找小王，但派出的人接二连三报告，王已不见。老杨在幕后急得团团转。

很快，费敏璋被群众轰下台，台上已无人"运动"群众，再这样下去，台下的群众马上

有全部散去的可能。在这危急的关头，老杨再度派人去找小王，并要我上台“救场”。

“蜀中无大将”我只得“充先锋”了，我走到前台，先指挥大家唱了几支语录歌，把大家的情绪略微调动起来，我就即兴发言，批了一通临时工制度，我极力模仿王的声气，企求得到台下的热烈反应，但应者寥寥。我硬着头皮顶下去，不时向台的两侧张望，希望有人能来替换我，但是没有，没有人肯到台前来。可悲的我成了过河的卒子，已经无法后退了。我只得为换个法子，讲起我们在外滩贴大字报的经过；讲在纺织局遭受的歧视；讲同姚红的接头，大字报的论战；讲同苏州人一起造反。这些即兴的演说竟然引来阵阵掌声，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段时间里，总算把小王找来了。

杨同小王在幕后进行了只有他们两人的谈话，从老杨严肃的表情和小王的沉默不语，我想老杨无非是在对他施加压力，既要用他，又不许他显赫，大概是这样吧！

小王上台了，他显得有些拘懂，掩去了原来飞扬的神采，至少他还没有从刚才同老杨的谈话中回过神来。他在台上表现得很听话，不时回头向老杨张望，在点头默许下行动，或者退回后台，直接同杨商量后再行动。

王重新在台上出现，受到了台下群众欢呼，全场涌起了一股热潮，走散的群众重又回来，台下的人群又越聚越多，空座位已经没有了，连走道上也立满了人，情绪热烈，恢复了原有的景观。

望着台下，老杨久久不语，他心中明白，没有小王，这台戏还真唱不下去。大家也知道，小王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当杨又把我们召集拢来，不用多说，大家一致同意老杨的决定，布置几个人日夜监视小王，不能让他走脱。

这场组织内部第一场为争夺领导权的明争暗斗的危机，就这样度过，双方达成妥协。

在市少年宫

两三天过去了，市委一直没有派出负责干部来，仅仅是那瘦小的一般接待干部在与我们周旋，市委这样安排明显是要达到不承认的目的，同时又不让你们上街扩大影响，把你们拖垮在接待站内，不能再有第二个“工总司”出现，何况在这时“工总司”仅仅是得到张春桥的承认，市委还坚持不承认，当然，我们这个组织就更不能承认。

谁都看得出，这样局促在文化馆内是闹不出名堂的。

为了打破僵局，我们决定上街游行，这次是在白天，仍由王、殷和我领头。一开始，我们没有在闹市区游行扩大影响的打算，仅是把队伍带向市委。

这次游行声势要大得多，而且心也齐，经过这三天的斗争，信心也比上次足。这支队伍大多数仍是妇女，她们是这几天最为坚定的基本群众。我们围着市委游行一圈，最后在延安西路的门口停下。我们在马路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语录歌，高呼口号。不过，大多数时间是静静等待。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市委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向附近的市少年宫。我们从延安路的大门进去，游行队伍在大草坪上等待了一会，然后被安排进少年宫的大剧场，这里的剧场要比静安文化馆的大，座位也多，环境和条件都要比原先的好，从接待的规格来看似乎是升了一级。

市委派了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于永实来与我们周旋，不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了。如果说派安排劳动力的劳动局的头儿来，这是市委的阴谋的话，就是把我们临时工的造反仅仅局限在“临时工不要做临时工”的范围内，同外界工总司割裂开来，这样对市委有利。这同日后在上海刮起的“经济主义妖风”一脉相承，这股风的刮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暂且放下，以后来谈。但是，这时谁也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好，似乎市劳动局副局长的到来，是“专业对口”归口闹革命了。

劳动局是管就业安排的，我们临时工的安排就是劳动局。由劳动局负责人来和我们对话，等于说临时工造反就是造劳动局的反而不是造市委的反。这样看来，我们不是升一级，反而是降级造反了!我们要求得到市委承认，像工总司那样，然而一个副局长能有这样的权力吗？市委不点头，杀了他的头也不敢答应。

于永实副局长，是个残废军人，他是柱着拐杖来的，我们就安排他坐在台的中央，还放上一只讲台。小王则站在台上，按照一套造反程式，宣布声讨大会开始，唱东方红，唱造反歌，呼口号，声讨发言。这时所不同的是有了于永实这个面对面的当权派，群众的情绪就高涨得多了，我们的小王也更能施展他的演员才能。但是不管表演如何出色，对局长大人简直一点效果也没有。因为这位当权派完全不为王的攻势所动，他只顾稳稳地坐在台中央，慢慢地与我们“打太极拳”，不紧不慢地说上几句话应付应付，大多时间沉默不语，好一个“以柔克刚”。

我在少年宫的这几天时间里，杨对我布置的任务是一定要保管好登记名册，别的事什么

也不用管。我就隐没在群众之中，再也不用到后台和台上露面。不过现在想来也非常可笑：何不把它藏起来呢？藏到家中不就得了吗？我每时每刻要把它抱在怀中，太不方便，又怕遗失，就化几角钱去买了一只聚氯乙烯塑料拎袋（六十年代这种包在上海非常流行），把厚厚一迭的名单全部塞进包中，抱在怀里，日夜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

我太疲倦了，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望着台上的小王，劳动局的于永实，我两眼发涩，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连声音也听不见了，一会清醒一会迷糊，我不知道究竟是过了多久，只是迷迷糊糊地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天下过雨，也有晴天，天也冷过。黎伯昂每天去上班，下了班来陪我。一天，他穿了件中式棉袄告诉我外面已经很冷了。这些日子，下雨、天冷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和小李也顺便带点糕点大饼油条给我充饥。

突然，小王在台上宣布出去游行。人都走光了。我被通知不要参加游行。我乘机上街饱餐了一顿，又大喝开水。回来后发现大家都在大草坪上待命。初冬的太阳和煦地照在这美丽的花园别墅里，使大家感到高兴，群众散坐在草地上，也有三五成群围成一圈，这些女将们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这两天造反的事。我不见老杨和小王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要聚集在草坪上，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我望着少年宫富丽的楼宇，高大的树木和美丽的花园，童年的失落感慢慢爬上心坎，这么美好的地方我却一次也没有来过，这地处静安寺地段的市少年宫离我家路途太遥远了。同样是童年，相差太悬殊了。我的童年已一去不复返，我为自己的童年婉惜和不平。想不到在此时此境才来到这本是童年才该来的地方。

回想昨天，看看今天，又想到明天，我的明天会怎样呢？我的心一下子沉下来，高兴的劲头消失了。

人们在草坪上待了许久，心情有些烦燥起来，都在问为什么不进会场坐？有人说不让我们进会场了，这是怎么啦？

少年宫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我抱怨起来，他说：“剧场的座位是为少年儿童设计的，现在经你们这些大人坐过，已经损坏不少。等你们走后要化费上万元的修理费，唉！……”他不断地唉声叹气，唠叨着，无可奈何地摇头，可惜他的座位，摇着头慢慢地离开了。原来如此！少年宫方面乘我们外出游行，就把剧场门锁了起来，我们又“流离失所”了。

太阳太高了，大约快四点钟吧！会场门又开了，草坪上的人们被唤回会场，开始新一轮“斗争”。那位于局长大概也吃了饭，可能得到市委新的指示，他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他稳坐在台上，不承认我们这个组织，坚持要我们回本单位搞运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反映临时工、外包工制度的不合理。他讲他的，我们唱我们的，一直对峙到半夜。我们列兴举了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可是这位局长大人就是“雷打不动“，死活就是这么几句话，他强硬的态度终于触怒了小王，他一把推开桌子，拉起这位当权派，不给他坐的权利。于永

实艰难地支着拐杖，被拉到台前。这一举动赢得一阵喝采，人们高呼口号，批斗这顽固的当权派。他支着拐杖一声不吭，用沉默来抵抗批斗。半天不见效，只得重又让他坐下，这一夜又白搭了。

绝　食

这时小王又施出新的招数，宣布全体绝食，向当权派施加压力。他一宣布，马上得到台下响亮的应和，有人高喊："我们坚决响应，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坚持绝食斗争！"

我想，能有多少人真正绝食呢？这无非是在吓唬人，大部分人在出出进进，台下的群众始终处在自然轮换之中。

我们的"绝食"行动居然被像模像样地用大幅标语刷到南京西路上的少年宫门口。那时在南京西路上路过的外地红卫兵还真不少，见到"最最紧急呼吁！十万火急！"无不驻足停留，看到"强烈抗议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临时工外包工的迫害，绝食斗争已坚持二天二夜，呼吁革命小将的声援"后，有的红卫兵义愤填膺，主动闯了进来，有的红卫兵看过后，犹豫片刻想走开，被布置在门口的人半推半拉地请了进来，在前排特为他们留下的座位上坐下。小王充分显示了他的演员天才，把临时工制度的罪恶和对走资派的控诉，有声有色地表演了一番，煽起了红卫兵们的强烈愤怒，他们上台即兴发言，表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赫鲁晓夫进行了鞭挞，又讲一通支持我们革命行动的空头话，一下子把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起先大批红卫兵的进来，红卫兵的上台发言，倒着实吓了于永实一跳，他的态度软化了不少。可时间一长，这位老革命轧出了苗头：这些红卫兵是外地来沪串连的"散兵游勇"，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这样的支持是空头支票，对他没有任何威胁。于是他干脆在台上闭目养神，不管你口号如何高呼，也不管你造反歌如何高唱，也不管王指着他的鼻子怒骂，于（永实）自"巍然不动"，这所谓绝食的招数也就失败。真正绝了食的倒还是这位局长大人。尽管他的工作人员不时上台在耳旁劝他吃东西，他坚持不走不吃，这场"绝食"的闹剧就有了这么一个颠倒的结局。

黎伯昂来看我，进门时拿到一张传单，我们俩人看后一笑了之。这是一张拙劣的传单，笑话百出的传单，我不知道是谁起草的，我敢肯定没有给老杨看过，如果他看了，就不可能闹出这么一张低劣的传单。如果从日后殷庆宝当宣传部长来看，这份传单是他搞出来的话，那么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宣传部长。

请看传单奇文：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快　　报

我们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会合革命造反誓师大会，对于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 30 多小时的斗争激烈，终于在 1966 年 11 月 18 日晚上（24：00）市少年宫召开的誓时大会上，已得到了上海市委特派员（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的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他说："我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并且得到了到会的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为此，我们特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市委以及全国的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报喜！

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临地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

（设在市少年宫）
1996．11．19

这是于永实在实在打熬不住时，要了一个滑头说："我承认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组织。"全场高兴，台上的小王更是高兴。这样于永实获得了半夜的休息，过后，于永实又推翻不认帐："我不代表市委，我只代表我自己。"人们空欢喜一场，而台后的宣传人员却刻印了这么一张不伦不类的传单报喜。

这场闹剧，实在闹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耐心地等待着台上的变化，但是迟迟没有出现，又是一夜没有合眼，我昏昏沉沉，人像在腾云驾雾，台上的局长若有隐若现，似乎是那样的遥远，四周似乎静得出奇，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若隐若现的人影在眼前晃动，听不到一切声音。

正在我迷迷糊糊时，众人的起立声把我惊醒，我随着大家向外走去，一直走到外面马路上。从幽暗的剧场一下子走在明亮的阳光下，走向车水马龙的淮海路列队游行。这样反差强

烈的对照，像在梦中。时间、空间都作了跳跃式。

第十一章　承认

“兵临”华东局

淮海路是上海的第二条大商业街，同往常一样，人行道上满是人，商店内人来人往，马路上车流如织，一派繁忙。在中午的阳光下，我们这些造反者高呼着口号唱着歌在淮海路上游行。我想这是为了扩大影响吧！我很想了解下一步的行动，在队伍中我找到费敏璋，他一见到我，拉着我就向队伍的前面跑，我又同殷庆宝、小王会合在一起了，他们告诉我现在是去华东局造反。

华东局在哪里原先我不知道，想不到就在附近。进入大门后，大片的树木草坪展现在眼前。越过草坪，在中央有连片的卷心菜地，大概是身在闹市，不忘革命传统的警卫部队种的吧！想不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仅是一墙之隔竟有如此幽静和宽敞的绿地。远处是错落有致的几幢洋房，在门口的左近，有一幢小巧精致的收发室，光滑明亮的打蜡地板，洁净的写字台、沙发，里面是卫生间，洁白、明亮光滑的抽水马桶，呈现在眼前，这样的卫生间要用“赏心悦目”这四字来赞美一番。要知道我们工人和普遍市民，住在老式里弄和棚户区里，每天在狭小的空间生活，吃、睡、拉全在一间房中完成，成了世上少有的“多功能”的房间，方便用的器具是木桶型的“马桶”，就放在你的床头，使用时臭气在房中弥漫。这就是中国人使用的便具。在文革的后期，我在朋友家中，碰到一位青年，他的父亲是上海市委的干部，在文革中靠了边——失去了权力，于是他也像工人家庭的子女一样，被分配到房修队中工作（这还算好的，没有上山下乡去修地球），我朋友家房屋大修，这位青年就在这儿工作，他在休息闲谈时，闹了这么一段苦涩的笑话：

他问我们，在修房中看到居民家中，每家必有一只木桶，他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并说他憋了很长时间，终于憋不住要开口问问。我朋友听了惊诧不已，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小伙，不痴不呆，竟然连马桶也没见过，只得含笑告诉他这是大小便用的便具。

这大小伙子惊愕了，上海市民住房的拥挤和窘迫，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叹地说，他自打记事起，就知道，人是住在花园洋房中的，方便是到清洁明亮的卫生间去的。他单纯地以为别人与他一样，理所当然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不无感叹说，如果没有

文化大革命，他父亲没有丧失权力，那么他绝对不会当一名房修工人，不会深入到寻常百姓家去，也不会明白，人间还有这样一种生活环境，而且大部分的工人都生活在其中。

我现在赞美惊叹不已的这个收发室，在半个月后完全变了样子。

由于华东局下辖六省一市，外省的造反派成批涌向上海，那幢小洋楼已经面目全非，紊乱、肮脏，到处是痰迹和丢弃的纸张，打蜡地板已经失去光亮，满是污泥，由于成千人的践踏，地板已经挠起和松动。更为糟糕的是卫生间，抽水马桶内外全是粪便，整个厕所流淌着粪尿，恶臭冲天，但人群还是不断地进去撒尿拉尿，没法下脚，就在地上填起几块红砖，立在砖上方便，砖旁是一堆堆隆起的粪便。堂堂的华东局的大门，竟然变成这样，真是天下大乱的景像。那时我对红卫兵刷出的大标语："天下大乱，越乱越好。"感到茫然，不好理解，难道这样就能越乱越好吗？

我们的队伍就在华东局的大门内集结，在王的带领下等待着。几百人的队伍，竟然全是妇女，想必在外面的马路上还有几百名男性"散兵游勇"在观望。

这时的小王完全以司令自居，已经完全摆脱了老杨的控制。若隐若现的老杨已经奈何不得他了，小王的四周始终有众多的人簇拥着他，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完全树立。

正在小王面对群众，背对远处菜地和洋楼演说的时候，突然从菜地的另一面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摩托声（摩托车在当时还很希罕），这声响这么大，看来是有意拆除了消音器，一个青年驾驶摩托车在原地兜圈子有意捣乱，刺耳的噪声掩盖了王的演说。小王转身手指摩托车手，愤怒地高声怒骂："兔崽子！要什么威风，你们长不了，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一付造反派的造反气势。但他的声音未必传到那青年的耳朵里，那青年我行我素，仍在原地一圈又一圈的要威风。王身感自己的声音不足以压住对方，就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有带人冲进去的架势。

这一触即发的情景，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制止，我看到他们用电话打进去，洋楼里有人出来制止那青年的举动，我们这边的群众才安静下来。

这远距离的交锋，促使了事件的尽快解决。很快有人告知我们，要我们到衡山宾馆附近的衡山路风雨操场去，华东局的首长在那里接见我们。

可敬的女造反队员

我们的队伍离开了华东局，向风雨操场前进，队伍中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接见的规格又上升了一层。不！上升了两层！

我们的队伍在风雨操场的外围马路上集结，等待进场。在这半天的时间里，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面对面与群众接触。队伍士气高涨，充满必胜的信心，大概在这五天的斗争中磨炼了众人的斗志，一种胜利必将到来的预感鼓舞着人们。我惊奇地发现人数陡然增加了不少，把附近的马路都挤满了，在华东局内时仅仅是数百人，现在要看清队伍的首尾已经不可能。这洋溢着欢乐气氛的队伍，似乎只有乐观，没有惧怕。

妇女仍是这支庞大造反军的主体，她们纪律良好，队列整齐，在原地耐心等待着命令。经过几天几夜的锻炼，她们已经认可我们这些头头的领导，尤其是对小王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当我们出现在她们的面前时，她们纯真的脸上漾起由衷的微笑，欢呼着，切切私议着，有的向我们提一些问题，有的向我们表示关切，对我们这些人几天几夜不睡表示钦佩和赞扬（我在这晴好的天气里却穿着套鞋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招牌了），她们知道我一直没有回家，被感动了，用各种语言来感谢和赞美。

她们对我有更多一层的关切——指着我的塑料袋内的名册，要我保管好，绝对不能落入当权派之手，否则就会有多少人坐牢啊！我非常郑重地说，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好这些名册。这样的回答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我望着她们纯真的笑脸和无拘无束的举止，完全忘却了性别的差异，溶化在兄弟姐妹的友爱中。

这些妇女多么伟大啊！她们大多有家庭，有父母、丈夫、孩子，在这些天里，从一开始就毫不看风使舵，而是毫无畏惧地跟着我们走，表现出使男人们为之汗颜的果敢、大胆与坚韧。难道是她们的头脑简单，容易被我们蛊惑吗？不！如果这样想，是把我们自己抬高了。

中国妇女是最了不起的。在漫漫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她们身上戴着比男人多得多的枷锁。男人可以科举取仕，女人却“无才便是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守着贞洁，否则就是潘金莲的下场；纣王暴虐失天下，却被演绎成妲姬的唆使引诱；唐明皇荒淫废朝政，替罪羊却是杨贵妃；番邦强大，威胁中原，帝王即送美女远嫁以和亲；城池被围，粮草断绝，守将竟杀爱妾供军士吃肉。更可悲的是，吃了守将爱妾肉的男人们非但不自愧，反而引起城中一连串杀妻吃肉充饥的惨剧。更令人震惊的是直到解放后的一些历史书籍中还将这个将军的杀妻行为描绘成抵御外侮的壮举。

中国妇女身上的枷锁实在是太重了！但也许是数千年特别的重压铸就了中国妇女特别的坚韧，而且这种品格简直变成基因代代相传。因此，九十年代“马家军”破世界纪录如探囊取物一般，以及我们这个三流足球国家的女子足球却摘取了世界杯亚军，是毫不奇怪的，六

十年代临时工造反时，妇女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坚定，也是自然的。

作为临时工的妇女们，她们同时又是母亲、主妇，她们拿着与丈夫同样微薄但对家庭是举足轻重的工资，艰辛地操持着柴米油盐，她们才是家庭真正的顶梁柱。失业对她们威胁最大，因此，她们对生存条件最敏感，所以，一旦投入革命，也最坚定。

妇女对政治信息的敏感和分析能力、组织能力也许不如男人，造反初始在外滩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临时工，清一色是男子；去帮苏州人造反的，清一色也是男子。男人既敏感，也就胆小善观望，在学校操场上开成立大会，马路上蹓蹓跶跶，有点骚动就滑脚的，又都是男子。但是，当“形势大好”，出来争权夺利的，也是男子汉。我们临时工造反可以说是女人撑起的天下，但是当总部“排座次”时，却仅有一名女子入围。这大概是普遍现象，整个上海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女性都罕见。

老杨神秘地隐去

在我们等待进入风雨操场的这半天时间，一种胜利的预感在每个人的心头荡漾，从四面八方来了更多的人，使我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对民主的渴望不可阻挡，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和恐惧在不断消除，人们一直被压抑的个性得到了解放。

在初冬的阳光下，我的脚上还套着雨鞋，手中牢牢地拎着那袋老杨交付给我的造反队员名册，显得有些滑稽，我从队伍的一头走到那头，所到之处是人们的欢呼和热情的问候，不知是出于拥戴还是关心塑料袋的安全，在我的身前身后已经有十来个男人跟着我，他们明确地对我说，要保护我的安全和塑料袋中的名册。他们前呼后拥，从这时开始一直紧紧不离我的左右。

这些名册，最后并未发挥丝毫作用，这是我的失策，在后来的工作中，日夜繁忙，无暇顾及，一直搁置在一旁，甚至没有再去翻看一下，最后在一九六七年年底，在王继鑫（小王）被捕后，我自忖早晚亦要被捕，并有抄家的可能，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被我付之一炬。

从这一天开始，我真正以一个头头的身份开始造反，组织活动，我的思想获得解放，我不再妄自菲薄，不再认为我非要听人家的。

这时，我忽然注意到老杨已经神秘地隐去了！从这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什么

时候隐去的，谁也不知道。大约是队伍向风雨操场前进的时候吧？他为什么隐去，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深谋远虑的他已经看出我们这个组织不祥的迹象，嗅出了潜伏在四周的凶险，而他又无法驾驭局势；更可能的原因，是他看到群众已经起来，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其他几个“头头”已经能够独立处理事件，他感到帮助临时工造反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而自己如果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他的非工人的身份将危及这个组织的生存，故而悄然隐去。喔！这足智多谋的老杨，这急流勇退的老杨，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老杨，这睿智练达、有着美满家庭、不像临时工出身却又在为临时工利益而呕心沥血的老杨，你还好吗？你和你那美丽的妻子、俊俏娇憨的女儿现在在哪里？你们能看到这本书吗？

从风雨操场开始，领导权已经完全在王、费、殷的手中，凡出头露面的必须有王的参与。没有了杨的幕后指挥，一切突发的事务必定要我们这几个人当机立断。这时我的地位也迅速提高，在我的身前身后自动汇集的保卫人员，凡事前来听命于我，这因素也促使我在惊喜和得意之余，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决定和主张，客观上造就了我的头头地位。

我们被通知进入风雨操场，同时被告知是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代表华东局前来接见全体人员。这是我们造反以来，最高级别的接待。前几天的造反，实际上市委没有人来，劳动局的副局长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却一下子跳到与华东局负有一定责任的高级干部对话，对我们不啻是注入了兴奋剂。

风雨操场

风雨操场是室内运动场，在六十年代的上海，室内运动场为数不多，据我所知就这么三个：陕西路上的卢湾体育馆、人民广场黄坡路上的体育馆和衡山路上的风雨操场。风雨操场最大，但最简陋，它不像剧场有舞台，也不像正规的体育场有逐渐高起来的观众席，它只是一间极大的空房子。在这里只有空旷的场地而没有间隔设施，会场的秩序不易控制，在这里，场面扩大了几倍，人员也增加几倍，控制会场秩序就非常困难。华东局的干部还没有到，接见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人群就不停涌动，前后挤压，会场秩序已经非常混乱。

我及时向王、殷、费提出要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工作。他们一致点头称是，但没有说谁去做，怎么做。我只得自告奋勇担当这艰巨的大会保卫工作。

我立刻把跟随我的人选拔了几位得力的作为骨干，任命了两名队长，一名负责会场中心的保卫，另一名负责外围的保卫，我自己手头留十几人，紧随我的前后，随时听我指挥派遣。我向他们明确、简要地作了布置，要两位队长迅速扩大人员，立刻行动。他俩马上各自把这段时间内一些骨干和相互熟识的“老面孔”集结起来，组成了两拨人马。

我们在风雨操场的造反活动开始了。王继鑫（小王）他们只管与华东局的韩哲一、黄宇齐在会场上周旋，以固有的一套程式开始，我则里里外外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努力把会场秩序维持好。

会议刚开始不久，突然外面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嘈杂声，随着外面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场内的秩序也大乱起来。我的人前来报告：有人冲击会场，大家不由一阵紧张。我想不通怎么会来人冲击呢？是什么人？我迅速派人了解，原来外面还有几百人要进来参加，而我们门口的保卫人员不放才发生冲突。我当即下令放行，不要把参加的人拒之门外，喧闹很快平静，大家吊起的心放下来。我看两位当权派刚才的紧张神情也不亚于我们。

这时有三、四个精明强干的人找我，把我请到一边，自我介绍是华东局的警卫人员，是跟随韩黄两位首长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保卫首长的安全。这些四十来岁的警卫人员，透出一股职业敏感，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保卫工作不好办，尤其是单靠他们几个人的力量更办不到，所以他们在商议之后，特地找我商量，他们肯定是已经观察一阵之后，才来找我的。

一个头戴鸭舌泥帽的，看来是他们的头，他握着我的手，客气地询问我的姓名，要求我拿出好的办法，把保卫工作做好，保证首长的安全。我不由得升起一阵欣喜和自豪，想不到我的存在，竟然还有这么重要的份量，年青的我，好胜气盛，一口答应保证首长的安全。鸭舌帽又握着我的手，询问我，采取什么办法。我一时语塞，因为我自出娘胎还没有干过这等重要的事，便反问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下是他感到窘迫了，他说，这种情况他们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是啊！这也难怪，首长在我们手中，他们处于从未有过的无权地位，不能把首长带走，却又要应付这么复杂的场面，当然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大言不渐地对这些老警卫人员说："我会组织好人员，做好保卫工作的，既然我们把首长请来，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鸭舌帽特别用双手握住我的手："谢谢！谢谢！"然后只得无可奈何地退到一边去了。我看见他们商量了一阵，很快分散开来，隐没在人群中。

我话虽讲了出去，究竟怎么做呢？我思索了一番，只有扩大我的队伍，充分依靠这几天来一直追随我们的纪律最好的，可敬可爱的妇女们，建立我的娘子军。我对场上的队长说，把他的人全部调集拢来，插到最前面，不要光是男同志，把这些女同志也拉起来。他们点头称是，马上走进人群。

我走到场上，拿过麦克风，要人们后退一段距离，我明白地说，这是为了维护会场秩序，

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一提阶级斗争这咒语，还真有效果，人们后退了不少，这时小王也拿过话筒动员起来，我的保卫人员马上带着队伍插过来，占据了最前面的有利地位。布置停当后，我又要求前面十几公尺范围内的群众席地而坐，这样既形成一个隔离带，后面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就一目了然，而且前面的人坐下来，后面的人也看得见，没有必要再往前挤，又形成了第二个秩序稳定的缓冲地段，使我们保卫工作的注意力可以放到最外层和会场外。这十几分钟的调度使会场完全井然有序了。

冗长的批判发言，当权派的软磨硬拖，会议无休无止地进行。第二次骚乱又发生了。

在场地的后面，突然一阵喧嚣，声浪越来越大，后半部的群众开始涌来涌去，人群大乱。我向后面望去，好像有一股人要向我们这里冲来，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冲击会场。但我刹那间意识到这次是真的冲击，可能要出事，糟糕的是前面席地而坐的群众纷纷起立，向后观看发生了什么事，场面立刻显得动荡不安，而我又挤不到门口去。我当机立断，高声指挥“娘子军”们手挽手筑起人墙。她们丝毫没有犹豫，勇敢地筑起十几道人墙。我冲到最外的一层人墙。

人流冲过来，冲过去，我竭力指挥着，也给“娘子军”有了主心骨。她们经受着挤压，一环人墙被冲开了，马上有人加进来，把这冲破的一环再连上，在这里已经忘却性别的不同，中国人之间那种男女有别，温文尔雅的举止没有了。一层又一层的人墙，护卫着那两位华东局惊恐的首长。小王手中的话筒，也开始发挥作用，再三再四要大家提高警惕，把有关的阶级斗争的语录反复念出来。人群开始逐渐安定下来。而向前冲击的一股力量莫明其妙地消失了，真是来得突然，去得蹊跷。

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应付的办法也不断更新，后来又发生了骚乱，最前面的群众迅速手挽手围了上来，这两位首长不再那样惊惶失措，而是主动配合，在我的指引下走向会场中间，群众手挽手围起的圈子马上合拢，把他们团团围住。我这个指挥也开始镇定自若。为了防止新的骚乱，我大声要求全体人员统统就坐下，小王也用话筒把人群从前到后逐渐劝说坐下，这样一来，有骚乱立刻可以看清了。我又增加后面及门口的力量，下令一旦发现有人捣乱，就立刻抓起来！同时决定不再放人进来，因为场地内已经挤满了，不能再进人。

我们终于得到承认

我们在风雨操场的斗争时间并不很长，韩、黄两位的联络员不断往返于风雨操场和华东局之间。看来这里的情况不断反映到华东局最高层，也许被传到北京，而上面的指示也不断传给我们。

第二天时近中午时，这两位首长最终答应我们的要求：

承认我们的组织为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这些同张春桥签字的工总司的五条要求内容是一致的，但其它的内容就有些不同：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打击报复，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已被辞退的要给予复工，参加这次造反活动的，不得扣压工资。

如果说后来的反对经济主义，把我们的组织称之为经济主义行会组织有点道理的话，那么这与承认工总司不同的内容就提供了口实。实际上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为起码的求生存而战确实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我们的要求最终写成书面的东西，由韩哲一，黄宇齐签字，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同时在一、二天内由华东局出面刻制一枚公章给我们。（在那时社会上要刻制公章有严格的手续，完全受官方的“长江刻字社”控制，不像现在假公章满天飞，只要化钱，马路边就能办成。）

因为费敏璋是外包工，故由费提出在组织名称中加上“外包工”。华东局的两位首长不明白什么叫外包工（果然不知道），由费作了一番解释。

经我们解释后，韩哲一、黄宇齐不断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他们明白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外包工，从不知道临时工外包工还有这么多不公正遭遇。听了这些话，更增强了我们造反的决心，认为这些错误的做法，上面直至中央都是不知道的，全是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我们就是要造反，把这些修正主义的、错误的、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东西揭露出来，让中央知道，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

这外包工“外包”两字，又引出了另一个组织。在我们正式成立后，有一位妇女几次来总部找遍我们这些头头，表示不满，说我们把她们遗弃了，没有替他们说话。我也曾接待过她，原来她曾率领一大批人，自始至终参加了我们的造反活动，忠诚地追随过我们，她们不是临时工，外包工，而是里弄生产组的工人，每天只有七、八角极低微极低微的工资，她们的待遇还不如临时工和外包工，境况更惨。她们是冲着外包工的“外包”两字而来参加造反的，这是她们的误解，因为这些里弄生产组是替大工厂做一些辅助性的低级产品加工，那时厂里算这种工作为外包给里弄生产组加工（现时流行叫外发加工）。她们冲着这外包两字而来，最后，得到华东局承认的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没有把她们包容进去，这位妇女同我们几经交涉无效后，便率领这批娘子军树起造反大旗，又苦熬苦斗几天几夜，

成立了一个叫“红色娘子军”的组织，这是里弄生产组工人的组织。

本不该是两个阵营

我们与华东局的两位领导接触中，没有发生什么过激的行动，我们的发言，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理解，自始至终关系良好。他们在签字后又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最后带着善意的笑脸与我们握手话别，赞扬我的保卫工作，用双手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他们的警卫人员这时也上来，紧握我的手，对我初露的组织才能赞扬一番，我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他们又找我合作过，这是后话。

群众已经陆续散去。我们这些头头与韩、黄两位话别。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少，我望着他们的面庞，是那样的慈祥，我们之间的谈话已经无拘无束。两位老人再三说：“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点不知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这样不合理的事发生。”他们带着对逝去岁月的追忆，怜爱地说：“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投身到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去时，也和你们一样的年青。”

刚才还是对立的阵营，我们要造反，他们不答应，而现在似乎已经是一家人了，是一个营垒内的人。

现在看来，他们和我们原本就是一个营垒的人，只是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把他们划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营垒中（如同外国某人把一大批功臣宿将判决为“人民公敌”处死或投入劳改营一样），然后发动人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可笑的是，造他们反的造反军却需要他们签字认可，需要他们出面为我们刻公章，但是，真正的认可权力又不在他们手里，如果没有更“上头”的点头或默许，杀了他们的头也不敢签。于是，大家就要认真而艰苦地熬过多少个声嘶力竭的不眠之夜，得到两个签名。风浪过去，忽然觉得对手并不是敌人，失败者也不是俘虏，我们的合法地位还是对手给予的，这实在是可笑的斗争形态。

临别时，他们望着我们疲惫的神情和嘶哑的喉咙，关切地请来华东医院（这是专为华东局、市委服务的医院，现在已经向社会开放）的医生，逐个为我们分发了药物。我的双脚由于六、七天来日日夜夜穿着套鞋，没有洗脚，脚趾间已经糜烂。医生蹲在我的面前不顾脚臭，为我上药包扎。这一幕至今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将终生难忘。

人与人之间本应是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这世界本应该充满了爱。

但是，从五十年代就越来越紧的阶级斗争锣鼓，终于引发了这么一场令人发笑而又遗憾的大斗争，自己营垒的兄弟杀得昏天黑地，而真正挑起这场斗争的杜勒斯却安眠于地下，大洋彼岸他的国家信心百倍地发展着，顾自登上月球。现在回过身来一看，那个年代所揭露出来的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已经成为谁也不屑一顾的琐事，而现在随便挑破哪一层黑幕都可以发现骇人听闻的对人民的渎职或犯罪。

不管怎样，我们这个被华东局承认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成了时髦的路线斗争的英雄，破天荒受到了华东医院医生们悉心的照料。但是，过去奋斗几十年的开国元勋们可以在一天之中成为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么，我们这些路线斗争的“英雄们”明天又会是什么呢？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也许，只有那位半路上就悄悄隐去的老杨想过？但是他已经消失了。

人们常说历史总是相似的，重复的，历史之所以重复是因为它和人一样也有着遗传基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基因是顽固而强大的。不满一年，历史开始无情地重复，我们这些“英雄”都被审查，许多人被判刑。一时间，革命者又成了反革命。起过骨干作用而幸免于审查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老杨，一个急流勇退，退得干净利落的人，一个我至今不知道他真实姓名的人。

我想激流勇退

风雨操场的斗争结束后，我带着胜利的喜悦，骑上了一直丢在静安文化馆里的自行车，飞快地斜穿整个市区，回家美美地睡了两小时，匆匆吃了晚饭到厂里去找黎伯昂。他是中班，我在他工作的车旁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得到华东局的承认。他说已经知道了。

我们俩充满了自豪。

我带着通古博今，学着历史上隐士的口气说：“造反成功，功成名就，隐居山乡。我要急流勇退，回到厂里安分地劳动，以后的事让他们去继续搞吧！”

我对自己作出的抉择，是那样富于伟大的坦荡和潇洒而感到有些飘飘然了。

黎听了我的话先是大吃一惊，继而问我真的急流勇退？当明白这是我的真话时，他极力反对我回厂，他要我继续干下去。我摇头不干，我还沉醉在古代圣人成就了丰功伟绩之后飘逸隐去的壮举之中。

黎说："我们这次造反，已经是市一级组织了，你就是市一级的头头了。运动就要结束了，运动后就可以做官，而且是市一级的官，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他这一席话，使我目瞪口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造反后能做官，而且是市一级的官儿。我非常明朗地告诉他，我不想做官。

他对我分析道，老干部已经老了，在这次运动中又一定要免除一些干部，造反上去的就要成为新的干部。我说："我不是做官的料，还是你去吧！"他听了表示坚决不去。

这倒奇了！黎是个有思想的人，他能把造反后的官僚层变化预先有理有据地分析出来，并且再三劝我去当官，但他却不去，我就追问他为什么？

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他的父亲是小业主。我一听默然了。是啊！在这场运动中，血统论把人搞得心惊胆战，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抄家，批斗，不就在眼前吗？

我也不能去啊！我的父亲究竟算是工人还是算小业主呢？我的叔父在49年去了台湾，这个历史上的政治阴影会影响我的。但是我一直天真地想，我的家庭应该算是工人阶级家庭，按陈同志的说法是一个"不纯粹的无产阶级家庭"。叔父去台湾，那是失业在家，穷困潦倒，被人雇去在船上烧饭的，再说叔父与我们早就分家，他的历史与我不搭界。

我们俩人在一片沉默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家庭。

黎打破沉默说："我们从外滩贴大字报开始，好不容易造反到今天，就这么半途而废了？后面的事还很多，殷庆宝、费敏璋他们能把我们临兄的事办好么？"

是啊！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了老杨，他们能行么？我已初显我的才能，有了一份自信，我要为临兄们出力。我已经像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身后有我的随从，一呼而百应，我就这么退下来么？

这几天的景象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必竟不是古代的圣人，我是当今的凡夫俗子，是一个好胜的、好显露自己的凡夫俗子。我急流勇退的决定很快改弦易辙，我要重新回到沙场去驰骋。我对他说，我同意去，但我提出我们要去一起去。因为我还水平低，不可能胜任，我需要他的帮助。他爽快地答应了。我重又鼓起激情蹬车赶向静安文化馆。因为在离开风雨操场时，殷庆宝通知我在晚上七时开会商讨今后的大事。现在时间早就过了，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

争 座 次

到了静安文化馆，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楼上的走廊立满了人，人们在交谈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径直向我们曾经使用过的一间办公室走去，马上遭到阻拦，说里面头头在开会，不准进去。我不由一楞，一看这些人，陌生面孔多，也有面熟的——我的“保卫人员”。我冲着他们说：“怎么？连我也不能进去吗？”其中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人（他就是后来一直跟随我的陆进雪）马上说：“他可以进去，他也是头头。”

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在门口守卫的人告诉我里面坐满了人，不能进去，我对他看了一眼，陌生面孔。我敲门，他不准。我真恼火啊！我不顾他的阻拦敲门，但里面的人不理，我只得放下手，心头窝着一团火，这叫开啥会啊！想想算了，回去吧！我受不了这难堪。

当我转身欲走时，门开了，出来一位，我就乘机挤进门去，这人跟进来阻拦我，我毫不理会，就在他空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见其他人没有反应，只得作罢，自己走了出去。他大概是上厕所，不一会又来了，我大大咧咧的不去理他，他只得站着，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那天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总部”开会。但我们这个组织天生就是先有组织后有头头，谁是“总部”的人就更不清楚了，所以，那天谁挤进了这间办公室，谁就是“总部”的人，大小有一份差事。如果不是我占了那个上厕所的人的座位，或许此人今后就是一个“头头”。革命造反的初始状态就是这么个样子。国产小说中表现群众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一开始就有着井井有条的组织，大约是不可信的。

我环顾这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只能放下三张单人办公桌，已经挤满了人，大约有十多人，气氛紧张。他们在争论着什么，对于我的到来，似乎没有看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大家已经形同陌路。我对这紧张气氛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我默默地听着、看着，终于明白了：今天的会议是“草头王”们在排座次。

我们这组织在筹备过程中，没有明确的领导班子，真正的领导成员也不明确。谁来得勤，来的时间长，起的作用大，谁就是头头。现在造反成功了，已经被华东局承认，这头头的交椅就该正式确定。参加这个会的成员多一个人，就要分一份权力给他，难怪他们像好斗的雄鸡那样争论着、抢夺着，对于我的到来就显得那么冷淡，只是对我这个在造反中已经崭露头角的人不便向外推罢了。

我很快感受到剑拔弩张的气氛，看来争夺第一把手金交椅的战斗已经持续很久，在这场争夺战中，明显的分成两派。

以殷、费等“摆测字摊”的一套人马为一派，小王一派。测字摊是主流派，只是少了一个老杨。老杨虽然已经隐去，但是他的影响还在发挥作用，至少殷庆宝利用了老杨的影响。我一直沉默不语，但最终殷庆宝记起了我的存在，他利用王出去小便的机会，对我耳语说，老杨关照过，不能给王第一把手的位子和实权，要防止他的野心。我点头称是，王的野心确实是有的，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处处暴露出他的野心，这点我也有同感。

王一人自成一派。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姓名是王继鑫。他在这圈子内从人数上来说是少数派。这时在他身边坐着一位约摸三十岁的漂亮女性，剪着那个时代女性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细眼柳眉，笑起来洋溢着足以倾倒男性的柔媚，生气时，眉眼倒竖，透出一股威摄力，足以让世上男人畏惧。这位女性我们第一次见到，显然是王继鑫带来的人。她就是日后左右王继鑫的大名鼎鼎的郭文美。日后，这位自称要吃政治饭的女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今天争一把手金交椅的过程中，郭不时在王的耳边絮语，一阵窃窃之后，王必定有新的言语、新的说法来同主流派争论，显而易见王说出的是她的主意。或者说从这时开始，郭就在左右王了。

王的身后角落里坐着一位五短身材，相貌平平，嘴唇厚厚的青年，化名叫险峰，也是王带来的人。厚厚的嘴唇注定了他的笨嘴拙舌，此人无啥才能，虽然后来他被王安插到我的身边，起控制或者夺权的作用，但深负王的期望，他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好高骛远，一直在我手下混混日子，没有干过什么事，也就谈不上建树。后来他们之间似乎发生不和，分手了。我年青单纯，没有意识到王的用心，我对险峰一直没有什么两样看法，我们之间相处较好。这就是王继鑫的一派。因为他带来的郭文美和险峰没有参加过造反活动，所以没有能进入领导班子。

另外有两位不能不写上一笔，一位姓王化名王伟，高个子，白净面皮，讲话漫条斯理，写得一手好字，在后来总部中别人全忙得不亦乐乎，他却闲得练书法，他把日常练的字，挑了些集成一本赠送给我。另一位是女性，亦姓王，为叙述方便和免打笔墨官司，姑隐其名，就称为王英吧！这位女同胞相貌并无出众之处，性情温和善良。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如果不是这场文化革命的时代风浪将她的命运作此安排，她应该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

这位女同志是老杨刻意物色的人物，在“摆测字摊”时，老杨嘱咐我们接待时，要找一位女姓，将来安排进领导班子，条件是要挑政治条件好的，丈夫是在部队的。在接待中物色到她，经老杨亲自找她个别谈话后确定下来。老杨认为，她的历史清楚，家庭出身好，丈夫是部队的军官。所以在那天开会搭班子时，殷、费按老杨原先的旨意，把她请来了。（从这件事既看到老杨的影响仍然存在，又可以看出老杨确实高我们一筹，他在造反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中、高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必有一位女性）而那王伟是如何进来的就不清楚了。这两位王实际上是总部的摆设，到头来命运之神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毁掉了一个美丽的家庭。这是后话。

另外一些人，基本上是在静安文化馆中筹备阶段的积极分子，热心的跑腿者，但他们无甚出人头地的才能，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在这场纷争中是无足轻重的一群。我与他们相比稍有不同，我以在外滩贴大字报点火的一派自居（虽然当时仅我一人在场），如果说这也是派的话，我就是中间派，但从参加的时间上来说，又可归入殷的主流派。

这场长达一夜，名为两派之间争夺一把手宝座纷争，不如说是两人在争抢宝座。一个是殷庆宝，一个是王继鑫。殷要年长王约十岁，有大学学历，社会经验和世故似乎略胜一筹。但王在郭文美的辅佐下或者说操纵下使他的口才如虎添翼，使这场人数上不是势均力敌的争夺变得势均力敌，争夺战持续到下半夜，大家感到疲劳不堪。人人心中都已看清这两人之间的心机，但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则不着边际地劝说，谁也没有把这层纸戳穿。

我感到痛心，我们这一个月来的斗争，却换来今夜的明争暗斗，我们如何对得起正在外面等候的工友，如何对得起那些忠诚地追随我们的娘子军，如何对得起全市的临兄们。我憋不住了，我反复劝说他们要团结一致，又挑明一点说，不能为了争夺而把我们的历史使命放在一边，走农民兄弟的分裂之路，让上面的走资派来笑我们。说到动情处，我显得有些激动。我只能挑明到这样的程度，我不想伤害任何人。这时办公室的门被那大胡子轻轻推开，他当门而立。在他身后门外的人全默默地看着我们，我的话受到了门外弟兄们的欢迎，一阵切切私议的赞许声传了进来，对屋内争来夺去的人形成了无形的压力。

绵羊当首领

一阵沉默之后，郭文美在王继鑫的耳旁低语了一阵，王作出了妥协，提出一个出乎意外的建议，把殷方老实的“书呆子”费敏璋推为第一把手，殷在审时度势之后也作出妥协，爽快地答应了。

让并无锋芒的人当第一把手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呢？那晚，我们是两只老虎难分高下，便推出绵羊当首领。看来老人家卧榻不起，领导权也交到了大家并不太熟识的中间人物身上。现在也听说不少乡镇企业为了赖帐而让傻瓜、危重病人充当法人代表。

这样的安排使大家松了一口气，顿时大家一阵欢乐，表示同意。

有人提议说休息一会儿吧！大家愉快地接受了。有人出去走走，有人抽烟，气氛一下松驰平和起来，外面的临兄们也轻松愉快地散开，有人回家去了，人们悬着的心放下。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费敏璋当仁不让地接受了这第一把手的职位，称之为常委主任。那么常委呢？在场的为这次造反作出贡献的都是常委（王继鑫带来的郭和险峰不算常委）。

所谓常委，是常务委员，那么委员呢？没有考虑。这种没有委员只有常务委员的体制不知是如何风行起来的，这恐怕是文革中造反派的一大发明和创造，在文革中各工人造反组织中通用（红卫兵组织中也有学法国巴黎公社用勤务员来称呼头头的）。现在，如果到某些机关去问一问，你们除了常委以外，还有没有委员，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实际上是缺乏民主传统的自然现象。有了常委领导班子，还要委员干什么？更可笑的是"常委主任"这一官职，常委怎么与主任搭起界来？为何不称"委员长"呢？大概文革中对"长"特别敏感，认为"长"字体现不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造反了，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所以后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委）的第一把手一概不称"委员长"而称主任，这要比称厂长、区长、县长、市长、省长，好听得多，堂皇得多。

有些国家总是注意名称上的含意，将国名前冠以"人民"（如刚果人民共和国），或冠以"民主"（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两者都冠上（如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似乎戴上了"人民""民主"的帽子就是人民的政权、民主的政权了。当然，一开始可能是这样的，可是久了又怎样呢？后来，自 1987 年 11 月以后，不少国家纷纷摘去了国名前这些漂亮的冠词。人类更成熟了。

但是，这次排座次，从大的方面来说，即从领导层产生的方式来说，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能去"争"的人，是在以往"斗争"中站在前列的人。它比按上级意图指派任命领导者的方式要民主得多，先进得多。

我成了组织部长

费敏璋的为人和无能，使历史将他推上了一把手的地位，也注定他日后是一个无实权的人物，左右不了任何人。

常委主任的位置给了书呆子之后，第二个争夺的座位必然是举足轻重的组织大权。殷、王两人展开了新的一轮争夺。但两人只是大谈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却闭口不提自己要当，无非让大家明白，非我莫属。唉！我真羡慕有的国家，小学生写《我的理想》的作文，一个班级总会有三四个学生写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多么心口如一呀！

眼看两人各不相让，又要发生一场疲劳的拉锯战。我不得不再度出面劝说，力图摆摆平。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王继鑫突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着我说："组织部长的职务由沈××担任"。他的双眼注视着我，似乎在对我说："我把这组织实权推给你，你心中可要明白，我们俩才是一家人。"

我大吃一惊，怎么让我当？我可不行！

我刚想说不行，王继鑫毫不停顿地说我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几天来的造反活动中，已经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能力，云云。

殷庆宝在猛吞几口烟后，马上接口说："我同意！"他也列举了一些我有组织才能的事实。我打断他的话，连说不行。殷庆宝俨然以老大哥告诫小兄弟的口吻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期望，相信你能把组织工作担起来，碰到困难，还有大家一起商量嘛！"他在说"大家一起商量"时，做了一个手势划了一圈，在自己胸前停下，似乎是告诉我："还有我殷庆宝呢。你可要听我的！"

我在王继鑫的眼中，不是殷、费一派，与其让殷夺去组织大权，还不如让我这个中间人物担当的好。而殷认为我早于王参加静安文化馆造反，因此把我归入他的主流派中。我在殷的眼中是一个上海"下只角"的土包子、好讲话，年纪又轻，容易控制，能听命于他。所以两人在争执不下时双方再次作出了妥协，使我意外地得到这组织部长的位子，也算是"渔翁得利"吧！

接下来的权力分配就很快了。王提出常委班子应该有一个秘书班子，成立个秘书处，他自任秘书长。殷庆宝欣然同意，同时把常委之一的骆江华塞进秘书处。王继鑫立即将不是常委的郭文美拉进秘书处。王和郭的企图再明白不过了，用秘书长的职位来控制常委班子，把不是常委的郭文美安插其中，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殷庆宝当然有他的想法：秘书么，可以一点实权也不给你。

剩下宣传部长一职，大家一致认为宣传是致关重要的，殷则乐哈哈地自任宣传部长。

另外，王伟和王英不能没有位子，于是就设立政治部，两人任正副部长。无产阶级政治是统帅一切的，这个口号响彻云天，两位自是高高兴兴地领受了。实际上一点实权没有，在我们国家的习惯中，政治部只有包括了组织部才有实权，否则只剩下嘴皮子。后来他们果然一点实事也没干。

最后剩下一位在华山路中学操场上，对我出示正规介绍信，挠劲十足的钱桂芳也硬是钻进了我们这个圈子。他在这场纷争中，也像当初在操场上那样仍然挠劲十足，不时说上一通言不由衷、思路混乱的话，在他的缠挠下，最终争去一个后勤部长的宝座。其他尚有几位根本不起作用的人也封为常委，全部塞在殷的宣传部中，不多时日，被殷抓住把柄，开除出总部，这几人就不去描述了。

座次分定后，人们注意起我的“卫队”（即风雨操场的保卫人员）来。我倒把他们忘了，因为我这时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塞满了如何开展工作，怎样搭组织部班子的问题。

他们正式任命在场的陈铭声、朱力军为正副大队长（两人不是常委），作为总部的纠察大队，任务是为总部日夜值班和警卫。这个纠察大队就是后来的“大队部”，王、郭对他们非常重视，一度成了王的羽翼，到后来成了总部纪律败坏的心腹大患，风气极端败坏，名声很坏。

争座次不先进吗？

过去，我一直认为那次“争座位”是乌烟瘴气的，但是，现在看来，它有不少“先进”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官吏的产生方式。

封建社会中，国家是帝王的私产，为管理百姓，就要设立层层机构，当然也就要按他的标准选拔、任命大大小小的官员。选拔的方式，由秦朝前的世袭、汉代的举荐、发展到隋唐的科举，逐渐进步、科学，但是，自上而下的“选拔、任命”是一致的，没有变化。

在这种体制下，对官员的选任成了“上面”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事。正因为由上面决定，跑官、贿官、买官就有了“目标”，即使是最清廉的官员，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恩公”是谁。不同的上司提拔不同下属，造成不同的派系或“圈子”，成为结党营私的温床。对于下级官员来说，钻营就成了比才干更重要的能力。对于百姓来说，谁来当“父母官”，是没有选择权的（更不用说罢免权），偶然碰到一个清官，万幸；如果摊上一个昏官、贪官，则受难、倒霉。当然，贪官、昏官也有被革职、杀头的危险，但比例很小（有时清官反而被谪贬、下狱、杀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写照。

这种自上而下的选任制沿袭了几千年，对我们国家选官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几乎成为一种天然合理的习惯，人们很难意识到它是印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身上的封建“基因”。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工厂、乃至一个车间的头头，通常是上级选派的，或者虽有选举，但百姓却能从小道消息中事先就知道是谁，十拿九稳。上面除了选派现任，还经常会在极小的圈子里秘密拟定第二、第三“梯队”，然后把这些“接班人”的材料锁进档案柜中。虽然后来真正接班的，不一定是“柜中人”，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想过没有，这种神秘的形态，与皇帝老儿“定太子”、“立遗诏”是不是十分相似啊？

我们国家一百年来一直在争取民主，孙中山推翻帝制，是民主革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争民主；国共双方几百万军队撕杀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更是“大民主”。但是，民主是什么？百姓怎样才能当家作主？

民主，就是百姓当家作主。百姓当家作主，最重要的权力，就是选择政府官员。对政府的认识，不应当是“衙门”和“老爷”，应当是 watch-dog——守夜人，也就是为人民群众维护秩序、保证安全的公仆。因此，政府官员、国企干部，应当由百姓选择——由百姓选举。这种由百姓自下而上的选举，必然要求被选举人心口如一地说出“我要当”，列出自己的资质，亮出自己的施政方案，公开站出来竞选。这样自下而上的竞选，候选人不可能对全乡、全县、全市、全省的百姓行贿，选民才是官员的“恩公”，他被选上后，会感激人民对他的信任。这样的选举，才称得上是“人民赋予他权力”。这样的官员，很难成为某一个“圈子”的人，很难成为“谁”的人，他工作起来不必抱谁的“大腿”，看谁的“脸色”，听谁的“招呼”，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我们中国人不聋、不瞎，脑容量也够用，就算不看别人二百多年的成功经验，到了今天，我们自己也能琢磨出这个理儿来。诚然，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村民就能排着队往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放投票的豆子，怎么过了六十多年，还是只在选举村委会呢？

反观临时工、外包工组织成立时的争座次，倒是体现了一个庞大组织的“竞选”，但还不够，因为争的人不敢直抒胸臆（好在听的人能听出“弦外之音”）。最重要缺失，是有了“争”，没有“选”，没有广大群众的选举。但是，如果真要选举的话，恐怕大部分还是这些“常委”，因为他们已经亮过相，其工作能力和胆量已被群众认可。如果选举，“绵羊”恐怕当不了“首领”，“草包”也不能凭“绕劲”当上后勤部长。

争座次时，群众也没有要求选举，表现出我国老百姓民主意识的淡薄，只是在屋内的人争得不可开交时，毛胡子老陆等人才推开房门，用沉默的注视表示不满，促使我们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

屋内争座位的人，还是注意了“资质”问题，没有参加过前期造反的郭文美没有进入常委，就是证明，尽管她后来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和胆识，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

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规律是共同的、普遍适用的，自下而上地选举官员，是任何现代国家都要走的共同道路。

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规律，不是不知道这个方式。六十多年前，村民“投豆子”，就是令人振奋的民主雏型。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企业法》颁布之后，我们上海绒布厂也曾有过民主选举，为了怕“乱”，先在一个车间“试点”，一位工作经验丰富，又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工人被选为车间主任，厂党委看中的人却落选。这带来了两个结果：一，这个车间工人干劲十足，生产蒸蒸日上；二，试点经验不推广，不实行，民主到此打住。

这就是我们的民主？

第十二章　第一号通令

通令出笼

这场“草头王”的纷争，经过一夜的明抢暗夺，在天亮时结束。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正式“开张”，匆匆地跻身于上海造反派的行列中，在造反征途中摇摇摆摆地走了一百天的行程，最后被抛出了历史旋涡，结束了造反历程。

总部常委的第一件大事是出了第一号通令。

这是根据华东局承认我们的签字文件的内容，发出维护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通令：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第一号通令

根据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本司令部特发出如下通令。

一、即日起，除本司令部工作人员外，未经通知的临时工、外包工一律不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一切后果均由其本人负责。

二、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凡自觉参加革命造反的临时工、外包工及其他的革命同志，他们所属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不准辞退，不准处分，不准围攻，不准扣工资）。如有违反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在两星期内（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复工，按排工作。各有关部门必须立即执行。（黑六类除外）

此　　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乱哄哄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暂时就在文化馆中开始了我们公开的活动。

一切从零开始，在我的周围重新集结起一批人，但当初我并不起用他们，我厂里的黎和小李子，成了我的信任之人，小李子成天为我跑腿。

这两天我们通过联络员（市委的那个瘦小的工作人员）陆续要来了几辆旧自行车，他又送来了一百元经费，华东局答应刻制的公章也送来了，这枚公章就在费的手中保管使用。通过这枚公章，我们马上自己出具介绍信，去刻制各部的公章，打印了总部的对外介绍信。

我们还没有袖章。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经有了袖章。殷、费毫无办法，只得到专门的商店去定做了几十只袖章，但只够总部的人员使用。这些琐碎的事全由殷、费、王他们作主，我在全身心地忙我庞大繁杂的组织工作，一时还毫无头绪。

两处洋房总部

这时对总部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总部的所在地。在文化馆中长驻下去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冷淡，极不欢迎我们的存在。再说这里又是市委接待站，大家有诸多不便之处。我们向市委提出，要求给我们房屋。这要求通过联络员的传递很快得到满足，黄昏时联络员手拿钥匙，请我们去看房接收。

殷庆宝与我一起去看房，那联络员领着我们到江苏路的一幢洋房。这幢房子，小巧精致，房间不多，他领着我们上下走了一遭。我们发觉里面已经驻了一个支农职工的造反组织。他们是在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工业战线紧缩时被动员回乡的城市职工。一般来说，这些职工被动员时都受到一定的压力，很不情愿地回乡，到了农村或多或少遭遇到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难，当地政府又不能解决。他们看到原先的同事仍在工厂，有稳定的工资，享受劳保，心中能平衡么？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机会，有了些许民主，他们也起来造反，编织起回城的梦想。

支农职工造反组织的几个人瞪着双眼，疑惑地看着我们。我感到不解，明明是来看房的，为何里面已经有主了呢？问联络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倒反问我这房子好吗？他已经看准了我这住在下只角的人对此洋房的惊羡之态。老实说这房子很好，他就说这房子是给你们两个组织合用的。殷庆宝一听此话，拉着我就下楼。联络员只得跟下来，陪着小心说："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你们去看看。"

这另一处是花园洋房，在愚园路 987 号（江苏路口）是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进了面北的铁门，一条水泥路通向南面的草坪，进门右首是进房的门，门内是厨房和储藏室，穿过厨房朝南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面对花园草坪的一边是一排落地长窗，厅的中央是一只椭园形的红木大圆桌，北面的墙有一只大壁炉。二楼分成好几间房间，均很小，北面有一间浴室，浴室内有一只燃煤气的热水器，还是解放前的进口货，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奢侈品。在北面靠愚园路的楼顶有一晒台，晒台是全封闭的，上面全用玻璃棚罩住，滤去尘埃，只有阳光照下来。我惊叹这家原来的资本家主人，住的房子这等奢华，设计得也很周到实用。但是我也笑这家主人，只想隔去外面马路上的灰尘，岂不知在这样的玻璃棚内晒衣物，阳光中的紫外线却全被玻璃阻断，失去了杀菌作用，真是化钱干蠢事。

这整幢房子的东西和家具已经搬空，仅在客厅内留下那张椭圆的红木桌和几张红木椅子，想来是它太大了，别的地方容纳不了才留下来的。这房子太棒了！比刚才的一幢要大，还有花园草坪，全幢房屋静静的，没有一个人，我不等殷庆宝开口，就把钥匙收下来。

然而，精明而又贪心的殷庆宝另有一个心眼：

在乌鲁木齐中路 11 弄 11 号有幢三层楼的洋楼，资本家在这两天要被扫地出门，街道办事处要搬进去（正规的行政组织也趁火打劫了）。这幢楼离他家近在咫尺，离静安文化馆也很近，他提议我们抢先占领下来，街道办事处算什么？我的考虑是：乌鲁木齐路是我们造反

的“热土”，全市的临兄都知道乌鲁木齐路，总部设在这附近好。对！抢下来。

第二天上午，带着大队部几个人，随着殷庆宝，穿过华山路就到了。这是一幢红色砖墙的三层楼房，我们这些人无所顾忌地闯了进去。房屋的主人一家男男女女全集中在楼下，他们龟缩在一边，用惊恐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这些膀大腰粗，臂上戴着造反队的袖章：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

红色袖章具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力。这家人一定经历了几次抄家，红色恐怖的阴影一下笼罩在他们的头上，簌簌发抖的姐妹俩互相偎依着，瞪着惊恐的大眼，时而看着我们，时而垂下双眼。

我们毫不理会主人的存在，傲视一切地直上二楼、三楼巡视一番，大家对这诺大的一幢楼房感到满意，决定占领下来。我们回到楼下，他们一家人仍卷缩在一边簌簌发抖，等待我们的发落，两个姑娘用可怜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一家人的身后是几捆包扎好的衣物，还有一些杂乱的日用必需品和几件旧家俱。那最老的男人大概就是资本家，他坐在角落旁，边上有两个女人站着（事后知道是大小老婆）。两个姑娘大概是他们的女儿。

殷发问：“你们什么时候搬走？”一个大男孩胆子稍大，抢着说：“办事处要我们明天搬走，后天办事处就搬来。”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色，殷说：“我们是造反司令部的，这房子我们要作司令部用，你们马上就搬走。”

那资本家老头颤巍巍地站起来，面露难色，低着头不敢吭声。那个年岁大的女人指着地上为数不多的东西叹了口气怯怯地说:“家里全是女人,男人全去上班了,讲好是明天搬的。”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确实不多,仅仅是楼下堆着的一点物件,但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她们,靠手提肩杠确实办不到。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我对殷耳语道:“我们必须在今天占领下来,抢在办事处前面，我们从大队部调些人，帮他们搬场，那我们不是今天就能进来了吗？”殷点头同意。

殷对大队部的朱力军说了几句，要他立即行动：一部分人搬场，一部分人就把房屋看管起来。朱力军就对那老头说：“我们马上派人帮你们搬，你们老老实实做好准备。”

他们唯唯答应。实际上他们就这点东西了，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那个大男孩听了似乎有点高兴，马上动作起来。唉！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的房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一下子到手两处。我们把愚园路的有玻璃晒台的洋房作为对内的总部所在地，不公开。把乌鲁木齐路的三层洋房作为对外公开的总部办公地。

归还零用钱

中午啃了面包后，我带着黎和李去我们乌鲁木齐路的总部。底楼已经有大队部的人在值班活动了，他们占据了一半房间，负责总部的保卫工作，另一半作为总部的接待室。人马有了，地方有了，又得到了正式承认，这接待工作反而没人管了。但我认为接待工作仍是重要的，就划入我的组织部，归我领导。

二楼归宣传部使用，留出一间作政治部。三楼给组织部、后勤部和王的秘书处使用（实际上后来王把愚园路作为他的秘书处办事地）。

我们进去时，二楼三楼的房间是全部被封着的，我们撕去红卫兵的封条——这一条条四指宽，两尺来长，写着潦草的“红卫兵封”的白纸。说来真奇怪，这么一条薄纸斜贴在门和墙的接缝处，房屋的主人就不敢进去，失去了财产所有权。财产的合法主人没有谁会狗胆包天去触动这些封条，因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红卫兵封条像征着阶级对阶级的专政。

但这封条对我们不起作用，我们可以随便撕去它，因为我们是造反派，我们是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造反”，就可以随意取用资本家的财物。

但是，我们却不敢随意处分这些财物，我们完全明白这些财物是充了“公”的，不是我们个人的东西。

打开一扇扇门，房间内凌乱的景象映入眼帘，一些衣物、用具杂乱地扔在地上，箱子和大橱门全打开着，床上堆着被褥之类，一看就知道，这家人经过了反复抄家，最后一次抄家注定了“扫地出门”的命运，仓促地被赶出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只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怜的生活用品，绝大多数被四指宽的白纸夺去了所有权。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家最悲惨的就是扫地出门。一般的抄家，仅仅是抄走一些金银首饰、存款、现金、字画文物和值钱的东西，使经济拮据，但日常生活起居还不致大受影响。但是像这家人被扫地出门就惨了，房屋没有了，搬去居住的地方必定很小很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况且那时凭票计划供应，尤其是棉布，所以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这些有床有橱、杂乱无章的房间，我对黎说："房间中全是资本家的财物，这不好，以后说不清，我们还是要这一间房吧！"我指着一间面对楼梯的儿童活动室，因为那个房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儿童小床和各种玩具，玩具之多，像托儿所幼儿园。他没顾上说话，只点点头，马上动手把小床玩具统统搬到外面的走廊上，一点不剩。

总部其他各部的好汉们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留下了沙发、床、大橱、被褥之类的东西，搞得不伦不类，说是办公室吧，有床，说是卧室吧，又有办公桌。只有殷庆宝的宣传部那个有大阳台的大房间还算好，像个样子，但最好的皮沙发归他了。

我环顾我的办公室，觉得很得意，因为屋内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任何财物，手下的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办公桌，把我这组织部办公室布置得蛮像样。这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办公室，今后经济问题绝不会搞到我的头上。

我的工作人员在废纸中，检到一张二百多元的活期存单，交给我处理。我看了看，马上吩咐他去大队部把帮资本家搬家的人找来，叫他们把存单还给原来的主人。

他们回来复命时，告诉我这存折是资本家小女儿的零用钱。他们一家人感激涕零，千恩万谢收下了。我听了很高兴。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人工五、六个月的工资，尤其是对他们来说，目前拿到这笔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当然同他们原有被抄的财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

现在想想，在中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三千年历史进程中，总的来说法制是在慢慢进步的，但是，其中也有两种情况会发生倒退：其一是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入侵。如元朝就恢复了一些野蛮而奇异的刑罚（但清军入关后很快就明白了推崇汉文化的重要）。其二是全部推翻前法律。如刘邦攻入咸阳后，宣布废除秦朝法律，颁布"约法三章"，使得百姓玉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刘邦不久便基本恢复了秦朝法律，此谓"汉袭秦制"。因为无论那个阶级制定的法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否则就不能有国际刑警组织，不能有引渡，不能形成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全部推翻，其用心是好的，但必然带来倒退。解放军进城后，颁布"约法八章"，废除"六法全书"，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可惜的是第一部刑法和第一部民法（通则）却在三十年后的 1979 年才订立。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其它大大小小的灾难，就是在这三十年的空白中产生的。

乱纷纷的一天过去了，一直忙到很晚。晚上我与黎和李三人睡在用报纸铺的地板上，毫无东西遮盖，11 月下旬的天已经很冷了，半夜被冻醒，实在受不了，我们三人就坐起来不睡了，一阵阵冷颤袭来，牙齿在打架，小李找来一只面盆，把门外堆积的书报拿来点燃取暖，我们像野人似的围坐在面盆边，跳动的火苗，温暖了我们的身子。

在抱来的废纸中，我随手翻翻发现一本簿子，里面是手工描绘的十字花样，这是江南水乡刺绣的一种，大概是这家里的一位姑娘手抄的，各种花卉鱼鸟，栩栩如生，真是一种民间艺术啊！如果照样绣出来，一定很好看，我真不忍心把它烧去，黎伯昂一把拿去丢入火中，我啊呀一声，责怪他为何要烧掉，他说这是封、资、修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现在我们冻得要命，这是革命的需要。他咯咯笑了起来，随手把书整本整本往面盆内丢，压住了火苗，这样一来烟更大了，满屋子的烟，又呛又咳，实在受不了，又去开窗，寒风直灌进来，比原先更冷，簌簌发抖的"革命者"们只得坐等天亮后，到外面饮食店，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浆，两副香喷喷的大饼油条，又暖和又饱了肚皮，再乐呵呵地投入新的一天忙碌之中。

挫伤了姚红的积极性

我的组织工作要全面展开，当务之急是先把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配备完整。首先接待工作由杨福海负责，带领一班老人马。我向他明确指出，接待工作不应局限于"摆测字摊"时的内容，在总部成立的新形势下，要特别对尚在基层建立组织的上访人员以鼓励和指导，要善于发现人才，看到有条件的上访者，可以直接引来见我。经我和黎的谈话商议后，决定是否授权来人组织区分部等下属组织的重大问题。但我更需要能力强，有文化的人来组织起我内部的班子。我的同事黎伯昂是当然人选，我对他的期望值很高，我们之间不分你我，可以放心地让他去做。

我想起了姚红，他的一枝犀利的笔，是我崇敬的，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我通知他，请他参加我的组织部的工作，他很快背着他的军用挎包出现在总部。由于姚红的参加，在组织部中以姚红为中心聚集起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顿时生气勃勃，战斗力陡增。

在每天纷乱的工作中，不断有人来找我，对每一件事我必须迅速作出处理决定。但是，二十四岁的我缺乏经验，一头钻进杂乱无章的事务堆中，不懂得知识份子类型的人的心理特点，我完全以工人式的豪爽、直言，放手让姚红去做，没有主动去靠拢他们，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至于他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也无暇与他们商议、交流，因此我并没有充分认识和发挥他们的能力。我没有同姚红谈过组织部的大计方针（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想到过我们今后该怎么"造反"），没有请他参加区分部的筹建工作。我绝对信任了黎，而一时忽

略了姚，我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下面的分部建立工作，完全忽视了我身边的这批精英，造成了重大的失误。

在积极组建各区分部的工作中，我不时被基层单位来的人所干扰，他们诉说在建立本单位临时工造反队时，受到本单位当权派的阻挠和压制，阻力很大，个别积极分子受到迫害，要求总部给予支持。我就具体向姚红交办，请他去这些单位解决。由于我简单的工作方式，也实在我太忙，没有抽时间与姚红交心，造成他默默地接受，但回来后，从未向我谈起处理的过程和结果，问起他，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已经解决了。我就不再过问。可能是我把组织区分部的主体工作交给了黎，而把基层单位的造反队碰到的疙瘩杂务事情交姚去处理，挫伤了他的积极性，使他有一种失落感，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这是我的猜测。

我对黎绝对信任，相信他能力比我强。可惜我高估了他，实际上，他为人的确老实，但并不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把握住人的复杂性，他的自信心很强，但并无出色的工作能力，他非但没有把建立分部的事办妥，相反把工作全搞僵了。在他一手联系安排下，竟然出现两个南市区分部，而这两个分部的挂钩都是总部承认了的，至使我后来花了相当精力，做了大量工作，才使他们合在一起，但还是埋下了祸根。当然原因也不全在此，这是后话。

黎偷吃糖果

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在繁忙的日日夜夜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在我们这间房的里面有一扇门通卫生间。到了晚上，就剩下我们三人时，我们就天南海北地神聊，放松疲劳了一天的神经，我发现黎不时往卫生间跑，起初我并不在意，后来我进去一看，原来他在翻卫生间的瓶瓶罐罐，那里面存有不少糖果之类的东西，他一面翻，一面吃。我看了一愣，这是资本家遗留下的东西啊！他见了我讪讪而笑说："肚子饿了，吃一点。"一面塞给我两块。"这糖很好吃，一吃就不饿了。"我呆了呆，些许小事我何必那么认真，使人下不了台呢！随手接了过来。这位老兄见我也吃了，便得陇望蜀，当着我的面把一个储蓄罐中的分币往自己的衣袋内装。我见了惊诧不已，这是人家的钱啊！怎么可以这样！但碍于情面我只能说："这不好吧？"他一面一把把地把分币抓进袋内，一面含混地说："呒啥关系。"最后把罐子内最后的一点分币全倾倒在手心内，匆匆塞进衣袋内。我见了他这副模样，默默地退了出来。但是，我一直觉得像吞了苍蝇一般不自在，总觉得这是革命者所不该做的事。

从这天后，他进入卫生间的频率越来越高，玻璃罐内的方块果糖一天天低下去。一天，已经很晚了，我们三人已经在地板上躺了下来。这种不脱衣服，没有床，没有被盖的睡觉，真还要有点能耐，我们已经连续几天这样艰苦地过下来。看看其它几个部，他们都有床有沙发，我们三人可谓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了。我一时无法入睡，在朦胧之中，我感到黎起来，进了卫生间，拉亮了电灯，他大概肚子又"饿"了吧！管他的，我和小李仍躺着不动。

不一会，我听见从卫生的另一扇通外面的门走进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殷庆宝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

"走！到大队部去!"又是殷的声音。

真是！这个黎伯昂呀！黎是我组织部的人，我应该起来去看看，但我羞于见殷，怎么说呢！我一时乱了方寸，不去管他，我躺着不动。只听杂乱的脚步声下楼去，却不见黎进来。坏了，黎被带下去了。我猜想殷带着人在查夜，见卫生间外面的门虚掩着，就推开门，见到他在吃糖。……。咳！吃就吃么，为什么不把门关关好呢！我在心中责怪着他。一时躺不住了，坐起来。小李也坐了起来。我们俩人谁也不说话，互相坐着静默了一会，我不安地在房内来回走动，唉！多难为情啊！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黎回来了，脸色很难看，嚅嚅地说："算了，我回厂去吧！我没有面孔在总部呆下去了。"我对他注视良久，也羞愧难言。说什么呢？反正我原来就有急流勇退的念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何不……。想到此，我混身轻松起来，我爽气地说："睡觉！明天我们三人一起回厂!"大家重又躺了下来，小李不痛不痒地咕哝了几句，责怪黎不该去吃糖，为什么不把门关好。作出了抉择的我，反倒很快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殷庆宝就来到总部。（他离家只有二、三分钟的路，每天回家吃饭、睡觉）我对他说，我们走了，回厂"抓革命，促生产"。他听了没有挽留，也不说什么，一丝得意的笑容在脸上一闪而过。

我向他交待各区分部建立的情况，哪几个区已经组织就绪，哪几个区尚未落实，另外还有一些琐碎的事。交待完毕，我的组织部工作人员尚未到来，我不等他们了，这样更好，免得问起来难堪。我与黎、李三人骑着自行车，一声不啃，各自回家。

离开总部大半天

到家后，感到周身疲乏，倒头就睡，睡了半天醒来，有滋有味吃了一顿热饭热菜。回想这几天的经历，感到自己退出了急流，有种说不出的轻松，心中盘算着休息一天明天去上班！突然想起在昨天下午市委联络员送来一部自行车，因没有人交接，于是我收下了钥匙，随手

被一工作人员公出借走了(自行车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是一个工人四、五个月的工资)。这事早上忘了向殷交待,别人又不知道,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四面八方凑起来的乌合之众,良莠不齐，谁知道借自行车的人的底细呢？如果他不老实，钻了我这空子，乘隙故意不报，日后查起这辆自行车来，岂不是我“吃进”吗？想到这里，我一时急了，做人要做得清白，有了一个黎为了吃几块糖，被人掐住话柄，我不能也被人说也是一个贪小的人物，不行！我要交接清楚。我马上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向总部驶去。

进入总部，门口值班的对我点点头，大家对我的到来似乎感到意外，都注视着我。我匆匆上二楼，进入宣传部的办公室找殷庆宝，他不在。我就上了三楼。

我才走了大半天，好像已经离开好长的时间了，看到我的部下们和熟悉的一切，有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我们之间似乎有些生分了，因为部下们见到我，只是静静地注视着，谁也不作声。我从他们的目光和神态看出，他们已经知晓了我走的原因。这时三十多岁的杨福海走到我面前，紧握住我的手。于是人们呼拉一下全围了上来。杨握着我的手，半天功夫才说：“我们对事情全明白，你回来了，就好。”

我摇摇头，对他说：“我来，是找殷庆宝的，是还有一辆自行车没有交接清楚，昨天联络员送来的车子，随手被宣传部的老石借走了，这事请你过问一下。我走了。”我对满屋的人看了一眼，转身欲走。杨福海一把拉住我说：“请你听听大家的意见好吗？”满屋的人神情黯然，有人说：“你留下吧！组织部不能没有你，全乱套了。”大家七嘴八舌劝我留下。

杨用嘴努了努一位坐在我位子上的人，在我耳边轻声说：“他是殷庆宝今天安插进来的人,殷庆宝已经召集我们开过会,封他为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他是华师大二附中的校工……。”我侧转头去看了看这个人：以前没有见过，满屋人中，唯独他正襟危坐。

一股怒气涌上我的心头——我才走了半天，你殷庆宝就马上动作起来，存心是在逼我走啊！不知你用黎的事搞了什么鬼，你是在窥视组织部长的位子啊！

楼下纠察大队的人涌了进来，一下把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挤满，连门外也立着不少人，他们全都激动地喊起来“你不能走！不能走!”我看着这些曾在风雨操场忠心跟随过我的人们，平静地说：“承蒙各位看得起，但……，”我看了“办公室主任”一眼，“我必须走。”

人们拦着我，诉说起这几天几夜的造反经历，不容易啊！一位女同志流着泪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看出你是一心一意为我们临时工办事的，真正为我们临时工办事说话的有几个？你走了……”她一时呜咽说不下去了。她的言语，打动了所有的人，好多人流了泪。在一片抽泣声中，我心头一热，潸然泪下，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队部的朱力军打破了沉默，他说："我们挽留你，不是挽留你个人，你应该想想，我们是为什么起来造反的？你要为上海所有的临时工外包工想想……"下面的话我再也听不清了，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在这一片滚烫的情感包围中，我还能说走么？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望着他们，尤其是这些女同志，她们离开丈夫孩子，日日夜夜在总部工作，她们是为什么？

留下来！我决定留下来！我泪眼模糊，激动地挥了挥手："我留下，留下继续同大家造反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的话刚说完，朱力军带头拍起了手，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我重又坐到我的位子上，那个"主任"只得退到了一边。

由于这一场意外的变故，杨福海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对于那个"主任"我既不赶他，也不用他，让他冷在一边（事实上此人毫无才干）。殷庆宝对此也没有出面干涉，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当然他一定知道我回来后在组织部办公室发生的一幕，知道我受拥戴的程度。这场争夺组织部长的权力之争很快平静了。认真说来，好像不能叫做争夺，因为我是自己走人，怪不得殷，说到底也只能估计他"正中下怀"，他当然也有权以头头身份再派个"主任"来，只不过派得太早，受到群众的反感，想不到我过了半天又回来交待工作，被大伙儿挽留下来，使他白费了心机。

也难怪殷要费此良苦用心，在我们国家，没有把"官"当成一个职业，人们可以说想当工人，想当售货员，想当司机，想当科学家，但万万不能说想当官，因为"想当官"和"有野心"是划了等号的。即使我们在风雨操场胜利后，在总部"排座次"的激烈争夺上，想谋取某某职业位的人只能大谈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便让大家想起他，推举他，而不敢"直抒胸臆"，所以闹出个鱼翁得利或庸人掌权的现状来。

说穿了，野心又有什么不好？想居于高位干出一番事业是人的本性之一，早就听说有的国家的词汇中野心与事业心、雄心是同一个词。在那样的国度，必然盛行着公开竞争，人们必然心地坦荡，少有鲁迅所谑说的"必须横站"的情况。而想做又不能说必然使人越来越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陷井与阴谋。

赶走姚红

此事一过，我就全忘了，我还是坦然地干，全身心地投入建立各区分部的工作。没有了黎，建立分部的工作反而得心应手，我一个区一个区的落实。区分部一建立，下面基层单位很快就会去挂钩，我的组织工作开始向下全面铺开，进展神速。我自己也惊奇：我竟会有这等组织才能？！在繁忙的工作中，内部和面上的事务我全交给杨福海。

但是，我仍然忽略了我的内部工作，姚红几乎被我遗忘了，他在干什么呢？在他周围聚

集起一群人，他们每天似乎很忙。我无暇顾及，不知他们在忙什么？

一天，快中午时分，殷气急败坏地找我说：“你组织部的人在造常委的反你知道吗？”我鄂然问：“谁在造常委的反？”“你带来的姚红为首造反”。竟有这等事？怎么我一点不知道呢？殷气势汹汹地说：“造常委的反还了得！这些人是你组织部的，你要处理，你必须今天处理。”他当即拉着我向三楼到屋顶的楼梯转弯处，指着姚红他们正在张贴的大字报说：“你看看，你看看！”我一看标题：

常委们究竟在干什么？

内容是揭发有些常委成员整天不干事，带着女朋友整天在总部鬼混，指责常委不组织宣传，不搞大批判，究竟要把我们临时工外包工引向何方，号召总部全体工作人员起来造反。措词相当激烈。

我这人好蠢！竟没有冷静地想想，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是在整个总部最冷僻的地方（三楼去屋顶的楼梯转弯处），正是为了避免被下面基层来的群众看到，可谓用心良苦。他们显然是为了促使常委们深思，改进工作，使总部的工作走上正轨。我也不去想想，写的内容、揭露的问题全是真实的！这些问题都出在殷的宣传部。我忘记了几天前殷对我的夺权，现在这是殷庆宝在清除我的左右，孤立我，目的还是要夺我的权，同时又可掩盖他宣传部内的问题。当时我只想到，如果让这大字传出去，对整个总部的影响太大了，总部的声誉被毁了，组织会垮台的，这绝对不能允许。姚红这人太狂妄了，我只想到他的自傲和对我的冷漠，对我交办的工作，从不汇报，现在竟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带着一批人每天瞒着我干这等事。

我一时气往上冲，不等看完大字报，就对殷说:“姚红是我带来的人，我赶他走就是了。”殷听后，露出一丝奸笑，可是我一点没有觉察，我当着殷的面，对姚红冷冷地说：“姚红，你是我带来的，你马上离开总部回厂去吧！”

他把军用挎包一背：“好！我走。”他指了指大字报说：“请你好好看一看群众的革命大字报”。

我竟然说：“我不用看！”我命令旁边的人说：“把它撕掉！”几个人上去就撕。

“革命的大字报不能撕”，姚红转身想阻止。

我大吼：“全部撕掉”。顷刻之间大字报被撕得片纸不存。

姚红气得脸都变了形："好！好！我走!"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后面跟着一批人也随他走了，留下的几个后来也陆续离开了总部。头脑简单的我啊！真蠢。现在想来，我觉得十分对不住姚红，这个年轻、干练，才气横溢而又高傲的青年。（姚红的真名叫姚得利，文革中，他一直用姚红的名字。）

姚红，亲爱的姚红！如果你能看到这本书，请接受我迟到三十八年的道歉！请原谅我三十八年前对你的无礼！

人啊！中国人！在脑海深处浸满了封建意识，真是根深蒂固。自己在刚开始的文革造反中，似乎是充满了民主精神，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夺当权派的权。但是，造反者一旦自己发号施令了（实际根本没有真正发号施令），却又压制群众起来提意见，害怕民主，仅仅是提意见的民主也要毫不留情地扼杀。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里难道只有专制的基因吗？就这样代代相传吗？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什么是民主？又该用什么来保障？

殷庆宝，利用我的无知，用我的手，排除了对他的揭发和批评，扼杀了总部的民主气氛，又削弱了组织部的力量，可谓一箭双雕，他的阴谋得到了实现。在这方面他是天才，但是实际工作，成绩却差极了。

在我忙于组织工作时，宣传部一点没有建树，就连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人家，我们始终在宣传工作上落后于"工总司"，更不及学生组织。

姚红的大字报虽被撕去了，但他的内容击中了宣传部的要害，逼使殷在宣传上要有所改进。他从自身的权力考虑，开除了在他部里的二、三个不干事的常委，大字报中揭露的一个常委整天不干事，带着女朋友鬼混的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段时间内，王继鑫在搞些什么名堂呢？他热衷于跑到基层去出风头，哪里建立造反组织时遭遇阻力，或者没有按照我们的第一号通令做，至使我们的临时工遭受了经济损失时，告到王那里，王就亲自出马，兴师动众带上纠察大队的人马，把在市委造反时的那套再重演一番。首先一仗是邮电局的李林义把他请去，在邮电总局内同局长大人斗了两天一夜。这一仗打得艰苦，胜利得来不易，成立了上海邮电系统的邮电总队。为我们总部架设了几部电话。那时只要拨问讯台就可以查询到总部各部的电话号码，这是上海当时所有造反组织中绝无仅有的。这一仗可以说是值得的。

从这以后，他整天在外搞这一套，今天去这个单位，后天去那个单位，甚至为了一、二个人的工资、辞退等问题也这样无休无止地搞造反而乐此不疲。他不知随形势改变而改变斗争方式。他没有认识到，我们已经是得到承认的革命群众组织，不值得花这样的精力。在组织部接待工作时遇到这样的事多着呢！一些个人问题，我就用电话解决；在建立基层单位造

反队有阻力时，就派一、二个人去解决，就像我派姚红那样。

王向我求援

一天下午，王继鑫从外面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在标准件×厂造反，那里的当权派顽固得很，已经两天了尚未攻下堡垒，要我调人前去增援。他的本意是向我这个组织部长要人，人越多越好，最好调几百人去，用人多来压迫当权派就范。可是我领会错了，当是要我带人前去增援。王继鑫这个风头是要出的，但绝不会想到要“我”去“解围”，看他出洋相。

我这人头脑就是这样简单：放下电话，立即设法调动车辆。我明白，我们的组织虽然被华东局承认，但尚未被社会所接受，局面还没有打开，到基层的组织渠道还没畅通，虽说有的区分部已经建立，但还只是一个雏形，基层的“临兄”在单位中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即使是成立了临时工造反队，也往往是处于无权的地位，要调动车辆和人员还有一定困难。再说为了这么一家小厂，兴师动众不值得。我只打算要一辆车，不调动人。我的手下总算较快地调来一辆三轮卡车。行！这就很不错了，我带着十多人，马上出发。

那个小厂在市区的边缘，大概只有二、三百人。走进厂门静静的不见人，在厂区内看不到大字报和大幅标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似乎并未在此发生过，一片死寂的气氛与整个上海的形势是那样的不协调。

一阵阴影从我心头掠过，今天的局面太糟了，不容乐观。应该说我们的王司令是斗争的老手，是见过大世面的，他的个性又那样好胜、好斗，今天来求救于我，那一定是太棘手了，否则他绝不会打电话给我的。

走进楼上的会场。这是一个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会场，在坐的只有百余人，（包括我们带去的人）。那个厂的当权派坐在台上，年龄已经快六十岁了，一付老奸巨滑的世故神态。他对于我的前呼后拥进入会场内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屑一顾，尽管王同郭文美领呼口号，拍手欢呼我们的到来以造声势，他仍正襟端坐翻看手中的语录本，连眼皮也不抬一抬。王继鑫带去的人和本厂的临时工们已经明显地露出了疲惫神色。

那厂中的临兄头头，把我们让进座位，我一看，认识此人，是我们造反时的基本群众，在总部也见过面。他与王匆匆向我介绍情况：上面端坐的是本厂的支部书记，掌握全厂的大权，这两天来这位书记死活不承认临时工造反队。要说也难怪，这个偏远小厂里连工总司的造反队都无人出来组织，他怎么肯承认我们的组织呢？他极力用生产压制革命造反，不管你

如何同他斗，他就是陪着你们，死活反对。王继鑫接到该厂的临时工造反队的求援后，带人来同他较量了两天，丝毫没有进展。

由于我们到来，一切从新开始。这位当权派的斗争策略很高明、很简单、也很实用，我们呼口号，他也呼，我们唱语录歌，他也陪唱，你批判控诉临时工制度，他闭目养神，你向他宣读我们的一号通令和华东局签字承认的六条，他说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没法承认。我们反驳说，我们组织成立后，市委按系统向下电话通知各单位，在临时工造反的一星期多，离开生产岗位的时间一律不得扣发工资，他也推说没有接到。我们愤怒声讨他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走资派，他无动于衷；我们给他扣上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吓人大帽子，他给我们读“抓革命，促生产”。看来，王继鑫、郭文美的确是碰到了一个软钉子，一片让你有力无处使的沼泽。

局面就这么僵持着，怎么办呢？我们的法宝全用完了，他却斜眼看着台下的我们不无得意，对我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嘲笑，让人怒火中烧！

这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尚未风行用体罚及侮辱人格的手段来斗争当权派，还没有出格的举动，对他的傲慢，我们已经计穷力尽，无能为力了。

这时我的内心是那样的焦急，天已经黑了下来，毫无希望的会还在继续，王继鑫在指着他的鼻子怒斥，往常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普通话，现在也显得苍白无力。全场的人茫然地看着台上，有的在打瞌睡，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人都想早点离开这片沼泽，无心恋战，而又不得不在这泥沼中跋涉，因为这时离开，就等于承认了失败。

残缺标语的魔力

我毫无目的地打量起这间小小的会场来，这是新建的楼房，在四周的墙边靠着课桌，上面残留着一些展品，显然在不久前曾作过展览会的场地，陈列资本家的抄家物资，作为向职工阶级教育的教材，墙上还有什么血泪斑斑的剥削史，吸血鬼等字句。看来在这展览会后，没有再派过什么用场，墙上没有常见的文革标语，只有正面的墙上有一幅残缺的标语：“打垮一切”。从这四个字的位置判断，后面还有字，但已经被风吹落，显而易见这是配合展览会用的大标语，我无意识地对这幅标语进行猜测，后面的几个字是什么呢？从字的间隔距离来推算，后面大概也是四个字，什么字呢？这是一个展示资本家的剥削史的展览场地，那么很可能是“打垮一切剥削阶级”或者“打垮一切牛鬼蛇神”。

现在，在这正面墙上“打垮一切”的残句下，端坐着那个闭目养神的走资派，我并无目的的眼光在这幅标语上停留了片刻。突然，我的脑中出现了奇迹！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看着那个分明是小觑我们的支部书记，哈哈！该是我们得意了。我腾地站立起来，高举毛主席语录，先宣读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接着我慷慨激昂地说：“革命的造反派、革命的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这个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顽固抵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敢于同革命造反派对立到底，这是有他的反革命目的和企图的。”我看了一眼老头。他毫不理会我的发言，似乎没有在听。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我的语调陡然一转：“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我手指这个老奸巨滑的老头：“这个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当权派，他要干什么？他要打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打垮我们的党中央。”

那老头微微睁开双眼，奇怪地对我瞄了一眼。

“你们看！”我把手朝墙上一指，稍稍停顿一下：“你们看这墙上的标语，打垮一切！要打垮谁的一切？打垮我们无产阶级的一切么?”

这时全场的群众齐刷刷地抬头看那标语，那老头也急忙扭头望自己身后的墙。一阵激动的交头接耳的声音从群众中爆发。我提高了声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这个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该不该打倒？”群情激昂：“该！”“要不要揪出来示众？”“要！”

王继鑫就势一下窜到他的面前，把他一把提了起来。这下老头只得乖乖地站着。王又领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老头子的姓名）!”“×××必须低头认罪！”

好了！这下子口号声雄壮有力了，全场活跃了！有人立起来指着他！要他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老头慌了手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面揩着额头上的汗珠，一面连连向群众低头不止。王继鑫问他：“有罪没有罪？”

老头稍稍迟疑了一下：“这，这……，这标语后面还有几个字被……。”不等他的话全部讲完，王猛地一把把他拉向后转：“白纸黑字，你读一读墙上的标语。”他沉默不语。众人全

站了起来：“读！快读！”

王继鑫虚晃一枪：“××，快回总部去，把照相机拿来，看他如何抵赖！”

这位支部书记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晃晃悠悠地转过身来，不住揩汗：“同志们，我没有对陈旧的标语及时更换，我有罪，我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我们乘势问“你压制革命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有没有罪。”

老头就范了：“我是犯了错误。”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

“我愿意在你们的条件上签字。”

该厂的造反派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纸交给他，他立即低着头，在顶了几天的条件上签了名，承认了该厂的临时工外包工造反队，并提供一切方便，并发还克扣的工资。

我们胜利了，郭文美回过头来对我点头笑笑。这时大家围着我，好不开心啊！大家心中明白，没有这一招吓住这老头，这老头还真不好对付呢。有人伸出大姆指在我面前扬了扬，我好不得意。

王继鑫乘势提出要老头用厂里的卡车送我们回总部，他巴不得我们快走，当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等车的当儿，这厂新成立的造反队头头，派人去食堂，送来了不少热气腾腾的馒头。这时我们才感到又饿又冷，一哄而上，就着热开水吃起来，匆匆吃完上车，高唱着歌，欢快地交谈着，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我在想，那个支部书记，真的怕我吗？不！怕的是我的上纲上线，怕的是无限上纲上线的文化大革命，怕的是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他心中非常明白这副残缺标语的份量。那时，不管是谁，领呼口号一时领呼错了，就要倒大霉，轻则从此不再使用，乖乖地去劳动一辈子，重则，查一查你祖宗三代，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给你一辈子受用。

这位支部书记就是被这样打败的。

我们的常委会

这次行动虽说成功了，但我认为很不值得。我对王继鑫整日搞这些活动很有意见。在常委会上，我把这些活动斥责为只打经济仗，不搞政治仗。那天我首先提议大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古田会议”的决议，把王这一阶段的活动，指责为单纯军事观点，我提出不能专打经济仗，专门在我们的一号通令上疲于奔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落后于形势。我们要打政治仗，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如何搞斗、批、改，紧跟上海的革命形势。（当时上海的形势是“斗、批、改”。所谓“斗、批”，就是连篇累牍地写批判“走资派”的文章；“改”什么？旧制度什么也不改。说实话，一件一件地解决临时工、外包工的实际困难，更有点实际意义，但这样太容易授人以柄了，没办法只能紧跟“形势”。）王接受我的意见，常委一致通过，终于结束了这种疲于奔命，耗时耗力的活动。

当时我们常委会的召开，没有一定的成规，想到要开完全由费、殷、王决定，临时由殷通知我，事先不知召开的内容，要讨论什么和解决什么问题，要到坐在会议桌旁才知道。不知是王的主意，还是殷的主意，也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的和想法，我们召开常委会必定也通知市劳动局的联络员参加，（这时市委可能出于对我们组织的性质的考虑，把我们推向市劳动局，指定一名处长吴贻荪为联络我们组织的干部，他再派出一名也是姓吴的叫吴永发的接待室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我真不明白，王或殷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提了几次，我们内部的会议没有必要让他参加，何必让他把什么情况都往上传呢？我倒不是怕我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让上面知道，而是我们开常委会，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甚至争吵，这些争吵明显是殷、王之间的权力之争，我们何必要把内部的弱点暴露给他们呢？这以后我们就不再通知联络员列席了，他只是白天跑来询问有什么事需要联络。再过一阶段，市委机关造反派的组织也成立了，这些一般干部自己也在忙着造反，联络员就不常来了，有事我们打电话联络。像这种邀请官方派员参加一个群众组织，而且是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的核心领导班子的会议，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不是常委，但每次必定参加常委会议的还有一位，王继鑫的秘书——郭文美。在总部成立伊始，草头王们在争夺座次时，郭就积极参与了，从这以后，她一直在王的左右，耳鬓斯摩，影响王的一切，也左右王的一切。在常委会上，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言，发表激进的言论，有时可以左右和操纵常委会的重大决策，在她锋利言词下，殷庆宝往往退让。

郭文美的衣着打扮朴素，非常合文革的时宜，一头齐耳短发，秀气的脸庞，时时透出一股令人畏惧的冷气。在常委会上，争论激烈时，她偶而也抽烟。据她自己说，她是《铁道游击队》作者的学生，曾在安庆日报当过记者，她的文笔的确也不错，总部的一些重要文稿就出自她的笔下。她有一个在幼儿园的儿子，丈夫在体育界工作，夫妻关系好像不太融洽，她

极少提起她的丈夫，有谁偶然提起，她总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让人不再说。她同王继鑫可说形影不离，她中有他，他中有她，他们俩人绝大多数时间在愚园路的总部，远离我们，一度在外界造成一种言不清，说不明的关系，尤其是从北京回沪后，扑朔迷离的谣传更让人说不清。

在最初的常委会上，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常委主任费敏璋，被王提议专管外交工作，即专门与工总司取得联络，我和殷也积极支持。王的提议是否有他的私人企图呢？不得而知，我和殷支持这样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我们不像工总司那样，我们没有中央文革的后台背景，可说是什么背景也没有。这样，就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

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此确立我们同工总司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行动纲领了。从以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可以反映出来。

但是从十一月中旬开始总部成立到十二月八日这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断绝了同外界群众组织的一切联络。我想不起，费敏璋在这段时间内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同工总司的接触到底如何？这段时间内，就如我在上面叙述的那样，我们忙于自己内部的工作和内部的明争暗斗。在常委会作出了开除几名常委，不再到基层打经济仗，费专管外交活动，决定召开全市的代表大会，具体由王与郭在愚园路总部致力于筹备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的工作，我则忙于建立分部的工作。而这时上海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

理顺组织系统

十一月三十日，红革会挑起了“解放日报”事件，工总司加入，占领报社大楼，建立了火线指挥部，迫使解放日报停止发行。上海的保皇组织——赤卫队在十二月二日就“解放日报”事件公开亮相，提出“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对红革会、工总司针锋相对地斗争。三方面的人员发动了游行。在汉口路山东路口的解放日报社几十万人剑拔弩张，闹得不可开交。此事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而我们却对解放日报事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原因很简单：一、我们组织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没有政治目的。二、我们内部纷繁的工作无暇顾及。

在王、郭筹备文化广场万人大会时，我的组织工作紧锣密鼓地在开展，已接近尾声。我原来的意图是按上海行政区划分，搞十个区分部，另有一个总部直属的邮电总队，这是由于邮电系统的李林义一直是我们造反时的基本骨干，而且他在总部中的人缘很好，王继鑫曾亲自带队参加邮电系统的造反，树起了邮电系统的一面造反的旗帜，故我承认他们的总队，并

由总部直属。但是各区分部建立后，造反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时髦风尚，一些不乏野心的人，在挤进区分部当头头无望时，就想在所在单位行业系统成立山头，要求直接得到总部的承认。我当时一概不予承认。他们与我力争，以邮电系统的总队已被总部承认为例、要我平等对待，有的则干脆拉起队伍，造成既成事实，也无所谓总部的承认不承认。最为突出的是独立性很强的纺织系统的山头，那时纺织系统的临时工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纺织系统的山头不管三七二十一，顾自向系统内的各厂临时工造反队发号施令。

在各行各业的组织相继成立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作出让步，正式给予承认。这一方面是既成事实，不得不如此；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些区分部（南市和卢湾）独立性太强，我出于保护总部权威的考虑，让行业系统的山头存在，使他们互相制约，削弱一些独立性太强的分部力量。我决定：各区的组织以“分部”命名，各系统以“总队”命名。这样，使各基层的造反队处于分部和总队的双重领导之下。

我的组织工作终于完成，我自豪地在常委会上宣布这一伟大工程。我如释重负，可以松一口气了。稍后，王继鑫筹备的会议亦已经就绪，我第一次全面开动我的机器，把万人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下去。

我们把文化广场的入场券，按区按系统分配，我把杨浦和普陀两区特别给予照顾，多分配一些份额，因为这是上海的两个工业区。这些入场券发放下去，引起一阵波澜，谁都想取得多一些。可见这次大会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临时工能有自己的组织。能在上海的文化广场扬眉吐气地发表讲话，这是十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从未有过的民主！

第十三章 万人大会后

羞羞答答的万人大会发言稿

会前我们曾召集各区分部的头头开会，征求意见。由王继鑫、郭文美物色一些基层同志上台发言，这些发言稿事先均经研讨，反复审阅，就连王继鑫的大会主席发言稿也经常委再三讨论，谨防出错，这篇发言稿是由郭文美费尽心机，化了几天时间执笔起草的，应该说写得好极了。

这篇发言稿。实际也是大会的宗旨：它针对社会上指责我们“斗争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提出的各项要求只不过是经济斗争，完全没有政治意义”的指责，自问“我们的组织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方向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这样一个论题。然后郭文美用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论证，她最好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毛主席语录，她引用了这样一段语录：“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她运用了这段语录，导出如下一个推理：

“临时工和外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残余。雇佣临时工和外包工的目的就是要‘以最少的投资或成本来取得最大的利润。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呢？这完全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利润挂帅’，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与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挂帅’是针锋相对的”。既然这是资本主义的黑货，那么就对社会生产向前发展起阻碍作用，阻碍群众思想革命化，扩大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最后承认自己是在打经济仗，但我们所打的是一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谁战胜谁的仗，这不是纯粹的经济仗，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真难为了郭文美，用她那生花妙笔，把经济斗争归入到毛主席阶级斗争的麾下，为我们寻得一顶保护伞，在当时，这样的推理方法，不能算是牵强附会的。

但是，整个文章恰恰回避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不要做临时工！

文章羞羞答答，极不情愿地绕开了这样简洁明了的一句话。实际上谁的心中都明白，局外人也好，自己也好，就是不能把这句话说出口。这时我想起了姚红，他在外滩的大字报就旗帜鲜明，明白无误地说出：我们不要做临时工！诚然，如果让他写万人大会的发言稿，也未必敢说出这句真话。局外人也明白，临时工造反，就是不要做临时工，但局外人也不愿在正式场合说这句话。

临时工不愿做临时工，这是多么正当的要求。局外人绕开这句话，就能指责我们“为私造反”“打经济仗”，“斗争大方向错了”。在这“假、大、空”说假话的时代，大家就是用假话蒙人、吓人、整人，也用假话来打仗，用假话保护自己。

我之所以阻止王继鑫“打经济仗”，把他的行动贬为“单纯军事观点”，原因是这样搞下去于我们不利。非但不能集中精力搞组织建设，壮大队伍，同时也会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经济口号都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气氛极不和协。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提出打倒市委的口号，不可能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和行动，但我们至少要紧跟形势，

以求得组织的存在。那么从发言搞来看，也仅仅是为自己脸上贴金，披上革命的外衣，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造反派而已。然后用这样的外衣，达到这次民主运动的目的——不要做临时工！

但是，理论上的保护伞是虚无而软弱的，从先秦时代开始就没有一个人能用理论来保卫自己，商鞅、李斯是这样，施洋、李大钊也是这样。虽然我们的组织从未说出“不当临时工”的话，但是，到了六七年二月十八日，中央的通知，把全国的所有临时工造反组织一网打尽！

万人大会

十二月八日晚上，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万人代表大会”，在文化广场准时召开。这次大会王继鑫请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来参加，他们与我们这些头头一样，坐在台上受到嘉宾的礼遇。

我当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为我留有席位，但是我却不愿坐，我的工作人员再三要我去坐下，我只是坐了几分钟又离席。一方面我不习惯坐主席台，另一方面这次大会又分派我负责保卫工作和大会琐碎的工作，不时有人来与我耳语，有需要我立时三刻处理的琐事，请示解决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显得非常繁忙，不时离席，那干脆就不坐了。

王继鑫在作大会主席发言时，其翩翩演说风度博得了满堂彩声，加上郭文美的讲稿，给了王充分的表演机会：“同志们！战友们！你们说，我们这次万人代表大会的方向对不对头呀？（众：对！）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不是一致呀？（众：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将这次大会开好？（众：有！）我们能不能够将这次大会开好？（众：能！）”会议开始不久，这四个众口一词、响亮划一的“对！是！有！能！”台上台下的问答合应虽然是肤浅的，但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是王继鑫的专利，他的拿手好戏，换了别人就达不到这效果。

接下来是费敏璋和下面基层代表的发言，对临时工制度空对空地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虽名为造反派，但并没有红卫兵们那种时髦的激烈行动，没有把市委的任何“走资派”揪来批斗，也没有提出什么当时风糜的政治口号：打倒市委。到了会议快结束时，突然掀起了一个热烈的高潮：王继鑫宣布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为我们的名誉造反队员，殷和费为他们两人戴上我们造反司令部的造反队臂章，台上台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在后台看着这一幕颇为吃惊，这是即兴而作？还是事先就安排好的？看着殷、费、韩、黄四人笑容可掬，紧紧握手的场面，对耶？错耶？说对吧，打倒混进党内的走资派的口号的余音还在空中回荡，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如火如荼，红革会、工总司在拼死与上海市委厮杀，保皇派赤卫队与工总司、红革会几十万人搅在一起，这是一场没有妥协余地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我们却让要被打倒的“走资派”成为造反者，这岂不滑稽？说错吧，没有错，共产党的领导是万万不能动摇的。

全场群众的掌声和会议掀起的高潮，表明我们这支造反大军，确实是一支日后称之为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我们常委的思想和行动局限于自身的利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和政治目的。

望着耀眼的灯光，一阵阵睡意袭来，真困啊！会议行将结束，我急于安排我的工作人员作结束的撤离工作，在后台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录音器材等用具，这时我好像听到王继鑫在会场上宣布着什么事，台下一阵喧闹之声，群情激昂，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在意，急急指挥人员撤离。

回到总部后，已经半夜时分了，我真想有一只床好好睡上一觉，连日的劳累和缺少睡眠，床成了我的第一需要。我骑上自行车向市区东北角的家中驰去，空荡寂静的马路似乎特别漫长，一阵阵睡意袭来，我一面骑车一面与睡神搏斗。快到家了，还有二、三分钟就到家了，一阵轻松，不由自主，放慢了速度。眼皮沉沉的，能睡觉了，马上能睡了。突然我撞上了堆在马路边修路用的石子堆上，连车带人栽在上面，呵！真舒服啊！我混身肌肉放松，眼皮怎么也睁不开，睡吧！这是最好的享受……。大概只是几分钟吧，或许只有一分钟，这是我一生睡得最美的一分钟。醒了才知道睡在路上，觉得身上没有什么痛的感觉，粗粗检查一番，自行车也没有摔坏，骑上它很快到家，轻轻地上楼，一头栽到床上。

醒来已经近中午了，我匆匆离家回总部，自行车不敢再骑了，乘车回总部吧！那时，造反派可以买到不贴照片的公交月票，谁都可以用，我们总部买了后，就几人合用，谁要公出就拿上用，事办完了回来，再交给后来的人用。我也拿了一张。

到总部已经是中午过后了，踏进大门感到一种少有的寂静。人都到哪里去了？走进三楼组织部，杨福海马上迎了上来："噢！小沈你来了就好！今天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一楞，环顾四周，办公室内就他一人。怎么啦！

我一听"立即离开生产岗位"这不是出格了吗？这个责任重大啊！我刚想问是谁写上这一句话的，转念一想：算了，不必问了！杨做事很谨慎，没有殷的命令，他不会自作主张，调令拟好后，必定给殷过目后才发出的。但我又担心这样的命令发出后，下面的造反队头头能有这样的能耐从生产岗位上抽人吗？倒底能有多少人可调动起来？

看来王、殷、费他们对能调动多少人，心中也没有底，只能下此命令，尽可能调动了。再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配合工总司的行动，总要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这是与工总司联手行动，怕什么？调令发也发了，不必有顾虑了。

我问："殷庆宝他们现在何处？"杨说："临时指挥部设在沪西体育场内，所有常委已经

全部去现场了，殷庆宝要你立即前去指挥。”我说：“好！我马上去。队伍调动情况如何？”这是我担心的问题。杨笑笑说：“我打了不少电话，询问过下面，各区已经调了不少人马去了，你快去吧！”

总部，总部，我们总部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带着几个人匆匆乘上 71 路公共汽车前往天山路，上车后得知 71 路已经无法行驶到终点站了，在前二站就要调头行驶，下车后我们只得步行向沪西体育场去。我看到一路上全是没有袖章的工人队伍，排着队在马路上集结，有认识我的人向我打招呼，啊！全是我们调动的队伍！排着整齐的队列，秩序很好，正在耐心地等待命令。

调动十万大军

我边走边听取沿途带队的头头向我报告：“我们接到命令后，马上集合起来，差不多全部来了，是乘公交车来的。”队伍中一个妇女说：“我们是走来的，厂内的卡车我们调不动，只能走来了。”又一个单位的头头告诉我：“我们是从杨浦区赶来的，走了一段路后，在马路上拦下卡车后才赶来的。”

多好的群众啊！这人山人海，这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股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投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确实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指挥下，全国亿万人民，在毛设计和限定的轨道上起来“造反”，发扬了十七年从未有过的民主，一度把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情绪引发了出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造反”，其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内的官僚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但对人民群众来说，官僚层和走资派是一个概念，人民群众造反的对象是党内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

十七年来被严重压抑的民主要求迅速发展，对共产党严重失误的政策不满，临时工、外包工只能在有限的民主气氛中，从经济要求上表现出来，但工总司却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夺权。工总司的做法，是在毛的设计之中的，但要通过权威的信息渠道予以操纵。然而政治上一旦夺权后，其经济要求很快就会反映出来，夺权后的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就是明证。

越往前走，集结的队伍越是多，刚才看到的队伍只是靠在马路右边，占据了半条马路，而现在已经把整条路全占满了。他们全是没有袖章的造反队，也就是我们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部的队伍。

在天山路的后方，也就是天山路以北，在中山西路武夷路口的沪西体育场是我们原定与工总司的集合地与指挥部。因为我们的队伍调动太多了，估计有十万人，只得站在沪西体育场以西各条马路上。

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将沿天山路向西，至古北路后即折向南，由北向南向色织廿四厂大门进发。而赤卫队的人马将由延安西路向西、至古北路由南向北进入色织廿四厂与我们对峙。

我们的队伍全部步行进入“阵地”。而赤卫队是“机械化部队”，他们直接从工厂整卡车整卡车开入“阵地”。这真是“小米加步枪”对付“装甲运兵车”啊！最可怜我们连袖章也没有，工总司的造反队早有袖章，赤卫队是市委的保皇组织，当然要什么有什么（赤卫队一成立，八十万队员马上有袖章）。我们的队员在此时对此意见颇大，不少队员直接而又善意地向我这组织部长提出意见，带着体谅的口吻，要求我尽快解决袖章。没有袖章，在此时此境犹如一个出征的战士没有军装和武器一样！我一面许诺大家一定解决，一面在想，这事该在常委会提出，必须早日解决。

这时传来命令，要求队伍向古北路进发，我随着队伍向前，在走到一条小马路口时，从北面开来的队伍与我们会合在一起，领头的是殷庆宝。我们俩人并肩前进，他一面走一面向我通报情况：“现在已开始进攻，工总司的队伍在我们后面，由我们打头阵”。他又说：“由于你回家，上午你不在总部，常委会作出决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队伍，由杨福海向各分部、总队发出了特别通令。

我说，这些我已经知道了，我要求他告诉我工总司的情况。他说，是工总司的戴立清来讨救兵的，这次行动是在工总司的请求下与工总司的联合行动，王洪文已在现场他们的队伍中指军。我环顾四周，一路走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工总司的人马。

殷庆宝得意地说：“我们这次调动的人马有十万人，我已经大约统计过了，不会少于这个数字。”我们在声势浩大的队伍中前进，为调动了十万大军而沾沾自喜。这是我们总司令部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显示我们存在和力量的一次机会。我和殷庆宝带着得意的神情，跨着大步，带领浩浩荡荡的大军，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杀”向色织廿四厂。

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意识到我们被王洪文利用了。

初冬和煦的阳光已经西斜，我们走出了天山新村的工房住宅区，古北路两侧的零星菜地里，不时有悦人眼目的青绿色的蔬菜映入眼帘，明媚的阳光，碧绿的田野，显露出和平与宁静。我们前方的马路上空荡荡的。我们身后的人群，却以好斗的姿态，走向我们决心要摧毁的保皇派——赤卫队的堡垒，救出我们的造反派阶级兄弟。一边是宁静的田野，一边是喧嚣的人群。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的强烈。

色织廿四厂事件

我们到达了色织廿四厂的大门口，这是一家小型的织布厂，大门朝西开，这个厂规模虽不大，但因地近西郊，工厂的占地面积却不小，厂房之间有不少空地，不像市区的工厂那样挤迫。大概工厂已经被迫停止了生产，听不到织布厂中布机的喧闹声。

我们的队伍拥立在紧闭的工厂大门外，铁制的大门是网眼式的。大门内也拥满了人群，是清一色的赤卫队员，隔着大门，两边的群众可望而不可及。

大门外的马路已被我们的队伍挤得满满当当，再向南的古北路却空空的，赤卫队还没赶到，我们的两条腿赶过了对方的汽车轮子。通过这空荡的马路，不时可以看到延安西路、虹桥路上一卡车一卡车赤卫队的“机械化部队”也风风火火地开到，大批赤卫队员跳下车，由古北路向北推进，但与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百多米的距离，两军对峙。我们对赤卫队的援兵不予理会，我们的目标是冲进大门救出造反派。

双方在门外展开了一场高呼口号的大战，谁也不让谁。呼口号并不能证明谁错谁对，接下来双方互相谩骂，门内的大骂我们是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是一批社会渣滓、政治扒手。门外的骂他们是保皇派，是走资派的忠实走狗。大骂不解恨，又冲向铁门把紧闭的铁门摇晃起来。而厂内的赤卫队员，有的爬到门上，据高临下地骂。一个男青年立在铁门半中央，从铁门上方探出上半身，得意地嘲笑我们：“你们袖章也没有，算什么造反派，全是流氓！”这句话触到了我们的痛处。那人又得意地指指自己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的袖章：“你们是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反革命！”

这一来激怒了我们：前一句已经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后一句竟说我们是反革命，太妄狂了！大家一拥而上猛力摇晃铁门，有的欲爬上去抓他，门内的人有些惊慌，赶紧退下来，大叫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固的铁门纹丝不动。稍停，门内的赤卫队又爬上铁门骂得更为嚣张。那个嘲笑我们没有袖章的人更是得意地手舞足蹈，我大怒，蹭地一下跳起来，把那个伸在门外手臂上的赤卫队袖章扯了下来。门内的赤卫队大叫：“快抓政治扒手，有人抢袖章！”我把袖章随手往口袋内一塞，退后两步，看你们如何来抓我！

不过，这不是办法，形势迫使我要冷静地考虑一番，因为我是头头，指挥这场战斗的人。我环顾四周，只见激昂的群众与门内的赤卫队员隔着大门骂成了一片，队形已经全部乱了。门内的赤卫队员也蜂涌而来，厂区内塞满了人，要想迫使他们打开大门是不可能的。这种僵

持的局面如何了结？

我想找殷庆宝商量，他连人影也不见，看来在这最前哨的阵地上，仅有我一个头头，只有我自己想主意了。我把视线转向右面，也就是大门的南面。这是一排竹篱笆墙（这种墙是用手指粗的竹子五根一并排，相互编排起来的围墙，再涂上柏油，以延长篱笆的使用寿命。几十年来，上海的工厂大都是这样围起来的。到了七十年代逐渐从上海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砖砌的墙）。我走近篱笆墙望进去，是一排简易的棚棚，堆放水泥等杂物，没有人防守。办法有了——把竹篱笆推倒！

我一声令下，马上涌来几百人。不知是谁在我耳边说："这可以吗？会不会被说成是破坏？"这句提醒话是够怕人的！搞破坏的只有是阶级敌人，这顶大帽子是吃不消的，十七年来谁敢干这等破坏啊！这时我一副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由我负责，上！"但又不得不补上一句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把手一挥，人们围了上来。刚才提醒我的话，不无道理。为了替自己找护身符，也为了向大家打气，我向大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接下来我作了短短的动员："为了救我们的阶级兄弟，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必须把竹篱笆推倒。"我手一指："听我的指挥！"人们一拥而上，几百双手顶在竹篱笆上，等待我的号令。

我退后几步大喊："一、二、三——一、二、三——"。我的"三"一出口，人们一齐用力推。顷刻之间竹篱笆和里面的棚棚轰然倒塌，一阵呛人的灰尘冲起，人们大声欢呼起来。踏着脚下的竹篱笆，跳过堆放的水泥包，如潮水般向大门方向的厂区冲去。赤卫队员纷纷后退，这时有人在前面带路，直向厂区东面扑去，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赤卫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随着人流向东奔去。在一幢独立于四周空地的房屋前，只见从里面"解放"出来的造反派向我们奔来，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激动地与我们拥抱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

援救工总司

原来在昨晚，大会快结束时，工总司的戴立清前来文化广场，被我们的纠察拦在门外，由我们的纠察传进一张字条，直接送到王继鑫的手中。这是工总司请求我们支援的求援信。

戴立清是工总司的人，传闻也是临时工，他曾参加过"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发生后的两天，曾有一张铅印传单到过我的手中，上面的落款是安亭事件中的工总司中的临时工组织。无法证实这一组织和这份传单的泡制者是否是他。在我们这些常委会头头中，绝无一人参加安亭事件，我们与戴立清素不相识，甚至没有见过面，在后来的造反中再没有任何

来往。我们与工总司无任何组织隶属关系。绝不是二十年后有人著书立说，说我们“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是戴立清。这一历史史实全盘搞错了，该书作者用文革的思考方式来对待历史。由于四人帮是罪人，那么戴立清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戴亦也罪人，戴是临时工，戴是当然的“红色工人”——临时工组织的司令，那么“红色工人”亦是有罪的组织。作者仍然用文革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无视了历史的真实。单凭这一点，我也要写出这本书，澄清“红色工人”的历史真相！

工总司的求援信要求我们派出队伍前去支援被围在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造反派。造反派和少数红卫兵被赤卫队围困在一幢房中，已经断粮几天了，情况危急！王继鑫立即在将要结束的大会上把此求救信宣读起来，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台下的群众作紧急动员，要求二千名队员前去解围。

群众听到有此等法西斯暴行，全场哗然，群情激愤，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但这支队伍并没有总部的常委带领，仅由几名总部的工作人员带着。群龙无首，在去古北路色织廿四厂的路上走散了一些，到了该厂后与赤卫队发生冲突，结果又散去大部，剩下的少数人被“俘”，与原先被围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和红卫兵一起被关在厂后部的一幢独立房屋内，反而弄巧成拙了。逃回来的人来总部报告了这些情况。

杨福海继续说下去：“今天上午，工总司的戴立清来我们总部，要求我们与工总司统一行动，立即调动队伍前去救人。殷庆宝要组织部调动各厂队伍前去。我对殷说：小沈不在就调队伍是否妥当？殷庆宝说这是常委会讨论后的决定。我就执行了他的命令，已经向各分部、总队发出了书面调令，要求各单位接到命令后，立即离开生产岗位，采用各种办法，前去沪西体育场集中。”

圆脸姑娘

我带着湿润的双眼，离开了他们，转而向大门方向走去，在人群中找王继鑫和殷庆宝。这时厂区内，全是我们造反派，但我不知道厂区的南面是赤卫队退守的地区，我无意中逐渐靠近了他们。突然从赤卫队方面传来一片：“抓政治扒手”的呼声，我扭头一看，有几十名赤卫队员向我扑来。在我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身后，突然冲上来比他们更多的造反队员把我保卫起来。我一看大多是一些青年妇女，她们勇敢地，面对赤卫队手挽手地筑起了人墙，挡住了赤卫队的冲击。

赤卫队只好站住，他们中有人高喊：“就是他！抢袖章的。”又有人大叫：“指挥推倒竹篱笆的也是他。”“抓政治扒手呀！”他们几次三番冲过来，但我前面手挽手的人墙已经迅速筑起了几道，人群随着赤卫队的冲击波而涌过来涌过去，人墙不时被冲破豁开一个缺口，但

很快又被人们拼力修补起来。这时，男造反队员开始向这里增援，他们插向人墙的外围，把赤卫队逼向后退，形势开始好转。

我怔怔地瞧着这些勇敢的妇女，不知所措地站在她们的中间，听着她们的摆布，这种时刻，任凭你是一个怎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任凭你平时有多少英雄气概，在这里全消失了。

我注意到一位身材娇小，长着一付白净圆圆脸的姑娘，是她拼力带着人，首先把我围起来，就快了那么半拍，我才没有被赤卫队当政治扒手抓走。是她指挥人们手挽手筑起人墙，数度人墙被冲开了，又是她拼死在人群中扭动身躯，满脸涨得通红，使出混身的力气才把冲破的人墙再度连接起来，还是她面对重又冲开的人墙，面对冲上来的赤卫队员，把我一把拖走，往接应的造反队员中拖，是她赢得了时间，使大批造反队员冲过来，逼退了赤卫队。还是她拖住我，把我拖离赤卫队防守的区域，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她才把我的手臂从她的小手中解放出来。她一面用手帕擦着额上的汗珠，一面欣慰地说："刚才真把我吓死了，现在好了。"她嫣然一笑，甜甜的圆脸，显得更甜，笑盈盈地看着我。我避开她坦然的目光，在我的四周还随着十几位娘子军，看来她们是一个单位的，是圆脸姑娘带领着这十几个人把我从赤卫队的手中夺了回来。我，一个大小伙子，竟被她们救出来，真感到汗颜。

我没话找话："你们没事吧？"那甜甜的圆脸又一笑，摇摇头。

这时，天色渐暗，造反队员们散开在厂区内，围成大小不等的圈子谈笑议论着，刚才紧张的气氛已经一扫而光。我想起了我的责任，我要找殷、费、王他们，我就在各个人堆中转悠，不管我走到哪里，这十几个娘子军就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保护着我。

在靠近大门口的地方聚集着几百人，有一个人立得高高的，在发表演说，因为远，他讲些什么听不清。这人是谁？我努力靠近一点，似曾相识，噢！是工总司的人。再一看，我们总部的费敏璋也立在他身旁，那么，演讲者大概是王洪文吧。我们推倒篱笆，冲进厂里，救出被"俘"的兄弟之后，他倒来"演说"了，真有一套！正在我疑惑的时候，突然从人群的后面灯光一闪，有人在偷拍照片。人群一阵喧闹，在上面演讲的人大喊："把他抓起来，抓赤卫队拍照的"。人群在一阵混乱中，谁也闹不清是谁在拍照，当然就抓不到人了。人们又恢复了平静，我努力往里挤了挤，没有殷庆宝、王继鑫。这时费敏璋上台演说了。我还得去找殷、王，我退出了人群，向南面走去。

南面的楼房看来是该厂的办公楼，楼前全由赤卫队员把守着。我想那里一定是赤卫队的指挥部。

我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到赤卫队的指挥部闯一闯呢？

勇闯虎穴

我摸了摸口袋，刚才在大门口缴获的一只赤卫队袖章还在。我转身对跟随我的十几位“娘子军”说：“我到那边去看看，你们不要过来。”不等她们反应过来，我就快步向赤卫队走去，走过这一半无人地带，我转身把左臂背着赤卫队方向，以极快的动作换上赤卫队的袖章，我没来得及朝“娘子军”们看一眼，就在不甚亮的路灯下，快步迎向赤卫队。

第一道防线，没有人阻挡，只是对我的袖章看了一眼。我穿过去后，心定了点，把脚步放慢，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

在通向办公楼的路两旁，都是赤卫队员，比第一道防线的人要密集得多。我神态自若地从他们中走过去，快走近办公楼时，两名赤卫队员把我挡住。我不等他们开口，先发制人问：“总部的人在哪里？”那两人不理我的问话：“你是哪里的？”我随口答：“杨浦区的!”紧接着又说：“我要找总部的人，有紧急情况反映。”这两人对我上下看了片刻，其中一人说：“在楼上，”他指了指在楼房外面的木制楼梯，“从这上去。”

我走到楼梯口，把守楼梯的赤卫队员拦住了我，我指了指刚才的两人说：“他们说总部的人在上面，我是找总部的。”他们说不能上去，我说我有急事，必须上去。他们放我上楼了，我好不开心。

我到了上面的拐弯处，一名四十岁左右的女赤卫队员又把我拦住。（这是第四道警戒线了，好森严的防卫!）她问;“你是哪里的？”“我是杨浦区的，来找总部。”

她警惕地审视着我：“你找谁？”

我能说得出谁呢？但我马上接口说：“我刚从杨浦区赶来，有紧急情况向总部汇报。”

她又反问一句：“你是杨浦的？”“我是杨浦的。”她犹豫了一下，让开一条道：“走到底的那个办公室。”说毕匆匆下楼去了。

看来，这第四道防卫线上的女赤卫队员，并不是专司防卫的人员，只是出于警惕性，见我陌生，主动上前盘问。从这点上可以看出赤卫队在个体政治素质上，确实要高出造反队不少。幸好，她下楼去了，如果警惕性再高一点，陪着我进去，那我就露馅了。我一面走一面想，我自称是“杨浦的”看来是做对了，因为这里离杨浦太遥远了，他们一定不会了解底细的。对！我继续这样说下去。

只几步路就到了那间门敞开着的大办公室。不容我再多想了，我一步跨进门。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有男有女，都在抄写着什么东西，从他们的外表和举止看来，都是干部的模样。（赤卫队中党员和干部的比例不小，造反派中就少有党员和干部，我们临时工组织中就根本没有了。）我大模大样地靠了上去，有一人对我这无所事事的人看了一眼，一面写，一面随口问了一句：“你是哪里的？有什么事吗？”

我装出随便的样子，故意往他身边一站：“我是杨浦总部的。来看看。”话一出口我马上意识到出漏子了。刚才还想过，有人再问，就回答“杨浦的”，怎么把我平时习惯用语“总部”漏了出来，合在一起用，成了“杨浦总部”，我对赤卫队的组织编制一无所知，他们有“总部”这么一个名称吗？

幸好，他没有在意，大概他只注意到“总部”两个字，反而对我另眼相看了。想不到赤卫队竟然也有“总部”。这真是“所见略同”，就像世界上的军队大多用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建制一样。

他有点讨好地说：“我们正在整理材料，这些都是造反派坦白交待的材料，总部等着要的。”

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他的话，他又指了指里面的一间办公室说：“里面还有一个是临时工外包工造反司令部的人，我们还在审问。”

我一惊！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里面办公室有一位女同志边做笔录，边在提问。坐在她对面的一个男青年，正呆呆地望着我，我定睛一看，啊——是我组织部的工作人员！

智审叛徒

看来他是昨天晚上的大会后，自告奋勇随着二千人的队伍开到色织廿四厂来，自诩是“总

部的”以号召群众，结果被赤卫队俘虏了。我毫不犹豫地向他走去，大大咧咧地往那位严肃的女同志边上一站。她抬起头来，对我看了一眼，又低下头来写。

显然没有对我产生怀疑，因为有四道警戒线防护的心脏部位，不会再出现敌人了。我平静地看着我的部下，他惊恐地对我看了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沉默了几秒钟后，我想，我该怎么办呢？我发现他局促不安地盯着那女同志面前摊着的几张纸，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大方地把这几张纸拿起来看。那女同志对我看了我一眼，没有反应，仍在写着什么。

我一看那几张纸，肺都要气炸了！上面赫然写着：

“我的认罪书

“我叫×××，是上海橡胶机械厂的临时工，是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部的。我受组织部长沈××的指派来色织廿四厂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下面，他把我们组织情况如实地供述了一番。最后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再为私造反……。”等等。我气得真想刮他一记耳光，这个可耻的叛徒！

我狠狠地盯着他看，他畏惧得低下了头，不时又抬起头，惊疑乞求的目光向我投来，希求我的原谅。这个软骨头！才一天的功夫，又没有辣椒水、老虎凳，就写出这样没有骨气的认罪书来，我能饶恕你吗！

他眼光中又有狐疑，我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赤卫队的头头？哼！你这个软骨头，叛徒，我可是“英雄虎胆”闯入敌营的英雄，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如何镇定自如，如何应付赤卫队的。

在愤怒和得意之余，我想：这个叛徒写的“认罪书”万万不能落入赤卫队之手的，否则赤卫队印成传单广为印发，那就太糟了！我对办公室里外扫了一眼，见他们都在低头写着东西。于是我从容地把这几张纸折好，拿在手中慢慢向外间挪步，这时那女同志偏偏在这时开口问了那混蛋叛徒一句什么，他却像没有听见，瞪大了眼在看我的动作。这女同志一回头，见我要走，发现桌子上的纸张还在我的手中，立刻问一句：“嗳！你是哪里的？”

我脱口而出：“是总部的！”她一听我是总部的，口气转为温和：“这材料你不能拿走！我还没有整理好！”

好一个“还没有整理好”！这些由干部为骨干组成的赤卫队，其素质确实高出造反队一筹，他们把党政机关的一套工作方法，完全运用到这里来了，搞整人的材料，要“整理”后才上报，真是驾轻就熟！只一天的时间，他们就把个混蛋叛徒，当面团在捏。

这叛徒的供词我拿不走了。不能硬来，我只好把那些纸往她手边一放。脑中一闪：现在不能马上走，否则会露出马脚来，同时也要防止我刚迈出门这家伙就出卖我。要吓他一下，稳住他，否则非但脱不了身，还可能更糟。

我开始做起演员，拉起架子，故作镇静对他训起话来：“你是叫×××？”他低声回答：“是。”我又问：“你是从文化广场带人来的？是谁派你来的？”

他没有回答，偷偷看我一眼，又马上低下了头，不敢再说是组织部长派来。我大声喝问：“是谁派你来的？快说！”他嚅嚅地说：“是大会主席王继鑫派我来的。”我乘机告诉他：“现在造反派已经冲进厂里来了，你们的王继鑫会不会来救你啊？”

他抬起头，为难地看着我。我一语双关地说：“欢迎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是时候了，该赶快脱身。我故作轻松地转身离去。（两天后，这个“叛徒”果然又来组织部找我，要求我的宽恕，重新让他在组织部工作下去。我对他说，你的叛徒表现，是我亲眼所见，你亲笔写的认罪书和交待我也过了目，现在你写的认罪书已被赤卫队印成了传单。我把传单往他面前一丢。冷冷地说：“我对叛徒是不会再用的，你可以走了。”）

我出了办公室，向楼梯口走去，突然脑中嗡地响了一声——糟了！在天还没黑的时候，不是有几十人要抓我这个“政治扒手”吗？如果被认出来就糟了。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我真是太冒险了！我不禁混身出汗，无心再去探险和猎奇，刚才的得意全没了。快撤！

想到这里，倒又不敢下楼，如果被下面的赤卫队员认出来怎么办？但不走又不行，硬硬头皮，赶快走了下去。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扫视四周，赤卫队的人数比刚才要少一些，我快步穿过这些守卫在楼前的人群。他们并不阻拦我，只是注意我臂上是不是赤卫队的袖章。

我终于走出了赤卫队把守的区域，快要进入造反派的“营地”了，我一面加快步伐，一面拉下赤卫队的袖章。突然，一群“娘子军”迎上来，一把拉着我就走。我一看，啊！还是那甜甜的圆脸，她拉着我的手臂疾走了十多步，完全进入了我们的“营地”。

我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松驰下来，而她脸上甜甜的笑却不见了，焦急地问："你没有被赤卫队抓起来吧!"

我用轻松不在乎的口吻说："没有，我戴了赤卫队袖章，一直混到他们的指挥部，兜了一圈。"

她惊奇而又崇拜地睁大了眼睛，似乎放心了，又喜又嗔道："你进去那么长时间，真急死人了，我们当你被赤卫队抓住了。"

我被她们的精神感动了，我故意说："有你们在保驾，我能被他们抓走吗？"大家听了欢笑起来，她笑得更甜了，她又说："王继鑫几次派人来找你，到处找不到你。我们等等你不出来，已经向王继鑫回报，说你被赤卫队抓去了。"啊！我感觉上楼才几分钟么，怎么外面已经闹成这样了!发生什么大事？非要这么寻我呢？我焦急地问她们:"王继鑫现在哪里？"她们全都茫然地摇头。

那么总部的人呢？正在我焦燥不安时，一名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我面前出现："啊呀！总算找到你了。"一把拖住："快走！快走！王继鑫要我找你，找了你半天"他把我从娘子军身旁拖开，小声地说："常委他们和工总司一起在和市委谈判。"

哦！和市委谈判？我大喜过望，形势发展得这么快!

我急忙问在哪里谈判，他说："快跟我走!"

我被他拉着就走，连向这些忠诚的娘子军告别也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向这些可敬的女性道一声谢谢！也再没有见到那位圆脸姑娘。

冰心曾说："世界上如果没有了女人，那么就少了 50%的真，60%的善和 70%的美。"我看，我们这个组织如果没有了娘子军，还会少了 80%的勇。

第三次见到王洪文

我随着他急匆匆向厂外走去，到了外面的路边，他拉着我坐进一辆停在路边的轿车。我问："那里来的车子？""市委的。"他向司机招呼一声，小车悄无声息地驱动了。

他说："得到消息，说你被赤卫队抓走了，急得不得了。王继鑫在谈判时，首先要市委保证你的安全，要赤卫队放人，要市委承担责任。市委也很急，派了小车要我们来找寻，现在好了。"

我对他说："我混进赤卫队的指挥部去看了看，不就是不大一会时间么？"

想不到，我一时兴起，为满足自己好奇和好胜的举动，竟促成了我们与市委谈判！转而一想，嗯？我还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我望着窗外，小车拐入我不认识的小马路，已经看不到我们的队伍了，俄倾，车子在一幢不显眼的房子前停下，四周非常安静。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是街道文化站，进入门后一看，是一间平日用作开会和活动的地方，我们总部的常委全在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不认识的人。王、殷见了我，马上迎上来："啊呀！你可回来啦，你是怎么回来的？"大伙都站了起来。我赶快解释说，是去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的指挥部看了看，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王继鑫把我介绍给大家。

市委来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同志，她以女性所特有的关切神情，站起来与我握了握手："刚才我们得知你的情况，非常着急，我和市委商量了你的安全问题。这下好了，没有事就好。"她又向大家说了些要制止事态扩大等话。

王继鑫在我耳边关切地轻轻问了一句："你真的没有什么吧？"我摇了摇头，附耳告诉他，我戴上赤卫队的袖章，混进赤卫队去看看，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待那市委女同志讲完话，费敏璋把工总司的王洪文介绍到我的面前，王洪文夸张地一下伸出双臂与我热烈地拥抱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是一家人。我提议：我们两个组织合并起来，一起造反吧！"

这个王洪文，现在与他的见面是第三次了，第一次在巨鹿路。我不认识他，他避开了我，第二次就是刚才看到他在色织廿四厂演说。我对这位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仔细地打量起来，他的头发留得较低，向后梳的大包头（看得出平时很注意发型），身披一件军大衣（这种军大衣对工总司的头头来说是非常时髦的，表明了他的头头身份，在文革的几年中风行一时），

敞开的军大衣露出了贴身穿着一件大红的翻领运动衫领子，下穿一条小裤脚管的裤子，一双黄颜色、头稍尖的船鞋（当时时髦皮鞋的一种式样）。这身打扮在六十年代是赶时髦的青年的打扮，又是一些不安份的小青年所追求的装束，是上海人称之为“小抖乱”的模样。在服装清一色的时代，这身打扮与他的中共党员和科室干部来说，是极不相称的。想不到这位在全国，至少是全市的知名人物，上海的工人领袖，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仰慕已久的英雄，竟然如此模样，与我想像中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想起与他在巨鹿路的遭遇，不免十分失望，心中对他轻视起来。不！他不是一个正派人物。

与市委谈判

这个会议是由市委出面、召集上海最大的三个工人组织，解决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赤卫队的谈判代表迟迟不来，使市委一直处于被动的不利局面。在我“失踪”的时间里，我们的组织和工总司一直围绕“失踪”，向市委施加压力。我的出现，这一议题自然消失，市委从心里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赤卫队的代表仍然未到，我们就继续向市委施加压力。市委的代表再三表示了对事态发展的忧虑，他们认为上海的三大工人组织已经集结了那么多的人，一旦发生冲突，出现流血事件是不得了的，所以希望各自撤离现场，使事态平息。而王洪文和王继鑫再三强调，这是市委执行资反路线，派遣了工作队，镇压造反派，所以要市委承担责任。而且这次又是市委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挑起了这次事件，因此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责任在赤卫队，是赤卫队殴打、拘禁了造反派。现在赤卫队至今没有人来参加谈判，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市委的代表一直在打“太极拳”，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这样撤离队伍么？虽然我们此举的目的已经达到，被困的造反派已经被救了出来。但就我们这一方来想，总有点不甘心，今天，我们一下动员了十万人，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实力。相反，王洪文却调动不了人马，至少他还没有从解放日报事件中缓过气来。

赤卫队的实力和性质，在解放日报事件与红革会工总司进行了较量中，已经亮相，在事件的前几天是很有气势的，俨然是上海市委的保皇派。但是造反毕竟是大势所趋，于是赤卫队很快败下阵来，或者说是退下阵来。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中，赤卫队头头很可能想以实力来与工总司再度较量，以决雌雄，想不到横里杀出一个实力强劲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救了工总司，坏了赤卫队的梦。

当时我们这几个常委没有从这全面的局势来考虑问题，也根本没有这样想过。不过王洪文心中当然明白，大势的扭转全靠了我们，因此不得不对我们有所谦让，当一直等不到赤卫队代表赴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决不撤出队伍，王洪文表示同意。我们商定：我们两方的队伍在原地待命，不得到命令不得撤离，以此向市委施加压力，逼使赤卫队前来谈判。

我们不顾市委的劝阻，当即由我去下达原地待命的命令。王洪文委托我前去沪西体育场向他的队伍传达。我走出门外，带上几个人坐上那辆轿车，命令司机向色织廿四厂开车。这位在市委开车的司机顺从地按我的要求向附近集结队伍的马路上开去。

一路上，我们的队伍还在耐心地在寒冷的冬夜中等待，这些队伍根本没有开进过廿四厂，他们还不知道“前方”发生过什么，我一路上凡是看到各路人马的头头，就下车匆匆通报一些情况。几次下车上车后，我觉得开一段讲一段的办法不行，这要多长时间才能传达完啊？我们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干脆探出身子，手扶着打开的车门，让司机开慢一点，沿路向我们的队伍喊话：“现在总部正在同市委谈判，大家原地等待命令，不得撤离。”

群众和带队的头头，听说我们在同市委谈判，欢腾起来，这对受惯歧视的广大临时工外包工来说，无异是莫大的鼓舞。我看到了自己的队伍是那样强大，而队伍越是欢跃，我的号召力就越大，在人们的夹道欢呼下，我不断地喊话，有时还喊上几句口号：“踏平赤卫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引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车开到色织廿四厂后，我向厂内的群众也喊了一阵话，然后就掉头向工总司队伍的集结地点——沪西体育场驶去。

沪西体育场内，确有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散乱地分布在场地上，好不容易找到现场负责人，这人是工总司南市分部的头头。我简明讲了谈判的经过，转达了王洪文不准撤离，等待命令的内容，转身欲走。这位头头拉住我说，时间太晚了，人员已经自行散去不少，不能坚持下去了，要求撤离。我说：“我们在谈判会上与你们王洪文约定，问题不解决，绝不撤兵。”他面露难色说，剩下的队伍，反响很大，提了不少意见。最大的意见是饿到现在了。

我问他，你们工总司总共调动了多少人马？他说一万多。我问大约还剩多少？他说大约五千吧。

我看看全场散乱的人群，绝对没有五千。

他为难地表示：“现在已经快近半夜了，我无法控制队伍。王洪文现在哪里？我要直接与他谈。”

我不由同情起他的困难处境，就说：“好吧！那你坐我的车子，跟我去见他吧！”

车开向附近的街道文化馆，望着车外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上的队伍，一股骄傲之情油然而生。我对那工总司头头说："你看看我们的队伍！你们还剩多少人？我们十万人。"

撇开文化大革命的是非，撇开王洪文的人品，从色织廿四厂事件中，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实在低下，在后来的康平路事件上，也可以看到王洪文如出一辙的表现。那么，如果没有 1976 年 10 月的粉碎"四人帮"，他果真侥幸地接了班，12 亿中国人又要蒙受多大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怎么竟会定出这样的"接班人"呢？

工总司二兵团

还是半个月前，大约是在十一月的下旬，我们总部刚在乌鲁木齐中路 9 弄 11 号正式开张的头两天，我正在为各区分部和系统的组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的接待人员引进来三位青年。他们自我介绍是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的人。我对这三位虎背熊腰的人物好生奇怪，他们来干什么？

总部成立后，我把无人关心的接待工作归到我的组织部的接待室，但接待的来访者，要么是不幸的临时工外包工，要么是来询问情况，前来挂钩的基层组织。像这样的人物尚是第一次，所以接待人员把他们引来见我。

我请他们坐下。他们首先询问我们的组织工作，我简单地介绍了一番。他们又问我："你们对其他造反组织的态度如何？"我说："我们与学生组织，像红革会等没有联系，我们对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是：我们两家工人组织应该紧紧团结起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造反派，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工总司的一切革命行动。"

我的谈话中总用"你们工总司"来称呼他们三位，殊不知我错了。

三人中的一位身材最高大的青年（我很幼稚，也不善交际，竟连姓名也不问，所以现在写不出他的姓名）对我说："我们二兵团在安亭事件中是造反的主力，我们的人员最多，力量最强，但王洪文出卖了我们，自顾自回上海后，与市委签字，宣布工总司成立，自封为司令。王洪文自认为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二兵团耿金章也是党员。现在我们二兵团回沪后，驻在红都剧场。"

我听了他们的话，只认为是一般的不满，并没有引起警觉，我插了一句："哦！红都剧

场，不就在静安寺吗？离我们这里好近啊！”

他说：“是呀！我们的人马在红都剧场，请你到我们二兵团来，我们两个组织的头头碰碰头，商讨一下形势好吗？”

我还是木知木觉，只当是一般的客套话，就说：“我很忙，以后有空了我到你们二兵团去。”

“今天晚上来吧！”

我说：“我实在没有空，以后吧！”他说：“那是不是约一个时间？”我说：“以后再说吧！”

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实在太忙了，再说我不善交际。

他们三人沉默了片刻，互相看了一眼，还是那个高大身材的说：“王洪文算老几？他不能代表工总司，不能代表我们工人阶级。他不是工人，是干部，不能代表工人造反派。”

我原来的估计错了，原来他们的来意是来拉拢我们。

工总司内部是不团结的，与总部闹独立的是一、二、三兵团，他们游离于工总司总部之外，自成系统以兵团的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其中二兵团尤甚。他更为露骨地说：“我们二兵团是不好惹的，王洪文是出卖我们的叛徒，我们二兵团希望你们同我们联合起来……。”

啊，他们也错了，找错了人。我是一个毫无野心的单纯的人，在这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越发显出我是毫无心计、极端幼稚的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一场权力之争，在造反派之间也是这样。但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竟非常天真地劝说他们什么，要团结一致呀，不要搞内部的帮派活动呀等等。他们一听话不投机，就告辞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他们那天不是找我，而是找了王继鑫和郭文美，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可能会与工总司二兵团，乃至一、三兵团联合起来，走上“夺权”的政治斗争之路，那么，我们的命运将会是另一个结局了。幸亏当时我们常委之间不太通气，各人搞各人的，尤其是王、殷两人。二兵团三个人来找我，我并没有当回事，自然没有向他们通报。后来二兵团耿金章的力量急速膨胀，也看到我们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上全力支持了王洪文，也就更不可能再来拉拢我们了。直到后来耿金章大反张春桥、王洪文，搞“上海新人民公社”时拉拢上海的

各派组织，费敏璋糊里糊涂地卷了进去。这是后话。

尽管王洪文的工总司与红革全搞了一个震动上海和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但从工总司内部来说，他个人的实力还大不过耿金章的二兵团。王洪文要调动工总司的人马，还不能那样得心应手。色织廿四厂事件中，王洪文在万般无奈之下，通过手下的戴立清向我们求援。这次，他充其量也只调动了近万人，而我们却迅速调动了近十万人，我们是得到群众拥戴的，我们上下是统一的。

我带着得意和优越感，把王洪文手下的头目带到了谈判现场的门外让他等着。

居高临下地对待王洪文

我独自进门后，以盛势凌人的气派，把王洪文叫到边上，居高临下地对他说：“你们的人已经自行散去了大半，已不足五千人了，而这几千人也不愿坚持下去，要撤走。你们工总司呀……”，我没有再往下讲，轻蔑地摇了摇头。

王洪文向我走近一步：“你就说是我王洪文的命令。”

我说：“你的人我带来了，你去听听你的部下说什么吧！”王洪文焦急地出门去和他的部下低声耳语起来。

我回到谈判桌旁，把刚才的经过小声向王、殷谈了谈。他们告诉我，赤卫队的代表来了，只有一个人。我一看，这人年纪很轻，态度傲慢。

等王洪文又进来后，我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气势压人的发言，宣布我们的十万大军，已被安排妥当，在原地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踏平赤卫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对于我的讲话，这位赤卫队代表不置一词，待到他讲话，气焰仍是嚣张不已，对于我们这些造反人物一脸的轻蔑。这下急坏了那位市委的女干部，连连说：“你们不能这样啊！那会出大乱子的，不能这样呀！”

我气得要命，这个赤卫队太嚣张了，我向赤卫队提出抗议，把我刚才在厂内看到的拘禁我们的人员，进行非法审讯，逼迫写交待材料的事，进行严厉的指责。

王洪文、王继鑫相继发言，重申是赤卫队挑起了这次事件，责任在赤卫队。我们要赤卫队代表对这个问题表态。那代表一声不吭。再三追问下，那代表却耍了个滑头，说他不代表赤卫队总部。全场哗然。

我们的王继鑫充分发挥了演员的天才，指着那个代表，指责市委既然把我们召来谈判，赤卫队怎么会派一个不代表总部的人来呢，这分明是市委的阴谋，王继鑫一口纯正的国语和演说风度，在这谈判场上领足了风骚。相对而言，王洪文的口才就大为逊色了。

最后，我们干脆把那赤卫队的代表轰出了会场。临赶他出门时，我们大声说要去踏平赤卫队。这又吓坏了市委的女干部，她站在我们的中间，以一个妇女的姿态（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连说："不能啊！不能啊！不能这样，坐下来，坐下来谈。"

待大家冷静下来后，我在心中分析了实际情况：现在起劲的是我们，自始至终是我们在冲锋陷阵，他王洪文做了点什么？我们总部的头头倾巢而出，而他们工总司的头头只他一人。此时的王洪文已经心不在焉，无心恋战。也许他心中明白，他现在手中的兵，恐怕已经完全撤离，无一兵一卒在现场，但他如果自己提出结束谈判，撤离现场，情理上却说不过去，因为是他请我们来帮忙的。

我指了指沉默不语的王洪文，把我的分析对王继鑫和殷庆宝耳语一阵，最后我说，时间已经半夜 12 点了，再这样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我们该收兵了。他俩同意我的意见。

我们撇开市委的当权派与王洪文商量"后事"，很快一致决定：立即撤离现场，明天由费敏璋和我去工总司，碰头商讨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一份联合声明。（后来很快出了一份红字的铅印传单，内容是揭露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由赤卫队总部挑起了 12 月 9 日的色织廿四厂事件，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由市委和赤卫队总部承担。）我们提出这份联合声明由工总司解决印刷，王洪文一一答应。当时我们的宣传很不得力，没有一套好的班子，没有系统的宣传计划，而且没有印刷渠道，要出一份铅印的传单极为困难。

我们两家商议妥当后，回到谈判桌上，表示同意市委的提议，我们与工总司一方，赤卫队一方共同撤离色织廿四厂及其周围地区。又严正指出，今天由于赤卫队没有诚意，所以结束谈判（事实上已没有了赤卫队的代表），事后再约定时间谈判。谁都明白，这是虚晃一枪，今天都谈不成，事后还会谈么？

井然有序的撤离

我们的决定立即得到市委的赞成，市委那位女干部情绪马上轻松起来，立即派人去通知。

通知谁？我们两家自会通知，她无非是派人通知赤卫队撤离罢了。从这点也暴露了赤卫队是市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

现在轮到我这组织部长想想我们的十万大军怎样离开的问题了。我立即向市委提出：赤卫队是得到当权派支持的“机械化部队”，有交通工具可以马上撤走，唯独我们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派是走来的。现已夜深，要求市委用车辆运送人员撤离现场。

市委立即同意（当然了）。那女干部向她的工作人员下达了命令，她的人员进进出出，忙碌起来。一阵联系后，她询问我一百辆车可以了吗？我问是什么车。她马上问她的随从，手下说是绞接式的大公交车（即巨龙车）。我想了想，我的人员现在已不可能还是十万人，再说已经深夜，调 100 辆车已经不容易了。我说：“可以。分批上车，直到现场不拉下一人为止。”

在我站在车门外一路上要求队伍在原地待命的时候，群众向我反映了肚子饿的问题。我回到谈判现场后，向市委提出，我们的群众已经十多小时滴水未进，饥饿难挨，附近天山新村所有食品店的食物已被抢购一空，时间也晚了，要求市委提供面包给群众充饥。那位女干部立即表示，群众的要求要马上解决，要关心群众。她的工作人员马上出去打电话联系，不多时告诉我，面包很快就过来。

乘谈判僵持时，我向大家招呼一声，说我要到现场去照应群众，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那女干部立刻说：“是呀！小沈你快去吧！我们要关心群众。”

说实话，那天晚上，真难为了这位市委的女干部了！他面对三只各拥有数十万之众的“大老虎”，面对着十数万人的大磨擦，主持这“四缺一”的谈判，既不能让事态扩大，又不能失去原则；既要息事宁人，又要保全市委和赤卫队的面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那个效率可真快呀！待我走出文化站的谈判现场，走到群众集合的各条马路上时，不多会儿整卡车整卡车的面包已经送到现场，我不知道来了几车，只是我的工作人员上车沿途分发下去，有的一个有的两个，按各人的需要分发。

没有人争抢，没有人多拿，人们手捧长方形的面包，美美地吃着，在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说，有这样的干点是很好的享受了。我又叫人送一点到谈判现场，又顺便问这面包是哪个厂的。押车的告诉我，是泰康食品厂运来的。我知道，该厂的临时工造反队力量很强。从这事

件后，只要凭我签字的介绍信，就能从泰康食品厂无偿地拉走我所需要的面包和饼干。

我在队伍中前后走动，慰问群众，向他们通报谈判的情况，大家对赤卫队毫无谈判诚意非常气愤。大伙手捧面包，对解决了饥饿问题非常满意。

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有一妇女发病，晕倒在地，人们手忙脚乱要送医院，却没有交通工具，十分焦急。我的手下就把一辆停在马路边的小吉普的电门拆开，把电线并起来后，由我的工作人员李鸿宾开车，把这位妇女送到华山医院抢救。他是一个“三脚猫”，驾车技术不高，在江苏路口差点撞倒行人，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回到天山路上，有人告诉我，这辆车是市劳动局的于永实的座车，不要还他了，就留下自己用算了。我拒绝了这个强盗式的建议。正在这时，这辆车的司机寻来了，他责怪我们自说自话开了他的车，害得他找了半天，又怪我们拆了电门，给他添了麻烦。我对他解释说，那是为了抢救病人。他还是唠叨个没完。我的手下火了，对他说：“你再闲话多，这车就不还给你了，我们部长用了。”（要不是顾及于永实的腿脚不便，我还真想这么做做。）司机听说我是组织部长，知道得罪不起，这才闷声不响把电门整理好，把车开走了。

从于永实的车和司机在这里，可以推断出，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就在附近，（像他这样的干部附近必定不少）但他没有露面，因为他的级别太低。也许他就在文化站或街道办事处待着。随时听候市委谈判干部的调遣，所以我们要吃的，马上有吃的送来，要车辆马上能调来。还可以肯定另外还有不少干部和工作人员在色织廿四厂的周围，探测动态，随时向上通报。很可能在谈判场外，还有一个市委的大干部在坐镇指挥，随时有工作人员给他通报消息。这场谈判，该有多少市委的人在忙碌啊！

别看造反派蹦得高，真正的实力，还在市委。

第十四章 组织改名

王洪文过河拆桥

第二天，费敏璋约我一起去工总司与工总司搞宣传的王腓力碰头，把两个组织的联合声明内容定下来。我们到了约定的一幢花园洋房。工总司的工作人员要我们在花园中等候，连房门也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见一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拳。费对我说，这人是“炮司”的头头。

“炮司”是上海一个很有影响的红卫兵组织，人员不多，但战斗力很强，就其影响来说，大概仅次于红革会，其头头是胡守钧，后来在炮打张春桥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上海很有名气。

费把我介绍给他，那炮司头头并不停止打拳，仅仅点了点头，算是对我的存在表示看见了。他的杨式太极拳打得很慢。一套拳快结束时，时间用了近半个钟点，我们也就等了这么长时间，王腓力才出来，费敏璋为我们相互介绍。王腓力一点没有想把我们让进屋内的意思，他站在台阶前对我们说：“现在没有空，联合声明已经付印，印好后，会给你们去张贴的。”说完就把我们扔在一边，同炮司头头走了进去。

我那个火啊！我们是为了你们工总司打头阵的，今天我们上门了，竟受到如此的奚落，竟连“炮司”的学生也不正眼看我们一下。

回去的路上，我窝着一肚子的火，埋怨起费敏璋来：你这个书呆子啊！办外交办得如此的糟糕。我一路数落他，他倒非常有涵养，任你怎样说，一点不生气，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来。我心中明白，社会上瞧不起我们，革命，造反就是为了铲除这不平，但我越来越感到就是在造反派中也充满了这种世俗的不平等！我们只是受了王洪文的利用，当了他的过河卒，他一旦感到危险消除，立刻过河拆桥。

我们的组织实在是太稚嫩了。我们“出生”才二十多天。我们来自各工矿企业受歧视的阶层。我们一直做着最下等的粗活儿。兴许是长期的养成使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总习惯说“是”而不习惯说“不”。所以，我们在文化广场第一次以万人大会的形式向社会显示了强大的组织实力之后，当天晚上就以十万人之众诚心诚意地去援救他人，援救我们以为是阶级兄弟的工总司，援救已经有了地位并且曾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王洪文，丝毫没有意识到被人利用。在胜利后竟然与王洪文约定去工总司的总部去商议大事而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总部开这样的会。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拿”别人一把。今天受此番羞辱，能怪谁呢？真是自作自受！

这时，我想起了老杨。如果足智多谋的老杨还在，我们会受此番羞辱吗？

工总司对我们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刺激，我决计要改变我们的形象，提高我们的地位！

首先要改变组织名称！

更名为红工司

经过一天的深思后，认为更改定名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再简称：红工。

不是吗？那时崇尚的是红色，唯有红色才是革命的象征。“临时工外包工”的名称太俗气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为私、为自己的利益造反，在当时左得出奇的政治空气中，对我们太不利了，难怪工总司、红卫兵瞧不起。我们也是上海的产业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起来呢？再说，我们的组织已经足够壮大，已经在上海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到了更改名称的时候了。既然我们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作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组织，工总司已经响彻全国，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又要有区别，那就在工总司的全称中加入红色以示区别。

我在当天晚上的常委会上，把改名的事郑重地提出。

我先把白天所受到的奚落和冷遇，愤愤不平地向全体常委叙说了一遍。郭文美和王继鑫也怒形于色，尤其是郭文美愤愤地说：“解放已经十七年，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显得这样的不平等。他们凭什么歧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为什么要受人利用？今后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热面孔贴冷屁股的事了，我们要独闯我们自己的路！”

我接上她的话头，把我白天经过深思熟虑的名称向大家提出来，马上获得全体常委的叫好，尤其不是常委的常委郭文美拍手叫好。改名获得一致通过。

在众人的称赞声中，我又提出了袖章问题。我说：“在色织廿四厂的行动中，我们动员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又是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组织，但竟然至今没有袖章，群众对此意见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成何组织？人家工总司赤卫队全有了，唯独我们……”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平时他们能抓权的地方，绝不会想到我，能抓的权他们早就抓了。但是我相反，该做的事我也并不去麻烦他们，能做的事就抢着做了。袖章问题他们何尝没有想过？他们也去了印字工场，但只解决了上百只，只够头头脑脑们戴着耀武扬威。要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他们就没有这份“闲心”了。我带着刚才在更名问题上的得意和兴奋看着他们的窘相，一时在肚中暗骂，你们这些无用之辈，只知抢权，打自己的小算盘！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还是殷庆宝，充分掌握了我的性格。笑眯眯地对我说：“这袖章

问题，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殷庆宝在内，一点也没能力解决，只有你组织部长除外。再说这也是你组织部的职责范围呀！这次色织廿四厂事件，全靠你带队冲进去呀！连赤卫队内部也敢去闯一闯，在座的谁人去过？你连‘红色工人’这个名字都想得出，袖章问题也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

殷庆宝一顶顶高帽子飞来，郭文美也从中起哄，恭维着我。我听着挺舒服，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四十万袖章问题的，看来非我莫属了。飘飘然的我一拍胸脯：“由我解决！”

抢红布做袖章

第二天，我召集组织部人员的会议，商讨袖章问题。大家都感到棘手，纷纷说其它东西我们可以用市委拨给我们的经费去购买，但棉布是国家统购统销凭布票供应的，四十万只怎么办得到？

从大家提出的这个简单理由来看，我们组织里的人是比较循规蹈矩的，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有像工总司和学生组织那样胡来。我们向市委联络员提出解决红布问题，遭到市委联络员的拒绝。似乎无路可走了。于是我要大家说说工总司和赤卫队的红布是哪里来的。大家说，这么大批量的布一定是市委批的，我们是小老婆养的，所以我们要不到。

有人告诉我曾有这样一件事：市百一店到了一批最新式的手摇式速印油印机，这种机器的印刷速度要比用当时常见的手推式油印机快几十倍。不少造反组织倚仗人多势众，把这批油印机一抢而空。我们后勤部也抢了两台。但我们有经费，事后开了支票给中百一店结帐。

这不明明在暗示红布也可以去抢吗？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人就接口提议到布店找红布，我摇摇头，一家布店能有多少红布？我们有四十万人，大约估算一下，总要几万公尺的红布。有人提议到各大布店全面收集，我也摇头，涉及面太广，影响就大了，这到底是去抢啊！造成的影响先不说，要动员多少人力才能完成啊？

我想到了批发站，那里数量大，目标集中，只要一次就能解决。

我派出人员到几个批发站去侦察。很快消息传来，在宁波路的市纺织品批发站内，有大批红布堆放。

兵贵神速，我马上把总部的大卡车调上，（这辆车是在色织廿四厂事件的谈判桌上向市委要来的）把总部纠察队的人调了几十人，我向他们布置了任务，言明这次行动是抢红布，

解决四十万人的袖章，但不准伤人，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果断、迅速。我又指定了几个人为现场指挥，各人作了分工。我随队一起行动，但不出面。

大家严肃地点头，悄无声息地上车，完全不像以往的行动时嘻嘻哈哈。这次行动我配备大卡车一辆，小车两辆，摩托车一辆，要求车队必须保持统一速度，不准拉下。为此我把大卡车调在前面，其余车辆在后面跟进。

大卡车上满载着一车人，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南京路上，去抢我们必需的红布。在这特定的"造反有理"的年代，这是革命行动，谁也不认为是在犯罪。在是非已被颠倒的日子里，人们就这样加倍颠倒着是非。

车队很快到了宁波路市纺织品批发站。

停车后，先派人去侦察，红布是不是运走了？侦察的人兴奋地来报告：红布仍在。好！我一声令下，大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一下冲进站内。指挥的人按分工指挥着人们，二话不说，扛起红布就装车。站内有不少职工，被一时吓懵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旋即有二、三人扑上来阻止，店里好多职工扑向布堆，死活不让搬。有人说："你们这是在抢布啊！"我们的人马上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革命行动，你敢阻止我们的革命行动吗？"于是双方纠缠在一起。不管指挥的人怎样喊，快搬！快搬！在乱成一团中，半天才抢出一匹。

不行！如果时间一长，马路上的行人围观起来，就不好办了，我手下的几个头头在看着我，等我拿主意。一个年近六十岁的小老头，大约是这里的办事职员，他不怕威吓，在人丛中阻拦搬运，他用商量的口气拦住众人说："我们支持一切革命行动，我们同意把红布调给你们，但你们总要有一个负责的头头出来，办个手续，我也好向上级交待呀！"我看着他瘦小的身躯，心想这人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大概是这里的负责人，他不能眼睁睁地让人在大白天下把这么多的红布搬走。

该是谈判的时候了，我不能不出场了。我站出来，要大家放下手中的布，不要争夺。瘦小的老人马上意识到我的身份，他把我让到办公桌旁请我坐下。我对环立在我身后的几个小头头看了一眼，扬了扬头，他们马上会意，带人把住了大门，有的则把站内的职工看管起来，形成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当我在办公桌旁坐下后，那小老头却改口说什么，这批红布刚从仓库出来，已经向外地调运了。他们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不能把这批红布交给我们。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

我气极了，不用硬的，看来是办不成，我对身后的人咬了一下耳朵，他们马上走到人群中，对自己人布置任务。我又对那小老头说："我们今天是下定决心的，同意也拿，不同意也要拿，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是说干就干。既然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我转身对我的人一挥手："动手！"哗！人们重又扑向布堆，纺品站的人本能地想阻止，但被我们的人

双手向后一夹，集中逼到了一个角落。有人稍加反抗，我们的人对他们说，这是造反派的脾气。但个别的人还是在反抗，我大吼一声："把他带走!"这下再无人敢阻拦了。

红布顺利地向卡车上搬。这时那个瘦老头，可怜巴巴地向我恳求办个手续。看他可怜，我也不想做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盗，就从拎包中拿出介绍信，当场填写一张给他。他看了看介绍信，又可怜地向我请求，是否剩一半给他，我盛气凌人地不置一词，他见我这样，只得又退后一步说，剩三分之一吧！我连正眼也不看他，大声命令："一匹布也不能留下!"这狡猾而负责任的老头只得写了一张收据，上面写明布匹的数量，要我在上面签名。我迟疑起来，这毕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布，传出去名声不太好，遂用了一个假名，应付过去。

看搬得差不多了，我就出门，坐进我的车中。几乎在这同时，我的手下已风卷残云般的把布全搬上了车。有人来请示：车往哪儿开？我说回总部。

我手下一个叫陆进雪的向我进言："不要回总部，我们装了一卡车的红布，在市中心走有危险，如果其他造反组织来抢怎么办？"他又说：

"红布有了，还要印字，印倒成了问题，不如就直接往印的地方送，而且要靠得住的。"

印字的问题，我早就想过了，只有到我工作的厂里去印，但不能直接把这一卡车布送去，如果我在厂内打不通交道，岂不丢脸？我原想把布送回总部，待我联系好后，再送去。现在陆进雪这样一说，似乎有理，该如何办呢？这时我们的人全上了车，男男女女嘻嘻哈哈闹成一片，不知是谁指挥唱起了语录歌，他们在催我开车了，几个小头头看着我。我不能犹豫不决了，我决定闯一闯我厂里的当权派："开车！唐山路。"

我们的车队出发了，摩托车、吉普车、轿车、大卡车鱼贯而行，浩浩荡荡驶进了我工作的厂里，而且还有一卡车的人！我把车队停在车间前的大道上，惊动了厂内、车间里的人，有认识我的上前与我打招呼，我匆匆一一招呼几句后，又对手下的几个头头交待了几句，急忙奔向大楼党委办公室，直接找党委书记。

厂党委书记的礼遇

当我踏进党委办公室，似乎他们已经接到下面的汇报，已经在等候我的"光临"了。党委秘书魏跃庆迎了出来，一面请我落座，一面倒茶。党委书记笑容满面，一迭声地说："坐！

坐!坐!”(如在平时,一个工人尤其是一个临时工,要想得到如此的礼遇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当我坐下，大家客气了几句后，秘书说：“你很忙，今天回厂是……”话没有再说下去，书记和秘书看着我，等待我说明来意。嘿，他们比我还心急。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回厂，请范书记解决我总部一个大问题。”原来满脸是笑的范书记，顿时收敛了所有的笑容。我仍然说下去：“我今天送来一批红布，请厂领导安排生产，印制我总部的袖章，我需要四十万只袖章。”

这位党委书记一脸的正经：“厂里的生产计划，都要公司安排……”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铃响了，秘书接电话后，向书记看看，对话筒轻声说：“正在谈，现在不能收下……等一等再说。”搁下了电话。

我明知是我工作的车间的支部书记来电话请示，这些红布该不该收下？这明明是拒绝我么！我不要听党委书记解释，我说：“我不管什么公司计划，你也不要用公司来搪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对革命造反派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衡量一个共产党员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反路线一边，……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们。”范书记说：“我们当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但是这事一定要请示公司党委……”

我一听来气了，不施加点压力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是说到做到。你什么时候印好，我们什么时候走。今天我们的人就不走了。”说毕我就拿起电话听筒，要总机接（本厂的）临时工造反队。这下他们慌了，秘书按住电话，劝我不要打电话，有话可以好好商量。但我不听，还是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丁胜成，我把情况对他谈了，要他马上去通知我带来的人，把红布卸在缝布间，今天不走了，什么时候印好，什么时候走。我故意这样大声嚷嚷。放下电话，范书记开口说：“我们还是要请示公司的，你也必须办一些手续，而且加工费也要算的。”他只能以退为攻，用加工费为难我了。

我说：“这都不成问题，加工费我可以要市委来付。”我又一想，不对，这句话可能反而使他缩回去，他一定会认为我在说空话来搪塞他，就赶快又说：“我明天请市委的联络员来商谈，”我又故意抬出联络员的身价让他放心：“市委联络员是位处长，他明天来会带来市委的介绍信，到时你可不能再推脱了。”这下书记爽快了：“这样好办！这样好办!”

这时丁胜成赶来请示我：“布已经卸下，人员安排……。”我对他说，在原地待命。他走了。我站起来，对党委书记充分表演了一番造反派的脾气：“布已经进缝布间了，请你与车间联系，另外你必须马上安排生产，我在这个星期内要拿到手的。”书记说：“等明天来了再谈吧!”我说：“不！明天我们一定会来的，你今天就安排下去，我在这几天内一定要拿到袖章。”

“这有困难，先要刻花筒，刻制花筒，先要图案室设计，雕刻间放样、刻制，工艺很多，这你不是不知道。”

我毫不客气地紧逼着他：“正因为要刻花筒，所以要你今天就安排生产。”我重又坐下拿起纸笔，把更名后的：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字样和尺寸大小留下，“明天上午市委联络员会准时来的。”

说完我就要走。他们主动向我伸出了手，我也伸出手握了握。

一个中型大厂的党委书记在送一个工人给予握手言别的殊荣，只有在文革中的此时此境中才能获得！

我同在门外等我的丁胜成向楼下走去。在车间外，我的车间支部书记在等着我，我不待他开口，就告诉他，已经同党委谈妥，这些布就卸在这里了。我又对在场的黎伯昂和丁胜成两人说，这些布你们要负责守住，要督促在这三、四天内印制完毕，每天用电话向我通报生产进程。我匆匆上车，带着车队回到总部。

晚上的常委会上，我高兴地向大家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旁听我们常委会的联络员认真地记下了我的要求：明天上午 10 时，请吴贻荪处长同我一起赶到上绒厂，带上必要的介绍信和办理加工的手续，支付加工费，必须在这三、四天内完成印制任务。

他记下后，又马不停蹄地连夜去传达我的要求。第二天早上，那位处长又同我通了一次电话，互相补充了一些细节。随后在厂党委办公室内，很顺利地办妥了问题。比我预想的日期要快。

几天后，上海的大街小巷、工矿企业就有了四十万佩带“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队”袖章的工人。

红工宣言

我们的组织正式更名后，费敏璋又重新写了一个新宣言，这个宣言印出来后的署名日期为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个宣言要比前一个宣言写得好多了，是一个颇有文采的“文革文章”。

新宣言抛弃了前一个宣言中“临时工、外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残余，造一切不合理制度的反！”的不合时宜的内容，以气吞山河的大手笔书写道。

望长空，红日高照；看大地，红旗飞舞。下二段道明在新的形势下，宣告更名。紧接下来以五个“红色象征”为段落的开头展开全文：

红色，它象征着“五四”“五卅”运动先烈的血迹……。

红色，它象征着兴业路——党“一大”内的明灯，井岗山上的红旗……。

红色，它象征着天安门广场上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巍峨耸入云霄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红色，它象征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

最后总结为：红色者，即人类梦寐以求、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

“红色工人”的光荣名称正凝聚着先烈的遗志，人民的理想，主席的期望，历史的使命和我们的志愿！

正是这个宣言中的“历史的使命”，这个无法直接道出内容的“历史使命”，指导了我们100天的造反史。

“红色工人”这一组织名称，从我创造发明到被每个人接受，是这个组织成立到结束，唯一的一件没有任何人反对和提出异议的事，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一致拥护，这大概也是我在文革中创造的一个绝无仅有吧！从此“红色工人”、“红工司”或者“红工”成了组织的响亮简称，成了临时工外包工的代名词，成了大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庞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编纂文革词典的话，“红色工人”、“红工司”、“红工”这些名词必定要被收入。

新宣言虽然写得气势恢宏，但是最后一句“历史的使命”，还是道出了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组织并没有质的变化，以后我们在一系列关键时刻，都充分显露出临时工外包工为本阶层的利益而造反的本质。

恰恰是这个仅仅为了求生存而造反的组织，被首先扣上了经济主义的大帽子，被中央最早取缔。

那么？上面需要工人组织搞政治斗争吗？当时看来，似乎是的，要你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批判这个、批判那个，还要你站在家门口，看到全世界。但实际上，只是跟着“伟大战略布署”冲过去、拥过来，连什么是政治都没有搞清，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到头来，被打倒的一个个都扶上马（他们的确不该打倒），最终监狱里关着的，除了几个原本是官，其余都是工人，是在造反中不按照伟大战略布署走的头头。所有的制度，包括临时工制度，几乎被原封不动也沿袭下来，中国历史再回到原点，重新运转。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国门，我们才看到世界历史在这个十年中走了多么远。

当时我这个极其微小的小人物不可能看得这样深远，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为了求得组织的生存和受到工总司的冷遇，使我形成了一套模糊的思想体系。从最初的反对王继鑫的“单纯军事观点——单纯的打经济仗”到把组织更名为“红工司”，我的意图是改变我们的形象，纳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轨道，唯有这样，才能有我们一席之地。我这时的思想体系十分稚嫩和浅薄，不可能有一套理论和纲领使常委们接受和付之行动。我只能在常委会上的争吵声中，把我模糊的想法在乱烘烘的争论中零敲碎打地提出来，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本人也把握不了自己，本能地刻意去追求我们的“历史使命”。但也正由于我这个“阶层”的本性，使我天然地拒绝了王洪文的拥抱，不至于在文革中走得太远。

第十五章 机关琐事

宣传部和政治部

经过了上述一系列事件后，我的生活开始平稳起来，一度过起了“机关”生活。

十二月八日，在文化广场的大会上，王继鑫宣布组织赴京代表团。这是他与郭文美的计划，其内容和目的，从来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他们有他们的私心和目的。猜测起来，无非想进京找到一举成功的捷径，说到底，还是临时工造反，去完成“历史使命”。

赴京代表团的成员，由各分部推荐组成。王继鑫把劳动局的处长吴贻荪一起带走，总部秘书处的郭文美、骆江华，政治部的王英、王伟，他们一起随王继鑫组成了几十人的代表团，王继鑫自任团长，扬言不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决不回沪。他们带着这伟大的誓言，在中旬离沪北上。

殷庆宝的宣传部，人员最为庞杂。为了稳固他的权力，他先是把两个在他部里的常委开除出总部。由于这两人无丝毫能量，因此并没有引出什么风波。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把蒋瑞根，林新中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开除出总部。这两人被清除的后果就不同了，他们是有能量的，在外面网罗了一批势力强盛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以南市分部和卢湾分部为基地，在六七年一月中旬开始，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揭发常委“罪状”的传单满天飞。这是后话。除此之外，看不出宣传部在平时的宣传工作中有什么建树。连最简单的在马路上刷大幅标语也不及其它组织。文革时期，尤其在关键时刻，大幅标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制造舆论，或对某一事件的组织表态的最醒目、最简洁的方式。因为我们组织的大幅标语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都软弱无力，所以就不能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是殷庆宝的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宣传中缺乏政治性和纲领性的目标，所以无法与时代要求合拍，只能停留在临时工造反的层次上。但就是这个临时工造反的内容，也没有很好地宣传。

红革会的《红卫战报》早就在上海出现，为了要同党报《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引发了解放日报事件。在事件后，工总司在十二月廿八日创刊了《工人造反报》。还有一些造反组织也相继出了自己的小报，而我们却不能。直到次年的二月六日，我们借助《新民晚报》内部的力量，才算出了一期《红工战报》，一期不伦不类、无人要看的报纸。

总部设立的政治部，更是离奇和可笑。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一个无所事事的部。当时排座位设这个部那个部的时候，我们这批临时工、包括那个已经悄悄隐去的老杨在内，都不会知道在机关和企业中的政治部或政治处，主要是管理干部人事调动和组织发展的机构，也就是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如果设了政治部，那么它就要下辖组织处、人事处和宣传处，如果单设了组织部、宣传部，那么政治部就不必再设。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政治部，大概是懵懵懂懂地以为革命造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所以应该有一个政治部来统帅一切吧！但是常委们谁也不会听命于政治部的王伟、王英两个庸人的“统帅”。这对男女确实也没有干出过什么业绩来，反倒是在日后被反对派捏住了他们亵渎了神圣“政治”的种种话柄。他们俩人也随着王继鑫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后来在 1 月中旬回沪后，形同虚设的这个政治部，实际上消亡了。

总部的“毒瘤”

在总部的工作逐渐走向正轨的同时，需要提及的一个部门是总部的“大队部”——纠察大队大队部。这个机构的设立和名称的确立，完全是殷和王的主意。但是它的班底，倒是我曾领导过的人员，就是以在风雨操场造反时保卫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娘子军们已散去回原单位）。总部成立后，我无暇顾及这些忠勇的随从，他们就落入了殷庆宝和王继鑫的控制之下。说实在的，这些人员是典型的乌合之众。其中一些素质较好的人，不满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大都陆续离去，剩下的称之为地痞流氓毫不为过。他们文化素质差，少数人员以总部的名义在外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吆五喝六，形象实在欠佳。再看看他们男女混杂，调笑不已的乌烟瘴气，把整个组织的形象破坏了。一些偶尔来访的人都为之侧目。

组织部的人员和一些基层头头不时向我表示了对大队部的忧虑，我也耳闻目睹了这些男女的丑态，但我已经不能控制他们，更不用说改造了，就连他们的队长陈铭声和朱力军我一时也拿他们没办法。朱力军还是一个正直的人，陈铭声的为人要稍差一等，他是王继鑫和郭文美的亲信，又随王赴京，陈郭两人时以姐弟相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队部时时表现出流氓无产者的为所欲为，时常结伙拉帮，气势汹汹地向常委造反，提出一些蛮横无理的要求，在殷、王的姑息之下，一次比一次闹得气焰嚣张，自成了他们的帮派天下，混他们的“革命造反”的“流冠生涯”。就是在大白天我也见他们男女合盖一条棉被，或睡或坐，调笑、打牌、吸烟，这就是他们在值班，在做警卫总部的勾当。

后来实在名声太臭，无数次的所谓造反，闹得总部不得安宁，殷、王对他们几次整顿、精简也不见好转，反倒助长了内部的帮派斗争。最后在“红工司”四面楚歌，每况越下，摇摇欲坠时，为了安抚和拉拢各区分部，在扩大常委会时，反倒把陈铭声也拉进了常委内。——可以说，这个“大队部”是寄生在总部的一个毒瘤。

兢兢业业的李衍清

总部的后勤部，虽然部长是草包钱桂芳，反倒是为总部做了后勤方面的实事。由于我的提议，我们的经费不再用联络员送来现款的方式收受，我们建立银行帐户，健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会制度，制订了一套收发规章制度。这些制度，为日后拯救我们这些常委立下了功劳。

这得力于钱桂芳手下的一个中年会计李衍清，是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严守现行的财会制度，尤其是在以后纷乱的“打、砸、抢”的动乱中，妥善保管了帐册和单据，老李在总部日后的“内部造反”——“1•13 事件”中，奋力抢救了帐册和单据，把它们转移到愚园路 67 弄 43 号一幢被抄的资本家房屋中隐藏起来，又在以后几次针对总部的“打、砸、抢”的浪潮中，忠心地保护了这些帐册。

为了保护这些帐册，这间房屋作为极端保密的地点，只有为数三、四个人知道有这回事，但却不知道具体地点。正因为这样的严格保密，所以这间房屋一直被保存了下来，在六七年二月组织解散后连“官方”也没有发现它。这间房一直在李衍清的手中，到了以后重拉队伍时，他把这地方交给了我们，成了我们唯一的活动地点。

后勤部完全有赖于老李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钱桂芳这个草包才得以安坐在他的部长位子上。他虽觊觎我这组织部长的位置，却没有能量像殷庆宝那们从正面向我进攻，安插人员进来。亏得这位草包想出了一条绝妙的“高招”——把他的老婆塞到我身边来，美其名曰：“秘书”。也许他自忖这样可以夺取组织大权。

我不要女秘书

那时在造反派中，头头几乎清一色是男士，而头头大都有女秘书，对此，社会上必然有风情的传言。想不到那时我的脾气真是出奇的好，对于像殷庆宝和钱桂芳他们这样处心积虑的算计我，我竟虚怀若谷，大度地容忍了，我不愿看到内讧出现。对这位草包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塞过来做我的秘书，我冷然处之，我拒绝了秘书的称呼，只答应她是一般工作人员。这位女同胞一来就从另一位姓徐的女工作人员手中，把总部介绍信抢到手，夺取了开介绍信的“权”，似乎认为这样就抓到了组织部的大权。这位草包的夫人，微胖的满月脸上，一笑就浅浅地显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小小的圆嘴吐出的声音是那样的软糯而灵快。她喜欢挨得很近与你讲话，头上的秀发不时撩拨着你的头颅，让人发痒、发麻，一股女人的气息随即通过我第六感觉让人晕眩。不行！赶快立起身，扳着脸，以不耐烦的口气，打断她的话，命令她此事该如何如何办，那事该如何如何办，挥手赶走完事，或者是我匆匆逃走了事。我处处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不热地对待，从不允许她跟随我，只让她在组织部的办公室中死守台上的两只电话。如果我是放荡的花花公子，对于这送上门的便宜，有不贪之理？这位草包必戴绿帽无疑。

一天早上，我皱着眉头，捧着我的左手。我痛苦的神色马上被她发现了，问我：“怎么啦？”我随口说：“大姆指肿得厉害，昨夜痛得一夜天没有睡好。”她关切地伸出胖笃笃的小手来，把我的左手握住看了又看，笑靥消失了，啊呀！啊呀地大呼小叫道：“啊呀！啧！啧啧！指甲下全是脓，不好了！这是蛇头疔。”

我不经意地抽回我的手，肿胀的大姆指其形状真像一只昂头吐信的蛇头。她睁大了双眼，焦急不安、又软又急地连问我：“已经几天了？去医院看过吗？啊呀！为什么不早点去看呢！唉！蛇头疔真痛啊！现在痛得怎样？”我捧着随脉膊一跳一痛的左手，自管开始我一天的工作。见我不再搭理她，只得讪讪地走开。但是当有人进办公室来，她就不断地告诉人：我怎

么怎么了，从侧面向我进言：马上去医院治疗。

上午在忙忙碌碌中渡过，中午，手肿得越来越厉害，看来不去医院治疗不行了，再忙也要去。

下午三、四点钟我走进了附近的华山医院，外面是阴天，候诊大厅光线暗淡，空无一人。我挂了号，外科诊室的走廊里更静。走进外科诊室，只有两位医生，冷清地在看着医学书，我挑了靠门的那位医生，把病历卡递上。那医生望了望我左臂的造反队袖章，我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看："甲沟炎，要手术。"简洁地吐出了这个字。我说："好。"他立即开好门诊手术单，示意我去付费。待我付了费回转来，他已把手术包准备好了。医生和我谁也不发一言，打麻醉针，拿出手术刀，娴熟地切去半个指甲，除去大量的脓和腐肉，再用纱布包扎好，默默地把一张已开好的消炎和止痛药物的处方给我。我无声地接过方子，离开了外科诊室，在空无一人的候诊大厅付费领药。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快，最迅速的门诊手术治疗，后来再也没有只有我一个病人在看病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好像把人类的疾病全赶跑了。事实上疾病总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牛鬼蛇神"们不能去看病；"革命群众"狂热得无心去看病。和医院的冷清可以比拟的是公园。在文革的高潮下，养花爱花被斥指为资产阶级情调，因为公园里小桥流水，花花草草，同社会上充满了杀机的阶级斗争极不调和，所以游人也比往年稀少。同样道理"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从各自的处境出发，也无心去欣赏它们。后来被斥为消遥派的人们（他们什么派也不参加）为了逃避这恼人的尘世，曾在公园这个"世外桃源"寻求短暂的和平。但是一纸禁令，全市所有公园停止开放，所有的影剧院全部关闭（电视对绝大多数来说尚不知为何物）。——想想看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吃、睡和劳动，除此之外，不能享受什么。要么去搞阶级斗争，要么就象畜牲一样劳作，人性被严重压制和扭曲，达到了令后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这时候候大厅越发昏暗，走出医院门诊部，方发觉天空阴沉得很，冬天的阴天，失去了阳光，更令人感到压抑。但是我手术后，除去了疼痛，混身轻松。我手捧缠着纱布的手回总部，走进办公室。

胖胖的圆脸迎了上来，关切地说："怎么啦？要紧吗？"我淡淡地说："开了一刀，剜去半个指甲。"她又大呼小叫起来，见我并不领她的情，讨好地说："你姆妈打来电话，我告诉你姆妈说你去医院看病了，你姆妈说明天来看你。"我心里真怪她多事，一言不发。

第二天上午，我母亲大老远赶来，看着我缠着纱布的手，问我去医院医生怎么说，我说

没有什么，是指甲下生了点脓，医生替我把脓排去就好了，请母亲放心。可是母亲不信，说："昨天我打电话来，接电话的小姑娘告诉我，说你手上生了疔，痛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要死！胖圆脸成了"小姑娘"了。我说："没有的事，就是有一点脓，发炎了。"我母亲又喃喃地说："那小姑娘倒蛮好的，电话里听伊也急死了。"坏了！母亲误解了，我只得解释："是呀！早上我在办公室里对大家说痛了一夜，所以你下午来电话，他们就这样说了。"可是母亲还是喃喃地说："迭个小姑娘电话里急煞了，我也急得来看你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没法说什么。我不想对她老人家挑明：现在坐在电话机旁的那个胖女人，就是电话里那个"小姑娘"。幸好，杨福海来解围了，寒喧了几句。谈了点家事，把母亲送上车。

这位草包的夫人，给我闹了这么个笑话。

从此之后，我对"秘书"两字敬而远之，绝对不敢用什么女秘书。但是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事无巨细，全要我亲自过问，心目中真想有人来分担我的事务性工作。

我的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李鸿斌，是黎伯昂介绍来的，说是他的好朋友（实际上是点点头的棋友），能力非常强，经历不一般，我信以为真。但很快我发觉此人的特长仅仅是善于吹牛，把他的个人经历吹得非常神秘奇特，什么父亲是高干，他在部队干过侦察兵，又在公安局中干过，专干反间谍活儿。他吹得太不着边际，，倒使我生出疑窦来，使我逐渐疏远他。而这人天方夜谭式的吹，却受到王继鑫，殷庆宝的赏识，后来被他钻进常委班子。另一个是踏实、忠诚的杨福海，年纪要比我大十岁多，比较老成，我越到后来越来越倚重他，把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委付于他去处理，此人确也分担了我大量的工作。他时常在人前嘲笑那个殷庆宝安插来的刘姓办公室主任，笑他要夺权，但没有权。言下之意，他杨福海不用夺权，我倒把权送到他手上；杨也常自诩会用权，可能是在笑我不会用权。他的话的确一言中的，我确无野心，没有心计，不去想也不会施阴谋，从这点说确不会用权。

有了杨福海，面上的工作我全放给他，下面分部、总队有什么事，他都处理得蛮好。他善于顺着我的意思，再掺入他的意见，指导下面的工作。有了他我可以抽出时间在外面跑，从而干了几件大事。

正因为我在外面活动，极感需要有一个人跟随在我的左右。我心中计划最好是"一文一武"两个男性秘书。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就住我家附近的中联村，我请他出来，希望在文笔方面为我出力，但这位朋友忠厚老实，胆小谨慎，对无产阶级政治害怕至极（他的母亲在红卫兵抄家风盛行时，害怕得上吊自杀了），怕参加造反活动后，会累及他，所以来总部两三天后就告辞而去。另一人选是人民印刷×厂的青工，我看中他的是头子活络。原想发

挥他的社交本领，以弥补我的不足。但他活络有余，却不甘寂寞，言辞中常流露不甘心在我的手下干简单的工作，抱怨我不给他权，不委任他当有职有权的头头，一星期后他的耐心丧失，也不辞而别。这两位男性秘书走了，又剩下我一个人。算了，我不再尝试找什么秘书，独来独往，一人忙忙吧！

在一次常委会上，费敏璋说起，现在造反派头头，都要配备秘书，现在工总司的头头们已经这么做了。言下之意，好像这是规定或者说已经风行了。隔了几天又一次会上，好像是殷庆宝提出的，说我们常委必须每人配备秘书，还向我推荐了一位女性，我一听是女的，就决定拒绝。但不等我开口，人已经来了。

神秘的女秘书

我对她看了看，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四十岁出头的样子，留着不经任何修饰的短发，他衣着朴素，一身蓝布衣裤，洗得清清爽爽，脚穿搭攀黑布鞋，组合成一位诚实忠厚的中年妇女形象。她的外貌太普通了，实在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

她稳重地向我礼节性地点点头，庄重地坐在我的对面，难得脸上有笑容（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我似乎没有看到她笑过）。我思索了几分钟：这人要，还是不要？这是位中年妇女，与我几乎相差一代人的年龄，而且她气质庄重，我和她之间不可能发生头头和女秘书必有的风流传言。

我在造反之初，就为自己立下两条戒律：1、不能犯男女关系的错误。2、经济上一定要清楚。我自信即使有了这位女秘书，也不会成为外界产生流言蜚语的条件。再说这是常委会上决定的，每人要配备秘书，又是他们为我配备的，而我的工作确也需要人。我迅速思考一番后，遂同意收下。于是我也就有了正式的秘书。但奇怪的是，后来费和殷都没有配备秘书。

在三楼有一间房，原是王继鑫使用的，他在去北京时，把这间房的钥匙交给我，我就把这间房交这位女秘书。我不知道是她的个性不合群呢，还是她不愿与这些临兄们为伍，我印象中，她一个人在这小房间的时间多。

有了她，我就把要动笔的文章交给她，我口述一遍，请她写一篇发言稿。她落笔很快，把我的口述要点记下后，根据我的意图和思路，很快成就一张文稿，送来请我过目修改。我稍提一些意见，她当即修改后，再请我定稿。我首肯后，不出半小时，一篇腾清后的稿子就送到我的面前。在拟稿时，她从不把自己的意见添加进去，从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完全按我的意图和思路写文章，如果我看了文章，认会漏掉了什么，或者我的意思表达不完整，或者

提出修改意见后，她能立时三刻按我意见修改出来。此人确实有干秘书工作的才能和经验。岂止有！她完全是一个正宗的秘书！从她的举止、谈吐来看完全是一个机关干部，我的内心一动，她会不会是市委或公安部门派来，打进我们内部的人？

可能我的内心活动被她看出了，或许从我赞许她的文章写得好，写得快，写得一手好字，辨出了我的疑惑。一天时近傍晚，在完成了我要求她的工作后，她主动向我解释她为什么参加我们的造反行列：

她丈夫是部队的干部，部队远在四川，夫妻长期分居，丈夫待她不好，感情破裂。她感到苦闷，感到痛苦，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投身革命，摆脱烦恼。

我听着她的简单叙述，开始还感到局促不安，我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对婚姻、家庭的矛盾彻底是个门外汉。尽管是一个比我大了一代人年龄的女性对我谈，我仍感到非常不习惯，甚至有些如坐针毡的滋味。然而听到这里我想起了小说《青春之歌》，不禁微微一笑。她把我们总部当成了逃避不幸婚姻的避风港，由于婚姻不和谐才走上“革命”道路，这不是与林道静投身革命的故事很相似吗？虽然时代背景和情节不一样，但性质却是一样的，多么富于文学意味和浪漫主义的味儿啊！

相反，这样的解释更加重了我的猜疑。我试问道：“你出来参加我们的造反活动，是很辛苦的，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你能行吗？”她马上回答：“能！能！我就是要用繁忙的工作来忘掉自己的痛苦。”我又问：“那你的孩子不是要你的照顾吗？”她说：“孩子都大了，在外地的大学里念书。”

她讲得太绝了——丈夫和孩子都在外地，毫无牵挂，这反而更不真实。我沉默了一会，又故意问：“那你为什么不到工总司去工作呢？我们在社会上，到处受人的歧视。”她低着头说：“我也是临时工，我要为临时工做点事。”

这些话并不能消除我的猜疑，尤其最后一句话，反倒是画蛇添足，露出了马脚：她如果是一个临时工来总部工作，必定要求我出具总部的公假证明单，盖上总部大印，由本人带回单位请公假，这样才能一天到头呆在总部而不用到原单位上班。大概她后来也知道了这样的惯例，于是，又向我解释，她目前没有工作（当然也就没有工作单位），可以每天在总部工作（当然也就不用总部开公假证明）。但不管她如何说，我认定这人是市委派来的。因为她的干部风度、老练的文秘能力和一手好字和好官样文章（我们国家的官场，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行文的套话，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熟练运用的。只有身在官场、不时动笔的人才能驾轻就熟），说明她绝不可能是临时工，而女临时工可说全是文化水平低的家庭妇女。况且，她说话时绝没有半点工人的语言和工人的气质。

我打定主意，来吧！我光明磊落，我绝不隐瞒我的观点和行动。

主意一定，我就什么事也不瞒她，每次晚上召开常委会，我也把她带到开会的场所，成了我名符其实的秘书。我吩咐她：你要做好会议的记录，她就在一旁认真地记录。在我们为某一件事争吵不休时，她从不发言。我一时想不起的事，问她，她就简短地提醒我，却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时的常委开会，已经没有市委联络员参加（因为我把联络员赶走了）。我把这位秘书带进常委会，了解我们核心的一切，不管你是不是市委或公安局派进来的，我们丝毫不隐藏什么，反正我们没有阴谋，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革命造反的，如果你是市委或公安局派来的，你就来监督或者监视吧！我们是正大光明的。

每天到了下午五点钟，她必定是问我今天晚上有会议吗？如果没有，她必定提出一些借口向我请假回去（她这样的小心完全是多余的）。有时她会提出一些生活琐事，说她明天上午不能来了（我想她是回去汇报吧！）我总答应她的要求。晚上有会，那她是必定留下的，一次也不会放过，没有会，我不留她干什么事，她也就急匆匆的离去。虽然她曾向我表白可以无牵无挂、不分昼夜地干工作，但实际上她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急于“下班回家”。

这样干了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后，一天她在快下班时，告诉我，她丈夫来信反对她参加我们的革命造反，她不能再来了。她找了夫妻不和的借口进来，又以丈夫的反对抽身撤回，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更能证明我的猜疑是对的。

除了那唯一的一次谈话外，平时我从不询问她的身世和家庭生活小事，那怕是一次闲谈也没有，甚至我连她的姓名也没有记住。她就这样神秘地出现，诡密地消失。奇怪的是她从什么途径打进来的，为什么费敏璋、殷庆宝极力主张常委们要配女秘书，而他们自己不用，其他常委也没有正式的女秘书，单单给我配？

我的猜疑几十年来没有同任何人谈及。

如果说，她的确是市委派来的，是为了我们把联络员赶走后，填补真空，以便了解和监督的话，在当时造反派尚未夺权时，市委是可能这样做，而且也做得到的。现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作为负有重大责任的上海市委，绝不能让一个拥有四十万人的群众组织，处于失控的盲点。如是这样，他们选择了这样的人安插进来，可以说已经对我们总部每一个人已经有所了解。这时王继鑫带队去了北京，他那一摊子有一位随行的处长吴贻荪，上海这一摊子，掌实权的只有我一人。他们在我身旁安插耳目，事先必对我作过重点分析，而我坦然地接受和自觉地敞开大门接受监督。我想他们一定是满意的，出乎意料的。考察了一段时间后，目的已达，遂撤回我的“秘书”，或者是形势的急剧发展，市委已经感到造反派的夺权已经势在必行，市委存在的时间已经不长，这样的监视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撤回了“监督哨”。

我的猜测不会是不着边际的瞎想，政治斗争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的斗争经验是白白积累的么？

我再次被人利用

一九六六年行将结束前，有两件事是可以记载的。

一天，黄宇齐突然来访。这样一位高级干部来到总部，很出我的意外，他直接进入我的三楼办公室，像见到老朋友似的握手、寒喧。不多几句的客套后他既客气又不失身份地谈了他来的使命：说有一重要会议需我去参加。

我听了一呆，我们的组织没有政治背景、没有后台，工总司和红革会的重大行动和会议，都是把我们排除在外的，只是需要利用我们时才会想起我们的（这可以从色织廿四厂事件看出），过后就把我们甩在一边。我们都知道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而我们没有后台，甚至连上海发生了什么大事也不知道。所以我对于黄的来临，既感突然，又有些受宠若惊，究竟是什么会议呢？他故作神秘地对办公室的人扫视了一圈说，没有时间谈了，要我马上跟他走。

我不及思考，就立即随他下楼，坐进他的小车，在车上他才告诉我，华东六省的造反派已经大批进入上海，他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今天在南京路西藏路口静坐，交通为之堵塞。黄说，这影响太大了，现在需要我前去参加由上海造反派和外地造反派的会议，解决此事。

这几天华东六省的造反派进入上海，是由于他们在当地得不到承认，想在华东局的上访中取得承认，原先他们各自在华东局上访，但是在旷日持久的僵持中，逼使他们联合起来。早上我已得到消息，六省的上访人员在南京路西藏路口、上海最热闹的地段、也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商场——市百一店前面举行静坐示威，阻断东西南北的交通，以扩大影响，逼使华东局妥协。今天黄宇齐来找我，看来是要用我们上海的造反派这张牌来对付外地的造反派。好！我们又成了被人利用的对象。

车进入华东局，他要我稍等一会，自己进去了。我在我们原先造反时停留过的一幢曾经是整洁雅致的小楼前漫步，说"曾经"是因为这时的小楼已经面目全非，被六省的上访人员搞得污秽不堪，厕所内已经无法插足，粪便横流，满目"劫后"的景象。

不过十来分钟，他出来同我上车，驱车到了南京路中百一店，从西藏路的大门电梯直上七楼。他引导我进入一间很大的会议室，我一看，四周的皮沙发上已经坐满了人。他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工总司代表，他们来了三、四个人，我们相互握了握手。我不善交际，没有问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反正我不认识他们（与工总司的交往是费敏璋的工作）。看着他们趾高气扬的模样，我也不想与他们事先通气和协商。其他还有华东局韩哲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这次六省静坐的代表，黄宇齐逐一与我介绍，安排我坐下后，会议立即开始。这当儿我开始思考我该如何表态，该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了。

今天把红工司和工总司的人请来，明摆着是向这些外省市上访人员施加压力，当权派该不至于要我们去支援外省市的上访人员吧！我想我最好的办法是不表态，看事态的发展再说。这时华东局当权派在讲话中，把工总司和我们红工司推向前台，特别突出了我们上海造反派的到来，表示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对静坐活动的关切，要求六省上访人员不能影响上海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要求他们尽快撤出南京路。

工总司的代表反应冷漠，发了一通对静坐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讲话，实际上就是不支持，工总司的发言，无疑给他们六省代表泼了一盆冷水。华东局的讲话就更为强硬起来，要求他们立即撤走，不能破坏上海的大好形势，有问题可以坐下谈。

我不打算立刻发言，我想尽可能拖到最后再表态。但意想不到的是，群龙无首的六省代表很快乱了阵脚。他们毕竟没有一个坚强的、有权威的核心，在压力面前败下阵来，会议竟很快结束，用不着我发言表态了。

华东局利用我们两个造反组织，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次危机。

一个人的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他的思想和言行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想当初，我们不成气候，在蠢蠢欲动时，会去参加苏州临时工上访的行列，一起向华东局造反，相互支持和依靠，可是一旦自己已成气候，造反成功，组织成立，“大权”在握，在今天六省造反兄弟盼望我们支持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却是什么看问题要全面，要顾全大局，要顾及到自己表态的份量和后果，要拖到最后再发言表态，等等等等。实际上是将自己置身事外，不加入，也不希望外地人员来乱了我们上海，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权派。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军也往往用这一手。北宋统治者招抚了宋江，再用宋江去剿灭方腊，自己不费一兵一卒就消灭了两支起义军。今天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是方法何其相似！

工总司和我成了宋江！

华东局肯定摸准了我们地位变了，立场也会跟着变，所以黄宇齐会屈尊前来。

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毛孩子怎能玩得过有五十年腥风血雨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年轻并不必然就是弱，一百多年前，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向整个旧世界宣战的时候，他们是强大的。他们的强大，是因为已经有了完整、先进、成熟的思想。

然而我们却是被点起来的火，被煽起来的玩偶，头脑中除了一些朴素的意念和空洞的口号外，其他地方都充斥着“私”。

工人造反派还没有掌权就变了，变得比农民起义军还快。

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因为缺乏有远见卓识的人。

没有人会提醒我们，只有人在利用我们。

羞辱陈阿大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中心是一个权字。为夺权和保权搅得天地昏暗。人对权力的欲望又是没有止境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从党内上层开始的一场权力之争，为了这场权力之争，发动了亿万人民参加，一边是造反派，一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主席的引导下，最终演变成造反派夺权、掌权。而在造反派的阵营和组织中何尚不是在演出一场权力之争呢？

一天，我的工作人员收集到了一张铅印传单，揭露王洪文不是工人，是十七棉的保卫科干事，是科室干部，他出卖了工人利益，等等。

这是一张反对王洪文的传单，其目的就是企图夺王洪文的权。下面是一行拗口的落款：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

我一看立即意识到这是工总司内部分裂的迹象。

我自认为我们的组织内部是团结的，以我的幼稚和单纯下此断语后，油然而生的可笑的自豪感，促使我要去找王洪文出出气，出出我们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中的窝囊气。

我对这张传单研究了一番，心想，他们造反司令部中的“造反司令部”是谁呢？二兵团的耿金章？不像。二兵团反王洪文已是公开的秘密，从组织系统来看，二兵团已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不需要用这拗口的署名。那么是谁呢？我对工总司内部一无所知，不可能猜测到是谁，不去管他了，我一定要借此机会去奚落他们一番。

我特意带着几个人跟随我去解放日报社。那时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后，一度占领了报社，他们的一些头头常在报社内，这天我设法打听到王洪文此时在报社内，所以我驱车直达报社。

我第一次只身去巨鹿路的工总司总部受到冷落，第二次同费敏璋去，也受到冷遇。今天使我不得不特意带上我的随从，前呼后拥，这样才显得出我这红工司头头的威风，才有可能见到工总司的头头。我的随从们确也善解人意，他们狐假虎威的表演使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工总司的一道道门卫，进入我要去的地方。

封建社会中大官行进时吹喇吧、抬轿子、鸣锣开道的封建排场在这里就是管用，工总司的喽罗、门卫、工作人员不但给我们放行，还有人在前引路，我的随从簇拥着我进入报社内部开放式的老式电梯，随着“铁笼子”的上升，我不知到了几楼。有人领着我进入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我的随从们就在门内门外站住，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子的老陆紧随着我。

一个双手捧着搪瓷茶杯在捂手取暖的青年不由站了起来，他身材比我瘦小些，身着中式的对襟棉袄，外罩是千篇一律的蓝色对襟罩衫，头戴风行多年的半围翻起来，帽沿上方用黑色丝带扎起一个蝴蝶结的黑色泥帽。在老陆对比之下，他太显文气了。老陆上前一步说：“我们是红工司的。”用手对我扬了扬：“他是组织部长沈××，要找你们的王洪文。”文气的青年傲气地问：“有什么事？找我陈阿大。”并粗俗地用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胸脯。

哦！这一指头就能捅倒的文弱小生就是久闻其名的陈阿大？！阿大，戇大，我惊其貌与名不符。但随着交谈下去，其人的言语、举止确与其名——阿大相符了。我不客气地说：“我要找的是王洪文。”他旁若无人地管自坐下，手捧茶杯呷了一口茶，昂起头：“他不在！”

我说：“我是为你们工总司的事来找王洪文的，我知道王洪文在报社，我才来找他。”他又呷了一口茶，狂妄地说：“我就可以代表工总司，有什么话对我陈阿大说好了。”看来今天要见到王洪文又是不可能的了。好吧！既然你阿大这样强横、霸道，撞上来了，今天就先羞辱你！

我以调侃的语调说："你们工总司好气派呀！占领了解放日报社，架子大得很，只是你们工总司调不动人马，也有求我们红工司调人马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没有反应的阿大，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红工司虽然没有后台，可我们是团结的，不像你们工总司内部七撬八裂。"他还是没有反应。

我接下去说："出了一个二兵团不说，又出了一个工总司内部造反司令部，你们的造反精神真足啊！"我扬起那张铅印传单："你看看！你们王洪文的老底都被人揭了出来，哼，你们工总司呀……你看看。"

他放下茶杯，马上跳了起来，看我手中的传单。

我又指着传单的落款大声笑了起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造反司令部，哈，哈，哈……真新鲜。"他一下夺过传单，额上青筋暴出连呼："啊！我晓得是啥人搞的，我晓得是啥人搞的。我去找王洪文，我去找王洪文……"一下夺门而出。等我从众人的哄笑声中明白过来，走到走廊上，他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我在得意之中，带着众人"打道回府"，得意了一番。仔细想来，我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第十六章 赤卫队的失败

解放日报事件

六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挑起了这场战斗，工总司插进去支援红革会。他们忙于争夺宣传工具和宣传阵地，闹得不亦乐乎，而我们则忙于组织的建设和筹备文化广场的大会。造反派在努力迫使解放日报——市委的机关报就范，致使解放日报停刊。赤卫队在此时匆忙登台，万人大游行，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在造反的浪潮中，人民的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对官方的喉舌——解放日报真的是那么要看吗？会真心实意地去游行要求看干巴巴的八股文吧？这就导致了赤卫队失去民心，成了上海最短命（66 年 11 月 23 日成立至 66 年 12 月 31 日瓦解）的群众组织。

赤卫队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他们本是一批对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感情的人，阶级出身较好，干部、党团员多，工作积极肯干，每次政治运动也都冲在前头，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次运动的“打手”。文革发生后，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这些平时的“天之骄子”，在上面的授意下，自上而下组织了这支“近卫军”，他们的组织成立和形成当然不会遇到造反派成立时的阻力和风险，他们有市委的支持，可以堂而皇之地按系统迅速组织起来并立即获得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市委御用工具得天独厚的地方。

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上海两大工人组织——工总司和赤卫队并没有正面冲突，赤卫队只是在游行示威，在舆论上“作战”，老实说工总司反而处于守势。但是市委在处理事件中却节节后退，以图息事宁人，逼使赤卫队在色织廿四厂中向造反派——工总司发动了强硬的进攻，扣押和禁闭造反派。

这个时间表是这样的：

11 月 26 日赤卫队成立（一说 11 月 23 日）。

11 月 30 日红革会进报社，事件开始。

12 月 1 日工总司正式加入。

12 月 2 日赤卫队游行示威，正式亮相。

12 月 5 日或 6 日市委代表王一平和宋季文在谈判中，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解放日报事件开始平息。

12 月 7 日开始，赤卫队动员了大批人员在色织廿四厂围攻和扣押造反队。

12 月 8 日夜，红工司在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后派二千人去色织支援工总司，插入色织廿四厂事件，大批红工司造反队员被扣押。

12 月 9 日下午，红工司调动十万人在色织廿四厂向赤卫队发起正面进攻，冲入色织廿四厂，救出被扣押的大批造反派。市委出面三方连夜谈判。

12 月 10 日，曹荻秋签发市委 12 号文件，答复工总司，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工总司人民广场大会

我们红工司从正面为工总司向赤卫队冲锋陷阵，显示了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事实上为工总司开辟了“第二战场”。事后，我们并没有在上海造反派中占有一席地位，我们始终处于低下的不平等地位，临时工受人歧视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你高举毛泽东的旗织，高呼最革命的口号，干了最革命的行动，从而有所改变，即使你实际上已经为人作了“嫁衣裳”亦没有得到承认。“炮司”的学生头头对我不屑一顾，果然令人恼怒，而我们的对手赤卫队更是趾高气扬，在谈判桌上根本不把我们视为谈判对手。

最可恨的是 12 月 11 日，是我们在色织廿四厂冲垮赤卫队的第三天。

12 月 11 日，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有几十万人参加，把人民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在会议进行时，我带着老陆、骑着摩托车绕人民广场外围兜了一圈，广场的每个入口处挤得不能再挤了，我被挡在外面不准进去。里面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扩音器中的口号声压过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大会的扩音器一直拉到了南京路上。

我看到这样的情境，一阵说不出的滋味搅得我肝肠寸断：前天工总司只动员到万余人，而我们却全力以赴，以十万之众向赤卫队正面进攻，解决了色织廿四厂事件，迫使市委在谈判桌上低头。对手被冲垮后，今天工总司却冒出了几十万人（据他们说有六十六万）坐在广场上摇旗呐喊。

敌人已经打垮了，在谈判桌上低头了，你“迎头痛击”什么新反扑啊？这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天、大前天资反路线反扑的时候，你们的人到哪里去了？最令人寒心的是，我们对这个会事先什么也不知道，只有费敏璋作为摆设坐在主席台上。

我们既不是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也就谈不上分享会议的成果。事后知道在这个大会上批判了曹荻秋，曹在工总司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要求上当场签字。这下好了，工总司有了《工人造反报》，赤卫队当然毫不费力有《革命战斗快报》，而我们仍然什么报也没有。

我在广场虚热的口号声中，气恼地对老陆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回总部，我不要看了。”摩托车在南京路上飞快地向西奔驰。

12 月中旬时，上海造反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而赤卫队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号称八十万，并且活动越发升级，公开打出反对张春桥的口号，公然要张春桥回上海检查，这样，赤卫队在上海人的眼中是保皇派的面目已经定型。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姚文元；赤卫队的后台是陈丕显、曹荻秋，这已经不是秘密。

工总司刷出大量标语：“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赤卫队是陈、曹御用工具！”“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在这样情况下，不得不装模作样刷出“炮轰上海市委”，以表白自己并不保皇。12 月 23 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老头（那时造反派中称曹荻秋为曹老头）揪来批判。

去看赤卫队的广场大会

我的老陆兴致很好，说:“小沈，有胆量吗？我们去人民广场参加赤卫队批曹老头的会。”我说：“这有什么不敢，走！”我们的摩托车从威海路一头进入广场，一看广场内人不多，只有司令台前的小半个广场挤满了人，整个广场的外围并没有赤卫队的纠察线，没有十一日工总司大会的盛况。

我们从人群的后面，也就是人群后部空出的地方驶过，到了司令台前方。我要老陆把车停下，老陆有些犹豫，但我坚持要停，他就捏住了离合器，但没有熄火，并不让我下车，说，万一赤卫队发现我们，好马上逃走。我们远远地在人群后观察司令台，一个人在作冗长的发言，下面的赤卫队员反应冷淡，会场显得有些冷清。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也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次大会呢？我陷入了沉思。

老陆怕出意外，急着催我走。我还在想我的大会该怎么筹备。我要他向西藏路开，到了西藏路再回头，从原路出广场。他虽然同意这么做，但是把车开得飞快，待我们在西藏路折回头向威海路开时，不寻常的高速，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回头来看我们，当有人从臂章上认出我们，惊呼：“造反队”时，我们一眨眼已经冲出了广场。

我哈哈大笑，笑老陆的胆量太小了，我的一笑把他的紧张神经缓了过来，他减慢车速回头对广场看了一眼，嘴里嘟囔了几句什么，大概是在为自己辩解。

从工总司方面（通过我们的"外交大臣"费敏璋）不断传来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停电、停水、停交通）向中央施加压力的新动向，又说这是"黑市委"（这是造反派对市委的称呼）的新阴谋。要求造反派提高警惕，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坏消息不断传来，海港情况不妙，很多船停驶，港口货物积压。最让人担心的是上海存煤不断减少，只有三天的存量。铁路情况也不妙，列车停开，旅客滞留，货物积压。

这些消息在造反派的头头中传来传去，人们担心赤卫队"三停阴谋"一旦实现，存煤用完，大上海就将陷于一片黑暗，混乱又将与黑暗同时降临，上海即将面临着一场大灾难。

尽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对消息的出处和可靠性会打上一个问号，但我当时并不怀疑，我为这种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对赤卫队欲制造三停而忿恨不已，对"黑市委"的阴谋和赤卫队的垂死挣扎，认为是明目张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并计划着我们红工司该如何行动。

12 月 29 日下午，费敏璋从工总司回来，他脸上带着兴奋，以神秘的口气，像透露国家重大机密似的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赤卫队已经占据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并说刚才在工总司开了会，传达了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鲜血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费转而兴奋地说，上海的造反派要充分动员起来，要调动队伍去康平路，解决赤卫队在此一举。

康平路事件

我、殷、费三人当即决定调动队伍。

费又对我交待说，指挥部设在衡山宾馆，王洪文在那里指挥，他与王洪文约定，在我们队伍到达后，要我即去与他联系。

看来实际去执行这个决定的又是我这个组织部长了，我立即派专人和用电话发出了我的指令，调动各种人马。

上次，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被人利用，受人愚弄，遭到冷遇的情况历历在目，这次我要圆滑一些，不要冲到前头，不能再做冲头了。所以在调令中，要我们的队伍在衡山宾馆周围集结，我的指挥部也设在这里。让你王洪文知道我们在“并肩”战斗。

我的手下在忙着调动队伍，我又指派专人去泰康食品厂调拨面包，我签署了调拨的字条，要求在午夜时分一定要送到现场，就地分发给我的队员充饥，这是接受了上次行动，我的队员又累又饥的教训，这次就“人马未动，粮草先行”。

我守在电话机旁，各区人马调动非常顺利的信息不断通过电话传来，派出的专人也络续回来，一切顺利。我对我的安排很高兴。

殷庆宝和费敏璋呢？不在了！我打电话时，他们就再也见不到人了。

在天完全黑下来后，我带着随从，赶到衡山宾馆附近的马路上。显得有些陈旧的宾馆大楼就在眼前，这里四周都是花园洋房，昔日是资本家的居住区。平日，这里非常安静清洁，冬日的夜晚马路更应是寂静空荡。但今天晚上一下汇聚起十余万人在附近各条马路上，我们红工司的队伍和工总司的队伍各占据马路的一边，向前向后延伸着。嗬！这次工总司的队员要比我们红工司队员多了。我很惊奇，王洪文真能调得动人马了吗？

我派人一打听，这些人马绝大多数是二兵团的，怪不得呢！是耿金章二兵团参加这次行动了，工总司似乎团结起来了。

现场仍然不见殷和费，派人遍找找不着，这两个滑头，看来今天晚上的行动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了。我不敢走动得太远，不能离开我原定指挥位置，于是派出人员去了解我们队伍分布的情况和人数。

大约过了半小时，各路领队头头纷纷前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指示他们原地待命。我对一些熟识的头头说出了我对工总司的不满，这次不必像色织廿四厂那样冲在前面为工总司“卖命”，让他们二兵团冲在前面吧！我们不直接与赤卫队正面交锋，避免流血，我们就在后面坐观其变，各路头头们连连点头称是。

我对这些头头面授机宜，让他们去掌握好队伍。我想我该去衡山宾馆内会一会王洪文这个总指挥了，这是费敏璋同王洪文事先约定的。当我带着人走向宾馆大门时，工总司的人马设下层层封锁线，他们的人员，蛮横地拦住了去路。我亮出我的身份，说明我的来意，请他们让路，他们就是不答应，最后我请他们把我的到来传进去竟也被拒绝，那种不可一世，不讲情理的态度，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

我回到我的队伍中，心里怒火中烧，我真想把自己的队伍调回头！撤出去！

不难看出，我们又被人愚弄了！形势明摆着，我们红工司又做了王洪文手中的一张牌。如果耿金章的二兵团不来，我们红工司又是冲锋陷阵的份。今天二兵团来了，就用不着我们红工司的人马了，干脆就把我们撇在一边，就像用过的抹布，随意往边上一扔，连招呼也不用打。在王洪文还没有成气候的时候，他会和我拥抱，会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是一家人”云云。他这样做是由他本人素质决定的，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总是这批机会主义分子可以坐着直升飞机往上爬呢？

我烦躁地走来走去，驱不掉心中的气恼。冬夜的风吹在身上，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冷啊！夜已经深了，人们在原地不断踏步、跺脚。有人来报告说，从泰康食品厂来的运粮卡车已经押到，请示怎么办？我当即指示：请各路带队头头按实际人数，直接到卡车上领取面包。

我们的人秩序井然地在分发着面包，我的队员们在一片欢呼声中啃着热烘烘、喷香松软的面包，不时听到队员对面包和我的安排表示赞扬。对面马路的工总司人员看到我们这边在分发面包，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也来打听要领取面包。我回答他们，这是我们红工司的面包，凡红工司的人都有，工总司的人不给。在卡车上分发面包的工作人员，不时带着几个工总司的带队头头前来与我商讨，恳求发一点给他们。我想起在宾馆门口所遭受到的侮辱，想起王洪文的无情无义，恼怒地命令，一只面包也不给！我对几个工总司的小头头说：“去找你们的王洪文要面包吧！”我的心就像冬夜的西北风一样冷，随你怎么说，就是不给！这些人只得怏怏走开。

隔不多时，我的工作人员又带来一个工总司的一个小头头，这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了，原因是没有人带粮票出来，看在大家都是造反派的面上，多少分一些面包给他。这近乎乞求的口吻，多少冲淡了我的怒气，而且他死乞白赖地不走，一股劲地乞求，我的怜悯心逐渐上升，不容我拒绝了。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好吧！只能给你 100 只。”说完我就别转身再也不理他了。他想想 100 只也好，就随人去领面包了。

这个缺口一开，对马路的工总司队员又来向我讨面包了。我不胜其烦，对我的工作人员说：“赶快发，我们的人全部领取后，如有多余，就送回总部去，对面马路的人多少给他们一些打发他们，随后你们赶快开着卡车走。”

不一会对面马路的工总司小头头前来向我道谢，我得意地对他说："这就叫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懂么？我们可是有经验了。"他连连称是。

是的，从这种大规模集团化行动的后勤补给工作来衡量，王洪文和他的总部头头们根本没有"实战经验"，他还没有一个漂亮的"战例"，也不会体恤下情，然而他却早已是红极上海，乃至全国的上海工人运动"领袖"了。

面包落肚，人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有些人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向康平路上走去，这是爱凑热闹的人不甘寂寞，去"前线"打探消息，回到"后方"再把情况传开来。在"后方"的绝大多数人，三三两两聊起了天，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有谈全市形势和眼前赤卫队的命运的，有谈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的。

我本来也想带人到前面去看看，但有人对我说，前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靠近市委大院。我就乘这机会，同下面基层造反队头头谈话，沟通思想，了解一些情况。我对杨浦区来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不管认识不认识，我总长时间的同他们谈这谈那。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下半夜了。突然从前面传来消息，造反队已经同赤卫队发生冲突！人们不约而同地停止，翘首等待前面传来更新的消息。到前面去看热闹刚回来的，成了大家最受欢迎的人，人们围聚在他们四周，听他们眉飞色舞地把看到听到的描述一番，不论暄染得是否走样。

不一会，前面又传来造反队已经冲进市委大院的消息。人们的情绪受到了感染，大家紧张起来，自觉收拢，整齐了队形，有几位头头前来询问我，我们准备怎样行动？我冷静地告诉他们，我们在原地休息，让他们工总司去斗吧！去冲吧！我干脆要这几位头头替我把这意思传到前面去：我们的队伍在原地休息。

俘 虏

很快，前面又传来消息：赤卫队已经被打垮，开始投降。人们正在惊诧赤卫队怎么这么快就被打垮了。突然从远远的前面传来阵阵口号声，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翘首向前望去。口号声似接力棒往这里传来，前面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这骚动似传染一样逐渐向我们传过来，原来站在马路中央的人群纷纷向两边退让，让出一条路来。

只见一支奇特的队伍缓缓地向我们这边走来。队伍呈三路纵队，这是从“前线”——市委大院押送“俘虏”的队伍。两边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夹在中间的一路是赤卫队。造反队员威风凛凛，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口中不断在威吓着，有的还不时动手揿几下“俘虏”的头。这些被俘的赤卫队员，高举双手作投降状，再被迫低头弯腰，在低垂的后脑上，顶着被撕下来的自己的赤卫队袖章，稍有反抗的，就被两边的造反队员架起双臂，被强制低头弯腰，这叫“飞机式”。（这种体罚在文革中被普遍应用，我想大概这种刑罚是在文革中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漫长的法制史中，从夏商奴隶制社会建立，产生了残酷的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发展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增加了流、赎、鞭、扑，这就是所谓九刑，此外尚有各种法外酷刑。西周和后来并没有“飞机式”，这是现代“文明人”在科学昌盛时代才发明的丑辱与体罚兼备的刑罚，就其野蛮程度来说，已倒退到三千年前的西周，因为那时没有成文的法，而文革时也没有法的，如同西周的法外酷刑一样。）

这些头顶袖章的人每走不多几步，就会被一些最最“革命”的造反队员拦下，这个最最革命的人把自带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打开，翻到印有毛主席像的第一页，愤怒地要赤卫队员低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被押解的可怜虫不得不呈九十度弯腰，口念：“我有罪，我有罪，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顺从的放过去；稍有不从，雨点般的拳头就砸在他的背上；有的太依顺，头低得太低，头上的袖章滑在地上，也被最革命者送上几拳。这种折磨、虐待赤卫队员的“壮举”被不远几步的又一批最最革命的人所仿效，这些可怜的人就被这样一路反反复复地折腾下去。动手打人的，呐喊助威的，人类的美德全被上帝收回去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阶级斗争，使人们倒退着演化，向野蛮演化。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值得自豪的是：12 月 9 日，我们红工司冲进色织廿四厂后，只是救出造反派战友了事，并没有依仗人多势众去“踏平”厂里的赤卫队。我闯进赤卫队总部后，也只见到赤卫队“审问”造反派，而并未施加酷刑。看来王洪文他们的“造反精神”是我们远远赶不上的。

突然在这群“俘虏”中，出现了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被双手反剪成“飞机式”走来。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汉子，他倔强地努力昂起头来，到了“红宝书”前，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这个汉子倔强地说他没有罪，话一出口，就被一顿拳头打翻在地，又被拖起来。血从雪白的纱布中渗出，一滴滴顺着面颊流下来，但他仍高昂着头，不愿低头请罪，两个“好汉”硬是把他缠着纱布的头揿下去，他硬是抬起头，“革命的”拳头又如雨点般砸下，鲜红的血在他的面颊上流淌。这样一来，“俘虏”的队伍被阻断了，有人吆喝起来，这个倔强的汉子才被人拖走了，押俘虏的队伍又开始行进。

被押下来的赤卫队员越来越多，这些最最革命的造反队员大概已经厌倦了这种表现自己的机会，后来的“俘虏”的待遇就好得多了，不再有人拿出毛主席语录来要这些“俘虏”请罪了，行进的速度也加快了。

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们，也不是我们该呆的地方，我也不忍心再看下去，我想我的队员也一定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的所有队员没有人参与动手，没有人参加这场残酷的斗争。我作出

撤离的命令，让人迅速传下去，扭头离开了这最最“革命”的地方。我痛恨我自己，我不该送面包给马路对面的工总司，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死乞白赖要面包的小头头，手拿毛主席语录，挥拳砸向缠着绷带的头。

这就是一举击跨赤卫队的闻名的“康平路事件”。赤卫队从此消失。

人的本性是残忍的吗？

从现场看，张春桥家被抄的传闻确有相当的号召力，能激起造反的“激情”，这个动力来自何种因素呢？一个人的神化，带来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神殿——中央文革，神殿和神殿里的人亦都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反张春桥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狂热的疯狂时代，不可能不发生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再加自上而下幕后指挥和煽动，“疯人”不发疯那才是怪事。

目睹了这场人间从未有过的人斗人、人折磨人的闹剧，我惊叹这种因时因地的发明，一定是世界上最最革命的“奇才”。在中国的大地上，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应时奇人俯拾皆是。夺江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保江山是靠整人保下来的；打江山涌现出一批优秀将帅，保江山则孳生出无数整人“奇才”。

人的本性是不是残忍的呢？大概处在茹毛饮血类人猿的时候是的。但那时残忍是对付兽类，用石木竹火抵御虎豹豺狼和猎取牛羊猪鹿，那时同类之间必是团结的，否则齿、爪不如兽类尖利的猿何以能进化成人？但是当猿真的直立起来成了人，就伴生了部落间的吃人肉，乃至国家间的互相残杀。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发现这种争斗的罪孽，于是宗教就与野蛮伴生，劝人慈悲为怀。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它们发掘培育了人类本性中慈善的一面，不然就不可能流传至今。九华山地藏菩萨有“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警句传世，这就不仅是简单的“善”而已，它的牺牲自己、普渡众生的思想简直与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异曲同工。

解放后，大陆上宗教活动被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代之席卷大地的是煽动阶级仇恨的各式各样的政治旋风，培育出“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语）的青年。如果说五十年代卷入自相残杀的人还属少数，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把全国人民都吸入了旋涡。人们像在一九五八年相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降临一样，再一次虔诚地相信了自己的领袖。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全球一片红”，相信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相信在身边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知识分子，于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的常用语）。

就像“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个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一样，违背马

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之外的人都踩到地狱里去，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等城头上的大王旗变幻停当而山河依然陈旧；当充当急先锋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真正接触了社会；当打开国门后意外地发现外面多彩的世界；当发现官僚层迅速地腐败糜烂；当贫富两极开始分化的时候，百姓们愕然了，他们感到受到了愚弄，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信仰危机，许多人不相信共产主义。

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天堂。改革开放这十几年，使我们国家迅速发展，也使我们看清了资本家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嘴脸，听到了最低层百姓的呻吟。

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一无是处。她描绘的美好社会蓝图人人向往，她提出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表现了人类中最优秀分子的伟大胸怀。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有了制约资本主义的力量。有竞争才有发展，而有制约才有竞争。社会主义的存在促使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它们的发展却实现了马克思提出的一些目标，几乎抢先实现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富裕，使它们有别于资本原始积累时的野蛮形态而开始变得“文明”。与其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优越”，还不如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之处。

我不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因为世上万物的发展遵循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规律。不是么——飞机飞到北极，总要往南飞；飞到南极，只能朝北飞。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旗袍，现在又流行起来。六十年代前，汽车外形是曲线，七八十年代变成挺拔的直线，九十年代后又变成曲线。从这条规律看，人类社会必然要回归到共产的或者说世界大同的形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否定之否定的“回归”，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老太太不能因为现在流行旗袍而把自己压在箱子底的旗袍翻出来给孙女穿；汽车外形设计师也不会把车子设计成以前的曲线。今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是什么样子？马克思说得不仔细，我们也说不仔细，但是它的到来却是必然的！——伟大的马克思！

像工总司这样折磨、虐待“俘虏”，绝对不是革命！绝对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军优待俘虏！

昆山事件

康平路事件的余波就是“昆山事件”。

康平路上一夜功夫，赤卫队被工总司（确切地说是工总司的二兵团）打垮后，第二天传来赤卫队不甘心失败，总部头头带领部分队员，步行上京告状，工总司组织造反队前去阻拦。下午又传来这样的消息：造反队追到昆山后，赤卫队煽动当地人围攻造反队。

下午近黄昏时，我的工作人员和大队部的几个人，你推我搡地挤到我的面前，共同推举“阿胡子”老陆讲话（看来他们已经事先商量好。推老陆同我讲，是因为老陆一直跟随我，好讲话）。

他们说，造反队在昆山被围，处境困难，进不成，退也不成，要我去排解造反队的困境。我说，我没有调任何队伍去昆山，在昆山被围的是工总司的造反队，我不想调任何人马去昆山。老陆说，不要我调队伍，只要我随他们走就是了。我说我不去。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缠着我，说工总司造反队已经饿了一天了，我们去送面包给他们充饥，反正我们昨夜的面包剩了不少。

我对工总司的困境一点不动心，昨夜的景象太让人寒心了，我们何必再作贱自己，去为他人“排忧解难”呢？但是禁不住他们的死磨硬缠，心想去看看工总司在昆山被围的狼狈相不是很好吗？再去了解一下，赤卫队和造反队究竟闹得怎么样了？我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欢呼起来，簇拥着我下楼。他们早已安排了一辆公交车，上面装了几十个箱子，是装日用百货的大纸箱，现在被装满了面包。我一看这模样，明白他们早就策划好了，只是不敢轻举妄动，硬是拖了我这个头头才好行动。

车子很快驶向武宁路桥，从他们上车后欢愉的神态来看，这那里是去冒险，倒像是去春游。

车过武宁路桥，在中山西路口的一个加油站，加足汽油。我们的车不用交汽油票，也不必付现金，就凭我的常委工作证，我的签字，油箱里的汽油就加足了。这真是一个造反的年代！

我在摇摆的车厢中，在面包的香味中，很快睡着了。待被推醒，告知昆山已经到了。这时天已漆黑，不知是几点钟了，我们的车子停在路中。他们告诉我，已经不可能再前进。我抬起头一看，车前的路上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在昏黄的路灯下，激动的人群似乎围住什么人在争论或者辩论。越过人群看过去是一座桥，桥的另一端也全是人群。看来要想穿过人群上桥过河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等人群散去，不知要等到何时。我派了两个人下车打探消息，一面打开了一箱面包，大家边吃边等待。

我问司机，除了这座桥，是不是还有其它桥可以绕过去。司机说，在昆山就这一条路，

别无他法。正在这时“砰，砰，砰!”派出去打听情况的两人急急敲车门，上车后，紧张地说：“下面全是当地的老保组织，马上要过来查上海的造反派了。快！把袖章脱下来，不能被老保发现我们!”

大家一时慌了神，匆匆把袖章脱下藏到口袋里。我问：“前面都是些什么人？工总司的人在这里吗？”那人说：“下面都是老保，是当地的农民，工总司的人被围在河对面不远的地方，现在老保对上海来的人查得很严。”他见我还戴着袖章，焦急地说：“快把袖章脱掉，不然会被这些农民打死的。”车厢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出奇的静，人们原先的潇洒劲儿消失得精光。

“阿胡子”老陆开腔了，他在我们这十几个人中年龄最大，又是走江湖出身，见识多，他首先要大家不要多话，对我看了一眼说：“我们统一口径，说我们是上海中百公司批发站的，是送这批货到苏州去，这批货都是日用百货。”他指了指盒上原来印制的上海中百站。我对他点点头。他又说：“就这样应付，由我一个人对外回话。”我说：“大家不要响，就让老陆一人应付。”全车十几个人沉默在黑暗之中。

老陆一声：“有人来了。”马上扑到车门口。乒乒乓乓，只听有人从两面用棍棒把我们的车子敲得震天价响，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大叫：“开门！开门!”几支手电筒从不同方向照进我们的车厢里来。

毛胡子一下把门打开，对外面的人说：“请问有什么事？”一面用高大的身躯挡在门口，但还是有一个硬挤上来。上车的人问：“你们从哪里来？”老陆沉着地答：“我们是上海中百站的，送货到苏州去。”

手电照到纸箱上，扫过来，扫过去，在“中百站”几个字上停留了一会，“里面什么东西？”

“百货!”看来他相信了，又问：“车上有造反派吗？”他对我们这十几个押车的人有些不放心。老陆回答得也妙：“没有！我们刚到五分钟，我们急着去苏州，前面是不是让一让路啊？”毛胡子以攻为守地提出了要求。

那人不耐烦地说：“不行！前面有几万人，路不通了，你们绕道从太仓常熟走吧!”他欲下车，似乎又不放心，回头又用手电照一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手臂，又看了一眼堆得满满一车厢的纸箱，下车挥手带人走了。我长出了一口气，重又坐在黑暗之中，心想，这人怎么没有闻出满车的面包香呢？

大家沉默了一会，毛胡子轻声问我怎么办？我想，既来了，尚未看到什么，难道就这样

回去不成？开车前进吧，车没法开。我就说："再派人前去探探路，我们步行进去看看。"谁也不敢答腔。还是毛胡子说："人家昆山人一听我们的口音，就会疑心我们是造反派。再说这一车子的面包一旦暴露，就说明我们是上海派来的造反派，那不就完了吗？"大家一听都附和起来。

我还有点不甘心。尚在犹豫时，又有一伙人乒乓乒乓来敲车子，又是几支手电筒光照了进来，毛胡子这次不敢把门打开了，他头伸出窗外说，已经有人上车检查过了。周旋了一阵这伙人总算走了。

这样待下去太危险了，还是赶快回上海吧！不等我开口，司机已经把车发动起来，有两个人立即开门跳下去，到后面协助司机倒车。车缓缓地倒了十几公尺，突然又是一阵棍棒猛敲车子，传来一声："开哪里去？"

毛胡子立在车门口说："我们去苏州，前面不通，我绕道走太仓，这路怎样走好？"老陆老练地向他们问路避开了危险，车子倒车倒了好一阵子，直到找到能调头的地方，把车调过头来，车下的两个人像捡回了命似地跳上车，连催司机快开！快开！当公路上再也不见人影后，大家紧张的心才放下，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但没有经历过的"昆山事件"。

赤卫队的气数已尽，只存在了三十多天（11.26——12.29），退出了上海政治舞台。

赤卫队有上海市委作后台，尚且失败，而我们没有后台，又备受歧视的红工司的命运会如何呢？

第十七章 红工司走上顶峰

我决心要开人民广场大会

在色织廿四厂事件两天后，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广场内挤满造反队，整个南京路和西藏路上拉起了扩音器，把人民广场召开大会的声响同时向繁华的南京路上传送，会议的发言和数十万人高呼口号的声音响彻这绵延十里的中华第一商业长街。这浩大的声势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地刺激了我。12 月 23 日赤卫队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我曾飞车去窥视一番。当时我的头脑中萌发一个闪念：我们何不也在广场召开一个大会，以壮我们红工司的声威呢？

这时上海的红工司，王继鑫带着他的赴京代表团走了，常委也走了一半，剩下在上海的就我和费敏璋，殷庆宝三人在主事（“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本来就参与不了总部的大事）。我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要在人民广场组织一次集会。正如我的意料，他们三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出于意料的是也不见他们的实际支持。殷庆宝、费敏璋两人听完我的提议后，好像在默默地思考着。我不知他们两人在想什么，倒是“草包”在唠唠叨叨：什么王继鑫在北京呀！啥人来组织啊？经费哪里来啊？市委会不会同意啊？等等。我本来不把他当回事，就不去搭理他。

殷庆宝沉默了好长时间后，狡滑地顺水推舟说：“我同意开这一次会，好！常委会委托你去组织这次大会。”我一楞：他倒好，自己不干一点实事。如果办成功了，主席台上少不了他。哼！这也难不到我，一个当权者，只要善于用人，怕什么！我胸脯一挺：“好！我们组织部承担了。”费敏璋见此乐得明确表示同意。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召开组织部的干将们开会，谈了我的设想和感受。

我说：“我去看了工总司和赤卫队在人民广场的大会，他们能开这样的大会，我们红工司为什么不能开这样的大会呢？”稍停我又说：“我们临时工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气人的是，那天我被工总司的人拦在了外面，连进入广场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们工总司用到我们了，就来利用一下，用不着了，就爱理不理，我受够了这个气，我们为什么要受人歧视？我们要在全市人民面前扬眉吐气，在人民广场倾吐我们的心声！”我的一番话，赢来了一阵掌声。在我的小小办公室内，这些工作人员，朝夕相处，这里没有虚应的客套，他们的掌声出自每个在座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每个临时工的心声。

我宣布：这个决定已经得到常委的讨论和同意，这是常委会的决定，这个大会的筹备任务，由我们组织部承担。我的话音一停，又是一阵掌声，掌声引来了其它部和纠察大队的人员，他们纷纷挤了进来。有的说：“坚决拥护常委的决定。”有的说：“早就该这么办了。”待人们稍平静后，杨福海问：“小沈，接下来的事，你如何安排呢？”

我环顾着大家。人们静了下来，望着我这年轻的组织部长。

我胸有成竹地说："上一次文化广场的会是由王继鑫搞的，人数是一万。这次大会是在人民广场，必须要有十几万人，难度要大得多，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大家一起动脑子，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我对在人群中的纠察大队的朱力军点了点头，我说："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朱力军负责。"

朱力军马上用一副江湖口气兴奋地说："既然这样看得起我兄弟，我决不在我们的部长脸上抹黑，兄弟一定保证做好。"大家鼓起掌来。朱问："我的人员不够怎么办？"我说："可以从下面调人，这个由组织部发调令。"他兴奋地说："好！"

我又宣布说："我个人不能钻在事务堆中，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由杨福海全面负责。"杨福海高兴地向大家看了一眼。本来那个一直被我冷落在一旁的"办公室主任"一直紧张地盯着我发言，这时他被杨福海得意的眼神，刺得黯然神伤，慢慢低下了头。我继续说："老杨组织一套班子，全面拟定全盘计划，筹备实施，直至大会结束后的善后工作。人员从组织部中挑选人员，组成骨干。人员不够也可以从各分部抽调人员，组成得力的班子。"我又对朱力军说："有关保卫工作你可同老杨商量，你们要相互配合、协调。总之，你们有权处理一切，解决不了的可找我。"

布置停当，人们陆续散去，只剩下我们组织部人员了，我对杨福海说："你马上开始行动，初步拟出一个实施方案来。"

下午，杨福海向我汇报，他还把后勤部管财务的李衍清也找来了。杨首先提出会议经费要一万元，我吓了一跳，这一万元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市委能同意吗？开这么一个会能要这么多的钱吗？继而一想，既然要杨全面负责办理，一开头我就驳回他，这不太好。杨见我沉吟不语，就细说了原由："我们不像工总司，什么都有，我要的一切全靠用经费去买去置办，会开完了，东西还在，总部还是用得着的……。"

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板上钉钉地说："这一万元的经费，就定下了，总之你本着节约的精神，该用的就用，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

老杨紧接着提出，这个一万元要单独提出，完全由他支配，不能受制于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我一听，是的，不能让钱从中插进来，这个草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决定说："可以这样做，不必通过后勤部。"这时熟知财务制度的李衍清似乎有些犹豫地说："我本人当然没有意见，不过……"

我不等他说下去，就打断了他的语头："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由组织部承办，这是

常委讨论决定的，一切由我负责。经费划到帐上后，提出这一万元现金来……”

我的态度使李变得果断起来，他也截住了我的话说：“小沈，我交给你！”我十分高兴：“好！你交给我，由我给老杨。老杨你必须单立一本帐，要把这一万元的用途，来龙去脉交待清楚，找一个懂财务的，按老李的一套制度收发，不能有半点马虎，会议结束，把这本帐本和单据、余下的款子及物资、全部移交给老李，由你们两人交割清楚，不得有一分一厘的差错。”老李听着不断点头。老杨也表示应该这么做，接下来他又提出，总部地方太小，人员来去太杂，对开展工作不便，要在外面另找一个地点办公。我说：“愚园路的房子空着，去那里吧！”他说：“不！南市陆家浜路有一空房可以办公，我已联系好了。”

我明白，他杨福海是为了完全摆脱其他常委的指手划脚，要取得完全独立的指挥权，充分显示他的能力。我想，我应该充分让他放开手脚去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完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感到非常满意。

接下来，他谈了一些交通工具等一些琐碎的技术性问题，我就说：“这些你就便宜行事吧！一切都交给你了，总之你本着节约闹革命的原则，该买的买，该用人的用人，一切由你决定，按刚才讲的原则去办去做。”

他又拿出一张组成人员名单来，给我过目。我匆匆看了看表示同意。接下来我们两人商量这个大会的日期，我要求尽快召开，他合计了一下，最后就定在 1 月 5 日。

筹备工作就此开始。

我在常委会上，实际就是向费敏璋、殷庆宝两个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当然只是“通报”而已，并不是请他们研究同意，他们也不阻拦。很快又通过联络员老吴把我们的决定通知市委和华东局，要求火速拨大会经费一万元，同时要求华东局和市委的当权派参加这次大会。

一切顺利、不到两天拨款就来了。中午，老李郑重其事地把一张一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了我，告诉我总部的帐户开在南京路中百一店对面的人民银行，要我到那里去支取。

我心中的一丝邪念

本来我可以把取钱的事交给杨福海去办理，但是事先朱力军为了应付大会的警卫工作，需要摸熟地形，熟悉周围情况，向我约好，要我在下午去人民广场，去观看他们纠察大队的演练，说有事需要我在现场商讨。这种认真的办事精神，应该给予鼓励，我便计划顺道去南京路取款，再到人民广场去看望他们，随后再到陆家浜去送这一万元的经费，陆家浜那里我还没有去过，我正好去看望一下老杨，鼓鼓劲。

我带着我的一个随从（人民印刷厂一姓卜的青工）赶去银行提款。那时我有一只浅灰色的人造革带拉链的拎包，这只包是殷庆宝决定，用公款买来，每个常委发了一只。这种包很便宜，也就是几元钱一只吧！但在当时算是很时髦的了，要比我原先的一只几角钱的塑料薄膜的拎包气派得多。拎在手中的物件，从几角钱升到几元钱，似乎身价也提高了，是么！这种包在总部还只是我们几个头头才有。

我的包中塞进了这一万元，也就非常充实和饱满了，这一万元巨款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我这个临时工的工资收入是每天一元八角，一个月工作 26 天，只有四十六元八角，因为按照规定临时工休息日是没有工资的，实做一天算一天。那么仔细算来，我要工作十七年十个月二十一天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如果要靠这区区四十六元八角的工资省吃俭用积攒的话，一辈子也攒不了这笔财富。拎着装有如此巨款的包，不能不令我小心万分。

包中虽有巨款，但我自己的口袋中几角钱的零票已经凑不满一元钱了。自从出来造反后，开销要大得多，每天的三顿都要在外面吃，尽管节约、节约、再三的节约，算了又算。一个月四十多元工资本来大部分是交母亲家用的，现在只能交二十元，余下的二十多元的钱还是不够我用。

在等银行开门的时间里，我同我的随从逛了几爿百货店，我很想买一条围巾御寒，因为我每天坐在摩托车后，迎面的风直朝胸口钻，冷得彻骨，身上多年的对襟中式棉袄，显得又小又单薄，哪里抵御得这尖利的寒风，里面的绒线衫更是又小又短，我想，有一条围巾就好得多了，至少可以不让风直接往脖子里灌。我看中一条便宜的只有几元钱的围巾，但是我的口袋没有钱！

抬头看了看店里的电钟，时间快到了，我只得退出店，到银行去，领出了一万元经费。出了银行的门，我的随从几次要帮我拎包，都被我拒绝了，最后一次拒绝使他好不扫兴。我也看到了他的不高兴，倒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这一万元的担子太沉了，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走过刚才的百货店，我不知怎么的，禁不住自己的御寒欲望，信步走了进去，我把手伸进包内想抽张十元钱来买围巾，但我的心却卜卜地猛烈跳动，像小偷偷钱似的一阵慌乱。但我终于从整齐的一迭一百张十元钱中抽出了一张付给了营业员，慌乱地拿上围巾塞进包中，急急忙忙拉上拉链，收下零钱，逃也似地出了店门。

走在西藏路上，我偷眼看我的随从，他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我一路走一路想，他刚才看到了我从公款中抽出那张十元钱了吗？大概没有吧！摸摸口袋中的钱，这三、四元钱的零找又可以过几天了。转而我又想，啊呀！我真昏头了，我等会如何把这缺了十元钱的一万元交给杨福海呢？我能对他说，我已经预先挪用了十元钱，等几天再归还？这多坍台呀！我一路胡思乱想，已经走到人民广场中间的司令台。只见朱力军站在有一人高的木制高台上指挥，他见了我马上向我招手："快去总部，华东局有当权派找你。"

这一喊，把我从十元钱的苦恼中喊醒。我向四周一看，我们的人在四下活动，有的排着队，有的在紧张地向四处奔跑。我问："有什么事？是谁找我？"不等他回答，老陆——我的摩托车手，已从另一头把车驶了过来："快上车，我已在广场上兜了几圈了也没有找到你。"我被他的紧张催促弄得也紧张起来，马上跨上摩托车问："找我什么事？"他一面起步一面说："不知道。"我们风驰电掣般地向总部而去，我一路上想，出了什么事？是谁在找我？摩托车高速行驶在延安路上，这样的高速，又是两个手戴造反队臂章的人（那时也只有造反派才能开着摩托车在马路上行驶），来往的车辆都急速避让，到乌鲁木齐路总部是一瞬间的事。

我一口气冲上三楼我的办公室，华东局的黄宇齐端坐在靠门的桌边，见我进来，马上起立，热情地与我双手相握："你来了。"我说："让你久等了。"我望着他，心想他来不知又为何事。

他说："有事要同你商量，你们一月五日在人民广场开会，我们一定支持，经费已经拨下，不过你们提出的名单，我们有困难。"他面露难色，继续说下去："曹萩秋被造反派带走后，已经几天没有消息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一听急了，曹荻秋是"主角"，这次大会，如果少了他，那就要逊色不少，上次在文化广场的会就没有市委的头参加。这次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开会，是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而且按照我和杨福海的设计，大会还要请全市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参加，如果没有他，大会岂不是又要降格不少？我们红工司的面子往哪放？

不行，无论如何不行，一定要争取到。我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不行，请华东局一定设法找到，这个会没有他，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他说："实在是因为没有消息啊！我们已经派了不少同志去打听也找不到。"我问："他是被哪一个组织揪走的？"他为难地说："原来的组织又交给其他的组织，转来转去也不知现在哪一个组织的手里。"

我说："请你们无论怎样也要设法去找，没有他不行！"他见我态度这样坚决，只得无奈地说："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吧！"

当时我根本没有理会“到时有困难再商量”的意思，实际上从后来的情况判断，他们是知道去向的，只是无法同那些红卫兵组织讲得通道理。要不到人，才来告诉我找不到。但我却不知深浅大大咧咧信口回答道：“好吧！到时有困难，我们再商量。”

缺少社会经验的我，只知要出造反派的脾气，蛮横地一味要人，要曹荻秋这块“金字招牌”来装点我们红工司的门面，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最革命的造反派。

送走了态度谦和的共产党高层领导，我这个毛头小伙子，不能不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似乎感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我步履轻松地跨上三楼。啊呀！少了一样东西！

我的包呢？一万元！

一条围巾的价值

刹时间，我一身冷汗冒了出来，平生从未拿过的一万元巨款，现在丢了！

丢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的，也就是说包在什么时候脱手的，我全记不起了，顿时我脑中一片空白。如果是骑在摩托车上丢的，那就不可能找回来了。越想越怕，汗水止不住的流。我返身冲下楼去，找上毛胡子老陆：“快！送我去人民广场。”他看我神色不对，疑惑地问出了什么事？纠察队的值班人员也在看着我。

我连说：“快走。”他发动了车子，我一下跨了上去，驶出总部后，我说：“出事了，刚从银行领出的一万元丢了。”他听了猛地把车刹住，停下问我：“什么？一万元落掉了？”我懊丧地说：“一万元的大会经费，刚从南京路银行里取出的。”他也显得非常焦急，问我带谁去的。我说是小卜。他说是不是他靠不住？我连忙说不是，不是。他听了猛地把车往前一冲，车比来的时候开得更快。

完了！我的一切全完了，我怎么向大家交待呢？我的呼吸感到憋得慌、闷得似乎要死过去。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在卡着我的脖子，我顺手扯下它来。啊！就是那新买的围巾，迎面扑来的冷风吹进胸口，被汗水浸湿的棉毛衫紧贴身上，一阵彻骨的冷，让我不禁一阵冷颤，手提围巾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太沉了，一万元！一条围巾的价值！

人民广场到了。车在木制高台前嘎然刹住，我立即跳了下来。朱力军仍在台上，他神情

严肃地问："你丢了什么东西？"我忙说："我的拎包，刚从银行取出的一万元经费。"我仰脸看着他。

他像救世主似地慷慨："拿去！点一点少了没有！"

我的心，紧紧被吊起的心，一下子松了下来。他无疑救了我，我对这位大恩人能不信任吗？我故作潇洒地说："不用了。"我双手接过拎包说："这是大会的经费，如果没有你，后果真不堪设想啊！"我再三向他道谢。

他却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对我说："这里的预演很成功，我要把人马撤回去了。"他向部下发出解散回总部的命令。

我跨上摩托车，要毛胡子送我去陆家浜路杨福海处。车驶到近威海路广场出口处，我突然要毛胡子把车停下。他停下后，回过头来不解地望着我，我说："老陆，你身上有钱吗？借我十元钱。"他说有。我接过他从前面递过来的钱，偷偷的把十元钱塞进包里。

车平缓地行驶在马路上。我想这只包是在什么进候脱手的呢？想来是在毛胡子心急火燎地催我走时，我想起要坐摩托车了，该是用到新围巾了，于是我从包中取出围巾，用双手围围巾时，包才脱手了，这该死的围巾！该死的围巾！

当我踏进他们一大间办公室时，杨立即带领众成员起立拍手欢迎，他笑容满面："欢迎组织部长光临视察，这就是我们的部长小沈同志。部长的光临体现了对我们的关怀，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和鼓励，请部长提出意见和指示。"这短短的几句奉承，不免使人有挨了拍马的难堪。他见我尴尬，马上把手一扬，众成员立即埋头各人的工作。他们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急忙打开拎包，一叠叠理出那使我惊出一身冷汗的一万元经费，与他一一交割清楚后，我长出了一口气。真的！这时我感到一身轻，既从失去一万元的恐惧心理下解放，又从我挪用了这十元钱的公款阴影中解脱，就是这一瞬间的私心铸成了几乎终生无法弥补的过错，这个教训我终生难忘！

王洪文要我们取消广场大会

我询问了一些筹备工作的进展，邀请了哪些造反组织，他们的反应如何？同管理人民广

场的机构是否去联系过？车辆的调度等等，他一一作了回答，我听了非常满意，在我要走时，他笑咪咪问我，这几天天气寒冷，请示能否添置一只煤饼炉，一方面可以暖和一些，另外也解决了众人喝开水的问题。我爽快地同意了，他马上起立向全体成员宣布："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沈同志同意添置一只煤饼炉，这是组织部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代表大家感谢部长的关心。"他又带头鼓起掌来，我从没有受到过这般奉承，混身不自在，只得匆匆向大家告别，逃出去了。

大会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上到下一派有秩序的繁忙，整个红工组织充满了勃勃生机。我向各区分部，各系统的总队发出了选送人员上大会主席台的通知。我们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要在全市人民面前亮相，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这对"四十万红色工人"来说是何等鼓舞人心！我们备受社会的歧视，在人民广场上开我们自己的大会，这是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上海人都知道，人民广场在十七年来，仅仅是上海党、政、军的要员举行重大庆典的场所，平民百姓是无法登台的。从下面的反馈来看，这一举动已经深得民心的。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堂皇的口号后面，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和前途，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吃饭问题，这就是力量的源泉。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是为私"造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说对了。在筹备过程中，在后来大会进行过程中，十数万人以热烈的态度给予我们信赖和拥护，其热烈程度和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成功程度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组织的广场大会。

人们热切地盼着 1 月 5 日的到来。然而费敏璋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

他从工总司回来，派人到处找我，焦急地等待我，当我跨进他的办公室，殷庆宝已经先我到了，看来他们俩人已经交谈过了。两人面无笑容，紧绷着脸。

殷庆宝见我来了，就说："让费敏璋先讲吧！"他又特地补上一句："让他讲完了你再发表意见。"

费敏璋说："工总司王洪文要我们撤消一月五日的大会。"

又是王洪文！我一听跳了起来，我刚想开口，殷庆宝制止了我，要我听下去。

费说："今天王洪文同我谈了，一定要我们撤消这次五日的大会，他们一月六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

"原来是这样。"我松了一口气："他工总司开他们的，我们开我们的，关他什么事！"

费一脸为难地说："我们要顾全大局，王洪文既然这样说了，我的意见还是取消算了。"

他的话一出口，马上遭到我和殷庆宝的反对，殷说："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使命。"他在历史使命这四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四十万红工把这历史使命交给了我们几个人头上，我们要对得起全市四十万红工，我们临时工自己不推翻这个临时工制度，谁来推翻？"

我的态度更为激烈："王洪文算老几？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他对我们红工干了些什么？他哪里想起过我们？噢，怕我们的会开得成功，影响了他第二天的声势？哼！我们偏要在上海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面前、在工总司面前显示我们红工的实力，这个会开定了。"

三人都沉默不语。空气是那样的凝重。

我暗然神伤地说："工总司有后台，红革会消息灵通，差不多的组织都有背景，而我们呢？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我们不干些实实在在的事，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再说会议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四十万红工全知道了，现在宣布不开了，对革命群众如何交待？对下面的头头如何解释？"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上，头发上都在呼呼向外冒火。看着费为难的熊样，不由我更加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会开定了，有什么后果的话，由我一个人来负。"

这一连串的发问，说得费敏璋低头沉思，他似有话要说，但又没有说出来，这个时常被殷庆宝嘲笑为三拳头打不出闷屁来的书呆子，这时抱着头憋着气。僵持了半天，谁也不说话。最后不得不由殷庆宝开口，要费敏璋立即去工总司，阐明我们的立场和决心，人民广场的大会我们按时召开。我又接着提出，作为妥协，我们也组织人参加第二天工总司的大会。

傍晚时，费回来了，情绪还是那样沉重。他的性格就是少言寡语，事情也就坏在这上面，像这样性格的人，不善交际又不善言谈，如何能同其他组织融洽相处，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呢？而且也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因此从来也没有完整地把外面的所见所闻，自己所做的事完整地向我们叙述过，即便谈了，也只是简单的几句表面现象，似乎他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判断能力低能儿。如果不知道他还能写点文章的话，我一定会把他当成白痴。

他只是软塌塌地对我说："今天晚上王洪文要你前去见他，时间是晚上六点，在武康路 2 号，王洪文在那里等你。"看来费敏璋已经把我的激烈情绪和我们的争论如实地向王洪文交底了，王洪文清楚费敏璋这个常委主任只是一个不掌实权的头头，对殷庆宝可以撇在一边，只要摆平我，使我就范，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我明白，王洪文要向我施加压力了。

拒绝王洪文

我和费敏璋按时赶到了武康路 2 号。

这里的环境非常幽静，穿过花园，进入一座颇大的洋房，在楼下宽敞的客厅内，坐着不少人，闹烘烘的在谈着什么。费敏璋抢先几步把王洪文从坐着的那些人中叫了出来。

王洪文迎面出来，把我引向外面一点，似乎不想让我听到那些人的谈话内容。

这是我第四次见到王洪文。他同我随意握了握手，并没有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认真商谈的意思，我们大家就站着说话。

他开门见山："今天约你来，想同你谈的是，你们五日的会还是不要开了。"

好个妄自尊大的王洪文，我为什么要俯首听命于你，我傲慢地说："这是我们红工司决定的事，我们筹备工作都已做好，通知也发下去了，这是没法取消的。"

他说："你好好考虑，还是不要开的好。"

他在威胁我吗？我不服气地把殷庆宝的话套用起来："我们有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个会是一定要开的。"

王洪文马上把我的话接了过去："我们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夺走资派的权，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我们要团结起来。"说到这里，他突然伸出双臂热情地同我拥抱起来："我们都是工人兄弟，何必要分成两家呢？"

好个政治流氓！在需要我们退让的时候又想起"团结"了？又想起我们红工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之一了？你刚才不是一开口就向我下令了么？在我口气也硬的时候，你却会演出外国人才用的礼节！

我不为所动，把他轻轻推开。

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工总司六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市委的大会，你五日的大会我看就没有必要召开了。"

我还是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王洪文终于露出他的目的说："我们两家本是一家嘛！两个大会可以并在一起开嘛！"

我一听，什么？又要来利用我们了，要我们来为你撑门面。我退后一步说："我们五日的会一定要开，这是我们的事，但是我可以组织人参加你们六日的会，费敏璋上你们的主席台。"王洪文没有接我的口，自管说下去："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没有什么原则的分岐，都是造反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两个司令部干脆合并起来，共同对付陈、曹不是很好么？"

好哇！干脆要吞并我们四十万人马了，你王洪文指挥不动二兵团，就处心积虑来收编我们了，这样可以壮大你王洪文的力量了。我断然拒绝："我们红工司的事，由我们决定，五日的会非开不可！"说完后我扭头就走。费敏璋连声叫我，气得我把他也甩了，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武康路 2 号。心里好痛快呀！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写到能够断然拒绝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的无理要求，出一口恶气的时候，心里确实很痛快。但是，我不能不再想一想，为什么当时我就没想到让费敏璋去通知王洪文，叫他到我的总部来呢？为什么王洪文有求于我，反而是我到他的总部去了呢？我那时虽然心气高傲，血气方刚，但又太幼稚、太实在，实在太没心眼。那天，我本来应该赢得更漂亮！

人山人海的人民广场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清晨，人们早早来到了总部，匆忙的脚步声打破了往日这时该有的宁静，人们忙而不乱地分批奔赴人民广场，我也跨上毛胡子的摩托车赶去。

广场的通道已经封闭，车辆已经不得入内，朱力军布置的纠察人员已经在有条不紊地活动，当我赶到广场中心的司令台时，杨福海已经指挥着人在张挂司令台上方的巨型横幅。

我信步走上司令台，广场内红旗招展，各路队伍打着红旗陆续进入广场，从东西两面进入广场的队伍向司令台前汇聚拢来。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昔日只有上海党、政、军要人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和庆祝大会的司令台上。我们的大会即将召开了，一种说不明白的滋味涌上心头。

我是整个大会的指挥者。在会议的程序中，我没有安排自己发言，我对这种干巴巴的发言不感兴趣，不想出这种风头，我忙我的后台总指挥，前后奔忙着，不时有人来向我请示一些突发的需要立等解决的问题。

时间过得很快，司令台上已经坐满了人，这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是下面各分部各系统的代表，还有上海各造反组织的代表，当然不能没有工总司和红革会的代表。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两大组织代表的发言。

司令台的东侧传来洋鼓洋号的声音，我瞧那帮吹鼓手鼓起嘴巴起劲地吹奏，像是走江湖的，与整个司令台上的革命气氛是那样的不协调。一丝不快掠过我的心头，杨福海这人办事老练，什么事都安排得好，井井有序，就这事不好。算了吧！已经上台了，就让他们吹吧！再看台下，整个的广场已经挤满了各区的造反队员。这就好了，这就是成功的标志。随着司令台上的指挥，整个广场上雄壮的语录歌在不断高唱，人们在等待着大会正式开始，预定的时间早已过去，大会却迟迟不能宣布正式开始，我被焦急的心情所笼罩。

整个大会十几万人挤得广场满满的，华东局及市委的一些当权派也已早早到场，唯独还有一人没有到来，至使大会不能宣布开始。这人就是市长曹荻秋。这个主角不出现，我们的大会如何向市委“声讨”和“开火”啊！

华东局的黄宇齐再三向我说明曹荻秋被造反派揪走后音讯全无。言下之意，我在这之前就已经向你打过招呼了，我们不是有言在先：有困难再商量吗？

我不信他的话，认为这是托词，我执拗地坚持，今天这个会一定要把他揪来。否则我们在其他造反组织面前的面子丢尽了。我耍了“造反派的脾气”，表示：一定要把曹揪来，他不到，我们就在广场不散。我咄咄逼人，毫无商量余地。

我这种造反司令的最后通牒，急坏了华东局的韩哲一和黄宇齐，他们同手下的人焦急地商量着。其实我也急坏了，时间已近中午，大会还迟迟不能开始，不断有人报告，群众有向广场外走散的趋势，我听了异常焦急，如果任其发展，这十几万人的大会不就完了吗？

朱力军又派人前来请示：“群众已大批向外涌，怎么办？”我当机立断，下令封锁各通

道，不准出去。这是不得已的命令！人们还是在等待，但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台上坐席中那些请来的造反组织的代表和其他的人员已经不那么正襟危坐了，他们在交头接耳，似乎在切切私议我这组织部长、大会的总指挥无能。遥望台下，十数万人的队形已经紊乱，不像原先那样按各单位序列排成行。不管司令台上如何领呼口号，领唱语录歌，下面响应已经稀稀拉拉，不像早先那样划一雄壮。后来干脆不能再用这种呼口号唱歌来拖延时间了，人们全松了劲，应了“士气三鼓而泄”的古训。

这时朱力军又派人来告急：有的单位集体排着队要求离场，已经同封锁道口的纠察发生了摩擦，人们不断向我告急，而这时会又不能开。我这人也真固执得出奇，现在想来，当时就把会开起来算了，何必要争这一个人呢？可见在那个年代，造成了一批狂妄自大的自信者，充分在这政治舞台上表演了一番。

怎么办？我的自尊和自信使我跨上毛胡子的摩托车，驶向道口，向要带队离去的头头交谈，向他们解释会议不能如期召开是因为曹老头没有到，向他们抚慰一番，平息了他们的不满，人们重又回头向广场中心走去。我索性绕场一周，向人们招手，请群众安下心来。我用我在造反中树起的威望，以我的身份，总算稳定了人们的情绪。

当我重上司令台时，市委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打听到曹荻秋的下落，他被同济大学的“东方红”红卫兵组织扣留住，华东局和市委再三向他们协商要人，他们就是不肯放。我说，难道你们没有告知他们，我们红工司在人民广场要批斗他吗？来人为难地说，我们什么话都说了，他们就是不放人。

到同济东方红要人

我怒火中烧，这些同济的学生，太目中无人了，太小看我们红工司了！我对这些人说，我亲自去。我返身上台把红革会的代表——一位女红卫兵——请了一起去，也请华东局的黄宇齐随我一起走，加上市委的工作人员和我的随从，分乘好几辆小车，（那红革会的头头与我乘同一辆车），从司令台后面人民公园出去。

在车上那带路的市委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曹荻秋在同济被“东方红”批斗，他们已经关押他好几天了，一直不放他回家，也不让其它的组织带走。我思考了一会，心想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是今天的会上总要让曹应应景，就对身旁红革会头头说：“我们今天的大会一定要曹荻秋到场，这个场面你也已经看到了，所以等会请你以红革会的身份做做‘东方红’的工作，务必把曹老头交给我们，就算是借给我们，会后我们再送还给他们，你说好吗？”

那红革会头头答应帮助去做工作。

只有那个时代，堂堂一个上海市长，才会被人当成一件物品似的“借”，一个上海市的党政要员在文革中竟落魄到如此地步。

那时路上车辆稀少，交通顺畅，车队很快进入同济大学，东拐西转在一礼堂前停下，会场内不时传来阵阵口号，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还在批斗曹荻秋。下车后，他们要我稍等，我和我的随从站在外面，他们进去交涉去了。

我在树木葱笼的小径中焦急地来回踱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这里就是闻名的同济大学，这里的“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组织，仅仅是同济校园内的学生组织，在上海浩大的造反大军中，是一个刚冒出来的无名小卒，其知名度远不能同红革会相比。这个组织直到半年后才闻名全市，被上海人讥为“投机（同济）东方红”，是以其头头陈干峰善于在政治上投机（因此叫他“陈看风”）而得名，这是后话。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好像已经过去了半天，他们出来了，告诉我“东方红”还是不愿交出曹荻秋，说他们下午还要继续批斗。我一听火就上来了，我声色俱厉地对红革会头头和市委的人说：“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即将曹荻秋交给我，我立即把人民广场的四十万人拉来，踏平同济东方红，我倒要看看小小的一个同济东方红有多大的能量。”

这一下市委和华东局的同志全围了上来：“这不行呀！这不是造成工人和学生的流血事件了吗？”黄宇齐说：“这责任我们负不了，怎么向中央交待呀！”

还是造反派脾气！“我说到做到，在五分钟内还不交人，我马上就去调人。”

这话一说，使他们完全处在两难的境地。可以肯定，他们在学生们面前也遇到了蛮横不讲理的造反者，于是一时手足无措地呆立在那里。

我愤怒地带着我的人向会场内走去，我的举动吓坏了在场的人，他们生怕我当场同学生发生冲突。市委的同志马上拉上红革会的头头抢先朝后台走去。我就站在后面观察形势的变化，当然我也不希望发生冲突。

不一会，“东方红”让步了，宣布散会，答应把人交给我。

他，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微低着头神情疲惫地向我们走来，从他满面的倦容来看，连日的批斗，对他的折磨是多么的巨大，满头的银丝下，他的面庞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他走几步还不忘停下来回头对台上的那几个刚才还在批判他的头头看一眼，大概算是一种告别的招呼，似乎对刚才的批斗毫不在意。

我们一行人从灯光明亮的后台向外走去，那些红卫兵们闪开在两旁让我们通过。我回头向还在台上的那几个同济东方红的头头看了一眼，他们的脸上怒气未消，用好斗的目光尾随着我们。我不禁轻蔑地一笑，你们必竟斗不过我啊！

到了外面，在青翠的冬青树旁，站满了红卫兵，这些刚从会场里散出来的学生，他们要在近处看看这位上海的市长"走资派"，稚气未脱的脸上充满了好奇，当市委的警卫人员把曹引向一辆小轿车，曹进入车子后，仍有学生把脑袋伸向车窗，再度仔细看着这位市长。修得整齐的冬青树是那样青翠，高大的梧桐光秃的枝干指向晴空，冬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四周那样宁静，学生们看着我们上车，刚才从会场内爆出充满杀气的口号声，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世界上的人，似乎都在做戏。

车队飞快地驶出同济大学转入四平路，进入市中心，一路没有红灯的打扰（那时的红绿灯是交通警用手操作），从南京路的人民公园大门直驶到广场的司令台下。我们一踏进台后宽大的休息室，原来坐在沙发上的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当权派纷纷站立起来迎接我们。我很清楚，他们迎接的是曹，而不是我，我只是他们表面上必须应付的"造反头头"，他们围住了曹，曹对他们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随即在中间的沙发上坐下，让宋日昌副市长坐在他的边上，立即低声交谈起来，似乎是在抓紧时间交换这几天的形势和情况。

我当然不会在意他们对我的冷落，马上让人通知台上，大会正式开始！不一会外面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大会终于正式开始了。

旌旗与呐喊的波涛

这时我忙着指示工作人员，赶快做几面批斗用的牌子，这是我在出了同济后在车上想起的事，可能是受了红卫兵批斗场面的影响吧。挂牌批斗在那时是非常时兴的"革命"行动，被斗者弯腰低头站在"革命群众"面前挨斗。胸前挂着一块宽约二市尺，高约一市尺的牌子，上边打上两只洞，用铁丝或绳索穿起来，挂在被斗者的头颈上，牌子上面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被斗者的姓名，冠之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派、特务、叛徒等等。再在姓名上用红墨水打上大×。这样的一块牌子挂在脖子上是很累人的，有的地方故意用铁丝、木板制作，

既增加重量，又让铁丝勒入皮肉之中，弯腰低头时间长了，就成了酷刑。

本来大会并没有打算挂牌批斗，只是要那些当权派到场就行了。上次的文化广场大会，还请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与我们同坐台上，又发了造反队袖章给他们（这是上海滩上绝无仅有的事）。但那次会没有请其他造反组织参加，今天这种规模巨大的批判会，又请了其他造反组织，如果还那样"温良恭谦让"的话，会使别人认为我们不是造反组织。但我和杨福海事前根本没有设想这种时髦的激进做法。啊呀！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总不能让他们同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坐一起吧！所以我一踏进司令台后的休息室，马上下了制作牌子的命令。我下达命令时，担心手头没有材料，无法立刻做出这十来块要紧的牌子来。

这时整个人民广场的十数万群众，在会议主持人的领读下，读毛主席语录。当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时，我走上司令台，走到并排的四、五只话筒前，宣布曹荻秋已经被揪到了，我大喊一声："把走资派押上来！"以曹为首的走资派挂着牌子走了出来。（想不到就在这几分钟内，在一首东方红乐曲和领读几段语录的几分钟内，我的工作人员居然用纸箱和草绳制作好牌子。）在曹的后面是宋日昌等人，最后是官衔最小的劳动局长王克。

这一长溜上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的出现，使十数万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我必须着重指出，这是欢呼，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啊——啊——啊——"的呼喊，而不是有人领呼口。今天是几十万临时工、外包工扬眉吐气的日子，上海最大的当权派在他们面前低下了头，将接受他们的批判！今天，临时工、外包工的兄弟姐妹可以理直气壮地批判临时工制度，争取生存的权利！

欢呼声和旌旗的摇动有如大海的波涛，一阵接一阵地向广场的边缘滚去，煞是雄壮好看。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呼场面，是上海大型群众组织集会中绝无仅有的。我不由心头一热，挥手向群众招手致意。

海涛般欢呼轰鸣了一阵后，有人领呼起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来，在这一阵激动之后，不知怎么的，我竟然即兴演出了一场一问一答式的批斗闹剧，这在当时是很时兴的。我事前一点没有想起过要搞这一套，完全是在这时随想随讲即兴发问。我站在曹的左侧，在我们的面前是几只话筒。我一付慷慨激昂的样子，我的问题得到曹的否定回答时，我就振臂领呼口号："打倒曹××！""曹××必须低头认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广场上的群众也随着高呼口号。

这位市长大人对于给他扣上的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等等的帽子，再大他也不怕，但只是涉及到具体的某一事，某一政策时，他就装糊涂："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逼急了，就转移方向，不正面回答。他虽然低着头，看来是那样的驯顺，但透过他的金丝边的眼镜，一双老年人特有的充满自信的眼睛在狡猾地闪动，当我大喊口号："打倒……"时，我在同济园中看到的他脸上那股刚毅的神态，复又闪现出来，近在咫尺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这股气势，他的满头银丝也似乎在嘲笑我这青年人的无知，我只得以"打倒曹××"而告终。

会议过半时，突然我的工作人员来找我，把我引入休息室，一批华东局及市委的警卫人员又出现在我面前，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客气，把我让入沙发落坐，对我恭维了一番。

一个曾同我打过几次交道的同志说："我叫郑方南。风雨操场时，你的大会保卫工作做得太好了，没有你的配合和指挥，我们真不好办呢！首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首长在台上受到造反派的批判，但我们还是要为首长的安全和健康考虑。"

在他们的捧场下，我不加思索地说："那当然，我们红工司既请当权派来了，就有责任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去。"他马上说："是呀！你们红工司比任何一个造反组织搞得好，我们对你的保卫工作是了解的，我们曾经合作过，今天只有你才能做好首长的保卫工作。"

在他们的吹捧下我有点飘飘然了。当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造反组织中，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没有胡来的地方，办事小心谨慎，再说我们组织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对政府，对现政权并不构成威胁，没有什么破坏力，说到底只是一群循规蹈矩的请愿者，对流行的"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调不甚明瞭，也不想去探究。临时工既是五八年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产物，也是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我们这些人是这个时期的牺牲者，每个人都有一段曲折的坎坷经历，在极左的政治高压下形成小心翼翼、逆来顺受的处世哲学，在这么一个群体中，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激进的造反领袖。我们这几个常委，不可能干出年青人简单盲目的举动来，遇事一般总能前思后想，唯恐走错路。我们组织在早期那个化名"老杨"的创始人领导我们"造反"时的举动，给我们树立了楷模。要说我比其他几人相对还算激进一点，提出不要打经济仗，要打政治仗，想跟着造反潮流前进，但在以后的行动中，始终不可能脱出临时工造反的框框。眼前的人民广场大会，我们提不出打倒市委、夺权等政治口号，我们口号的核心还是砸烂临时工制度。所以在政府要员乃至他们的警卫员眼中，我们这群循规蹈矩的请愿者，当然要比其他的组织好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

让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话题。

那姓郑的同志接下去的话，却让我愕然："首长在这段时间被一些造反组织揪来揪去的批斗，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过家。现在的问题是，在司令台的前后，已经被各个新冒出来的组织包围了，他们就等着大会结束后，就要揪走他们，小沈同志你看怎么办？"

这消息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我的为人，我的经历，使我不可能倒向这些组织，把当权派交给他们，而且刚才我已经说了，有责任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去，我不能食言。我也看不起这些新冒出来的组织，我不愿让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当权派带走。我的工作人员插话证实说，各种组织已经向我们提出要求“借”当权派。他们要借当权派的真实理由是明摆着的：因为他们是刚冒出来的各种按自己的职业经历凑合起来的组织，还没有得到承认，他们要合法的地位和组织经费等等，因此他们急于借当权派来斗，逼迫当权派签字承认。

那些警卫人员继续说：“一些人已经把司令台的出路围住了，我们商量下来只有请你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我说：“这样吧！我们送当权派出去，不用理会外面的这些组织。”但这些警卫人员是老练而又负责的，他们要我谈得再具体一点。

我仔细想了想，那些人要当权派心切，绝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目标明显的机会，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动手抢人，我一时犯了难，想不出用什么好办法把这批当权派在光天化日下稳稳当当地送出去。我只得说：“大会结束后，我亲自送你们走。”

但郑同志紧盯着问：“请你具体谈一谈。”他显然还是不放心。说真的，我想不出具体的办法，但是我年轻好胜，尤其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之中，是我把曹老头揪来了，群众对我在司令台上出现时发出的欢呼，我向十几万人挥手致意，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成功，我能让最后一件事难住吗？我不愿在他们面前示弱，反攻为守说：“那你们有什么办法，也谈谈么！”这一来他们面面相觑，被难住了。

我看着他们的窘相，不无自信地说：“既然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你们这些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就看我随机应变吧！”我骄傲地指着我的纠察大队说：“你们放心吧！我总部的人有的是办法，每辆车上都安排上我总部的人，到时保证送你们出去！”这么一来他们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但显然他们对我的回答是失望的，不过有一点他们是明白的：我愿意放这些当权派走，而且不想把任何一个当权派交给其他组织。从他们向我们组织坦然地提出保卫首长安全，并让我们斗完他们的首长之后交给他们，已经说明市委的警卫们已经从我们组织在风雨操场等一系列造反行动的比较文明的举止及良好的组织、调度能力上把我们与其他组织区别开来，因而对我们比较信任。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了一会，还是那郑同志说：“到时请你安排了”。

我撇下这些警卫人员，到外面去察看了一番。通人民公园的路，在我从同济回来时，还是一条清静的安全通道，现在已经涌满了人群。仔细辨认，江湖味十足，不是我们组织的人，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我有点抱怨朱力军的疏忽，但为时已晚。显然在我们总部有人在放人情，否则这些人是不可能进入司令台后面的，这里我们布置的人员太少了，力量单薄，司

令台附近的警卫人员仅仅只能守住大门，怎禁得起几百人的冲击呢？看来，靠这少数人是无法冲出重围，把当权派安全送出去的。我立即派人，向朱力军传达我的命令，立即把外围的纠察人员全部向司令台后面集中，用来对付这些杂牌造反者。

有人对我说，台上的乐队吹鼓手们就是一个什么组织，他们也已向我们提出要借当权派——劳动局王克局长，是他们发现了后面这条通道，于是他们引进了这些人。我一听，对这些各种名目的组织更没有什么好感。

朱力军带着他的全部人员进入司令后台，我立即要朱力军布置人力，把这些当权派护送出去，一个也不能交给人家，要他随机应变，用各种办法送走。同时要他把广场同司令台的通道封死，不准再放人进来。

然而，晚了。这时，大会已接近尾声，宣布把走资派押下去时，司令台后人群骚动，广场方面不断有人向台后涌来，我们的纠察只得极力筑起人墙进行阻拦。

在休息室内，我们的人员和市委的人员闹哄哄地乱成一团，当权派挂在颈上的牌子被摘下扔了一地，人们像逃命似的，心慌意乱，每个当权派都听着他周围的人摆布，忙乱地向外涌去。朱力军的干将调动一长串的小轿车向我们靠拢，我大叫："快上车！快上车！"

这时，突然有人高叫："快让开，快让开，有急救病人。"我回头一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极力排开众人，从休息室抬出一付担架来，一位病人躺在上面，居然戴着一副大口罩。

绝了，这位病人不是别人，是副市长宋日昌。远处的一辆救护车被招引来，病人一上车，这辆救护车抢先发动，急促的铃声摇将起来（那时的救护车是用人手摇铃铛来警告人们避让），人群后退了几步，我对后面的车大叫："赶快跟上！"但可惜只有一辆车跟着冲了出去，（事后知道这是殷和费的车子）人群又合拢起来，把道路阻塞了。

我们的纠察冲上前去，努力把人群压向后面，企图挤出一条路来。人们在相互推挤着，看来时间越长，越是不利，因为从广场不断有人涌来，欲把进人民公园的道路阻挡住。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当机立断，走到最前面的一辆车前，对后面的车辆大叫："紧跟我的车，一切听我指挥。"我坐进车内，对司机说："快开车，冲过去。"司机扭头对我看了一眼，不明白怎么能在这么窄小的人缝中开过去。我说："我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一切由我负责，快！"眼看前面的路有进一步被阻的危险，人们还在向前涌，我不顾一切地说："你只顾开快冲过去，一切由我负责。"我打开车门，探出半个身大叫："让开！"——只见纠察人员一阵努力把人群稍稍压向后面，让出一条窄窄的路来，这时我的车抓住时机开动了，那司

机驾车快速向前冲去，人们一惊，本能地向后倒退，车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人们一路纷纷后退，车已经横冲直撞到葫芦口了，只要冲过这口子前面就没有阻拦。我往后看了看，担心后面的车子没有跟上。如果我后面的车子与我的车被拦腰切断，后面的车失去指挥，那就糟了。果然在我后面的两辆车在慢慢起步，不敢一下向前冲，正在这时第三辆市委曹荻秋的座车一下从后面冲出来，以异乎寻常的技巧和速度超出了这两辆车，冲到我的车后，填补了空档，这时后面的司机反应过来了，紧紧地咬往前面的车辆。我的车子已经冲出了人群，前面已经没有阻拦的人群了，待到转弯要进入公园时我探身一看，我的车后一长串的汽车紧紧地一辆接一辆地都冲出了人群。

转入南京路，我们的车队向西开去，待开过几条马路后，长长的车队越来越短，最后不复存在——各人的车各自奔向回家的路了。像华东局的韩哲一、黄宇齐就是由我们的人直接送回了东安新村的家。

这些华东局来首长，上台挨批时都是一色的黑色长棉大衣，这样的打扮在上海人中是没有的，这清一色的装扮已经在大家面前亮了相，一眼可以认出而被抢走。我不知道当时是我总部人员随机应变呢，还是他们随机应变，他们出来坐车时把黑棉大衣都脱下交给了我们的人，改变了目标的“颜色”。

我们的人把黄宇齐送到家门口，在分手时，他表示了感谢，匆匆握手道别后，谁也没有想到棉大衣。第二天，朱力军说从黄的棉大衣口袋里发现了黄的一枚私章，问我怎么办？我一看，就说：“一枚私章，倒不能拖着，放在谁头上都是麻烦，你马上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吧！”

当然，曹荻秋也由他的警卫护送回去了。

近看宋日昌

我回到乌鲁木齐路的总部。总部显得有些冷清，看来那些工作人员还在人民广场收拾吧！但是殷、费呢？他们回家了吗？疲劳了一天，我坐下休息一会。刚从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歌声和护送当权派脱险的紧张气氛中脱出来，一下面对这静静的、静静的办公室，似乎失落了什么。我坐不住，又上下走了一圈，怎么啦？难道他们真的回家了吗？连往日最热闹的大队部也特别冷清，那些主要人物也大都不见，只有随我同车回来的人在津津有味地向值班的人讲述一天的经过。过了一会才陆续回来了一些工作人员。

这时，毛胡子悄悄地拉了我一把，把我拖出总部。到了外面马路上，他的摩托车停在马

路边上，要我赶快上车，我好生奇怪！这么神秘兮兮的，干什么呀！他说，“费、殷都在愚园路的总部，你怎么不知道？”怪不得我在这里看不到他们的人，原来他们在那里。

愚园路 987 号的总部到了，这里的门整天关着，我敲了敲铁门，值班看门的老头应声把门打开，一看是我，也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快进去。”

踏进客厅，眼前呈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在中间的椭圆形的红木桌上摊满了白斩鸡、方肉、红肠之类的熟菜，在一只钢精锅内是生煎馒头，已经所剩无几。更让人惊奇的是副市长宋日昌在东首的一端，边上是劳动局长王克，朝南的一边坐着费敏璋和殷庆宝，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或坐或立，他们看见我，马上站起来，招呼我入座。

宋日昌说：“啊呀！你才来，快坐下，快坐下。”他倒反客为主招呼我了。

殷庆宝马上招呼人：“快！再去买一锅生煎来。”

看着这一桌丰盛（当时这是很丰盛的）的酒菜，一阵饥饿感在我胃中翻腾起来，是啊！已经一整天滴水未进了，但是眼前的景象太让我骇怕了，这不是丧失了革命立场了吗？他们是走资派，我们是革命造反派，这……这怎么可以呢！

我不去理会宋日昌的招呼，顺手一把拉着殷庆宝到门口：“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殷放下笑脸，板起面孔，双手一摊：“这有啥？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大家都是人，饭总是要吃的！”

他的面孔难看，大概我的面色也很难看，我反驳说：“可这不是吃饭，有白斩鸡，有绍兴酒，传出去怎么办？你考虑过影响没有？”他生气地撇下我，转身向红木桌走去，大概把我的责难看成是乡下人的大惊小怪。他对尴尬地立着的宋日昌和王克连连让坐，可是那两人还是看着我，没有马上就坐。我只得勉强端起笑脸也请他们坐下，宋这才就坐。

我需要冷静一下，以调节我的情绪，我总不能当场同殷吵架吧。大会的成功是我的工作人员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们也是一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杨福海他们怎样了？收尾工作也不少呀！面对这一桌酒菜，我这个头头能坐下来吃吗？我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你们吃吧！我再到人民广场去看看撤得怎样了。”扭头就走。

我很奇怪宋日昌怎么会到我们总部的呢？而且劳动局长王克也同时在场？

原来，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机应变”把宋化装成“病人”，向特意为大会设在广场的救

护站召来了一辆救护车（抬担架的恰巧是在救护大队做临时工的评弹艺人王柏龄，后来他到我厂里做临时工也谈起了这件往事），人们把戴着大口罩的宋日昌抬出了司令台，送上了救护车，我们总部的人也上了救护车，这辆车冲向车队的前面，殷庆宝的座车紧紧跟上，抢先一步走了。在路上，救护车司机询问开到哪里，总部的工作人员说开到愚园路去。于是，宋就这样被救护车送到了我们总部。那王克也是被我们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带到这里来的。看来这是殷庆宝一手策划的。我真不知他要搞什么名堂。

我和毛胡子很快到了人民广场，这时广场两端已经开放，49 路公共汽车已经在广场上行驶，自行车流在司令台前匆匆而过，夜色苍茫，万家灯火，白天的闹剧已经烟消云散，好像在这广场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再看看司令台没有亮光，看来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离。

毛胡子说："我们回去吧！"我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南京路西藏路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我无法想像今夜与当权派"共进晚餐"的举动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只觉得口渴难耐，什么话也不想讲，毛胡子把车向西行驶，从黄陂路折入南京路向静安寺而去。我的情绪平静多了，我能回避么？我为什么不回避呢？但我无法选择，还是随毛胡子重新走进了愚园路 987 号的大铁门。

这时客厅的气氛已经轻松随和得多了，宋日昌已经非常随便，摆出一副长者对青年人的宽容气度，面露笑容，背靠在椅子上，舒坦地伸展着他的腰板，也许他好久没有这样舒展过了。在他的身后站着王克，尽管他的身旁有一只空椅子摆着，是为他设的，我落座时，出于礼貌也请他坐下，而他却再三推辞，把我弄得很僵。宋日昌对他说："你坐吧！"他才落座。真是穷讲究——在这种场合，王克还不忘森严的等级臭礼仪。他大概知道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夫妇和大臣范蠡被吴国俘虏，在关押他们的茅屋里，范蠡都不忘记让勾践夫妇坐着，自己侍立一旁，行君臣之礼。所以我让他坐，他不敢坐，只有他的主子宋日昌叫他坐，他才坐。

我坐下后，宋日昌问："人民广场的群众都散了吗？"我回答了他，他连说："好！好！"有人给我一杯酒，我推辞了，要了一杯热茶，为我买来的一锅生煎已经只剩一点温热，殷庆宝为我和毛胡子各盛了一碗生煎馒头，同时也为局长盛了一份，啊！原来这位局长大人也同我一样，饿着肚子呢！我的一份很快吃完了，我请王克局长再添几只时，他推辞说已经饱了，放下了筷子，我看他碗中还剩了几只没有吃，哼！又是假客气！我为自己添了一份，就着热茶狼吞虎咽地吃，有人又为我递来一杯黄酒，我还是拒绝了，我喝我的茶，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决不喝酒！

酒确能沟通人们的感情，看模样宋市长已经喝得不少了，话语随便而且多起来，他以长者的口吻说："我早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比你们还年青。"指着我说："对！和你差不多。现在老喽！对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理解呀！"有人笑着说："你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他不无感叹地对着我说："老了，还是你们青年人比我们行，今天组织了那么好的大会，这是其它组织比不上的，你的能力很强啊！"

殷庆宝听了有点不悦："我们组织部长是这里在座中最年青的。我们常委是集体领导，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由他去执行。"

宋日昌似有觉察，不再继续夸奖我，喝了一口酒，脸色已经微红，他说："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不好理解啊！天下要大乱，而且要越乱越好，这怎么得了啊！这样乱下去，乱到哪一天啊？"他的概叹也真让人同情，他是高层领导，高层管理者，他有维持一方秩序的职责，这在世界各国，任何时代都是同样的，但是最高层的领袖却煽动底下的人"乱"，而且要他们"理解"，不许去"压"，一压便是执行"资反路线"，可是，又不许出乱子，出了乱了又是他们负责，这样的官怎么当呢？

第一次看到"开后门"

屋里的气氛是那样的祥和宽松，白天的火药味都到哪里去了？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人有感情，感情又是可以交流的，短短几分钟，我们之间消除了一切敌意，如果让我现在再来批斗他，还真下不了手呢！想起白天神情冷峻的曹老头，如果他现在也在场，是不是也会消除敌视的情绪呢？

气氛已经十分随便了，我们纠察大队部的一个成员与宋搭话时，竟极力吹棒宋是老革命，参加革命早，有经验。宋市长当然又叹起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苦，有点有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叹。

我对这位大队部的纠察很反感，他平时就流气十足，自由散漫，今天又低三下四地吹捧，把我们红工司的脸都丢尽了。不料他摸出一张纸来对宋说是什么组织新近成立，由于得不到市委的承认，拿不到经费，他受那个组织之托，请副市长签个字。

我真是万分震怒！怎么这样不识时务，一个组织的承认，难道是在酒桌上可以办的么？我恼怒地盯着他看。

想不到这位当权派却一伸手把纸接了过去，抽出笔来在纸上签了名，并向王克交待了几句什么。这时王克马上站起来，弯腰听着他的指示，并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着。今天，我非但在近距离平和地看到了宋日昌，而且也同时在近距离看到了市委高层的上下级形态，看到了下级对上级的恭顺阿谀。多少年后，当听说有些老干部离休之后顿时掉入门可罗雀的处境，也就不奇怪了。

宋非常轻松地把纸交回一直立在他身旁等候的那个总部人员。

这时，在愚园路总部，宋是中心，全然一副主人派头，首长气度。别看我们能纠集十数万人对他进行批判，但是，权力仍然在他手里，我们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我万分吃惊，怎么这样爽快就承认了一个组织，这同我们经过七、八天的斗争相比太容易了。这大概是我最先见到的官场中的“开后门”现象。几年后“开后门”之风成了全社会的“时尚”，这种“开后门”之风，到底始于何时呢？或许就是从文革开始的吧！从反修防修，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第一年逐渐风行起来的吧！

第十八章 抵制经济主义“妖风”

风 源

这时，我们的常委主任费敏璋开始说话了（那天在场的常委都是戴眼镜的，但唯独他的书生气十足），他要人把这些吃的东西撤下去，换上茶。他说：“今天请宋市长来，我们组织要同市委商量一件大事，就是如何制止经济主义妖风的问题。”

我一听这倒是一件大事，但为何今天采取这种形式来做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费、殷两人事先没有与我通气呢？从今天的安排来看，他们两人事先是商量过的，而且费也一定从工总司方面获得了这时整个上海关于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信息，促使他和殷策划了这么一场会谈。平时殷对我一直是瞧不起的，归纳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我比他青年，阅历没有他深。二、我是从下只角杨树浦来的，对吃喝玩乐一窍不通。另外我一直反对打经济仗，要打政治仗，想跟上整个上海的形势。

因为有了这些分歧，我们之间共同语言甚少。他曾对我直言不讳地说，他造反是了发财。吃惊之余我对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后来他曾对王继鑫、费敏璋和我作过评论，说王继鑫造反是为了女人；费是书呆子；我是上海乡下人。从这些评语中多少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头头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组织的确缺少老一辈革命家年青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志和文彩，只是一些为了发财、为了女人的人和书呆子。就是这些书呆子、乡下人、想发财的人，组成了“红工”的司令部，也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决定一个组织几十万人的命运。

六七年的元旦过后，上海刮起的一股经济主义之风，越刮越烈。各单位，工厂的造反队在采取“革命行动”时，首先是冲击档案，烧“黑材料”（整群众的材料），平时绝对向老百姓“保密”的文件被造反队披露出来，有人对照某一时期的文件发觉自己在加工资时，没有按规定加足，或者被压了下来没有加，就在造反队的带领下，对本单位的“走资派”进行批斗，要求按有关文件加工资或发放各种津贴等等。这种情况涉及的面非常广，但只是每个单位“工总司”下属的造反队，才能得到这些文件，然后组织批斗，迫使工厂的书记厂长等当权者签字，同意增加工资并补发（当然，最终没有上级领导机构的同意和批准，下级基层单位的当权者是绝不敢自说自话签发大量现金给老百姓的）。几天内，这场“钞票暴动”迅即在全市铺开，各单位纷纷到银行提取现金，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使银行不堪招架。因为从全市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现金，无异是对计划经济的极大冲击。

百姓对照文件，要求弥补国家对自己的“欠债”，本无可非议，但在当时，被认为是偏离了文化革命的目标和目的，当然引起中央的震动，认为是经济主义“妖风”，下决心要刹！

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源”在哪呢？从以上情况来看，是工总司的下属造反队。

受这股潮流影响，红工司属下的造反队也蠢蠢欲动，有的步工总司造反队后尘，想如法炮制。但是，临时工要“学样”也难，因为临时工没有工资级别，没有工龄，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较短，长的二、三年，短的几个月，完全没有补发钞票的口实，只能在以工作日计工资上做文章，于是提出要求：按固定工以月计工资，要求补发星期日休息的工资，这样就使临时工在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也补得了一点少得可怜的残羹剩饭。外包工就更可怜了，连这点也做不到（难怪费敏璋要为此呼口号呢）。所以，在这次经济风潮中，真正得到实惠的是固定工，而不是临时工，更不是外包工，其风源在工总司。中央和上海如果要刹住经济主义“妖风”，就应当拿工总司“开刀”。

红工司背黑锅

但是，身居正统地位的工总司，并没有成为“开刀”的受害者。工总司得了便宜又卖乖，开动宣传机器，指责这是市委转移斗争大方向，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把责任推向市委当权派。

市委陈丕显和曹荻秋肯接受这口黑锅吗？当然不干。老百姓常说“柿子专拣软的捏”，官方经常说“抓典型”。被抓了坏典型的都是“软柿子”。我们红工司里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临时工、外包工，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开始造反又是要求生存权，由此与“经济主义组织”的“帽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既然上海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这风源必是经济主义组织引起的，那末，这口黑锅当然只有红工司来背了！

我坐在桌边，静静地听着费与宋的对话。总结起来，就是要以我们组织的名义与上海市委共同签署下发一个文件，把目前在临时工和和外包工范围内的经济风刹住。费把临时工和外包工的处境与现状，这几天上海从基层刮起的经济风的混乱局面谈了谈，费要求制定出一个界限和标准，其中特别提出要维护外包工的利益。宋日昌对反映的事实表示同情，但对于制订出一个界限和标准觉得不好掌握，要我们先谈出一些意见来。他摆出一副愿意倾听的架势，要王克坐下，做好记录。

费、殷两人摆出一副工人领袖的模样和为工人谋利益的庄重神气，提出了一些时间界限，最后决定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发出 5.16 通知的五月十六日为时间界限；标准呢？这就更难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谁也说不清，谁也难解决。

费、殷两人的本意已经非常清楚，并不想真正刹住这股风，他们只是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使之合法化。

这个目的能达到吗？从十七年的历史来看，是决不可能的，错了的不就让他错下去吗？十七年的历史是不承认错误的历史，提出狠刹经济主义妖风的口号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吗？工人们起来要欠债人还债，但因为是“旧”债，要债就成了“妖风”。当然，我当时并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钱不是好拿的，这不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不是方向，现在不是提出“狠刹”么？这或许就是中央的声音。我们这几人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

对他们的一套听得不耐烦的我开口说：“这些问题留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吧，现在搞这一套是不合时宜的，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一律刹住！”

我的表态，引发了常委之间的争执，因为我的话大大违背了他们的本意。

我和费敏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以维护临时工和外包工利益的救世主的姿态，慷慨陈词与我争论不休。在我的坚持之下，书呆子气十足的费敏璋无可奈何最后声明在外包工问题上他保留意见。（就是这个保留意见，几天后成了要我们组织命的意见，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短视和无知。）

宋日昌在眼看着我们的争论结束后，以和事佬的姿态表示要向市委汇报，把红工的意见认真讨论。费、殷精心策划的这场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工总司又一次的广场大会

第二天，一月六日，我特意去了人民广场，工总司今天要开大会。王洪文找我去武康路 2 号，是要我取消昨天的大会，突出今天的大会。今天的大会内容王洪文事先一点也没有对我透露，但从工总司六日大会发出的三个通令来看，这个大会确实是事关紧要的。其中一个通令是：

不承认曹荻秋是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监督劳动。要求彻底改组市委。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三个通令以急电报党中央，请毛主席表态。

但主席却在沉默。

如果毛主席表态支持，那么这个大会就成了一颗“原子弹”。

我坐在毛胡子摩托车上驶进广场，竟没有人阻拦。空荡的广场，没有纠察人员，也没有医疗救护站和茶水供应站，这些后勤工作全然没有，难怪他们的大会可以接二连三地开下去。而我们却要搞得那么正规，想得那么周到，真太费心费力了。

昨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而今天，天气阴沉，飘起了雪花，虽说雪不一会就停了，但阴冷刺骨的寒风吹在身上，也是够受的。诺大的一个广场，只有面对司令台的地方围了不足二万人，（姚文元向中央报的简报上说十万人，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说二万多人。）人们缩头缩脑地挤在一起。我看到这情景不由高兴起来，昨天我们是十几万人，而今天你工总司就这么一点点。哼！你王洪文就是要我们替你撑市面，离了我们你的势力就单薄了，就连老天也不帮忙，下起了雪。我带着满足的心情离开了人民广场。

殊不知在我洋洋得意之时，命运已经注定了我们的短命！从六七年一月五日红工司浩浩荡荡的广场大会使我们的组织冲上了一百天造反史的顶峰后，形势便急转直下，迅速走下坡路。一个多月后，中央的一纸通告，轻而易举地取缔了它。

现在想来，工总司的王洪文虽然是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流氓，但由于有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政要兼文人作后台，所以工总司不但信息灵、胆子大，而且能够提出政治口号。是的，从相邻两个广场大会的规模、组织、后勤上看，工总司远逊于我们红工，但是，它提出了新的政治口号（尽管毛主席没有表态）；那么我们红工司的广场大会呢？留下了什么？

我们不可能留下什么!!

红工竟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

也是在一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夺权开始，登载了由十一个造反组织签署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标题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一月八日，三十二个造反组织“紧急通告”签发，这个通告进一步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并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妖风”进行抵制。

这两个文件立即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载并加了编者按，一月十一日破天荒头一回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出了贺电，震动了全国。

这封贺电对我们红工司来说，却是一纸“死刑判决书”!

一月六日上海解放日报登载了一月五日我们红工司大会的消息，我们为自己的大会消息能登上解放日报而沾沾自喜，但仅仅过了五天，一月十一日中央发来的贺电，完全淹没了我们的喜悦。这是因为我们这个在上海仅次于工总司的工人组织红工司没有在一月八日的“紧急通告”上签字，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造反组织的贺电就不包括我们在内。换句话说，贺电表示毛主席、党中央承认了上海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恰恰没有我们红工司!

这个冲击波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直到贺电在大街小巷张贴，费敏璋面对外界的压力和内部的责难，才道出了一月八日签署“紧急通知”的真相。(说是真相，其实只能说是他的感受，因为签署时有什么内幕和背景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另外他是不是有所掩饰和为自己开脱，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下面是根据他当时的叙述而写:

八日各组织在“锦江饭店”九楼由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执笔起草了这个“紧急通知”，汇集了各组织的意见凑成了十条。当时王洪文根本没有在场，在署名时只有二兵团的耿金章以二兵团署名，工总司根本没有人参加，结果各组织提出，作为上海最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不署名，这个“紧急通知”就没有权威性，工总司不可不署名。在这样的压力下，耿全章尽管有野心，还是在工总司的名下签了字。论到我们红工司时，我们这位酸气十足，个人利益看得特重的书呆子以提出要增加条文对外包工有所区别，否则会对我们组织带来压力为由，要求补充修改。他的短见，无知和私心，竟驱使他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端出了他的“保留意见”。他不合时宜的发言，当然遭到反对。这个上海造反派的聚会有陈丕显参加，陈也在通告上签字表示同意。陈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出来主持上海工作的，(说穿了

就是抓经济工作的，因为当时上海上缴中央的财税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口却只占百分之一，上海的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刹住经济主义风的“紧急通告”他当然同意。我想，这个“紧急通告”也有可能是在他的授意下，召集了这些组织，并在他的实际主持下搞出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宋日昌向他汇报了五日我们的情况后，启发了他利用造反组织起草文件的方法来制止经济主义风也未可知。如果最后这个猜想是真的，那等于说：一月五日白天我们的组织在广场斗当权派，登上“百日造反”的顶峰后，当天傍晚我们就在愚园路总部向当权派递上了绞死我们红工的“绞索”。

据费敏璋说，他的修改意见还没有得到反应，下面就传来一阵喧哗，一个新近成立的老保（保皇）组织——上海工人纠察队要闯入锦江。（那时红卫兵也好，工人组织也好，其袖章一律是红底黄字，唯独这个组织是白底红字袖章。据说用白色是仿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上海工人在周恩来领导下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袖章，故这个组织的名称也以此名命，一出场这个组织就被定为老保，步赤卫队后尘，不多几天就消失了。）这个白袖章组织在下面喧闹，大家下楼去了，我们这位秀才也跟着下楼，说是去跟人抓老保，待他再上楼时，已经人去楼空，无从谈起了。

他回来后，没有向我谈起此事。待紧急通告见报，在内外交困的责难声中，他才谈起这次签署紧急通告的过程，以此来为自己辩解和开脱，因为外界说他拒绝签字。

我认为费敏璋的辩解应该是可信的，以他的为人和一月五日夜里在同宋日昌会谈时，同我争执不下时的所谓保留意见联系起来看，是对得上号的，外界组织立说他拒绝签字，也可理解。在这种场合和形势下，谁都巴不得要签字，而唯独他一人没有签，说拒绝签字也不为过。

这一事件，进一步暴露出我们这些头头互不通气，各人搞各人的事，没有一个坚强核心的弱点。王继鑫去了北京，一去不返，已经半个多月了，音讯不通，更能说明问题。

一月五日文汇报的造反派夺权，发表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原是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签署的一份传单，本是造反组织小报上的小东西，不料竟然上了大报。这个冲击波在当天还没有显示出来，虽说没有红工司的参加，但对红工司影响还不大，因为当天我们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还处在巅峰。

一月六日文汇报二版以这样的标题发表“本报讯”：

“上海十多万红色造反大军庄严宣誓彻底砸烂临时工外包工制度”。

“工人代表愤怒控诉临时工、外包工这一变相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罪恶，决心建立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新劳动制度”。

我派人去买了一百份文汇报，大家看着文汇报非常高兴。不容易啊！我们的造反，倒底还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组织部的人员更感到这几天没有白忙。我同杨福海高兴地讨论，认为通过目前的批判已经掀起了高潮，接下来要好好组织人，从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把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雇佣劳动制度批深批透，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期待运动后期中央制订出一个崭新的劳动制度。

期 待

我稚嫩的头脑想：这个新劳动制必定是充分体现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没有歧视，没有失业，平等相处，生活安定，每个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为早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这个美好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是由于官僚主义者们，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毛主席，才使我们老百姓不能当家作主；正是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阻碍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前景不能实现，所以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十七年的老百姓，才有这样那样的打击和遭受不幸。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劳动人民在毛主席的支持下起来造反，“造反”在封建社会是“犯上”，杀无赦！现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起来造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意味着人民可以真正起来当家作主了，毛主席真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太阳升……这首每个人都在唱的歌，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心声。现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眼看就要垮台，资反路线马上就要铲除，工人阶级很快要迎来第二次解放，一个民主的革命的伟大的新中国将屹立在世界东方。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

人民被领袖狂热地运动起来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最过人之处，在于运动大家。打江山、夺天下，以“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和运动战，来“运动”蒋介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毛泽东发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团结了全国人民；抗战结束，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的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涌跃地参军，进行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夺得天下。十七年后，再一次运动学生——以红卫兵为先锋，以“破四旧、立四新”为开端，进而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各阶层起来“造反”，以制止所谓的修正主义，把火烧向他的同僚。但是，伟人忽视了人民内心的一面——即对民主的渴求，使得文革向他所始料不及的、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以至形成长达十年的动乱。

挣 扎

让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时间表上去：

一月八日，由于费敏璋的昏庸，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一月九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紧急通告”；

同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五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如果说，原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大，到了九日就有两个冲击波向我们总部冲来。

人民日报的转载还加了编者按，这意味着中央的支持和承认，这三十二个组织见了中央大报，成了响当当的左派。更要命的是，在“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紧急通告上我们没有署名，外界就更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为私造反的经济主义组织。

在抵制经济主义的旋风中，我们这个戴上经济主义帽子的红工司能存在下去吗？

我们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这顶帽子，我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上海革命组织之外，其后果之严重，震撼了每一个“红色工人”，责难的声音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压向总部。一股暗流开始公开活动。

这股暗流以被殷庆宝开除的原宣传部人员林新中、蒋瑞根为首，形成了一股反对派势力，联合各区头头向总部施压，矛头直指费敏璋和殷庆宝。

内外交困的费敏璋同殷庆宝瞒着我去解放日报社，要求刊登我们表态的文章，表示坚决支持紧急通告的立场，企图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

一月十日半夜时分，殷庆宝来电话，要我马上调动人马去解放日报社。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出了什么事要调人。他说，解放日报拒绝我们的文章见报，因此要调人去解放日报

造反，越多越好。

我挂了电话，让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头脑清醒一点，仔细一想，通过这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太那个了，明明是我们自己理亏不签字，能怨谁？我恼恨费的昏庸，也反对殷的安排。

调“越多越好”的人去？去制造新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斗争的大方向肯定又错了，势必造成我们更大的孤立，处境更为艰难，此等傻事万万不能做！

不去吧！似乎对红工司的前途在袖手旁观。我决定去报社，但决不调人，我只是喊上值班的十来个人跟我去报社。踏进编辑部，我一看已经有几十名总部的人员在这里，这是殷庆宝和费敏璋带来的。这是何苦呢？殷见我来了，迎上前来告诉我，他打电话后，报社已经同意发稿，现在费敏璋在里面同他们谈。

我不想说啥，无聊地打量四周。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室内摆满了办公桌，桌上全是稿件和纸张，给人杂乱的感觉，大概因为是夜里吧，屋里没有报社的人员，我们的人就立在办公桌的四周，有的站在走廊上。

隔了一会费敏璋来了，他告诉我和殷庆宝，他写的东西报社不同意发表，他刚才同他们在争。他刚说完，一位瘦瘦的一脸倦容的中年人走来。费向他介绍我是组织部长，他一听满面怒火地对我说:“你带着那么多人来报社是什么意思？是来造反？这是新生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已经夺过权)！你们是在造谁的反？”

我一听，知道一定是指刚才殷庆宝威胁他要调人马来，连忙解释说：“来的人都在这里了（意思是告诉他就这么几个人）。我来只是请报社登上我们的文章，表示我们红工司坚决支持紧急通告，拥护紧急通告。我们被排除在三十二个造反组织之外，请你想一想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的处境……”

那中年人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是你们费敏璋拒绝在通告上签字。”他指了指费：“本来你们红工司的署名是排在工总司的后面，居第二位的（天哪！如果签了字，我们就是上海第二位的造反组织!)，是费敏璋拒绝签字。”

费敏璋要插进来声辩，那中年人粗暴地打断他说下去：“到了现在，你的文章中，还是提出什么外包工的利益。”他抖了抖手中的纸：“这种文章我们解放日报不能登，这是违背紧急通告的精神的。”

费敏璋激动地说："我要为四十万红色工人负责，我们有我们特殊的地方，我要代表全市红色工人讲话。"

中年人怒气冲冲地说："你个人能代表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吗？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我赶紧说："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是要革命的，费敏璋的错误并不能代表全市四十万要革命的临时工、外包工……"

他对我看了一眼，怒气冲冲地走了进去，把我们扔在一边。

唉！我听了费敏璋的话，真要吐出血来！这个呆子！到了现在，还要提什么劳什子的外包工的什么特殊利益，脑子有毛病了！

我恼怒地对费说："到了这步田地，你还在写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本来是第二位的响当当左派呀！事情就坏在你的手中。"

他又唠叨开了。我故意走开，不去听他的。

殷庆宝向我解释现在的文章内容必须坚持什么什么内容，所以费会跟报社争起来。我也不想听。

大家沉默，无言以对。

我突然感到一阵疲倦袭来，我要睡觉，我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想，我厌倦了一切，我要睡。我迷迷糊糊地伏在桌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推醒，那瘦瘦的中年人站在我身旁，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这是见报的清样，你同意的话，签上你的名。"

庸俗的表态

这是一张四分之一版大小的一张空白新闻纸，中间铅字印就了长方形的一篇文章，噢！这就叫“清样”。看惯了整版排满铅字的报纸，现在在一张空白的新闻纸上只有豆腐干大的一篇文章觉得好不新奇。我的头脑一下子像那张空白新闻纸一样清爽起来。我接过清样一看：一行标题赫然在目：

革命工人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坚决拥护和支持《紧急通告》。

看到富贵不能淫的“富贵”和“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个标题要是在今天是蛮不错的，但在左了还要左的文革时代，就太庸俗，太没有革命化的气味了。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什么富啊、贵啊、淫啊的提法早就不见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再看正文：

我们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所公布的《紧急通告》表示最热烈的拥护，最坚决的支持。

在上海各路革命造反大军的猛烈攻击下，中共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陷入全线崩溃的狼狈境地。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正疯狂地妄图用停止生产，中断交通，滥发工资补助等等祸国殃民的手段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妄图用金钱物质刺激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上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妄图用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最毒辣的手段——糖衣炮弹来腐蚀革命群众的革命意志，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总司令部严肃揭穿中共上海市委这一阴谋，并且代表全市四十万红色工人，向上海市委提出最最严重的警告！

我们上海红色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切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毒计，都是永远不能得逞的。我们坚决要牢牢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为完成社会上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而奋斗到底；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要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以“政治统帅经济”，决不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爷们的当！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对于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也很不满，因为它似乎是承认了我们有经济主义的倾向。这篇文章显然是费敏璋的手笔，结尾部分是报社编辑的手笔，原来的结尾被删去了，换上了这样的结尾，看来他们争的也就是如何结尾。费敏璋看了又开始激动地要争辩，争他的特殊利益。我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已经到付印的时间了，再争也没有用，在上海要改变这种局面已不

可能。我不想去争辩，有这篇文章上报总比没有好。

我默默地在上面签了字，签好后往殷庆宝面前一扔，殷也签了字。我俩无言的行动使费敏璋也不得不签了字，那中年人拿了清样就走。

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是被严格控制的，凡是上报纸的都是官方的或是被官方肯定了的东西，是神圣的，上报纸是件了不得的事，人们习惯了这种观念。今天我们红工司的文章上报了，也是了不得的事，我们带去的人都面带着笑容，现出一副斗争胜利的样子，笑哈哈地走出报社大门。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什么胜利也没争到。

走出报社大门，已经是一月十一日凌晨了。

一月十一日更是要命的日子。虽然我们在当天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表态文章，但这天，中央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第一次这样高规格就紧急通告，向上海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发表贺电。

下午，中央的贺电在上海以红色铅字印就传单，张贴在各条马路上。

上海的三十二个造反组织欢欣鼓舞。

对我们来说，无异敲响了丧钟。

中央明确无误的表态，一下子就把“经济主义妖风”刹住，不几天，上海坚决收回了已发的几千万元钞票，此风烟消云散。

第十九章 北上首都

做实事 救组织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酝酿着去北京。

十日在报社经历的情况和那篇文章的结尾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认定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地位，笼罩在头上的经济主义组织的阴影已无法摆脱，我决定上北京去捞取政治资本，照当时文革普遍使用的贬义词，就是去北京捞“救命稻草”。

我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让我们把时钟倒拨二十天，从六六年的十二月下旬谈起。

赤卫队覆灭前，在造反派中普遍传闻赤卫队要制造“三停”事件，指责赤卫队妄图制造“三停”的传单和标语到处可看到。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的一次造反组织的聚会上，大家曾在闲谈中，对港口和铁路的运输表示担扰，因为那里的生产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的工业用煤（包括发电厂用煤）已经只有三天的储备量。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想想看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一旦这三天的储备数字再往下降，一旦上海没有了煤，所有的工厂将停工，电厂不能发电，那可真要大乱了。

有人讲，陈丕显在战备工作会议上说，以往一直为上海储备三个月的用煤量。上海有那么多的工厂，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这一煤炭储备工程是何等的伟大。就连高喊打倒上海市委的造反派们也不得不交口称誉：陈丕显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不无感叹地说，如果没有陈、曹预先储备了那么多的煤，上海早就瘫痪了。

我一直痛感到，我们没有政治背景，造反以后一系列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在这样变化剧烈的政治风云中，我们这个组织要保持和存在下去，并争得一个相当的地位，前途是渺茫的。

现在上海运输紧张，用煤的储量只有三天，而“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提出的号召，国民经济是绝对不允许瘫痪的，不管谁在掌权都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上海的生产形势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只有干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来，才能改变我们的形象，进而在造反派中争得一席之地。

我国的知识分子曾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提出过“实业救国”的口号，我却在六十年代提出这个“做实事，救组织”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我一时热情高涨，兴高采烈地把我的想法同费、殷谈，提出要组织人员去港口和铁路“抓革命、促生产”，恢复那里的生产秩序。

我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懒懒地说了声“同意”。

“同意”两字一出口，等于是说你就去做吧，是你提议的嘛！

我热情不减，说要先去蹲点，了解和熟悉情况。

那你就去呗！

我把组织部的工作交给了杨福海，自己则全身心地扑到了铁路上。

我先到我们下属的铁路总部。（按我组织部原先的安排，按系统成立的一律称“总队”，但铁路局的临时工们为了突出他们的特殊之处，用了铁路总部的名称，在既成事实面前，我就默认了。）这个铁路总部的成立，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着“临时工”的旗号，以我们红工司已经在上海获得承认的优势，在路局内部获得了承认，打出了“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铁路总部”的旗号，事后才来我的组织部挂钩。自然，这种挂钩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手续，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自己成长起来的自称是我们下属的组织，并且也愿意受我们的领导，这就成了。本来我们应该发给他们公章的，但是他们通过路局自行解决了。）

瘫痪的是铁路港口，所以我打算去两个地方，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港务局，我先去了铁路局。（我一到铁路局就被那里的事务缠住身，再也无法去港务局了，我就委派杨浦分部的顾华前去，结果我用人不当，委派的人能力太差，一点名堂也没有搞出来，连一般的情况也说不清楚，港务局那一头我只得放弃了。）

事先我用电话告知铁路总部我到达的时间，我在民德路“红房子”——铁路员工对上海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的称呼——找到了他们。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赤卫队失败后，上海始发的二十六对客车已经停驶，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刚把我的来意和设想同总部的人们谈了，工作刚开了个头，第二天，工总司却在铁路局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由工总司的谢鹏飞指挥，我们的铁路红色工人总部被排除在外。

于是，我同工总司，同谢鹏飞在铁路系统的角逐从此开始。

在铁路上，临时工的地位低下的情况要比其它行业更严重。工总司的造反队之所以居于正统地位，是以正式职工为基础的，这些职工工作多年，情况熟悉，更有不少干部参加进来，尤其在铁路局这个技术性特别强的准军事性质的系统中，临时工只能干最低下的力气活，我的工作范围当然被局限在这个狭小、低等的圈子内。而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一开始就从上层

着手，带有夺权的倾向。我虽然有办实事的思想和行动，但从我自身的思想和条件来说，我没有夺权和掌权的动机。无论怎样比较、分析，我都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退缩，为了四十万红色工人，为了挽救组织，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而且，这几十天来，我对自己的能力也越来越自信，谢鹏飞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是一个小人物，平凡的青年，但造反使我拥有了部长的头衔，我的来临，给了铁路局临时工们不小的鼓舞，"组织部长"要在铁路总部蹲点，意味着我对他们特别重视。"蹲点"这一词汇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术语，是上级领导要在蹲的"点"上，推行新的工作方式或者贯彻新的意图，创造出新的经验，再来指导全面的工作的意思。对于已经习惯了政治术语的群众来说，我的蹲点，给他们壮了胆，客观上促使了铁路上的"红色工人"积极地活动起来，至少在这些头头中，能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实实在在地做点实事。我把我的思想在他们总部的头头会议上反复阐明，他们也完全同意和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几乎每天要去铁路总部，同铁路总部的头头关系非常融洽，这些头头的年龄都比我大，谨小慎微，缺少造反头头应有的胆识和魄力，在铁路的准军事环境下，他们的自卑感太强，处处缩手缩脚。不过列车段的红工头头吴国祥，却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此人身体虽很病弱，但能言善辩，有胆有识。他率领他的"娘子军"们参加了一月五日人民广场的大会，大会的磅礴气势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和胆识，列车段的红色工人在他的领导下，勇敢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日六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赤卫队在上海覆灭，部分赤卫队员随着他们的头头步行北上"告状"，上海的铁路调度人员大多离沪随赤卫队北上。因此，上海的铁路运输全部瘫痪，在混乱状态中挣扎的全国铁路系统雪上加霜。一九六七年元旦过后，大刮经济风的上海铁路处在更为严重的境地，上海站始发的二十六列客运列车全部停驶，大量旅客滞留在车站。列车段"红工"头头吴国祥大胆地组织了一支由临时工（即我们"红色工人"）担当的客运列车。

吴国祥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选择了最有影响的京沪 14 次特快列车为突破点，那时全国的铁路交通几近中断，以上海开往首都北京的 14 次特快来震动全国铁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举动必能直接受到中央的注意。

首列"红色列车"发出后，成了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它向社会表明，只有我们红色工人是在"抓革命、促生产"，为全面恢复铁路运输作出贡献。但这样的壮举，这样的胆识，必然遭到世俗偏见的阻挠。

这个阻力还真不小。当时铁路的经济风刮得非常历害，正式职工不愿出车，而 14 次特快的餐车上全是固定工，他们以耻于同临时工一齐出车为借口拒不上车。至为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车长。因为这一技术性强的重要岗位从不安排临时工来担当。我们都是一些工龄不长的女列车员，无法胜任车长职务。吴国祥就在众多的车长中，选择了一位好说话的张姓车长，请他担任这次红色列车的车长。吴真是一个有头脑、口才又极佳的青年，在他的鼓动下，这位车长同意随车出发。

但是我们这位吴国祥头头并不到此为止，他创造了一个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车长制：任命一位女列车员金月雯为正车长，职责是去抓政治工作，张车长为副车长，去抓业务。政治统帅业务么！这在当时是谁也不敢批驳的。实质上吴国祥以突出政治为名，突出了红色工人的地位，这是吴的聪明之处。

餐车还是挂不上，吴国祥无法动员好多的正式工上餐车，那一千多旅客吃什么呢？铁路总部火急向我汇报要求解决，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杨福海想出用面包来代替餐车。对呀！这可是一条绝好的主意，又省事又省力。我马上批条子，派出总部的大卡车去泰康食品厂装了一卡车的面包和饼干火速送到列车段。

这一车面包是由纠察大队的几个人押送去的，我们这些纠察队员在外面总喜欢借总部的名义夸耀自己。那好得很，这列整装待发的红色列车缺少的就是男子汉的勇气和胆量。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姓蔡的大男人被娘子军列车员们扣下，要他随车一起出发上北京，这位“总部要员”在“娘子军”们的簇拥下上了 14 次列车。

冲破重重阻力的红色列车终于满载旅客，开出了上海，驶上了艰难的进京之路。

列车艰难地行进

在沪宁线上还比较顺利，渡江后，开始遇到麻烦。

列车严重超载。

这不算什么，最严重的是常常被迫停下，停下后，车站又迟迟不发开车信号，时间久了，旅客骚动，谁也不想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中遭罪，旅客找列车员、找车长，两位车长又能怎样呢？当然要找我们这位总部来的姓蔡的“要员”想想办法喽！娘子军们把他推向了旅客。

他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路可走：带领一些旅客到站上找站长，讲不通怎么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现场批斗站长，促令发车！这一招还真行，列车终于向北爬行了。

然而这一招并非处处管用，在一个站上，列车又被迫停下，蔡重演故技，带着人去找站长，结果被当地的“革命群众”用麻袋往蔡的头上一套，饱尝了一顿冷拳，幸亏旅客中的勇敢者，仗着人多势众，又把他抢救出来，人们簇拥着鼻青脸肿的他，再去找车站上的当权派时，已经找不到一个主事的人，只得用电话向铁道部求救，几番折腾，列车又开始爬行。“红色列车”就这样艰难地向北京靠近。

全国铁路运输的严重情况，当然引起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的铁路运行图上，却有一列 14 次列车缓慢地向北京前进，而且这列车不断有电话向铁道部频频告急，这引起了国务院有关方面的注意。

14 次列车一到北京站，国务院就派出了工作人员前来迎接，崭新的轿车停在边上，要有关人员随他们去，说有首长接见，要了解铁路情况。这些女列车员们哪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慌了神，出头露面的事又落到了这位“总部大员”蔡的头上，可是这位心地厚实的老临时工，也被这崭新的几辆轿车和“首长要接见”吓坏了，他看了这气势，连连摇手。可来人又非请他走不可。他权衡再三，事关重大，就说，我们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一个赴京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常委，要找到他们才一起去。想不到国务院的车队竟陪着他到左家庄去找王继鑫，没有找到，又在北京城转悠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只得把他送回，不了了之。他也就随 13 次列车折返回上海。

回上海后，他把这段经历讲给纠察队员们听，遭到了不少人的责难，说他放弃了一次多么好的机会啊！传到我的耳中后，我把他找来，请他详细谈一谈，我极力想了解究竟是谁派人来接他，为什么来接他，来接他的人同他讲了些什么，要他们去见哪位“首长”，可是这位拘谨的蔡什么也讲不清。

也许，那天要接见 14 次列车工作人员的“首长”，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唉！我们又丧失了一次改变自身形象和地位的绝好机会。

但是，我不抱怨这位姓蔡的老工人，他已经额外地承担了列车北上的许许多多任务，历尽了磨难。我只能在心里拚命地埋怨我自己！是我考虑不周到，没有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最好情况，预先关照他们如何应对，如何争取。我想起诸葛亮能事先推算出后事，交给赵云三个锦囊，在遇到难关时再一个个打开来看，里面有他预先写好的妙计。我为什么不能努力多想几步呢？这虽然是“促生产”的列车，但它担负着改变红工形象的政治使命，为什么我不把能言善语的头头吴国祥派上车呢？这次“红色列车”我们红工虽然胜利了，但是，胜利的果

实本来可能更大。这种机会只有一次啊！丢失这次机会，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写上这段历史：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元旦后，在全国瘫痪的铁路运行图上，有一列震动全国的“红色列车”艰难而顽强地从上海向北京运行，它是我“红色工人”发出的 14 次特快，是我临时工的光荣!

然而，“胜利者”写的历史，不是这样写的。那个张姓车长他因这次偶然的因素当了“红色列车”车长，被王洪文们选送为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在上海的报刊上大大红了一阵，为王洪文们掩去了大刮经济风的真实历史，王洪文们反而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先知先觉的英雄。

自 14 次红色列车到达北京后，吴国祥接又连组织了几次以红色工人组成的列车开出上海。在国务院周总理的干预下，铁路运输开始逐渐恢复。但是（又是但是!）上海站秩序刚有点恢复，吴国祥的权力就被工总司谢鹏飞的火线指挥部收去。我们再度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那个病弱的吴国祥，最终在谢鹏飞之流的迫害下，被辞退回家，抹去了他的存在。

今天，我郑重地为红工，为吴国祥，为“红色列车”上的女列车员——我们红工的娘子军，写上这两节光荣的历史。

我们成了弃儿

“紧急通告”这颗“原子弹”的爆炸，敲响了我们组织的丧钟，红工司像一叶扁舟在内外交困的风雨中挣扎。虽然一月十日去解放日报社搞出了一篇“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表态文章于十一日见报，但我总认为大势已去，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好不容易发出了“红色列车”，却丢失了与中央首长见面的机会。

在铁路总部，我了解到 1 月 13 日铁道部要召开批判吕正操部长的大会，内容是抓革命、促生产，据说有周总理参加。我一听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红工司铁路总部如果以 14 次红色列车为资本，进入大会去，能见到总理就好了。再以此为契机，得到中央的肯定，就能在上海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典范来站住脚跟，挽回我们在“紧急通告”上所失去的一切。

铁路上的同志建议我一起去，我心中也想，这是一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放过，只有我

自己去，才能搞出一点名堂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

我们商量具体的人选，当然，吴国祥必须去。吴提出带当时的女车长金月雯一起走，这样在汇报情况时，有这样的一个当事人出来讲话，比什么都顶用。时间太紧，如果乘火车走，虽然这时铁路已通，但还是怕中途受阻，不能及时赶到。为确保赶上大会，我们决定三人乘飞机先走一步，铁路总部的同志和我的随行人员乘火车走。

决定后，我当即去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去购 12 日的飞机票。可惜，去晚了一步，被告知只有一张晚上八点十分的机票了，其它的机票已被工总司购去。我就把那张票买了下来，等明天再来买 13 日的票吧。

票虽买来，却使我犯难了，一张票，让谁先走呢？

晚上我同殷、费碰头。我们的心情沉重，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还能说些什么呢？只有费敏璋还在唠叨那天在锦江九楼签署紧急通告的经过，好像他的表白可以洗刷掉他的罪过。好吧！就算我们两人相信了，能对四十万红工谢罪么？

闷得实在憋不住了，我打断了他那梦呓般的噜苏，把我在铁路上的情况简单谈了一下，说出了我的打算，我决意亲自去北京，要把这根救命稻草抓住。殷庆宝听完我的话，半天不出声，只是拼命抽烟。我想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我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就对他们说："今天我已去购了机票，不想工总司也得到消息，派人参加这个大会，把机票全买去了，只剩了一张，我把这一张买来了。我们红工司不去，又会落在工总司后面。我反复想过了，我们一定要去，在上海已经没有我们的出路了。再说王继鑫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干什么呢？我也要去看看。"

想不到，费敏璋却提出把那张机票给他，他要去北京。

我问："你去干什么？"我心想：你对铁路情况一点不熟，现在谁去我都不放心，尤其是你能干什么？什么事都坏在你的手上。我去的理由是那样充分，而你以什么理由，什么资本去呢？

他竟然说，他曾写过一本作品，寄给了中央文革，他要去查询，通过查询，他可同中央文革接触，再把我们红工的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

我听了这天方夜谭式的理由不由得说："你那是什么大作品啊！竟然认为中央文革会来接待你！你去北京充其量只能到文革接待站，那能有什么用？不要做梦了。"

呆子对我的嘲讽毫不介意，苦苦求我把机票给他，近乎哀求的声音令人讨厌而又心烦。大概是这两天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想去北京避避风头，逃避外界和内部的责难，否则他的日子怎么挨过去？

他见我不肯把机票给他，又哀求殷庆宝。殷庆宝连抽几根烟，沉思良久，说："好！你们都走吧！剩我一人来支撑这残局吧！我祝你们都能成功！"声气中大有伤感的味道。看来，他们两人私交甚好，他是存心放他，让他逃过这要命的难关。或许他对费的梦话还存一线希望。

既然殷这样说，我就把机票给了他，反正一张票对我来说也没有用。

（费在 12 日夜逃也似地飞离上海，之后音讯全无，我们后到北京的人谁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他悄无声息地飞走，不知过了几天，又悄无声息地回来，没有向任何人谈起他的北京之行。）

殷又接着抽起他的飞马香烟来，吸了几口后，郑重地对我说："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不管办得成办不成，快去快回，办出点名堂最好，办不出名堂也赶快回来，总之快去快回，我一个人撑不起！"稍停他又说："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到，王继鑫去北京已经一个月了，不晓得在搞点啥？你到北京后不管情况怎样，也要找到王继鑫，一起回上海来，就这件事，你一定要做到。"我说："你放心，我这次去北京，不管怎样，一定尽快赶回来，我会去找王继鑫的，把他们撤回来算了。"

十二日全上海的马路上贴满了大红字印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贺电，一看到赫然在目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开头语就令我黯然神伤，一种失落感，一种我们已经被这个狂热的世界所抛弃的失落感揪着我的心，我们成了弃儿。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贺电对工总司的肯定，用词之高无以复加。上海的造反派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不时有锣鼓声传来。对我们来说，这兴高采烈的锣鼓声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匆忙地奔向民航售票处，我要飞北京，去捞"救命稻草"。

十三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我、吴国祥、金月雯飞离上海。我的随从们在十三日早上就先我们乘 14 次特快出发。

我的随从大约有近十个人，其中有邮电总队的头头李林义，他向我建议把他使用的轿车一起带走，这样到北京后可以方便许多，说北京的交通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又说了不少别的好处，被我断然拒绝。我这人不愿太张扬，免得日后被人指责，还是谨慎点好。他被我挥手推到边上，只得不作声。毛胡子老陆又向我进言要带摩托车走，他的理由也是交通不便，可以为我争取时间。我想想还是不带好，他见我不同意，编了不少理由来说服人，我想带上摩托车走，影响不太大，这不同于轿车，坐摩托车不是享受，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带就带吧！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得寸进尺又提出把一辆永久两用车和一辆苏联制造的两用车（现今称助动车）带走，我挥挥手："带吧！"把他们全打发走了。

在我组织这次北京之行的准备工作时，我要厂里的丁胜成为我去总务科借了好几件工作棉袄供大家御寒，这几天正是三九严寒，北方的冬天要比南方冷得多。说来也可怜，上海造反派的头面人物风行一件棉军大衣，而我无此能耐，现在要去北方，只得向厂里借了。我们印染厂的工作服是用印布车上的衬布做的，反复使用后被涂上了各种颜色的染料，用得不能再用了就废物利用做工作服和棉短大衣的面料，看上去像外国军人穿的迷彩服，难看死了。

我同吴国祥约好，在延安中路民航售票处一起乘班车去机场。我不喜摆场面用轿车，平时我的行动靠毛胡子的摩托车，现在他先走了，我也没有要小车送我。我们上了民航的交通班车，刚要开时，我的姐姐赶来，为我送来毛衣等御寒衣物，一股浓浓的温情流向心田（亏得这件毛衣为我抵御了北京零下十度的严寒），我匆匆挥手与她告别，连话也没说几句，车就开了。

当心谢鹏飞的人？

班车很快进入虹桥机场。六十年代的候机室，空荡寂静，寥寥无几的旅客在静静地等候上机。封闭的中国，封闭的上海，又是动乱的文革，中国的老百姓乘飞机，犹如《天方夜谭》中乘上有魔法的飞毯。我乘飞机上北京，成了厂里的新闻，成了日后数年中朋友把我介绍给初次见面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乘过飞机"，用来作夸耀性的开场白。

我们三人在静默中等候。女同胞金月雯努力使自己稳定下来，尽管做了这样努力，还是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着我们，紧贴着吴国祥的身背，似乎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丢下。而作为男子汉的我俩，何尝不是小心翼翼，生怕多走动一步，犯了什么规矩。

时间过得好慢，一下从忙乱中安静下来，思绪跌落到空虚、失落、飘渺之中，我对这次北京之行实在不敢细细思量。我们没有后台，没有高层的信息，我们能在北京得到点什么呢？我们已经是文革的弃儿。

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闷空气，我同吴国祥交谈起来，他充满信心地说到北京后，如何找人，如何把 14 次列车的事向上汇报，他是那样的善谈，可惜这时的我一点也没有听的兴致，失落和悲观越来越浓。我烦燥地走向宽大的玻璃窗，望着停在跑道上的银色客机。这是我第一次来机场乘飞机，但此时此刻唤不起一丝一毫新鲜感，心烦意乱。

有人招呼登机了，旅客开始向飞机前走去，我们三人排在末尾，准备登机。突然广播中响起了："请上海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去机场大门，有人找你。"我听了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我焦急地对吴说："你们两个先上飞机吧！"吴听了欲言又止，我又补上一句："万一我走不成，去北京的事就靠你了，明天同我们的人会合后，你们商量着办吧！我会在铁路总部等你的电话。"

我回头就奔跑起来，时间不多了，去机场门口要走好长好长的路，再返回登机，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我一下放慢脚步，心想去还是不去。正在这时，我们总部的一辆济南产的轻骑二用车驶到了我的面前，来人要我赶快骑上他的车，告诉我殷庆宝在大门口等我。

原来殷庆宝在机场门口被守卫机场的荷枪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不准进入机场，经交涉，警卫就打电话，用广播召我，再经交涉，他们放一人骑车来接我。车很快在门口刹住，殷庆宝带着一行人和一辆小车在门口等着我，我心急火燎地问："出了什么事？"

殷庆宝笑着说："没有什么事，我是专门来为你送行的。"我松了一口气。殷接着说："我在总部没有等到你，听说你是坐班车走的，所以我就赶了来，路上出了点事，耽搁了时间，所以来晚了。"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殷又笑笑说："小事一桩，没有时间谈了，"他抬手看看手表，"没有几分钟了，你快走吧！我只有一句话：找到王继鑫，快去快回。"

我转身跨上二用车要走，他又说："还有一句：当心谢鹏飞的人。"车很快就驱动跑开了。

谢鹏飞？与我什么相干？我没有当回事，随即忘掉了这句话。车瞬间就停在飞机旁，我急忙掏出我的机票，匆匆登机，进舱一看，旅客已全部就坐。

我不想坐前舱

我的座位在前舱，他们两人在后舱，一开始不明白售票处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其实道理是简单的：因为那时买飞机票要单位介绍信和工作证，售票见我是红工司常委组织部长，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安排到前舱了。在官本位的中国，处处体现了这种封建等级意识。

我穿过中舱来到前舱，前舱要比中舱小得多，里面坐着几位外国人，中间剩着我的一只空座位，我看看我身上的“迷彩服”，自惭形秽，再说我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身份和国籍，我想不必去挤身前舱吧！别惹出点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为好。（事后从服务员口中知道，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从文革开始到现在的半年多，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绝对的孤立，与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交往。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只有和“明灯”关系最好，《地拉那——北京》高唱了好几年）

我向后舱走去，后舱实际就是中舱座位的最后一排，再后面就是厕所和服务员的工作室，幸好在吴国祥的座位旁还留有一只空位，我们三人正好坐在一起。

服务员（那时不称空中小姐或空姐，小姐的称呼已经抛弃了十七年，——这是资产阶级地主剥削阶级的称谓）看了我的票后，要我到前面去，我说：“我就在这里吧！我不用去前面。”她——年青貌美的服务员的眼神有点不解：放着前舱的好位置不去，在这厕所旁坐？我领会她的眼神，我指着吴、金说：“我们是一起的。”她大概发觉我们三人穿的工作衣是一样的，便点点头同意了，走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在想怎么有这么难看的花棉衣。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情绪好多了，便告诉吴国祥没有什么事，殷庆宝只是前来送行。我这时我才对这次同行的金月雯看了几眼，这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妇女，身材娇小，穿上宽大的工作棉大衣，显得更为娇小玲珑，一张白里透红秀气的脸，羞涩地低着头，一路上几乎没有讲过多余的话，即使开口也是轻声慢语，我怀疑像这样的弱女子，能在拥挤的车厢里干列车员的活吗？更不要说当车长了。列车员应该是泼辣能干的，每当列车要停靠前方车站时，应该扯开嗓门大叫某某站到了，真难想像，她是如何应付那趟进京列车的。看来大风大浪的确能锻炼人，对人的才干进行评判，更不能单凭外貌，面前的金月雯就是这样，柔弱秀丽的外貌隐藏了她内在的聪明能干。

飞机上的服务员开始忙碌起来，手中托着盘子，为旅客送口香糖，以前听人说过，口香糖是一定要嚼的，否则飞机升空时耳朵很难受，我记住了这点，很快剥去包装纸填进口中大嚼起来。

飞机的轰鸣声传入耳膜，在跑道上越来越快，昂头升空，当我想到要看看地面时，圆形

的舷窗里已经看不到地面了，我懊恼地想，算了，待到北京时再看地面是什么样吧！

过一会服务员又用托盘送来了鲜桔水，有热的有冷的，服务员先问我要冷的还是热的，我就手指吴和金示意先给他们，可是吴摇了摇手，金和我也就不要了。这时我发觉吴的面色非常难看，灰中带青，呼吸急促，我问他怎么啦，他艰难地说："我生过肺结核，开过刀，现在觉得难过得很。"他睁开眼对我看了一眼又说："不要紧的，你放心好了。"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他的脸色好转一点，呼吸也平稳些了。他说比刚才好得多了，但还是紧闭双眼，好像睡着了似的，让人多少放心了些。

两位服务员——年轻的妙龄女郎，在收拾完毕后，宣布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她们身穿合身的浅灰色制服（像文革中海军的制服颜色），腰束一根军人的武装带，一头齐耳短发。这身打扮，说是空姐倒不如说是一名军人。灰色的制服，掩不住青春的朝气和苗条的身材，飒爽英姿的她们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挥动，有节奏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她们边舞边唱毛主席语录歌，嗓音清丽好听，简单的舞蹈动作婀娜多姿，透着一股轻柔。最后一个歌是《地拉那——北京》说是为在坐的阿尔巴尼亚外宾演唱，这使机舱内的气氛热了起来，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都和着节拍拍手，直到唱完这支歌。

手拍得最响的旅客是在中舱前部的一群人，从这些人的举止动作来看是工人，我猜想他们必是工总司的人了。难道昨天他们的人没有全走掉，今天同机的人也是他们吗？我想起了刚才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的人，难道他们是谢的人？要我当心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的脑袋像一罐浆糊、头沉得很，头顶上的舱壁上一个个白色的喷气孔，丝丝地喷出缕缕暖气，透过圆形的舷窗，可以看到半只机翼和机翼上飞速旋转的一只螺旋浆，发出沉闷的轰鸣，睡眠严重不足的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服务员又在微笑着问我要热的还是冷的，我要了一杯热鲜桔水，几口就喝了下去，味道好极了，真想再喝一杯，想想这大概是配给的吧，又不好意思开口了。那时上海的寻常百姓是不会买饮料喝的，对乘飞机时无偿送来的饮料感到挺稀罕，哪像现在喝饮料像喝白开水那样随意。服务员收去空杯子，又送上了口香糖，说北京到了。

什么？北京到了？我才打了一个瞌睡呀！我刚把糖送入口中，飞机已开始下降，耳膜感受到一阵压力，就像从江湾游泳池的高台跳板上跳下，直插水底时，水压使耳膜胀得难受，只是飞机下降时间长得多，也难受得多。我再一看吴国祥也是双眼紧闭一脸难受的样子。他极力想控制自己，好让我们放心一些，可是力不从心的他，脸色是那样灰白，呼吸急促，头仰靠在椅背，用微摇着手来回答我们关切，好像连说话也会增加他的痛苦。幸好，圆窗外掠过机场的建筑物，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

谢鹏飞和我都错误估计对方

我们三人在后舱，理所当然的是在最后下机了，我们随着人流向候机楼走去，吴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常态，我们三人只得慢慢地拖在后面，与大家逐渐拉开了距离。待人们走进候机楼，楼的另一面有机场接客人的大客车驶来，人们陆续上车开走了，随即第二辆也来了，工总司的人全上去了，我们三人在离车十多公尺的地方被人客气地拦了下来，请我们坐一会，说等一会有车送我们。

我说："我们急着要到铁道部去开会。"那人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去。"

我有点疑惑不解，问："送铁道部吗？"那人还是说："对！会有专车送你们。"我不放心地问："要等多少时间？"那人答："马上有车来了。"

我虽然有些疑惑，但听到有专车送，一时就相信了，我不了解北京的地理和情况，被懵住了，眼看着同机的人全开走了。

嗨，这一等呀，可就完了！车迟迟不见到来，大约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吧！那拦我们的人早已不见踪影，在偌大的候机大厅去找谁啊！凡看到穿灰色民航制服的人我就问，但得到的回答是：等一等！会有车的。到了这时，急有什么用呢。吴国祥昏昏然地坐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倒也不急。我焦急地在大厅中走来走去。

在大厅的一侧，有几只玻璃柜台，我想那里是售货的柜台吧！本不想买什么东西，但肚子早饿了，去看看有什么面包之类的食品吧！但柜台里没有什么商品，只是香烟、毛巾、香皂几种日用品。

我突然眼睛一亮，在一只玻璃柜台中，陈列着一排精致的毛主席像章，要比外面流行的稍微大些，制作也精细得多，六七年的一月，毛主席的像章在中国大地风行还不很久。在随后的一、二年里，像章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精细，品种也越来越多，数量更是惊人。在玻璃柜中的毛主席像章的下面有一行字：凭机票，每人可请宝像一枚。我大喜过望，马上招呼他们，把我们三人的机票递上："请"了三枚宝像，我们每人一枚，马上别在胸前，那股高兴劲儿扫除了焦急的心情，时间也好像过得快起来，总算有人来通知，送我们的车来了。

车行驶在去市区的公路上，两边的田野不见一点绿色。黄土，望不见尽头的黄土，北方的冬天就是冷。

进入市区后，不多时车就停下了，下车一看也如上海一样是民航售票处，向行人一打听，

铁道部离这远着呢！我恍然大悟，我们被人愚弄了！殷庆宝要我当心谢鹏飞，是不是谢鹏飞的人在捣鬼，把我们拦下了？不管怎样，我们被耽误了近两个小时。

我这个怀疑不是空穴来风。这个“耽误”可以和殷庆宝在为我送行路上的“出了点事”联系起来。

我从北京回来后，他告诉我那天送我的路上发生的事：他带着人，坐上一辆经改装的吉普车（座位比轿车多），前往机场，在虹桥路上，遭到一辆轿车的跟踪和拦截，那辆轿车在路上不断制造麻烦，企图迫使殷的车子停下来。殷急于赶到机场，不予理会。轿车见殷的座车不停，竟用车来相撞，殷的车子只好停下。

在争执中，殷倚仗人多势众，搞清了对方的面目。原来谢鹏飞得到了我们三人进京的情报后，他为了不让我们在铁道部的会议上把红色列车的真象公诸于众，不惜用这种卑劣的特务行径来阻拦。

谢鹏飞必定认为我这头头是会乘小车走的，所以他亲自带人坐一辆轿车，预先在我们总部附近盯上了殷的车子，一路追逐，拦截，撞车，终于拦下了我们总部的改装吉普，没想到车上坐的不是我，而是送行的殷庆宝，他想不到我这“部长”竟是乘售票处的班车到机场去。

殷人多势众，谢“光棍不吃眼前亏”，居然答应殷的要求，落笔写下他承认违反交通规则，向红工司道歉，并签下谢鹏飞的名，我看了这张字条，哈哈一笑。

笑过之后，我突然想，在上海谢没有得逞，但在北京我不是轻易地上当了吗？我本来想，双方都是工人造反组织，还不至于加害于我吧！结果上了当。谢和我都失策一次，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

这很像中国与南越在西沙的海战中，我方以为对方的指挥舰必定在前，对方以为我方的指挥艇必然在后，于是开火的首发炮弹互相都没有命中对方的指挥舰艇。一个是以君子之心度了小人之腹，一个是用小人之腹度了君子之心。

唉！我这人那，一生以诚待人，诚得迂腐，面对奸诈和不择手段的小人，显得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年青时这样，中年步入老年也是这样，面对社会，无能为力，只好躲进蜗居，面对妻儿成一统。

没赶上铁道部的会

我们在民航售票处下车后，想赶乘公交车去铁道部，连问了几个人都说，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全部停驶，今天没有车可乘，你们只有步行。

天啊！路还远着呢，今天下午的这个会是绝对赶不上了，到这时我算死了这条心了。但我们还是不断地问着路，向铁道部走去。

大白天，没有公交车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走着走着，发现北京的商店门面全被大红颜色的油漆所覆盖，走了一程又一程，街道的两旁全是红色，一律的红色，无一例外。这些油漆是新近在同一时期刷上去的，亮得耀眼。在这红海洋中漫步，我们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革命热浪，在红色的海洋中，金色和白色的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是那样醒目，顿时使我们热血沸腾，不由概叹，倒底是伟大领袖所在的首都，政治空气是那样的浓烈。我们三人兴奋地走着，东张西望，交谈着各自的感受。

在一条路口，看到有群人在围着看一张传单，我也凑上前去看，是一张红卫兵刚贴上的传单，内容竟然是反对北京城内搞的这种“红海洋”，传单把这奇异的“红海洋”斥指为极左思潮，掩盖了阶级斗争，难道只要把门面刷成红色，就成了革命派？反革命也可以把自己刷成红色，因此这些红卫兵呼吁停止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我一看对啊！说得有理，透过现象，把事物的本质揭示出来。倒底是北京红卫兵，敢说敢讲。刚才的亢奋一下冷静下来。

我们三人继续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人走乏了，肚子也饿了，买了几只面包啃，无心去观赏北京的“红海洋”了，“红海洋”与我们无关。

待我们赶到铁道部时，夕阳西下，已近傍晚了，只见有两卡车的人高唱着语录歌开进铁道部大院，纷纷跳下车。我们上前向他们一打听，他们说，铁道部的大会已经散了，他们就是从会场回来的。

完了！为了赶这个会才乘飞机，可还是没赶上！

不去管它了，先找人安排吃的和睡的地方吧！

吴国祥很快找到了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一位同志（这人我也认识），他先安排我们在食堂吃了晚饭，随后吴和金去了乘务员宿舍，我被安排在中央调度室的一间办公室里。

总部被砸

偌大一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办公桌上为我铺就一床被褥。我实在太困了，很快就入睡。半夜，枕边的电话骤然响起铃声，我一惊而醒，拿起电话，听筒传来总机接线员的声音："请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部长听电话。"我说："我就是。"

"那好，上海你们的总部找你，请你通话。"

话筒里传来了殷庆宝急促的声音："是你吗？我告诉你，今天总部被砸了，你马上回上海来。"

"什么？总部被砸？"这消息太突然了！转而一想，这也是必然的，费敏璋拆烂污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连累群众感受到压力和委屈，情绪落入低潮，而反对派早就在蠢蠢欲动，一直苦于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当然会抓住费敏璋的辫子，运动一些群众，乘我离开上海之机当夜发动了这次砸总部的行动。好啊！这批反对派！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问："殷庆宝，是谁领的头？"

"南市分部，蒋端根、林新中他们带人来砸的。"

哼！这恰恰是你殷庆宝拆下的烂污，是他不能容人，开除了他们，造成了这种后果，我怒火中烧，睡意顿消。

殷急促地说："你马上回上海吧！乘飞机回来，明天就回来。"

明天回上海？已经半夜了，明天就是今天！我想了想，我总不能就这样回上海呀！我说："我不能就这样马上回上海，我总要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我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不！马上回上海，乘飞机回来，北京的事不要去管了，家里的事要紧。"他态度很坚决。也难怪，上海就他一人在支撑，他一定自感撑不了这个场面，才深夜打来长途找我。

我问："总部现在怎样了？你现在哪里打电话？"他告诉我，总部被他们抢去了一些财物和自行车，一辆改装吉普车等等，现在这些人已经离开总部，他是在总部打的电话。我一听放心不少，殷还能在总部打电话，说明这些人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只是抢了一些东西就走，并没有占领总部，没有宣布接管总部的权力，另组总部领导班子，他们还成不了气候。想到这里，我劝他不必惊慌失措，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安心等我，我说："我一定尽快回上海，就在这两三天好吗？至少我要把王继鑫找到，把他们一起拉回上海，平定内乱。"

话筒里沉默了一会："好吧！我希望你越早越好。"

我同情他的处境，我说："殷庆宝，你再撑几天，我一定尽快回来，放心好了。"

我放下电话，重新躺下，可是再也睡不着了。这些乱子都是他们两人种下的祸根，如果我在上海，肯定不会出这种事，反对派们知道我离开上海才敢于下手。

我又想，刚才的电话，远在上海的殷庆宝的电话，居然会接到我的睡处，嘿！做了一个造反的头头，连上海到北京的电话几分钟就接通了。

事后我才知道，总部被砸后，殷惊惶失措，马上打电话到红工司铁路总部，他们就把殷的电话，通过铁路内部电话线，接到铁道部的总机上。我住在中央调度室办公室，部里一定是知道的，否则半夜时分，总机话务员不会找到我。当时我住进去时，部里有人反对，说这里是中央调度室，是机要部门，全国的铁路就是在这里调度的，不能睡人，经上海去的那位同志说："他是我们上海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他们就不再吭声，退了出去。所以这个电话就被接了过来。

去找"全红总"

天一亮，我就起来刷牙洗脸，盘算我今天的行程和打算。上海的总部出了这么大的事，昨天的会又泡汤了，这个铁路上的事交给吴国祥看着办吧！找王继鑫的事，等大老李、毛胡子他们来了再一齐去吧！我一个人先去全国总工会看看，听说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总部"（全红总）就设在总工会，我要去会会这个全国性的临时工组织的头头。

吃早饭时，我把安排告诉吴国祥，他听了很乐意，他说铁道部的事由他来办，他可以去找熟人想想办法，一定搞出点名堂来，不能空着手回去，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有些把握。就这样我们各自分手。

今天，北京的公交车正常行驶了，我一路乘车问询转了半天，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踏进总工会大楼，大楼内一片狼籍。

满地的污泥已经干涸，看来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打扫过，乱糟糟的卫生状况好不吓人。走廊的情况是这样，室内的景象更是吓人，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人，衣冠不整的男男女女，席地或坐或睡，男女同室，稻草碎乱地铺满一室。这些从全国不同角落来的人，像群战争难民，像旧社会走江湖的流浪者，为了保持室内暖气片发出的暖气不外流，窗门紧闭，有的门上垂着棉门帘，当我掀起门帘探头一看，一股臭气扑来，那些或坐或躺着的人，木然地瞪着我，呆滞的眼神看得让人心慌。

怎么啦？这里是地狱？还是革命的圣地？我返身而退，一间间看过去，全是这样的景象。我再向楼上走去，二楼也是这样，三楼稍好些，没有人住在里边了，但原先是办公室的门窗支离破碎，办公桌椅凌乱不堪，冷落、破败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

我不想再深入探究下去了，不想在这“中华总工会”去找什么“全红总”了。我回头下楼，走过厕所，一股臭气刺入鼻腔，一股黄色粪水流向门外的走廊，冻成冰粪，而那男女偎依在地板乱草上的情景更让人恶心。

联想到上海，我们总部内的大队部也有这种情况，原先我以为，只有我们上海总部才有这种丑恶，想不到在首都，在全国总工会，情况更糟。

原来，革命造反都是这样的？！这算什么革命造反啊？革命是这样的么？这样的革命造反能成什么气候！这样能造出一个新世界来么？以前的革命、井岗山、延安，会是这样的么？决不是！只有自身朝气蓬勃，才能造就崭新的世界。再想想这两个月来我们遭受的挫折，耳闻目睹的事实，昨晚上海总部的被砸——唉！我们自己真是一片乌烟瘴气！我算看透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了大门，不由得转过身来，面对在我心目中原是那么神圣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门，恍然彻悟：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人类的伟大革命，是一批乌合之众以各自的心态，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演出的一场傀儡戏而已。难怪上海的“老保”们骂我们造反派是社会渣滓。

不知怎么的，我的情绪一下跌落到冰窑里，混身瘫软，我觉得太累了，太累了……

疲倦突然袭来，一股莫明的心理占据了我的脑海。

厌倦！我厌倦这造反的生涯！我要退出这造反者的行列！

我离开中华总工会，像受了重伤似的一步步向铁道部走去。

回到铁道部，刚在我下塌的办公室坐下，我的随从大老李、毛胡子等人从上海赶来了。他们刚下火车，看上去他们还挺兴奋的，嘻嘻哈哈的拥进来，我正要找人发泄一下我心中的愁闷，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我把在总工会看到的景象对他们描述了一遍，发泄了一通对革命造反的厌倦心理，大有看破红尘的味道。

或许我的情绪感染了他们，他们立在我面前，神情凝重，一言不发。

我心中的郁闷全发泄了，人反觉得好受一些，话题转入眼面前的事。我向他们通报昨晚上海发生砸总部的“1•13 事件”（因为发生在 1 月 13 日，我暂且把它定为 1•13 事件），他们听了大吃一惊，马上乱糟糟地议论起来。

待他们平静下来后，我对他们说：“这事也就这样了，殷庆宝要我今天就回去，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蒋瑞根、林新中这些人反不了天。我总想在北京搞出点名堂来，但是昨天我们又没有赶上那个会，铁路上的事，我让吴国祥去办。我想在北京活动几天，如果没有希望，就立即赶回上海。”他们点头称是。我又说：“我们首先要找到王继鑫他们一伙人，真不知道他们一个月来干了些什么事，找到他们后，一起回上海。”

寻找王纪鑫

我们正在商议时，上海铁路总部的那位同志和中央调度室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向我传达

昨天 13 日大会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简短地谈了几句，话题一转说周总理指示：在中央调度室睡觉的造反派同志撤出去。

喔？周总理指示！我立刻爽快地说："周总理的指示，坚决照办。再说我们上海又来了那么多人，我马上撤出去。"

大老李马上说："铁道部不能住，我们去邮电部。"大老李指指自己的邮电制服，对那同志说："我们几人是邮电职工，我们全部去邮电部。"铁道部的同志高兴地同我握手道别。

待他走出去，我对我们铁路的同志说："你对吴国祥说，请他继续为 14 次列车的事争取机会，我会不断与你们保持联系的。"一面我又拿起电话要通了上海，向铁路总部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但他们对总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白。我有点失望。或许接电话的人听出来了，他说，"你可以通过上海路局的总机转接我们总部殷庆宝，只要把总部电话号码报过去就可以了。"一试果然通了。

殷庆宝平静地说："总部非常太平，今天一天没有什么事发生。"我告诉他："我要离开铁道部，明天去找王继鑫，以后有什么事，你可打电话给吴国祥，我会同他联系的。"

打完电话，我们一伙人去邮电部，邮电部把我们安排到郊区的一所地方去住宿，我们的人分成两批，一批人乘公交车前往，一批人乘座摩托车和两用车走，在这零下十度的严寒中，上海产的适应江南气候的永久两用车显出劣势，踩得浑身冒汗才发动起来，而那辆苏修（苏联）的两用车，适应寒带气候，毫不费劲地一蹬就发动了。我们在冬日夕阳的余辉下，冒着大风向我们的宿营地驶去，我虽躲在毛胡子老陆的身后，尖利的寒风还是把我的没有戴帽子的脑袋吹得发痛，老陆也直喊两个膝盖冷得发痛。到北京航空学院时，我冷得几乎受不了，幸好，我们的住宿地就在附近。

踏进住宿地，我一看非常满意，大概因为这里已是郊区，住的人不多，里里外外的卫生状况很好，洁白的被子、床单，整齐地摆放着，地上干干净净，完全没有总工会那种令人恶心的景象。我们在食堂心满意足地吃了一顿热饭热菜。他们是坐了一夜火车没有好睡，我也只睡了上半夜，所以大家早早地睡下。我就在这里度过了我北京之行的第二夜。

早上醒来，已经是一月十五日了，我们决定还是去左家庄找王继鑫。我们在左家庄寻了个遍，也找不到他们的人，一打听他们全部搬到劳动部去了，我们又赶往劳动部。

这是我在北京见到铁道部、邮电部之后所见到的第三个部，也是房屋建筑最差的一个部。

劳动部的外观像民房，门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的牌子却硕大无比（其实它的牌子并不比其他部的牌子大，而是这块牌子立在这原来是民居的平房旁边，其比例就失调了），看着这一排平房，简直难以相信这里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级机关。踏进大门，里面的房子一排排、一进进全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

我们随便一打听，马上有人指给我们说在那一排屋中，看来上海来的他们影响还不小呢！他们是几十人的代表团，占了好几间屋子。这里也同总工会一样，地下铺着稻草，人们散乱地坐在地铺上交谈着。这里的景象要比总工会清洁得多，至少没有太令人反感的地方。

我们找到了王的一伙人，相见之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互相打听情况，高兴地叙谈起来。事先我对我的随从们交待，不得把总部被砸的事向大家尤其是下面基层来的人透露，我不想在北京再引出一场骚动来。或许这是我的多虑。

我与大家握手寒喧后，人们把我引向王继鑫住的那一间。

在京的常委会

敲开门，王继鑫和郭文美一见是我，先是一怔，继而以惊讶的神情望着我，半天才招呼我进门，几个基层分部的代表也随着我进来，人们高兴地围着我，打听上海的情况，我就泛泛谈了一些情况。王继鑫以一种怪异的口吻问我：“听说你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是吗？”我说了一些大概。从他们的言谈来看，他们对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连三十二个组织发了一个紧急通告的事也不知道，连 12 日的人民日报也没有看过，这些人真不知在搞啥名堂。

我心急，就对王继鑫说：“我们是不是找一个地方，召开在京的常委会吧。”我的话一出口，其他不是常委的都知趣地退了出去，我、王、郭和另几个常委便席地而坐。

我首先把前天发生的 1•13 事件向大家通报，奇怪的是他们听了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在听我讲故事。这里是不是有嫉忌的心理在作怪，抑或有些幸灾乐祸呢？我说不清楚，也不去细想，我转入我这次来京的任务这个话题，把我办实事的设想和铁路的情况，14 次列车等向他们汇报了一个大概，又把我们由于费敏璋没有在《紧急通知》上签字造成的巨大困境，内部又在造反，以至发生 1•13 事件，这种内外交困、几乎使我们红工司陷入绝境的局面告诉他们。

我告诉他们费敏璋也在北京，我问他来过吗？他们说根本不知道他来京。我又把费来京的经过向他们通报。

王继鑫嘲笑费敏璋说，如果他去中央文革的接待站，要通宵排队，而且就算轮到接待，也根本不起作用。

我说："现在由于费的错误，造成了我们在上海被动挨打的局面，前天又发生了 1•13 事件，总部被砸。现在上海实际上只有殷庆宝一人，我来京前他再三要我找到你们，一起回上海。鉴于这么一团糟的局面，我们应当立即回上海，全力应付困难。"

他们听完了我的话，都不吭声，一时沉默了半天，各自打着算盘，随后几个常委提出不少他们必须留下来的理由。这些混帐王八蛋，他们竟然对《紧急通告》、组织的困境等等面临的一大摊子严重问题，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政治上的盲人，还在做梦呢！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赴京代表团已经在京一个月，我看也不见得有什么名堂能搞出来，在北京已没有什么意义，我和殷庆宝的意见是明确的，全部人员立即撤回上海。"

王继鑫和郭文美还算聪明，不明确反对，推说后天中央文革召开一个会，他们要去参加，说他们已经为这个会作好了准备，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对我很有诱惑力，我想，是不是能捕捉到一点机会呢？我表示，这会就在眼前，大家一起去参加吧，会后就回上海。但王伟明确反对回上海，他的理由是，王英现在生病不能走，而且他已领了"全红总"的记者证，要参加一个几天后"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内容是控诉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的血腥罪恶。

（"全红总"的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确召开了，这些头头被江青的接见和讲话冲昏了头脑，胆大妄为，拿出了血衣什么的进行控诉，向外国记者展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种做法暴露得太过分了。我认为正是这些举动才导致了中央解散"全红总"的"二月通告"的出台，因此这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恰恰是解散"全红总"的起因。）

一听王伟要参加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我的政治敏感告诉我：不能参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会惹来麻烦的。我坚决反对！不同意王伟留下来参加记者招待会。

奇怪的是郭文美原来是记者出身，她为什么没有去领记者证？而且在我极力反对时，她不表态，不表示自己的意见？

这个在京的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

赴京代表团干了什么

会后，我与其他一些成员接触时，不少人向我反映了四位常委在京的表现，内中一人是南市分部的（这次 1•13 内乱就是南市分部策划的），这人书生气很重，原是黎伯昂联系、帮助组织的南市分部的头头，后来又有一个分部冒出来，经做工作后合在了一起，但他受到排挤，被推到赴京代表团。因这层原因，他对我比较亲近，我们见面后，把他在北京看不惯的一切详细地向我反映。总之，把大家的反映归纳起来：王伟和王英两人的关系昭然若揭，已成众矢之的，反响强烈；王继鑫和郭文美的关系，是“暧昧”二字，众人略有微词而已。

同大家接触交谈后，我得出如下印象：赴京代表团在北京，大体上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就全国来说，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上海“红工司”的赴京代表团，曾是“全红总”拉拢的对象，他们拉王继鑫和郭文美参加，但因为只是“拉拢”而不“看重”，因而他们两人拒绝参加“全红总”，所以我们上海红工司同全红总没有建立组织关系。对于这点我不反对，觉得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有好。全红总给我的形象太坏了，我一点也不可惜。

在北京期间，王继鑫和郭文美做了这么一件事：

1966 年 12 月 26 日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接见全红总代表，代表们在会上控诉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12 月 28 日上午我接到王继鑫发来的电文：

1966 年 12 月 26 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负责同志。江青同志讲：要了解现在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什么情况，并已考虑到这是不合理的制度。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在座的其他首长听后也极为愤慨。江青同志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说：“这不是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包身工一样了吗！江青同志还说，过去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苦了！这次我们一定要把这不合理的制度砸烂！她又说：我们跟你们是感情相通的，必是相连的。江青同志讲：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是干革命的，是革命的同志。康生同志也讲：你们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少奇要在工人中间闹分裂，企图使企业变

色。在场的代表还向陈伯达、江青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谈到劳动部对代表极为苛刻。江青同志就对劳动部李部长和郗部长讲：你们一定要让代表们吃好、住好，给予开展工作的方便，这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手捧电报，我惊呆了，我们临时工代表竟然受到如此高规格的接见，我的眼光在“江青同志在听了代表们的反映后，极为感动并为此气愤得流泪”上停留打转，热泪止不住地流下。我确实被感动了，我们老百姓遭受的一切不幸全是下面的官僚在蒙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况下造成的，你看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不是“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吗？我们的造反终于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得到了中央文革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用江青的眼泪平息内乱

那天我把电文递给杨福海，让他当众宣读，让大家分享这份每个人应有的喜悦。正当每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时，突然杨浦分部来电话告急：从国棉十七厂（王洪文所在的工厂）来了一红工头头，他组织了人马欲夺取杨浦分部的领导权，分部的头头们在惊慌失措中直接向我求救。我扔下电话心中骂了声：这些无用的草包！随即对正巧在场的虹口分部一名头头布置任务，请他立即回去调动人马。他神气地向我表示，立即调几卡车人直接去杨浦分部。

我略一思索，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要动用武力，此举只是有备无患，便对他说：“你调好人马在原地待命，不必立即就去，我先去解决，需要时我再用电话调你。”他听罢急匆匆就去调人了。

我带上毛胡子就走，杨福海关心地说：“多带点人去吧！”我说：“用不着。”

我们的车奔向长阳路江浦路上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杨浦分部所在地。

走进分部的门，只见气氛很紧张，楼下挤着不少人，看来是来夺权的人，有人把我引到楼上。神情紧张的分部头头们见我到来，立刻松了一口气。一个头头小声地问我带了多少人来？

我笑笑，小声反问他：“来夺权的就下面这些人吧！”

他点点头，一面指给我看，“就是他带来的，国棉十七厂的。”

这人二十岁出头，肤色微黑，个子不高，操一口纯正的国语，能说会道，他对我这总部组织部长的到来略感吃惊，但很快稳定了情绪，重又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我正要摸清他的底细，就让他说下去吧！

他以王洪文这块金字招牌吓唬人，以十七厂引以为荣，以十七厂来压人，贬低分部头头，抬高自己，处处暴露出他的个人野心，赤裸裸提出夺权要求，但他在我这个总部来的头头面前并没有放肆的举动。

听到这儿，我明白他没有什么能耐，仅此一点吓唬人的本领，对这么一个小毛孩子我不想多浪费时间，但我也不想用简单粗暴的做法逼得人“跳墙”，能和则和。

用什么办法来制服他呢？怎样既能清除这种不该有的夺权行动，又能不伤和气呢？

有了！这是一个最简捷的办法。我把刚收到的电文拿出来，当众读了一遍，读毕我把电文交给分部头头，让他们马上抄写一份，向下面传达和刻印传单；然后我开导这个毛头小伙子说：“江青那样支持我们临时工的革命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分成两派，内部夺什么权呢？你要好好想想啊！”

这一着果然有效，镇住了他。他爽快得很，当即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在总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不再另拉山头。

我听了趁热打铁，抓住时机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虹口分部，告诉他们：人马不必来了，立即撤消调动命令。这毛头小伙被我这只没有打出的“拳头”彻底镇住了，对我表示：愿意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我也马上安抚他，既然他口口声声王洪文，我也就顺水推舟，要他与王洪文拉好关系，搞好十七厂的红工工作。我一定会对他委以重任云云。

这场风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平息了，事后，再也听不到这人的消息。哈哈！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会事，你能聚起一群人，拉起一个山头，再强横一点，就能变成发号施令的草头王。如果失去了时机和信心，你就去他妈的蛋！

回忆起 12 月 28 日的这场插曲，王继鑫他们在北京的所作所为，除了他们 12 月 28 日发回来一纸电文，被我用来平息了一场内乱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实际上，王继鑫他们并没有参加 12 月 26 日的座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这个会，那是“全红总”一手组织的，岂容他人染指？12 月 26 日晚上的会，他们直到 28 日晨才发出电

文。现在，从电文的措辞和时间上来推测，他们是在 27 日白天从铺天盖地的传单中得到了消息，再经过郭文美的拼接整理，用这样的开场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六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同志接见了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座谈会……。"隐去"全红总"三个字，让看的人误以为，王继鑫的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中央文革的接见。

郭文美的笔又把此内容进行"上海化"，临时工、合同工是全国各地通用的提法，在外地是没有"外包工"的，唯独上海有外包工（事实上外包工与合同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电文中郭文美硬是把它拉在一起，在合同工后面加个括号放上外包工，让这纸电文上海化。他们这是为了掩盖自己没有参加座谈会，便把北京的传单改头换面发回上海。

面对赴京代表团这样一堆烂摊子，我决定在这两三天内回沪，把赴京代表团也一并撤回去！

我的随从们也明显表现出对赴京人员的不满，尤其是毛胡子和大老李，他们性格豪爽，嫉恶如仇，有正义感，完全站在我一边，是我可信赖的人。我决定一旦赴京人员拒绝回沪，就要采取行动，逼迫他们回去。

与首都红三司交谈

中午过后，有几位红卫兵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王继鑫向我介绍，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隶属于首都三司。他们送来了首都三司出的《首都红卫兵》报纸，这是一份 1967 年 1 月 10 日的一期，头版头条是《砸烂刘邓，彻底解放合同工、临时工》的社论，第三版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是《评合同工、临时工制度》，落款是，湖南大信纺织厂萌芽文革小组等八十三个单位合同工代表。

萌芽小组！就是我和黎伯昂转抄他们的传单在外滩张贴的萌芽小组！我猜想"全红总"这个组织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搞起来的。

另一篇文章是《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了》。第三篇是《合同制度十大罪状》。

首都三司的报纸这样化大力气支持，是对 12 月 26 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呼应。首都三司在北京，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左派，影响之大无与伦比，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在同这几位学生握手时，心中突然一亮，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我请他们席地而坐，向他们介绍起我来京的目的，向他们介绍我们红工司在上海的情况。也说了由于费敏璋个人的错误，使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经过，并介绍了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抵制经济风中，我在铁路蹲点，组织了 14 次列车进京，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北京，国务院派出人员来接我们，从这次列车开通后，在周总理的关怀和过问下，使全国的铁路畅通，说明这次行动影响的巨大。

我又告诉他们，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曾派记者到铁路局的列车段采访这次列车的组织者吴国祥。我告诉他们，记者是带着这样一个观点去采访的："你们在刮经济主义歪风中，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又是怎样转而抓革命、促生产的？"这当然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而且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吴国祥当即同记者辩论起来，指出刮起经济主义风的根子在市委，不在我们红色工人身上，我们红色工人不可能刮起经济主义风，在这次经济风中，真正得益的不是我们红色工人。他指出记者这种提法是带着偏见和歧视来的，这是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所不能忍受的。结果采访变成了长时间的争论，于是采访也就不了了之。因此上海至今没有登载我们这次列车的消息。所以我们来京想参加 13 日铁道部的会，可惜没有赶上。

在我介绍情况的过程中，红卫兵小将一直静静地听着，似乎并不专注，是不是对此有些冷淡呢？还是故意老成持重，不轻易表态？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我便笑着说："还有你们外语学院的一段插曲呢。"我故意顿了顿。

"唔？"他们几人不约而同注意地看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这列由我们上海红色工人组成乘务员的 14 次从上海开出后，到南京摆渡，过长江后，列车在浦口车站受阻，因为客运有几天不通了，浦口车站滞留不少旅客，这些旅客拥在站台上，拼命往列车上挤，列车严重超载，再也挤不上人了。这时有一位外国青年用生硬的中国话向我们的列车员请求帮助，对于外宾我们的列车员还是要照顾的，允许他从车窗中爬进乘务员休息的车厢中来，他是你们外语学院的英国留学生。"

我的话被打断了，红卫兵们向我提出问题："是北京的外语学院吗？""你怎么知道是英国留学生？"学生们表现出异常的热情。

我说："是你们北京外语学院的留学生，他也外出串连，在回北京的路上，被滞留在浦口，把他急坏了，当他看到有一列车开往北京，就急不可耐地跟着往上挤，无奈，同样想挤上车的人们并不由于他是一名外国人而买他的帐。他终于在乘务员的休息车厢中安顿下来，受到我们列车员的热情照顾，因为没有餐车，列车员们除了分给他带去的面包外，还把自己带去的食品分给他吃，列车员又将自己带上车的大米煮了粥送给他吃，又饥又饿的他，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他激动之下，写下了一张字条，表示感谢……"

红卫兵们马上打断我的话问："这张字条带来了么？给我们看看。"有的问："他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签的是外文姓名，我不认识，但中文写的是感谢上海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万岁！等语句。"

那位领头的红卫兵伸手要看，我摇了摇头："不在我身上，这字条在列车段的头头吴国祥身上。这样吧！我们约个时间，我去铁道部，把吴国祥他们请来，并把那字条也带来。"我们一言为定——一小时后再见面。

中央播发 14 次列车的消息

时间这么紧，去铁道部接他们两位，用什么交通工具呢？正在我为难时，大队部的陈铭声（他随赴京代表团一起来的）说："我去司机班要辆小车吧！"看来他已和劳动部的关系搞得很熟。他把我领到劳动部的司机班，向他们说："这是我们上海总部的常委、组织部长，有急事要用车去铁道部。"那位班长二话不说，马上派了一辆小车给我。这时旁边有两位女红卫兵不高兴地对班长说："我们要车，你说不行，为什么他们要车马上就行？"

我一看，是两位女学生，她们手拿着被子之类两个大包。

那司机班长说："说不行，就不行！你们还蘑菇什么？"两位小将也不甘示弱与他争吵。

我息事宁人地劝说道："这样吧！我一人坐一辆车也是空着，如果顺路的话，就带她们一起走吧。"那班长对我看看，还是坚持说："不行！"两位小姑娘又要与她论理，我说："算了，她们拿着那么多东西，带她们走吧！"那班长无可奈何，极不愿意地说："那就上车吧！"

两位挺凶的姑娘也不对他道谢一声，出门就往车中扔她们的东西，另一个又急忙去拿别的东西，我们只好等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司机不耐烦地嘟囔："你们今天要车，明天要车，没个完，答应你们了，又这样拖拖拉拉，好人就是不能做。"话虽是对那姑娘说的，似乎也对我的多管闲事不满。我只得一声不吭。

开车了，驶过一排排平房出了劳动部的大门，在半路那两位小将连道谢一声也没有就下了车，甚至不回头看一下就走了，是北京人不讲礼貌呢？还是在这特定的年代，人们不讲礼貌了？

我以上海人特有的热情和客气，向那司机道谢，开始聊天。我问："这车怎么一点声响也没有，那样平稳？"他告诉我："这辆车是西德的本茨轿车，是部长的座车。其它的小车都出去了，这辆车平时是不用的，只有部长才用，所以刚才不能答应那两个学生。你是上海来的部长啊，我们班长就派我出车。"

原来如此！想不到我处处能沾"部长"头衔的光。

司机又问我："北京来过吗？"我说："第一次。前天刚乘飞机来。"他就说："我陪你看看北京城吧！我们兜上一圈吧！"他一面开车兜圈，一面指给我看，这是景山，这是中南海大门、天安门、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王府井大街等等。这是我这次北京之行，唯一的一次忙中偷闲，领略了首都的风光。

到了铁道部，金月雯已经回上海去了，我只得把吴国祥一人接到劳动部。那几位红卫兵小将已经在等我们了。吴把那张字条出示给他看。

他一看就兴奋地说："是他，真的是他！是这个英国留学生的签名。"他指着字条说："这个留学生平时非常反动，想不到他居然会写出这样的字条。看来你们的工作做得太好了，使他转变了反动立场，站到我们无产阶级一边来了。"他热烈地握着吴国祥的手："感谢上海的铁路工人改变了一个外国反动学生的世界观和立场，感谢上海的革命造反派！感谢你们！你们真了不起啊！"

他征求我们的意见："这张字条是不是给我，我要把它在我们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我当然表示同意，吴也连声说好，我们趁此把我们红色列车的情况向他详细介绍，吴国祥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同时把一份经过材料交给了他。那几位红卫兵兴奋地拿着材料走了。

我心中万分高兴。我们 14 次列车的报导，连同那位同学的字条即将在下一期首都三司的报上发表。

吴国祥对我说，他在部里还要争取一下，这两天也要回上海，上海铁路红工总部已经几次打来电话催他回去。我告诉他，我在这两天也要回去，而且在京的代表团所有人都要回去，请他转告那位在京的铁路总部的同志，请他有所准备，为我们回沪安排一下。我与吴就这样匆匆分手了。从这次北京分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见过面。

这以后的进程太快了，意想不到的快！清早，我刚在收拾睡铺，有人兴匆匆地跑来告诉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 14 次列车的消息，人民日报也登载了。我再三追问你们有没

有听错？那带着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志说，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首都红卫兵果真手眼通天！我马上请毛胡子开着摩托车去购买当天的人民日报，遗憾得很，他兜了很多地方也买不到人民日报。

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的北京之行总算没有白跑！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该立即回上海了。

回到上海后知道，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人民日报之后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报导，通栏标题是《红色列车在前进》。不过这篇报导里面有不少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最奇怪的是插进了上海的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组织，说什么一卡车面包是他们支援的，我看了只得无可奈何地笑笑。不管怎样，总算努力没有白费。

我想，这次北京之行，使中央大报、中央电台、首都红卫兵大报、上海大报都用大块文章发表、广播了我们红工司的消息，我们的形象该扭转了，红工司应该说是挣出了困境。

误入“白虎节堂”

现在该是想想家里的事了，1•13 事件还没有了结，回上海后如何对付这些“内部造反”的反对派呢？我向外语学院的首都三司红卫兵提出请他们随我到上海一起闹革命，参加我们总部的工作。那位与我接头谈 14 次列车的小将（看来他大小也是一个头头，家在南京）欣然同意，由他组织了 20 多位红卫兵小将与我们一起成行。这些红卫兵小将是真心实意搞革命的人。（哪怕他们观点很左，哪怕他们干过错事）我们成行的日期就定在 1 月 18 日。

回上海的时间定下了，但是购买车票的事，王继鑫他们却不愿承担，因为他们对回上海本来就是勉强答应的，看来这事只有靠我自己的积极性了。

我预见到车票不太可能购到，为了不至于拖延下去，我就亲自去铁道部找我们的铁路总部的那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我决定在明天全部撤离回沪，并有首都三司的二十多位红卫兵跟随我们回沪，请他安排，他一口应承：没有问题，到时来接我们。

我很高兴地离开了铁道部，换乘了好几辆车匆匆去北京工人体育馆去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会议，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对我们总是那么有吸引力。

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离市区很远，好像在郊区似的，四周空地很多，一大片黄土环绕着园形体育馆，路上车流稀少，有一种空旷、荒凉的感觉。体育馆外面很冷静，不见人来人往，我想大概会已经开了，便急急跨上台阶向玻璃门走去，门口两旁荷枪守卫的解放军战士把我拦住。我出示了我的证件——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常委组织部长的工作证，我用上海普通话向他们说明我是来开会的，他们看了我的证件后，退后一步向我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穿过门廊，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走上楼梯，上面是环形的走廊，沿窗有沙发可供休息，但是不见一人，我向中央的大厅走去，也听不到什么声音，我很诧异，怎么这样静呢！我继续向里面走去，到了看台，一排排座位竟然空无一人，静得可怕，我略微一惊，马上退了出来，到了外面的环形走廊，这时西下的夕阳透过明净的大窗户，照得厅内一片光明。啊！时间早着呢！在这容得下万人的体育馆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这个将要有中央首长参加的会议大厅中，竟然只有我一人！我脑中突然出现《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节堂”的情景，我越想越怕，混身燥热，立时惊出一身汗来。

北京的公交不像上海那样方便和快捷，我从劳动部到铁道部到这郊外的工人体育馆，换乘了不少公共汽车，北京的公交车要等好久好久才来一辆，换得我昏头转向，由于我没有手表，把时间估计错了，开会还早着呢！今天的会是中央文革召开的，传闻说江青也来参加。今天我一个人闯了进来，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那该多么倒霉，说也说不清。假如我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主席台安放一颗定时炸弹，那不就是一个绝好的暗杀机会吗？该死！我怎么会有这念头？

我越想越怕，立即向大门走去，通过那两个卫兵守卫的大门时，幸好，没有把我拦住。我快步向公路走去，心中好生奇怪：他们根本不该放我进去，而我马上退出来，他们又为什么不拦住我问一问呢？在这大讲阶级斗争、提高革命警惕的年头，至少要对我匆匆而进，匆匆而出存一点怀疑啊！起码要问问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年年月月强调阶级斗争，时时处处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但我们从未听到什么有阶级敌人破坏的消息）。今天中央文革召开大会的地方布置了警卫部队，必定也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我仅仅是出示了我的组织部长的工作证，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造反派的得势，另一方面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封建主义的意识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官越大，活动自由也就越大，而“限止”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管”辖老百姓而设的。

这天的会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进入会场看了会标才知道，是“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动员大会，后来也知道，江青等头面人物并没有出场。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北京，压力太大了，当局必须动员这些人离开。我在劳动部住宿的第一天吃晚饭、王继鑫给我一大张的油印饭菜票去食堂就餐，饭菜票是免费发放的，食堂的每个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只要扯下一小张交给食堂，每人一律是一勺白菜肉丝和几两大米饭或者馒头。在长长的队伍边上，不时有人来向我讨取饭菜票。我很奇怪，我说你们不能自己去领吗？他们没有回答我，只是死乞白赖地盯着我，我明白了，他们是领不到才来向我讨，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是盯着我要呢？

当又一个中年妇女向我讨饭菜票时，我扯了几张给她，可她盯着我手中一大张簇新的饭

菜票，要我再多扯几张给她。我明白了，我手中这一大张，一个人是足可吃一个多月。他们是不属于接待的或要被赶回去的人，他们没有饭吃。我想我在两、三天内就要回上海，要这些纸张何用？就慷慨地扯下大半张送给她，她千恩万谢到后面排队去了。后来我也学乖了，排队时只拿一小张，不再“招摇”，免得召来麻烦。

从这小事可以看出，北京的外地上访人员太多了，北京已不堪重负，中央必须把这些人赶回去，所以召开“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大会，这时的铁路已经畅通，具备了“杀回老家”的条件。会后第二天，北京城内“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标语口号遍地都是。我们在此氛围下“杀”向上海。

和三司小将“杀”回上海

行前王伟又一次提出要留下来，不愿回上海，理由还是：一，王英有病不能回沪。二，要参加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我怒不可遏：“不行！有病理应回上海治疗，中外记者招待会更不能参加!”

王伟冲着我说：“你个人有什么权力干涉我？”

我大声说：“我以常委会的名义勒令你们两人回去。”我的声浪传到了外面，我的随从毛胡子和大老李们一下把门打开冲进来，怒目对着王伟。

很好！这两个忠实随从来得太好了！我又说：“你们一定要留下，就必须退出红工司，交出红工司证件，以你个人的名义去参加，后果由你个人去承担。”王伟铁青着脸，冲到我的面前说：“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你凭什么……”

我打断他的话：“难道你要我在大家面前揭露你们两人干的好事吗？这两天我掌握了你们大量的证据，你说要不要？要不要!”

毛胡子像铁塔般往他面前一站：“王伟!你们两人不回上海，我马上把你们送公安部去。”大老李冷冷地说：“你王伟凭什么名份为王英包办要留下来？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好。”

在众人的恫吓和怒目注视下，王伟默然低下了头，权衡再三，终于就范，表示愿意回上海。在火车站上车时，王英被裹在被窝内，由王伟抱着上车，我看了这场景，只能摇摇头。我这个尚未成婚的毛头小伙，不能理解为何要这样包裹严密，抱着上车。说病重吧，按常情应该急于回家，好有亲人服侍治疗，他们算什么关系？说没有病吧！这模样病得还不轻呢！

1 月 18 日下午，在约定的时间，外语学院的二十多位三司同学雄赳赳地列队前来劳动部会合。我们在铁道部的上海铁路的同志也已来到，将由他带领我们进站（我派出去购车票的同志，早就向我报告，车票无法购到，看来，我早先的安排不是多余的）。我们向劳动部要了两辆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开向火车站。

车站广场人山人海，都是“杀回老家”去的英雄们。我们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一看这场面，对我说：“不可能从正门进站了，要从铁路职工进出的边门进站，就像我们上海北站那样走民德路‘红房子’进站一样。”（“红房子”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口子，旅客是不能进出的，一般旅客也不知道。）我明白在大群受阻旅客面前，堂而皇之地无票进站是会惹麻烦的。我们很快整理好队伍，红卫兵在前，我们在后，大约有六、七十人。我同那位带路的走在最前面。我们的队伍离开广场向右转，沿着北京站外围走。那位上海铁路总部的同志抱怨我带的人太多了。我从他的神色和一路的唠叨，明白他的难处，他毕竟只是上海铁路列车段的一名临时工列车员，尽管在上海大小是个头头，但不可能在北京站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要无票带这么多的人进站确实太难了。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门口我们进不去，我的脸往哪搁呢？那么多人再折回劳动部吗？年少气盛的我，用一脸的若无其事走在前面，怕什么？“船到桥头自会直”嘛！

队伍在小胡同中转了几个弯，我问快到了吗？那小头头说，快到了。我就请红卫兵们唱语录歌，那位红卫兵头头马上指挥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队伍合着整齐、嘹亮的歌声前进，壮起我的胆。我胸前挂着王继鑫的照相机，神气地向那扇一百米外的小门走去。这时我的带路人不是合着歌声的节拍前进，而是越走越快，与我拉开距离，后来干脆一溜小跑，快到那小门时边跑边掏出证件给门卫看了看，像个贼似地闪进门内不见了，连回头望我们一眼的勇气也没有。这家伙！我头皮一阵发胀，好吧！没退路了，硬着头皮闯吧！我把照相机端正一下在胸前的位置，毫不畏缩地走向那黑色的木栅栏的小门。

两个门卫迎出来把我拦住，问我：“你们去哪里？”我从容地说：“我们是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我指指我身后的红卫兵：“这些是首都三司的。”

身后的红卫兵们真棒！他们原地立正、队形不乱，在头头的指挥下，一遍遍高唱语录歌，代表团也队形不乱。

门卫看了看我的袖章，看了看雄赳赳的红卫兵。

我灵机一动，马上递上我组织部长的证件。这几天的经历告诉我，在首都，官衔能起很大的作用。证件一扬，还真管用，两人的态度马上和顺不少，我傲慢地说："我们是回上海。"我指了指军歌嘹亮的红卫兵们说："他们是协助我们去上海工作的。"

一个门卫说："那你们应该从车站进站，这里是铁路职工出入的地方。"

我说："今天车站人太多了，我们无法进站，是你们站内同志要我们从这里进站。"我想光骗还不行，还需要吓唬他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上海 14 次列车的事吗？是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恢复了全国的铁路交通，我们是被邀请来参加铁道部 13 日的大会的，今天我们回上海是铁道部安排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采访任务。"我特意摆弄了一下我胸前的照相机。二门卫低头看了看当时并不多见的相机，又看了看我们几十人整齐的队伍，这一切大概镇住了他们，一位门卫说："那你有介绍信吗？"

我一听乐了："有！"马上从我灰色拎包内，拿出一本红工司的介绍信，当场填写撕下交给他们，那门卫收下后看了一眼大红的印章，退后一步让我们进去。我得意地一挥手，我们的队伍就顺利地进入车站范围。走了几步，在转弯处，那个带路人不好意思地迎上来。我对他笑笑，不想责备他。

他默默地在前面带路，我们进入站台，在 13 次列车前停了下来。这时车站还没有对 13 次的旅客检票放行，站台上就我们这些人，车厢门紧锁着，我们无法上车。

我要带路人把本次列车车长找来，车长一到，我问他："我们上那一节车厢？"车长就指了指我们面前的这最后一节车厢说："你们就上这节吧！"一面命令列车员开门放我们上去。我还不放过他："这节车厢我们包了，不准放其他人上车。"他无可奈何地只得说："可以，可以。"就匆匆走了。

我们上车后，刚刚安顿好，毛胡子他们几人也赶到了，我不知他们是使了什么法术进站的，而且已经把摩托车、两用车送上了行李车。毛胡子在我耳旁轻轻地说："王伟和王英也被我押来了。"我一看车下，王伟双手抱着用棉被紧紧裹着的王英，吃力地向车厢上迈步。原来，在车站广场上，我忙于整队，向边门走时，在混乱中，王伟借口王英有病，以向车站借用病人专用手推车而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两人的行踪被随后开着摩托车和两用车赶到的毛胡子他们发现，身不由己，一起进了车站。

给车长照像

开始放客了，只听前面车厢和站台上人声鼎沸。这同我们无关，谁也不去理会，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各人的亲疏分群在座位上坐下来，整个车厢是我们的，怎么坐都可以。红卫兵小将们自成一个天地；我们的人又分成几个群体：各分部的自成一群；王继鑫他们自成一群；我的随从们当然又围在我的四周。只听前面的争吵声更为激烈，探头向窗外看去，前面站台上围着不少人，在叫骂声中，不断向车上拥挤。这时，车长急匆匆走进我们的车厢，在过道中用目光扫视，当看到了我，急步走到我的面前，焦急地说："开车时间已过了，但是还不能发车，因为前面的车厢太挤了，还有不少旅客在站台上无法上车。"为了证明他的话，他探身窗外向前一指。争吵怒骂声从这些滞留在站台上的人群中一浪高过一浪地传来。我明白了车长的来意，我扫了一眼我们的车厢内，该坐三人的座位我们只坐了两个人，该坐两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人，而我们的车门在我们上车后早就关闭了，车厢的通道门也锁上了，其他的旅客无法进入我们车厢。这位车长倒是十分尽职，执行了我的命令。

他以十分小心的口吻问："如果这些人不能上车，就无法发车，我想来跟你商量……"他略一停顿，注视着我的反应，我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就爽快地说："我们腾出三分之一的车厢给你，但你必须保证我们车厢的安静，人员必须……"话没有讲完，他马上高兴地说："我安排上海的一批文艺界的人来，保证使你满意。"我说："好吧！就这样，请你尽快发车。"他如释重负地走了。（文革期间，车长是多么难当啊！）很快，我们的车厢里来了一批年轻的文艺界造反派，我们的人在我的招呼下，很快收拢起来，让出了部分座位，刚好坐满一车厢，也没有站立的人。这精明的车长！

列车终于开动，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作好坐一天一夜火车的打算。当夜幕笼罩大地，列车在天津经过一阵喧闹，重又开行时，在北京数日的疲劳，催使我很快坐着进入梦乡，睡得好死好死。这是我一生中坐火车过得最快的一夜。我一生中从未乘过卧铺，但这一夜也是睡得最好的一次。好像只有一会儿，天就亮了。

13 次特快列车在祖国北方的原野上奔驶，早晨的我，神清气爽，心情好极了，活动了一下身子。早饭后我们的车厢里开始热闹，不知是谁拉起歌来，请那些文艺界的人唱歌，他们也请我们唱歌，我们唱歌的任务当然地落在红卫兵的身上，双方轮番高唱语录歌。大老李发现在我们过道对面的年青姑娘是评弹演员，大老李知道我喜欢评弹，就扯开大嗓门，请她们弹唱。

两位演员就拿出琵琶，弦子弹唱一曲开篇《雷锋，我们的好榜样》(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评弹只能唱这一曲，或者是赵开生谱曲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唉！榜样是好，就是一点不醉人。张鉴定的《误责贞娘》；蒋月泉的《杜十娘》那才叫醉人。两位姑娘一曲《雷锋》唱罢，放下琵琶，大家沉浸在一片不可名状的沉默之中，竟然没有掌声。不是她们唱得不好，也许是大家对这厌倦，谁也不想听不想唱。文艺界的人大概觉得已经还了我们昨天的情，也就低声自顾谈他们的话，车厢一下冷清下来。

我不甘寂寞，胸前挂起照相机，向前面的车厢走去，在人群中“挤”着走。到了餐车，餐车内空空的，有几位列车员在打扫卫生，那位车长也在其中。我走上前去，高兴地同他打招呼。他客气地让我落座，在客气和拘谨中努力揣摸我的来意。我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势，向他提问，问他一些铁路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铁路中断的原因，经济风在铁路上刮起时的情况。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他都小心翼翼地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或者用几句套话来搪塞，让人听了，等于没有讲。

我觉得无趣，就对在边上几步远看着我的几位女列车员说要替他们照相，我端出“记者”的架子，把镜头对准她们。她们现出中国人特有的过分谦虚，慌乱地散开不愿我给她们照相，有的列车员干脆背转身拿起抹布揩抹桌子，我就一边“卡嚓”一边说：“好！这是你们在打扫餐车的镜头。”我又拉车长照相，他左躲右避，礼貌而小心推辞，怎么也不肯。

我心中想：我们的 14 次列车冲出上海时，一些固定工耻于和临时工为伍，甚至不肯挂上餐车。现在这个车长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呢？如果他也是不愿和我这个临时工的红色工人头头交谈，那对我来说不也是一种耻辱吗？我有点忿忿然，今天我这个红色工人的头头，非要给你照张相不可。但是他死活不肯在镜头前亮相。我总不能咆哮动武吧！我灵机一动，说：“车长！这样吧！你和她们，”我指指那些女列车员，“一起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你们在出乘途中还在积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样的镜头不是很好么！”这一招真灵，你敢拒绝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他再也不敢推辞躲闪了，乖乖地与女列车员们围坐在餐桌旁，每个人手捧“红宝书”。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卡嚓，卡嚓”地照了几张，同车长握了握手，扬长而去。

我回到自己的车厢，王继鑫要我坐到他那里去，说开个会商量一下回沪后的工作。我明白，说得好听是商量，实际上郭文美一直在同他窃窃私议，另外两个王也在等候我参加这列车上的常委会，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怪事来。这时的王英坐在郭和王伟的中间，不像是一个病恹恹的人了（直到上海，她再也没有躺下过），我对这两人很反感，爱理不理。

我坐定后，便说：“回上海的工作，不便在这样的场合下谈，事实上上海情况究竟怎样了，谁也不知道。在北京城里，上海的造反派都很吃香，我们借了这个光，很顺利地上了车。在车上我们利用了我们在铁路上的优势，人多势众受到了特殊的照顾，可是回到上海，一踏进上海的大门，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红工司在上海已经臭不可闻，铁路上还有一个工总司的谢鹏飞是我们的对头，他为了阻止我到北京，用尽心机。他如果知道我今天带了这么多人回上海，必定要来找我们的麻烦，现在我们该讨论的不是回沪后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谢鹏飞。”

这几个人听了我的话，都愣愣地看着我，大概是不明白为什么冒出个要对付谢鹏飞的话题来。于是我说：“今天我们一进上海北站，没有车票，几十个人如何出站？如果谢鹏飞得到我们今天回沪的情报，完全可以把我们阻拦在站里，使我们出不了站，让我们出洋相。这样我们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面前，台要坍光了。”

怎样出站？

听我这一说，能说会道的王继鑫不响了，能说会写的郭文美也呆了，沉默了半晌，看他们没什么话可讲，我便回到了我的座位上。

我也沉思起来，一上午的高兴劲全消失了，这几十人出站的重担自然又落在我的身上。思虑一番，有了！我起身去找那位车长。

找到他后，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到上海，请他在前方站停靠时，陪我去站上打电话。他好像有些不愿意，吞吞吐吐说："列车进站，停留时间只有几分钟……。"不等他说下去，我造反派脾气上来了，我问："下个站是哪里？"

"蚌埠。"

我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那好，到蚌埠后，你来我的车厢，一起去打电话，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发车!"甩下这句话，我扭头就走。

大约过了一小时，蚌埠到了。我跳下车厢，车长也从前面车厢下车从站台上奔了过来（车厢内拥挤不堪，他无法快走），他把我领进站上一间办公室，指了指电话机。我对他命令道："我的电话没有打完，你不能发车。"我拎起电话，报了上海我们铁路总部的电话号码，很快接通了，幸好有人，是我熟悉的头头。我对那车长看了一眼，他知趣地走开说："我去招呼列车。"

我对着话筒对那个头头下达命令："一，马上去通知殷庆宝，我们今晚坐 13 次到上海，同车到达的还有 20 多位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他安排车辆来北站接，并安排红卫兵的住宿。二，我们没有车票，请铁路总部安排我们出站，并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谢鹏飞捣乱。"

我用简洁的语句很快打完了电话，这时车长来到了门口，我挥了挥手，就近奔上列车。车长向机车发出发车信号，列车开出了蚌埠站。我的心稍稍安定些。

车到浦口车站，我们的列车被分解开来，推上了火车轮渡。

在长江中，我思潮起伏，原先安定的情绪，又不安定了，我不知道铁路的红工头头们是否安排妥当了？我最好再打个电话落实一下。在南京站，我下了火车，在站台上找到车长，告诉他我还要打电话，他很为难地说："列车在过江时晚点了，在南京站只停留两分钟，到常州时再去打电话吧！"我想常州是到上海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站了，万一打不成电话呢？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在南京打。"车长再三保证，到常州时一定会有时间给我打电话的。此时车站的铃声大作，站上的工作人员在忙着打信号发车。我只得作罢。

车到常州，我不等车长，自己奔向车站的办公室，看见电话拎起就向上海要，正巧还是那个我熟识的头头接电话。我告诉他，我们已到常州，列车准时到达上海，询问准备工作做得怎样？他告诉我，已经通知殷庆宝，刚才又同殷通了电话，说车辆已经调好，铁路红工总部也已经作布置，要我一切放心。

我又问："谢鹏飞有何举动？"

"谢鹏飞不知道你今天到上海，一切正常。"

我很满意。

我又特意告诉他，我现在是在第一节车厢。放下电话，我匆匆向列车走去，车长见到我上车后，向新调上的机车头发出了信号。夜幕中，列车驶向上海。

车过真如，放慢了速度。我们乘座的这节车厢在北京时是最后一节，在浦口过江后，成了最前面的一节，缓缓驶进上海北站时，我见到站台上全是臂带红工司袖章的人，啊——我们的人！他们手挽着手，拉起了纠察线，在夹道迎接我们。

车停稳后，铁路的头头在窗下高声喊我的名字，我高兴地打开窗，同他握手。他说："一切顺利，都布置好了，快下车吧！"我们一行人下车，列队向车尾方向走去，通过一节节车厢时，我注意到后面各车厢门还没有打开，显然这是铁路总部的特意安排，为了使我们的队伍不致被旅客冲散。众多的旅客在车上眼巴巴地瞧着我们神气地向后面"红房子"处走去，那个头头一路还领呼了几句欢迎的口号，场面挺热闹。我看了看这批几百人的迎接队伍，放心了。出了站台，转弯向北，我看到沿铁路进入红房子的道口一直到红房子前的小广场。也布置了不少纠察队伍，上海的铁路总部还真够细心的。

殷庆宝在小广场迎上来，满脸笑容，看上去得意非凡，完全不是 13 日夜里打电话给我时那种焦虑惊慌的样子，我很惊异。

我把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介绍给他，他同每个红卫兵热情握手，把大家向车上让。我一看，已调来了好几辆的大大小小的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得意地手一摊，作了一个潇洒的姿势，请我上车，坐在我的边上，笑容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他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有好消息，到了总部后再讲给你听。”

我如坠云里雾里。

回到愚园路总部后，安排了小将们的住宿，一阵忙乱过后，我环顾四周，没有感觉到总部被砸的迹象，仿佛那天只是刮了一阵轻风。殷庆宝对我们称之为 1•13 事件已经不介意。

当然，我称之为“1•13 事件‘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抢走了一些物资，诸如自行车、宣传工具，还有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被抢走后，没有加水就开，结果汽缸发热烧坏，这辆车就被弃之路旁。我们找回后，向原借单位一还了之。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潜在的反对势力在全市流行的内部造反风潮中，日益强大，他们在全市好几个地方无时不在策划夺权阴谋，要夺我们常委的权，企图取而代之。好在这些人虽然充满了野心，但又各怀鬼胎，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所以在我回沪后，这些人曾发动了几次行动，均被我轻易地压平，这在下章中叙述。

其实，真正的危机在总部。就在殷庆宝神秘地要告诉我的“好消息”中。

貌似吓人的“通告”——授人以柄的绞索

这时的总部常委们——我们这些头头——已进一步分化，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以自己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事物的见解，顽固地表现自己。我搞我的“实业救国”——办实事求生存，关心的是铁路上的“抓革命、促生产”。王继鑫热衷于赴京，走捷径。这条路事实证明行不通，回沪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只知与郭文美卿卿我我，有时两人密谋总部的工作，却又矛盾尖锐，时哭时笑，嘻笑怒骂相互交织，我也看不懂。费敏璋和殷庆宝想的是经济主义的实惠。其他的常委就不用去提了，二王的情况已经描述过了；还有两个常委也是不起作用的人。——这就是我们总部的现状。

然而殷庆宝是如何面对现状的呢？他在路上对我闪烁其词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他乐不可支地坐在我的对面，对旁边的骆江华说:“让他们看看。”两人的得意溢于言表，五天前电话中的惊惶失措荡然无存，潜台词是：“让他们开开眼！”

一张大型的供张贴的铅印传单展现在我面前。传单分左右两部份，右面一版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这是 66 年 12 月 26 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的产物，如果没有这次江青流泪的表演，“全红总”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迫使劳动部和总工会同意泡制这么一个《联合通告》。这张通告的下半部份还有这三家的大红印章和部长及总工会主席的签名的影印件。这张具有劳动部长和总工会主席签名影印件的怪诞的文件，在文革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其内容仅仅局限于临时工、合同工的切身利益，概括起来共有三条：一是不能解雇；二是已解雇的要召回，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三是遭受迫害的要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天哪！这三条陈旧的内容，让人看了马上联想起经济主义，自己把自己局限在经济利益的圈子内，这样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应一月风暴即一月革命的需要！这可以从毛主席对上海三十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迅速作出认可的反应来证明。而江青在 12 月 26 日流的那点幼稚而廉价的眼泪，完全不合毛主席的胃口，善于揣摸毛主席心思的张春桥，当然不会去迎合江青对临时工的态度，张春桥也绝对不会允许在上海另有一个势力强盛的工人造反组织崛起，同张一手扶植的工总司平分秋色。（这可从后来不久的历史发展来证明。）

再来看看殷庆宝搞出的东西的左面一版：那是一个《特急通告》，以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三家发出，共有七条内容，结合上海的形势，披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外衣，还是一个不准解雇，强调劳字 114 号文件（我总部成立之初的造反成果，我们总部发出第一号通令，同时上海市委发出劳字 144 号文件——不准解雇）。更为可笑的是第七条：勒令市劳动局和各区劳动局正副局长在 1967 年 1 月 22 日前来总部听候受审。（其结果是，殷并没有做“审”这些正副局长大人的准备工作，也没有一个局长愿意前来受“审”。殷放了一个响屁。）

我把这一张貌似吓的“通告”一目十行看了看，一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可欣喜的，我清楚这一纸文字并不能把我们从厄运中解救出来，这是一张毫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是一条授人以柄的绞索！殷庆宝、骆江华的头脑太简单了。

我不好把这层意思直接表达出来，只是指着下面工总司和首都三司的署名，提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会同意出这么一张东西么？”骆江华面孔涨得红红的，以急促的语气说：他去了工总司，去了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他们同意这么署名，为这他忙了一夜。骆江华在讲时显得异常激动，让听的人感到，他完成了一椿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业绩，让人明白他为了这份传单能得到工总司和首都三司这两个全国响当当的左派组织的认可，已完成了高不可攀的壮举。

我把传单不经意地随手递给了王继鑫。他一看右半部三个大公章的影印，便以轻蔑的眼光，指着公章说："在北京，全红总的人找过我，我没有理他们，他们竟然带着这个东西找到上海来了，你们也接待了他。"王对左面一版的《紧急通告》看也不看，还给了站在边上的骆江华。

我们两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使骆江华的"热度"立时冷下来。但殷庆宝还是堆着笑脸，指着《通告》想要说点什么，却被王继鑫打断了："我们还是谈谈上海的情况吧！"这时，我们的宣传部长陡地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1•13 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我已查清，蒋瑞根和林新中操纵了南市分部，带着人来砸总部的，抢走了不少物资……。"

王冷冷地说："这两人不是你宣传部的人么？"殷一时语塞，等回过神来，才气愤地诉说这两人在宣传部里如何搞分裂，闹派性，有野心，而他又是如何整顿开除这两人，等等。这话听得让人心烦，我不耐烦地说："宣传部搞了些什么宣传工作呢？有些什么成绩呢？我们吃亏就吃亏在宣传上没有做好。"

殷听了，指指那个通告，不快地说："你们在北京时，我们在上海搞了这个通告，连夜联系印刷厂，印了出来，哎呀！忙得我……。"言下之意这是极大的成绩和功劳了。他掏出一枝烟，慢慢点燃，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似乎在说："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正为红色工人谋利益。"好像有了这张东西，已经把我们组织从逆境中解救出来。

瞧着他的这副样子，我只得说："到了今天再提这种东西，你还不觉得是不合时宜的吗？我们不能再钻进经济主义里兜圈子了，尤其是在中央的贺电出来后再搞这种东西！"我顿了顿，继续说："在北京我去过总工会，原想去看看全红总，与他们取得联系的，但进去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一片乌烟瘴气。本来我们同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现在这件东西往外一贴，让人看了似乎认为我们上海红工司是全红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下属组织了。听说他们在近几天要搞什么中外记者招待会，我看是要出事的，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拖进去陪葬。"

我的这番话，当然得到了王和郭的连声赞同，因为这样说对开脱他们在北京的无所事事的责任是有利的。当然我的本意并不是为王、郭开脱，我只是据实分析，阐明观点。

然后，我又把话锋转到上海："这个特急通告又把工总司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起拉来署名，通过了谁？他们会真正同意吗？"殷抢着说："这是骆江华去联系的，工总司是同意的，首都三司的驻沪联络站也去联系过的。"

我问："具体是那一个头头同意的呢？这个头头能代表组织吗？再说，首都三司这个名称的用法就不妥当，在卅二个组织的紧急通告上，用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名称。"我的态度非常明朗：对这两个组织同意署名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我的话激怒了殷庆宝，他恼怒地与我争起来。王继鑫大度地说："我看对这通告不用去争了。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犯了极大的错误，但这些已经成了过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把工作做好吧！"

郭文美睁着美丽的小眼睛吟起了毛主席的一首诗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她激越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今天开始，我们常委要齐心协力'从头越'，局面会打开的。我们在北京看到、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认为这次北京之行是有收获的。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她和小王两人摆出一副胸有成竹地回上海来收拾残局的架子。郭文美的这个"从头越"获得了大家的赞赏，好一个从头越！争论就此打住了。

然而真正把这通告"打住"的是张春桥。

张春桥判了"通告"的死刑

从工总司方面传来了张春桥的意见："请三个组织好好坐下来讨论一下通告的内容。"

张春桥这一句官场上惯用的含意明确的否定性暗示语言，无异宣判了通告的死刑！于是，工总司表示这张通告根本没有同意署名；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表示，没有通过北京方面的同意，不能以首都三司的名义署名。

好了！这下子通告成了废纸一张。我们的宣传成了反宣传，宣传部长再也得意不起来了。

在新的压力和惊恐之中，我们的常委班子重新聚拢起来。但是积习难返，仍是各搞各的一套。王继鑫和郭文美干脆不在乌鲁木齐中路露面，他们两人躲在愚园路总部的房子内，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费一个人从北京回来后，仍在忙他的陡劳无益的外交。殷在忙他的宣传——没有头绪的宣传。我仍把注意力集中在铁路。

一天，我们铁路总部的头头通知我，说杭州铁路的造反派有代表在上海，杭州的形势紧张，现在铁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谢鹏飞召开有关杭州问题的会议，请我参加。我听了很高兴，以为这表明我们在铁路局的局面打开了，以为谢鹏飞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存在了。我兴冲冲地赶去赴会。

我被人引进了民德路“红房子”的铁路分局的办公大楼。我的老对手谢鹏飞见我到来，迎出来握手让坐。平日不可一世的他，始终不正眼看待我们临时工，今天却格外的热情。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议尚未开始，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到来。当我被介绍给杭州的铁路造反派时，我受到了更为热情的长时间握手。我们的铁路红工头头在我耳旁轻轻地告诉我，杭州铁路方面的造反派也是临时工。

我一听就明白，今天为何要我出席这个会了。

张春桥要利用我压杭州人。

其中的一位，看来是杭州来的人中的总负责，他特意把我让进他们中间坐下，围着我热烈地交谈起来。被冷落在一边的谢鹏飞，悻悻地说：“开会了！开会了！”高声打断我们的谈话。大家只得坐下，听他宣布开会。那头头小声向我介绍他们在杭州的处境，诉说他们受到路局的压制，不得已来上海寻求支持。因为杭州路局亦受上海管辖，杭州不稳定，必然影响上海，杭州方面的临时工组织找上海的铁路红工组织求援。上海路局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却认为杭州路局的临时工造反派在闹事，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进行干预。

谢鹏飞的开场白我根本没听，不知他在说些什么。对于这个会，事先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在铁路上，谢鹏飞飞扬跋扈，处处压制我们红工的活动，前一时期他在我北京之行时干的卑鄙勾当，使我一直与他处于对立地位。所以，今天这个会从一开始我就从感情上站在杭州人一边。谢鹏飞为了抬高他的身价，再一次大声制止了我们小声的谈话：“春桥同志非常关心上海的形势，春桥同志也非常关心铁路的大好革命形势，关心铁路的运输畅通，在春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春桥同志指示以火线指挥部的名义，由我来主持召开这个有红工司组织部长参加的三方面会议，解决杭州铁路面临的问题。”好家伙！他一口一个“春桥同志”。自己没有力量，就抬出后台压人。可以想见，没有张春桥的指示，他绝不会请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可悲的是，我没有明白张春桥的用意，还不懂揣摸的艺术。张春桥要我来参加会议，是要用我的力量让杭州的临时工不得轻举妄动，也就是用“宋江”压“李逵”。而我却天真地认为张春桥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没有忽视我们红工司在铁路上的作用。所以待谢的发言停顿时，我马上发言，表示对杭州方面造反派的支持，请他们介绍情况。杭州的同志以激昂的情绪，诉说了受压制的情况，在发言中流露出对“火线指挥部”的不满。

他们的发言被谢多次打断，谢以火线指挥部的气势压人，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压人。我对这些杭州的同志深表同情，与谢据理力争，在吵得不亦乐乎，僵持不下时，我就天真地提出我们一起去向春桥同志汇报，分清是非，解决问题。我的提议当然遭到谢的极力反对。而我坚决主张去见张春桥。

谢看看没有把会开下去的可能，只得同意向张春桥电话汇报。他把我们扔在一边，顾自到隔壁房间去打电话。我很生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有后台，有权。我们临时工的命就该如此！过了一阵，谢进来了，要我去听电话。我到了隔壁，谢对我说是张春桥的秘书何文秀要我通话。

张春桥根本不听我讲

这意外的电话，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怎样才能打好这只电话呢？已经没有时间想了，我拿起了听筒：

“你是红工司的×××吗？刚才谢鹏飞已经汇报了你们的争论。春桥同志指示，请你们好好坐下来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我一听急了，这不是只听谢的一面之词吗？我急忙说：“我要当面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

对方不耐烦地说：“这就是春桥同志的指示，就这样了。”

我更急了，对方要挂断了，我不能放弃这么一个机会。我赶紧说：“我要向春桥同志汇报情况，有关我们红工司的全部情况，希望能得到春桥同志的当面指示……”不等我再说下去，对方软软地然而又是冷冷地说：“就按春桥同志的指示办吧！”电话断了。

我手拿话筒呆呆地立在电话机旁。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却被冷冷地关在了门外。电话被挂断了，就这么被挂断了。我们是后娘养的！我们好不可怜啊！我们没有张春桥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是想要这个号码，也根本沾不上边，我没有办法重新拨打过去，我们处于如此不平等的地位！我们遭受歧视的命运是不可能改变的。想不到堂堂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一个炙手可热的中央大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也对我们如此歧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主席的夫人——江青的眼泪又值几何呢？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谢鹏飞一直在旁边站着。现在，他狞笑着把我拉回原来的会议室中。我怅然若失，默默地坐下来。谢得意地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请杭州的造反派回杭州去，就地抓革命，促生产。”

怎么？内容变了？要他们立即回去？张的秘书不是说三方面再好好讨论的吗！转而一想，争也是没用的，坐下来谈什么？抓革命是虚幌一枪，促生产才是正经，路只有一条，乖乖的回去“促生产”吧！

看着谢鹏飞这暴发户狐假虎威的得意模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别说了，说了也白说，实际上今天把我叫来，就是要我帮着谢压制杭州人，至少要我明白，不得插手。我在这扑朔迷离的政治面前显得太幼稚了，我总想，革命造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我们造反派不支持造反派，这算什么造反派。而作为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为什么不肯听听我们的反映呢？当时我百思而不得其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历史的面目一点点被揭开，这些就不难理解了。

那天我被迫成了一个局外人。我只能在沉思中保持沉默。可是对杭州人来说，就生死攸关了。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同谢激烈地争吵起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个会就在吵闹声中结束。

回去吧！杭州人。

这是我在铁路上的最后一次较为重要的参与，自此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面对我们的红工组织分崩离析、支离破散、摇摇欲堕的局面。

第二十章 面对反对派

总部又被冲击

回过头来再看看反对派对总部的再度冲击。

大概在我从北京回来后的几天吧！那天很晴朗，下午我单身一人从静安寺步行回乌鲁木齐中路的总部，刚走到华山路口，迎面有几位总部大队部的女队员气急败坏地拦住我说，总部又被南市分部的人砸了，他们的人已经占领总部。她们要我马上回头。

我抬头一看远远的是有不少人围住了总部。我急忙问她们总部情况怎样了。她们说总部的人全逃出来了。

我也能逃吗？

我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我决不做这样的小人！我也容不下我的部下如此胆小，竟然全逃离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在闹，竟敢这么大胆的闹到我的面前来了。我头也不回，气冲冲地继续向前走。可是这些女队员却死活拉住我不放，说太危险了，他们指名要抓你呢！

指名要抓我？好哇！这话反倒更激怒了我，我傲慢地说："看谁敢来抓我这堂堂组织部长。"我拨开她们，怒发冲冠地继续向前走去。我的言语，我的行动增加了她们的勇气，她们中胆大些的就紧随我，胆小些的落后几步也一起返身向总部走去。

在离总部几十公尺的地方，有人在现场刷写张贴大幅标语：

"×××（当天的日期）行动是革命行动!"（好得很！你们自封革命行动。）

"把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费敏璋揪出来示众!"（好！这句标语倒有份量。）

"砸烂红工司常委王继鑫殷庆宝……的狗头!"（其中当然也有我的狗头。）

这些标语已经书写得只剩几个字就可完毕了。我把贴标语的人往边上一拨拉，伸手就撕，刚贴上去的纸，浆糊还没有干，整张整张被揭了下来。在我的身后，一名女队员小声对我说："啊呀！标语是不能撕的呀!"

我气吼吼地说："反革命标语就是要撕!"刷写张贴标语的人一时惊呆了。乘这当口，我一不做二不休，以极快的动作，把所有的标语全撕下来。他们这才回过神涌上来，把我围住。有人大声说："撕标语是反革命行为。"有人大叫："抓住她!"对方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他就是组织部长×××。"

我身后的女队员小声地对我说："他们已经认出了你，你还是马上转移吧!"女将们很有趣，在这紧要关头也没忘记用词的褒贬，把"逃跑"说成"转移"（转移一词是我们的革命

电影中对处于劣势中的“好人”常用的词，比直呼逃跑要好听多了)。我是四十万红色工人的组织部长，我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吗？这不合我的个性。我干脆往人堆中一站，大声说：“我就是常委组织部长×××。”

我想，我当时的姿态一定是大义凛然的，因为围住我的人都被镇住了，他们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这倒更使我大胆地向他们进攻了：“你们今天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

我这句不讲策略的话，引起对方一阵骚动，马上招来了回击：“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撕革命的标语就是反革命!”“我们是来抓反革命政治扒手，常委都是政治扒手!”

说归说，但没有人敢冲上来抓我。

我毫无顾忌地说：“标语是我撕的！你们上来抓呀!”

没有一个人上来。

我发觉他们不时紧张地向华山路方向张望。我明白，他们虽然砸了总部，刷了标语，但内心仍很虚弱，他们害怕我调人，怕我的身后会有大批人马冲来。我更大胆了，我乘机说下去：“你们不要上一小撮坏头头的当，不要被他们个人野心利用，他们是一小撮坏头头，他们为什么被开除出总部你们知道吗？这些历史政治面貌不清的人在操纵着你们，你们要反戈一击呀!”

这时，逃离总部的工作人员，开始陆续向我聚拢。我一看是时候了，我大踏步向总部大门走去，非但没有人敢于阻拦我，反而闪开了一条道。我旁若无人地走进总部，对那些被裹胁来的人，不屑一顾，直上我的三楼办公室，我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随着我进来。很快，逃散的人差不多都回来了，不多时便恢复了平静。

大队部有人向我汇报，来砸总部的人已经全部退出。

少倾，后勤部的李衍清夹着帐册也回总部了。他向我报告，当总部一受到冲击，他马上包起帐本离开总部。他在华山路上转悠，观察动静，眼看着我穿过华山路，便远远尾随着我。看到砸总部的人撤走了，他就回来了。他再三申明这是为了保护帐册的安全，意思是并不是胆小而逃跑。

我对他的高度责任心表示了敬意，安抚了一番。我要各部检查一下，损失了什么。大家说没有什么损失。我问：“其他的常委呢？”大家都说下午没有看到过他们。

总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一个头头的情况下，遭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作鸟兽散，这真应了一句“群龙无首，不堪一击”。我从铁路北站回来，来得还算及时，现在军心已经稳定，恢复了正常的秩序。想想刚才的情景，对方的头面人物也没有敢在现场指挥，不知躲藏在哪里，这些被蒙骗来冲在前面的群众，被我声色俱厉吓退了。果然是“两军相遇，勇者胜!”

大队部有人来报告，说退出去的人集结在华山路上还没有走，蒋瑞根、林新中已经露面，在人群中活动。我告诉大家各就各位，不必害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有人进言，调人来保卫总部，也有人建议我，派人去把那两人抓来，我都拒绝了，因为我不想把事态扩大，搞得复杂化了。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有什么事由我来顶。”我镇定的态度影响了大家。

正在这时毛胡子风风火火地进来，他是刚得到消息赶来的，随后来的还有邮电的大老李，大老李说，他已经调好了人，请求我下命令开过来。

我说：“既然已经调好队伍，那就在你汾阳路等待吧！暂时不要开过来。有你们这几员大将就足够了。”

用首都三司压反叛

又过了几分钟，大队部朱力军来报，蒋瑞根带着人重又“杀”回来了，现在下面要求见我。我一听，就说明他已经不敢乱来，只是要“见我”，而且也说明我们总部的战斗力已经恢复了，他自己已经走不到楼上来。我一面说好呀！放他上来。一面立即布置毛胡子，要他马上去愚园路总部，把随我来沪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请来。

在这几天时间内，这些红卫兵按毛主席早年的革命方法，开展了调查研究，他们已经对我们组织的造反进程有一定的了解，对我们组织的现状可说是了如指掌，让他们出来说话，一定比我更有说服力。我要依靠这些红卫兵，运用首都三司的威望，瓦解这些反叛分子，消除内患。

不一会，在我的三楼组织部办公室内挤满了人。我在南面我办公桌旁端坐，蒋瑞根出现在我的面前，但他只敢萎缩在门边。这人四十开外的年纪，皮肤黝黑，脸庞精瘦。外貌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一副猥琐小人相。他身穿一套有铜纽扣的比他身材更为削瘦的陈旧的

呢制服，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受。

他的口才粗听也不错，一口宁波上海话，滔滔不绝。听得时间长了，才发觉他常犯逻辑错误，把不同的要领混淆起来（倒不是他有意偷换概念，而是他没有这个本领），把概念搞得模糊一片，所以他的长篇大论成了信口雌黄。

可以看出这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完全靠个人的小聪明，一知半解，生搬硬套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革命词藻，“扯着大旗吓人。这样的一个人，殷庆宝竟然选来作为宣传部的人员写文章，真正可笑。唉！有文才的姚红一批人却被殷庆宝假我之手赶走了，这个不学无术的混蛋部长！

老实说，蒋瑞根，林新中讲不出我的什么罪状，对我还是很客气的。他们耿耿于怀的是昔日他们顶头上司殷庆宝，还有就是常委中的二、三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和费敏璋的拒绝签名，他的发言就集中这些“罪状”上。

我让他们自由发言，不去打断他罗罗嗦嗦的话，因为我需要时间，我在等待红卫兵小将们的到来。而我的同僚——其他的常委们呢？这些胆小如鼠的东西，一个也不见，不知躲在哪里。他们也许在别处看我，袖手旁观。如果我失败，就看了我的好戏，成功了，这是大家的胜利。

时间不长，红卫兵小将来到了。这很出乎蒋瑞根的意外，但是他立即表示了欢迎，双方都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红卫兵的到来，因为他们是首都三司的，是红遍全国响当当的左派，人们对这组织及其成员都刮目相看，希望他们一个公正的裁判，评定大是大非。双方都希望红卫兵支持自己。

蒋瑞根重新讲了他那似是而非的论调，摆出常委们条条罪状。但他的混乱逻辑，导致了他的失败。他的荒谬逻辑三段论是：凡常委们所做的都是错误的，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打倒，所以常委们就必须打倒。另一个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这人处处标榜他是为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说话，他认为，因为有了错误的常委，所以常委们不可能为广大的临时工的利益说话。而他是正确的化身，只有他才能维护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但他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既然要说费敏璋不在《紧急通告》上签字是错误的，就不能标榜自己是临时工、外包工利益的代表。因为恰恰是费迂腐地坚持临时工、外包工的利益才不签字，才使我们组织成了被排除在三十二个组织之外的“经济主义”组织，现在你蒋瑞根又要代表这一特定阶层的经济利益说话，不是又要脱离“一月革命”的形势，违背中央肯定的《紧急通告》，成了“经济主义”的维护者了吗？这说明他对《紧急通告》的意义和影响一无所知，否则就不会如此信口雌黄。

他竟然又指责我们参加工总司发动的色织廿四厂事件，动员了十万人脱离生产岗位，破

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听了非常吃惊，他竟蠢得如此啊！

果然，他立刻遭到了红卫兵小将的批驳。小将们的政治敏感比这些人强多了，那个带队的小将马上站起来，以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肯定色织廿四厂事件的大方向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造上海市委的反。至于行动的浩大，造成大量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浩浩荡荡地起来了，这样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方向完全正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路线斗争的需要。"

小将铿锵有力的发言，把蒋瑞根的一点气焰压了下去。蒋瑞根气急败坏地把矛头针对 1 月 5 日大会以后，在愚园路总部殷庆宝操办的那次同宋日昌吃晚饭的事，他夸大其词地说那天我们用公款大吃大喝，喝的是高级酒，还与走资派宋日昌碰坏，喝的是四十多元一斤的高级茶叶。

好吧！既然你说了四十多元钱一斤的高级茶叶，我就先抓住这一点进行反驳。我说，"这四十元一斤的茶叶，在上海根本没有，请你现在替我买一斤来看看。（当时文革中确实没有这么贵的茶，至少在我们能走进去的商店中没有）。"这天连酒、菜、生煎馒头一共化去了四十多元。由于忠于职守的会计李衍清的抵制，不给我们报销，便由王继鑫提议，由我和王、殷、费每人拿出十元钱来，尾数再由殷承担，了却了这笔费用，为了这十元钱，我着实心痛了一阵子。我对王继鑫说，我那次吃了几角钱的生煎馒头和茶，付了十元钱，却要跟着背黑锅，算什么名堂。

能反驳的，我尽量据理反驳，这样就陷入了琐碎的事实争论中，在这无休止的唇枪舌剑中，我只是做了些澄清事实的工作，未必能压倒对方。有份量话，结论性的话，还是留给红卫兵小将们说好，由他们来说比我说效果好得多，所以在争论每一件事后，最后总有红卫兵重重地发一通话，结束争论。最后，蒋瑞根再也没有炮弹可发了，那个带队的红卫兵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红工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也是难免的。

我用了首都三司的威望，很快把这次反叛压了下去。

没有和小将再约相见

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在我们总部的活动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一、二个星期。他们到了上海后，人数不断地减少，有的去了他们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有的我不知去了哪里。（他们随我来上海，是得到他们总部同意的，到了上海后，马上又与他们的驻沪联络站取得联系，完全接受联络站的调派，组织观念非常强。）

有天晚上，那位带队的红卫兵来找我，说接到了他母亲病重的电报，要马上回南京去探望，特来向我告别，并心急如焚地要我设法送他走。那时火车票很紧张，想要随买随走是办不到的。我马上打电话要铁路总部想办法，他们告诉我在半小时后有一列去南京的火车，我就请他们派人在民德路红房子接我。我要了辆车，亲自送他进站上车。

这位小将挤上了马上要开的火车，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再次感谢我的帮助，我们的手紧紧相握。我感谢他的帮助，神色黯然地与他互道珍重。

他难过地说："我没有为你们做些什么……"下面他好像还有话要说，但咽了回去，似有难言之隐。我感受到这些红卫兵小将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倾听了我们的讲述之后，都表示出对临时工的真诚同情。这位红卫兵头头，是位很成熟的大学生，他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已经深深理解我们的遭遇。我们再次紧紧握手，从相握的手中相互之间感受到对方的真诚。列车开动了，我随着开动的列车跑了几步，挥手告别。

我们没有相约再见，我没有说请他再来上海；他也没有说会再来上海，我们相通的心，已经明白，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一种预感，一种直觉让我明白，我们的路已经走到尽头。而他可能比我更清楚，因为，手眼通天的首都三司的报纸已经不再刊登支持临时工的文章。

毛主席在纠正江青的眼泪了。

这页历史之谜还没有被揭开：是不是全红总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激怒了毛泽东？

小将们离开了我们。我设想的让首都三司红卫兵来拯救我们的组织，推出一个崭新的红工司的美梦消失了。

两次对乌鲁木齐路总部的"打、砸、抢"失败后，后来又发生过第三次的行动。反对派大约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把目标指向了不对外公开的愚园路总部。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革中出现的名词"打、砸、抢"，用在我们反对派的三次事件中是不确切的。我们的红工队员受到社会长期的道德规范的熏陶，还是比较规矩的，"打、砸"两种行为并没有发生！只是在第一次的 1•13 事件中抢去了一些宣传工具和车辆。这三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夺常委们的权，被反对派裹胁而来的群众，在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下，没有发生其它组织中的真正"打、砸、抢"行为。只不过那时内部造反的夺权斗争，或组织之间的

斗争中发生的冲突事件，夺权一方惯用“砸烂”和“踏平”，被夺权的一方就说对方“打、砸、抢”了。

愚园路总部被冲平时，我不常去愚园路总部，只有在约定去召开常委会时，我才去那里。那天当我接到报告，愚园路总部被反对派群众占领后，我匆匆赶去。

这是第三次“砸”总部了，我已经没有一点亢奋紧张的心理了。

我看见那些被裹胁而来的群众占领了空空的洋房，房内挤不下的人就在外面的花园草坪上，或坐或立，好像在平静地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在冬日暖和的阳光下，其乐融融，闻不到什么火药味儿。

有人告诉我，王继鑫正在楼上与他们的头头在谈判，我听了不想去参加，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在上面，我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次内乱。我徜徉在人群之中，有些人用友善的态度同我交谈，我就顺势利导进行解释工作，澄清外面流传的一些说法，把我们组织同工总司相比，苦口婆心地说明我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我们组织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我以平等的态度、平和的口气，像朋友之间谈天那样，诚恳地向群众讲清楚。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人们对我们常委的工作开始理解，尤其是反响最大的费敏璋拒绝签字的事，经过我把事件的原原本本向群众讲清之后，人们也表示了理解和原谅。

就这样，群众不断提出问题，我不断解答。当群众知道事实真象，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对立情绪消失了。我趁热打铁，指出今天的行动只能使仇者快，亲者痛，这是广大红色工人所不愿看到的，说到这里人们不断点头称是。几十分钟后，效果出来了——被裹胁的人们三五成群慢慢散去，草坪上的人群越来越少，楼里的人也逐渐散去。最后反叛的头目自感形孤影单、大势已去，也只得灰溜溜地走了。第三次“政变”遂烟消云散。从这以后我得出一条经验，对这些反对派不必去理他们，他们反不了我们正统的地位，成不了气候，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另立山头吗？

反对派的三次行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以南市、卢湾两个分部为首的反对派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以我们总部常委有错误——罪状——为号召，不断联络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召开各种会议，一直妄图夺取总部的权力。那时上海的各种造反组织中，一些野心十足的人，在运动早期没有挤进权力圈，到现在造反已成定局，他们也要分享权力，尝尝当头头的滋味，于是不断爆发内部造反事件，从中派生出名目繁多的组织，“山头”林立，自立为王。蒋瑞根之流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滋生出来的一群人，他们之所以策划来策划去，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群众，我们的红工群众，不愿看到分裂，反对他们的夺权活动。这可以从我所经历的两次平息反叛活动中得到证明。

尽管他们三次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活动，始终是一个麻烦，对总部来说总是一股压力。再加上外界对我们组织的看法，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压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同时，我也清醒地看到，我们常委班子确实有不少问题存在，费敏璋的错误，是众矢之的；常委中的男女关系问题，是腐败的体现；钱桂芳是个草包，他在夺《支部生活》杂志的权中，闹了天大的笑话；骆江华本来无所作为，现在只知沉缅于一个漂亮的女司机，深夜在静寂的马路子，跟女司机学开小轿车。这些常委实际上名存实亡，已经不再参与什么革命造反工作，不再干些什么实事了，只剩下我和殷庆宝（殷还算是在干事的）。

面对这样的烂摊子，面对这样的一群男女，我既气愤，又感到前途暗淡，我们的事业要坏在他们的手上。

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只有摒弃这些人，成立一个新生的总部，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想，还是自己另拉一个新的组织，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以我的影响和威望，完全可以做到。

我把这个设想天真地同殷庆宝商量，要他把老的班子撑下去，我们明里是分开来，是两个组织，暗里我同他决不分离。他沉思良久，表示坚决不答应我这么做。我也不坚持，轻松地说：那就算了。我这人太讲情义，我不是一个政客，不是铁腕人物，我下不了这个手，我不能把曾同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从总部赶出去，即便我是为了这个组织的前途和未来，即便他们确实已经不配当常委，即便凭我的威望和能力可以做到另建总部。

过了一段时期，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尤其是我们又没有能挤进上海新生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大联合中。殷庆宝郑重其事地找我。同意我的设想，他说他从财力人力各方面给我方便，要我另拉大旗。

我感慨万千地对他说：“时机已经失去了。再另立山头的外部形势的条件已经丧失了。再说我已经对政治，对造反已经厌倦至极，不想再干了，连这原来的组织部长也不想干了，我已经没有雄心去拉新的组织，这种愚弄群众，欺骗自己的蠢事，我已经看穿了，厌倦了。”

在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制历史的国家，一个组织的领导层的更新一直是个大问题，即使是在文革的极端大民主中脱胎而出的造反组织，也无一例外地钻入了封建的巢臼。一开始，造反组织的头头的产生还有点“时势造英雄”的味儿，是自然涌现出的工人领袖，但是，这些组织不可能建立领导层更新的制度化的民主制度，使得下面无法重新涌现优秀人物来替代陈旧的或丧失斗志的或腐败的领袖，于是，组织的活力减退，发生“脑死亡”，随之慢慢瘫痪。我虽然想到了应当更新总部成员，但我也只能想到用一种非常的办法而绝非是保持组织活力所必须的正常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要说我不会按自己曾经想过的办法去做，就算做了，

它的结果也只会类似残酷的“政变”，也许要留下更多的遗恨。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人物

一个“中央文革来的人”

六七年一月下旬，上海号称四十万人的红工司，已经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就在我们内外交困，一筹莫展，无路可走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给无所作为的常委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陆进雪，我们称他为毛胡子，是跟随我的摩托车手，他住在长宁区，所以他同长宁分部的头头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一月下旬，他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人通过长宁区分部，在了解我们红工的情况，这人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

“是他自己说的。”

我笑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毛胡子极力说服我，要我相信。我还是明显表露我的怀疑和不感兴趣。

他马上转而向殷庆宝和王继鑫游说，不料一拍即合，他们马上把那个人奉若神明，与他见面，高兴得无异迎来了一尊救命菩萨。

他们是如何碰面的，我不得而知。隔了一天通知我在淮海路622弄市党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中开常委会。我匆匆赶去。看来他们已经在那里长谈了半天。我这时才见到了这个神秘人物。

这人四十来岁，皮肤微黑，相貌堂堂，天庭饱满，方面大耳，笑口一开微露一对大门牙，

他口齿清晰，口才极好，他自称是吃开口饭的。

“吃开口饭的”是什么意思？是暗示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吗？常识告诉我，自称是“吃开口饭的”，就是称自己是演员。江湖上“吃开口饭的”是指说唱演员、街头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如果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必然是国家干部，国家干部是不会自称“吃开口饭”的，而应当称自己是搞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工会工作、党务工作、行政工作、教育工作、科研工作、技术工作等等，所以我的直觉始终把这个自称“吃开口饭的”伶牙俐齿，善于表演的“中央文革派来的人”与说唱演员、卖梨膏糖的江湖艺人划上等号。这个莫明其妙的直觉一直左右着我，我的直觉始终指挥着我同他的关系。

顺便要提及的是，这人自始至终没有直接来过总部，自他出现后，一直秘密地出现在总部之外的几个地方：淮海路的一间公寓，或衡山路 1 号，还有后来虹桥路的一座花园别墅。这几个地方都是毛胡子他们搞来的。我不知这类似狡兔三窟的做法是不是出自这个神秘人物的主意或策划，反正他的出现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中。

当我踏进那间陌生的公寓房时，那个神秘的人马上从沙发中站起来，伸出热情的大手与我相握。我与这人接触的第一眼。就一直抱着怀疑、谨慎的态度，同殷、王等人的态度极不谐调。

他站在我的前面，吐字清楚，抑扬顿挫，一招一式极力做出一个大干部的姿态，我隐隐觉得他像在演戏。

我请问他的尊姓大名。他自我介绍：“木易杨，杨解泉，解放军的解，泉水的泉。”

我还没有听清：“什么泉？”

“山泉，泉水的泉。”

“噢!”我若有所悟的样子。说实话，他自我介绍时，笑容自然，太潇洒了。他反客为主，把手一让：“请坐啊!”随后他仰身一坐问：“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组织部长罗!”向两边的殷、王投去洒脱的肯定兼询问的笑容。

殷马上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上，笑容满面地说：“年青有为的组织部长×××，一月五日人民广场大会的组织者，在铁路上蹲点，抓了 14 次列车，就是报上的红色列车在前进……”

我不惯人家当面捧场，马上打断："这是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群众自己起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杨（现在可以称他为"杨"了）马上接过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上海有一个红工组织，在全国铁路上有一定影响。他老人家……"

杨开口"老人家"闭口"老人家"，确实与众不同。给你一种感觉，他是从主席身边来的人，而且又给你一种感觉，他与我们的距离很近、很亲。这一段开场白完全征服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轻轻的语调，使人静心屏气地集中思想听他的讲话。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了一些小道新闻，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外面的小道新闻，对我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每天对报纸看得也很粗（我敢断定有人连报也不看），对外界的联系，上海造反派的动向和活动，乃至全国的动态，更是知之甚少，所以，猛然间听到他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一些小道新闻），当然崇拜得五体投地，听得几乎入迷。他每讲一段总要使用大干部讲话时的口头语："是这样吧！"不时向殷、费、王征询，这几个人马上点头称是。而每当他用这四个字对着我问的时候，我却不愿不懂装懂地去奉迎。我睁着有时迷惘、有时审慎的眼睛，逼视着他。所以，后来他干脆不再搭理我。再到了后来，他的语音越来越轻，只在他们之间交谈。大概已觉察到我的怀疑。

我坐得离他稍远，时间久了，对他的话已不感兴趣，我就研究起他的衣着打扮：他身穿中式对襟棉袄，外罩一件有点泛白的蓝布对襟罩衫，下穿咖啡色的花呢裤子，衣裤已经显得陈旧，但洗得非常干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灯芯绒棉鞋，头发向后梳理。这是一身道地的上海市民的装束，极为普普通通的上海人，生活在这一水准的，是上海普通工人家庭。他操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思路敏捷。——这一切再简单不过了，他是道地的上海人，不可能是北京来的。在香烟缭绕的烟雾中，我心中一个大大的问号升了起来，我最先的直觉是：他是一个演员，走江湖卖梨膏糖的"小热昏"。我看着我们的常委们对他趋之若鹜、口口声声地"老杨"、"老杨"，奉之若神明，我的心有些痛。

聪明人这时应该保持沉默，冷静地观察。可我偏偏不是一个聪明人。我找准一个机会，开口插话，以笨拙的问话向老杨扔去："听说，老杨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我们上海红工情况的？"

我的问话是那样率直，那样令人吃惊，引得众人怔怔地望着他，也望着我。那位老杨听了我的问话，没有立即回答，微笑着、缓缓地、故作姿态地说："不！不不！我是来向大家学习来的，向你们这些敢冲敢闯的老造反学习来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红工情况非常关心，要了解上海红工的情况。"

好一个老杨！他用了当时大首长经常说的“向群众学习”之类自谦性的话来回答我，比方江青就常说“向小将们学习”，陈伯达也自称是“小小老百姓”。杨在此时用这句话，就变成模棱两可的回答。你可以理解成他不是中央文革派来了解情况的，因为他说是来“向老造反学习”的，但是你更容易理解为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他不是又抬出“老人家”了么？在那个时代，上级首长对下面说来“学习”就是“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下达指导”、“布置任务”的代名词。好一个能说会道的老杨。

我不去管他，也不去管大家是如何想，继续说下去：“你既然是来了解情况的，我就谈一些情况吧！”我把外界对我们组织的误解和我们所作的事，包括铁路上的事实，证明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主义的组织，我请他发表看法。我的一番话冲淡了、或者说是打破了当时由他夸夸其谈的气氛，变成了逼他表态。

他对我不客气的问话，似乎有些不高兴，推说：“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以后再谈吧！”他用不愉快的语调说“以后再谈”，隐隐地露出一种威吓，一种可能离开我们，不再接触的暗示。

殷、王、郭的脸上立刻流露出对我的不满，唯恐我的不敬得罪了他，马上以谦恭的语句挽回我的冲撞，请他不要离开我们，请他参加我们常委班子的工作，进行指导。

几个人恳请了一番后，老杨才故作姿态地说：“谈不上指导，大家相互学习，紧跟毛主席老人家的战略步署嘛！”又说：“我只有几天的时间可以同大家在一起。”殷、王高兴得与他握起手来。

时间是晚了点，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独自离开了他们。这次碰面就这样结束了。

显然，费、殷、王、郭对于杨的真面目，不想去猜疑。好比一个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病人，遇到一个自吹自擂的江湖郎中，当然宁信其真，不信其伪。

我曾私下直率地同殷庆宝谈起我对杨解泉的怀疑，指出对他的来历不明，我们要当心，至少他绝不可能是什么中央文革派来的。殷庆宝听了我的话，笑哈哈地说：“让事实来证明吧！”我听了很不高兴，刚要反驳说上几句，他收起笑脸，正色说：“我看他是有来头的，你嘛——嫩了！”他以轻蔑的态度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只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由于我的态度，以后他们同杨的接触就不再通知我参加。我的组织部工作本来就很忙，我不像他们可以无所事事，所以，我也懒得去打听他们的行踪。不通知我参加会面么？谢天谢地！

真的要谢天谢地，由于他们有意避开我，使我日后少了不少麻烦，甚至免去了牢狱之苦。

那段时间，陆进雪（毛胡子）与他的朋友（也是大队部的）对常委的行动特别关心，跟得比任何时候紧，他们几乎整天与费、殷、王、郭、杨在一起。有什么事反倒由他们来通知我。这段时间，常委班子已经没有什么作为，除了我在总部主持日常的工作外，他们都迷恋地围着这位“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转。他们远离总部，在其它的秘密地点开会，我对他们的活动毫无所知，也不去理会，他们搞他们的，我做我的。

炮打张春桥

辨别杨解泉真伪的机会来了，一月二十七日，毛胡子通知我说，殷、王已经与老杨决定，转移到虹桥路去商量大事。

我疑惑不解，为什么要到远离市区的虹桥路去？

我们在市区的秘密地点已经不算少了，这虹桥路的地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问：“这房子是谁搞来的？”毛胡子得意地说是他搞来的。他要我立即跟他去，说殷、费、王、郭、杨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薄暮时分，我们向虹桥路的秘密地点驶去。那里离西郊公园（动物园）不远，公交车辆稀少，只有 57 路可以到达。由于文革的需要，上海所有的公园已经关闭，上海最大的西郊公园也不例外。没有了游人的西郊，57 路就特别稀少，等一辆车要等半小时还不止。

殷、王他们为了绝对保密，特地没有动用任何车辆，他们都是乘 57 路公交车去的。穿梭来往市区联络的只有毛胡子他们两人。这里没有电话，要走到虹桥路上的一家小杂货店的公用电话才能与外界联络，极不方便。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这远离市区的偏僻地方来呢？是不是杨的主意？或者是殷、王有什么预谋？我不知道。

在虹桥路上，摩托车向左拐弯，转入一条小马路，一座花园别墅出现在我的面前。别墅四周是农田，农舍远远的散布在四周，淡淡的轻露在林木和菜地上漂浮。啊！好一座远离喧嚣尘世的世外桃源。车进大门，修剪良好的草坪、树木，表明这里有人在管理。一幢不知是欧洲哪种式样的洋房，洞开着窗户大门，没有人居住。内部的家具已经搬离一空，看来这“世

外桃源”的地方也没有逃过文革的洗劫。据看管这幢房子的人说：他是洋房主人留下来看管房屋的，主人家在 49 年去了台湾，是一个大资本家，内部的财物已经被红卫兵抄尽，家具也全部没有了。我知道，红卫兵抄家是不会把笨重的家具抄走的，怎么会连一只坐椅也没有呢？第二天，百无聊赖时，随郭文美去周围农户走了一遭，噢，明白了！这些家具都被附近的农户乘机搬走了，沙发，不成套的单件红木家具不伦不类地摆设在农民简陋的房屋中，与他们低下的水活水平和原有的破桌旧椅很不谐调地混放在一起。当我这不速之客闯进他们的家门，浏览起这些东西时，农民们显出局促不安，用审慎小心的态度来同我们周旋。郭文美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想上门向他们换一些大米。而农民则唯恐我们是来查办的。当我们说明来意，要用粮票和钱向他们换一些大米时，一位老妈妈马上慷慨地送给我们市区人吃不到的新大米，连粮票也不肯收。

我们饿了，就借来锅碗，在客厅的壁炉内燃起火来煮饭，后来木柴不够了，又把窗户拆下来投进了壁炉。（唉！真是一场空前的破坏呀！）我们用酱菜就饭，吞咽着大米白饭。记得从昨天傍晚来到这里，我还没有喝到过一滴水，用干巴巴的嘴，吞咽大米饭，还真有点困难，我草草吃了一碗就放下了。看着这被破坏得只剩四壁空壳的洋房，再看看我们的狼狈样子，很像是在逃避追捕的强盗。真是莫明其妙，我们干吗要受这份罪？

第一天晚上，我们无谓地空谈了一夜，借来几张座椅轮流坐，后来干脆席地而坐。我对众人对杨解泉的奉承已经木然，而对杨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更不感兴趣，我越来越不明白，究竟有什么重要大事要到这里来商讨，搞得如此神秘。到了下半夜，我像个囚犯似的坐在地上打起瞌睡，后来，众人也瞌睡了，停止了毫无意义的“会议”。

第二天清晨在花园中散步，很是赏心悦目，但是一进入那空旷的客厅，面对面坐在地上，一缕愁绪又袭上心头，我们是来干什么呢？是商讨组织的前途，如何走出困境么？似乎应该是这样，但实际又不是这样。我越来越不明白，策划这场闹剧的人是谁？为什么要把杨解泉拉进来？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为杨解泉而安排的？问他们又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愁肠百结，惦记着总部的工作。我想离开，他们又说这是常委集体行动，所以要远离所有的人，秘密工作一段时间，谁也不能离开。真是活见鬼了！

上午我在虹桥路上转悠，在附近的农田小道中徜徉，想把心静下来，然而怎么也静不下来。下午开会时，我的情绪越来越焦躁，对这不解决实质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议题的会议简直是厌烦透了。

一个下午就快过去了。突然陆进雪他们两人骑着摩托车从市区回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我们冲来。他们神色紧张，连说出了大事了！我一下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很高兴他们的到来，打破这令人生厌的气氛，我不以为然地抬起头，想听听他们带来了什么新闻。

“炮打张春桥！”一声惊雷！

什么？炮打张春桥？太突然了，不可能！我们全睁大双眼，惊奇地盯着他俩。陆进雪以

郑重的声调说，闹市区已经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幅标语，他亲眼看见红革会的小将在张贴炮打张春桥、张春桥是叛徒的标语。

太不可思议了！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安亭事件中代表中央处理的全权代表，毫无异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张春桥是叛徒？这不可能！而上海的“红革会”是学生运动中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人数最多，声势最大。“解放日报事件”是红革会首先发难，最后被中央肯定，引起了“一月风暴”，夺上海市委的权。红革会中有不少高干子女，同北京联系甚密，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炮打张春桥。工总司是全市最大的工人组织，是毛主席肯定的造反组织，而工总司的靠山不就是张春桥吗？如果张春桥是叛徒，毛主席能肯定工总司吗？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推理，刹那间在我头脑中运行、冲突，真是说不清、理还乱，太让人震惊了！

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是郭文美，他表示消息来源可疑。陆进雪以坚定的语调说在淮海路、南京路的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什么样的标语，他骑摩托车兜了一个大圈子看到大量标语才来报信的。

大量标语的出现，说明的确成了炮打的气势了。这太重大了，我马上奔到虹桥路上去打公用电话，我同杨福海通了电话，证实确有其事。杨福海焦急地询问我们常委在哪里，要我们马上作出反应。我要他们晚上派人值班，等候命令。我搁下电话，跑回别墅，告诉大家炮打已经是千真万确，我们赶快回市区吧！晚了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大家说马上讨论后回市区。

讨论？我们从何讨论呢？我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对这次重大的事件内幕一无所知。支持红革会么？太冒险了。支持得对，可以一下子红遍上海乃至全国，但如果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呢？那就成了反革命啊！天堂与地狱仅一步之遥。

怎么办呢？我们一筹莫展。这时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杨解泉的身上。他不是在长宁分部以中央文革的身份突然出现的吗？他不是暗示我们他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么！

但是，他现在同我们一样，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也不敢轻易表态，不置可否，反问我们对此如何看法。

大家不敢轻易表态。说实话，有他在场我们更不好乱表态，大家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我呢？反倒幸灾乐祸，冷冷地在旁观察起来，老天保佑，总算有了一个辨别真伪的试金石，看看你杨解泉是什么角色。

我把这想法轻轻告诉了殷庆宝，他到这时似乎也醒了，狡猾地笑起来，轻轻地对我说：

“逼他表态！是真是假看他表演了。”我们两人会心地相视而笑。于是，我们两人对杨一吹一捧，逼他表态，看他表演。

他一定感觉出我和殷的话中有“居心不良”的成份，但是他没有办法，耐着性子保持沉默，站起来，焦燥地抽烟，来回踱步。看得出来，他是在努力保持镇静，使自己不至露出马脚来。但是，他不时朝天花板干望的眼神，和太阳穴旁突突跳动的青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根本不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人。是的，他非但对这突然的事件不敢表态，而且也不敢表态说，过几个小时，待他与中央联系之后给我们一个准确回答。

时间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已经半夜了，没有了公交车，这么多人回市区已经不可能，离天亮还早着呢，就这么熬下去吧！

大约是下半夜了吧，总算沉得住气的杨解泉从他喷吐的烟雾中醒来，发表了深思熟虑后的“高见”，我们这些人静心屏气聆听。只见他抑扬顿挫地说：“工总司是毛主席老人家已经肯定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从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到一月革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红工司与工总司是怎样的关系呢？”他用眼光扫视大家。但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因为大家迫切需要知道的，是这次“炮打”行动究竟是对是错。不过，我从他避开正面回答的话中，感到他也许要作一个滑头的表态。好吧！我就给你一个台阶，看你下来之后怎么表演，于是我说：“我们两家的关系是工人兄弟的关系，我们一直是支持工总司的，这可以从色织廿四厂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来证明，我们从成立开始，就一直由费敏璋同工总司保持联络，紧跟王洪文的工总司。”

他点头称是；“好！那么在目前炮打事件中同工总司的关系应该怎样呢？”他又一次的反问大家。

我们这些人一致的意见当然是肯定的：我们是上海两大工人组织，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兄弟组织的关系。

他说：“好！我们可以灵活地表态，用不着去直接对炮打表态，我们只要跟着工总司走就可以了。”他又环视一下，狡黠地笑道：“我们就拟定这样的口号来表态——红工司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这只狡猾的狐狸，总算让他想出了一条我们组织表态的口号，从而避开了自己表态的尴尬。也好，这句口号本身是不错的，于是郭文美把口号记录下来。杨解泉摆脱了沉默和冥思苦想，得意地指挥起来，他说：“这口号也是我们的行动纲领。”他要费敏璋立即赶去工总司探听工总司的态度，打听事态的发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并向王洪文表示我们的态度。他又转向我：“请组织部长运用你的能量，发动全市的红工力量，把我们刚才拟定的口号用最快的速度刷向社会，要挑最闹的市区，最醒目的地方，刷上特大的标语，扩大红工司的影响。”

我对殷看了一眼，表示完全可以做到。

说实话，这句滑头的口号，是很得体的表态，能进能退。我们偏重于张春桥不会被轰下台，他不下台的话，我们没有错。如果他被炮打下台，只要工总司不倒，我们也站得住脚。杨不愧是一个“军师”，但他充其量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没有什么高深的后台。

（从此我与杨解泉没有再见过面，但其他常委却仍然同他混在一起，保持着联系，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二月份的某一天，殷庆宝通知我去复兴公园门口的洁而精饭店去吃午饭，说有杨解泉相约，我意外没有去成，那天他们谈些什么，我也没有问。有次在闲谈中殷庆宝告诉我，杨对我作了如此的评价：“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叛徒。”这大概是他对我的不满和挑唆之言吧！）

我想去探虚实

转眼之间，天已经很亮了，大家对这两夜一天的生活也过怕了，决定马上回市区总部去，我先骑上陆进雪的摩托车离开。一进入市区，马上被严峻的“炮打”形势镇住了，马路两旁炮打张春桥的标语比比皆是，其声势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行动。强大的红革会充满火药味的炮弹，又把上海人轰糊涂了，原先中央的领导人一个个被靠边，被打倒。中央文革原先的组长陶铸被打倒，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现在中央文革中的大红人张春桥又被炮轰，瞬息万变的形势令人吃不透，又令人震惊。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共产党几十年没有发现，而现在却被一帮红卫兵发现了？这里面有没有背景：中央有什么人支持？如果没有，或者炮打错了，这可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反革命啊！这令人发昏的时代！旋转不定的文化大革命，这令人吃不透的突发事件，让人眩晕，让人迷惑。

不过，我发现在这炮打的大标语中，只有红革会一家“独领风骚”，上海的其它组织都缄默不语，大概他们也在窥测动态，不敢急于表态吧！我努力搜寻工总司的标语。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红革会发难，工总司支持，两家最后联手把解放日报事件搞得震动全市全国。今天在炮打事件中工总司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找不到工总司的标语。

工总司为何还不表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念头突然在我的脑中出现：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去和红革会联系呢？至少可以去探探虚实，摸一些情况，在上海众家组织因为吃不透情况而不敢表态时，如果我们红工司能了

解到内幕，第一个出来表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红工司翻身的时机到了。

我直接去找红革会？风险太大了！如果红革会打错了，我等于是去同反革命联络。假如我冒险去同红革会联络，也假如人家看得起我，能透底给我，那么我们响应了，仍然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一鸣惊人，出人头地；要么打入地狱，不得翻身。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就是投机，我有这个投机的资格么？

从事过境迁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要打倒某一个要人，不在于他有什么过错或历史问题？全凭他老人家的好恶，要打倒只要罗织罪名就可以，要树起来也只要一句话："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重新启用邓小平时的话）就行了。张春桥虽然是个中央大员，如果打倒，何患没有罪名？如果需要张春桥，何患他历史上叛徒之嫌！实际上他是不是叛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人家的态度。

看来，我没必要到红革会去！

我在想入非非中回到总部。在三楼，我的工作人员迎上来，杨福海焦急地问常委对炮打作出什么反应，有什么确切的内部消息吗？我把决定告诉了他，他听了问杨解泉的反应和意见是怎样的，我苦笑道，这些都是杨解泉的主意，这些口号都是他亲自拟定的。杨福海点点头："好！这样表态好。"一面露出笑容。我要他马上以最快速度向各分部、总队传达常委的决定，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一定人数上街刷大幅标语，尤其是市中心的几个区，必须在闹市地段尽快刷出："红工司与工总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主的的大标语。并且尽可能发动基层上街刷标语，以最迅速的行动，造成红工司最大的一次宣传运动，表明我们的态度。

——什么态度？鬼知道！只是让人知道在这世上还有四十万被遗弃的人群，在这紧要的炮打事件中，我们没有搞经济主义，我们不是一个经济主义的组织，仅此而已。想想也可怜，人家工总司还没有表态呢！我们却忙不迭地要与人家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下午，我还是不甘寂寞，带上毛胡子老陆，骑上摩托车在市区的热闹地段，看形势的发展。马路上已经有不少我们那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幅标语。我很高兴，如果由殷庆宝的宣传部去组织，如何有此速度和声势啊。

这时，工总司的标语——那些我们需要依附的"皮"也间或出现，开始对红革会反击，态度很明朗："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炮打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这些标语的出现，控制了局势的发展，但局势还是没有明朗，人们在静观事态的发展，等中央表态。

到了晚上，中央文革的急电传到了上海，表明中央对张春桥的支持，指出红革会的方向

错了。急电马上在上海的马路上张贴和广播。局势陡然急转，立时三刻把上海红革会炮打浪翻压下去。费敏璋也从工总司匆匆赶回，把中央的态度和工总司的态度带了回来（好可怜，中央的消息我们要从“嫡系”那里听来）。在这次炮打事件中，我们总算与工总司站在一起，不失时机地表明了我们大方向正确，大家很高兴。

暴风雨式的炮打，刹那间烟消云散，在以后的几天中，马路上不时有装满红卫兵的大卡车在马路上奔驰游行，打出各大专院校的红革会旗号，急于向外界表明心迹：

“红革会战士向毛主席请罪！”亮出这样标语口号，好一派大将风度！

有的院校就差劲了，打出的标语口号宣称这是红革会极少数头头干的事，与广大红革会战士无关。或许这是一种策略，使红革会能继续存在下去。

当然了，炮打红极一时的张春桥，只能是极少数头头操纵的事。

第二十二章 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哄闹

工总司王佐东约我开会

在炮打事件前，上海的造反派在为夺权——夺上海市委的权，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组织中红革会力量最强，几次三番单独夺权，但因为没有工人组织的参加，没有革命的“三结合”，得不到张春桥的同意和支持，这些夺权行动全流产了（这或许是促使炮打事件发生的原因吧）。“1•28”炮打事件后，夺权成了头等大事，成立一个新生的政权——“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使命”摆在各造反组织的面前。

对于这些夺权的筹备内幕，我们知之甚少，只有费敏璋仍在办他的工总司外交，他不断传来我们被排挤在筹备成立人民公社之外的消息。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无疑又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被排除在上海革命造反组织之外，使我们内外交困，如果这次我们再被排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处境就更为险恶了。它意味着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中，已经没有红工司的地位，意味着我们这个组织政治生命的死亡。

对这样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都无能为力，只有催促我们长驻工总司的“大使”费敏璋去努力完成了。唉！催促也仅仅是催促，明知他无能，也只能这样了。

我个人同工总司头面人物几乎没有接触。要说有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为解决色织廿四厂的谈判，另一次就是武康路 2 号的那次，王洪文为了取消我们 1 月 5 日的人民广场大会，约我去见面，我不买他的帐，断然拒绝了他的“兄弟情谊”，我们的会议照常开，而且非常成功，我想他一定非常恼火。在这成立人民公社的紧要关头，他能不报复吗？至少他不会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

至关重要的时刻到了。我束手无策，焦虑不安。

突然，工总司方面的头面人物范佐东派人来约我去见面。

这太突然了。我同范佐东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工总司的头头们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们，不要说邀请我去他们司令部。有什么事呢？我这个单纯的老实人什么也没有猜想出来，只是兴冲冲地应约而去。

我按时到达外滩总工会（这时的工总司总部设在这里），毫无顾忌地东走西问，找到了这位大我好几岁的范佐东，他同我握了握手说：“时间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研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

这太好了，我求之不得。费敏璋这草包，一直同工总司联络，什么事也做不成。看！现在工总司主动来找我了。

随着他向楼下走去，到了外面的马路上，我问他会议有哪些组织参加，在哪里召开。他看了看手表，没有回答，只是说：“时间到了，快走吧！你的车呢？”

我说：“我没有车，哪里像你们工总司。”他听了我的话，大度地说：“那你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他的车就停在门口的马路边，车里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娇媚地催促范快上车，范就在她的边上坐下。当看到我也打开车门上车，不满地朝我瞟了一眼，在范的耳旁嘀咕起来，我从她的神色敏感地意识到她是要我下车。我的自尊心仿佛被猛的刺了一刀，但是为了大事，我只得强压怒火。好在范以一脸的正气告诉她：“这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我特意请他一起

去开会的。”这女郎才不高兴地停止了嘀咕，向司机说：“开车！去淮海路党校。”

这是一辆阔绰的三排座的轿车，充分显示了目前轿车主人的显赫地位。我坐在后排，我对前面的女郎忿忿地看着，她的头发留得较长，看得出是精心梳理打扮过的，同一律留齐耳短发的女性形成显明的对照。她不时回过头来瞟上一眼，我便把自己深深地陷进沙发座中，佯装闭目养神，但从司机头上长方形后视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俩的正面，只见那女郎亲昵地偎依在范的身上，在他耳边轻轻地私语。瞧着这副亲热劲，我想“耳鬓厮摩”这句成语大概就是这样吧！这时又听那女的娇声问：“你饿口伐？”一面从包中拿出一只饼干铁罐，打开来，把饼干一块一块地喂给范吃，不时吃吃发笑。这轻浮的女人！我明白了，这大概就是范的女秘书吧！怪不得外语中秘书就是情妇的同义语。

我继续深深地把身子埋在沙发中，我继续想下去——我想大概王继鑫和郭文美也是如此亲热的吧！否则外面如何来传闻呢。唉！造反，造反，这是什么革命造反！有权有势后，必然会走上这条道路吗？我庆幸我没有走上这种道路，我为自己的清高而骄傲，我鄙视他们的浪声浪气。忽然，我在北京中华总工会的所见所闻又涌上心头，我想，这造反迟早要走向末路，走向反面。一时我又沉浸在灰心丧气的情绪之中，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一阵从内心发出的疲倦——我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这时车一转弯，驶进了淮海路 622 弄，哦！这是党校，中共上海党校。我们下车后，那位女郎头也不回，匆匆地向后面的楼房走去。我跟在范的后面，问他会在哪里开？他说你跟着我吧！

话虽这么说，他却快步而走，有意同我拉开一段距离。在左边的一幢楼的门口有不少人站着，也有不少人在进去，他似乎有意要避开这些人，快步朝前疾走。从楼内传出一阵阵闹哄哄的人声。这时有人在喊他，向他招手，他朝那人走去，我也跟他匆匆走进楼内。

“上海人民公社”就这样诞生？

楼内的人还真不少呢！在中间的一间大房间内聚集了许多人，我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看。人们围着一个戴鸭舌帽的青年，那青年人态度傲慢地在大声讲着什么，定睛一看，是工总司的王承龙，好一副总管爷的腔调！

就在我这么东张西望时，回头找范，范已经不见了。我只得一间间教室去找，那里还有他的踪影，我连忙出楼，也没有他的身影，面对偌大党校的一幢幢楼宇，到哪里去找？我心想，不是说来开会的么？这里不是聚集了上海不少的造反组织吗？大概会议就在这里开罢，

我重新回到中间的那间大房间里面。

在这个大教室里，哪里像在开会，乱糟糟的吵成了一团，有人在激动地争辩着什么，有人在愤愤不平地诉说着什么，有人默默地在看着听着。

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这里汇集了上海不少造反组织，要求结合进那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新生的权力机构。这些人代表着各自的组织在纷纷向工总司的王承龙苦苦诉说。而他则不时斥责这个组织为老保组织，不能参加，那个组织有什么什么问题也不能进入。于是有的人在低声下气地求他恩准，在遭到他的轻蔑拒绝后，又愤愤不平地数落起来。接下去又是一个组织向他表白自己组织的造反经历，但他都以傲慢的口吻把这些弱小的在野派们拒之于门外。

我目睹此景，心中极其烦燥，这哪里像在组织新生的革命政权？我真不想说什么，是啊！面对骄横不可一世的王承龙，我能说些什么呢？但是，不说吧，似乎白来了一趟，有些不甘心。说吧，看来也要碰一鼻子灰。但我想，我是你们工总司范佐东请来的，总还不至于像前面这些人一样，讨个没趣吧！决心定了，几次要想插进去讲话，全被人抢了先。我又想，这些弱小的组织造反都比较晚，但我们红工司造反早，人员多，对工总司还多少有点情谊吧！我干脆分开众人走上前去，把王承龙从讲台上拉下来。他对我看了一眼，我就向他自我介绍，简要说明来意。

他不等我把话讲完，就用轻蔑和嘲笑的口吻说："噢！你们红工司啊！你们的费敏璋拒绝在紧急通告上签字，你们是搞经济主义的组织，也想进上海人民公社啊？！"

这是意料中的，并不奇怪，我对他说："费敏璋个人代表不了要革命的四十万红色工人，我们红工司对他的错误已经作了批判，……"

他再次打断我的话，以嘲弄的口气对大家说："一个经济主义组织也想参加，啊——你问问大家会同意吗？"

我发急了，拉住他说："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是要革命的，我们红色工人在以往的重大斗争中，都是与你们工总司并肩作战的，这些你不会不知道吧！"

想不到他把我一推，闯开人群向外就走，一些人马上乱哄哄地跟着他向外走去，继续向他唠叨诉说。

我没有这个耐心继续去受他的鸟气，我愤怒地盯着他远去。你们工总司没有一个是好人！要用到我们出力时，就来找我们，现在却把我们一脚踢得那么干脆和无情。我无心再浪费时光，便走出党校，走上淮海路。

热闹的淮海路上人来人往，走过这 622 弄的人们，大概谁也不会料到在党校的楼宇里，造反头头们是如何闹哄哄地要挤进这即将诞生的上海的新生权力机构，为自己的组织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不会想到，新生政权的诞生竟是如此乌七八糟。

幸好未上贼船

马路上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向人们预示造反派的得势，夺权的成功。我想这对大多数市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无动于衷，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广大市民更不会发觉满街大标语中有一个细微的不同之处：

"热烈欢呼新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热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成立！"

"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同样是"上海人民公社"，一种标语前面有个"新"字，是"新上海人民公社"，另一种标语没有"新"字。不用说普通市民会从有没有这个"新"字上发现什么不同，就连我这个头头也没有悟出它们的差异，并进而想去了解其中的内幕。我当时的理解是直接称"上海人民公社"也行，加个"新"，表明它是"一月风暴"后的新生事物，也行。殊不知两种标语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

这里的"新"是指另外成立一个"新的"上海人民公社来与正在筹备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相抗衡。这里有一个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的更大的权力之争。我的老天！新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成立，两派已经形成，分裂已经开始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以耿金章为首的一派人（包括范佐东），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新上海人民公社”与王洪文对抗。那时上海市党校是王洪文筹备成立人民公社的地方，而耿金章他们也选定在党校内进行筹备和策划他们的行动。看来我是耿、范选中的对象，事先他们一定对我作过研究才把我约去的。

孤陋寡闻，头脑简单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兴冲冲地跟着范去了。如果我真的跟范进了他们的会议室，也就是进了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室，我也跟着他们干了，那么我就成了分裂上海新生革命政权的一份子！几个月后，掌握权势的王洪文就把耿金章、范佐东抓进了监牢。如果我成了“新”公社的成员之一，王洪文的“铁拳”也必然会砸在我的头上。

如果说，在这之前，命运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开出的“红色列车”只因为车长嘴笨而失去了我们组织与中央首长甚至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又使我在北上赴京去参加铁道部“抓革命，促生产大会”时又差了一点点没赶上，使我两次失去成功的机会，失去宣传自己组织，扭转组织形象的机会的话，那么现在，冥冥之中似乎又有鬼神在主宰我的命运，在关键时刻使我避免滑入深渊。不是吗？在党校不知怎么搞的，使我离开了范佐东，阴差阳错撞进了王洪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内。当时是撞了一鼻子灰，还抱怨范在戏弄我，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事隔多少年后，才感谢那次差错，使我避免了上“贼船”，也使我看到了王洪文他们的新生革命政权成立时的轰闹、混乱、肮脏的样子。

第二十三章 解散前后

夺《支部生活》权的闹剧

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的上海，为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而忙碌，各派造反力量为了挤进这上海的权力机构而争斗。在 100 天前，人们刚起来造反时，谁也没有想过夺权，随着形势的发展，经过几十天造反生涯，造反头头们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的生活，或者说已经尝到了执掌权力的甜头。是啊，人们在尚不明了真正的民主是怎么样的民主时，人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起来造反，但是，当自下而上的夺权，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按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授意夺权开始后，头头们脑中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民主意识荡涤殆尽，权力的私欲被挑逗而急速膨胀开来。

中央可能以为这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一股新生的力量，实际上，他们在这一百天里，一下

子暴发起来，已经迅速地腐败，成为权力暴发户，成了新生的权贵。他们掌了权，绝对比不上那些老的当权派，比不上那些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考验的革命家。

在这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我们红工司的头头一无所知，因此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组织又一次被排除在外，已成定局。这样的后果究竟会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王继鑫、郭文美两人是怎样想的，费敏璋和殷庆宝又是怎样想的，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我有时灰心至极，很想退出这场人间的大闹剧，可是真要这么做，老实说于心不甘，唉！还是做我的组织部长吧！可是，有时我却又思想活跃，很想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切切实实做点事。

一天清晨，从家中出来，经过一夜在家好睡，我神清气爽，乘在电车上，一路观赏着沿路的标语口号（从马路两旁的标语，可以观察到上海的形势发展），这天窗外掠过的口号都是夺权的内容。

在这一片夺权声浪中，我十分天真地想，上海的造反派们都在夺权，我们为什么不也去夺权呢？

夺市委的权？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敢想的，红革会几次夺权都没有成功，我们肯定办不到。记得在我即将去北京的前二天，我召集各分部各系统的头头们来总部开会，我原本的意图是就费敏璋拒绝签字的错误向大家进行解释，说明那天在锦江签字的经过，以求得下属的谅解，要求大家面对外界的压力同心同德，渡过眼前的难关。在我的解释下，人们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没有向我发难。

不想在会议快结束时，那个草包后勤部长钱桂芳突然窜进会议室来，用他常委的身份，大放厥词，号召大家夺权。他歇斯底里的讲话和提出夺权的号召，使各分部的头头们愣住了。大概“夺权”这一字眼对于我们这些“临兄”太陌生了。也或许大家被他的歇斯底里的形象糊弄住了，人们屏住呼吸在听。这一来，这个草包就更来劲了，歇斯底里更为发作，用更神精质的语言，混乱的逻辑思维，唾沫横飞，要人们现在就跟着他走去夺权。这时，草包的夫人——那个身材丰腴的女人不知什么时候也站在了丈夫的身边。指手划脚地在帮衬着丈夫，仿佛这时的天下已经是他们夫妇俩的，仿佛红工司的总部和组织部的权力已经全部被他们俩夺到手了。

我对这眼前的闹剧出奇的冷静，似乎在看一个小丑在演一场拙劣的戏，我很厌倦，以至于打起了瞌睡。当我被一阵脚步声弄醒，杨福海嘻嘻笑着告诉我，草包带着人去夺权了。

去夺谁的权呢？可笑得很，也亏他想得出，去夺党刊《支部生活》的权。我不由大笑起

来。我环顾一下，我们组织部的人都在，没人跟他走，下面的头头们只是被他带走了一部份人。我的人都在看着我，他们看出了我的态度——不屑一顾。

我对剩下的头头们宣布，我要去北京，为了铁路上的情况去北京，尽一切可能利用 14 次列车的光荣挽回组织的颓势。

已经时近半夜，不断有人把钱桂芳的“夺权”消息送来。开头二拨人的报告还当正经事来向我报告，后来的几拨人则用嘻嘻哈哈的玩笑口吻来说。前面的人说钱如何劲头十足地带人冲进了《支部生活》，最后来人则说他挨训的那个熊样，听得人们哈哈大笑。我的好奇心被引起来了，要去看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在我的一声招呼下，我们下了楼。

《支部生活》杂志离我们总部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从静悄悄的马路走入《支部生活》那扇厚重的小门，进门就是平时接待群众来访的接待室，接待室里还剩下七、八个人，居中的就是那个草包，低着头被一中年干部训话。他皱着眉，苦着脸，一声不啃，他那思维混乱的脑子，似乎在努力思索：为什么兴冲冲来夺权，反而被训？他的荣辱与共的妻子站在他身后，一脸的惊恐和不安。

只听那个干部训道：“我们《支部生活》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刊物，是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是党内的刊物，你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来夺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钱桂芳竟敢来夺共产党的权！你好大的胆！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说到这里，这名干部这发现我们陆续进来的人都是陌生面孔，于是他把话头停住，对我们审视了几眼。稍停，他又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缓和一些，内容也开始转变，把调子降低三格：“革命造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的反，你钱桂芳竟造到《支部生活》来了，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大方向错了。”

这名干部一面说一面还是不断转过脸来揣摸我们，终于，被他看出我是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始终一言不发，看这干部如何发落草包，然而我的身份还是被那草包夫人暴露出来了。她不知怎么，大梦初醒，向我奔来，急急向我求助，要我出面讲讲话。

《支部生活》的另一干部，从草包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是组织部长后，马上对那位训话的干部耳语了几句，那干部的训话内容调子马上又下降三格：“你们红工司是一个临时工外包工的群众组织，我们对你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同情你们受歧视的地位和遭遇，我们在接待工作中，也不时听到群众的呼声，我们《支部生活》深表同情，尤其是你们在政治上的待遇……。”

这些话分明是在说给我听，其用意显而易见，生怕把事闹大，想把事件就此了结。此人深谙世故，像钱桂芳这样的草包，可以用大帽子吓唬，但对其他人就未必行得通，他以退为进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后，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有点幸灾乐祸地向神情木然的草包看了一眼，心情十分轻快，微微一笑，转身向外走去，我带来的人也随我向外走。草包夫人慌了，忙不迭地上来叫我，让我救她的丈夫。我笑着说："由你夫人保驾足够了。"我走到门外，殷庆宝贼　嘻嘻对我说："这小贼，让他去。想权想昏了头，夺权夺到这里来了。"原来他也来了，站在门口看戏。人们嘻嘻哈哈地在马路上笑了一会，这场丑剧就这样结束了，事后知道《支部生活》借给他几大本《大参考》合订本打发了"草包"，这"草包"在过后的几天以几本《大参考》自我陶醉了一番，还真有点阿 Q 的遗风。

我成熟点了么？

回想到这里，车已到外滩，看着车窗外掠过的市劳动局的牌子，我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们真正要为四十万临时工、外包工，即今天的红色工人做一件大好事，主宰自己的命运，何不去夺劳动局的权呢？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我一时为我的想法而兴奋。到延安东路，我转乘 71 路车，在车上我继续盘算着这件事。到了总部，我带着车上的兴奋，告诉杨福海，我刚才在车上想起夺权，我们应该去夺劳动局的权。

他听了高兴地说："对呀！早就该这样做了，你今天是怎样想起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也是看了外面的形势才触发起来的。

他说："你们常委是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心想，"讨论？常委们讨论？"我的情绪不由得从兴奋中跌落下来，不由叹了口气："老杨，你看他们这些人在做啥？他们会想到这些问题吗！真正在做事的只有我们组织部。"

杨福海看着不无悲愤的我，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对我的牢骚是有同感的，他们也时常这么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停了一会儿，他说："如果你起来带头，我们支持你，而且也一定会得到下面的拥护。"

是的，他的话没有错，而且也是真诚的。但我并没有被鼓舞起来，相反，我一想起我们这些常委的所作所为，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上海的遭遇，我对这革命造反，实在看透了，也灰心了，早上的好情绪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这人从骨子里就没有个人政治野心，我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代，错误地进入了这个造反角色里。一开始，我仅仅从我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带着良好的愿望，想象着通过这场革命，使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下，过上尽善尽美的生活。但我这个乌托邦式的肥皂泡很快就破灭了，随着这场革命的逐步推进，使我看清了它是丑而不是美，也使我从幼稚的革命狂热中冷静下来，认识了我自己，认识了人的灵魂，人的丑恶。我彻底厌倦了。我一声叹，默默无言地结束了我这几小时的、可以被称作是“小资产阶级”式的狂热。

我似乎是成熟一点了么？

（后来在组织解散后，只有我一人在同市劳动局的吴永法在进行善后工作。一天，我们在回收散失的物资时，他对我在这样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仍认真地工作，不由叹息起来，他说：“你们常委真不争气：费敏璋拒绝签字，其他几个常委又有生活问题，实在不像样，本来上面有意图，要把你们结合进市劳动局革委会的，……。”他不无惋惜地看着我，半天才说：“如果都像你就好了。唉！全市的红色工人，算是白白造反了。”难道，这就是我们这场造反的真实评价吗？）

欲进不能想，欲退亦不能。组织部的工作总是要干下去的。

面对下面的反对派力量，我以响应工总司提出的精简口号为借口，制定了精简各分部、总队脱产头头名额的方案，试图用削减人员的办法，削弱他们的力量，缩小他们的权力，其真正的矛头指向那些反叛的几个分部，和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纺织系统的分部、兵团之类的下属组织，竭制他们的反叛倾向，限制反对力量的扩大。

这一举措遭到了下面的反对。我太傻了，也太认真了，目前我们红工的地位，已使总部的权威大不如前，但我却下文件缩减脱产人员编制，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剥夺掉，行得通么？一纸空文能削弱他们的力量么？

中央解散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1967 年 2 月中旬，我还在苦苦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红工司的时候，2 月 18 日，突然传来了中央的通告——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的通告。

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让我们不知所措。

所有的常委总算被惊动了，总部见到了他们多日不见的人影。

全体常委在大队部陈铭声的上海第九印染厂厂里的地下室开常委会，商讨对策。

我们先对这一通告的全文作了文字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一文件的措辞是含混不清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你可以是理解为是对全国性的组织“全红总”的，与我们这些同全红总没有组织关系的组织无关。但是，从全文的要求和目的来看，从全国的形势来分析，又完全可以理解为：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必须解散。这一文件使人在理解上产生歧义，它不像法律文书那样用词确切。这种用词含混不清的中央文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现在看来是不是上面有意这样措词，用来探探全国势力强盛的临时工造反组织的反应呢？这种可能也许会有，但是，中央要直接下令解散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只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更为可能的是，当时许多身居高位的要员本身知识层次很低很低，因此，经常下发让人模棱两可的文件，就不奇怪了。

郭文美，我们的女秀才把中央的通告逐字逐句地推敲，推出她的观点，认为这是针对“全红总”的，我们应不予理会，继续干我们的。她的观点听听也有道理，我们可以凭我们的实力，凭我们同工总司“并肩战斗”的业绩顶一下，拖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形势，再决定行止。

我手捧这个通告，也反复推敲。这个通告是有歧义，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解释，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央不愿看到有为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临时工组织的存在，更不愿看到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存在，要解散这些组织是中央的意图，这才是文件的实质。就像欣赏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一样，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她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

我心中又涌起北京之行和一些头头们的丑行给我带来的恶心和对文革的失望。

这时，我手拿这纸中央通告——这张对临时工组织的“死刑判决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解脱感，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好不高兴啊！

我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我的高兴，我向大家表明：“拥护中央的决定，执行中央通告精神，解散组织，我们大家回厂去重新做我们的工人，这不是很好么！”

我用的“解散”这个词刺痛了众人，大家跳了起来，一致反对解散，说文件中根本没有“解散”一词。我说文件是没有用解散的词，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要解散。我的话又召来

一片反对声。我孤立于众人之外。

郭文美圆睁她那美丽的小眼睛，怒斥我背叛了四十万红色工人，出卖了红色工人的利益。

我反唇相讥："我不强求大家的意见同我一样，你们要坚持下去，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退出红工司，总归是可以的吧！我也知道你郭文美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为四十万红色工人干了不少事，我交出组织部的大权，由你郭文美来领导，这不算叛卖行径吧？"我最后的几句话刺中了她的痛处，她沉默下来。

开常委会发生争论或争吵，已是我们的"传统"，不足为奇，我们的会议照常继续。这次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郭文美同我的激烈分歧，这是会议无法避开的焦点，那么其他人的观点呢？

郭文美的观点，按常规也是王继鑫的观点，殷庆宝明确附和郭的观点，费敏璋这个名义上的头儿，是出名的闷罐子。人们在郭文美激烈的言词下，都一脸的悲愤，都附和不解散的主张，但是又对中央通告噤若寒蝉，不便进行直言的抵止和批评，所以又是一脸的悲凉，只有郭文美转弯抹角地对中央的通告表示了不满。在这样的气氛下，这些平时不干实事，起码最近不干实事的人，似乎成了四十万红色工人的救世主，只有他们才是为红色工人在谋利益，为四十万做了不少好事，现在通告的下达，剥夺了他们为四十万人谋利益的权力，才使他们悲愤难抑。好一派"殉道者"的悲壮啊！

在这悲壮的时刻，郭文美叙说了她同王继鑫的一段找王洪文的经过：

匪巢般的工总司总部

他们两人在接到中央通告后，未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就去工总司找王洪文商议红工司与工总司合并的重大事项。这时的工总司已搬到外白渡桥旁的原苏领事馆内（由于文革中中苏关系恶化，领事馆已经关闭），他们通过人约定在晚上的某一时间同王洪文见面。到时候他俩如约前往。诺大的房子内，灯火不明，墨黑一片，经人通报后，半天不见人出来引见。在等待中，他们只听见工总司内的人员互相用口哨声联络，好像进入了黑社会中黑道人物的匪巢之中，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天下？这哪里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的形象啊！两人等了半天，王洪文始终没有出来见他们。

这时的王洪文怎么会同意我们与他们合并呢？想当初，他势单力薄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我们，借助我们的力量，甚至不惜与我拥抱，称兄道弟。如今，他春风得意，气势正旺，而我们则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在中央的命令下，我们该下台了。他有什么必要会见这两个去

投靠的人？他还要我们红工作啥？王、郭两人也太天真可笑了，瞒着我们众人欲与王洪文谈判合并，在复杂和卑鄙的权力争斗中，显得是那样幼稚、可悲！

郭文美和王继鑫二人的心理活动的轨迹可能是这样的：看到通告后，第一步甩开大家，抢先同王洪文联络，如果合并成功，那就是他二人的功劳，可以捷足先登得到好处，在工总司中分得一把金交椅。如果这步棋失败后，就提出召开常委会，对通告"钻字眼"，鼓动大家继续干下去。

我觉得，继续干下去，简直是火中取栗！

经济主义有错吗？

以我当时的阅历和为人，对郭、王两人不可能有如此认识，也不会去把人从坏处想，不可能在情感上同大家闹翻，我们毕竟是"临兄"，我们同受"临兄"的遭遇，我们造反的目的就是不要做临时工。我同他们的分歧，对费敏璋不签字的不满，只是思想方法的不同，就连费敏璋、殷庆宝同宋日昌副市长谈判，本身也没有错！

经济主义？是的，我们是经济主义组织。为广大临时工外包工们谋利益，有什么不对？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利益，哪来什么所谓的"政治"利益？想当初，我们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不也是为广大工人农民在谋利益？为什么这么声势浩大的"革命"、"造反"，却不能使革命者说出自己真正的、正当的革命目的来呢？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忘了呢？

只是我们这些头头，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是在有限的、划定的圈子内的"大民主"，利令智昏地起来为自己的利益"造反"了，我们当真了！红工四十万人都当真了！

我也是一个经济主义者，我们策划和导演的一月五日的人民广场大会，不也是在声嘶力竭地大叫大喊，要砸烂"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吗？

现在形势急剧的变化，不能不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继续下去，那将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说明白点，是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那么我们这些头头的下场是明摆着的：戴上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投进监狱！那么，四十万红工，将比不造反还糟糕。理智告诉我，该是收场的时候了。我把我的观点亮出来，要求大家不要再去钻字眼了，坚决执行中央通告的精神，回厂去做工人吧！

正在争得不可开交时，陈铭声前来通知我们去食堂吃半夜饭，我们这才一哄而散，在食

堂里坐下，这时夜班工人已经吃完全走了，在陈的安排下，吃到一顿比夜班工人丰盛得多的半夜饭，这是自造反以来，唯一的一次不用掏钱吃饭的享受。

饭毕回到开会的地下室，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从精神到肉体，完全散了架，感到从未有过的劳累。真的太累了，造反三个月来，到了今天，从精神到体力。有一种无法说清的累。九十年代初的夏天，北京人风靡一种“文化衫”，印着“真累”两字招摇过市，穿的和看的觉得潇洒和好玩，我不知他们如何会“真累”，想想 67 年初的我，那才是“真累”呀！

在地下室里，没完没了的会照常开下去，散了架的我却倚着墙沉沉睡去。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睁开枯涩的双眼，只见满室的烟雾，悲愤激动的郭文美，睁着她疲倦的小眼睛在哇哇讲着什么。我转动一下酸楚的身躯，挪一挪坐得麻木了的屁股。郭文美看见我醒了，便冲着我大喊大叫。我瞪着双眼，半天才听明白，她要我表态是散还是顶。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睡觉，我真厌烦透了，我带着气说：“啥人现在出来表态领头带着干，我一定紧跟，坐牢、杀头就是了。”谁也没有应声，在沉默、难堪中我又沉沉睡去。待我再次醒来时，有人在瞌睡，有人在打着哈欠，有人还在呢喃着什么，有人从外面进来说天已蒙蒙亮了。唉！争论一夜，议而不决，什么名堂也没有。谁都惦得出这张中央通告的份量，谁也没有魄力站出来，敢于说顶下去，我们这些懦弱的人！

这是最后一次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常委会议。会议就这样散了，事实上宣告了组织的解体。会后也没有部署解散的具体事项，也没有向外界宣布我们的态度，就这样暧昧地在混、在看、在等。总部里，看不见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费敏璋的人影，他们在干什么呢？

解放军报记者驾临

大概过了一、二天吧，我在晚上有了时间，回到我的厂里，向黎伯昂和丁胜成谈起中央的通告，我态度明确：解散！我们把厂里的红工造反队解散！

丁胜成表示：与厂里工总司造反队联合，并说这大概是下面基层红工造反队的大致趋向。他对解散红工造反队深表惋惜，用各种语言来说服我。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人对生存、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对排除在组织之外，列入另册的恐惧。不过黎伯昂是极力赞成解散的，这符合他的为人和性格。在二比一的情况下，丁胜成提出召开我厂红工造反队的全体队委会讨论决定。（事后队委们全部同意解散，丁才无奈地放弃已见。）

正在这时，突然乌鲁木齐中路的总部大队部朱力军给我来电话，（在总部的常委中，只

有我把我的行踪向值班人员告知，他们遇到紧急事情总是用电话同我联系，尤其是黑夜，所以我回厂时每每接到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朱力军告诉我，有三位解放军来总部，称是解放军报记者，要找常委领导班子的人。在文革中，中央的二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月刊的联合社论就是中央的精神，文革的动向，就是以二报一刊的社论作引导，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也通过二报一刊发表。这些记者是下情上达的桥梁，不能等闲视之，尤其是解放军报的记者。

今天晚上军报记者驾临总部，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况非同寻常，我很吃惊，马上意识到，他们的到来肯定与中央通告有关。我马上问：“王继鑫、殷庆宝他们呢？”“已派人去找过他们了，不知他们在哪里！”我又问：“到殷庆宝家里去找过吗？”答：“去过了，他家里人也不知他在哪里。”我说：“你再多派几人去找。”

这时，我感到对方电话里有人插话，同朱谈了几句，稍停朱说：“解放军现在指名要找你，你赶快来吧！我派老陆来接你，这样快一点，解放军已经等了半天了。”稍停，朱力军又加上一句：“老陆已经来接你，你一定要来噢！”我给了他肯定的回答，便放下电话。

这情况太突然，也太重要了，这些王八蛋们藏到哪里去了呢？他们背着我又在商量什么了吧，难道他们的行踪连朱力军、陆进雪也瞒过了吗？这些该死的东西！

陆进雪驱车赶到，我跨上他的摩托车后座，我觉得军报记者来到，而且点名要找我，我倒反而要多请几个常委一起接待。我问毛胡子别的常委都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

摩托车在寂静的马路上疾驰，我的心也在急速地跳动，等候我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摩托车冲进了乌鲁木齐路的总部。

善者不来

三楼，我的办公室内，挤满了男男女女的人，有我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纠察大队部的人员。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其中一位戴眼镜）被大队部的一些女同志围着，这些女同志倾诉着自己当临时工的酸楚，两位年轻的军人认真地听着。闻讯赶来的杨福海在同另一位年长约四、五十岁的解放军同志低声谈话。我一进门，人们刹那间

静下来。

杨福海起身，向那位中年解放军介绍我的身份时，三位解放军马上起身向我伸出了手，我们互相握手，客气了几句。那几位女同志又仍像祥林嫂一样向解放军唠叨着，似乎成了一个对临时工制度的批判会了。约摸过了十来分钟，那年长的军官开口了，他向革命群众——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明，今天时间不早了，以后再来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转身向我说："我们来找你们，想听听你们对二月十八日的通知有什么意见和反映。刚才同志们已经讲了不少，现在想听听你们常委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他们果然是为了中央的"通告"来的。

满屋的人又安静下来，工作人员们出于对自己的命运的关心，迫切需要知道我们常委的想法和决定，因为常委开会后没有向大家宣布什么决定，他们更把眼前这些"记者"视若神明，似乎只要把临时工的状况讲给他们听，中央就会收回成命，我们就不用解散了。几十双企盼的目光注视着我。那两位年轻的军人马上打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再一次被逼上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需要我在其他常委都不在场的时候立刻拿出意见，我出口的话将被视为四十万红工司群众组织的态度，而且我的话是面对真正的中央派来的人——《解放军报》记者说，如果出现闪失，其责任与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几十双眼睛，面对两位军人随时准备下笔记录的手，面对那位军官似乎能洞察一切的目光，在静得几乎能听得见每个人心跳的办公室里，我刚才在摩托车上跳动不安的心反而平静下来，临时工遭受的种种苦难和我们遇到的种种不平给了我勇气。一时间，我心中拟好了发言稿。

我首先谈了我们为什么要造反，谈了我们所做的一切，谈了我们同工总司的良好关系，渐渐把话题拉向眼前的事上。我说："我们对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还刚刚开始，对上海陈、曹的批判还没有展开，我们对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泡制的临时工制度还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我们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说到这里，引起一片赞同声。我把话锋一转："我们对文件的理解还吃不透：这一文件是针对'全红总'呢？还是对全国所有的临时工组织？是不是也针对上海？请你们作一解释。"这一问题是文件的关键所在，也是文件既要达到目的，又不挑明范围的关键所在。

我直截了当的提问，引来了讳莫如深的高明回答，戴眼镜的年轻记者回答说："我们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们今天来是听听你们意见的，刚才大家已经谈了不少，对于临时工制度，文件已经说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他回避了我的提问。

他的回答当然不能使大家满意，引起人们一阵议论。是啊，就拿“运动后期处理”来说吧，实际利益都放到“后期”处理，那么前期和中期是干什么的呢？难道真的只是拉下几个人，换几个人？而且，所有的运动都只有开始和高潮，而没有“后期”，四清”就是这样，谁知道后期是什么时候？（文革果然是没有“后期”的，一直拖了十年，才由华国锋同志的中央班子作出“结束”文革的决定，使文革成了唯一一次有“结束”的运动。）

那年长的军官严肃地说：“我们对中央命令的态度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对于中央的精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目光扫视大家，对我更是注视了一会，继续说：“对中央精神暂时不理解也不要紧嘛，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逐渐理解的。要紧的是我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这通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要坚持执行！”凛冽的目光又对大家扫视了一番，转身把椅子拉得离我更近些，不再理会满屋的“革命群众”，似要单独对我说话。

我这人没有当过干部，不懂官场的一套，不知在群众前避讳什么，这时，我应该把他领向隔壁的办公室作单独的谈话才对，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

他见我木知木觉，只得低声问我：“你们常委对通告是如何讨论的？”

他单刀直入的提问，引来了我的直言不讳的回答：“我们常委对通告已经讨论过，我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文件的措辞来看，我们分析这不是针对我们上海的，因为我们同‘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我们上海‘红工司’是独立的组织，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红工司应该与全红总有所区别。”

年长的军官打断我说：“前一阵子你们同全红总、总工会搞了一个什么通告？”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搞了三个大公章……。

这下可好！殷庆宝搞的那份大通告里埋下的自杀性炸弹终于爆炸了！

我连忙分辩道：“那是全红总的几个人到上海来游说，我们个别人不明真象印制了这份通告，事后我们按照春桥同志的指示精神，收回了这份东西。我们再没有同全红总发生任何联系。我们上海红工司确实跟全红总没有任何组织关系。“

那军官沉着脸，对我的话不置可否。

我继续说下去：“另一种意见是：这是党中央对广大临时工、外包工的关怀，党中央已经了解临时工制度的危害，要相信中央会在运动后期处理的，这个文件明确全国的临时工组

织都要解散，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上海也不例外，应该解散。不管持哪种观点，我们红工司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坚决听党中央的。”

两位年轻军人认真记录着，年长的军官一脸的严肃，认真地听我讲。他见我讲完了，对我看了那么一会，然后郑重的问：“你是哪种观点？”

我心中不由一阵慌乱，我该怎么说呢？但我不得不老实说：“我是主张立即解散，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

他紧盯着我又问：“那你们最后是如何决定的？”他的双眼逼视着我，射出一股威慑力。

室内的空气一下凝固起来，几十人的呼吸也一下屏住，直觉告诉我，眼前的来人是“善者不来”。人们十几年来对于中央的决定能有丝毫的违抗吗？如果我们按王继鑫、郭文美那样的主张硬撑下去，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决没有好结果。想到这里，我一时激动起来，不能让众人吃亏，更不能让四十万红色工人蒙上违抗中央命令的阴影，不能让红工司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赤卫队第二的悲惨下场，我当机立断，大包大揽地说：“我们内部虽然有不同争论，但我可以代表红工司表态：我们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坚决解散。”说完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那军官脸面的肌肉也“阴转多云”放松了一些，他立起来把我的手用双手握住，使劲摇了几摇，大声说：“这个文件是中央的声音，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对党中央的指示要坚决执行。好！这样好！”他又摇了摇我的手，随后放下，恢复了我们刚见面时的满面笑容说：“还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

战备需要别墅？

真客气啊！还有什么要同我“商量”的？在首长、上级滥用“商量”的时代，解放军有时也不爽快了。我忙请他坐下说。

他坐下，满脸堆笑：“在虹桥路上有幢小洋楼，我们问下来说是你们司令部在用，有这么回事吗？”

我竖起耳朵在听，真当他有什么大事。什么，虹桥路上的房子？我倒发起呆来，一下转

不过弯，稍定我才明白过来，哦！那不就是我们同杨解泉一起开会，正碰上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们苦苦熬了一夜的那幢花园洋房嘛！我问：“是的，我们在那里有一幢房子，怎么啦？”

他笑笑：“我们部队战备需要，我们想与你们商量，把这房子让给我们部队使用。”

部队战备同花园别墅怎么也联不起来，我又不能问什么样的战备，才需要用花园别墅。我脑中虽然这么飞快地闪过这个问号，但解放军的威望马上在我的脑中占了上风，我坚决地说：“战备需要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们一定支持解放军的战备任务，可以！可以，约个时间我们领你们去吧！”

那军官说：“谢谢！那就不必了，只要你们把你们的东西搬走就行了。”我说：“那行。”

他沉吟了一下又说：“你们在衡山路上也有房子吧？”我的心猛地振动了一下，怎么？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全部的秘密活动场所！好厉害啊！这不是明摆着在收紧“包围圈”，逼我们让出秘密地点，逼我们收场嘛！什么部队需要，战备需要，这是在限止我们的活动，在向我们发出警告，看来不解散不行了，我庆幸刚才当机立断的表态。

省得他再问，我干脆地说：“是的，在衡山路 1 号有我们的房子，在淮海路党校附近也有我们不公开的房子，你们全收去吧。”

我这样一说，他显得挺高兴：“好！这样做好！谢谢你们的支持。”他又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谈这些吧，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情况，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他递给我一张纸条，我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上海警备区×××，电话×××××——×××

喔——他们是警备区的人，不是记者！

我这下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我们是脆弱的跳梁小丑，却整天挥拳跺脚，说什么要对走资派、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专政工具用得着这么张扬么？不用！我面前的解放军，他们才是真正的专政工具。

不是么？他们一来“了解情况”，我就不得不表态坚决解散；他们一同我们“商量”，我就得把花园别墅让给他们搞战备。

冷清的总部

总部开始冷清了。下面各分部的头头们在一阵慌乱后，头子活络的在设法找门路钻营投靠工总司。总部的人呢，树倒猢狲散。王继鑫、郭文美、王英、王伟还是不见人影；殷庆宝、费敏璋也很少露面；大队部的那些“绿林好汉”各投门户，剩下一些老弱和妇女在坚持看门。“门前冷落车马稀”，往昔的热闹消失了，往日闹烘烘、乱糟的总部，显现出少有的宁静。“常委”中只有我一个还每天坚守在组织部。诺大的一个总部，只有我们组织部的一些人，宣传部的几个人，再加后勤部的会计李衍清抱着他的帐本和单据，坚守着这个行将消亡的“总司令部”。我和杨福海还在“领导”着，在作解散前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拟了几条规定，要各分部头头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房屋、物资的交接工作，不能把国家的物资（办公用品、车辆等）丢失和损坏。

会计李衍清看不到他的顶头上司“草包”，只能来找我。我安慰他，要他好好保管帐册和单据，请他把这些帐册拿回家保管，不必来总部了，一旦上面有部门来接收时，再请他出来。他清瘦、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凄苦的笑容：“也只好这样了……”他抱着帐本转身出去，又转身回来，指指怀中的帐册说：“我是为了你们几个常委啊，这里进进出出有几万元的经费（按当时的工资和币值，要顶现在的几百万了），如果丢失了单据，今后查起来你们怎么办啊！”

我说：“是呀！多亏你了，我知道，你为这些帐册也吃了几次惊吓了。”我指的是蒋瑞根组织的几次“打砸总部”，他怕单据帐册被抢失落，几次抱着这些东西，东躲西藏，“没有你这么尽心尽力，我们几人以后有得吃苦了，真谢谢你了！”

他平时言语不多，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我们的财务多亏他按正常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我由衷的尊重他，平时他对我的挑剔，我总是心悦诚服地按他的要求去做，告诫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遵守财务制度。

这时，他握住我的手真情地说：“常委中只有你是那样正派，像样拚命工作，真正为四十万红工的利益在办事，如果都象他们，我早就走了，我图什么啊？”他讲到这里，动了感情，眼眶湿润起来，哽咽着说：“临时工大家不团结，中央出了文件要解散，今后我们……”他似有很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我和杨福海心中都明白，我们对中央的命令能说什么呢？能评论吗？不敢，连想都不敢想！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他抱着帐册回家，我们就这样凄然地分手了。

开始几天，我们几人还忙于阅信和收阅电报，还动笔复信，后来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

也就看过算了，不再回复。但信件和电报突然大量涌来，就像当初我们刚成立的时候那样多，这些信件大都是华东六省的中小城市的临时工造反组织来的，内容大致一样：对中央通告的理解有歧义，要求我们解答，有的干脆询问我们上海红工司是散还是继续“造反”，他们表示愿意跟着我们干，有的上海周边城市的组织更干脆，愿意在上海红工司的旗帜下合并起来干下去。

看着这些信件和电文，我不禁思潮起伏。

夺权怪圈

从 66 年 5、6 月份开始，转眼 8 个月过去了。当需要夺权的地方由钦定的组织夺权之后，二月中旬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收”的文件。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这八个月看起来是自下而上，风起去涌的“群众运动”，实质是自上而下，按“伟大战略布署”指挥的“运动群众”。运动初期造反的口号对上是针对某些人的，对下是鼓动人心用的。真造反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怕是假造反也不是人人可“造”的，权更不是人人可夺的，只有钦定的人才可夺权。不是吗？上三司（上海的学生组织）夺了一次权，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派人抓了起来（我们的费敏璋书呆子还跟着人去抓“坏头头”），耿金章的二兵团也夺过权，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也夺过三次权，没有一次不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上面不认可！那时的上海，首先没有张春桥的认可就夺不了什么权。可笑的是在这股夺权风的吹刮下，我们的草包司令钱桂芳去夺市委的党内刊物《支部生活》的权，结果夺了几本《大参政》合订本回来，被人当乡下人哄笑。

现在想想，当时的上海几次三番的演出夺权闹剧，高等学府的学生，工厂的工人都狂热地卷了进去，真心实意地或夹杂着私心杂念地，执迷不悟地或至死不悔地去夺权，一次次地失败而又一次次地去夺，无人去从深处想想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假如站在万米高空俯视地球，这些夺权的队伍大约很像打仗的蚁群吧！

有群居习性的昆虫如蜜蜂、蚂蚁，其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工蜂、工蚁，由于性器官不发育，所以它们只知道工作或者打仗。那么，夺权的群虻是缺少了什么才使他（她）们失去了思考能力？为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张春桥则挑中了听话的工人，尤其是上海的工总司中的王洪文帮派体系，把这些人收拢为自己的帮派山头，打击不听话的其他组织，包括工总司里的耿金章二兵团，又把自己打扮成工总司的恩人。让这些人死心蹋地跟着他，成为统治上海的工具，进而把上海作为向上爬的资本，爬进中央，爬进中南海的权力圈。

从上海的夺权，可以看到这样的“怪圈”：一开始让充满革命热忱，最有造反精神的学生组织去夺权，把死水一潭的形势冲开、扰乱。当学生组织们自以为可以指点江山的时候，

则推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语录，组织工宣队进驻“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领导一切，向这些狂妄大胆、意气风发而实际上百无一用的书生发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警告，给充当文化革命“马前卒”的学生一闷棍。当夺了权的工人组织喜笑颜开得意忘形时，再推出最新指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把权力从工人组织中稳稳当当地收回来，再度集中到个人手中。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大圆圈，回到原点上。只不过曹获秋换了个张春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阴谋家。哦，还多一个王洪文，这低能的政治流氓！

工总司送票来

在夺权后的地方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前夕，需要“开刀消灭”一批为“经济主义”而起来造反的组织，尤其是对势力旺盛的临时工组织，这其中包括全国人口庞大的农民——贫下中农组织，防止这些人转向真正的造反。张春桥把临时工称之为流氓无产者，认为其破坏力非常强大，对新生的地方政权——革命委员会有潜在的威胁和破坏作用，所以要统统清除，至少要为以后的新政权消除麻烦。这就是二月中旬一系列中央文件的出台背景。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工总司方面突然送来几张入场券。二十四日下午将在文化广场（这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展开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按理这种由工总司垄断召开，有张春桥、姚文元出场的会，我们是轮不上参加的，那为什么在我们红工司前途未卜的时刻——或者说行将消亡的时刻，特意送来票子，要我们这些常委们去参加，说明这个会议的内容一定同我们有关。

当我从杨福海手中拿到入场券时，心中不由这样联想：这个会将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一次会，只要张春桥一句话就能致我们于死地；只要一句话也能使我们悄无声息地退出这个舞台；只要一句话也可以让我们体面地退出。在听候“判决”的前夕，我们这些常委们该讨论一下才对，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能争取主动才好。想到这里，我问杨：“王继鑫、殷庆宝他们去吗？”

杨说：“这两张票子就是王继鑫派人送来的，说是给组织部，他们当然也去。”

我问：“这几天一直不见他们的人影，他们在哪里知道吗？”他摇摇头。我看看他手中的入场券说：“那就我们两人去吧！”

杨喜形于色地说：“可以有机会见到张春桥了。”

确实，见到过张春桥的造反派群众或中小头头为数很少，有过这种机会的头头可以在人前引以为荣。杨对这个会充满了幻想，他说：“要我们去参加这个夺权的誓师大会，很可能张春桥对我们红工司是重视的，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的江青是支持我们的，还为我们流了泪，看来中央通告不是针对我们上海的。郭文美和王继鑫一直这样认为的。”

我听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唉！死到临头了，还这么高兴地去见将要宣判我们死刑的刽子手。我们工人的头脑是多么简单，多么可爱！我不去和他争论，要紧的是与其他常委们碰碰头，但直到会前也不见他们的影子，我真不知他们在鬼混些什么，看来他们是故意回避我。我只得同杨福海赶去文化广场，进场一看，前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两人只能在后面台阶式的看台上坐下。

我必须主动表态

这里集中的人物可说是上海滩上造反派的中坚骨干，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头头，一般的造反队员是不可能拿到入场券的。人们的心绪兴奋，不时有此起彼落的语录歌在会场中激荡，而我却情绪低落。我默默地向主席台上看着，就在两个多月前的 12 月 9 日，我们在台上召开大会，我是大会的指挥者，想不到今天却只能坐在台下的后排。一股物是人非的悲凉袭上心头，心中的预感越来越清晰告诉我，这个会对我们不会有利。

我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的：从走资派的手中夺权后，造反派掌权，成立新的政权，文化革命就要结束了，现在是在收的时候。运动要结束，就要纳入正轨，而我们是被扣上经济主义帽子的组织，我们不是“依靠”的对象，如果我们现在不宣布解散，硬是顶下去，就意味着对抗中央，变成被“专政”的对象，只要在今天的会上张春桥轻轻的一句话，我们的组织必砸无疑，我们这些头头去坐牢，而下面的基层队员必遭到比原来更惨的歧视和迫害，还不如不起来造反可能还好过一些。

可悲的是这些必定要出现的后果，我们总部的其他头头根本没有考虑过，比如在最后一次的常委会上，郭文美就慷慨激昂，口口声声为四十万红工的利益，要把组织保存下去，根本没有想到对抗下去的后果。不!绝对不能听任他们把我们四十万红色工人引向苦难的深渊!决不能让郭、王的主意来左右我们！警备区军官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他凛冽的目光在逼视着我，“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的声音在我耳边轰响。尽管感情上难以接受，但理智告诉我，“红工司”是到了该消亡的时候了。

想到这里，一股莫明其妙的冲动涌上心头：我个人要左右这个局面，坚决解散！这才是

真正的维护红工司的利益，在现阶段唯有这样才是正确的选择。我对杨福海说：“我去后台找王洪文去。”杨不解地问：“去做啥？”我说：“王洪文不见王继鑫，我去找他，看他怎么样？”

我转到外面，后台的入口被工总司的人员围得水泄不通，不管我怎么说，就是不让进，我只好退回主席台前，这里的保卫人员少得多，我亮出了我红工司常委组织部长的工作证，总算被我一直闯到台口，我对最后一个拦住我的说，我要见王洪文有重要情况面谈。他要我等一下，便上台去通报。

不多一会儿出来一位人物，就是我曾见过面的王腓力，他傲然地立在台上，问我要见王洪文做什么，我只得说为我们红工司有关中央通告的事要求面见。他说王很忙，不可能见我。那种高傲的态度我受不了，但是此时我不想和他论理，就说：“这样吧！既然现在他很忙，那请你约一个时间和地点，我们再面谈吧！”他傲慢地说：“王洪文很忙，有啥事，对我讲！”他仍居高临下地站在上面，一付不耐烦的高傲。

我的傲气也被激起来了：“不用谈了，请你传张字条给王洪文和张春桥吧！”他只得点头同意道：“那你就给我吧！”我打开包，取出纸条和笔写起来。他说：“你还要写起来啊？我很忙，快一点。”在他的催促下，我略思索了一下，极为潦草地写道：

王洪文、张春桥：我们对二月十八日通告已经在常委会上讨论过，我们对中央通告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分歧，有争论，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坚持解散。请作具体指示和安排。落款是红工司组织部长我的名字。我把纸交给他后就退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杨问我怎样，我轻描淡写地说：“他们不让我进去，我见不到任何人。”搪塞了过去。

张春桥的讲话

大会终于开始了，照例全场唱东方红，唱语录歌，接着是打倒和万岁的口号。

这时的王洪文的地位尚不明确，仍然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今天的会上还只是陪衬，会议开始后，先是姚文元简短的发言，后面是张春桥的长篇发言，会场中不时有雪亮的灯光扫来扫去，这是电视摄像机在转播今天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台向全市播放。各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革命群众集体收看。（六七年，电视机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只有工厂、单位才有电视机。在文革中全市性重大会议，经常用这种形式实况转播，集体收看）

张春桥的发言，不时被狂热的造反队员的掌声和高昂的口号声打断。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成了中国的大红人。他的发言中不时插进诸如此类的话："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向我们说……"，"毛主席还说……"，"所以毛主席说……"，"毛主席还讲……"，后来干脆说："主席说……"，"他说……"。张春桥的这些语句给人一种印象：他经常与毛主席在一起共商国事，是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当然，在 1 月底，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事件后，张仍屹立在中央和上海的显要位置，就已经提高了他的身价。因为那时在文革中从中央文革的组长陶铸到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中央的老一辈人物，凡被红卫兵小将点名炮轰的，全被掀翻而无一幸免。因而，张春桥的存在就说明了毛主席对他的信任。聆听这样一位从伟大领袖身边来的人作报告，热烈的掌声和狂热的口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张春桥的那次讲话很讲究策略，听得出经过了精心的推敲。我听了以后，经过脑子的"翻译"和重新表达，就成了如下的话：

张春桥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夺权，该是什么样人夺呢？你大学生红卫兵不能夺，没有我认可的工人组织也不能参加夺权，就是夺了，我也不承认，要由我认可的人和组织组成"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支左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才能夺权。他特别强调："主席那个时候就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领导城市一个市，还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那天就说，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主席甚至于讲，我看当个系主任也不行"。

张春桥用毛主席的话排除了学生，那么再要排除谁呢？三结合之一的老干部是要的，像陈丕显、曹荻秋只能是打倒的对象，当然不能结合，老干部中听话的马天水是要的；工人组织呢？要听话的嫡系，那只有王洪文了；其他的杂牌要清除，就连工总司中的耿金章之流也要排除在外。

大谈夺权后，第二个问题是扫清夺权道路上他认为来抢"果子"的人。这当然要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人，他说："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机要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

他明白无误地用了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概念，怕我们钻字眼顶着干（就像王继鑫、郭文美那样对文件的理解），他在谈了小学中学的情况后突然话锋一转："这些文件，里边象'红色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执行。"

好了！再明白不过了！我们的确只有解散这一条路可走了。他特别用了"红色工人的文件"，这只能是指我们，北京的"全红总"是不用"红色工人"这一称呼的，用临时工、外包工和"红色工人"名称的，全国只有我们上海。

当初，我发明这个“红色工人”名称的本意是为了既有别于工总司，又强调临时工外包工也是工人阶级。想不到“红色工人”成了上海临时工、外包工的专用名词。名称的改变，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尽管我们提出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是与工总司并肩战斗，并的确给予了工总司很大支持，我们也努力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步署，努力做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但今天被“春桥同志”轻轻的一句“红色工人的文件”就把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否定了，轻巧得就像掸掉衣服上的一根头发一样。

好在张春桥只是这么轻轻“点”了一下，没有用刺激的语言。我想，他心中必然明白，我们在他眼里固然是“杂牌”军，但毕竟是仅次于工总司的第二大组织，所以还是给点不明不白的压力，让我们自动解散，否则一旦闹起来也够麻烦。所以，他虽然在后面的讲话中又批了不少其他的杂牌组织，像什么上山下乡的知青组织、农民组织、支内职工的组织，连因为公墓被掘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都被一一点到，就是不再涉及我们红工司。我不知道我递上去的纸条他看过没有，是不是看过以后，他有意高抬贵手，让我们下台后的日子好过些？

移交陈其炜的房产

张春桥的一句话，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再也没话可说，只得同意解散，一切烟消云散，真正的树倒猢狲散，所有的人员一哄而散，在以后的几天里，总部已经没有人管了，殷庆宝同王继鑫商量后，在那间堆放抄家物资的房间门上贴上封条，拉上我们几个常委一起在上面签了名。实际上，这间房的房门钥匙，就他们两人有，我一直小心从事，有关财物的事尽力躲着，没有牵连一身轻。

接收的单位没有来，我们由殷庆宝安排，轮流值班，我同马仁来被安排在最后一夜，那天我准时去了，在五原路口的一家熟食店买了几样菜（其中有骆驼肉，我称了半斤），又买了一瓶黄酒，我们俩人在冷清清的总部中，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喝不出味来，话也说不多，在悲凉的气氛下很快就喝醉了，倒头就睡，天亮一醒就走。

这是我在这幢房子最后一次过夜，几天后的三月六日，我厂内的造反队通知我去这幢房子办理抄家物资的移交手续。

这幢房子原来的主人叫陈其炜，广东人，是在上海做房地产的资本家（我曾在顶楼的房间中看到一整箱的房屋设计图纸，可见其当初生意做得很大），大概在公私合营的 1956 年，他或者他的子女安排在上海房地产系统的乍浦路房管所工作，所以今天这些财物由乍浦路房管所来清理，他们通过组织系统，逐一通知了在封条上签字的每一个人，要求到场一起清理。

我按时赶到，而我十天前的“同僚”们却一个没来，时间过去了一小时，仍不见他们的影子。心中无鬼的我老实奉召前来，家离这里近的咫尺的殷庆宝却不见。那位房管部门的同志等不及了，只得决定开封条进去。

在清点中我算开了眼界，有一架小巧的屏风，是红木的，每扇屏风都是用翡翠、玛瑙制作的古代仕女图。各扇屏风的仕女图可单独成画，屏风拉开又连成一个整幅画屏。这大概是古代官宦人家深宅内院的妇女生活图，栩栩如生，真太美了。他们请来了广东路文物古玩市场的内行来鉴定文物，据那老人介绍，这是明朝年间的文物，价值连城，是他向我指出那是翡翠，那是玛瑙，用这些东西镶嵌成浮雕式的画，那老人说，这样的文物是极罕见的，传世不多。

我端祥着这架屏风，突然想起，在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怎么没有把这架价值连城的古屏风砸碎呢？这不是名符其实的“四旧”吗？我想大概这些红卫兵也被这幅艺术珍品迷住了，这些古代美女让人下不了手，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

清点结束了，要我在一张清单上签名。签就签吧，反正在场的人都签，我心里踏实得很，怕什么。在一式几份的清单上逐一签过名后，他们也给了我一份。

现把这份清单中的文物部分抄录如下：

1.古屏风 4 扇（长形）　　2.古屏风 2 块（横形）

3.文物橱 1 只　　4.磁器 2 件

5.木座 3 只　　6.木盘 1 只

7.景泰蓝盘子 1 只　　8.茶盅 1 只（大清乾隆号）

从这张清单看出这样一些问题：

一、文物物橱是一只极为老式的衣橱，那么，原来有没有与此配套的家具呢？

二、三只木座本身是精美的文物。那原本在上面放置的文物必是更为贵重的文物了，文物呢？

三、茶盅只有一只，按说应是成套的，不可能只有一只

从这张清单看，上述文物是残留下来的小部分，其余的文物在哪个环节丢失了或砸烂了呢？

文革抄家，使文物流失或灭失，从这可见一斑。

2 月 24 日大会后，总部解散，大约在月底吧，我们这些总部的常委被通知到市工人文化宫去接受审查。

接受第一次审查

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我们审查的组织名叫“反对经济主义总部”（经济主义的帽子从开头一直扣到解散），这是刚组成的一个专对解散组织进行财务检查的机构。他们令我们到工人文化馆接受审查。我们一伙在门口碰头后，一起上楼。那些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把我们似俘虏一般对待，他们把我们赶到一间堆放杂物的大房间内，把积满灰尘的桌椅拖出来，让我们这些“俘虏”坐在屋中一角，令我们写坦白交待书。

这时，我们尚假四十万红工头头的余威，对他们的吆五喝六，狐假虎威不予理会，以郭文美、殷庆宝为首，谈笑风生，神侃海聊，逍遥了几天。而李衍清拿着帐册在另外的地方同他们一起查帐，经过几天的检查，结果是我们在财务上无可指摘。

这不能不归功于李衍清！是他严格把关，建立了一整套正规的财务制度并严格遵守。这恐怕是在上海的造反组织中绝无仅有的吧？

最后一天，要结束这白天软禁生活了，这些检查人员不得不说，我们的帐目清楚，没有违反财务制度，没有乱花钱。他们原先认为我们至少在报销“误餐费”上必定有问题，想不到我们报得极少极少，这点完全出乎他们意外。因为其他组织在这上面是一个大漏洞。他们还悄悄告诉我们，工总司的帐目才混乱呢！

听到这么几句话，心里有一种阿 Q 式的快感：你工总司算什么？

现在想想，文革中的造反组织，是一种“胡作非为”的组织，但不是所有的组织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胡作非为（比如，我们红工组织在财务制度上的守规矩），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什么力量促成的呢？要知道，文革中没有一个文件是要求组织要建立财务制度的。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

这一百天的造反生涯结束了，我重新回到工厂去做工。

第二十四章 重拉队伍

我骨子里不是造反派

人的命运实在难以捉摸，一星期前我还可以调动数以十万计人马，做前呼后拥的造反头头，一夜过后，我手中的权就被剥夺了，接着做了几天快乐逍遥的白天“囚犯”。我从工人文化宫接受审查出来后，就立即回厂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当我重新站在平洗车的出布岗位上时，似乎感觉我昨天还在生产岗位上，一百天的辉煌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过去的一百天里，我隔上一段时间回厂，总有不少人围着我，而现在只能顾影自怜了。看来人的价值也是“随行就市”的。

我的顶头上司带班长——一个老泰兴，人称“大梦”的老好人（因为他口头语好用“别做大梦”来告诫工人要认真工作，一天不知要说上多少句，故大家尊称他“大梦”）。我向他报到，说我回来了，请他安排工作。

他笑了起来：“别说梦话喽。”一口浓重的泰兴话。我说真的，旁人也证明说这是真的，他才点点头：“回来好，回来好。”遂把我安排在原来的岗位上。

现在，我满耳是轰隆的机器声，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眼望流不断的从头上飘下来的灯芯绒布，晃若隔世。

这时的上绒厂，大权已经被工总司造反队夺下，上从党委书记厂长，下到车间支部书记主任，全部“靠边站”，（靠边站是指当时的当权者——党政领导人从权力座位上下来，交出大权，这是从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一位排长的口头语取来。）上上下下掌权的人物都换了马，现在掌权的头头们，其中的有些人，平时的所作所为和人品是令人摇头的。（我们车间的造反队头头，就是原来被我口诛笔伐的人物。）他们在忙于召开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大会，批党委书记，批政治部主任，批车间支部书记。

说来我这个人也真是“贱骨头”，当我看到现在掌权者们的“胡作非为”之后，我又不安份了，我头脑中受共产党教育的正统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我要为当权派“靠边站”后被批斗的过激行动鸣不平了。剖析我自己，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正统的思想始终左右着我的行动，在我的一百天的造反史中也处处可以看出，我无所谓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我只是一个受共产党传统教育出来的信徒，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其根源是由于我的不公平的遭遇。但我从心底里却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为了建成一个真正的完全按毛主席教导的、完美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官僚主义，没有不公正，一切为人民服务。

这时的我认为，让现在这些人掌权是破坏了党的领导，是坏人掌权，不能让这些人掌权。相对来说，我在感情上同“靠边站”的人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批斗会上大胆地指责造反派头头。当然，要指责他们，就要有政治依据，要有“武器”，“武器”是简单的，首要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譬如用得最多的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也不是党的领导。另一个“武器”是当时的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对这些社论认真读上两遍，用有关的段落和提法，再结合本厂的情况，来指责他们，打击他们。譬如，用：“党的干部 95%是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用来保护我认为要保的原当权者。虽然批斗会上只有我一个人唱唱“反调”，但往往由于我这么一冲，再有人附和，气氛就被我破坏了，要么草草收场，要么不敢为所欲为地批斗。

我不光是在批斗会上发言，在会后，我经常铺开白纸，提起毛笔，饱蘸浓墨，仔细回忆会议过程，抓住某一头头的一言一行，用大字报，上纲上线，大批这些混蛋。

我在工总司造反队一统天下，夺权在手的气候下，用大字报公然称他们为混蛋头头，其轰动效应是震动全厂的。当然，我注意立论牢靠，用新出的社论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记得我用了一篇当时出的社论《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来打击他们，打得他们那个痛啊！他们原来是在四清社教运动中挨整的人，他们的造反动机可能就是因为吃了四清运动的苦头。而现在中央却突然出了这么一篇社论，太好了！立刻被我装在“枪膛”中放了出去，我用大字报称他们的造反是要推翻四清成果，为自己翻案，完全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这一棍把他们打闷了，他们暂时不敢开什么批斗会了，在群众中威风扫地。

我这种毫无顾忌的冲杀，虽然痛快，但是，结下了仇恨，为他们日后报复播下了种子。

垂死挣扎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我特别惦念红工的群众，惦念这几十万失去了组织依靠的队员们，也惦念着各基层组织的头头。

组织被解散，总部被接收，心灰意冷的群众大多数成了“逍遥派”，好多队员什么组织也不再参加。有些活动能力强的，不甘寂寞，投到工总司麾下，但是，在后来工总司的“内战”中，他们却成了牺牲品，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挨整了一段时间。

解散以后有没有掀起一点“浪花”的呢？也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卢湾区的红工分部人员，他们活动能力特强，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他们摇身一变，进入了工总司卢湾区联络站，还似乎掌握了该区的宣传大权，他们把红工司的《红色工人报》与工总司下的《卢工造反报》合并，改名为《无产者报》，报的版面和内容，简直就是原《红色工人报》，在三月九日的这期上，竟然发表了一篇《红色工人报告别读者》的文章。

他们在文章的开头，对于二月十七日的通告的态度是这样写的：“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红色工人的各项有关问题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我们全体革命的红色工人应该坚决响应，坚决贯彻这项文件，不折不扣地执行并做好这项重大的工作。”

这些“最亲切的关怀”、“最英明的决定”、“坚决响应”、“不折不扣地执行”等等的话总是要说的，就象大臣在跪接皇帝赐死的毒酒时，必定要说“臣领旨谢恩”一样。

接下来，文章把《通告》之后，各单位辞退大批红色工人，乘机对红色工人进行阶级报复称之为是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以及假冒革命组织名义的人的垂死挣扎。

错了！可怜的同志们！我理解你们如此措词，但这决不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或假借革命组织名义的人之所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早就被踩在脚下了，也没有这么多人“假借革命组织名义”，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御旨”的力量。实际上，垂死挣扎的正是你们，正是我们。

虽然他们改头换面，利用工总司的外衣，顽强地坚持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用最左的语言和赞美伟大领袖的词藻作掩护，揭露一些对红色工人歧视迫害的阴暗面。但这些人搞的时间不长，不几天就被“溶化”了，失去了他们的笔杆子。王洪文和张春桥是不会容忍红色工

人的存在的。

卢湾的这些红色工人，他们原是反对总部，与总部闹独立，另立山头的帮派团体，到了组织解散后，他们在工总司的旗号下继续为红色工人说话，其勇气可敬可佩。但是，时至今日，这些人的帮派思想还继续存在，在该期报纸上同时出了一篇“揭发红工总部一小撮常委的罪行”的文章。文章以整版篇幅，揭露了所谓常委们的罪行，内容大多是失实的，偏激的，有些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夸张了的事实，有的纯属造谣。这种兄弟相煎文章的出台，其效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口口声声为红工利益，但并没有大局观念，而是为他们小团体的利益，为小团体的头头们出了一口气，一口受了殷庆宝排挤打击的乌气。

在我厂里，我这保皇的角色一直在做下去，我不断有大字报贴出来，抱着一种轻松的、近似于游戏的态度，不断攻击造反队的批斗和和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笔墨游戏中，我一直处上风，一种胜利者的自我陶醉，使我出足了风头。

而这时的三、四月份，上海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委已经全部靠边，新生的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在执掌着全上海的党政大权，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已经全面瘫痪，工总司成了一统天下的掌权组织，从市革会到各区革会，到各系统、各基层，全部由造反队掌权。

但是，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外。

雄踞上海东北角的上柴联司和支联站

这个例外是上海柴油机厂。

有着上万名员工的上海柴油机厂，雄踞在上海东北角的军工路上。这时厂内有两派组织，对立严重。一派“上柴联司”在与工总司挂钩的过程中，不知何故，失去组织关系，没有隶属于工总司，后来他们就自成一体。而另一派“上柴东方红”却挂上了工总司的组织关系。据说“东方红”里干部较多，被大家视为保皇派，群众基础不及“联司”，但既挂上了工总司的关系，就得了势，两派的内战最后打到社会上，互相张贴和散发大幅标语和传单。

上海市民中普遍支持联司，并且形成了一股支持和同情联司的力量。这里面是不是有对弱者的同情呢？也许有。

我很难说清上柴厂两派组织争论的问题究竟谁是谁非，仅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联司的宣传舆论工作做得极好。一个万人大厂中的一个组织，能在大上海铺天盖地张贴大幅标语，是很了不起的，给公众的形象，它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反资反路线的英雄。广大市民从文革开展以来，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对官僚主义痛恨不已，对曾受过当权派压制、甚至镇压的造反派比较同情。但市革会却表态支持工总司属下的"上柴东方红"——实质上的老保组织，这样，市革会、工总司就站到了全市人民的对立面。这是不是有对造反队夺权后的失望心里呢？或许有。

人们有了支持联司的思想，上柴联司就有了群众基础。然而，掌了权的，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稳固，必然要压制这全市仅有的一个反对派——这个同工总司一统天下相比起来，似乎是徽不足道的反对派。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压制反而进一步激起了市民对上柴联司的同情和支持，对市革会的倒行逆施，深感失望，而这时又有一部份人，由于没有挤进造反队夺权的行列，促使他们转向联司。于是，在上海，各种同情、支持联司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股支持联司的政治风暴，各区各工厂，支持上柴联司的组织纷纷成立。以上海某汽车配件厂的陈卜昌为首，组织了全市性的"支联站"——上海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各工厂的支联站组织纷纷向陈的大旗靠拢。当然这些组织一出现，就遭到工总司的压制，但压制又强化了市民的造反心理。——上海滩，一个个"真造反"的组织揭竿而起。

这时，上海的临时工和外包工们，却在二月十七日的通告后，被大量辞退，在这生产萎缩、乱遭遭的时代，哪里会被及时重新安排工作呢？这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生活的艰难。

我关心上柴联司的命运，市民对联司的热情支持，支联站的出现，激荡着我的心扉。我收集上柴联司的宣传品，了解上柴厂的文革情况，有意在厂里建立支联站组织。而"临兄"们的命运又让人揪心，这时殷庆宝和王继鑫几次三番来厂拉拢我，要我为"临兄"们出力，重拉队伍。我考虑后认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能局限在厂内小搞搞，决定随殷、王去重拉队伍。

当我刚要离厂时，厂内一名"临兄"叫陈鹤鸣的来找我（我不认识他，由黎伯昂引来见我），随同来找我的还有电气间的一名电工、布机间的一名机工，他们开门见山要我出面，以我的号召力组织我厂的支联站。我告诉他们，我去意已定，无意在厂内搞支联站，但我可以帮助他们开个头。于是我拿出一些联司的宣传品给他们，又把其中的一张铅印的传单贴出去，下面落款写上"上绒支联站（筹）"，让全厂人知道，这支联站是我支持搞的。余下的具体工作让他们去作。我毅然离开工厂，重新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6743 秘密据点

我们这次的活动，称作“重拉队伍”，而不称作“造反”。这一称呼不知是谁定下来的，反正在这一圈子里，大家约定俗成。“重拉队伍”倒也很形象化，像土匪被打散后，重新聚集。美化一点说，像是共产党游击队，打散后，再聚集。

王、殷他们活动已有多日了，他们从管帐的李衍清手中得到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就是李在 1.13 事件后不断的“打、砸、抢”，怕在反对派砸总部的行动中，失去帐册，在愚园路 67 弄 43 号设立的秘密地点，把帐册隐藏在这里。这间房子只有李衍清一人极为保密地使用，故总部解散后，没有被收走。想不到他这个举动非但保存了完好的帐册单据，使我们安然通过了市革会的经济审查，而且又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活动场所。

这是在静安寺闹市附近的一条新式里弄，我们占据了二楼东面的一间，西面的一间还是房主人即资本家夫妇使用，在北面靠西的二间下房被一学生组织占据，紧靠北面的墙外另一幢花园洋房是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楼下的房子一间被封掉了，这是抄家时被红卫兵封掉的，另一间为房主人的起居室，下房是厨房。我们进出就走东边的门，南面的门是不用的，一直关着，南面的正门要通过小花园，才能进入楼下的房间。因为楼下的一间被封了，另一间为资本家使用，他们也是走东面的门进出，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进入过下面的花园中去。这幢花园洋房的西面是相连的同样式样的邻居房屋，邻居间花园之间相隔的是很矮的砖墙。我看了看环境很是不错，闹中取静，很像是搞地下工作。我就提出把这个活动据点称呼为 6743，这是从 67 弄 43 号定下来的，这个提议被大家接受，6743 的名称一直用到我们滚蛋。

在下房有个学生红卫兵组织，他们扯起了一面红卫兵的大红旗，每天有不少学生来来去去，吵得我们不得安宁，后来他们不知从那里搞来一套扩音器，整天不断地念语录，念他们的什么文章，播放革命歌曲，吵得厉害。我冷眼观察下来，这不是一个什么正宗的有势力的红卫兵组织，活动的主要人员就是一个人，其他的人看来是附近的中学生，有的女学生还那么天真稚气，相比之下，这个人就要比他们大好几岁，不太像学生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姓连叫树雄）。我们请他不要这样闹，他却口出大言，要我们“滚他妈的蛋”，照样每天开他的播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台现在开始播音……”。你看，他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别看他一杆大旗几个人，谁也奈何不了他。我们恨得牙痒的。

概说红卫兵

真有必要把当时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说一遍。那时上海的红卫兵最大的组织是红革会，响彻上海乃至全国的红革会，组织了 1 月 28 日炮打张春桥和 4 月 12 日的第二次炮打，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炮打后，开始走下坡路。还有一个组织是“炮司”，用了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做名字，这是一个人员不多，但战斗力很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的红卫兵组

织是“红东北”——上海红卫兵东北地区指挥部，因其活动在上海的东北地区，故称“红东北”。红东北的头头之一就是日后响遍全国的金训华。他瘦瘦的身材，黑黑的脸，身穿一身旧军装，腰束一根武装带，背挎一只洗得已经发白的军挎包，头戴军帽，帽沿下一双有神的眼睛，透出一股英俊之气。有天他到我总部来，对我们红工司被排除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甚感不平，但他表示无能为力，这青年一身正气，有正义感，对我们临时工的遭遇深表同情。金训华在文革的烈火中被锤炼成一个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后来他带头在“上山下乡”中去了“北大荒”，在一次抢救国家财产的壮举中，被无情洪水卷走牺牲，追认为烈士，中央号召全国的红卫兵、学生“向金训华学习”，画家创作出一幅油画，画的是金训华在与洪水搏斗的场面，这幅画的构思和主题被江青捧为文艺革命的方向，也成为全国的文艺界，尤其是画家学习的方向和样板。

既然在上海市区的东北方向有“红东北”，那么，相应的还应该有“红西南”。“红西南”的确有，但知名度及活动能量，远不及“红东北”。

北京有一个首都三司，上海学样，有一个“上三司”，在夺权中被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砸掉了，上三司的头头成了坏头头。

还有一个臭名昭箸的组织是同济大学的“同济东方红”。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上海人谐音称它为“投机东方红”，但因保张有功，挤进了市革会，分得一杯羹。

以上这些组织是上海有一定影响的大组织，至于各学校“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什么什么组织，多如牛毛，三、五个人凑在一起，从毛主席诗词中抄一个响亮的名字如“千钧棒”、“云水怒”、“风雷激”、“从头越”、“追穷寇”、“百舸争流”、“鹰击长空”等等，再发一个宣言，做一面大红旗，一个组织就出来了。一个人也可以成为一个组织，他可以叫“独立寒秋战斗队”。也有些大学里的组织名字起得神秘而恐怖，如“契卡”，那是苏俄秘密警察的名字，听起来瘆人。多如牛毛的组织互相打内战，争论不休，互贴大字报，国家的纸张、教师的血泪、他们的青春同时被消耗掉。

我曾在长宁区看到一个组织，叫什么“驱虎豹”战斗队，只有七、八个人，胆量却惊人，不知他们是偷还是抢，搞来一辆小吉普，横冲直撞，一身流气，今天找准一个目标去抄家，明天就上馆子大吃大喝，开着车子去游苏杭，钱用光了，再换一家去抄。当然，这样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成天打家劫舍的红卫兵组织是极少、极少的。

在我们眼皮底下的连树雄，就是一个极不正规的只有十几个人的红卫兵组织。一天，他的底细被我们摸清了，他不是什么学生，而是普陀区清洁管理站的一名临时工！他冒充学生，把附近学校一些学生召拢来，自己立为头头，并不断地“招兵”，欲成立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这一个骗子！

赶走小骗子

大家就推王继鑫和我，找他谈，劝他不要这样招摇，把这些学生散去，并请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却傲慢地提出，由他做头，要我们听他的。这个狂小子，算了，由他去吧！

不料，有一天他竟带着几个人，声称是奉了市革会的命令，要我们解散滚出去。我不由大怒，拨出拳头，把他痛打了几拳。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学着革命电影中英雄的样子，慢慢倒在地上，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又装模作样地对他的几个同伴说："你们要誓死捍卫毛主席，你们要记住，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然后头一歪，假装昏死过去。真恶心！我心中明白，要害部位一拳也没有打，能死吗？真他妈的！

他装死倒也讨厌，我指指扩音器对王继鑫说："把这吵人的扩音器砸掉算了，看他是真死还是假死，砸坏了看他拿什么去还给人家。"因为我曾听说，这东西是连树雄这小子向什么单位借来的。王继鑫就故意吆喝起来："把扩音器从楼上扔下去！"这一招挺灵，这家伙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扑向扩音器，把铁壳的机器抱在怀里，王继鑫故意去和他争抢，他护着机器夺路而逃，我们就顺势把他的东西都扔到外面，他带着人，拿着东西落荒而去。

好了！他的这间屋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我高兴地收拾打扫屋子。郭文美说："你火气怎么会这样大，我真怕呀！万一真的打坏了怎么办？"我笑起来："我又没打他要害部位，只是打了几拳在他的肩上和背上。这个冒牌反倒要赶我们走，不这样对付他，难道真要我们走吗？"

王继鑫得意地从口袋中摸出一只电子管："这家伙抱着扩音机时，我假装和他抢，顺手拨了一只管子出来。"他顺手把管子望垃圾堆一扔，大家哈哈哄笑起来："这只扩音机响不起来了，看他还怎么嚎叫！"

这个骗子被我们赶走后，清静了不少，我们开展活动也方便了，不再怕被人知道我们的内幕。

红工群众向我们聚拢

我们在这里活动的消息很快在红工中传开。我又通知原来的各分部头头召开会议，当然这些人的名单，我事先经过研究，把认为靠得住的，能积极工作的找来。我想依靠这些人，利用原来的组织层次，以便重拉队伍的活动可以较顺利地开展。

对于那些原来是反对派的人，我没有派人去接触，但蒋瑞根还是找上门来了，他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表白了一番，说过去的事错了，不该打内战反对总部，没有团结一致，造反失败了，他要求我们收他下来，一起重拉队伍，他的表演确实打动了郭文美的心，但我和殷庆宝很冷静，对于蒋瑞根一直冷淡待之，既不推他走，也不安排工作，把他冷在一边，所以后来他觉得无趣，渐渐来得少了，最后不再来了。（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的心胸太狭隘了，没有既往不咎胸怀。这也是“草头王”们的通病，我们无法做到毛主席统一战线的气度。）

经过几次召集，我们终于把各区的头头全部联络了一遍，在这基础上，我还在杨浦区的一些大厂中活动，暗暗联络原来的基层头头和积极分子，不过，我们之间的联络还仅仅停留在这些头头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组织，就不能把他们捏起来，工作也只能限在联络而已，特别是对于一般的群众，如果没有一个组织，他们只能是观望，不能期望他们做什么。

那么，把原来的红工司大旗扛出来？

谁也不敢！起码是时机不成熟，只能招致失败。原来我们可以高呼口号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但现在是毛主席批准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在掌权，你能造反吗？有几个脑袋？浅显的道理谁也明白。经过不言而喻的讨论，我们把组织的名称定为：“上海市批判两种劳动制度联络站”，以批判刘少奇这个名正言顺的面目登场。

我们以原红工司宣传部中姓姚的工作人员为主，由他负责，出了一份不定期的油印小册子，散发到我们的群众中去。在小册子中，我们把刘少奇历年来在各地的干部会议上和视察各地时的讲话中有关使用临时工、合同工的言论，选编出一些最“有问题”的话，一段一段地摘抄，不加我们任何观点，仅在封面点明我们的意图：刘少奇推行的两种劳动制度究竟是什么货色？并且画上一幅漫画：一只巨手握一枝巨笔，对准刘少奇的大鼻子，而刘少奇手脚朝天被批判在地。就这样，我们以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合法身份，从地下转到半公开的政治斗争中。

（在红工司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些刘少奇详实的言论材料，还不知道有这些材料，只朦胧知道临时工制度是刘少奇搞的，文革进行到这时，市劳动局的干部也造反了，把这些刘少奇历年有关用工制度的讲话，作为大批判资料印发出来。）

接下来，我们租借了长宁区工人俱乐部的剧场，召开了一次批判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的

大批判会，我们把入场券分发到各区的积极分子手中，一千多人的会场居然坐满了。他们大多是抱着希望来的，以为我们要正式拉起大旗，也有些人是抱着看一看的观望心理。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大会的发言内容，全是空洞的小心翼翼的判刘文章的照读，而且对我们原来红工司的往事只字不提，绝不涉及一些诸如重拉队伍的实际问题，我们这些头头也不在台上照面，直到最后也不见王继鑫、郭文美的影子。这样一来，对群众的热情反倒是泼了一盆冷水。我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开始看到坐得满满当当的人很感欣慰，但随着与会积极分子情绪的低落，我的心也逐渐冷了下来，最后批判会就冷冷淡淡结束了。

我上台和工作人员默默地收拾东西。昨天晚上大家布置会场，写标语，拉横幅，热情高涨，有说有笑，干得很晚也不说累，而今天却沉闷得很，我也非常的失望。

原先在计划这个大批判会时，王继鑫把领导班子明确了一下，我、王、郭、殷四人退居后面，公开的班子为朱力军等原来几个总部的工作人员，再加上一个满头花白头发的刘俊。朱力军和刘俊两人非常高兴，他们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次大批判会的组织和安排，全部由郭文美和搞宣传的一班秀才们写大批判稿。至于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有什么行动安排，没有明确过，谁的心中也没有底，谁也无法预料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我再次被他们推了出来。但我对于这种形式的重拉队伍，信心并不足，积极性也不高，我心里想的是另一步棋。

我想的另一步棋

这时“支联站”的气势咄咄逼人，联司和支联站已成气候。我的观点完全倾向于上柴联司，我非常想同上柴联司、支联站联合起来，在大联合的过程中，拉起我们的队伍。我不赞成郭、王热衷于批判两种劳动用工制度和急于去维护临时工的利益。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两点突得太出就仍然会被人们、特别是被“上头”认为是“经济主义”组织死灰复燃，那样就失去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最后又会被迫解散。如果组织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当前，用能够存在的红工拉起队伍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大概可算是我们之间的“路线斗争”吧！

然而，郭文美认为这个会成绩很大。她陶醉在这微不足道的“胜利”之中。她以我们这个圈子的中心自居，经常把我们的聚会约到她的家中。她的家住在 49 路到底的东安新村。柯庆施在上海时，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一些领导同志迁居到东安新村，名为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这里的新村比我们杨浦区的新村要安静得多。我们常在她家聚会，由她滔滔不绝地发表高论。她拿出在安庆日报当记者时的文章剪报给我看，又告诉我，她的一些写作技巧是师承《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我经常看到她与王继鑫在呕气，见我来了，就马上装着什么事也没有，与我谈笑风生，有意把王冷在一边。有时看去大概他俩刚大吵过一场，郭一时还不能“若无其事”，她就沉着脸，吸起烟来，连我也一起被凉在一旁。

郭文美的家中就她一人，我从未碰见过她的丈夫。据她说，她的丈夫是吃体育饭的，参加“上体司”造反，与丈夫感情不和，在闹离婚。他们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还没上学，小孩放在新闸路的外婆家。有次聚会我去得最早，我不识时务地问起她丈夫在哪里，怎么我从未碰见过？这个问题大概触到了她的伤心处，她竟幽幽地哭泣起来，哭得那样惹人同情，也就在这时，我才发现她还有女性共有的柔弱，一反她平素争强好胜的样子。平时她自称，喜欢吃政治饭，要搞政治，做一个女政治家，活脱一个女强人。现在面对哭泣的她，我不知所措，进而害怕，如果这时殷庆宝等人闯进来，他们会怎样想？

似乎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逃！逃出去！我出门骑上自行车就逃，在马路上转了几圈，有意拖了约半小时才返回她家，这时她已恢复常态，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时殷庆宝笑嘻嘻的也与我前后脚进来了，我舒了一口气，轻松了许多，天哪！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女人在我面前这样的幽幽地哭泣。

有几天她和王继鑫似乎有什么事瞒着我，他们从联络站出去，说有事要办，一连几天都这样，我也不去过问。一天，她召开我们所谓的核心开会，吸着烟，一脸严肃，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和王继鑫去了几次市革委的群众运动组，为我们这个联络站取得市革会的承认而奔忙。市革会下分为工交组、教卫组、群运组等几个组，分管全市的政务。群众运动组——群运组是分管上海的各群众组织的，组长就是有名的游雪涛。此人在五十年代曾在我所在的厂里工作，过后调上海青年报工作，在文革中为张春桥收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的情报，在当时赫赫有名，武康路 2 号就是他的据点。

郭文美这几天神秘活动，结果都一次次碰壁，她在这样的局面下，才公开她的活动情况，要我们一起随她去群运组，说约定游雪涛第二天下午与我们见面进行辩论，去的人数尽可能多一些。

在“群运组”碰壁

第二天有十多人随她去了。群运组在四川路近延安路口的一幢大楼内，进出的人很多，显出杂乱而繁忙的景象。她熟门熟路地把大家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门口，把里面的工作人员喊了出来，里面的人出来一见是她，又见我们来了那么多人，就很不客气地说：你们是临时工造反，是经济主义组织，应该按二月十七日的通告解散，不可以再成立什么组织。

我们就以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为名，说明我们红工司解散后，还没有组织在开展这方面的大批判，我们这个联络站不同于过去的红工司，我们要积极地进行大批判，把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批臭批倒。这位工作人员冷冷地说，你们可以回原单位去进行大批判，根本没

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我们就强调，没有这样的组织，各单位就不可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据理力争，要求游雪涛出来见我们。

想不到各个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一哄而出，谩骂我们是为私造反，是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是中央明令禁止的组织。我们极为气愤地说，你们这样污蔑我们，就是几个月前，老保、资反路线的执行者谩骂革命造反派的语言，你们倒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们是钻进市革委的资反路线的代表。——这样你来我去，气氛越来越紧张，楼上的人越来越多，乱成了一团，一片谩骂之声。

突然，从楼下冲来几十名红卫兵，（从他们组织有序的情况来看，是群运组召来的。）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声称要把我们这些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们当然也不示弱，要求与他们辩论。这时就听一声"打现行反革命"的口令，红卫兵仗着人多势众冲上来，把我们往外推，只要我们犟着不走，拳头就打上来，使我们本能地向后退，我们退，他们也就不打你，你们只得一面退，一面嚷嚷着："市革会群运组不讲理！"就这样被他们赶了出来。

公开合法活动的梦破灭了。郭文美和王继鑫的"路线"走不通。

这时的上海，与我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上柴联司的活动已经深得人心，他们在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在人民广场，每天晚上拉上柴油发电机、电灯、扩音器，进行有血有肉的宣传、辩论，搞得如火如荼，形势的天平似乎倾向了联司，各单位的支联站乘势纷纷成立，支持上柴联司已成燎原之势，大有与工总司分庭抗礼、重分天下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观点开始被大家接受。不！不是我的观点被他们接受，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这条路可走了！所以，在会上大家明确同意了我的观点，并由我去上柴厂同联司联络。

王才生和他苦难的家

讲支联，就必须先讲这么一位人物。

我手下有一位在上海机床厂工作的临时工王才生，四十岁左右，他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妻子患癌症，常年卧病在床。他家住在杨浦区的一个典型的工人新村——鞍山新村，在底层最东头的一间。进门的左手是他们夫妻的床，床横头是一只破旧的五斗橱，靠窗是用木板搁在两条长凳上的木板床，是孩子睡的，床上是凌乱的灰不溜秋的衣被，床下塞的是木板衣箱等杂物。两床之间靠一张老式的八仙桌，桌上是一些碗筷和罩在纱罩内吃剩的饭菜，吃

后的碗筷还没有洗，……。这是一个缺少了健康主妇的零乱、肮脏的家。

我每次上午去他的家，（他每天是上长中班），他不在时，那位卧病在床的妻子，躺在床上，睁着无神的双眼，抱歉地请我坐，说："你自己倒开水吧。"我无法忍心在这凄凉的景象里坐着等她丈夫回来，总是匆匆地把要交待的事对他妻子说完就走，她妻子总是说："好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他妻子是那样认真，我要通知王才生参加的会议，或交待要做的事，他从来没有因为与己无关而不去做。她绝症在身，还是那样支持我们的工作，实在难能可贵。到了 8 月 4 日，上柴联司被"踏平"，大批支联的人被抓，他丈夫也未能幸免，本来凄凉的家，更加惨不忍睹。这位平凡而不平凡的妇女不久去世了。几年后，王才生重组家庭，同另一家庭合成一个家庭，两家的房屋"两调一"合并起来，但数月后，他同他的两个孩子被女方一家赶了出来。他自己的家没有了，只能带着孩子生活在厂里。拖了几年，他才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厂里给他分配了房屋。

我那时曾在核心会上提起他家的困难，经大家一致同意，从我们少得可怜的买纸张的经费中拨出 15 元，交给王才生，聊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没有经费的活动

那时我们是在受压制的情况下起来重拉队伍，大多数人离厂后，已经没有工资可领了，有的人在二月十七日通告后的大辞退中已被厂方辞退，失去了工作，断了经济收入。（我这次离厂后的前三个月，每月还拿到四十多元的工资，后来厂里的造反队，停发了我的工资。在前三个月我多少还要留一些家用，再维持每天在外的三顿吃。那时我们每天在静安寺愚园路边上的一条弄堂内的合作饮食摊上吃阳春面，或者到愚园路华山路转角的绿村饭店吃冷面。每天吃冷面，吃得见了冷面就怕，干干的冷面在舌头上的感觉是麻，酸醋不是酸味，是苦。六分七分一两，一餐吃三辆或四两。）

我们的活动经费也根本没有来源，不像在红工司那时，能得到市委的拨款，工资在单位照拿。这些宣传用品、油印机等哪里来呢？小册子的印发要纸张，开大批判会租会场要出租金，在山穷水尽，连自己吃饭也困难的情况下，只得全体一致作出决定：从红卫兵查抄封存的资本家的财产中，拿出一点东西去旧货店寄售变卖后，充作经费使用，我曾被分配把一只电风扇送到淮海路"国旧"去，用我的工作证去寄售。

有天我与王继鑫从绿村吃了冷面出来，带着嘴中的苦味逛马路。夏日晚上的静安寺，车来人往一片繁忙，天热了，一些少女少妇身着当时式样保守的短衣短裙和塑料凉鞋，悠哉游哉地在漫步。望着上海夏夜所特有闲适，在这里似乎不存在什么文化大革命，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犹如梦幻般遥远，现在重新回到尘世里来。这时

我看到有两名少女手持几束鲜花，笑嘻嘻地迎上来，她们身穿稍高于膝盖的裙子（这样短的裙子，是离经叛道的装束，够大胆的）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以男子为目标，兜售怀中的康乃馨。鲜艳的花朵，迷人的微笑，甜糯的言语，打动着你的心。但她们没有忘却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怀中之花，是文化大革命的违禁品，少女流转顾盼的双眼，不是濒送秋波，而是警惕地注视着周围，时刻提防造反队或"文攻武卫"，她们行动敏捷，向你兜售的时间，决不超过半分钟，仅以三言二语，无论卖买成与不成，立即以极快步伐离去，很快走向马路对面，隐没在熙攘的人群中。她们就像仙女一样，飘忽而来，缥缈而去。王继鑫禁不住在我耳旁轻轻地说了一句："真让人动心啊"!

静安寺与上海的西南角相邻，这里可说是上海资产阶级住宅最为集中的地区。静安寺的夏夜，温馨而甜美，使人忘却了残酷的政治运动。但东去仅几公里的人民广场，这时却人山人海，集中了上海的叛逆者。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司"战士，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开出宣传车到人民广场，带上他们厂出产的柴油机，大卡车上的柴油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把广场的一隅照得雪亮，高音大喇叭发出联司的声音，宣传联司的观点，揭露上柴"东东江"的罪行。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化名叫全向东的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支持联司的革命行动。他的演说是那样的鼓动人心，引来了一阵阵热烈而发自内心的掌声。上海人民支持上柴联司的声势越发浩大。

我正式明确机床厂的王才生作为我的联络员，建立我们同上柴联司之间的联系。王才生是机床厂支联站的成员，机床厂和柴油机厂都是军工路上的大厂，军工路一带的工厂基本上是支持联司的势力强。出乎我意料的是，经过王才生多次联络，上柴联司却迟迟没有表态，显得非常慎重。

与上柴联司面谈

他们终于约我去上柴联司商谈，那天我在王才生的陪同下前去。我们到了军工路上柴厂，在厂门口等候时，我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这时的上柴厂，"东方红"及其所有成员已经撤离，仅是联司的人员在坚持生产。在厂区的中央大道两旁贴满了巨幅标语，"誓死捍卫……""用鲜血保卫……"的标语使人看了心惊肉跳，似乎使人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和血腥气，似乎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厂门口有七、八个人在徘徊，内中有一位穿裙子的妙龄女子，一脸的愁容，她焦急地对同事说，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回家了，而她的家，必定要到五角场换 55 路车到外滩，而后才能到家，而这时上柴东方红的人就驻在外滩的市革会大楼内。她怕到了外滩被东方红的人发现抓去，但又太想见她的妈妈，她的妈妈也必定为在她担心。这位美丽的女郎，徘徊在厂门口，诉说她内心对妈妈的思念，焦急中不时流露出对"东方红"的痛恨，而她的联司身份，又使她对自己组织的观点执着坚定。我望着她的身影，既同情她，又对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钦佩不已。我想，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处在花季的她不正该是同恋人漫步在花前月下的时候吗？

联司的人员出来，把我们领进厂区一直到联司的总部，一位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青年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联司的常委之一，厂团委书记。他说，他们的头头杨冲池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同我见面，并说他们对于今天的见面，是经常委会讨论过的，受常委会和杨冲池的委托，由他来接待我。

这位青年善于言谈，他简洁地向我介绍了联司的处境，大意思：联司受到压制，不得已才杀向社会，在上海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和同情。联司不敢走错一步，错走一步就有被以反对新生的市革会的罪名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为了对几千名联司战士负责，他们经郑重研究后，认为在目前不可能与我们联合起来，因为如果联合起来，将会进一步导致联司的困难。

好一番有眼光，通情理，讲策略的话！

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困难处境，我们可以等待，但是根据我同王洪文几次打交道的经历来看，我们不能寄希望他们会发善心。我介绍了过去我们同工总司"并肩战斗"的历史，王洪文在需要利用时，可以称兄道弟，现在他却在各种场合攻击污蔑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搞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正式打出红工司、上柴联司、支联站大联合的旗号，我们必须以实力来与王洪文对抗。

他听了我的话后，心情沉重地说："东方红撤出上柴厂是一个阴谋。我们得到情报：工总司要血洗上柴联司。我们不得不为几千联司战士负责，每走一步都要谨慎从事，权衡再三，我们联司战士每天坚持在车间生产，为的是不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他表示个人同意我的观点，但他不能违背集体讨论的决定。想不到这青年人如此练达，真不愧是万人大厂的团委书记。

"血洗上柴联司"？怪不得在厂区中央大道上，联司刷出了气氛悲壮的标语。血洗？怎么个血洗？我还停留在去年康平路赤手空拳解决赤卫队的概念上。

接下来他把话题扯开，向我介绍联司的发展过程，他说，联司是联合了厂内最早的一批造反组织，很早就与杨浦区工总司组织挂钩，但是厂内的老保组织"东方红"却抢先与上海市工总司挂上了钩，这样一来联司却被推出了工总司组织。他又说，"东方红"中干部参加不少，是赤卫队的翻版，是老保，而联司是全厂最早的一些分散的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的，革命干部参加的也不少，但这些干部大多受压制，他们同广大群众一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坚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把上柴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握手道别时，他再三表示歉意，为了几千联司战士的政治生命，不能贸然与我们联合，他说，如果只是我们这些头头被打成反革命也就算了，但无论如何不能把组织打成反革

命组织而使数千革命群众遭难。

我由衷的对他表示敬意，表示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两人一致同意，今后我们加强联系，继续由王才生作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进行联络，相互支持。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局我一点不感到意外，一次见面不可能达成联司与我们组织以及支联站联合的重大决定。但我想，大联合迟早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会接受我们的意见的。

这次上柴联司之行，使我感触颇深，我亲眼看到了他们高昂的斗志、坚定的信念以及有效的组织工作，上柴联司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群众组织。虽然没有见到他们的头头杨冲池，但这个年青的团委书记已经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他们的核心必是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他们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和组织能力已经能与大集团军的将领相媲美，他们不愧是优秀的工人领袖。现在青云直上的工总司王洪文之流与他们相比，只能算是粪土而已。

我们走出联司，到厂门口，那位想回家见妈妈的少女已经不在门口了，不知她是不是回了宿舍。我有点怅然，我很想护送她到外滩，因为反正我们是同路，我不信有人会在马路上抓人。刚才我为什么不同她讲明，让她等一等呢？

我把上柴之行在常委们碰头的时候作了详细的汇报。

这次上柴之行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我们在上海支联大潮涌动的形势下，仍加紧了重新打出旗号的准备工作，我们召集各区头头的会议越来越频繁。

支联形势

这时的上海，上柴联司在人民广场每夜的集会越来越热烈，反工总司、反市革会的味道一次比一次强烈。市支联站的声势已经非常强大，上海市民的同情心和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上柴联司。市革会、工总司的威信如日落西山。市革会越是对联司进行压制，越是激起市民的反感，舆论对联司的支持越强。上海市民的逆反心理，占了主导地位。

形势，对我们的发动工作更为有利，我们原有的群众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上海经历了六六年下半年翻天覆地的大乱，六七年的“一月革命”的夺权，到了六七年二月，文革似乎大功告成，相对来说形势处于平稳，想不到六七年七月份又涌起了浪涛，涌起了一个对市革会、工总司一统天下发起冲击的真造反。上海的形势再度陷于混乱和紧张，不但人民广场每天的人群有几万之众——清一色的支联观点的群众，而且在工厂内，在各种公共场合，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会自发地发生辩论，争得不亦乐乎。那时许多家庭也为此经受了一场考验，往往在一个家庭里，为了支联观点和工总司的正统观点，夫妻反目，各走各的路。

上海处于一场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一场争民主的前夜。

上海的形势是一锅将开的热粥，在全国，围绕革委会的成立，各派力量为了权力的再分配而武斗迭起。近在身边的南京，江苏省革委的成立，使南京形成了两大派。在省革委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组织就抬出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没有挤进革委会的就说：好个屁！遂形成“好派”和“批派”（简写成 P 派）两大组织。（各地成立革委会都无一例外地用毛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好”这条语录。实际上这是他老人家在纠正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批示中的一句话：“这个权力机关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们从中断章取义，成了一句对所有革委会的赞美词。）在南京的上游武汉也形成了两大组织，在武汉直到把“百万雄师”打下去后，才形成一个较为平稳的局面，为这个局面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死了人，伤者更众，打了不少“反革命”。

全国大大小小的武斗场面，通过二分钱一张的红卫兵办的小报如“文革通讯”之类，不时传入上海，对上海的混乱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不管你上柴联司的头头如何谨慎小心，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上柴联司的目的实在也是很小的，只不过要在厂的革委会中站有一席之地。再说大一点吧，充其量也只是要夺厂革委会的权，要掌握一个厂的权罢了。但在王洪文之流不能妥善安抚之下，只能把此事扩大，走上社会。但也许是联司头头们的才能和见识太强了，他们瞧不起王洪文，王洪文之流根本不是联司头头的对手，也无容人的海量，因此联司要走上社会干一干。于是，王洪文的执政派只得用官方的态度上纲上线，把联司走上社会宣布为反对市革会，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无奈的上柴联司，已经骑在狂奔的马上，欲罢不能。退，等于低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进，又要戴上反市革会的大帽子。联司头头在进退维谷的形势下，小心从事，如履薄冰，拒绝与我们这个已经“声名狼籍”的红工司联合，一点也不奇怪。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头头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后退已经没有生路。进，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联司开始感到力量孤单。

上海的支联站组织，已经遍布各大厂，初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全市性的组织。

所谓松散，就是基层的组织与陈卜昌的总站虽有名义上的上下隶属关系，但没有统一的号令，没有严密的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各基层组织在支联总站的旗号下，各自为政，为支持联司摇旗呐喊（很像国际法中的"邦联"）。这种松散的情况在文革期间造反组织中很常见，尤其是组织形成初期都是这样。但不同的是在文革一年之后仍成立一个称之为"联络站"的组织，则是一种策略。因为，这不同于早期的造反，早期的造反，稍具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明白这是自上而下的煽动，当然可以有恃无恐。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再造反，就是往自己头上戴上反革命帽子。如果此时要成立一个什么"支联造反司令部"，不要说获得批准，估计顷刻之间就进了牢房。于是"支联站"的名称就应运而生。但即便是这样半公开、半下下的"站"，仍然是一种对权威的反叛，没有一定的勇气、胆略和正义感的人，是不敢参加的。

在上海的各工厂内，处于无权地位的几个血气方刚的头面人物在活动，宣布成立支联站，但他们没有固定的、众多的成员，还不具备揭竿而起的基础。而这时的我们，虽然这段时间的活动，也是半公开半地下的，与支联站的松散相似，但不同的是，我们有过辉煌的昨天，有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只要时机一到，就可呼之即出。

联司被"逼上梁山"

混乱的局面中，出了一件对联司来说不大有利的事——上柴厂的一名中层干部叫解福喜的死亡事件，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大型的追悼会（实际上是一个控诉会），称解福喜是给联司活活打死的。工总司掀起了浩大的宣传活动，使一部分群众动摇，一时支联的形势沉闷。但联司不甘寂莫，立即予以宣传上的反击，噔清事实真象，于是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交大青年教师"全向东"的雄辩口才，每日在人民广场为上柴联司鼓吹呐喊，上海的支联情绪又趋高涨。杨冲池、、陈卜昌从工总司、的"追悼"大会这件事上明白无误地知道，如果联司失败，下场是什么？这意味着：监狱、劳动改造、甚至枪决。但是孤军奋战又不可能取胜。虽然在广场上有数万群众在心态上、情感上倒向他们，但是这决不能替代有组织的群众。

这时他们不得不考虑同我们的联合了，不得不揭竿而起，公开同工总司对抗了！这与他们原先的小心行事，仅仅是厂内的大联合，夺权，成立厂革会的初衷大相径庭，也可说是被逼上梁山了吧！

对于我们来说，为什么要重新拉起大旗呢？我们沉寂了不多时，就有一种被遗忘、被出卖的失落感，我们不甘再度被人歧视，被人宰割，要为大批被辞退失业的“临兄”争得劳动权，生存权。在这风起云涌的混乱局面中，我们为何不再能有所作为呢？尤其是受了市革委会群运组的愚弄后，一种被王洪文出卖的复仇欲望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

这时的上海市民对市革会、工总司的不满情绪已经到顶点，自发地发生了焚烧车辆的骚乱。深夜，在南京路近外滩的手工业局门口（日后的二轻局产品陈列室），成千上万的市民，把工总司耀武扬威的摩托车和汽车推翻焚烧，市革会当时毫无控制能力，只能斥之为一小撮流氓和反革命的捣乱，事后竟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到。这对王洪文、张春桥来说，无异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王洪文除了对付联司以外，还不时在各种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红工司进行污蔑、攻击。王洪文实在是不懂什么战略、策略的小人，在这么危险的时刻，他竟然不知道团结、安抚大多数，集中力量攻击一个敌人，即使对我们红工不来拉拢，起码也应该放着不管，不来惹我们吧！他根本不知道，他越是攻击、污蔑我们，就越是把我们往联司方面推，壮大了联司的力量。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和局面中，我们和联司的大联合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大联合已经来不及了

8 月 2 日，我的联络员王才生突然前来，他一脸的严肃相，小声地对我说，联司方面来人，同意我们联合的建议，约定 8 月 3 日，三方面（联司、红工司、支联站）会议，商讨具体的联合事宜和举起大旗的日期。这个消息使我振奋不已，是我期待已久的！

我把此情况，马上向常委们作了汇报。（王继鑫与殷庆宝对与联司的联合，一直持消极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圈子内，只有我一人是持积极的支联观点。）由于这次事关系重大，王继鑫愿意与我一起去赴会议，最后决定由我、王继鑫及刘俊一起去会谈。

上柴联司安排我们在 8 月 3 日上午 10 点，红工司的代表到陈卜昌的厂里，再由联司派车来接我们去上柴厂。

3 日上午我们三人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一些到了陈卜昌的厂里。

这是一家很小的工厂，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厂内厂外张贴了不少支持联司的标语，厂内广播台也在播放支联站的各种宣传材料，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一位年岁稍大的自称是支联

总站搞组织工作的人接待我们。他端了几张折椅给我们坐，我们就在厂门内的空地上坐下休息，从南面照来的太阳光，被厂房遮住，我们在阴晾处，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热辣，但无风、闷热，使人们身上冒出了油汗，又将是一个酷热的夏日。树上的知了在拼命嘶叫，与高音喇叭的声音合在一起，平添了空气中的热量，真是一幅令人发疯的景象。我们焦灼地等待上柴派车接我们走。

在等待中，我以内行的恣态，对我的同行，那个自称也是搞组织的大谈特谈如何把全市的支联站既按系统、又按条块组织起来，谈得那位不时点头。那位搞组织工作的头头几次去打电话摧车。

最后一次打电话后，他神情黯然地走来说，车子不能来了，联司的头头们现在很忙，无法抽出时间。他又紧张地说，已经得到情报，工总司要采取行动了。

这就是说，王洪文要下毒手了？！联司的战士要流血了！

当时我们还没有预感到会有这样严重，但是这消息马上令我们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我紧张而焦急地问："那么支联站准备采取什么行动？陈卜昌呢？"他有些举止失措，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只是说："陈卜昌在早上就去了上柴厂。至于联合的事。我们以后再谈吧，具体的日期会通过联络员同你们联系的。"他匆匆地与我们握手言别。

说老实话，我们虽感受到空气的紧张，但无法设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8 月 3 日夜晚，我同王继鑫走在南京路上，从静安寺一直向东走去。南京路上人来人往，还是那样热闹，大幅标语和大批判文章贴得到处都是。时间已经很晚了，突然马路上不时有满载手执木棒、铁棍，头戴藤制安全帽的造反队员的卡车向东驶去，这景象立时使我和王继鑫警觉起来。这些人被调动起来驶向哪里？是去对付联司的？联想起上午的情景，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禁对联司的命运担忧起来。

这时我的脑海中浮起了我在上柴厂门口看见的那位少女的身影，她娇弱的身影与眼前的一车车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人是那样的不对等。

我们仍默默地走，南京路上空气越来越紧张，路人不时停下脚步，一声不响地望着飞驰而过的卡车。走到华侨饭店门前，这幢大楼在修理，搭着脚手架，这里是上海体委的所在地，也是"上体司"的所在地，脚手架上扩音器在高声地叫喊着。上体司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知名度就在于它有一批彪形大汉组成的打手，他们的严刑拷打和在各种场合以武力为后盾的蛮横是出了名的，是一批披着革命造反外衣的流氓，一批以打人为乐的魔鬼。被上体司关押的所谓审查对象，不时被他们拷打，甚至有人被打至死。攻打联司是他们最乐于干的事。

不屈的联司

第二天，8 月 4 日，不时传来上柴联司被围的消息。下午，只见一车一车的人从军工路方向撤下来，其中也有联司被打伤的被俘者，这些混身污秽不堪，满脸是血的人不知被送往哪里去。这些不屈的战士，虽然已经受伤，已经被俘，但他们一脸愤怒，正气凛然，丝毫没有委琐的奴才相，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气概。

我要着重说明：联司并没有武斗的准备。我到上柴厂去，只见到大字报、大标语和门口几个闲谈的人，生产有序地进行着，整个厂区，绝没有武斗发展到后期那种将大楼门窗、楼梯堵死，路上设街垒，楼顶筑工事的景象。他们毕竟是老百姓，受党的教育十几年，绝不会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夜之间会发生血淋淋的镇压，绝不会想到王洪文、张春桥之流会卑鄙到调动数十万手执木棒、铁棍，头戴藤帽的人来攻打一个不设防的群众组织。

联司面对动用了军舰封镇江面的重重围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进攻的人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抵抗的人也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里，双方都是同胞，都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叛者，都是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者，都是毛主席的狂热追随者，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但现在，一方是反革命，一方是英雄。

那些看着电视屏幕，躲在幕后指挥的人，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负责封锁江面的士兵，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联司的战士被当成反革命被打得头破血流时，头脑中想的是什么？那些好像被注射了荷尔蒙的工总司战士，头脑中想的是什么……。

8 月 4 日下午，联司被攻破，大量人员被抓。

我看到一卡车一卡车凯旋而归的工总司战士，他们虽然胜利，却无笑容；虽然凯旋，却无歌声。他们站在车上，默不作声。我想，他们一定在想，在思索，因为联司的血跟头脑中注入的荷尔蒙产生了极大的反差。也许，他们感到无颜面对上海市的父老乡亲。

路旁的市民，冷漠地看着他们驶过。

在镇压的现场，在上柴厂军工路西边的田野上，自发而来的人群，远远看着被攻打的上

柴联司，向全副武装的进攻者投去正义的石块。

在平凉路上，凯旋而归的英雄们，被愤怒的市民们拦下，在正气凛然的市民面前，这些“英雄”们，自感无地自容，撂下大卡车鼠窜而去。义愤填膺的人们把大卡车掀翻在地。

自发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市民，只能这样发泄胸中的怒火！

公元 1967 年 8 月 4 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上海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这悲壮！记住这耻辱！

联司的呼喊

就在这天下午，1967 年 8 月 4 日下午，上海闹市街区却响起了联司的声音。一辆联司的用消防车改装的宣传车——联司的象征和骄傲，冲出重围，在市区街道中穿梭往来。在消防车的两旁和驾驶室的两边踏板上站着武装的联司战士——他们不得已手握铁棒，以对付暴力。他们疲惫不堪，满脸满身的污泥。为了对付工总司的拦截，车辆以高速行驶。高音喇叭中反复传出一位女性悲怆而嘶哑的呼喊：

“上柴联司已被血洗！联司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上柴厂！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革命群众赶快行动起来！上柴联司是不会屈服的，联司战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看着这悲壮的景象，听着这悲怆的呼喊，我不禁心头一热，潸然泪下。

二十一年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匈牙利纳吉民主政权被镇压时，它的电台也曾向世界发出过“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的呼喊。五十年代，没有人能救得了纳吉，六十年代的上海，也没有人能救得了联司。虽然一个在东欧，一个在东亚，但历史是何其相似。

在北站宝山路的热闹地段，这辆宣传车往来奔驰了几次。路上行人，驻足止步，默默地为联司被血洗而悲哀，为联司的威武不屈而感动。但没有人轻举妄动，没有人敢轻举妄动。人们只是把这段血的历史默默地埋在心里，在心中化为火山的岩浆。

上海是英雄辈出的上海，不太远的将来，历史将会雄辩地证明，创造中国新纪元的，必定是上海！

联司的精神永存！

秘密据点被砸

我们非常幼稚，我们甚至不明白，“8.4 行动”实际上是针对全市的反叛力量的。联司被血洗了，而我们却还不死心，照常活动。在此之前不断有人提醒：当心我们之中混进工总司、市革会方面的内线。我们听了常一笑了之，且不懂得如何保密。我更为天真，丝毫没有估计到，我们同联司之间的联系和接触，市革会方面必定已经掌握。我们没有对局势作一个全面的正确分析，我们糊涂地认为：联司跨了，我们单独干，而且要加快我们的步伐。我们不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在 15 日正式重拉红工司的大旗，重新公开活动和恢复组织建制的糊涂决定。

这个决定一出，我的脑海中曾闪过一个念头：“在联司被镇压的不利形势下，到时队伍拉得出吗？群众会不会响应？要知道这不同于去年下半年的形势啊”。但这仅是闪念，仅仅是一闪。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

我们虽然这样在盲目地活动，但对形势的估计，也不是一点没有，我们认为，王洪文可能会对我们采取行动，我们也作了被围、被砸的应急措施。紧靠我们北面的一幢房子是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我们同他们联系后，他们同意我们在被砸时，翻越屋顶，进入他们的办事处后逃跑。所以在靠北墙的下房处备了房修工人用的竹梯，以备紧急之需时，可安全撤出。

这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带着替换的汗衫短裤，一直在愚园路的联络站内，晚上就胡乱地睡上一觉，反正是盛夏，用不着什么被褥。没有席子，在地上铺上报纸就睡。

联司被血洗后的第三天，8 月 7 日傍晚，白天的活动已经过去，晚上还要开常委会。我照常去绿村吃了冷面，在熙熙攘攘的静安寺兜了一圈，时间还早，我就去殷的家中，约他一起回 6743。我们在华山路上行走，行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转过绿村饭店走到愚园路的邮局门口，发现气氛不对，本能使我警觉起来，我停住脚步说：“不对！弄堂口怎么围着那么多人？”

这时在马路边停着几辆卡车，卡车有不少人，卡车的周围马路上也有不少人，似乎在集结待命。我们两人观察了一会，我不无忧虑的说："不要是来砸我们的吧！"殷大大咧咧地说："你看，都是一些红卫兵，不关我们的事，怕什么！不会的。"我一看，确实是一些红卫兵，其中还有不少女学生。我们继续走，到了 67 弄弄口往里一看，43 号门口平静如水，没有人，没有出事的迹象。殷嘲笑我："神经过敏！"我们大摇大摆地向弄内走去。67 弄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一直可通南京路，弄内也不断有行人在走。

我们进入 43 号，走上楼梯，这时有三、四个青年人走下来，我一愣，这些人我不认识。送他们下楼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的常委沈××来了。"这些人重又回了上去，我们的人介绍说，他们是从机床厂来找我和常委的。我一听马上请他们坐。他们自我介绍说，是从上海机床厂来的，王才生派来的。

我急切地问，王才生现在那里？是否被抓？我知道 8.4 后，大街上到处贴着通缉令，杨冲池和一些大厂的支联站头头大都被抓，全市掀起了一股抓支联头头的旋风。所以，我很为王才生担忧。那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说："王才生在厂里。我们机床厂的支联站没有被砸，我们还在坚持活动，他很忙，要我来告诉你，他没有事。"说完他就要走，甚至连坐也没坐。

我硬拉住他，问他你姓啥？要他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他用纸条写了电话号码，写了一个"支"姓。我很奇怪："你怎么姓支联站的支啊！"他支吾地笑笑："我天生就是一个支联派啊！"

我手拿纸条，心生疑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来人在我沉思时，匆匆带着人走了。

我对殷庆宝说："来人不对啊！神色慌张，不肯讲真实姓名，我看我们马上撤离！不然王继鑫他们也快到了，我们到静安寺去迎他们吧！"

正在这时，听见楼下弄堂里一片嘈杂的脚步声，我从东窗探头一望，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就是弄口马路上的红卫兵冲了过来。我一声惊呼："不好，我们被包围了！"这时，我挥手向房门外扑去，要工作人员把竹梯靠上屋顶。这时传来了砸门碰撞之声，我们几个人慌乱一团向隔壁撤离。

殷庆宝说："快！不要窝在一起，我们两人从前面阳台走。"殷拖着我窜进隔壁的资本家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阳台)，走上阳台，下面是小小的花园，南面是一堵矮墙，有一扇从不开启的门。这时我看到短墙外，已经有不少红卫兵把守，我迟疑了一下。殷庆宝急促地向西一指说，我们下去后向西翻墙。我一看也是，可以进入邻家，一路可以翻墙逃走。再说，这时已经听见楼下的门被砸开了，再要退回去，向北面的湖北省办事处逃已经不可能了，别无选择。

他往下纵身一跳，只听他“啊哟”一声，我也不顾一切了，纵身跳了下去。只见殷蹲在地下，不能动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腰摔坏了，不能动了。我说我扶你走，我一把拖起他就走。这时南面的花园门有人在砸门，我拉着他向西走去，他说：“啊哟，我痛，不能动。”我望望西面的矮墙，我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翻过去逃走，但我不能丢下殷不管！朋友义气和共产党培养的英雄气概油然而生。我高声对门外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砸门了，我来开！我们有人受伤了。”我打开门，大批人冲了进来，我说：“他受伤了，我来扶他走。”

拥进来的人在花园中乱找，我说：“就我们两人，不用找了。”这时有人在楼上大叫：楼上已经没有人了，还有人呢？我就顺势一指西面的墙，说：“他们全跳墙走了，因为他受伤了，我就留下了，只有我们两人。”

工人模样的几个人向西一挥手：“捉！”大群人就乒乒乓乓的敲起邻家的门。这时冲进几个年青工人来，不由分说，把我两臂向后一拉，头一按，弄成“飞机式”就向外推，真是脚不点地。我只听殷庆宝大叫啊哟，啊哟，我却无能为力了。我被拉到马路边的卡车上，一上车我的眼镜就被摘去，蒙上了黑布，又一脚踢在我身后脚弯处，我一下跪倒在卡车贺驶室后窗口，这时有人把我的头一按，双手被人捆绑在身后，成了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囚犯。我记得老辈子人说，双眼被黑布蒙上是土匪绑票的办法。

刑 讯

车子开始在马路上七转八转地行驶，只几分钟我被押下汽车，跌跌冲冲地被押上楼，转了几个弯。当他们撕去黑布时，我一看，这里似乎是一座学校，这间是教室，因为有黑板。

红卫兵一个也不见了，教室里几个人全是彪形大汉，我吃不准他们的身份，既不像工人，更不像学生。这间教室内，只有我一个“囚犯”，大概殷庆宝被他们关在另一教室内。我不知道腰部受了伤的他，是如何走进这幢教学楼的。

我对他们看，他们也注视着我，只见两个人手拿用电线绕成的鞭子，对我挥了挥，内行地要我把衬衣、汗背心、裤子脱掉，我赤膊只穿一条平脚内裤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用鞭子指了指我的脚。我明白，还要脱鞋。这是怕我要逃。我脱了鞋。当我抬起头站在他们面前，用没戴眼镜的近视眼望着他们时，这两人却突然用拳头，地准我的肩、背、

胸部一阵猛击，我硬是挺住了。

在他们打累了休息的时候，进来了几个中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这些男孩，上来摸摸我发达的胸肌和发达粗壮的上臂，露出羡慕的眼神，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肌肉真发达啊！"另一男孩说："这人一定很经打的。"

这时另两个打手走上来，对准我又是几拳，我立定不动。这似乎是对他们的蔑视，触犯了他们，一个打手说："这个身体太结棍了，掼背包！"随着他的话音，我被突然一记"背包"——人在半空中被抢起 180° 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们便发出一阵狞笑，笑声中传来一声高叫："起来"。我还没有立稳，又被重重地摔了一个"背包"，再被逼立起来，又是一下……。就这样我被他们当牲畜一样地打，这些两脚兽已经忘记了我们都是人类，不是弱肉强食的野兽。

当他们停止拷打时，我发现那两个男孩不在了，是他们害怕了，不忍看下去？还是被赶走的？我愿他们是害怕不忍看下去才走的。我在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时，这些打手已经退到一边。在课桌后坐着的一个人开始在准备做记录了。

他们拷打人是行家里手，但在审问我时，却对我们的情况不熟悉。他们问："你是支联站的头头吗？叫什么名字？"我一听倒放心不少，他们连我们是什么组织也不知道。我就顺着他们的思路说下去，说我是厂里的支联站头头，经常去参加人民广场联司的活动，那个做记录的就不停的记。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几个人，俯身看笔录，一看就大怒起来："好啊！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原先审我的几人还在莫名其妙时，这几人一下扑上来，围住我："快说！你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我们知道，快坦白交待你们组织的情况，快交待你与联司的罪行和支联总部的罪行。"

我明白，这才是真正审讯我的人。眼前的打手和抓我们的红卫兵都是临时凑起来的。

我想，我如何对付他们呢？这些人见我不响，马上命令打手上来一阵猛打，渐渐地，我感觉不到痛了。

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封建文化是源远流长啊！在封建王朝时，一声"升堂——"的吆喝声中，犯人被带上堂，县官一拍惊堂木："嘟！大胆刁民……"在没有人证、物证、书证的情况下，只要大老爷一声令下，用夹棍、板子使犯人招供，这大概是最简捷、最有效的审讯方式了。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我们的国度却在向封建回归，并向"顶峰"发展。不是么？在封建社会，县太爷扔下一支签，捕快才能凭此去捉人。现在可好，简捷到连一支签

也不用，就用土匪绑票的模式把国家的主人抓进来拷打。清末四大奇案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知府在花厅审问杨乃武，因为不在公堂，就犯下了私设公堂的罪名。而今天，国家的主人在这里，在莘莘学子学知识的学堂中被拷打，被审问，他们能因此获罪吗？清末，因为“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几十名官员掉了顶带花翎。今天，这些对对我刑讯的人，以及其他数不清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人，还有那些幕后的策划者，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我被打了几个小时，天早黑了，他们开了灯。我从迷惘中醒来，望着昏黄的电灯，望着这些模糊的大吼大叫的人影，又陷入我的想入非非中去：我要像我童年崇拜的英雄那样，不能出卖朋友，要宁死不屈，绝不做叛徒，要像卓娅、刘胡兰，要像江姐一样，在狱中不吐一字，绝不能出卖组织，不做叛徒甫志高！我会成为一个英雄的，打吧！真的，打在身上一点不痛。这样打打停停，时间久了，打手累了，他们又抱怨我身体太棒。

这时，有人进进出出，不知在忙什么。大概在商量对付我的鬼主意吧！我得到短暂的休息。大家互相对视，打手们在吸烟。

我身后的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进来的人转到我眼前，手里拿着几张纸，对我说：“你不老实交待，殷庆宝已经都交待了，你还是快交待吧！”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时，另一人不耐烦地说：“快说，你们什么时候重拉队伍？”

我一惊，“重拉队伍”这一我们所特有的词汇，只在我们红工常委圈内使用，他们怎么也知道了？我说：“我们是说过要重拉队伍的，但只是讲讲而已，还没有具体的行动和日期。”我讲完后，凭这几小时的经验，知道又要挨打了，但这时谁也不来打了。

那人显得有点得意：“你看，殷庆宝已经交待了。”他把纸伸到我面前，我是近视眼，白花花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高兴地说：“殷庆宝已交待你们在 15 日正式重拉队伍，已经组织好十几万人了。”

我一听，这确实是殷庆宝的交待，但最后的一句“十几万人”是夸张了，我都没有把握到时能否拉得起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交待呢？我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情况，那还来问我做什么。”

那人问：“这是事实吗？”

我想，这个殷庆宝太没用了，这个叛徒，软骨头，我这半夜挨打，算白白硬挺，白白挨打了。就说：“既然殷庆宝已经全部交待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那人又问："你去上柴联司是同谁碰头的？"

"殷庆宝的交待中有了，我承认就是了。"

他们在小声商议着。

不一会传来的声音："这个姓沈的有种，算了，好结束了。"他们又私议道："这个人倒还吃硬，隔壁的那人，生活也没有吃，还没有打，就什么都交待了。"另一个说："隔壁那人腰在跳楼时受伤了。"

他们的头头商议后，拿交待记录纸的这人对我说："你看一看殷庆宝的交待吧！看后签上你的名字。"到了这步田地，我看什么呢？看不清，也不用看，我就胡乱地在殷庆宝的名字后面签上了我的名字。我太累了，昏昏沉沉的，管它去吧！这一来他们也如释重负地，似乎完成了任务。我就在一张靠背椅上坐下来，松一松我紧绷绷的双腿。

我准备就义

过了几分钟，又过了几分钟，进来一位四、五十岁的军官，他们把几张纸递给他看，互相小声地说了几句话，军人点点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你是沈××？"我说："是的。"他对我看了一会转身欲走。我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解放军同志，你不要走。"

我像见到了救星，我要向"亲人"解放军控诉这帮两脚兽非法拷打我的罪行，我努力睁大眼睛，分辩这是不是警备区那个和蔼可亲的军官？看来像，又不像，眼前的军官脸面是那样的冷漠，我的心又收紧了。

"你是军代表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用暴力对我进行非法拷打，你军代表看看。"我转着身子前后给他看我伤痕累累的胸和背。军官冷冷地一言不发。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一伙的，幕后的指挥者，我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解放军要支左，要支持革命的左派，你们是怎样支左的？"他还是一言不发，也不理我的责问，转身出去了。两个打手拿出一条外面缠绕着极细金属丝的电线，把我双手反背在绑椅子背部，前后紧紧的捆住，随后关上电灯。

两脚兽们出去了，全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被绑在椅子上。我望着窗外的夜空，万籁俱寂，大概已经下半夜了吧！

这时，我感到混身酸痛，汗如尘土涂满了我的头脸和全身。蚊虫又来叮咬，人却动弹不得，只得让它们叮，让它们吸血。我心中一阵烦燥，汗和着尘土从额上流下，犹如小虫在脸上爬，痒得人心都要跳出来，要发疯，我真想大叫大喊来减轻痛苦。但我不能叫喊，我不想让他们看我遭罪而得到满足。我一阵挣扎，双臂一阵钻心的剧痛，那金属丝嵌进肉里去的刺痛，使我明白，我还是不动为妙。但痒又使我难以忍受，我抬起左腿膝盖努力往脸上凑，头尽量低下去，低下去，小心不能太用力，否则双臂的电线嵌进肉里去太痛了。头再低一点，膝盖再高一点，终于碰着了。碰到后，只感到粘粘的，又是滑滑的，是汗？是油？还是血？一下，二下，三下……，不止痒，但不管怎样总算可以解脱一点痒的难受。小心！上身不能大动，双臂要痛。左面的脸好受一些了，右面的脸就如法炮制。那么颈部呢？额头呢？痒得再难受也没有办法了，膝盖碰不到了。

蚊虫在嗡嗡地叫，就像刚才打手们的嚎叫声一样令人讨厌。你这小小的蚊虫也这样欺侮人，要叮就叮吧，要吸血就吸吧，何必嗡嗡个没完呢！这时，在这黑暗的时空内，似乎世界已经只有蚊虫和我存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一切已经消失。我就这样忍受着煎熬，等待着太阳升起，盼着曙光的来临。

头，昏沉沉，身体软软的，头脑中一片空白。啊！窗外已经不再漆黑一片，早晨来临了，天，开始亮了。讨厌的蚊虫没有了，我一下感到轻松了不少，头一沉，我睡了过去。

热烘烘的，我被热醒了，睁眼一看，窗外是热辣辣的太阳，又是一个酷热的天气，不知是上午的什么时候了。这时进来几个人，把我解开，命令我穿上衣裤和鞋子，用“飞机式”押我出去。下楼后，一辆卡车停在外面，他们把我押上车，按住我的头。车子不开，似乎在等着谁。我偷偷地乘他们不备时看起四周的环境，这是一幢老式的洋房，这学校一定是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这是什么地方的学校呢？我思量着。这学校肯定离静安寺不太远，因为昨天晚上卡车只开了不多一会。

殷庆宝也被押来了，他被“优待”着，没有“飞机式”，是被两人架着走出房子的，上车后他就躺在车厢板上，不断哼哼着。我心里不由骂了一声“软骨头”！但他的哼哼声，不由使我的心软下来，大概他的腰伤得不轻吧。

又上来一批红卫兵，大都是女孩子，她们不敢看我们，毫无声息地面朝外，大概我们的尊容太可怕了。这些畜牲！用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挡在车厢两边，来掩盖他们的兽行。出了学校门，开上马路后，押送的打手们，大概为了遮人耳目，不再让我“坐飞机”，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顺势也不再跪着，而改为坐着，他们也不管。车子开得很快，经曹家渡，过武

宁路，又在天目路上行驶，转弯上旱桥，共和新路。要开往郊区么？为什么去那里？

昨晚的残酷拷打，使我现在不由断定这批畜牲要对我下毒手了！大概是押送我去刑场吧！我要死了！

我望望天空，天气晴朗，天穹湛蓝，只有很少几朵白云，太阳当空明晃晃地照着。看看卡车两旁的学生，他们默默地站着，互相之间没有一句话，背对着我们，这更加重了我心头的疑云，啊！我要死了，必死无疑了，这时我的脑海中浮起了往事，亲人，朋友，同事。永别了！活着总是美好的，你看这天空不是蓝得那么清彻、可爱吗？

我明白了自由的含意

突然，车辆一个急转弯，把我从迷惘中惊醒，我一看，这里已经是中山北路转到大连西路上往东开，这是去那里啊？现在已经快到我再熟悉不过的杨浦区了。很快，车转到控江路上，莫非去军工路的机床厂？看来我今天不是去死，而又要遭到一顿毒打了。

车子一过杨浦公园，转上了隆昌路。喔——杨浦公安分局。我心里轻松了，进公安局苦头总该少吃一点了，何况可以尝尝铁窗风味，我心里不由升起了一种愉快的感觉。

在太熟悉的隆昌路上，我不由担心碰见熟人，万一被熟人瞧见了，他们到家一传，不要急死家人吗？母亲知道了怎么办？我像鸵鸟把头埋入沙内马上低下了头，以逃避熟人的眼睛。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车到平凉路口，公安局门口果然有不少人在张望围观，啊呀！怎么办？

车子一转弯却没有停下来，一直开过公安局，咦！去哪里？

卡车不进公安局，却进了隔壁的电力专科学校。进入大门，在西面的一幢小楼前停下，我们被押下了车。

我望了望空荡的操场，操场上已经长了不少草，在靠南面平凉路一边的围墙边，有不少树木。这里的一景一物我太熟悉了。这座学校解放前叫工业专科学校，是抗日战争时由日本人建造的。在我小时候，有天我抓到一只小麻雀（它刚在学飞，不幸被我抓到了），我好开心啊！我把它放入一只洗菜的小方篮内，上面用布蒙起来。我给它水，它不喝，给它饭，它不吃，只是不停地唧唧叫个不停，在竹篮内乱飞乱撞，我呆呆地看着它，不由犯愁了，它是

在叫它的妈妈呀！母亲看不过去了："罪过呀，这样会饿死的，还是把它放了吧！"

好不容易捉到，放了多可惜呀，但是不放，又会饿死它，我好奇地问：它为什么不吃呢？大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它胆小，怕。我想想那就不去看它，小鸟总不会怕了吧！过了半天它还是叫个不停，再去一看，饭粒一粒不少，还是不愿吃，我想还是在想它的妈妈呀！现在关在这么小的地方，它不愿意呀，大人又说，失去了自由，它宁可死，所以不吃不喝。

自由？我不太理解，但有一点我是有感受的，在阴雨连绵的时候，不能出去玩，一个人闷在家里，那多难受。看着小鸟焦急的鸣叫，乱扑乱飞，我实在不忍心小鸟死去，对！放了它。放到那里去呢？放了后，它还不怎么会飞，不是又要被人捉住吗？

母亲说，放到工专学堂里去吧！那里树多，大学生读书人，是不会去抓它的。我双手轻轻地捧着它，走到学堂门口，那天大门关着，我从铁栅处伸进双手放开，鸟扑扑地飞向空无一人的地上，停了片刻，又飞到围墙边的树林去了。我放心回家，心想小鸟它自由了，它一定很快活。

我望着眼前曾经放归麻雀的树林。树林比我小时候少了几棵，但长得更高大了。麻雀自由了，今天我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自由。

我的部下要来救我

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因为在我们身边慢慢地围了不少人，这是一批看守，但不是昨天夜里的那些打手和押我们来的人。他们像观看什么稀奇的动物一般打量着坐在水泥台阶上的我和殷庆宝，指指点点，窃窃私议。我听一个说："喏，这就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带过四十万人呢！"

"打的不轻啊！""那个已经打伤腰了。"我听着这些话，听着这些人不无同情的话，我生怕撞见熟人，只得低着头。殷庆宝不断的哼哼，无力地靠在我身上。我俯着殷的耳朵轻轻问他："你伤在哪里？"他说："腰像断脱一样痛。"（后来出去后才知道，他在跳下时屁股着地，造成脊椎在腰部的地方压缩性骨折。）我说，那你就靠在我身上吧！

一会儿，看守拿来一搪瓷碗的饭（大概四两吧）和一碗清彻见底的冬瓜汤，一双筷。我一见有饭，马上感到了饥饿，可是只有一份，我问看守还有吗？他们说只有这一份。我就对殷庆宝说："你吃吧！"实际上我这时真想吃。

殷摇摇头，苦着脸说："吃不下。"

我在他耳旁轻轻说："今天晚上，看来还有一顿打，还有一夜的折磨，人是铁，饭是钢，多少吃一点吧！"

他在我的劝说下，点了点头："向他们要只饭碗来吧！"

我看那些看守一点也没有动静，就说："算了，你先吃，吃剩下全是我的。"

他皱着眉，苦着脸，接过筷子，把碗里那块蒸饭上面的一层硬壳饭要扒拉掉，我连忙抢过碗和筷，把上面一层硬饭掀在碗的一边，把下面的稍软的饭挑松再递给他。我实在是舍不得扔掉这些饭啊！我太饿了，眼巴巴地看着他吃。而他却扒了两口说吃不下，我又劝了几句，他再扒了两口，递给了我。

我狼吞吐虎咽，几口就把饭吃了，喝着清汤晃水的冬瓜汤，啊——太解渴了！已经十几小时滴水不进了，这是大热天啊！我的"吃相"，一定是太狼狈了，耳边传来看守们摇头叹息声。风卷残云，一瞬间两只碗底空空。

吃了饭，我注意到这些看守的人，清一色的一人一根铁棒，头戴藤帽，左手臂上除了有工总司袖章外，左手腕还扎一根窄窄的红色小布条，兴许是看守的标记。我想，这红布条以前从没有见他们使用过，大概是"8•4"（攻打上柴联司）后才有的吧！他们见我吃好了饭，示意我们跟着走。我把殷庆宝扶起来，他身体的份量大都靠在我的肩上。我的左脚腕处已经肿了起来，是跳楼时受的伤呢，还是昨天被摔"背包"摔坏的？我搞不清了。一注意到脚腕，它就剧痛起来。我一瘸一拐地扶着殷往前挪。我们两人这种受刑后的惨相，再加上浑身的油污、汗渍，使这些看守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呵斥的语句，只是慢慢地跟在我们的身后。

我们两人被押进了里面靠西的二楼教室，他们没有把我们分开关，而是关在一间教室内，这教室空空的，在屋子中央的地下铺着芦席，我和殷庆宝躺在破芦苇上。大屋子里没有关其他的人，只有我们俩，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偏西的阳光射进来，照在身上热辣辣的，晒醒了我，躲也没处躲。醒来后，我清醒了不少。殷也醒了，我见看守不在门口，就轻轻地问他："昨天你坦白交待了什么？害得我多挨了不少的打。"

他不响，只管哼哼。

我有点火，逼着问他：“你交待我们重拉队伍的日期了？什么都交待了？你的交待他们给我看了，这是叛徒的行为，害得我白白被他们打了大半夜。”

他听了挣扎着坐起来，带着哭腔气冲冲地说：“我对得起大家了，对得起四十万红工了。我腰已经摔断了，受了这种伤，要是再不讲，再被他们打成残废，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办？我家里怎么办？像你光棍一条怕什么！”

我忿忿地说：“难道只有你上有老，我没有老的？没有结婚成家就该挨打？”我嘟哝他：“做了叛徒还有理？……”

本来我是想同他商量今天夜里怎么对付审问，想不到他还那么有理，我不想同他争了，让他去吧！他愿怎么说就让他说！我能挺则挺，不能挺就见机行事，下半夜想办法逃吧！周围的地形我太熟了。

这时，我忽然看见教室门口的玻璃上有人在张望，我警惕地坐了起来。

门被轻轻推开了，进来的人对我摇摇手。我一看，是对面红卫造纸厂的老朱。他的打扮也是戴工总司袖章，手腕系一小红布条，但没有拿铁棒。他原是红卫造纸厂红工造反队头头，也是我们杨浦分部的头头之一，此人与我关系甚密，在这次重拉队伍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很大，我曾经在该厂召开过东区的原红工的基层头头的会议，鼓动和组织重拉队伍的准备工作，该厂是我东区的工作据点。这个厂的红工组织力量很强，在组织被迫解散后，他们立即转入工总司的造反组织中，在厂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保持了原红工组织的建制，还保住了单独的办公室，因此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积极与东区的一些厂联络，是我在杨浦虹口等区中重拉队伍的支柱。

我惊喜地站起来，迎上前去。他机警地朝走廊两头望了望，对我悄悄地说：“我听说抓了两个红工司的头头，说是组织部长，果然是你。我去找人来抢。”

我摇了摇头。我的本意只想有人能够接应，到半夜后我们逃出去就行了。如果明目张胆地抢人，很不明智，现在不是几个前月，目前的严峻局势，抢，只能招来大家的不幸。但尚未等我开口，他就心急慌忙地走了。我重又躺下。这时一个看守走来，对我们看了看又走了。

我等看守脚步声远，就低声对殷庆宝说了刚才的事。殷很兴奋。但我对此举却不抱甚希望，“8•4”以来的几天，上海掀起了一股大抓各厂支联站头头的旋风，一时恐怖的气氛笼罩上海，人心惶惶，老朱他们固然有点实力，但事到临头，有多少人能不怕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呢？

在我的心底，又有些洋洋自得：我这组织部长，也没有白当，我忠实的部下，要冒着危险来救我们了！这是只有在革命小说中才能见到的情节呀！我对殷不无得意的说：“不要再哼了，你耐心地等着吧！今天夜里让你们夫妻团聚。”

西晒的太阳已经被公安局大楼遮住，教室内凉快一些，从走廊内不时有些微风吹来，我们的精神顿时振作了不少，人好过多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

大概过了半小时多一点，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队员，要我们马上跟他们走。

我一惊，头脑中飞快地掠过一个问号：他们是自己人还是工总司的人？如果是自己人，怎么这么快就行动了？老朱呢？他怎么没来？无论我怎么想，眼下我只得扶着殷庆宝走出教室。这些人很性急，不停催我们快走，我真吃不准是自己人来救我们了，还是因为走漏了风声，工总司要把我们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去。

下了楼，外面停着一辆大卡车，校园内平静得很，不见什么人影。看来是走漏了风声，要转移了。上了车，卡车马上发动，一转，就到隔壁的公安局大门内停下，把我们押下车。

我这时真诚地希望，这是风声走漏，我们被转押之后，老朱他们就不会来抢人，这样就可以不连累他人了。（后来我知道，事情果真如此。）

押送我们的看守同公安局的一位穿便衣的警察交涉了足足有五分钟，公安局似乎是不愿接受，最后勉强收下。押送我们的人和卡车开走了。

公安局的大门口围着不少人，大多是一些十多岁的小孩，我真怕这些看热闹的人群有熟人，就背对大门，倒想快点进牢房去。但这位接受我们的警察并没有把我们带进去关起来，却让我们在二门外等候，自己却进去了。

过了一会，他出来坐在桌边准备作笔录，要我们把姓名、身份和参加的组织报一下。他记下后，问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说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非法绑架，拷打了一夜，我们不知犯了什么罪，我们没有犯罪。他问，你们不犯罪，为何被革命群众送到这里来呢？

我据理说："这些人的身份不明，严刑拷打我们，这是违背伟大领袖的教导的，怎么能说他们是革命群众呢？"

他极不耐烦地立起来，对我说，你们等一等，又进去了，这一进去时间就长了。

我们直到天色黑了还不见这人出来。在这段时间内，不时有卡车把人押来，这些人丝毫不受阻拦地直接送到二门内被关押起来，一批又一批。我想，当年蒋介石"四•一二"大批清洗、逮捕共产党，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吧？"四•一二"是白色恐怖，那么今天"八•四"后的大清洗该称它"红色恐怖"呢？还是照旧称它是白色恐怖呢？从这两天来看，好像是专了工人阶级的政，还应该算白色恐怖！张春桥、王洪文是共产党人吗？这算是共产党领导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为什么？

上柴联司为其自身生存的斗争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同情，上海人民支持联司的一系列行动，又逐渐演变为可歌可泣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我认为，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真正称得上造反，称得上革命的，就是联司这一段！其他的，无论怎么热闹，充其量只是木偶戏。联司和支联运动，才是中国大地上一声争取民主的春雷！

铁窗里的语录歌

这时的杨浦公安分局内关满了各厂工人领袖，他们都具有支持联司的行为和言论，对张春桥和王洪文来说，这些人是一股巨大的反叛力量。他们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代表人民大众向往民主的心声，勇敢地向张春桥、王洪文独裁统治作斗争的敢作敢为的优秀的工人领袖。

但是，在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华夏大地，争民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五七年，五十万"右派分子""自投罗网"；五九年，彭大元帅又以卵击石；今天，联司和支联英雄身陷囹圄。当

然，还有以后的，发生在祖国心脏的大惨案……。

这些民主的斗士捐出了自己的青春、事业、家庭、幸福，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动摇着封建的根基。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争民主的运动此起彼伏经历了七十多年，总有一天，封建的庞然大厦会轰然倒塌，一个民主的、自由的中国将屹立在世界东方。如果将辛亥革命称作东方睡狮的觉醒，那么，民主的中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迅跑。

我看见不时被卡车送来的“人犯”——被抓的各厂支联站头头——送进了二道门内，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不把我们也关起来呢？我从革命书籍《王若飞在狱中》、《不死的王孝和》、《红岩》中看到不少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狱中的英雄表现，我突发奇想：赶快把我关起来吧！让我也尝尝铁窗滋味，这不是很浪漫吗？让我也学学《红岩》中的共产党们如何开展斗争，那可真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吧！

忽然，从二道门里面传出了雄壮的语录歌声。（共产党领导的公安局，关了一大批高唱毛主席语录歌的人，真让人笑掉大牙！）啊！这是里面的“难友”们在向“监狱”当局示威了，这些可敬的支联勇士们，歌声一阵又一阵，有时又传来嘈杂的人声，显然里面的勇士在团结一致，英勇斗争。我向往着立即进去，参加到这一行列中去。

事后知道，机床厂的王才生当时也被关在杨浦分局内，在后来被押进去的人中，有不少支联头头原是红工头头，有人认出了我，他们进去后，就把我也在这儿的消息传给了王才生。这些人为了显示一下团结的力量，就发动了这场用歌声抗议的浪潮。

我要尝尝铁窗滋味

一股莫名的燥动在我心中升起——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幼稚单纯的心已经飞到里面。我大声要求看守二道门的一位老民警赶快催那位便衣出来，“这样不出不进的，是什么意思，快快放我们进去！”

老门卫用惊诧的目光看了我片刻，大概他不明白，怎么竟有这种人？竟吵着要“进去”？但他终于拿起了电话，讲了几句话放下说：“马上出来了。”

我等啊等，还是不见那位便衣的人影。这时二道门口很杂乱，有闲人看热闹的，有被关人的家属在同门卫纠缠的，不时还有原被拘留关押的小偷之类的人被放出来，就在二门口经训斥后按上十指手印发送出门的，也许是为了把小偷赶走，腾出铺位让给刚关进去的支联头

头们去享受，可见里面已经人满为患。

老民警已经下班，门卫换了个年轻人，新门卫根本不知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儿。我和殷庆宝完全可以趁这个当口逃离虎口。但我年轻气盛，不愿就这样走，我要“进去”，要进去斗一斗。我焦躁不安地向里张望。年轻的门卫不让我看，把我当看热闹的闲人赶开。

晚上十点钟以后，便衣总算出来了。我立刻上前交涉：“为什么不把我们关起来？！”便衣也对我看了一阵，手一挥说：“你等等，我正在电话请示。”说完又匆匆进去了。

请示？向谁请示？我从他这一句话顿时理出了这两天的头绪：这显然是一场有计划的行动，幕后的指挥是工总司的王洪文之流，他们一定事先从安插在联司、支联总站和红工内部的“内线”那里掌握了我们要重拉队伍、与联司联合，共同反对工总司的情报，所以布置了这次大搜捕，让机庆厂的工总司造反队去执行，为了麻痹我们和掩人耳目，又拖来红卫兵做掩护。抓了人先在附近的学校刑讯拷问，再送杨浦分局（过去王洪文抓了工总司内部的反对派范佐东等人，也喜欢往杨浦分局送），在送分局前，先在隔壁的电力专科学校暂时羁押过渡。——这“一条龙”的计划算得上是很周密的了！

也许是他们发现走漏了风声，怕出意外，便仓促地把我押往分局，但还没有和杨浦分局商量好，因此虽然把我“卸”下车，却进不了分局二道门，而别人却直接进去了。分局对我这个“人犯”大概也是极为重视的，有点拒之门外的意思，不愿承担责任。尤其是里面唱开了语录歌，就更不想把我也关进去了。这样一来，那位便衣就要一遍遍地“请示”。

负责任的老公安

好不容易等到了 11 点多，便衣出来了。他一本正经地把我们的姓名、年龄、组织名称，担任职务一一记录下来，让我们签字。我签了字，站起来准备跟他“进去”，他却出乎意外地说：“你们可以回家了。希望你们回去后，停止一切活动，解散目前两种劳动制度大批判联络站。”又说了要珍惜大好形势，紧跟革命路线等等套话。

太遗憾了！想不到要放我们走。我跳起来质问：“为什么不明不白抓我们，现在又不明不白放我们？”

他冷冷地说：“不是我们公安局抓你们的。”

“现在我是在你们杨浦分局，我当然要找你问清楚。”

“我们不是放你们了吗？放了也不好？”

“我不要你放！你把我关起来吧！你们拷打了我一夜，饿到现在，你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没那么容易，至少你们应该承认错误，对我们公开平反。”

便衣感到我有点难缠，他作出无可奈何地样子说：“你们怎么被抓的，我不管。现在放你们是我请示了上面才作出的。”

我一步不让：“那么你再去请示上面，不平反就把我关起来。”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转身进去了。

我沉浸在得意之中。我不是一个孬种！进牢房也吓不倒我！我雄赳赳地站在那里，混身热血沸腾，两只手都有些颤抖。

我感到殷庆宝拉了拉我，耳边传来他的声音：“放出去就算额角头了，还要什么平反？”

我愤怒地转身，盯着他看，喷出一句话：“你要走就走好了，你这个怕死鬼！”

他躲开我的目光，哀哀地说：“我上有老、下有小，有三个小孩，你说我怎么办？你一个光棍汉当然不怕……”

我压住火，轻轻地推开他：“你走吧！我不连累你。”

殷庆宝并没有走，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算了算了”地劝。我被他烦死了。但也起了恻隐之心，决定让步。我请门卫打电话请那便衣出来。便衣出来了，问我们为什么还不走。

我问：“你请示上面了吗？”这是我顾全大局的说法，他当然不会傻傻乎乎地把我的话

拿去请示。

他平静地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家，你们的家人一定在等你们回去，再说你们也受了伤。”他用同情的口吻来作动员了。

我不买他的帐，不愿这样灰溜溜地走，我说：“昨天上百人对我们打砸抢，请你们公安局处理这些人。”

“对你们作出革命行动，怎么能说是打砸抢？”

“既不是打砸抢，为什么抢我的眼镜和皮夹子？”

我提出眼镜和皮夹子，是要在临走的时候找点岔子和他搞搞，并没有期望能要回来。想不到这位公安同志却认了真，问我和殷庆宝被搜走了哪些东西，认真地一一记录下来，对我们说：“你们等一等，我与机床厂联系一下。”又进门去了。

他这一去，直到午夜也不见人影。殷庆宝嘟嘟囔囔地埋怨：“走吧走吧，别同他们搞了，这点钱别要了，出去后我赔给你好了！”

我生气地说：“你是资本家？算你钱多？你我皮夹子里一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你的不要，我还要。你就是走，身上没有一分车钱，怎么回家？”

他竟说：“你家就在隆昌路，几分钟的路，先到你家不好吗？”

我横了他一眼：“你我这副熊样，不要把我娘吓死吗？我才不想让家里知道呢！”

殷无话可说，只得耐心等待。

一点多钟，那位便衣总算出来了。他带来了我们所有被搜走的东西。看来，这是一位负责而老练的公安，在半夜里，他竟然把事情办妥了。

他如数还了我们的东西，只是扣下了红色工人总司令部的常委工作证。我不依。他说：

“怎么？你们通过这次教训，还不死心，还要重拉队伍？”

我不依不饶地说：“是的！你把我关起来吧！”殷庆宝急坏了，他拉了我就走，也不怕腰痛了。

又回 6743

深夜，我们俩一瘸一拐地走在空旷寂静的平凉路上，殷庆宝让我先回家。我摇摇头说：“你伤得很重，还是先去医院吧！”殷归心似箭，说：“还是先回我的家吧！不去医院了。”我坚持先去医院，因为杨浦区中心医院离这只有几分钟的路。

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医生、护士和一些病人家属都睁大了眼睛呆看着我们。他们一定明白，我们是被抓被打的支联站头头。众人一概不响，医生更是不敢问一句题外话，只是小心地给我们开了一般的外伤用药和“三七”、止痛药。我们在急诊室饱饱地灌了一肚子冷开水。我扶着殷，一步步向电力专科学校门口的 25 路电车站走去。等了不一会儿，25 路通宵车来了。到外滩又转 71 路通宵车。殷的精神似乎好多了。他说：“天还没亮，不要去惊动家人了，我们还是回愚园路联络站吧！”

到了 43 号门口，门关着，不管我怎么碰门和喊叫，楼上的资本家就是不下来开门，我顿时火起，恨恨地说：“真是人一落魄，狗也敢咬了！”我绕到南面，翻墙进入花园，沿着墙壁的水落管三下两下爬上了二楼阳台，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劲，这么大的火。

我怒不可遏地冲进资本家住的那间屋子的落地玻璃门，喝令资本家起来。

男的抖抖索索爬出了蚊帐，但床还在晃动（必是那女的还在帐子里发抖）。我大声呵斥道：“我在下面报了我的姓名你为什么还不开门？”

“你们组织被封了，我已被造反队训过话，不准我……”

我打断他的话：“快点！去开门！殷庆宝还在下面。”

他迟疑着不肯动。我怒火中烧：“怎么？穷爷的话你敢不听？你当穷爷完蛋了吗？告诉

你，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的。”我一把拖了他到隔壁我们用的房间门前，门上赫然贴着“××路房管所封”的封条。

我一把扯了封条。他带着哭腔哀求道：“不能扯，不能扯呀……”

我说：“我敢作敢当，你天亮后去回报吧！就说是我沈××撕去的。我不怕！”资本家哭丧着脸立着。我瞪着眼命令：“快去开门！不老实我就打你，把火出在你身上。”

这一招果然灵，他去开门了。等殷庆宝上来时，我已经用钥匙打开了门。里面收拾得很清爽，不像一般组织之间的打砸抢后一副杂乱场面。只是印刷工具和印好的宣传品被搜走了，私人的东西却没有少，我挂在门后放替换衣服的拎包都在。这更证明这次行动是对我们有组织的打击，而且计划极为周密，打击到什么程度的命令也执行得很严格。看来，这次行动的确只是警告我们停止一切活动，不想把我们逼得太凶，把我们放出来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我和殷庆宝坐在皮沙发里，资本家混身发抖地站着，我命令他“速去烧水，侍候穷爷们洗澡”，我这个刚从公安局放出来的“犯人”现在对资本家“专政”了。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他乖乖地去烧水，不多时他来说水开了。

我发怒地说：“怎么？听不懂么？快去服侍殷庆宝洗澡。”

他一声不响地与殷走到卫生间里去，不多时殷洗好后出来，资本家又把水倒好，在旁真的要来侍候我。我手一挥：“滚！”他乖乖的走了。我舒服地躺在浴缸内，一时迷迷糊糊，差点进入梦乡。

洗好澡后，天色开始发白。我们休息了一会，殷说回他家去吧！我们在离开时，资本家在门口，哭丧着脸，小声嘟哝着什么，我大声说：“你去回报，就说我沈××撕的封条”他连说不敢不敢。

我放缓了口气说：“你主动去，这样你才不会挨训挨批。还要说他们重又占领了这座房子。”

临走，我要教教资本家怎样保护自己，不被我们拖累。

回殷庆宝的家

殷已经用不着扶了，我们神气地走出了 43 号。华山路上已经有行人，一辆赶早的三轮车踏过，殷神气地一招手，我们上去，到了他长乐路的家下车，气派地付了五角钱。他家门还没开，一家人还在睡。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呼唤他妻子：“惠玲，惠玲！”

片刻，门开了，他的妻子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嘤嘤地抽泣起来，上下抚摸，轻声问哪里受伤了。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镜头。

我在后面忍不住了，小声说：“嗳，嗳，差不多了，可以让我进去吧！”惠玲抬起头，这才发觉还有我呢，顿时羞得满脸通红，头一低，赶快让我进屋。

这是很小的三间平房，实际是三间坡屋，六、七平方一间，一间殷的父母住，殷夫妇及三个小孩住中间，还有一间殷的弟弟搭一只床，吃饭起居就在这一间。

他的父母也闻声过来，对着我们看了半天。我们现在容貌整洁，衣衫刚换过，要是直接到这里，其“尊容”一定会吓坏二老的。我潇洒地说：“我们很好，只是庆宝的腰扭伤了，问题不大。”我安慰大家。他母亲说：“你们饿了吧？老头子，快去买早点。”殷父忙不迭地就走，殷庆宝说：“多买点！”

是啊，已经有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了。在 43 号，我尽管呵斥资本家烧水伺候洗澡，但我们绝不会命令资本家做饭。

很快，早点来了，豆浆、油条、大饼、锅贴摊了一桌，散发着那么香那么香的香味！他们全家看着我俩吃。我的吃相一定非常难看，我似乎一生没有吃过如此香甜的食物，没有喝过如此甘美的玉液琼浆。

吞吃得快饱的时候，我才有时间悟出一个道理：为什么拷打一夜后，最后不出汗了，也没有大小便一次？那是因为两人二夜一天只合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冬瓜汤，身体里的水份早就熬干了。

从惠玲的口中我们知道了外面的情况。那天，我和殷庆宝从南面阳台跳下后，其他人员从竹梯子翻入北面的湖北省驻沪办事处，旋即顺利逃脱。一周姓工作人员，相当灵活，出去后立即混入愚园路上的人群之中，在半路上把王继鑫、郭文美等人截住，当我和殷庆宝被推上卡车押走时，他们目送我们开走。好险！真是只差一步啊！

王、郭虽免于一难，但当夜已是惊弓之鸟，不敢有什么活动，仅去通知了殷的家人，第二天早上又通知了我的姐姐。相约之下，他们化了一个白天走访了市政法指挥部——一个统管上海公安、检察、法院的权力机构，又走访了市革会的其它有关部门，但接待人员一律称不知道此事，说不知道是哪个组织和机构抓的人。走访无结果，是在“情理”之中的。

王、郭两人还是够朋友义气的，他们昨天奔波了一天，今天一早又赶到殷的家，喜出望外发现我已经好端端地坐着，殷已经好端端地躺着。

我不愿当着殷家人的面谈什么，就留下殷养伤，对王、郭提议回联络站去谈。

王说联络站已经被封了。

我用嘲讽的口吻说：“就那么一张封条你就不敢进去了？就这样散伙了？”

他有点尴尬，辩解说：“我们总要先营救你们两人才是。”

“封条被我撕了，在哪里倒下去，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是我。你们要是怕就不用去了。”

我的话当然刺痛了他们，但这两位忍了。

决定回厂

进入联络站后，我们一些在附近观望、探风的人发现了我们，重新又聚集拢来。

我在对王、郭的谈话中，没有提及殷的差劲表现，算了，顾及他的面子吧！再说，他腰受了伤，情况与我不同。

在后来的几天中，联络站的工作转了方向，不再提重拉队伍的事。对这种转向我很不以为然，我还没有从被严刑拷打中产生的逆反心理中冷静下来，为此我同大家发生了一场争执。我偏激地认为还应该重拉队伍，而不应该搞这种不痛不痒的“大批判”。我的观点只得到郭文美一个人的支持。

冷静下来想一想，重拉队伍的气候确实已经丧失。“8•4”行动后，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在野”的群众组织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上海成了工总司的一统天下。这种气候下，提出重拉队伍，群众是不会冒险跟我们走的。

既然时机已经失去，我们当然只能搞搞大批判。但我觉得，这样刻刻、写写的半公开半地下组织，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既不能在群众中产生什么作用，更不能对上层、对中央起什么影响，谁也不会理你。我对目前这种活动方式丝毫不感兴趣。我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

我在作出这样的判断后，遂决定告别众人回厂“抓革命、促生产”。

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大家，郭文美对我一再挽留。我对她说：“我对组织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这样的搞法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而且有的人一旦大难临头，想到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样搞下去，我也寒心了。”

我的暗示，她当然心领神会，我们两人黯然神伤，默默不语。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我想到了一件往事，就是在去年 11 月份，组织成立伊始，在乌鲁木齐中路总部三楼组织部的房间内，黎伯昂偷吃糖果殷捉住后，黎曾写下一张交待认错的纸条给殷。

现在我要离开大家回厂了，我向殷要求把此纸条给我。我的动机是朋友一场，不要把这张屈辱的纸条留在殷的手中，我要回来可以回厂后还给黎。想不到殷却要我请客吃一顿，才能把此纸条还给我，一面讲还一面笑。我心里骂了一声：“流氓”。但我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朋友的面子，就答应道：“好！今晚在绿村我请客，王继鑫，郭文美你们也去，我与诸位饯别。”

这顿晚饭，吃得很闷，只有殷一人谈笑风生，一改数日前哼哼不停的可怜相，这个可鄙的叛徒！

席间，殷把字条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喷了一口饭，黎的纸条上竟写偷吃糖的行为得到了我的同意，而且我也一起吃。

虽然我知道，这种捏造事实的写法是为了迎合殷当时要打击我的目的，但我仍感到一种被朋友出卖的伤痛。殷庆宝为了夺取我的权力，竟这样处心积虑地在背后做小动作，时至今日，还要敲我一记竹杠，全不想数天前我对他在“里面”的照顾，而且出来后我也没有把他的行径公诸于众，他真是无情无义。唉！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这样肮脏、卑鄙。

我心灰意懒，什么也不想了，决心老老实实做一个工人。尽管席间郭文美又提出挽留之语，我只对她凄然一笑，低沉而又坚决地说：“我算了一算，今天该我夜班，我马上回厂去上夜班！决心下了，说上班就上班！”郭诧异地问：“已经三个月不上班了，何必那么急呢？”我喟然长叹，默不作答。

我作出回厂的决定，是轻率的，它使我过早地失去了保护。

第二十五章 秋后算帐

打手的世界

我告别了他们，匆匆赶到厂里。那个泰兴老头，安排了我的工作岗位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我在酸洗工序的出布岗位上。

不多一会，发觉有些异样，没有人同我说话，有个姓刘的坏种，若即若离的在近处对我监视着，还不时有造反队的人远远看一看就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果然，半个小时后，造反队头头之一的姓蔡的坏种同姓刘的走来，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

我一进办公室，马上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职业打手”。完了！我又要被严刑拷打了！这些人用黑布蒙上我的眼睛，押上卡车。待他们扯下我眼上黑布时，

我一看，又是在一间教室内（事后知道是上海航空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人的学堂成了惨无人道的同类相残的地狱，这真是对人类文明的嘲讽。

后来我才知道，在杨浦区虹口区的一些工厂和学校，组织了一个叫虹杨联防站的组织。我不知道他们的宗旨是什么，联防？防什么？防谁？实际上他们是工总司属下的基层造反队联合组织的一批打手。称他们为“职业打手”毫不为过。这些学生和工人，不念书不做工，就是每天打人，打无辜百姓，美其名曰打流氓。工厂造反队之间发生争执，发生武斗，就派这些职业打手上阵。

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武斗：在文革前我们厂同外厂共同联办了一个职工疗养院，因为我厂出的经费最多，所以领导权亦在我厂，该疗养院也以我厂命名，叫上海绒布厂疗养院。在造反夺权的日子里，疗养院的夺权成了问题，各厂造反队谁也想夺这个权，要在“疗养院”三个字前面挂上自己的厂名，于是各厂造反队争得不亦乐乎。其中有一家是上棉卅二厂，这厂出了一个王秀珍，是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红极一时的市革会委员。因有这个背景，该厂动员外厂几千人来冲我厂。我们厂就把虹杨联防站上千人的学生调来，把工厂筑成一个堡垒，用硫酸、烧碱作武器（纺织印染厂里这种“武器”多得是）对付冲击者。这次武斗，幸好被军代表及时制止了，否则其伤亡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外面几十辆卡车冲来时，我厂原来的一位党委秘书（现时也是工总司造反头头），为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到大门口进行劝阻，被对方用弹皮弓弹瞎眼睛一只。外厂有几人被抓进来毒打了一顿。尽管大规模武斗被制止了，但毕竟是伤了几名无辜者。“虹杨联防站”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打手的组织。

在文革中，出现打手和以打人为乐，是必然的。毛主席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就对一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要武嘛！”既然老人家倡导“武”，那位红卫兵当即改名宋要武。于是，从中央报刊到街头小报，无不充斥着“专政”的语录，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种“暴力的行动”，煽动红色恐怖，播撒阶级仇恨，把文革序幕中，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那一点点当作遮羞布的学术气氛扯个干净，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中国从一个礼议之邦，一下子成了打手的世界。

当文革结束，武斗的烟尘降落后，人们看到了报应——兽化的尚武，并没有使民族强悍，反而使见义勇为者大大减少。因为文革的武斗是对无辜者的施暴，是对弱者的酷刑。它培育的不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只是狐假虎威的懦夫。它摧残了人性，摧残了民族精神，毒化了民风。如果说文革对经济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对民风的毒化则是更大的犯罪。中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把国家打个稀烂，三年不就恢复过来了吗？大跃进、浮夸风使国家饿殍遍野，三年不也恢复过来了吗？但民风的恢复恐怕要化几代人的努力。文革结束已经近三十年了，人们称赞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们却悲叹人心变得刁滑了，社会诚信水平大大下降了。

这笔帐不知找谁去算。

毒箭双雕

我站在教室的一隅，几个杀气腾腾的打手环立我的身旁，手痒痒地急于要动手。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已经领受过了，我心中明白，厂内的造反队头头尤其是车间的头头，他们是在用打击支联站头头为借口，对我进行报复。

六六年夏天，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中，我们车间的大字报大都出自于我的手，触痛了一些人。后来在六七年二月红工组织解散，我回厂的一段时间内，我又用大字报同他们唱对台戏，冲击批斗厂长和车间党政领导的大会，使这些工总司造反队头头对我恨之入骨。现在我轻率地回厂，正撞在刀口上。得！我认了，我只有满足他们的复仇心理了。

打手们刚要动手，忽然从外面走进一人，我一看，是我车间的造反头头蔡长根，此人猴腮尖嘴一肚子坏水，他插在我与打手之间，对打手眨了眨眼，对我说："这里是虹杨联防站，把你抓来的是联防站，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在假充好人了）。只要你讲出厂里支联站的成员情况，就没有事了。"

我对他说："厂里支联站我不知道，我不在厂里，如何知道呢？"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他歪了歪嘴，这些打手立即扑了上来，"大背包"接连不断，人尚未站稳，又被凌空摔起。我干脆不起来，他们就用厂里带来的织布机上的"打梭板"猛力抽打屁股，我一阵阵钻心的痛，撕心裂肺的痛。这次打的要比上次厉害多了，我不得不以揪人的嘶叫来减轻痛苦。

打手累了，休息的时候，蔡和厂里外号叫狗熊的出来讲话了："你还是讲了的好，何必皮肉受苦呢？"这些打手以满足的神情，歪着头嘻笑着抽起香烟，欣赏我的痛苦。

我重新对他们说："厂里支联站的事，我不知道，我人在外面，有些什么人参加，我怎能知道呢？"我的回答，实际上他们也明白。

"那么，上绒支联站（筹）是你搞的吧！"

“是的，那张支联站（筹）的宣传品是我张贴的，我贴出后就离厂了。”

这时又进来几个打手，他们没有参加刚才的打，似乎损失了什么，便插话说：“不交待吗？”蔡对他们点一点头，这几人冲上来，把我拖翻在一只长条凳上，我脸朝下躺着，他们就抡起“打梭板”轮流抽打，直打得我拼命叫喊。

厂里又有几个头头赶来，看看不对，出面制止道：“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事体来。”（这是指不能打死我。）这些打手才歇手，又是抽香烟、嘻笑。

他们把我拖起来，我的下半身像在火里烧烤那样刺心的痛，我望着昏黄的灯光，晕晕乎乎的头脑一片空白。这时忽然从隔壁传来陈鹤鸣的声音，我明白造反队把他抓来关在隔壁。只听有人在说：“刚才沈××不老实，不肯交待，你已经看见了，怎么样？不要不识相，还是识相一点好。”又听陈鹤鸣急急为自己辩护：“厂里支联站头头是沈××，不是我。”这小子真不是人，明明他以头头自居，发展组织了不少人，而现在却全推给了我。

“啪——”一下响亮的梭板打在桌子上，“怎么？要吃生活（打）吗？”我只觉得陈的声音逐渐低下来，嘟嘟哝哝再也听不出说些什么了。我有了殷的教训，知道此人要出卖我了。

过了半天，厂里的头头们从隔壁走进来，又开始对我审问：“你还是交待的好，陈鹤鸣已经坦白了。”

我明白不开口不行了，而且我不值得为了保陈鹤鸣这样的软骨头而受罪，我就叙说了他来找我的过程。但我没有把我知道的另外两人的参与说出来。他们对这样的“交待”当然不满足，要我把所有参加的人的名单交待出来，我坚持说不知道，他们居然也不再继续追问我，反倒穷追不舍逼我交待厂里的党员干部是否有人参加。这时蔡长根又用软的一套“诱供”，明确要我把党委书记参加支联站坦白交待出来，软的不行，又来硬的，把我拖翻在地又是一番毒打。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逼我把党委书记范雨生逼上死路，我心想，这些人也太狠心了，夺权就夺权吧，何必这样无中生有地陷害一个人呢？喔——不对！这坏种今天是毒箭双雕，既可对我报复，又要利用我达到诬害党委书记。事后一旦真相大白又可一点不负责任，罪名由我来承担。这着棋太卑鄙了！

我说：“蔡长根，你太阴险了。你打吧！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总有一天我不会饶了你！”于是，免不了又遭来一顿毒打。但只要打手停下手来，我就是这样一句话：“要打，就打死我，不打死我，你蔡长根不要想太平！”

我这种顽强态度，倒也镇住了他们，他们停止了审问和拷打。又把我连夜押回厂里，关在工会的二楼走廊。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呻吟（这时的痛疼简直无法忍受），这惊动了驻在我厂的支左军代表，一位年轻的战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什么呢？我没有理他，只是翻动身躯，啊呀，啊呀地呼叫。他呆了一会，把医务室的夜班医生，一位叫朱敏的女医生叫来。这位“白衣天使”一见我这个“支联头头”或者说“临时工头头”，便“噢，这个人呀！”回头便走，啥话也不问，啥药也不给。

我看着她走了，我从心底里可怜这个女医生。你是一位医生，而且是解放军请来的，你如果是怕的话，我也能理解，但你那对我不屑一顾的鄙夷，说明了你并不是怕得罪造反队，而只是轻信谗言，随风摇摆，也把自己降得那样低微。

我想吞下纸条

那个年青的解放军战士在我的身边站了一会，也走了。我继续在地板上翻滚，天色开始发白。天亮后，他们把我关进东头原团委办公室内。我一人在空荡的房子里，听着楼下的路上，不时有车间里的工人走过，从他们的声音中我了解到，这时厂里造反队开始对凡参加过支联站的人，三、四人一抓，分批往航校送，由航校的打手拷打。一时把厂里的气氛搞得恐怖万分。

我在抚摸伤痛时，突然手指触及口袋内的纸条。啊！昨天晚饭时殷庆宝给我的黎伯昂写的字条！如果这张字条被搜去的话，他们只要把这字条照抄，在前面加上一两句说明，我们两人将在全厂三千工人面前成了偷糖吃的小偷，会有多少人笑话我们，几年后还会有人把它当成笑柄。这太严重了，我要消灭这张纸，把它吞下肚去，像电影中地下党那样。

不过，时间还来得及，并不是到了电影中国民党搜捕拍门的关头，再说吞纸张一定不好受。我就把纸撕成小小的碎片，想把它撒到窗外去。

窗外，对面大楼的底层，就是造反队办公室，千万不能给他们发现，而且两座楼之间是一条通道，来往的人不断，一次撒多了会出问题。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扔。幸好一阵阵的东南风帮了我的忙，纸片飞得远很开，我用几分钟了了这件心事。花了十几元请客要来一张纸，又冒了被造反队发现的风险消灭掉，想想可笑。我真是白痴！

好了！绑架、拷打、审讯，我都经过了，这次又差点吞“文件”，我都能挺过去！我对

得起组织，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算得上一条硬汉。

这天的中午，我被看管着去食堂吃饭，我在一个角落埋头吃着，一些布机间挡车女工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议。不用说，我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从飘过来片言只语中，我知道了两件事，第一是上午有大批人被抓到造反队和航校，只是几拳也就了事，没有受我这么多罪。第二件事，使我极为痛苦，因为从她们的话中露出，是由于我的招供才导致了这些人被抓、被打。

我成了罪魁祸首！我成了出卖大家的叛徒！我有口难辩啊！这顿饭吃得好痛苦，我咽不下，但还是在强咽，这样可以拖延一点时间，再听听一些外面的消息。一直到慢慢吃完，也听不到党委书记范雨生的一些信息。我判断，由于我不肯就范，造反队陷害范书记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二、三个月后，我才知道，陈鹤鸣这孬种那天夜里，没有挨过一记打，一吓就交待，咬出了五十多人。第二天白天，这五十多人全受到了冲击。这其中有陈鹤鸣顺着造反队头头的意思，胡乱咬出来的人，这些头头乘机报复，满足了个人恩怨的老帐。

原来的一个电工、一个机工是参与搞支联站的人，这次也吃了一点苦头。由于陈鹤鸣使坏，假充好人，说我把他们招供出来，他们两人一时对我恨之入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路上碰见，都给我看白眼。直到多年后，这一内幕逐渐从造反队中传出，陈鹤鸣的为人才逐渐被人彻底看清，这些受害者对我表示歉意。而且从这一件事上厂里的工友都看出我不肯出卖朋友，讲义气的品性，反而进一步树起了对我的敬意和威信。

逃出去！

下午，蔡长根又来了。（上午不见人影，大概睡足养好了精神。）他们对支联站的人员已经不感兴趣，该打击的，他们已经打击了。（实际上我厂的支联站并没有干什么事，徒有一个空名）。现在对我揪住不放，要我交待车间党支部及支部书记在执行“资反路线”时的一些详细情况，在组织大字报时，谁出了什么主意，干了什么。在党委书记范雨生的问题上，一再逼着要我把他与支联站扯上线。

我冷静地想了想，不管我怎样挺住不开口，姓蔡的坏蛋也一定会说我已经如何如何交待了，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对他要进行报复的干部实施打击，事后，把一泡稀屎拉在我身上，他则可以轻描淡写推卸责任。

不！在现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我要改变策略，对这些干部我要保护，不能让蔡制造我的假口供，使他们遭受肉体折磨和政治磨难。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共产党的信徒，对厂里的这些干部，还有一些感情联系。在文革初期，我参与了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造反队头头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是有问题的人。我仍坚信，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百姓之所以受苦受难，是由于下面的干部，现在是造反队头头歪曲了上面的政策。

那么，怎么保护自己呢？我不能硬顶。硬顶除了皮肉再次受苦，还挡不住他们制造假口供。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对！逃！一逃了之。

主意拿定，我同蔡周旋起来。我想，只要混过眼前，然后瞅机会赶快逃。我装出一副温顺的样子，对他说：“我混身是伤，让我休息休息。”我还特意把裤子解下来，整个屁股已经发紫发黑（他一看，肯定充分满足了报复的欲望），我又说：“你们下毒手打得我如此，终不能逼人太甚吧！如果把我打死，你怎么交差？”

这又软又硬的两手，使他没有进一步逼我，他还没有开口，我又说：“明天你来，我一定交待。”他现出得意的奸笑，大概想不到我会软下来答应交待，很快走了。

晚上，一开始睡不着，直到下半夜才睡着了。天刚亮，我就醒了，我注意看了看，外面走廊上竟然没有人看守。我很高兴，出这座楼不成问题，但如何走出工厂的大门呢？如果门卫把我拦下来怎么办？而且现在时间尚早，上早班的人还没有来，一般来说大门还没有开，这样出去，必然要被门卫拦住，但又不能太迟，迟了进厂门的人多了又不好。

我耐心地等了一会，估计大约 5 点刚过，我快速下楼，直到厂门口，没撞见一个人。往前一看，大门洞开。我便以稍快的脚步走向厂门。一般来说，门卫不可能追赶出来，他们同情心总有吧！如果是同造反队头头一条心的人当班，只要我走得快，冲出厂门外，我就不怕了，一对一我可以奔跑，可以逃离。不怕！我快步经过门卫室，两个值班的人，对我看了看，扭头只当没有看见。

好！成功了！我快速走出厂门，向 25 路电车站走去。去哪里呢？不能回家，回家他们可以来抓。到愚园路 6743 去，他们是不敢到那里去抓我的。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联络站。

两天后，蔡长根竟由黎伯昂带领着来到愚园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继鑫也想马上动

手教训他一顿。黎赶紧声明说，他是向厂里保证过的，要保证蔡的安全，请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要动手了。我真恨啊！你黎伯昂不该屈从他们的压力，蔡有胆量来就让他自己来，你真不该来。王继鑫几个人不管，走上前去要打蔡，把蔡吓得脸都变了色儿。我为了朋友只得劝阻王继鑫等人。蔡大概是受了厂里造反队的训斥，叫他来找人，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拖了黎当保驾来叫我回去。并说回去后保证不怎么怎么。

我当然不能上他的当，拒绝了，恨恨地骂了一通。

我重新在联络站呆了一个多月，不过，对联络站的工作不再参与，无所事事，在混。

到了十月中旬，厂里的党组织像上海的其它单位一样开始恢复，先是以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恢复，后来再恢复党委。党组织的恢复，意味着造反队权力的削弱，这些头头不可能再胡作非为了。这时，我就马上回厂。果然谁也不再来与我纠缠，我重新做我的工。

“专案审查”序幕

这时的上海，自 8•4 后，趋于稳定。九、十月份，各单位党组织相继恢复，市革会这个上海的权力机构真正地开始稳固。虽然在“一•二八”，“四•二七”两次炮打过张春桥，说他是叛徒，但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保他过关，上海的炮打事件也就烟消云散，他在中央和地方的地位十分巩固。王洪文的地位也已确立，成了上海的“工人领袖”，一个实力人物，张春桥、王洪文成了相互依靠的帮派集团，这就是日后发展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一稳定，就要开始“算帐”了。市革会、工总司继“8•4”大行动后，以原公、检、法为基本力量，掺以各单位抽调的工人，组成各有针对性的“专案组”，对各路在野的造反人物进行“专案审查”。

我在十月初回厂后，过了一段安定的生活。愚园路的联络站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活动和解散了。

到了十二月份不断有消息传来，我们这一圈子的人陆续开始被审查。

审查的序幕是这样开始的：专案组以市政法指挥部的名义指定某人去胶州路派出所报到，要你去写交待。每天早上去，晚上放回家，几天后再调换另一人去。这段时间后，王继鑫、郭文美、朱力军、刘俊等人相继被正式关进公安局，后来转入思南路看守所。

那时社会上流传，凡自己认为要被抓起来审查的人，事先必须准备好一套“毛选”，五斤粮票，两元钱。我扳扳手指头已经差不多了，早该轮到我了。我准备好毛选、粮票和两元钱放在更衣室的箱子里，每天等待厂里造反队的通知。

但通知很久没来，我像条漏网的鱼。一直到了六八年的一月二十日，这天我是早班，刚发好工资，我被人喊去。

轮到我了！

来人要我去造反队办公室，我明白轮到我了。我就向同组的工友们告别，我说：“再见了，我要同你分别一段时间了。”有人打趣说：“哟！你又要出去造反了吗？做了官可不要把我们忘记呀！”我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呢？我马上去更衣室拿了毛选等物，换下工作服离开车间。

到造反队办公室的大楼前一看，没有吉普车。

怎么？没有用车来抓我？我走进造反队，几个头头用一种不在乎的眼光对我看了一眼，说：“你现在去市政法指挥部，马上就去。”

我看了看周围，办公室内没有陌生人的面孔，更没有穿公安制服的人。

我问：“我自己去？”

“是的，你自己马上就去。”

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去政法指挥部，而不是胶州路派出所？我又问政法指挥部在哪里？那姓王的头头说：“怎么？你不知道？”他翻了一下，在抽屉内取出一张纸，说胶州路××

号。

噢！还是胶州路派出所啊！

我出了造反队，心想，如果马上就去，今天肯定要饿肚子。干脆吃了午饭走吧！我立即赶到食堂，一个人在角落里埋头吃饭，装饱肚子好去受审。我明白，这次的受审要正规多了，动手严刑拷打是不可能有的了，但也难对付了，因为这是一些正规的公安人员，要想蒙混过关是不容易的，但我并没有恐惧，吃完饭很坦然地骑上自行车就走。转念一想不对，万一他们今天就把我关起来，这辆自行车怎么办？我不能失去它，算了，乘车吧！

到了静安寺，徒步走向派出所。这派出所原来在万国殡仪馆的隔壁。我不禁想起了那次为了我们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在这里开的追赶悼会。那时我们确实风光了一阵，门口大小车辆不少，一个做临时工的平民能进万国殡仪馆，场面搞得那么大，不容易啊！可现在我们组织垮了，我是作为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来接受审查的，不久将走向监狱，走向劳动改造的营地，而且是那么的“自觉”和“自动”。

后来看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早就这样做了，在苏联，那些被审查的人更“自觉”了。一个妇女被抓走了，留下了出生才几个月的婴儿，邻居的一位妇女出于同情和母爱，不愿看到这条小生命夭折抱来照料。隔了一段时间后，这位邻居的妇女等不到被抓妇女的消息，她就去有关部门询问，并询问对于这个婴孩如何处置。好，这个妇女就自动送上监狱之门！当局为了凑数，也就不管她一点没有什么“罪过”，也把她抓进劳改营地，再也不见回家。

自觉走进监狱的人们

五十年代，在我们上海，我们厂也有这么“自觉”走向公安局，走进监狱大门的人。

一个运动到来了，厂的领导和保卫干部就要拟一份按上级要求的数字，填满要抓的人的名单。这些没有犯什么罪过，却是有个性，不愿俯首听命，在平时顶撞了领导的人，被认为是不听领导、不听共产党话的坏分子。其中有一人被一名工会干部很偶然地保了下来，这干部对他的上司说，这人就是脾气坏了点，人倒是不坏的。就这样把他从名单上勾去，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数字，又把另外一个凑了上去，这下这名凑数上去的人倒霉了，一去二十几年，直到文革后才给予平反。

由于每次运动中列在名单上需要“送走”的人太多，厂里保卫干部一时忙不过来，就会

直接通知本人。接到通知的人就会自动地拿了铺盖、衣物、日用品喊上一辆人力三轮车，走向公安局，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现在，该想想为什么那个时候人们会那么顺从地、自动走进公安局了。是无处可逃吗？的确是原因之一，因为严密的户口制度和无所不有的票证制度使无户口、无任何基本生活票证的人无处躲藏。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那时的百姓太老实。大家都相信共产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既然自己不是坏人，那么叫去就去呗！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最多在里面呆十来天就会出来。而进去的人为什么去了就没有回来呢？外面的人就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是坏人！而回不去的人经过反复的引导、“教育”后，也会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的确犯了罪，是个坏人，把自己关起来是“挽救”，对外面尚未犯罪的人是个警戒。

说实话，那时共产党的威信实在无与伦比。有的人家小孩学坏了，大人管不住，也会自动地把孩子送到公安局去，让共产党来管一管。公安局收下孩子之后家长放心地走了。过几个星期家长去领孩子的时候，却领不出来。对不起，孩子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一直过了三十年，孩子变成了半大老头的时候，才平反。

这实在太轻率！

之所以轻率，是因为自己是胜利者。

胜利者是很难自律的。尽管共产党在胜利刚刚现出曙光的时候，就让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汲取李自成腐败的教训。但，共产党是一个无人能够制约的党。没有制约的权力是必定要腐败的权力。虽然那时贪污腐化并不多见，但草菅人命、侵犯人权却比比皆是。这是比贪污、腐化更能刺伤百姓心灵的腐败，胜利者这样玩弄百姓的敬仰，太不爱惜自己的威望了！

单纯的我，根本不明白进狱后的非人待遇，还异想天开，为不能尝尝铁窗风味而懊恼不已，直到若干年后，读了《生死在上海》这本书中所描写的真实的思南路看守所内的监狱生活，才后怕得打了个冷战。

这时的我，坦然无惧地进了胶州路派出所。

写“交待”

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那民警要我稍等，一会儿，有两个年青便衣把我领进一间房中，他们要我坐下，给我一迭报告纸，要我交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我说我没有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参加的。这两位便衣还算客气，没有大发雷霆，只是说，你把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经过情形写一写也可以。他们扔下一迭纸就走了。我一个人就这样呆坐在这间房中。

我对这间房作了观察，这派出所是一幢花园洋房，我呆的这一间朝北，外面是一片草坪。西北风从窗缝吹进来，这是一年中最冷的三九严寒天气，一个人坐在冷板凳上一动不动，实在太冷了，冷得脚趾发痛，手指发麻，时间久了，一直冷到骨髓。

我就这么呆呆地坐着，突然从左面的隔墙传来一阵鸽子的咕咕声，啊！鸽子。我的脑海突然涌现了一张五十年代的宣传画：两名活泼可爱的儿童，一男一女，手捧和平鸽，画的名字是《我们要和平》。但文化大革命要的是战斗！连在海上航行的“和平××号”的货轮，一律被改为“战斗××号”，“平安电影院”改为“战斗电影院”，哪里有和平啊！我觉得一阵阵的咕咕声好烦人！

这一天从中午到下午，一直没有人来管我。天黑了，我实在是又冷又饿，就去找派出所值班的，一位女民警说：“你等一等。”我又退回小房间。过了一会，她大概通了电话，得到指示，来通知我说，你今天可以回去了。明天早上八点再来。

我快步走在寒风凛冽的马路上。行人稀少，静安寺也失去了夏日之夜的繁忙和热闹，我匆匆在一饮食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急急走到殷庆宝的家中。

我告诉他现在轮到我了。他告诉我，其他人已经正式关起来了，现在搞联络站的就我们两人没有关起来。他还说，在昨天以前的一星期他也在那个派出所那间朝北小间坐了一个星期。他夸夸其谈，说他如何如何地与审问的人顶了起来。我默默地听着，似信非信，没有久坐，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老实地到胶州路派出所按时“上班”，那两位便衣还不见踪影，我就在窗口望着枯黄的草坪和凋零的树木发呆。直到九点多钟这两人才出现，他们要我把交待材料拿出来。我把只写了几十个字的纸交给他们。两人一看，大发脾气，说我不老实，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我不去同他们争辩，他们也不想与我周旋，虚张了几句要我老老实实把经过写下来，又匆匆走了。

这就开始写我的交待。

我写道，在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号召下，我们起来串联，起来造反，于 66 年 11 月 15 日得到华东局的承认，成立了组织。又是只写了半张纸，写完我就看窗外的草坪、树木。这时隔壁人家养的鸽子被主人放了出来，鸽子自由自在地在草坪上嬉戏啄食，有深雨点也有浅雨点，还有灰壳，我看来看去就是没有酱鸽（一种咖啡色的鸽子）。我站在窗口，冷气透过玻璃，刺人心肺。我挪动着双脚，不断移动着冻得发痛的脚趾，等待着从鸽棚里能飞出一对酱鸽来，但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失望。

读小学时我也养过鸽子，有一段时间特偏爱的是酱鸽——“双阳”纯种。那时养鸽子的讲究要种纯，品种有：司大瑟，凡尔琴，日本黄种，李美林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再也没有纯种鸽子。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看着枯黄的草地，看鸽子，百无聊赖，一时莫名忧愁袭上心头。这样的审查算什么王法？关不像关，放不像放，没有自由，让你“自觉”地走进牢笼，精神上的压抑让人觉得气也透不出来。人啊，还不及这些咕咕叫的鸽子。

毛主席在去年号召全国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系列的社论、最高指示，一次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这一切让人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对人民是那么的信任，把人民调动起来，把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调动到疯狂的地步。毛主席实在是伟大，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著述那么多，加在一起恐怕要有几千万字。可是毛主席只用一句话就把它们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南昌起义、井岗山，不就是造反吗？劳动者向剥削者造反，夺取应得的权力，不是天经地义吗？不是天然合理的吗？全中国、全世界哪里能有第二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如此精辟的概括呢？没有！只有毛主席，只有伟大的毛主席！

然而，为什么今天，却把一批批造反的人投入监狱挨整、审查呢？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上柴联司又是犯了什么罪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造反有理”是骗人的。是谁在骗人呢？造反自古是要杀头的，现在你不是起来造反吗？你是在造谁家的反啊！造共产党的反那还了得，今天就抓你来了。

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一股愤怒在心头激荡，我犹如一头困兽在房中不时走动。

夕阳西下，那两个便衣来了，我仍站在窗口，我不想坐下来，直直地站着，看着他们。两人拿起我写的纸一看，就大吼大叫地开始对我训斥：“沈××你不老实！难道你想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吗？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与他们顶了起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按他的指示起来造

反有什么错？难道我写的东西不对？我看你们才是在反对毛主席”。在我毫无顾忌地与他们一句来一句去顶牛的时候，有一位便衣出去了，我估计他去打电话汇报了。

走了的便衣进来同那人咬了咬耳朵，对我说：“你这样硬顶没有好处，你会吃亏的，你知道吗？王继鑫不老实已经关起来了，你不要走他的路。”

我说：“今天你们也把我关起来吧，我不愿每天这样受罪，已经是三天了”。那两人要走，我把他们喊住：“天已经黑了，我肚子早已饿了，我要吃饭去！”那两人说：“不行，你等着。”

他们走了，大概吃饭去了，我却又冷又饿地呆坐着。

两人回来后很有耐心地与我磨蹭，要我老实地交待。在提问中，不时提及一些我们过去的造反经历。这时我明白，他们已经从王继鑫等人身上取得了材料，基本掌握了我们的情况，开始来审问我了。这时我却不去回答问题，大吵大闹地要求回家，他们不准，我又提出给我出去吃饭，他们也不许。我火了：“我今天只在早上吃了泡饭出来的，中午饭也没有吃，你们就是把我关起来总也该一天两顿饭给吃吧，你们如果怕我逃，可以陪着我出去吃一碗阳春面。”这些人丝毫没有心肝。

我发现唇枪舌战的时候，他们中一人不时去打电话，我料定这两人只是一般的角色，我就说：“我要见你们的领导。”这句话大大伤了这些老爷的官面子。两人拍桌子瞪眼，说要把我关起来。

我用蔑视的眼光，斜着看他们：“那请你们马上把我关起来！”

没有动静。

我冷笑一声：“想当初我起来造陈、曹的反，就已经把头拎在手中了，还怕坐牢吗？我们这些人早就上了黑名单了，还怕什么呢？”我横下心了，什么也不怕，我想早点结束这似关非关、使人心焦的生活，干脆关进去算了！这是迟早的事，王继鑫他们关起来了，还少得了我？

可是这两人倒矮了下去，再也不理我，但却坚持不让我出去吃饭，用这来报复我的顶撞。

与裘顺富初次交锋

一个多小时后，来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便衣，这人一进来，那两人就很恭敬地站起来，轻轻地对他耳语了一番退了出去。

我看着来人，他也看着我，互相对视了片刻。他踱着方步，不时看我一眼，又不停走动。

这人身材瘦小，精干利索，他的面孔倒显不出什么凶恶和奸刁的样子，如果他不是一个公安，兴许还是一个使人乐于接近的人，我想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了。这样相持了一会，他坐下，坐在我的对面，又对我注视片刻，拿起我只写了半页的所谓交待扬了扬开口了："听说你这三天来什么也没有交待，这可不行！你要知道，王继鑫也是这样和我们顶，现在我们把他抓起来了。你这样下去，对你不利啊！"

我说："我没有犯过错误，也没有辫子可抓，我怕什么？"

"你没有问题？那我们把你请来干什么？"

"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的，何罪之有？"

他立起来："你们造反，这是造谁家的反？"

我也不甘示弱："我们是造黑市委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

"你们是在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

我一不作二不休，顶他一句："我不知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很可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把我叫到派出所，关不像关，抓不像抓，你们到底是哪个组织的？"

这么一说，他非常生气："好啊！你沈××到还真有胆量啊！竟敢怀疑我们，难道我们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吗？"

"谁知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大有人在。"

他一拍桌子，气得一时没有话讲。他想了一会，又坐下来，我也坐下来。他说："你要我表露一下身份？好！我给你看。"他把右手伸进衣服口袋，拿出一张工作证来，送到我的眼前。

我一看——"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二科裘顺富"，照片也是他本人。他的身份是公安人员，这无可怀疑。我刚才其实并没有怀疑他，只是与他顶着干。

我还是故意激他："公安局是黄赤波的，早就砸烂了"。

我看出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从口袋里拿出飞马牌香烟，抽起烟来。他改变了策略说："广大公安干警是好的，毛主席说 95%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现在上海的政法指挥部成立了，这是在新生的市革会直接领导下，是受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他话锋一转："你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下起来造反，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你们这支队伍是很复杂的，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混进坏人，你还年青，还很单纯，你还不了解。我们对你作过调查，是有了解的，你在前一阶段做过一些好事，我们都知道，我们请你来，就是请你帮助我们，把混进你们红工司中的坏人揪出来，要把这些人和事理一理，你应该协助市革会做好这一严肃的政治工作啊！"

他的话满足了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我的气消了。他看我已经在专注地听他的讲话，于是，这个老公安更进一步的说："你是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你掌握了那么多的人，我们就是请你来把坏人揪出来。这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是为无产阶级立新功的时候了，你要看清形势啊！"

听了这段话，我有点飘飘然了。他便把高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抛了过来。我平心静气的说："我也不要立什么功，我做的事光明磊落，完全可以审查，我也愿意接受审查。"

他顺着我的话说："对！我们了解你，信任你。"

我说："我从开始串连到造反成立红工司，以及后来的活动，都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些过程谁都看见，谁都知道，完全可以审查。"

他凑近一点，以职业的敏感说："是啊！你不说，别人也会说的。"

我有点警觉："我们革命造反，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光明正大的、公开的活动，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他与我又坐得凑近一点："好！那你就把这些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下来。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经得起审查，经得起考验啊！"他站了起来，满意地注视着我，他的内心一定得意非凡。我这一个还不成熟的青年，到底被降服了，上了他的圈套。大凡中国的警察——公安人员在审讯中很容易用封建社会的刑讯逼供的一套，但历史毕竟是在迟缓地进步，对骗、吓不吃的人，就用"哄"的办法。现在，他高帽子一戴，避开"老实交待"这个刺耳的词，我就轻易就范了，答应"把经过写出来"。

他拍拍我的肩膀，非常友好地说："还没有吃饭吧，一定很饿了，我也没有吃过，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这人的弱点是吃软不吃硬，我被他的关心所感动，马上回答说："不饿，不饿。"实际是又饿又冷。他把我送出派出所大门，还关心地说："你先去买点吃了再回家吧！"我说："是的，我去吃点暖和一下再说。"

这一天真冷啊！天已经很晚了，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西北风在吹。我挨着饿努力蹬着自行车，飞快地向家中踏去，坐了十几小时的"牢"，一下子在空荡的马路飞奔，舒展了筋骨，那份自由让人高兴。

好像在写回忆录

第四天早上又按时"上班"。这天我很勤快，坐下后就开始我的"写作"。我把造反过程按时间前后，就事写事，报流水帐似的写下去，按事件前后一个一个地报，这中间不具体涉及到某一个人。到下午太阳西下时，一篇洋洋万言的红工光荣造反史已经写就。寒意阵阵袭来，我已经写到总部的解散。我就此打住，后来的什么重拉队伍与这一切活动一概不提。

我重又站到窗口眺望着枯黄的草地，盼望看到鸽子，但只听鸽舍内的咕咕声，却不见主人把鸽子放出来，或许鸽子已经放飞过，而我忙于写交待而没看见。我望着空荡的草地，仿佛自己已经失去了一次囚犯的放风的机会惆怅不已。我望望摊放的"报告纸"，今天已经写了很厚的一迭了。我想，造反至今一年有余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什么纪念或回忆的文章，这似乎是在写作，好像在写回忆录，而不是什么交待。

经过这么一写，造反的过程变得十分清晰，是的，我们是没有犯过什么罪，搞过什么非法活动。我有些高兴，这是我们临时工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个人的光荣历史。

一阵高兴后，寒意袭来，冻得心中发冷，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什么时候能回家？今天写了几十张纸，该早点放我回去吧！我孤寂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焦急地等着他们的到来。这天上午十点钟时，一位年青的便衣曾来过，看我已经写了不少，满意地把写好的一迭纸拿走了，下午又来过一次，把写好的又拿走，而现在却再也不见人影，我等不及了，到外面找到值班民警，请他打电话给他们，但左等右等不来，真不知他们在忙什么。

天已经黑了好一会了，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我很饿，坐下吧，冷得脚趾发痛，人发抖，不停地走吧，走得人发慌。我就坐下再站起，走几分钟又坐下，犹如动物园大铁栅栏中的一头老虎来来回回麻木地走，麻木地等。我不知老虎为什么要这样的走来走去。但我知道，我这么走是在消磨宝贵的时间。

七点多。他们来了，裘顺富和他的两个属下。他们看我写的东西，越看越不满意，裘生气地一扔，在我面前不停地走来走去，又不时侧转头来看我，考虑如何对付我。

他终于开口了："这就是你的交待？"他顺口说出了"交待"，而不用经过伪装的"过程"。

我不答理他，看着他的生气的模样我还有点高兴呢，我就是要这样对付你们，昨天你对我的一套，在我冷静后想明白了，这是你对我的"哄"，因为你吓不倒才用哄。我昨天还很受感动，可今天我不能上你的当，我用歌功颂德的一套，为自己、为红工司涂上了一层亮丽的红色。再说，我们确实没有干什么坏事啊！至于重拉队伍，与上柴联司的联络，能瞒的还是瞒。至于 8 月 7 日对我们的冲击，我想他们一定是知道的，不是已经搞过了吗？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也不能把红工司的一切事和盘托出啊！尤其是涉及个人的问题，我就是要这样与你们周旋。我这样想着，自认我很聪明，把自己看得很高明。

裘不再走动了，再问我："你的交待就是这样么？"他又用了一次"交待"。

"是的，我们做过的事我全写下来了。"

他拿起我写的纸，在我面前扬了扬又扔下："按你写的，我还要为你请功了？"

"实事求是嘛，我做过的事不赖，不扩大也不缩小，有什么不对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王继鑫已经在里面交待了，

你为什么不交待？”

“他是他，我是我。我起来造反所做的一切，是大家看到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是有罪的话，那么就判我的刑吧！该几年就几年，这是我罪有应得”。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的模样。

现在看来，我那天要他对我判刑的要求，好像有点请他用“罪刑法定”和“罪罚相当”的现代法制原则来对我量刑的味儿，但那时我们国家，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竟然没有刑法和刑诉法，判不判，怎么判，全跟橡皮筋一样随意（我国第一部《刑法》在十二年后，建国三十年才颁布）。那时我国只有一部（1954 年）《宪法》和一部《婚姻法》，婚姻法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而那部宪法的作用呢？刘少奇在挨批斗的时候，高举着它大声说：根据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这个举动，既神圣悲壮，又天真可笑！更可笑的是，有一位书呆子教授在一九八九年讲法律课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法律，如果那时有一部《宪法》（他忘了那时有《宪法》），我就可以用《宪法》为刘少奇辩护。”唉！有法律就有用吗？在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地方，强权能撕毁一切法律。

裘同志气得又开始走动起来，还是不时侧转头来盯着我看，我也就等着他的下文。

“你还真讲江湖兄弟义气啊！还在为他们保。这样对你不利，我们今天是在挽救你，给你机会。”他停住脚步：“你要好好考虑你自己的后果，不要再保下去了”。

我说：“王继鑫的事，他自己会交待，我做的事我交待。”

他用苦口婆心的口吻说：“你们这支队伍中是很复杂的，有坏人混进革命造反的队伍中来，你为什么要保呢？”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坏人？谁是坏人？。

裘沉思了半晌：“你还是执迷不悟？好！”他从上衣的内口袋中拿出一张照片扔在桌上，手指：“这人认识吗？”

杨解泉是特务？！

我一看，这是一张一寸报名照，杨解泉！

啊！这个人，自称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我对他一直有怀疑，现在公安机关要指名调查他的问题了，他果然有问题，这个政治骗子！

我本能地感觉到，这和文化大革命，和造反的正确与错误完全是两码事。

我老实地说：“认识。”

“叫什么名字？”

“杨解泉。”

裘又摔下一张一寸照片，是个中年汉子，我辨认一下摇摇头。

裘又摔下第三张照片，也是一个中年汉子，我摇摇头：“不认识。”

他收起照片：“这两人是台湾国民党派遣特务。”

我吓得一跳。

裘继续不慌不忙说出让我吃惊的话：“这两人是在解放初期随蒋匪帮××号军舰起义过来的派遣特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台湾方面要这两人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运动混进造反队伍，掌握你们红工司，乘机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妄想复辟。这两人是杨解泉的朋友，他们选择了杨解泉，用他来打进你们常委内部，掌握你们常委。”

我吃惊盯住他那严肃的脸，头脑中全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青天白日旗，这是最严肃的对敌斗争啊！是最不得了的敌我阶级斗争啊！我们竟然跟台湾国民党敌特机关联系起来了！我头皮一阵阵发麻，毛骨悚然，混身燥热，这可不是喊喊造反有理闹着玩的。我不由感到如芒在背。

裘盯着我，成竹在胸地说下去：“王继鑫和杨解泉关系最密切，你们一起开过不少黑会，我们全部掌握。”

我的防线崩溃了，而且是全线崩溃：“我一点不知道这些情况，我对这人的出现是一直有怀疑的，我同他的接触有过两次，第一次在淮海路的一间公寓里，还有一次是在虹桥路的一幢别墅里，时间是在 1•28 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因为我对这人一直存有疑心，所以，王继鑫、郭文美、殷庆宝他们瞒了我，开过几次会没有叫我参加。”

“好！你把这些情况写下来，一定要如实交待，每一个细节都要写清楚。”

“我一定原原本本写下来，决不隐瞒。”

他又对我开导一番，之后顿了顿，故意说：“殷庆宝到现在还在保他。我信任你，明天你不用来了，你在家中写交待，写好后交到静安分局来。明天我再找殷庆宝，如果他明天还不交待，还要保杨解泉，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不能再等……”他突然停住，似乎像是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不该给我知道，转而说：“你马上回家，不能去和殷庆宝通风报信，不能把我刚才的话去告诉他，否则你要负责，把你一起抓起来。”

我马上站起来，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急匆匆走了。

报 信

他的话无疑提醒了我，我应该去通风报信，不能让殷庆宝被抓去坐牢，我们不该为了台湾特务的牵连而入狱，殷庆宝如果被抓，他还有三个小孩啊！我不能不讲朋友义气。

我急忙骑车到静安寺面摊上吃阳春面，一面吃，一面快速而胡乱地思考着，难道我们已经卷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敌对斗争的旋涡中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为，性命交关啊！在今天，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今天，竟让国民党特务混了进来！那还了得！好在我没有参加以后的活动，王继鑫对杨解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一直背着我与杨在一起，我被排除在外，不知他们搞些什么名堂。谢天谢地，幸亏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天殷庆宝通知我，说杨约我们几人去复兴公园门口的洁而精川菜馆吃饭，要我按时前去。结果我这“下只角”的乡下佬在复兴路上的复兴公园门口转了半天，没有找到洁而精。这次会面我就没有参加，事后被殷嘲笑了好几次。幸好，鬼使神差使我找不到，也许

真有神明在暗中指点我。我庆幸我的运气。现在王继鑫他们已经抓起来了，殷庆宝可不能再陪进去啊！

我在寂静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不时向后面看，是否有人跟踪监视我，我不时以快慢不同的速度骑行，判断在我身后的自行车的是不是跟踪我的人，当我确信没有跟踪，便匆匆拐向长乐路，朝殷家中骑去，敲开他家的门，他的小孩已经睡着了，夫妻俩人困惑地看着我。

我压低了声音焦急地说："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

他们俩更吃惊了。我迫不及待地说："你知道杨解泉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打进我们红工司？他是台湾特务！"

我此言一出，像扔了一棵炸弹，他夫妻俩都倒抽了一口冷气，"腾"地站起来，瞪大了眼睛。

我把刚才裘对我讲的话，看照片的事飞快地讲了一遍，但殷庆宝却两手一摊说："他的朋友是台湾国民党的派遣特务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没有搭界怕什么？再说老杨又不是我们组织的人，我们的活动他又没有参加，怕个屁！"

我实在想不到他竟会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话，有些不悦，强调说："我可是冒着危险来给你通风报信，你如果这样硬顶也不关我的事，我是尽了朋友的责任了。"我立起来："不过我要把话说完。殷庆宝，你知道吗？那个人小样来西的人是静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叫裘顺富，我估计他是负责人。他说你一直在保杨解泉，刚才他说了，明天要找你，如果你明天还不交待，继续保老杨，那么就马上把你抓起来。"

殷听了我这番话，像被打了一闷棍，再也不是轻飘飘的了，呆呆地坐着，像个哑巴。他的妻子急了，劝丈夫好好想想，并要我坐下，问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我说："裘顺富警告我，不准与你通风报信，否则要把我一起抓起来，我冒着危险来，你殷庆宝反而不相信，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总算尽到朋友责任了。"

他妻子焦急地问殷："你怎么不响啦？杨解泉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倒是讲啊！"

殷回过神来，故作轻松地说："我同老杨没有什么接触，王继鑫同他关系密切。"很明显，

他是在安慰他的妻子。

我说："你比我先进胶州路派出所，我去了四天，明天我不用去了，又轮到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管殷庆宝如何想法，如何去应付明天，我不敢久留，匆匆回家了。

机智干练的裘警官

从这天起，我再也不用去胶州路派出所"上班"，我每天照常在厂上班，专案组裘顺富要找我，就直接打电话，他往往用市革会的名义找我，一方面也许是他不便公开专案组这个机构，同时又也给了我面子。他一般打电话到车间办公室，由办公室传话："喂！沈××，市革会来电话，快去接电话。"或者："刚才市革会来电话，要你×时去一次。"我就去静安分局同他碰头，后来专案组迁到市局，他就约定我在广东路派出路碰头。所以在这审查我的三年中，厂里的同事还当我同市革会上层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我的日子过得还很消遥。

我年青单纯，性格倔强，公安人员用吓的一套没有吓倒，哄的一套我也不吃，但最后还是在骗字上被骗进了。裘利用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怕被国民党牵连打成反革命的心理，用什么台湾派遣特务啊，××号军舰起义等一套谎话，骗得我乖乖地就范。这一套骗人的说法，使我相信了十几年，对这一段历史一直抱着神秘感，庆幸自己的幸运。但随着年岁的增长，见识的增多，明白了这全部是公安人员哄、骗、吓的一套。

应该承认，裘是我见到的公安人员中十分罕见的机智干练而有人情味的警官，在两天的交锋中他迅速看透了我既倔强、又讲义气的特点和为人，轻易地驾驭了我。他要利用我使殷庆宝就范，就故意对我说"明天殷庆宝还保杨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故意警告我"不能去殷家中通风报信，否则也把你抓起来"。而我真的被利用去通风报信了。

果然，隔了几天，裘满面春风地问我："你去殷庆宝家通风报信了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又故意说："我本来要抓他的，因为你去过了，他第二天来，我一问他就马上交待了，我就没有把他关起来。"

我只好老实地说："是的，我去过他家，我之所以去报信，是为了他家的三个小孩啊！"

他听了不知是赞赏还是什么，很温和地说："今后你可不能这样啊！告诉你不能去，你却去了。你不老实，当心我把你关起来呢！"

裘顺富这人有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和对职业的责任，因而对手中"猎物"采取的手段既紧紧不放，但有时也会自然地显现出很浓的人情味。这在文革中，对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表现出这类情绪，按说是极不应该而且危险的，因此，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有次，我在早晨到静安分局去见他，因为我是夜班出来，在分局门口等候他出来的时候，伏在门口的桌子上睡着了，尽管门口风大，但我倦极了，睡了不知多少时间，等我醒来，一抬头发觉他立在我面前，好像已经有段时间了，他带着怜惜的神情看着我。我一下站了起来。他说："夜班很辛苦吧！这里风大，进里面去吧！"

人，总是有两重性的，离开了政治、残酷的政治，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有人情味的，在那冷酷年代中，一位公安人员能流露出对被审查对象的关怀，实在是难得。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当后来（一年后），审查到我们常委中有人曾把资本家的抄家物资偷出去变卖这段事情，殷在总部和联络站重拉队伍时与资本家抄家物资有染，我在愚园路联络站经集体同意动用抄家物资充作经费，经我的手卖过一只电风扇，此款全部供联络站使用。裘对殷的处理是"退赔"，通过厂里每月扣工资，扣了好几百元，赔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对我的处理却大不相同，他让我用节约闹革命的名义，去九江路财政局付钱，把我去北京的飞机票与火车票的几十元差额"上交"。裘暗示我，这笔钱就作为我的退赔，他催我尽快去付清，以便可以为我说话。我自然很感激他。

我在派出所四天写交待的生活结束后，果然殷庆宝在次日被叫去，多大功夫，他就把杨解泉的情况和盘托出。

几天后，裘要他通知我，由我们两人打入杨解泉他们这一圈子中去。

要我打进敌特！？

我听后大吃一惊，心中老大不愿：一，怕与台湾特务沾边。刚刚使我的防线崩溃而就范交待，生怕卷入这敏感的政治旋涡，而现在反而要我靠上去，混进去，这实在太可怕。二，由他们在后面操纵"打入内部"，我是什么身份呢？密探？叛徒？眼线？耳目？这些字眼都实在令人讨厌，反正共产党"侦察员"的称号是不会给我们的。三，心狠手辣的台湾派遣特务如果把我杀了灭口，我算是共产党的英雄？烈士？还是死狗？恐怕是一条死狗吧！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这算什么！

不过，这些想法我不敢说给殷庆宝听。看得出，殷在耍滑头，他也不想干，可又不敢得罪专案组，却把我当傻瓜，把杨的地址交给我，说“还是你去的好，我上有老下有小”，露出一副可怜相。我的心肠软了下来，这担子就我来担吧。

我打电话给裘，他约我见面。见面后，他说就你一个人去？我不愿说殷耍滑头不愿去，事到如今不要去拉他了。我万般无奈地表示就我一个人去，一副为难的样子，又装出什么都不懂，十分害怕，请他面授机宜，教我用什么方法打进去，讲点什么话。

裘却什么也不愿教给我，只是笑了说：“你是几十万人的组织部长，这些聪明才智你一定有的。”

我面露难色：“这是对敌斗争啊！”

他看出我不愿意，但也看出我不敢回绝。他只是说暂时不要说什么，只要靠近他们，听他们说些什么，能接近就是胜利。最后他给了我两个地址，说一个地址是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一个是杨的家。他家的地址在唐山路、汉阳路，离我厂不算远；另一个地方太远了，我根本不想去，他们“碰头”的地方必定十分危险。我心想还是去他家应付一下再说。

我装出一副英雄气概说：“好！我一定完成任务！”像电影中的英雄。

这时，裘非常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一，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漏出是我们要你打进去。你要明白你的对手是谁，是国民党特务。二，你的对手是谁你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你不得再骑自行车，行走时，应当走人行道，不能走在马路下面，尤其是在横穿马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

他这一番内行的关照反而使我真正害怕起来。我对苏联和国内的惊险反特小说看得很多，尤为欣赏《一付铜钮扣》，那些双重间谍心狠手辣，杀人灭口的伎俩就常用制造车祸的手法。

裘又安慰我说：“你放心去，我们会保护你的。”

我耐不住天真地问：“你们怎么保护我？”我想，难道派人跟着我不成？他说：“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对你是负责的。”

领受了这极不愿意的“任务”后，我想得很多，决定能拖就拖。一拖拖了好几天，直到

他们打了几次电话，一切借口都用完了，我才决定去杨解泉的家。

我特意挑近中午的时间去杨解泉的家，汉阳路桥堍的这个弄堂，弄口正好是 25 路电车站。我折进弄内，抱着说不清的心情，找门牌号码，号码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抽越紧。我进了他的家门说什么呢？用什么借口呢？这一难题一路上困扰着我。本来，我与他毫不来往，现在，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门口，必定引起他的警觉。我想起殷庆宝对我说过：杨曾对我有过一句评语："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叛徒。"杨解泉既然对我有过如此的评价，对我的防范之心必然早已有之，我之被排除在外也顺理顺章。他为什么要对我严加防范？难道真有特务活动？

我去他家，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他的地址，我是如何到手的？我将怎样自圆其说？想到这里，老裘啊！老裘，你这个老公安（他常自称老公安），这一漏洞你想过没有？

一面走，一面想，一面寻着门牌号码。走过头了，回头再找，又过头了，再回头。哎——不对！根本没有这个号码。我反复徘徊，真的，这个号码确实没有，这是一个空号。我问了人，回说是没这号码。

嗨！高兴啊！我如释重负，我可以交差了，这想不到的意外！

我又拖了两天，才向裘交差。他非常惊奇，问我："你是到唐山路吗？"我确切地说是这地方，向他说明 25 路 19 路电车站就在弄口，再把地形说了一遍。他听了陷入了沉思，自语自言地说，"这门牌号码……怎么会不对呢？"稍定他又问："你去过第二个地址吗？"我说："没有。"他立即说："你去。"

我只得答应，可是我内心极不愿意去，马上又补问了一句："这地址不会假吧？"他没有回答我。

这第二个地方，我始终没有去，拖了几天，他把我召去，我一见就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那也是一个假地址。他对我看了一眼，沉思一会："好吧！这事就这样了。"我像得到大赦，一下轻松不少。从此裘再也不提打入内部的事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讲好要我和殷两人一起打入，可是殷从未提起殷干过什么，可见他要滑头比我更甚。

神秘的台湾派遣特务的说法，或许根本是子虚乌有，是专案组故弄玄虚，逼我就范的手法；或者是文革中一件所谓台湾特务的冤假错案。

“这事就这样了。”裘说完后，就要我专题写杨解泉的材料。我就把以前写的有关杨的材料，集中起来再写一遍。这是我的第一份牵涉到具体个人的专题交待。交上去后，裘并没有再逼我什么。

我隐隐感到，杨解泉已经被捕。

杨的可怜的妻儿

果然，一天杨的妻子怀抱几个月的婴儿，皆同小姑（杨的妹妹）来我家找我。我很惊奇，她们怎么会找到我家的？这一定是殷庆宝在充好人，把我推上尴尬的地位，好像我成了出卖杨的罪人。

杨解泉出现之初，以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自居，后来退而说他的妻子是上海的大红人、国棉十七厂厂革会主任唐文兰。对这样的话，我嗤之以鼻，摇头不信。今天这位冒牌的唐文兰就在我的面前。

她，看上去有 40 岁（可能实际年龄没有 40 岁），一副狭长的驴脸，门牙外扒，其貌很丑。我很纳闷，杨怎么会讨这样的老婆。这两人很不般配，杨是一个内外均具才华，口若悬河，很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如果称得上家的话）的人；而这位夫人，却是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纺织厂女工，言语木讷。她怀中的婴儿还在吃奶，而她年龄却这样大了。

她哭哭啼啼，抱怨错嫁了人，嫁给一个被抓起来的“反革命”。她诉说，到了这么大年纪，嫁了这么个丈夫，刚养下儿子，却要承担起全部家庭重担，叫她怎么过啊！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我能说什么呢？

她的小姑，杨的妹妹，自我介绍在邮局工作。形成反差的是，她长得很美，也很会说话，她代嫂子说明了来意：哥哥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们来的目的是想听听消息。

我能说什么呢？我反问你们如何知道我地址的呢？她回答说，是她哥哥在临被关时，告诉家人，如果出了事，可去沈××家询问。看来，在这期间殷把我被审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杨解泉透露了，殷把自己洗刷得干净，把我推出来，让她们来我家。我年青，还不知人世的

险恶，一直被人当乡巴佬在耍，还自作多情去通风报信。

她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能有什么消息可以安慰她们呢？只是说些语无伦次的空话：我也是被审查的对象，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相信市革会，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情会清楚的。

这样的空话安慰不了人，她们始终缠着我，她们几乎每个星期五（我厂休日）来找我，后来杨的妻子一人怀抱小孩也来过几次，我真厌烦死了。她哭得伤心，语言中就是怪我，怪我不肯对她说什么。记得有次我对她说："你丈夫冒充中央文革的人，把你说成是唐文兰，而我也是一样被审查，只是没有被关起来而已，你找我是找错了人，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无能为力。"我不敢再多说了，怕把国民党特务的事说出来吓坏她。我望着这怀抱婴孩的纺织女工，从心底里同情她。这样老实巴交的妇女，怎么会嫁给杨解泉的；而杨解泉怎么会讨这样一位老实得可怜的女人。我的同情心并不能帮她什么忙，更不要说能减轻社会对她的压力，她只有以泪洗面的份了。

唉！不知杨解泉这敌特案件是真是假。

神秘的吉普车

在这段审查杨解泉的时间里，我还算轻松，毕竟我同杨之间发生的事就那么两次，简单又清楚。在这段时间内，我严格地按裘的警告，没有骑自行车，每天乘 25 路电车上下班。中班晚上十点下班，洗澡、乘车，到家总要近 11 点钟，夜很深了。我偶然发现，我下车后，走上十几步到路口时，总有一辆小吉普停着，当我走过这停着的吉普车时，我的身后响起了发动机声，吉普启动，很快调头开走。今天如此，明天也是如此，这个星期中班是这样，隔了两个星期的中班也是这样。我有些纳闷，这是不是裘所说的，对我的保护？真的有台湾特务要暗害我吗？那我真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了，我没那么伟大。我肚中实在没有什么秘密，对杨的情况可说一无所知，我并不值钱，为什么要保护我？不过，我因此平添了一份安全感，也不由得对裘警官的负责态度萌生敬意。

如果这辆吉普确实为我而来，他们化了那么大的本钱，看来他们总是认为有这种必要，有这么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姑且当他是真的吧！假案也是要当真的。世道就是这样的颠倒。

我成了印证交待材料的标准

杨解泉的被捕，使我得到了一段时间的清闲，大概他们在忙于审问，忙于要知情者交待。大概杨的问题审查完毕了吧，接下来就是要我写王继鑫的情况，集中谈王的事，按时间，按事件围绕王写材料。隔一段时间，又开始要我对被关的另一人专题写材料，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审查下去。

时间长了，我发觉他们要我写的材料，往往是对其他人的交待材料印证与核实。当我摸准我的角色的重要性后，我下笔就更慎重了，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扩大和随意，我强调人与事同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关系，突出人与组织的关系。

我是尽力了，但被关的人并没有消除厄运，他们还是被一关到底，抓人的人和机关历来是不会认错的，只有到十年后的大规模平反，他们才得以昭雪。

觉得棘手的事，就推说不知道，或者写得含混，但他们就一次次地找我，逼我。遇到要逼我时，这角色就由专案组的其他人来担当，裘不出面。有次他们有意把我带到里面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房间很小，好像没有窗户，阴暗、压抑、灰暗的墙壁从来没有粉刷过，墙角挂满了蜘蛛网，满地灰尘烟蒂，肮脏不堪。在五、六平方的空间里，只有一张课桌，这是公安人员坐着记笔录用的，人犯坐在桌前一只脏不堪言的废小木箱上。这样的环境，可以使人犯从心理上感到害怕，让你顺着他们的思路，“老实交待”。

有时他们为了一件事，几句话就对你上纲上线，置你于死地。没有真实的材料，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就一次又一次用各种办法压你，逼你，反复提问，反复暗示，这样时间一长，从来没有的事，就会慢慢在头脑中“清晰”起来，“记忆”恢复了，最后自己也吃不准：“这事大概是有的吧！我怎么会忘了呢？”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使年青人的脑子像患了老年痴呆症似的，把过去的事和近期的事扯在一起，胡言乱语起来，他们就得到了所谓交待材料。人在这样长期的折磨下，就会变成精神病，总部纠察大队的朱力军就是这样被关押在思南路看守所，一关多年，最后成了精神病人。（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此人成了一个玩具发明者，做老板发了财）。

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交待是去印证和核实关在里面的人的交待，而且感觉到这是老裘同志有意的安排，是他的一种善意的、良心的体现。我胆大起来，敢于直书否定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为人开脱，我开始心安理得起来。

攻击过江青吗？

要命的事来了，我这印证交待材料的“角色”也不好当，终于有件事搞得我死去活来：

在三年的审查后期，专案组的注意力集中在王继鑫和郭文美两人的所谓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专案上。我不知道是谁咬出这么一件致命的事来，这是摊在我们头上最严重的罪名。

他们要我老实交待。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就反复找我，逼迫我坦白交待，最后摊牌说，一共有谁谁谁在场，而且加重语气说，已经确切掌握我也在场，要我认清形势，赶快坦白交待。看我不肯就范，又用软的一套说：“你放心，我们知道你，当时你没有讲过话，只是在听，所以我们不会定你的罪。”反复保证我没有事。

反复的暗示诱供，搞得我神魂颠倒，在我的思维将要逐渐“清晰”时，他们认为火候已到，由裘出面，再来软的一套，捧上捧下地说：“你的一枝笔真好，写的东西有才华，你可以尽情描写，把当时的情景描写一番就可以了，只要把情景描写出来。”

注意！这里只要你“描写”，像文艺作品那样地描写（虽然我从来没有尝试要写小说）。在反复的提示和暗示下，我仿佛在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阴暗的天气（反革命分子在攻击伟大旗手时不会是阳光灿烂的，必定在阴暗的角落里），天像要下雪，我和王、郭、殷等人坐在（愚园路联络站）那个二楼朝东的下房内的沙发上，我们在一起闲谈，王和郭的攻击江青的言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回家写了这样的一篇东西给他们，他们很高兴，马上拿了进去（那时他们已搬到福州路市局），不一会又出来生气地说，你怎么不写郭文美的攻击江青的言论？我茫然不知所答，心想，郭文美是怎么说的？那人就提示我，说攻击江青是郭文美说的。

我不懂，郭文美究竟说了什么攻击江青的话？

那人就提示说，郭文美不是去过北京吗？江青流着泪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后来又解散全国的临时工组织，郭文美就是这样开始攻击江青的。要我马上补充写交待。

我说，“我没有听见她这样说过。”

那人就沉下脸："怎么？你要翻供？要知道你已经写了一份交待，你现在翻供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立逼我在这市局闹哄哄的接待室一隅，按他的意思写下来。过了几天又要我写郭文美说了这段话后，王继鑫又接上口，共同攻击江青。

我实在无法写，就去找殷庆宝，把这段时间的情况告诉他。他说，他也在写同样的交待。我问殷，这段攻击江青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他说有的，郭文美是说过的，他描述了一番。被他这么一说，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是我记性太差，现在回忆起来了。

我就顺着殷的说法，把这一交待写好送上。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于心不安，攻击伟大旗手江青，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要枪毙的！不能这样胡乱交待害人啊！我主动打电话给裘，要求约时间见面。我预先写好一张纸，说我以前写的郭、王两人的攻击江青的材料是不真实的，他们两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出来见我的不是裘，那人一看我写的东西，大发雷霆："你又要翻供吗！你包庇现行反革命……。"他训了一顿，把纸扔给我就往里走。我一把拖住他，再三求他把这材料交给裘，他总算收下了。

第二天，裘打电话给我说："怎么翻供了？好呀！你来一次。"

我忐忑不安地去见他，他把我上下打量了又打量，双眼逼视着我，用威严的口吻，要我把有关这一恶毒攻击的事集中写一份材料。我慌了，只得答应，把以前写过的再集中起来起来写了一份，交给他时，他大约看了看，露出了笑容，放我回家。

几天后，又把我召去，问我这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我懵了，发生在哪月哪日呀？天知道！我只得说，我想不起来。他说："你再好好想想，回去吧！"几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就真的使劲儿去想，越想越糊涂。

我只得再去问殷庆宝，殷说"这事肯定有，但几月几日讲的，当时啥人会去记住它。反正有这么回事。"

我不得要领，又只得再想，我想了几天，突然想起我的"描写"："那是一个阴暗的天气，很冷，好像要下雪的天气。……"

见鬼！我突然跳起来！

大热天哪里会下雪！

我们在愚园路 67 弄 43 号联络站活动时是在夏天，5 月份到 9 月份，哪里会下雪，真是活见鬼！

好啊！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我的漏洞，所以要我写“准确”的日期了。我不能害人，不能再写什么东西了，更不能去找殷庆宝。让这份在时间上有明显漏洞的交待材料自己来说明自身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假材料吧！绝不能再写虚假的材料了，在时间问题上，就坚持到底：“记不起了。”

以后几次召我去，我死活坚持说：“记不起了。”奇怪的是，居然他们不再来逼我，以后，再也不提这事，好像就这么不了了之。

王继鑫出狱后，在“四人帮”垮台后的平反高潮时，他曾来找过我（他在狱中加上出狱后戴上坏分子帽子前后共十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对红工司被抓的人员都予以平反。王在平反后，偕同郭文美来串连我们这些人，提出要求市高院对我们红工司组织平反。我冷静地表示不参加，我的理由是：红工司这一组织，当时并没有被打成什么反革命组织，高院不可能同意“平反”的提法，这是毫无意义的行动。给予组织平反，还想干什么？重当造反司令？笑话！再说，全市的临时工在几年前已全部转正，你还想干啥？

但王继鑫仍反复劝说我参加，仍是当年造反司令的架子，一副重温旧梦的神态。我笑笑说：“你还是不减当年勇啊！”他得意地笑了，以英雄的架子说：“听陶××（过去总部的工作人员）讲，你在外面做叛徒，出卖了不少人。”

我正色道：“陶××一直是夸夸其谈、言不由衷的人，在几年的审查阶段，我从未与他见过面和接触过，此人也够不上被审查的资格，他何以知道我的表现呢？谁在这三年的审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各人肚中都很清楚，你清楚，我也清楚。”

他被我抢白后，一时语塞，稍后，他不无遗恨地说：“在攻击江青的问题上，你为什么不坚持说我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江青的，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就好了。”他大概想，江青成了“四人帮”，他和郭文美如果曾经攻击过江青，现在就是英雄了。但他不想想，他和郭也

许早就被枪毙了！

我正色道："王继鑫，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你的话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我有我的良心，不能为了自己的安逸出卖人，何况是莫须有的罪名。"

他还是说："如果把我打成恶毒攻击江青的反革命分子的话，现在就是英雄了。"他的脸皮还真厚。

我说："如果当时我顶不住，按他们的说法写了，你可能也已不在人世了。"

他争辩说："只要不死，就是英雄。"

我冷冷地说："那你也成不了张志新。"

我对泼来的脏水，还耿耿于怀，不无生气地说："既然你和郭文美是恶毒攻击的英雄，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自己爽爽快快地坦白，现在自然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何必要我来出卖你呢？"

王一时显得有点尴尬。

稍后，他转成懊恼状："郭文美是说过江青流泪支持过我们，可后来又要我们解散，我们被出卖了，被利用了，我也附和了几句。为了这几句话，被追查了很长时间，吃了不少苦头。"

我问他："你们说这话时，我在场没有？"他答："正巧你那天不在，殷庆宝在场的。"

"那何苦把我也扯上呢？是谁把我扯上的？又是谁把这事咬出来的？"

他不响。

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事上面的反复？"

他把话扯开去了。

——这是十年后的话。

支联问题裘网开一面

在三年被审查的日子里，我们常委一个个被审查。一段时间内是某人，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人，大家互相交待，我就一个接一个地写我的印证式的交待，把一百天的造反和后来一百余天的重拉队伍的经过，一点一滴地写清楚。最后，我也被作为重点，交待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专案组也要其他的常委集中写我的材料。

我自认为没有什么辫子可揪，既无经济问题，又无生活问题；在杨解泉的问题上，我很放心，我不可能卷进去。难于过关的是重拉队伍时，我曾积极主张与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搞全市的大联合。王才生作为我同上柴联司之间的联络员，积极活动，我自己也去了上柴联司同他们谈判过，又在 8•4 行动的前一天去了陈卜昌的厂里，积极准备大联合。在这件事上，殷、王、郭等人却一直持观望态度。现在审查我的问题，他们定会把这一切推向我。支联问题上，我无退路，结局不妙。

按当时“分析”和“推理”，我主张同上柴联司、支联站搞大联合，性质是严重的，势必造成上海两大派打内战，这是破坏上海大好革命形势，是针对被毛主席肯定的上海市革会。我又听说这样一个传闻：在 8•4 攻打上柴联司时，毛主席在上海，而且还看了电视实况，说明这一行动是得到毛主席承认和肯定的，所以我的问题实在比所有被关押或未关押的头头严重，我过不了这一关！

我自忖也要坐牢。

可是为什么不首先抓我，而是先抓别人呢？我决定这段事不交待不写，我反正是要被关的，到了监狱里面有得写了，关就关吧！

这样决定后，我把自己的“专题”交待送上。不几天裘打电话来，我在公用电话处回电给他，他问我：“你的交待全部写好了？”

我明白，他要提这段“支联”的故事了，我索性直言不讳地说：“我全写了，就是支联的一段没有写。”

“你为什么不写？”

我说：“这事你已经掌握，也瞒不了你，我也堵不了殷庆宝、王继鑫的嘴，我沈××就这件事是有问题的，你看着办吧！”

他大声说：“好啊！你明白就好，等我把你抓起来！”

我平静地说：“该怎样就怎样，反正这事我做了，该判几年劳改就几年劳改吧！”

他追问一句：“你不写？”

我坚决地说：“我不写，关就关吧！”

想不到他大笑起来：“你倒是顶硬的一个，竟然等我把你抓起来！好吧，就这样。”他搁下了电话。

我也平静地放下电话。

过了两天，又把我召去，我同往常一样去约定的地方，他对我看了半天，带有一点赞许的眼神，点了点头：“你人还是老实的。”

从此，裘同志再也没有提及这段最严重的事情。

他为什么轻易放过我？是裘的个人良心，个人的作用，还是上面有指示？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讲究策略”而把我放在外面？至今我猜不透。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裘为人正派，虽是公安，但有良心，有他自己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个人既有执行党的命令，服从上级需要的一面；又有网开一面的善心。

在十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我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在医院中住了一年，患了中国第一例

的怪病，服用大量激素以维持生命。凡大量长期服用激素，必定脸是“满月脸”。我的尊容就可想而知了。外加我全身器官受损，反应迟钝，走路蹒跚。1982 年年初，我刚搬家，住到控江路一带的新村。我在上午九、十点钟从菜场买了一把芹菜，行动迟缓地行到控江路桥堍处，那里恰好距派出所不远。一群约五、六个人迎面走来，我目光呆滞、神情木讷，只听他们从我身边擦过时飘进耳内一句话：“沈××怎么成了这样的人？”

沈××？谁提及我的名字？我缓缓地回转身来，只见他们在停下来在看我。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我们相距十几步，哦！原来是十年前专案组的原班人员，裘也在，他们在低声说着什么。一位曾来我家几次的年轻人（这时也不算年轻了）问裘：“现在沈××情况怎样了？”裘不答，对我看了又看。这时，其他人别转身向派出所走去，裘还是注视着我，带着同情、复杂的眼神。我们两人相对而视，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直到他回头走去。他不时再回头看我，他的身影逐渐远去，我才迟缓地回转身子。

世界好大，世界又太小，相隔十年，我与裘在这样的情景下相会。他注视我的眼光给我留下永不消逝的印象。

我重病在身，我们两人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说的话也不同，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

对付外调的人

随着文革中“一打三反”、“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对我们这圈子的审查面一下扩大开来，连一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被列入审查对象。我这个昔日的“组织部长”，今日的“编外犯人”成了大忙人，除去我做夜班以外，早、中两班，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厂找我外调，高潮时一天同时有二、三个单位。说来好笑，我刚报到上班，厂组织组（当时称“组”而不称“科”、“股”，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简）来电话到车间找我，那个老泰兴值班长神秘兮兮通知我去组织组。后来他也习以为常，只简单地说：“去噢！”我心领神会，调头就走。

组织组是厂革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接受外单位前来外调的专案人员，外调人员为审查本单位的认为有问题的人而常去外单位或外地，向知情者调查情况，是一种“美差”，因为可以乘机游山玩水。

我们这些共同造过反的人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而牵连在一起。但这里的“牵连”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牵连，在那个年代，被视作同共同犯罪中的“共同犯”。专案外调人员摆出（或者说尽可能做得像）一副提审犯人的架势，让你感到惧怕，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把他们要

的材料供述出来。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谁也不敢顶撞外调人员。

开始总以这样的提问开场：姓名？年龄？籍贯？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再就问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外调人更横，竟问你犯了什么罪。（不知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询问知情者。）

我一听就顶了起来："你是什么单位？来审问我！"言下之意，你们没有资格。外调人员火冒三丈，拍桌而起："你好嚣张，还不老实！"

我心中明白，你们奈何我不得，你们只是外单位一个基层组织来外调而已，我难道还能被你们吓住？但我又不想闹得太凶，因为他们的后面是市革会的专案组，总导演是市专案组。于是我就转弯道："你们要了解谁？我就把这人的情况介绍给你们，是不是这样？"

外调人员骄横地说："怎么？你要摸我们的底？"

我也不甘示弱："那我就无法向你们谈了。"

我立起来，表示不再谈下去。他们就大发雷霆，说我太嚣张，竟敢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干。

我反唇相讥："你们竟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更狂了么？你能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级别太低，根本无权来问我。"

他们气得要命，大声跟我吵。这时往往是我厂组织组人员闻声出来打圆场，对他们说："你们要外调谁，就问谁的问题嘛！"又对我说："你对谁了解，就实事求是，把知道的情况谈出来。"我就以胜利者的口吻，顺势"落蓬"："那你们就爽快地说要调查谁，我配合你们。"表明我不是一个能被随手捏捏的人。

外调人员只得萎下来，无奈地说："×××认识吗？"

我就一面坐下，一面说："哦！他呀！认识，这人是我组织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我特别强调一般两字，有意贬低："他是一个跑跑腿的，作用不大；好夸口，好吹牛。"甚至骂上几句。让他们感到，他们手中的猎物是个简简单单、不会隐瞒重大问题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个人下了台（如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一生干的事全成了坏事，成了罪状，连说过的话，也都是错的；一个基层的党政干部被“靠边”，他过去所做的好事，也全被说成坏事而挨批斗。上至中央下到地方，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同样，我们这个被解散的造反组织，被关押被审查的的大大小小头头全成了“坏头头”。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我就得“老实坦白交待”，把同我一起干过事的人的“罪行”提供给他们。

我为了能减轻我的部下的磨难，所以当他们问什么事是他干的，我就轻描淡写的说，这是在当时什么样的背景下，是我布置他做的，他如何做了，又如何向我汇报了，这事的责任是我的。我把能揽下来的全揽下来，虱多不怕痒，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我身上无所谓，搁在别人身上就重了，光是学习班、批斗会就够他受的。说来也有趣，为了我这个“大将风度”，还受到了裘同志的警告。最后，来人问不出什么了，就说：“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我轻松地说：“怕了我就不造反了。”我手一指：“来吧，把陈述笔录拿来。”他们就把纸和笔递过来要我签字。

我挡回递过来的笔，认真看他们的笔录。

这些人很坏，断章取义是惯用手法，对他们认为需要的材料就记，不需要的不记，对对象不利的绝对记录在案，有利的情节和开脱的语句只字不录。这样的一篇陈述笔录，是歪曲事实，无端整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整人的材料，回单位后可以变本加厉地整。）

看到这样的笔录，我就拿起笔来，大笔一挥，整段整段划去。他们连说：“嗳，嗳！你怎么……。”我就反问一句：“我是这样说的吗？”我就管自重写，他们也奈何我不得。

最后，我必定在陈述笔录上写：“经本人审阅（不写‘以上看过’），情况属实。”再签上我的大名，像大官批阅文件一样。最后再盖上我单位的组织组公章，这一外调材料就算完成。

牵着他们转

有的外调单位来三、四个人，如果他们态度和气，拣好听话恭维我几句，我们之间就不存在敌意，对他们的提问我就叙述起来，说得兴起，便以夸耀的口气像讲故事似的说我们的造反经历。听的人津津有味，一副满足了好奇心的神色，他们不时撩拨几句让我说下去。我朝笔录纸上一看，什么也没有记，我发觉上当了，不高兴了：“你们是来听我讲故事的？你

们回去吧！”接下来就是一场争吵。

厂组织组的一位女同志闻声赶来。他们指责我拒绝合作。

我针锋相对，指着他们的笔录纸说：“你看，我讲了半个小时，口也干了，他们记了几个字？”我得理不让人，摆出教训人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这么忙，他们却浪费时间听我讲故事，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当儿戏，我要回车间去抓革命促生产去了。”我做出要走的样子。

这时我厂的同志必定劝我坐下，对他们说上几句大家都忙，抓紧时间的话，我就重又坐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大大咧咧地说：“好吧，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你们说吧！”于是，叙述，开脱，修改笔录，签名，外调材料完成。

像我这样对付外调人员，大概是极少见的，但我并不是第一次就敢于这样顶、这样斗。在头两次的外调时，我是被懵住了，老实地问一句、答一句，被人当犯人审。事后分析分析，我才感到窝囊，他们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利用我去整人！

逐渐摸到了外调的规律和外调人员的心理，就明白了怎样掌握主动权，就可以对对象减轻压力，开脱“罪责”。我的智商并不比他们低，我的经历比他们丰富，以我的胆识和气魄，镇住了这些外调人员，达到了我的目的。

这些情况后来陆续反映到专案组老裘那里，他打来电话：“你的反革命气焰好嚣张哟！竟敢对外调人员大发脾气。”我解释说：“这些同志摆出审问的架子，我受不了。再说他们就是好听我讲故事，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听，浪费时间嘛！他们总不该像你老裘那样，什么都该知道吧？这对阶级斗争来说也是不利的。”

裘听了我的话，口气平和地说：“你的脾气也够大的了，以后脾气不要发了，有什么要求就好好向他们提出来。”

我抢着说：“我要他们告诉我被调查的对象姓名，他们就说我摸他们的底，逼得我发脾气的。”

裘说：“你可以好好向他们提出来，然后把你知道的实事求是地说出来。”

我赶快抓住这句话说：“但他们就是不实事求是，断章取义地记下我的话。”

他不耐烦了："好了！好了！他们说你好摆组织部长的架子，你倒真会摆架子啊！"

从这一次电话后，我心中更有底了，我的架子就更大。

后来，这些外调单位（也有二、三次重复来的）大概被告知过，摒弃了审问式的问话，没有了专横的态度，开门见山要某人的材料。有的单位不主动的，我就会往椅背上一靠："说吧！你们要谁的材料。"这样缩短了不少时间，少费了口舌，用不着我费心揣摸。我处在有利的地位，掌握了主动，就更可能摸到对方的"底"，也摸到了专案组的"底"，使外调人员完全在我定下的狭小范围内，收集他们已知的材料，避免节外生枝。

我明白，我的陈述记录，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于是我放手干起了保护过去工作人员和各区分部头头的事，尽力使他们早日从"学习班"中解放出来。

没完没了的整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就是整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对我们这些造过反的大小头头，都要整一整，折磨得让人终生不忘"学习班"，终生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终生不忘因自己"轻举妄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尽情表现自己，我要让这些外调人员看看我这大头头，不是活得还算潇洒吗？那么，你们手中那个小小的猎物，还值得这么整吗？

有时等待我的外调单位来了几家，我就潇洒地往当中一站，对满屋子的外调人员说："哪一单位先到？后到的请排在后面。"对先到的单位，手一招："请坐，请你们开门见山，否则时间来不及。"直截了当，某人、某事，三言两语打发走人。可来人意犹未尽，只得退过一旁，但还不想走（我知道，这些人很想听听我们过去的造反史）。我管自接待（我很自豪可以用"接待"这个词）后面的单位，有时我兴致所来，也想让这些外调人员听听某一段造反过程，让他们全面了解背景材料，我就会说："今天你们几家外调的内容差不多同在一段时间内，我给你们多说一些，大家一起听听。"我就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时，在静寂的气氛中，他们围着我一个中心，听着一段段刚刚逝去二三年，曾经震动上海的旧闻和内幕。看着他们聚精会神的样子，看着他们被我在牵着鼻子转，我好不得意。

有一点必须注意，外调人员最忌的是不能问他们是什么单位来的，就是到了目前这样的场面，我仍不能问，否则他们一定不高兴。有时我明说你们是某厂来的吧？他们就显出不高兴，只当没有听见。不让问就不问吧！那时的人，哪里知道公民有"知情权"，哪里知道有"告知权"，更不用说"沉默权"。

漂亮的泼妇

有一天，通知我去组织组，我与往日一样，悠然一脚跨进办公室，两男两女，一个单位的，好大的阵容，调查谁？他们是什么单位，看来今天我得小心点才是。

坐定后，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摆开做笔录的架势，另一位俏丽的 30 岁左右的女人示意另一男的：开始吧！他们以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一本正经的问法作开场白。

在这段时间，各单位专案外调人员来厂，都已经用相当温和的态度来迎合我，这样的外调开场白好久不见了，这虽然引起我的不快，但今天在没有摸清对方的单位和意图前，我不便发作。

那位男同志从造反初期开始问起，他们一个事件问毕，又问下一个事件。那个俏丽的女人，不时打断问话和我的回答。我从她的随心所欲，可以认定她是四人中的头。她对那些关键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轻轻放过，她和这伙人在兴致勃勃地听我讲故事！再看那做记录的，也在饶有趣味地听，什么也没有记。我不由勃然大怒，腾地站起："你们是在听我讲故事啊！我拒绝回答你们的提问。"我马上把组织组的女同志请来，指着他们的纸："你看看！我讲了半天，他们记了几个字？"

那个女的说："我要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记不记是我们的事。"

我说："那么我不回答，你拿我怎样？"

那个女的露出泼妇的嘴脸："你敢！"

我针锋相对："那我拍拍屁股走了。"那个女的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你敢，你敢！"她原来俏丽的脸庞，小巧的双唇，这时却那样令人生厌。

我玩世不恭地笑起来："你这泼妇的模样，请你在家对你的丈夫去发吧！这里是上绒厂，没有人吃你这一套。"这一来她更受不了，跳起来，大叫大喊。

我厂的女同志把我拦住："你耐心点，不要走，不要走。"我却挑逗说："我一定要走啊！否则，就是不敢走。"我怕她还没有听出味来，又加上一句："我就是怕她罗。"我厂的女同志微微一笑，息事宁人地对他们说："你们就直截了当地问要了解谁？大家都很忙，抓紧时间，好吧？"她回头又对我说："耐心点，把有关的向他们谈。"

我也大度地说："好吧！我可以配合，你们是什么单位？"

那女的气犹未平，轻蔑地说："你无权知道。"（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法制国家会这样回答被询问人。）

我微微一笑，"那你们要问谁的问题呢？"

他们几人相视了一会，女的说："周××。"

我从鼻孔嗤的笑了一声："你们是卢湾区果品公司下属的中心店了。"

周××在这家食品店做临时工，卖水果，他是总部大队的人员，在 67 年夏天"重拉队伍"时，他一直在愚园路联络站跑腿打杂。此人无能耐，为人糊涂，但又不安分，离过一次婚，又讨了上棉十二厂一女工为妻，这女人生得漂亮，好像有精神病史，讲话搭七搭八。这是一对糊涂夫妻，只要今天快活，不愁明天无米。周某人不算坏，待人办事挺热心，就是到了月底无钱用时，手脚有些不干净，在愚园路时，常干些顺手羊的小把戏。

当我们决定变卖被封的资本家财产充作经费时，周某某显得很活跃，熟门熟路地把东西挑出来，经手过几件东西。此人要审查的看来也只有这不干不净的事了。（文革开始，写"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被中央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它"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么，现在由"组织"去调查、整治这些鸡毛蒜皮人物的鸡毛蒜皮的事，算是什么"路线"呢？）

我大大咧咧地坐着，对那作记录的说："你听着！不要漏记，不要断章取义，歪曲我的话。"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见他们对我有点挑衅的话语没有反响，我就故意再次挑衅道："周某某，此人是在总部混混的，在总部值班看门，在联络站时打杂跑腿，没有什么职务，也没有干过什么事，够不上审查的资格。他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这寥寥几句，把那泼妇的气得说不出话来。

冷场一会，男的问了一句："就一点没有干过坏事？"

我反问道："那你干过坏事吗？"

那男的真是好气量："你再回忆回忆。"我装着没听见，把头转向窗外。

那女人开口了："听说他手脚不干净！"

我反击道："那只是你的听说。"

那女人显得耐心了："周某某这人，在店中经常小偷小摸，在你们总部也偷，是个贼。你知道他偷些什么吗？"

这愚蠢的问题，机会来了，我装出大怒的样子："你说他是贼，偷过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他偷什么，我不也是贼了吗？你在侮辱人。"我猛地立起来，大声说："你在侮辱我的人格，我拒绝你们的提问，我走了。"

组织组的女同志闻声，无奈又赶来，我对她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次外调就这样结束了。哼！

第二天，裘来电话："你怎么脾气又大了，人家又反映到我这里来了。"我解释说，"他们正事不干，听我讲故事，又侮辱了我，我当然要发脾气。"裘对我也不怎么样，只是说，下次不可以，就搁下了电话。

现在想来，裘同志不但在审查红工常委时，对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给予了不同的处理，而且在全市大大小小单位对红工一般群众的外调中，也能容忍我对手下人的正当保护和对外调人员的高傲不驯，显示出他既精明干练又通达情理的为政、为人的高水准、高素质。事隔三十年，回过头来，我应当庆幸审查我们的公安负责同志是裘顺富。如果裘同志（请允许我称你同志）能看到这本书，那么，在这里我向你表示敬意！

第二十六章 悲凉的起义

姚红领导的反抗

一九六七年二月后，红工司解散，上海陆续有临时工被解雇，我们重拉队伍搞联络站，在“8•4”大镇压后，重拉队伍失败。一九六七年年底开始，我们这些头头被关押、受审查，红工彻底跨台，被解雇的临时工越来越多。

本来是为了要吃饭起来造反，现在反而没了“饭碗”。被解雇的临时工们不断去市劳动局要求工作，失业大军在市劳动局门口聚集起来。通过文革的造反，红工的锻炼，人群中很快产生了新的领导核心，明确提出“要工作，要吃饭”的口号。

提出统一的口号，标志一个松散的组织已经形成。

这无异是对市革会的挑战，这是“8•4”后对张春桥、王洪文的又一重大的反叛行动，必然要遭到镇压。

在这之前，零星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姚红就领导了一次小型反抗活动。

事情发生在虹口区的商邱菜场，那里的临时工全是女性，她们不甘被无故解雇，团结起来进行论理，理亏的新当权者恼羞成怒，竟然唆使打手毒打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制造了罕见的暴力解雇的悲惨事件。正义感特强的姚红领导这些女工的斗争，把她们的遭遇写成文字，又把被打伤的人员的伤势拍了照片，到处上访，但是在上访过程中，进展不利。他说要把这些照片进行大量冲印，附在传单上广为传播，以唤起舆论的支持。

我虽在审查中，但自感在暗中还是能把这洗印照片的事揽下来，就自己出钱去买了不少“处理”的便宜印相纸，用自制的土印箱，印了不少照片给他。

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些被解雇的女工，被重新安排工作，总算有饭吃了。但被打的白白被打，唆使打人的是正确的化身。

这些零星的小型反抗活动，越来越多！失业大军越来越壮大，必定会在这时汇聚起来。王洪文之流说这是在“闹事”；失业者说这是要求工作要吃饭。当权的统治者要的是“顺民”，老百姓要的是“民以食为天”。

“闹事”者终于把事“闹”大了，在市劳动局（这时，市劳动局已从外滩迁到江西路）的对面，江西路近汉口路的墙上，公然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那些“要吃饭”的人张贴的。

我极想去看看，但我不能去。我一去，在江西路上出现我这么一个危险人物，几分钟后就会传到专案组，专案组的大本营就在只有几十公尺远的江西路福州路冶金局大楼的一楼，必定有“有关部门”的人在监视着现场。我不能引火烧身。

我压制着冲动，压制着想投入这重新“造反”行列的冲动，只能向为了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英雄豪杰们默默地表示敬意。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从另一个方向把我拖进了这场旋涡。

张元龙和徐同增领导了起义

事件愈演愈烈，人群越聚越多，每天在江西路上，“闹事”的人群络绎不绝，有三五成群打探消息的，有来劳动局上访要求工作的，有情绪低落的，有激愤不已的，也有来看热闹的。

在这表面现象中，涌动着一股组织起来的地下活动，其标志就是墙上的大字报不断涌现，不断更新。其言词有的温和，有的尖刻激烈。大字报或者用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阐述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失业，那么要求工作的权利当然是合法的；或者用批判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说明要求工作无罪。

一张张大字报，如支支利箭射向市革会，张春桥、王洪文沉不住气了，要用大棒打人了，上海的两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把这斥指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妄图压

制这纯粹来自下层百姓求生存要工作要吃饭的合理要求。但这一招并不顶事，人们并没有被吓住。于是张春桥亲自上阵了，在全市的电视讲话中，施展他的高压手腕，力图压下这场正当的斗争。

张春桥电视讲话的背后，意味着要用行动抓“阶级敌人”了，善良的人们退缩了，围聚的人群消失了。

但，还是不断有新出现的大字报，这重又鼓起了人们的勇气。没有了工作，连极为微薄的工资收入也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了，逼得人们只有铤而走险。人群重又聚集，火焰再度燃起。

在这样的局面下，裘把我召去，明白无误地要我“打入内部”，去破坏这场斗争。

裘指出为首的核心人物是张元龙。

啊！原来是他。

这人原是红工司宣传部殷庆宝手下的一枝笔，在重拉队伍时，主编《批判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小册子。他为人忠厚老实，一付慎微小心的书生气。他竟有如此泼天大胆，领导了这场斗争？我不由肃然起敬！

张元龙的妻子原是一位资本家的小老婆，在文革形势的推动下，这位要强的女性，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与资本家离了婚，在认识张元龙后，与张结了婚，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艰难，女的受人歧视，一直没有工作，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张元龙又被辞退解雇，断了生计，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一家三口何以为生？

他们原住在资本家留下的一间在常德路上的公寓中，由于无钱付房租，拖欠了好几个月。尽管这个女人已经嫁给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房管所的造反派们仍然把这重组家庭的女人视为“寄生虫”，岂容拖欠房租的“寄生虫”住下去呢？他们被赶出了这高级住宅。

张元龙这一家子，要求工作无门，断了生计，遭受了一系列冷酷，在绝望之下，只有横下一条心，在文革初期熏陶出来的造反精神驱使下，驾轻就熟地干起了“阶级敌人”的“捣乱”勾当。人们以他为核心，顽强地抗争着。

另一人物为原总部大队部的徐同增，据介绍，该人物在指挥一切。徐在红工司总部的时

间，学到了不少造反的经验，他已不再是过去在总部值值班，冲冲杀杀的徐同增。于是以徐同增的经验老到，加上笔杆子张元龙的谋略，众多要吃饭的人团结在他们周围，组成了一个对市革会来说危险的团体，波澜壮阔地在江西路上闹起来。

市专案组要求我前去"打入内部"，扮演这样的鹰犬角色，我很反感，我能这样做吗？做一个叛徒，出卖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出卖我的同路人，我所崇敬的"绿林好汉"吗？不能！

我决不做鹰犬

但虎视眈眈的专案组人员，在盯着我，我能拒绝吗？"在这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你要经得住考验。坚决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站到市革会一边来，还是站到对立面去，你自己选择。"这出自专案组之口的言语，份量是够重的，我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上面的"旨意，在这当口，专案组接手江西路上的"闹事"案，一定是市革会指示交办的。

我也明白，做鹰犬的角色，绝不会有好下场。不管到那一年，都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我的选择要么是拒绝，坐牢；要么是按他们的旨意（实际上是上面的旨意）去"打入内部"，做受人鄙夷的刽子手。

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我不能犹豫不决，让他们看出我的心思，我迅速表示接受指令，打入内部。我故意装出欢欣鼓舞的样子，表示要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立新功，将功补过，一定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新生的市革会。

但我暗暗决定相机行事，寻找办法对付，决不做对不起人的事。

听了我的表态，他们向我摊牌了：在明天下午，在徐同增的家中，将有骨干参加会议，要我去参加。

我暗暗吃惊，既然专案组已经掌握这个情况，说明他们内部已经有鹰犬出现，这一危险的人物是谁呢？现在，专案组再把我派去，一定是为了可以更深层次地掌握动态，以便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我为张元龙和徐同增的安全担忧。

我开动脑子应付专案组。

尽管裘是老公安，但他们还是有漏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一漏洞正好为我利用。

我显出真心诚意的样子说："我在他们召开的会议地点突然出现，不是要引起他们的疑心吗？我是受审查的人，马上会引起他们的警惕，他们必然会对我进行防范，这……"

那个较年轻的马上插话说："那就要看你本领了，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顺着我的思路说下去："我还是现在就去徐同增的家，先随便谈起来，如果他要我参加明天的会，那最好了，如果不提，我也可预先找好借口，第二天闯去参加会议，这样不是好一点吗？"

一直沉默不语的裘开口说话了："好！就这样办。"他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那样庄重地对我指示："大胆、冷静、机智地面对这场斗争。"他一字一顿地说完，似乎他又想起了什么，向我指出："你多听少说，不要出主意，不要把自己陷得太深。"他顿了一顿又说："否则我们到时可拉不了你。"

在他的警告后面，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关怀。我感动了，认真地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

裘庄重地说："随时与我联系，你一切小心从事。"

他们像在搞地下工作

我按专案组提供给我的地址，在北京西路找到了徐同增的家。门是朝南沿街开的，进门是一天井。我环顾四周，客堂很大，很整洁，家具不多，觉得很宽畅，大约有二十多平方。

明天的会，这里可坐不少人，而且很静，适宜开会，外人要闯进来，可以直接挡在大门外。

徐的妻子把我让进落座，泡上一杯茶。

我自报了姓名，她立时警觉起来，冷冷地说："你有什么事？他不在。"前后判若两人。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们家的住房住得好宽畅。"我无话找话。

女主人不搭理我，无事找事做，故意冷落我。

我略一思忖："他不在，那我明天下午一点再来找他，请你转告他。"

我有意把开会时间约定为我找他的时间，等于报了一次警，说完我就马上离开了徐家。

第二天我按时去他家，果然还是和昨天一样静悄悄的，什么人也没有，还是他妻子一人在家，冷冷地说："他出去了，我马上要去娘家。"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很高兴。他们转移到别处去了，他们好警觉呀！我又有点惆怅，我真想见见这些"绿林好汉"啊！他们比我有魄力，有胆识，他们真像在搞"地下工作"！我想，还有些什么人参加呢？很可能有不少人也是我原来的部下。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人啊！我已不再是他们可信赖可依靠的红工司的组织部长了。我被误解深深地刺伤。

我复杂而失望的情绪更引起了他妻子的警惕和反感，她既不让坐，更不倒茶，管自在整理着什么。这是明摆着的：我不受欢迎。

我立即告辞，离开徐家。

我跨上自行车，轻松地向福州路冶金局大楼骑去，没有按平时的惯例，先打电话，由裘

约在附近的广东路派出所见面。我在冶金大楼传达室请门卫通知一楼 108 的专案组。

不一会裘下来了，他马上把我拉进大门右边的食堂，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呀？你来这里走过劳动局门口吗？是不是被人看见过？"

我说："我是从西藏路沿福州路过来的，没有被人看见。"

他有点不高兴地说："以后你一定要先用电话联系，不要直接上这里找我。"

我告诉他，昨天我去徐家，他不在，今天下午又去，什么人也没有，根本没有人在开会。

裘："哦？那么徐同增呢？"

"他也不在。"

他反背双手踱了几步，站到我面前："你还是设法要同徐联系上，想尽一切办法靠上去，最终要同张元龙见上面。"

我很奇怪，难道张元龙完全隐在幕后指挥了吗？我说："张元龙结婚前在宜川新村，他的地址我有。"

裘说："他已经很久不去了。他现在神出鬼没，行动诡密。"

原来如此！他们已经完全转入了地下。

我不便再问下去，站起来表示要走了。他又庄重地说："大胆，冷静，用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要打进去。"我点点头。他送我出大门，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目送我骑上车。我向外滩方向骑去。

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几次打电话约徐同增见面，他总是拒不见面，从电话中传来他极不友好的语气中，我感到他对我的厌恶："你现在来找我有什么事？我没有空见你，我要到丈母娘家去了。"随即把电话挂断。后来，他干脆不接电话，要公用电话回说没有人在家。

我把这一切向专案组汇报了，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一筹莫展的样子，心想，这样很好，我可以过关了。

一张叫“鸭孵卵”的大字报

张元龙他们好样的！他们组织的大字报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天下午围看大字报的人把江西路两边人行道挤得满满的，我厂乘 17 路电车上下班的人不少（17 路电车恰巧经过这个地段），他们把这令人振奋的景象不断告诉我，使我再也按捺不住想去看看的欲望。

早班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竟自去了江西路。我把自行车停在九江路上，向劳动局门口看去，人群鼎沸。我慢慢地向对马路满墙的大字报走去。大字报前人头济济。

这样的大字报场面已经很久不见了，这时到处能见到由单位造反队组织的与墙报形式有些相似的《大批判》，有文有图很漂亮，但都是空洞、单调、乏味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些“小道”内幕消息掺杂其中，很少有人去看。而在这里临兄们要工作要吃饭的呼声，令人同情，大字报内容写得生动、真实，催人泪下，不管你是否是临兄，都要停下脚步看下去。

墙上也出现了一些钢笔书写的小字报，多为短小精焊的小品文或是打油诗，文采照人，字迹端正。显然是为了贴起来快捷方便，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贴的人比较安全。

这里也有大量当局组织的大字报，是一些不知人情世故，不知柴米油盐，靠父母吃饭的红卫兵写的，他们在上面的唆使下，向失业的临兄们发起了进攻。

他们在临兄们的大字报上，复贴（注意：他们只是“复贴”，而不是“撕去”，在动用专政工具的时候，还留着这假面具，这种形态是值得研究的）上他们的大字报，他们闭眼不看现实，以极“左”的面貌，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展开不平等的“辩论”，压制民主，消除“流毒”。他们或者在临兄们的大字报上用钢笔胡涂乱写，抓住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进行所谓的批驳。

面对这些“左”得让人欲哭无泪，只能笑其无知的大字报，我们的英雄很懂得策略，出了一张善意批评的大字报，写得十分生动，效果奇佳。

标题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上海市井俚语："鸭孵卵"。不同于任何一张大字报标题，就这足已引人注目了。

"鸭孵卵"是六十、七十年代我们上海人用得非常广泛，频率很高的一句上海方言的口头语，引伸意义为惹事生非、不明事理、捣蛋青年的代名词，极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出典，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出这三个字。

大字报大意是这样的：

一只老母鸡在抱窝孵蛋，为了孵出下一代，老母鸡专注地孵着，不时用嘴把蛋翻身，变换位置，调节温度，母鸡的专注引来了一只母鸭的好奇，它在边上看着，觉得好玩，正在这时母鸡暂时离开鸡窝去吃食，母鸭感到机会来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为了好玩，它摇摇摆摆地踏进鸡窝中，学母鸡的样子坐在蛋上，可是它马上觉得一点也不舒服，它不时扭动身子，尽力想搞得舒坦些，结果把一窝蛋翻得乱七八槽，有的滚出了鸡窝，有的被它的扁嘴啄破了。大家知道，家鸭在人工的培育下，一代又一代，已经丧失了孵蛋的本能，繁殖后代完全靠人工在哺场中控制温度孵出来。而这只完全丧失孵蛋本能的母鸭，也要来瞎起劲，岂不是笑话吗？

这张大字报的含义不言而喻，它善意地告诫那些不明事理、不懂生活艰难坎坷的人不要瞎起哄，这不管你们的事，不要做上海滩上的"鸭孵卵"。

这善意的上海人的骂人话，引来了观者的阵阵笑声，我看了，也哈哈不已，我佩服此文幽默的文采，它用通俗的道理，劝人不要助纣为虐。

张元龙啊张元龙，你在殷庆宝手下，并没有显山露水，今天，你自己在挥动大旗，你的聪明才智却充分显示出来了，在这险恶的环境下，你能渡过去吗？

匆匆看罢大字报，我刚转身要走，还是被人认出来了(可见这里的群众是有一定基础的，难怪张春桥的电视讲话也吓不倒他们)。我还来不及招呼，很快在我的周围聚起了几十人，这些人向我诉说被解雇后的遭遇，在劳动局接待室受的冷遇；有的对临兄们出的大字报叫好；熟悉我的，小声询问我们这些头头的下落，对监禁的头头表示关心和不平。

我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我自己记不清当时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还受到群众的拥护，我的心不禁难过得紧缩起来，我现在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呢？

俏丽的小姑娘

一个面容俏丽清秀、身材姣小的小姑娘的形象，浮现在我的面前。

那是红工司总部成立不久，我们的接待室每天人满为患，接待他们是很累的工作，我安排了好几个人搞接待，也忙得不亦乐乎。我认为接待工作一定要搞好，一、这可以使总部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联系群众；二，可以解决群众的就业问题，指导群众掌握我们同市委达成的保障就业权利的《114 号文件》，让群众用自身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一天，接待人员引来一位年仅十八、九岁的姑娘，她穿一身洗得干净、略微嫌小的单薄的蓝布衣服，畏畏缩缩随着接待人员进来，不知是冷、是怕、是羞，还是自卑，她低着头。当接待人员对她说，这是总部的常委、组织部长，她才微微抬起头。她面貌清秀，生一双讨人喜欢的大眼睛，但这双眼睛是阴暗的、忧伤的。

我很纳闷，这么年青美丽、还没有脱尽稚气的姑娘，她来干什么？在我看到的来访者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年青的女孩子，难道她有什么事，为难得接待人员解决不了，非要我亲自解决吗？接待员看那姑娘不开口，就代她把话讲了出来。

可惜的是，我现在怎么也回忆不起她怎么会孤苦伶仃一人，生活无着。她要求安排就业，地区不给解决，在这大乱的日子里一切被“砸烂”了，谁会去安排她的工作呢？况且她很可能还是一个“黑六类”的子女，背着“黑锅”。这个失去了父母的庇护，被这疯狂的社会抛弃的小姑娘，在这乱纷纷的年代，不知是谁给她指点迷津，使她抱着希望，找到我们总部来了。由于她的身世令人同情，接待员把她直接领来，企盼我这头头能解决她的吃饭问题。

听完她的情况，我也犯难了，我无法也无力解决。我们同市委达成的《114 号文件》只是对在 5 月 16 日以来被“解雇”的可以回原单位“恢复”工作，可是这小姑娘还从来没有“工作”过，我怎么办？我很为难，又不忍心打发她走，她一个人靠什么生活下去啊！

大老李看出了我的为难之处，他豪爽地把胸脯一拍：“把人交给我吧！我来想办法把她安排在邮电系统工作。现在先在我们总队干起来吧！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她一口饭吃。”大老李用征询的眼光要我表态。

我对大老李是信任的，此人正直、热心，乐于助人，也只有古道热肠的大老李有条件解决这难事。我如释重负，说：“大老李，就这么定了，你可要负责啊！”

我转向那年青姑娘，也没想到去征求她的意见，说："你跟大老李去吧。"她看看我，看看一身邮电制服的大老李，又看看大家，她的眼神中透出迷惑不解。我向她解释："大老李是邮电总队的头头，由他设法安排你进邮电系统工作，在此之前，你随他到汾阳路他们总队去，先在那里干起来。"

大老李庄重地说："你放心，有我大老在，我一定保护你，不让人欺侮你，像亲妹妹一样待你。"

众工作人员说："大老李是好人，你放心去吧！"到这时，这姑娘才点了点头。

但我又有点不放心，问大老李："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她？"

李说："我们总队也有女同志，我安排女同志陪她。"

"那么她的工作呢？"

李说："你放心好了，我会找当权派去打交道，一定安排她在邮电系统工作。"

这时，大老李提出要我亲自送她去。我一时还没有领悟过来，我的摩托车手毛胡子老陆开腔了："这事还非得你小沈出马不可。"我这才醒悟，是呀！大老李带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突然出现在他们总队，难免被人议论，我一块儿去了，大老李才不会被误解。

好事做到底。走吧！

摩托车的后座只得让给那姑娘了，我骑上一辆"苏修"的两用车，大老李是"永久"两用车，我们四人一起向汾阳路驶去。

不几天，大老李来总部，骄傲地邀我去他们那里看看，我也想去看看那姑娘，他们为她安排得怎样。

那天送她去是下午，这次去是晚上七、八点钟。

到了那里一看，宣传品摆得满桌满房，六、七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那姑娘已是一身邮电绿衣人装束。大老李对她说：“你看谁来了。”她一见是我，满脸笑容，忙着迎了上来，又是让坐，又是倒茶。我问她好吗？她一面笑着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工作了，一面像小鸟一样，张开手臂像要飞的样子，在我身前转了一圈：“你看，我这一身绿衣裳好看吗？”明亮清彻的大眼睛是那样的欢乐，那样的天真、单纯。

我见了她的高兴样，自然消除了我的担心。

她今天的模样与前几天判若两人。她掩饰不住发自内心的高兴，与其他两位女同志在欢快地分拣宣传品，欢乐地唱着歌，连走路也是蹦蹦跳跳的。望着她像小鸟一样欢愉，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大姐姐、大哥哥们的照料，有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必须主动汇报

我从回忆中醒来，站在江西路汉口路转角处，记忆中的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晃过，挥之不去。那位天真、纯洁的姑娘，现在是不是也会落到眼前这些人的地步，失去了工作，重又陷入绝境？

我的心又紧缩起来。

望着满墙的大字报，一方是为了要工作，求生存，求得一家仅能维持温饱的要求。一方是那些受蒙蔽、被利用的无知青年，挥起大棒在“批”人。对这些善良而无知的青年，我真想大喝一声：停止你们愚蠢的行为！请认真想一想，你们为我们这些失去了工作的失业者想过没有？在今天的社会，一个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就是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赖以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对那些刚掌了权的人，造成眼前这局面的而又在磨刀霍霍的人，我热血沸腾，我真想对昔日的旧部振臂一呼：“造反有理！”我重新做你们的头头，你们的组织部长，争取本属于我们的生存权！

险恶的处境，使我不得不冷静下来，我不能轻举妄动，要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我逃也似的离开围着我的人群。

本想悄悄地来，悄悄的走，但刚才我原来的部下围着我的情景，一定惊动了专案组，瞒是瞒不过的，危险迫在眉睫。我要立时作出主动行动，越快越好。

我在九江路上，找到我的自行车，骑上车找公用电话，拨通电话后，在等待裘听电话的瞬间从电话中传来一片嘲杂的人声，啊！我的出现惊动了他们，一定是的。

不由得意起来，只要我们能真正团结起来，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场斗争一定会胜利。

从听筒里传来裘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啊！你现在哪里？"果然，他已经接到报告了，有点沉不住气了。

我告诉他，我在九江路福建路上打电话，我告诉他，刚才去了江西路现场。

他问："你去干什么!"口气严峻。

是的，我去干什么呢？现在我打电话给他，无非是我主动告诉他我去了，去干什么？我没有自圆其说的解释，如果说是去看热闹，他能相信？容不得我多想了，我一急就说："我几次打不进他们内部，我来这里是想由我出面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你老裘不是可以掌握主动了么？"

裘听了我这愚蠢的答话生气地说："你现在哪里打电话？"他又一次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福建路上打的公用电话。他说："不用讲了，你马上回家，明天上午九时在广东路派出所等我。"在放下话筒前，他又一次命令我说："你现在就回家去，再也不能在江西路上露面了!"

失业者一旦聚集起来向政府要求就业，竟然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恐慌，伟人倡导的"四大民主"在哪里呢？

我很钦佩领导这场斗争的张元龙，他组织的大字报犹如一把烈火，烧去了文化大革命虚伪的民主，让"革命群众"进一步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我钦佩他们组织得严密，对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头头们一律不信任，排除在外。徐同增对我的警惕就是他们的成熟之处。

我钦佩之余，又为他们的处境担忧，不由得心揪紧起来。

明天，明天上午九时的碰头，怎么应付？今天算是过去了，明天怎么办？管他呢！真把我逼急了，就正式投入进去，组织起一批人，公开斗一斗，大不了被关起来。

第二天，我被裘狠狠训了一通，他嘲讽道："怎么？你还想做你组织部长的旧梦？那里的乱子还不够大？要你去火上加油？还用得着你去搧风点火啊？"又吓唬我："昨天你再待下去的话，我就要把你抓起来了。"又警告我说："以后可不能乱来，不能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要请示汇报。"听到这里，这事算了结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他并没有要我做什么事，我如释重负。

又是假情报

从这以后，有一个人同我特别近乎起来。

这人叫黄辉，在军工路电缆厂做临时工，三十岁左右，能说会道。据他说，他原是卢湾分部的工作人员，在 67 年重拉队伍时，他经常出现在愚园路 67 弄 43 号的联络站，我同他就在那时认识的。

在联络站时，他的行踪飘忽不定，要么天天来，要么几天不来，来了就是吹小道新闻，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从来不干事。给我的印象是此人很不踏实。

现在他主动与我用电话联系上了，他不断提供一些市劳动局门口的情况给我，让我感到他对那里的群众非常同情和关注，在积极参与这场斗争。

过去，我同他从没有来往，他突然在这时出现，不能不使我警觉。很可能是专案组对我不放心，把他派来监视我，唯恐我真的去煽风点火。

我又想起，67 年夏，在重拉队伍时，有人警告我们，在我们中间混进了市革会、工总

司的人，要我们提高警惕，那时我不以为然，不相信我们临兄之中会有出卖朋友的内奸。直到 8 月 7 日被抓拷打追查，我才相信，我们之中的确有奸细。现在黄辉再度出现，我得小心同他周旋。所以，他每次来电话或者与我见面，我就如实向裘汇报。

我又判断，黄辉这人也可能被派去打入了张和徐的内部，但他并没有能靠近核心，只是在外围转悠，现在又来监视我了。

有一天，裘通知我去专案组，我早早吃了晚饭按时赶到，门卫打电话上去，他们下楼在右边的食堂同我谈话，告诉我，今天晚上张元龙、徐同增他们在南市开会，要我赶去参加。裘的助手——个子矮胖的一位便衣把地址给我，说这会非常重要，要我一定设法打进去。

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点头的份儿。

这几天，我的鼻炎发得很厉害，头昏脑胀，我顺手把随身带的 B6 药片服了两片，那助手见我吃药片，哈哈笑了起来："怎么？你害怕了，吃镇静药？"我顺水推舟说："是呀！我头发晕，心发慌，吃了药会好点。"他听了笑得更响了："你呀！真没用，你过去是怎么造反的。"

听了他的嘲笑，我一点也不生气，反倒高兴，你们把我看成没用的窝囊废那才好呢！我索性虔诚地说："我一点经验没有，你帮帮我，出点主意，教我一点办法吧。"那胖子高兴地笑了。

临分手，裘叮嘱我："沉着、冷静；多听、少讲话；不要出主意，否则以后我们不能为你说话，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裘的人格又出现了两重性。他执行着上面旨意，干着整人的工作；又在悬崖边上拉人一把。他是个正人君子。

我骑上自行车向南市去，天已经暗下来。我脑中在想，如何应付这一关，对张元龙他们，我希望他们对我抱警觉抵制的态度，这样于我于大家都有利。想到这里，心里似乎好受一些，那么又如何应付专案组呢?咳！多想有什么用，管他呢！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

吉人自有天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地址又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门牌号码。

我好开心！我又一次逃过了难关。

专案组老裘也真可怜，收到的尽是假情报，被人牵着鼻子走。连老裘都经常收到一些假情报，更说明张元龙、徐同增他们的成熟。现在再想想，让公安去对付自己的百姓，实在是浪费了公安人员的生命，裘的聪明才智也被浪费了。当然，裘是不由自主。

过去，共产党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时，会收到老百姓的假情报么？不会！

监视大字报的人

我在附近兜着圈子，反复核实，确证是假地址后，我决定顺路夜闯专案组，省得明天再被叫来，省去一次奔波。

到了冶金局大楼，已无门卫值班，无法打电话上去，根据平时的观察，我知道他们的办公室在一楼，外滩的房屋多为外国人所造，底楼称为 G，一楼实际是二楼，我上楼后，整个楼面黑暗一片，我在黑暗中摸索房间号码（平时我向门卫报 108 号，他就用电话把专案组人叫下来，我想这大概是房间号码），现在漆黑一片，如何找呢？正在我止步不前时，忽从一房间中传出裘的声音，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在原地大声叫："老裘！老裘！"

那房间中裘的讲话声嘎然而止，门一开裘第一个冲了出来，见了我急着问："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门牌号是假的，他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呢！"

他把我领到下面的食堂里，要我在这休息，不要走开，等会要同我谈话，就上去开会了。

我环顾四周，这食堂的灯都熄了，只有从玻璃大窗透进外面路灯的光亮，在幽暗的光线下，我看见靠窗的长凳上有两个人在睡觉。在我同老裘进来时，其中一人翻下身，对我们看了看。我坐着等裘下来，可是怎么也等不到他们的出现。我的倦意来了，也找了张较宽的长凳横下身来。

刚迷迷糊糊要睡着时，有人进来，悄无声息地找地方躺下，而那原先的两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我在黑暗中看着他们，好不奇怪，他们是干什么的？正在这时，又有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女的，胖胖的，三十多岁的模样，他们也无声无息地躺下了。我不知道是几点钟了。只知道外面马路上的车辆声几乎已经听不到了，大概是半夜了。

天气真好，不冷也不热，无需什么衣被，我很快就睡着了。待我醒来时，食堂的灯亮了几只，食堂的一头，伙房的工作人员在忙着。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都在，他们人手一碗交头面，有滋有味地吃着。那矮胖的裘的助手把我叫醒，笑嘻嘻的指指桌上的一碗面，要我起来吃。吃面的人还不止专案组的七、八个人，原来睡在凳上的那些人也在吃面，气氛显得很热闹。那矮胖的端着面碗走来走去，活跃非凡。

吃完面，这些人走进走出，显得很忙碌，我也没有在意。

突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人来贴大字报，这些人一下子紧张起来，在矮胖者的带领指挥下三三两两悄无声息地出去了。

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些睡在漆黑食堂里的人是专案组用来监视江西路劳动局大字报的动态，为以后抓捕这些“破坏大好形势”的“阶级敌人”作好准备。

这些人出去后，食堂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我为那些来贴大字报的人担心，他们必被跟踪，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幕今天恰巧被我看到，而我的后果又怎样呢？为什么要留我到深夜，难道是让我看这一幕吗？

我为我自己，也为我们临时工——那些被解雇后失去生活保障的临时工而悲哀。

要我辨认一张“反革命传单”的笔迹

在饭后一枝烟，吞云吐雾后，裘招手把我喊到他的桌边，他把记事簿打开，把一张手掌大小的纸递给我，说：“你好好看一看，这是谁的笔迹？”

我一看，这是一张从墙上揭下来的支离破碎的小字报，那是由于它本来在墙上粘贴得很牢固，在用水浸湿后小心地小片一小片撕下，烘干，再拼凑粘贴在纸上。因为它内容“反动”才被作为罪证揭下来。

字迹用钢笔书写，工整漂亮。是一首打油诗，按当时文革的标准是一首矛头直指市革会的反动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要吃饭、求工作，语言尖刻点罢了。然而在当时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反革命罪证了。

书写的人当然也知道这份量，为了不在张贴时找来麻烦，才用如此小的纸张书写，以便快速贴出后快速离去。

我一眼就认出这是原红工司宣传部的某人笔迹。看来这次在劳动局门前的风潮，基本上是原宣传部人员为班底。

我手拿这张纸，做出努力思索的样子，专案组的人围着我，静得出奇。只有食堂厨房内传出的响声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空气。

不知什么时候那矮胖者出现在我的面前，指着我手中的纸说："这张反革命传单，矛头直指市革会，语句反动。是谁写的，你快讲出来。"

我皱着眉，作出绞尽脑汁的样子说："我看不出啥人写的。"

胖子追着不放："你再看看，这人的笔迹是很老练的。"

我一番搜索枯肠的样子，轻轻摇摇头："这字不像是张元龙写的，他的字没有这么好，这么老练。"

胖子说："是的，不是他，我对过笔迹。这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写的。"

我沉默着。

裘说话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站稳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一边来。不要江湖义气，迷住了你的眼睛……"

胖子插话道："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这是恶毒攻击新生的市革会，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讲得高兴，竟指手划脚，想用无限上纲把我吓怕而招供。

老练的裘却打断他的话，语气平和地说："我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你没有参与。面对这场斗争，你的表现是好的，我们了解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已经成立了市革会，这是毛主席批准的革委会，在大好形势下，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你想想问题有多严重。从你的家庭出身来说，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他顿了顿，继续和颜悦色地说："你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把剥削阶级在你身上的烙印除去，消除父辈对你的影响。"裘特别加重父辈两字的语气，犀利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描。我明白，他在用我叔父 49 年去台湾的档案材料施加压力，但他并不点破，给我留了点面子。

他的话又收回来："面对这场斗争，你要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对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是清楚的，你是犯有错误的人，但不像王继鑫他们，我们对你是区别对待的，我们给你机会，在这场斗争中，你要立新功。"

"立新功"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口号，是说造反派夺权后，不能停止不前，要继续立新功。老裘的用意是非常清楚的：用"高帽子"来捧我，要我说出是谁写的。

我"感恩戴德"地说："我是要好好改造世界观，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我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喝了几口水，你们是了解我的。我一定将功补过，争取有一个好的结论，你老裘对我的帮助和挽救，我铭记在心……。"

裘打断我的表白："你愿望是对的，但要看你的行动。"

他接下又说："这里发生的事同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有顾虑。要立新功，你要好好想想，这是谁写的？"他把话题又拉了回来。

我皱着眉摇着头说："我实在想不出是谁写的。"

他循循善诱："写这东西的人，有一定的文才，一定是你熟悉的人。"

我一时脱口而出："是啊！这字看起来是熟悉的，可是我想不出是啥人写的。"说到这里，我自己吓了一跳，说这字是"熟悉"的，不是露出马脚来了吗？

我赶快补漏洞："郭文美被抓了，不可能是她，张元龙又不是，殷庆宝没有这个胆量，

他想的是上有老，下有小……。”

那矮胖子冲进一句打趣的话:“当中还有一个金元宝!”众人轻轻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

我很感谢他这时这么来上一句，太好了，一下把气氛冲淡了，转移了注意力，掩饰了我的惊慌。我继续作出思索状:“徐同增胸无点墨也不可能，费敏璋……”我摇摇头:“也不能，是谁呢？”

我的表演大概很出色，老裘说：“现在一时想不出，你回去后好好想想，想出了马上打电话来。”

我一下轻松起来，说：“我回去一定好好想想。老裘，我去南市没有找到开会的地方，看来我……”

他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天快亮了，你回去吧。从现在开始，你要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将功补过。”他看一眼几个睡在凳上的人，又说下去:“这样你将会很辛苦的，又要在厂上班,又要出来活动,我心里是清楚的,但这样对你有好处。你看,我不也是一夜没睡吗？”

他不容争辩的命令和提携让我重新沉重起来。

黄辉约我“靠上去”

现在不是想的时候，我告辞出来，骑上自行车几步路就到了贴大字报的地方。这里灯火通明，靠福州路的一头是花哨的“大批判专栏”，装上了明亮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靠汉口路一头的墙上是这次风潮的大字报。

马路上只有几个行人匆匆而过，大概是赶上早班的人。有两三人在电车站附近站着，这是监视的人，伪装成等车人。这里的大字报太吸引我了，我多想看一看，尤其是刚贴出来的那份。我不由跳下车，急急地扫视几眼，但想起在我身后有几双眼睛在注视着我，只得骑上车就走。

当我到厂时，已经晨曦微露，我是头一个进厂的早班工人。时间还早，我进浴室美美地冲洗一番，把一夜的疲劳全冲掉了。

在隆隆的机声中，我开始思索起我的处境：昨夜的经历，已经把我逼上了山间小道，我已经别无退路。我不该在昨夜走进冶金局的大楼，把自己送了进去。我成了什么人？张元龙他们才是临兄们的领袖，真正的高尚的人。

我沉浸在自责之中。

上午九、十点钟，黄辉来电话，约我下午四点钟在江西路上碰头。

在江西路上碰头？在人群中公开露面？我明白这是裘他们在逼我积极行动。他们必定认为我只有在那里公开露面，才能靠近张元龙他们。

事到临头，我只有这么做了：走一步是一步，过一天是一天，把水搅浑，最坏的后果大不了也进监狱罢了。

但是，最大的可能倒是专案组把我摔给厂里造反队来整我。厂里造反队，对我眈眈虎视已久，他们虽然在支联问题上对我打了一棍，但由于有专案组的影响，使造反队不能继续整我，然而他们并没有放松，处心积虑在找我的把柄，欲置我于死地。

我要在应付专案组时，也要为今后应付厂里的造反队留下一条路。

我终于脱出来

下午二点钟我下班后，在去江西路赴黄辉的约会前，我先到外滩纺织局去。

乘着电梯上楼，很快找到了我厂的朱祥生。朱祥生原是我厂文革前的党委委员、监委书记，现借在局里工作。

他很客气地让我落座。窗外，外滩的景色一览无遗，黄浦江上的船舶缓缓驶过。我出现

在他的办公室，他很感意外。我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说，开门见山："在市劳动局门口闹事的情况，你一定知道，上海两报的文章你也一定看过。"

他瞪着眼，望着我点点头。

我说："我这段时间受市革会专案组的审查，专案组要我打进这些闹事人的内部去，我不能不去。我把这情况告诉你，你是党员、老干部，我对厂里造反队不信任，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我同造反队的关系，你也知道，他们一直要搞我。"

他不发一言听我说下去。

"现在市革会专案组又要我打进内部，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今后的运动谁也吃不准，专案组总有一天要撤消的，以后厂里造反队抓住我在江西路上的活动，对我采取行动，我将分辩不清要吃亏。所以我今天来，把这些情况告诉你，到时请你出来证明一下。"

他听到这里，面露为难之色，想要说什么。我拿起他面前的笔和纸，写上了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说："这是专案组的电话号码和负责人的姓名，你可以联系核实。"

他对我这一席话，始终一言不发，我也不想再说什么，就告辞走了。

在江西路上，市劳动局门口及马路两边还是那么多人。我在两边马路的人行道上兜了一圈，在汉口路转角处见到了黄辉，他在同一人讲话，见到我似理非理打了个招呼，继续同那人在闲谈。我就走开去看大字报，我想他会来找我的，想不到他就此不见。我就回家。昨夜几乎一夜未睡，又上了一个早班，累了，回去！回去！

第二天上午，裘来电话，没有要回话，只是请办公室的人转告我，要我下班后去"市革会"。

下班后我去了，想不到出了一个惊喜的结局：

裘一脸的不高兴，几乎是怒容满面，劈头问我："你昨天去哪里了？那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向他泄密？"

我明白朱祥生已经打电话同他联系过。我说："他是我厂的老干部，原是党委成员，现在纺织局革委会工作。"我又向他说明，厂里造反队一直想整我，我怕厂里对我报复，妨碍我打进内部的工作。

他听到这里，生气地站起来，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半天站住对我说："你怎么能向外人谈这里的情况，这是泄密！你真胡来。"

我声辩说："他是革命的老干部，共产党员，原是监委书记，现在又在局革委会工作。"

他听了大发雷霆："你真瞎搅，我们这里的工作能让他知道吗？"

我迷惑不解地说："不是说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么！党领导一切，我对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党员老干部谈……。"

他打断我的话，气急败坏地说："事全给你搞糟了，打乱了我们的步骤。"他盯着我看了半天，语气缓和下来："你想问题真简单。"他摇了摇头，欲言又止。是啊，他无法对我的话反驳，又不能讲我不知道的个中道理。

我低着头在想，我是简单啊！共产党也不全是一家人。

他看我低着头不说话，挥挥手说："你回去吧！今后江西路的事，你不要参与了，再也不要同任何人谈这里的一切，如果你再讲些什么，"讲到这里，他恢复常态，用嘲笑的口吻说："小心我把你抓起来。"说完他顾自上楼去了。

山穷水尽而又峰回路转，想不到困扰我的难题，无意之中，竟然这么容易和无意中就解开了。

我解放了。

起义的结局

我意外地得到解脱，逢凶化吉，保持了名节，但张元龙他们后来的结果是意料中的事：他被抓被关，其他被解雇的失业的人们陆续安排工作，风潮就此打住。

在我们这个国家，在这特定的时期，中国人逆来顺受的个性，悄悄地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在尝试民主的极为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微不足道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的组织者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失去自由。在没有法制和民主的时代，正义的力量显得太渺小，张春桥、王洪文操纵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要扼杀一个人太轻而易举了！

在这场风潮中，人们要争取的是什么？

是男人一天一元八角，女人一天一元六角的工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领头人被投入监狱。

而在权力宝座上的张、王之流出于安稳掌权的目的，“法不治众”，随手安排大批“追随者”就业。人们有饭吃了，也就满足了，淡忘了。就算有几个人忘不了狱中的领头人，但群众已经聚不起来了。所以，在狱中的领袖没有人能去营救。于是，轻而易举地就扑灭一次起义，而且使其他敢于领头掀起风潮的人望而生畏。

外国人用外国的眼光看中国的人和事，说：“中国人太懦弱了。”

是“懦弱”么？

外国人哪里了解中华民族的悲哀。

历史会记上这么一笔么？

不会！

我用我的笔，

记下这次对张春桥、王洪文之流的

悲凉起义！

第二十七章 还是阶级斗争

第一刀砍向书呆子

六八年夏天的大字报风潮过去后，我有了一段相对的安稳日子，但专案组并没有撤消，审查仍在继续，随着文革政治大气候，时松时紧地进行着，大约至一九七〇年冬才告结束，持续了三年。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吧！纺织局的军代表秦政委来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批评掌权的造反队头头捂紧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抓阶级斗争。

对头头们的批评，群众听了非常高兴，因为工人群众对头头们一直表示不满，军代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造反头头闻风而动，阶级斗争的大幅标语，眨眼之间又在全厂刷写，轰轰烈烈大抓阶级斗争的场面又出现了。

群众期待的是抓造反队队委中的阶级斗争，而掌权的头头之间是不能自相残杀的。

阶级斗争的第一刀砍向谁呢？

在图案设计室有一出名的书呆子，在造反初期，他参加了造反行列，充当了科室的造反小头目，后来又与那些头头们不合流，等到造反已成定局，他这小头头的宝座也该拱手让出，去安分地去画他的花样设计。现在他做了替罪羊，第一刀砍在他的身上，尝到了批斗大会的滋味。

我走过会场外，听到里面打倒的口号声，我若无其事地进会场观看了一会儿，轻松地想，头头们真会玩，这就叫阶级斗争？批斗这么一个书呆子？亏他们想得出！这倒霉的书呆子。

这天我是中班，吃了晚饭后，被叫到厂部大楼，在原来的党委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这时党委还没恢复）负责人之一的魏某找我谈话。他就是那个原来的党委秘书，他也起来“造反”，现在是造反派，“三结合”结合进了领导班子。

他瞪着一副近视眼，镜片后的眼乌珠几乎要弹得飞出来似的看着我。他在斟酌字句，该如何同我谈话。我站着等他开口。

这时虽已晚上七时多了，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但办公室内却灯火通明，看他们都很忙，有的在低头写着什么，有的走进走出显得格外的忙碌。这些人见了我一言不发，甚至连看也怕看，熟视无睹，一脸严肃。

我预感到这时找我来，没有好事，该是轮到我倒霉了。

搅乱批斗红工的预演

魏某终于开口了，他讲得有点费力，但语气还算平和，讲了半天，转了半天的圈子讲了一番阶级斗争的大道理，显出有点无奈的样子，说秦政委对我厂视察时，作出指示，说我这个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所以明天中午要召开全厂大会批斗我。

我不买他的帐，同他顶起来，指出这样做是在愚弄革命群众，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应该在眼前的这些造反头头中揭，你们这是在找替罪羊，是歪曲秦政委的指示，是阳奉阴违。

他听了我的话，越发显出无奈的样子，把我让进内间的办公室，要我一人好好想想，就走开了。

我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想我的处境：厂里造反队处心积虑要整我，这是我早就有预感的。仅仅是厂里造反队整我，我还不怕，怕的是专案组把材料转到厂里，专案组假手厂里来整我，如是这样，情况就严重了。

专案组对我们红工司的头头审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由专案组直接审查，另一种是由专案组幕后指挥，通过审查对象的单位进行审查，但搜集材料，汇总材料，都在专案组的统

一领导下进行。

我“接待”的外调人员，就是这种方法。

这其中搞得最凶、最突出的就是杨福海。

平时在单位里，杨福海恃才傲物，得罪了单位的造反派，在审查他时，搞得他很凶，而专案组又拿他开刀作靶子，他的苦头吃了不少。

一天，裘把我叫去，透露市里计划召开全市的电视批斗大会，把王继鑫等在押的和在外面的我们的原红工司头头揪出来批斗，效法批斗胡守钧集团那样的全市电视批斗大会，杀鸡儆猴。作为预演，借山东路仁济医院旁的教堂作会场批斗杨福海，主持批斗会的是杨福海单位的造反派，幕后由专案组指挥，裘要我上台揭发批判杨福海，并且告诉我在全市批斗会上我是扮演“反戈一击”的角色。

我陷入了极度的为难之中，我将要在全市人民前亮相，变成四十万红工的罪人。

我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我一筹莫展。

那天下午，批斗会在教堂中预演，专案组人混在后排督战。我则将要在台上手拿专案组授意的批判稿揭发杨的“罪行”。

批斗会开始还循着预定的程序进行，到了进入批斗杨福海，让他逐条认“罪”时，显露了杨的辩才，他成了一头非洲草原上的公牛。他单位的头头实在不是杨福海的对手，水平着实差劲，不时回头求助于我。我发觉机会来了，就努力扮演一个积极批判杨福海的斗士，极力把水搅浑，批斗会乱了套，最后大会的主动权完全操纵在我的手中。我在台上，看到专案组人员不等大会结束，他们就全撤走了。

结果，因为我的“积极”表现，喧宾夺主，预演失败了，计划的全市电视批斗会流产了。我的表演，对专案组来说是弄巧成拙，搞得他们哭笑不得；对我来说，适得其所，又逃过一劫。

我想事隔几十年，杨福海一定还耿耿于怀，但他一定不会知道召开全市电视批斗大会的计划，不知道那天在教堂对他的批斗只是预演，如果我不积极地“表演”，打乱它原定的程

序，那么电视批斗大会就将按计划实施，对全市四十万红工的打击有多大？

我不是先知自觉的伟人，在这场人类的浩劫中，只能是被动地表现自己，在被动中为自己、为我的众临兄们，尽可能逃过劫难。在当时，这是多么的难啊！我只能说靠着命运之神的厚爱，幸运地躲过了重重危难。

当然这里有自身做人的起码道德，为人要正派，心术要正，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

诚然，被人误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我自秉言直书这段逝去的岁月，让当事人和后人去评说。

造反队哀求我接受批斗

让我再把话扯回到魏某说要批斗我的事上。

如果，现在是专案组一时拉不下脸，而假手厂里来整我，那我的磨难将旷日持久，没完没了。

对，明天打电话给老裘，摸摸底，看他怎么说。

我主意一定，反而有了对办公室的人观察观察的兴致：他们似乎都很忙，一点也没有下班回家的念头，对我这个明天要挨批斗的“阶级敌人”连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被划在阶级敌人一边的我，只有闷闷地坐着。

两年前，我是四十万红工司的组织部长，同是在这间办公室，同是这个魏某，他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忙不迭地为我搬椅倒茶。而今天，他脸上冷若冰霜。

想想这人也太可悲，为了能挤进厂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他处处努力表现自己，讨好造反队头头。在一次外厂造反队纠集了几千人冲击我厂的武斗中，他被推到最前面，企图制止一触即发的大武斗。冷不防被对方用弹皮弓打来一块铁螺帽，弹得满脸鲜血，瞎了一只眼。这

场武斗最终被军宣队阻止，没有造成大的伤亡。由于他的勇敢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用一只眼睛的代价，被结合进厂革会。

现在他又被推到我前面，他知道，由他出面找我谈话，日后我会记恨他，所以一脸无奈相。想想这人也太可怜了。

魏某与我谈话时，我保持沉默，看他怎么说。他显得有些疲倦，反复向我暗示：这是在演戏，是演给群众看的，希望我能谅解。我不是笨人，当然理解他的话，但我还是不言不语不表态，听他讲。他只好说得更明了：怕我在批斗会上不服，在批斗会上闹翻，要我忍耐，千万不要同主持批斗会的造反队头头抢话筒顶起来。后来，他几乎是在哀求我答应下来。

批斗人的哀求被批斗的人，真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这说明我还不是一只死老虎。

时间很晚了，他为了完成造反队头头们给他的任务，一再求我答应下来。到了这境地我也就软了下来，不就是演戏吗？

我开口问他：“明天是谁主持会？”他说，这你就不用去管他是谁了。我直截了当提条件：“如果明天主持会议的头头太过火，让我难堪，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惹火了我，别怪我脾气大，到时候你今天的这些话全白说。”

听了我的话，他高兴得眼乌珠又要飞出来，连连点头说：“如果太离谱，我会打园场，为你解围的，你放心好了。”

我说：“只要让我过得去，我也不会太那个的，能配合我就配合。”

他连连用一口无锡话说：“不会难为你的，不会难为你的！”他显得兴奋起来，起身到另一间办公室去。

我起身也想走，却被外间那些在埋头写着什么的造反队员拦住，要我再等一会。我只得无聊地坐下。

时间过了十点，中班早已下班，我急着想回家，我不想由于我的迟回家，而让妻子觉察我的处境。我不管造反队员的阻拦，敲开了隔壁办公室的门，满屋的造反队头头在开会。我对魏某说，我要走了，他说，你再等一会。我只得再等，直到十一点多了，还不见他人，我

一时火了，要人把他喊出来，我指指墙上的电钟："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怎么？你们想把我关起来？不放我回家么？"他有点尴尬，吱吱唔唔，看来真是不想放我回家，我立时发火："好啊！不放我回家，明天这个会看你们怎么开吧！"我无所顾忌地撒起野来："我是市一级的头头，由市革会专案组审查，你们的级别太低，不够格，你们算老几？你们是在打击报复，我横竖横了，看你们把我怎么样？"

他慌了神，连忙对我说："不是不放你回去，我们会还没有开完。"我不依不饶，立时要走，他迟疑了一会，只得说："把你留下来，还是考虑明天的批判会要准时开。"

我一听，言下之意是怕我明天不到会，好！这正暴露了你们的底。我确证：对我的批斗，完全是厂里在搞我，没有市里专案组的背景，这么说来，明天的批斗无伤于我，对我没有危险，的确是演戏！

我爽快地对他说："明天我保证按时到会场，这你可以放心，我是经过大风大浪锻炼过的，还怕这样一个会么？"

魏听了我的话，面露难色，朝隔壁办公室看了一眼。我放低声音对他摊牌说："我急着回家，只是不想让我妻子知道，如果你们一定要留我在厂里过夜，那么你们看着办吧，我也横竖横了。"这前半句的话，大概打动了他的同情心，后半句的威胁之话，他也领会了。我又补了一句："我是说到做到的，说保证来就保证来，说闹翻就闹翻，不要逼我上梁山。"

他听到此就说："你再等一等，我们研究一下。他去向其他头头去讨旨意了。

不一会，他来说："你回去吧！明天十二点钟在俱乐部门口开大会，你要提早十分钟到场。千万不要在会上顶起来，我会打园场的，不会难为你的。"

妻的担忧

急匆匆洗了澡，心急火燎地赶回家，抬头一望，窗户透出灯光，她还没有睡？糟了，该用什么话来搪塞呢？我开了门，轻手轻脚放好自行车，上楼时，希望她睡着了而没有关灯，想不到她并没有睡。我冲她一笑，若无其事地说："这么晚了还不睡，快睡吧！明天要上班呢。"

她盯着我看，往常的笑脸不见了，我当她是我晚回来而不高兴，我笑着说："下班后，几个人吃了点心，吹了一通牛，所以回来晚了。"

不料她却忧愁地说："你不要骗我了，出了什么事？"

我继续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什么事啊？快睡觉。"

她说："你不要瞒我了，刚才铁牛来过了，厂里倒底要怎样搞你啊？"

完！她全知道了，唉！这个铁牛真多事，何必来通风报信，真不该来。

妻告诉我，在我该回来时，却不见我回家，就倚在床头眼巴巴地等着，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不料窗外传来压低声音的叫门声，把妻惊醒了，开窗一看，是铁牛。丈夫没有回来而他的同事铁牛却半夜来敲门，妻慌得什么似的冲下楼。

铁牛一脸的紧张，不用问，蹦着的脸，就说明出了事。铁牛失去了他往日的潇洒，惊恐地说我被造反队关起来了，今天不会回来了，说了这一句又眼睛一转，叮咛道："我走了，不要对人说我来过。"好心的铁牛匆匆走了。

我百般安慰她，让她放心，我会安然渡过这一关的。总算让她睡着了，我自己却一时睡不着，我把魏的谈话又理了一遍，确信我的判断没有错，但是明天还是打个电话给老裘，摸摸底。

摸 底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打电话给裘，告诉他，厂里要搞我了。他听了我的话，稍稍停顿了一会，平静地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嘛！要经得起审查嘛！"

我仔细辨别他的语气，他的语气是轻松的，轻松中透出他的职业特点，他不会直接流露出他的真实意图："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你厂里造反队对你审查批判也是对的嘛！你要正确对待，端正态度，接受对你所犯错误的批判。"

听到这里，我可以放心了，我向他提出了要求，希望他来干预这场对我的批判。我说："我的问题你已经全部掌握了，我没有必要向厂里交待我们红工司的造反过程。"他说："你要经得起考验嘛。"

我的心全放下来了，情况很清楚，今天的批斗会，纯是厂里在拿我开刀，我更明白地提出了我的要求："老裘，我厂里搞得我太过分的话，我可要请你来说话呀！了解我为人的是你，最清楚我这段造反经历的也只有你，你可要为我说话呀！"

他简直像朋友似的说："你要端正态度，不能同造反队顶牛。"他又哈哈笑起来："怎么？你还想要你的造反派脾气？要经得起考验嘛。"

我连说知道了，把电话搁上，我还担心什么呢？没事！

话虽这么说，心中总是有点不踏实，挨批挨斗的滋味还没有尝过，等待我的将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呢？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早早烧了中饭，吃了饭，心情完全松驰下来，急急向厂里赶去，赶去"演戏"。

进了厂门，打倒我的大幅标语赫然在目：把我的名字颠倒写上，还用红墨水打上"×"。标语的内容看得人心惊肉跳：

"打倒帝、修、反的别动队沈××！"

"把里通外国的沈××揪出来示众！"

这两条标语够火爆的，让人吓上一跳：在我们厂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罪恶的阶级敌人！这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么？

我对这两顶大得吓人的帽子微微一笑，不存在的罪状，对我构不成危险。

我明白，标语的内容指的是这么一件事：

日本间谍？

不久前，我在工农兵医院（百年老医院仁济医院，文革中改了名）住院手术。那时这医院的工宣队由我厂进驻，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原是我厂里的党员干部。有个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找我外调，竟然找到医院里，被那支部书记挡了架。我出院的第二天，那外调人员又迫不及待追到我的家中。什么事竟然这样急？外调的人露出了笑脸，表示歉意，要我配合。

我对这人这样外调很反感："我刚出院，你就赶来了，真是'只争朝夕'啊！"

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在笑脸后面很刁滑地吐出威胁的话："我通过你们厂里才来到你家的，如果你认为今天我来不合适，手续不完备，我可以现在就去你们地区居委会。我现在直接来你家不去居委会是考虑你的影响。"

罢！罢！不能让他去里委而影响家人的生活，不能让母亲也跟着我担惊受怕。我只得说："你不要兜圈子，要了解什么人什么事就直说，我知道的就谈。"我还当是我那以往造反的一档子人和事。

他挤出一丝笑意来："你身体还没有恢复就来找你，很对不起。这件事很重要，需要你提供情况，你当时在场的，你把这事好好回忆。我们也知道你没有参加进去，你不要有顾虑，要照实说。"

我听得不耐烦了："你是什么单位的？你要了解什么？请你不要浪费时间。"

那人只得说："我是中国毛纺厂的，要了解胡金华的情况。"一面把一张外调介绍信亮在我的面前。

我不由感到奇怪：外调我过去的邻居？我说："他原来住在我家隔壁，前二年搬走了，他是在你们厂做临时工的呀！"

"是的，想请你谈谈他的情况。"

我有点不快："我曾在二年前杨浦公安分局对面的墙上看到过几幅大标语，是你们工总司造反队把他抓进公安局写的标语，从这标语我才知道他是你们厂的红工造反头头，可他从没有与我联系过，我们之间谁也不知道谁，你要我谈什么？"

那人好脾气，不像一般外调人员搭足了架子来审人，笑笑说："不是你们红工造反队的事。胡金华有一个日本朋友，这日本人在上海生活，通过清队查出是日本特务，请你谈谈这方面的情况。"（看来这些人对特务和间谍的概念是分不清的。）

我说："他是归国华侨，出生在日本，抗战爆发时全家回国，在这里开洗衣店度日，五八年去了宁夏，三年自然灾害时回上海，当了几年临时户口，报进户口后就进你们厂工作。至于他的日本朋友我怎么知道呢？"

那人说："这事我们了解，与你不搭界，你不要有顾虑。我们掌握的材料是你与那日本人一起吃了三次饭，你要把这一切原原本本谈出来。"

我这时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吃饭的事是有的，但只有一次。那日本人是间谍？"我有点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这几年，让我们看到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实在太多了，真不明白，搞了那么多运动，为什么这些人以前没有查清，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全查出来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搞不知道，清理阶级队伍一搞，盖子一揭，日本特务的原形就暴露出来了。"

我说："那日本人是在上海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的呀。"

那人说："是在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实际上他是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

将信将疑的我，只有怔怔地朝他看的份了。

他见我不开口，就说："那你就把你刚才说的一次吃饭的情况说一说。"

现在想想也真好笑，人情往来的一次请客吃饭竟然有特务间谍的活动？那我不也成嫌疑人了？

还是我做临时公民时，一个暮春的季节，胡金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有事要同我商量，要请我帮忙，他说，他有一位日本朋友，在日本时，是隔河相望的邻居。后来这日本朋友也到中国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回国，一直留在上海，在一家皮革厂当工程师，讨了一位上海老婆。胡金华说，他经常去这日本朋友家，常在他家吃饭，很不好意思，想回请这日本友人吃一次饭，但苦于家中是一间灶坡间，实在太小，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也没有，想借

我家的地方请这日本人吃一次饭。我听了无可无不可，但回家同母亲一说，不料母亲坚决不同意，母命难违，我只得回绝了他。

过几天，胡却来邀我去吃饭，说他借了小宁波的家请客。我自感汗颜，再三推辞，他又动员小宁波来请我，小宁波说："胡金华是请日本人吃饭，借我的地方，我不吃不行，我一个多尴尬，你来，我们两个人就有伴了。"生生把我拉到他家。

那日本人已经同他的中国老婆先到了，我们客气了一番入座。

我看那日本人，瘦小的身材，显得有点苍老，看上去有五十岁的样子，刻板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似乎满腹心事；他的老婆就显得年轻多了，只有三十多岁，匀称的身材，姣好的面容，雪白的肌肤，彬彬有礼地同我们客套几句。看起来这女人一点也不懂日语，他们夫妻之间交谈就用上海话。胡同那日本人谈得非常入神，尽管那日本人会讲一口道地的上海话，但他们俩人却讲日本话。

面对丰盛的菜肴，小宁波轻轻地在我耳旁说："让他们去讲东洋话，我们管我们两人吃。"他指了指满桌的菜，挟了一筷菜，连说吃！吃！

而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胡金华，混身的不自在，那有心思吃喝，我就这样拘谨地呆坐着，挨了半个小时，乘机告退，逃也似的走了。

我把那次经过简要地说了，外调的人发问："他们两人在谈什么。"我说："他们说的是日语，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说啥。"他又问："那么另外两次情况又怎样？"我说："就这么一次，那来另外两次？"那人说："我们掌握的材料有三次。"我说："我只知道这么一次。"那人说："在你刚才说的那次，后来又请过两次。"我反感地说："你们既然掌握材料，应该清楚我就这一次，为什么还要这样问我？"

经我只么一顶，他避开这一次、三次的问题，又提示说："你看到他们送什么东西吗？"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心中想，你们这些人顶好我说："有呀！有一台收发报机呢！"

他见我谈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来，只得要我在笔录上签字。

以后那人又到厂里找过我，反复提示，逼我按他们的意图谈，最后一次我火了，对那人说："你来十次也没用，事实就这样，特务、间谍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那人还真好耐心，

不动怒，一直笑咪咪的。

现在看来，这个外调人员是个笑里藏刀的笑面虎，在背后对我下手，他把这莫须有的罪名，交给了我厂里的造反队。

我厂里的头头拿着这罪名向我开刀了。这大幅标语不过是造了个声势，假的就是假的，看他们还有哪些伎俩。

奇怪的批斗形式

还有一条标语“打倒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沈××!”

这是因为对我的憎恨，实际上道出了我把他们这些头头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还不解恨，在厂区的柏油路上，用石灰水刷上比方桌还大的字，都是打倒我的标语。可见这些头头恨死了我，把我的名字让人践踏，让卡车来碾压。

再看会场，布置在俱乐部会场外，这样容纳开会的人要多得多。主席台放在俱乐部的大门口，上方挂了一条横幅：“狠抓阶级斗争 批判沈××大会”。在我的姓名前没有风行的帽子，例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者叛徒特务×××。这些通常用来定性大帽子一概没有，看来没有市专案组的背景，他们定不了性，尽管会场外的大幅标语在虚张声势。

奇特的是，别的批斗会总是被斗对象面对群众，站立在会场主持者前，弯腰屈背面对革命群众。今天批斗我的会场布置却一反常态，我立在会场“观众席”的后半部，同参加开会的革命群众一样面向主持者，不同的是群众坐着，而我是站着，我的面前也有一只麦克风，供我回答或者说供我交待问题用。

通过半个会场，面对我坐着的会议主持者，是那一个头头呢？

那是印花车间的一位头头，他以前经常来我们红工造反队办公室串门，应该说我们原是熟的，想不到今天是他来主持批判我，以厂专案组组长的身份来主持批斗我的会了。

他比我还年轻五岁，是厂里最早的一批“老造反”之一，他组织的厂里最早的造反组织名为“心向党”，其人的造反动机和行动，真如其名“心向党”似的狂热和激进，同时也伴随着年轻人的单纯和简单，他的造反生涯一直被人利用，或者说被这个疯狂的文革浩劫所利用，他成了典型的青年激进分子。后来又是被历史证明是文革的牺牲者和受害者：他被推上了厂专案组的组长这个令人生畏的地位。得罪人的坏事，差不多全摊上了他，在工人们的心目中声名狼籍。

批斗会按时开了，例行的学习“最高指示”——是会议的主持人选读几条结合会议内容的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要全体与会人朗读。我用心一听，所选用的是一些常用的一般语录，没有与大幅标语的杀气腾腾相配合。

在文革中，需要欲致人于死地，那就在阶级斗争的语录中去选；如果不想致人于死地，那用和诸如“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一类，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下，“挽救”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

我见过世面，懂得个中“活学活用”的妙处，我可以从读语录中揣度对我批斗的严酷程度的深浅。

语录在一条条读下去，我的心情越来越松驰。

主持人开始讲他的开场白。乘这间隙的功夫，我向四周扫了几眼，我所熟悉的工友和关系很好的朋友全到了，铁牛也站在后面，神情专注地在听，朋友们都在专注地听发言，他们在关心我的命运和处境。

我从心底里谢谢他们，我在心中向他们默默地说：不要为我担心，会走过场的。

中国人太善良，太老实本分了。在封建社会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亡”的戒条下，人民太驯顺了。在文明社会的现代，我们民族还是那样温顺得可以。在大谈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民更是噤若寒蝉。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批斗会上，哪一个不是驯化了的牲口？

我也不能例外。虽然我有超乎寻常的判断，有不平常的经历，但我必须小心谨慎，在挨批斗时不能出错。正因为我没有错——没有反革命的罪状，他们一时奈何我不得，所以我开口说话不得有错，不能有“辫子”被抓住，否则立时就打成现行反革命。话虽如此说，但心中总有一份不安，历年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像一柄利剑高悬在头顶，有权的统治者，可以想出各种手段来折磨人，这在文革中是屡见不鲜的。

今天的重头戏，是围绕在几年前，我同那不知姓名的日本人吃了一顿饭所惹下的里通外国的罪状。主持人用耸人听闻的语句，向群众宣布我的里通外国，同日本特务联系。当然，这能让人大吃一惊，一时获得很好的“戏剧效果”。我的要好的工友，脸上似也露出吃惊的脸色，为我捏一把汗。

此时批斗会领呼口号的马上声嘶力竭地领呼打倒我的口号。一般情况，被斗的人也必须跟着一起呼打倒自己的口号，就像喝御赐毒酒前的领旨谢恩。但我不甘心让人看到我的窝囊样，我没有举手呼打倒我自己的口号。我抬起头向四周扫视一圈，发现我的好友们也没有举起手来呼口号打倒我，包括我车间的大部份熟识的工友。坐在会场前半部的布机间女工在举手呼口号的时候，“万岁”拳头多，“打倒”拳头少。

批斗会的主持者认为已经达到气氛，进一步揭发说我是帝、修、反的别动队，一贯收听敌台。我知道，这是我几年前装矿石机闯下的祸。

那个“陈同志”果然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猜想，随意在我的档案中记上收听“敌台”的记录。档案，档案，害了多少人的档案！写的人毫不负责地写；现在说的人又任意想象和发挥，说我是在呼应蒋匪帮反攻大陆，是帝、修、反的别动队。

待造反队头头把我的罪状揭露了，该要我坦白交待了。

我站在麦克风前，平静地用简洁的语言叙说了怎么会同日本人吃饭的经过。那头头不时蛮横地打断我的发言，说我是在狡辩，提出一些不合情理，强调夺理的提问，我也就不客气地抢着在话筒前同他辩论起来。我不想表现出过分的对立，但也不示出我的软弱，不温不火地同他周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是欲加之罪，我说的是客观事实。在不可开交时，那姓魏的就出来打园场，但他是在解他们头头的围，倒是我让主持人下不了台。

说我要“上山打游击”

造反队头头们，当时为了应付军代表秦政委来厂视察时批评头头们不抓阶级斗争，就把我和那书呆子揪出来批斗，让上头看到，他们在抓阶级斗争，所以用他们的话说，“要把火药味搞得越浓越好”。

在这种气候下，那个丁胜成，认为卖友求荣的时机来了，他向造反队头头们秘密“揭发”出一条我这个组织部长“要组织人员抢南京路上的商店，上山打游击，对抗中央”的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这么不负责任的胡乱编造的慌言，头头们竟然信了。丁胜成却从此爬进了他们的圈子，干尽了坏事。

他们逼我担白交待“上山打游击”的罪行，我判断这一定是厂内有人在陷害我，但为了不吃眼前亏，我就写我的造反故事，逼着要一次，我就写上一点应付他们。二次、三次、四次地写，我发觉他们对我的造反经历并不熟悉，发觉他们并没有对我有系统的内查外调，他们隔三差五的找我要交待，只是漫无边际地要我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明确目标。我彻底明白了，我厂里的造反队还靠不上市专案组的边，老裘没有借此整我。没有市专案组的指令，我厂造反队要审查我的造反经历是不可能的。从此我更“老油条”了，一天天地拖，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写上一篇没有“主角”的造反故事给他们。不久就没有人再要我写了。

自那次批斗会后，我参加政治学习的权利被剥夺了，我同厂里的地、富、反、坏、右、资等人一样，被摒除出“革命群众”之外。我反倒高兴，这样可以不必每天提早二小时到厂参加学习和会议了。那时开会学习成了每个人的负担，但谁也不敢反对，我却获得了暂时的解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轻松。

是啊！每天少开两小时会，等于少浪费两小时生命。

造反队又把我送进“火线学习班”去受“火”的煎熬，同厂里所有的“清队”对象集中在一起，每天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所谓“请罪”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学习班”的全体“牛鬼蛇神”排成两列横队，在毛主席像前弯腰作沉默状，做出绝对虔诚的样子，腰要弯得尽可能的成九十度，脸上作出诚惶诚恐的痛悔模样。你在低头弯腰时，头脑中尽可以想你的事：月底快到了，计划的票证，油票啊，糖票啊，不知老婆是不是已经都买了？啊呀！下季度的小菜卡、肉票、鱼票不知去领过没有？这点自由还是有的，因为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的头头，无法看到你头脑中在想什么。

这档请罪的例行功课做完后，就分成小组学习，什么“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清队经验”啊，什么“给出路”的政策啊，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啊等等。

在我这小组，读材料和报纸的差事往往是我。为了熬过这漫漫的“长夜”，我尽可能的读得慢点再慢点，拖延时间。在这里时间不是金钱，也不是生命。

最干涩的是每个人谈“心得体会”和作触及灵魂的“反省”，这时时间过得特别的慢，人们的心灵的确像在“火线”受着煎熬。

在“火线学习班”中，我是唯一的年青人——最年青的“阶级敌人”。我没有“历史问题”，解放前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娃娃。大概我的造反经历，可算我的“历史问题”了。

古董专家

我自恃年青无历史问题，还有一股不肯屈服的傲气，不愿窝窝囊囊地为自己头上套枷锁，我就这么每天在熬时间罢了。每当老头们在无话可说时，我就打破沉闷，开起“无轨电车”，讲点文革中刚逝去的趣闻轶事，（当然是在没有头头在场的时候）。在我的影响下，老头中有人也就扯上些他们年青时的趣闻。我最感兴趣的是一位古董收藏家的发财趣闻了。引得我在以后的几年中，对厂里俱乐部陈列的两本杂志“文物”和“考古”每期必翻，每篇必读。

那位收藏家是资本家，他以一口软糯的苏白，以平直的说梦话似的语气，谈他“发家史”，讲他的“剥削史”。我很愿意听，不时打断他的话头，寻根究底提出一些问题。他也很乐意回答我。

快要到结束时，他就把话打住，说一些时兴的套话，并做出非常沉痛的样子，说：“我剥削有罪，向造反派请罪，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就这样打发时间。

实际上这位一口苏白的资本家，根本称不上资本家。他的家在苏州城里，他住厂集体宿舍，每星期乘火车回苏州。他在苏州出生长大，在苏州的布店里“学生意”——当学徒，满师后，在苏州做了不长时间的布店伙计，后失业在家种茉莉花度日。后来到上海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布店，他不擅经营，而且生不逢时，解放了，做老板的日子不好过，这家布店一蹶不振，最后关门，他自己就做“跑街”当“掮客”，在上海的棉布业中混日子，连老婆孩子也不能养。幸好他有一收藏古董的爱好，使他能使家人温饱。在广东路的古玩市场上，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多年的爱好，使他成了上海滩上小有名气的古董鉴别家。他不时以低价收进一件二件有价值的古玩，逢到有愿出高价的买家，就卖出一、二件自己的藏品。多年下来，聚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特别钟爱收藏鼻烟壶，成了上海最大的鼻烟壶收藏大家。加上其它的藏品，他成了沪上收藏古董的名家，有时广东路古玩市场的专业人员也请他去鉴别疑难的古玩，成

了一个一语定乾坤的文物专家。

后来，他进了我们绒布厂当了一名工人，微薄的工资，不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一年中他总要拿出一、二件藏品卖到广东路古玩市场的收购处，以补不足。（这时民间私下不得交易，有古玩出让，必须由国家收购。）

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然成了抄家的对象，被抄古玩数量据说占上海第二、三名。有时他悄悄地对我说他如何在偶然的情况下，以极低的价钱，收进了一件稀世珍宝，其价值翻几十倍上百倍。这时他又不无感慨地说，到了六十年代，国家的收购价实在太低，他在近几年中，卖给广东路国家收购处的几件文物，实在是出于无奈，要不是生活所逼，为儿子学业，他是绝不会去变卖的。

我对他的惋惜不以为然，我说，"你被抄家，抄走了一百把历代名人书画的扇子，无数的鼻烟壶，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碗'，大量的名人名画……，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再好再古的精品全不剩了，还不如那时都卖掉才好呢！"

他听了默然良久，无言以对。

他的名字叫陈乃康。

工 贼

在我这一小组里，还有一位是真正有历史问题的工贼，他在解放前沪东的一家棉纺织印染厂当工人，参加了国民党的"护工队"（护工队的任务是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解放前，我们厂——光中染织厂——在地下党领导下多次举行罢工斗争，就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他所在的护工队被派来破坏我厂的罢工，制造两派工人的斗殴，大打出手，国民党当局乘机抓住机会，镇压工人运动，罢工就此失败。

他在学习班交待说，我厂的老工人中，有人参加过那次破坏活动，出卖了工人利益。造反队头头问他，这些工贼，你还认得出吗？他马上讨好地露出媚笑，像鸡啄米似地点头说："认识，认识！"头头马上下命令道："你把这些情况回去写下来，明天交到造反队来。"他露出受宠若惊的媚态："我回去就写，我回去就写……。"

我熬不住说："过了二十多年了，你还真能认出来？"

他冲我笑笑，得意地点点头："这些人都在我肚里，我一进上绒厂工作，就认出这些人了。"

我不无揶揄地说："你的眼力还真行啊！"

他有点得意忘形了："那时光中厂分两帮，织造部是无锡帮，印染部是泰兴帮，那次罢工，打得可凶了。"

我追问："那你这外厂的护工队也参加打了？"

他发觉我提的问题有点不友好，就含混地说："那时年纪轻，年纪轻。"闭口不说打还是没打。

时间差不多了，快到下班的时间，头头说："今天的学习很好，触及灵魂，有成果。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那头头大概觉得今天有成绩，高兴得忘了要我们做一天第二次的请罪仪式。

头头走了，我觉得有点高兴，因为可以少受一次低头弯腰的罪。

老头们似乎并不高兴，他们仍低着头，沉默着。我明白，明天不知又是谁要轮上被这工贼胡乱指认的灾难。如果他指认的人确有此罪行，那也罪有应得，如果是莫须有，或者纯是为了自己邀功而瞎指一气，甚至是为了泄愤，那不是让无辜者遭难了吗？参加过那次破坏罢工的活动的人，真能避过同厂工人的检举，混过镇压反革命、四清等等的历次政治运动么？这是不可能的！

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八十年代初，这个工贼却在子女亲友前，在邻居前，在我面前，多次大言不惭地诉说他在文革中被审查遭难的经历，以一副时代的英雄，耶稣受难的形象，夸说他的"英雄"历史，俨然成了受到"四人帮"迫害的英雄人物。他的记忆力这时显得出奇的差劲，他忘了我的存在，忘了我还是有记忆的人。

第二十八章 文革冤魂

小高邮

在全国上下清理阶级队伍的萧杀声中，一封不负责任的检举信，可以把一个人整得死去活来，遭到莫明的厄运。

我们车间有一位工人，大家平时都喊他“小高邮”。由于他的家乡高邮寄来一封揭发他是漏网富农的信，造反队不作调查，就把他送入“学习班”，逼他承认自己是富农。他明白这是有人在泄私愤而故意陷害他，他当然要申辩，摆事实。

那么，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富农分子”，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叫他俯首认罪。车间里几个年青人从那些“专业”打手那里学会了打人技巧，一时手痒，也跑去参与这野蛮的“游戏”。可怜那小高邮被打得遍体鳞伤，打歪了颈椎，疼痛难忍。

他被迫挂着“逃亡富农×××”的牌子，在各车间中游斗，被逼一手拿着畚箕，一手拿着木棒敲畚箕，扯着嘶哑的喉咙喊：“我是富农×××，我有罪……。”

瞧着他伛偻着身躯，歪着头，头歪着又被强逼着低头，那不协调的怪模样，看着难受。看的人自己也不自在起来。再看他痛苦扭歪的脸庞，让人不忍卒睹，一些女工背转身子，再也不敢看上一眼。

从此这人落下一身病，不久就死了。

他的名字叫赵春洪。

一个书生

印花车间有个汉子，身材有些瘦弱，一介书生的模样，在没有开车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机器旁，低着头满脸的忧愁，双眼凝视着地面，仿佛要从这斑驳杂乱的水泥地上看出世道为什么这么乱，他几乎每天在看，终不能看出这杂乱的裂纹有什么名堂。要开车了，做准备工作时他拼命地干。车开了，他努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去，似乎要把排不掉的忧愁忘却。

但是，厂里是铺天盖地批斗他的大字报，就在他工作的车旁也被造反队刷上有关他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把他的名字用红墨水打上×，让他从头到脚笼罩在血淋淋的恐怖中。

他是河南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我们厂的织造车间当一名管技术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赶到印花车间做工人，用汗水洗刷历史上先辈的罪孽。他的“罪行”就是他不该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地主出身的大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想不通的是他早年就叛逆了他的家庭，投奔了革命，是党在建国后把他送入大学深造。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脚踏实地跟着党走。但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间成了被批被整的对象，随着“清队”的步步深入，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大字报、大标题只是一种兆头，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灾难：没完没了的“政策攻心”，没日没夜的拷打，他的精神和肉体垮了。

他在山东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他生死相依的妻子，有他视作生命的子女。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是那么的短促，又是那么珍贵。他要活下去，活着总是美好的。他忍受了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总算挺了过来。在每次被打翻在地时，他支撑着剧烈疼痛的身躯，在一张张打手们狞笑的脸前，在青年人无知的哄笑声中，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四周，他感到孤独无援，莫明的绝望涌上心头，难道党的政策变了吗？对地主、富农要斩尽杀绝吗？家庭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再说自己并非是地主家庭出身啊！

在他还未成年时家道就已中落，他已投身革命，土改时不是已经有了结论了吗？现在还逼迫承认是地主出身，那今后就要过“四类分子”的生活，这将是永远不得超生的生活。他自己也就算了，可是不能害了三个孩子，害了妻子。他的眼前浮现探亲回家时，一家人团团而聚的景象，他们睁着双眼在看着自己，用期待而痛楚的眼睛在看着自己。他精神为之一振，要挺住，要活下去，熬过这一阵运动的高潮，或许生路就会再现，他要为孩子们着想，要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就这样，他一次一次熬过刑讯和逼供，一次次写交待为自己辨白。

就在这当口，他的妻子却意外地跑来上海，告诉他，原籍的造反派也在行动，他们的暴行比上海还要可怕万分，她受不了当地“专政”的“铁拳”，她是逃到上海来的。

这五雷轰顶的消息，一下把他打跨了，他的精神支柱彻底蹦溃了，绝望了。古人云：“好

死不如赖活。”他在好死与赖活之间徘徊选择。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这令人心惊肉跳的语句在他的眼前时刻跳动，这无尽无头的残酷现实，天地之间已容不得他们夫妻了，他们无法逃过厄运了。他们在抱头痛哭一夜后，在五角场附近农村的一棵树上，双双上吊自杀，就这样离开了这“史无前例”的人间，去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寻找他们的避风港。

他的名字叫许甡?

厂专案组组长的回忆

事隔二十多年后，我同参与许甡事件的某造反队头头进行了访谈，下面是该头头的回忆：

在党组织恢复后，“三结合”的厂革委会中的革命干部获取了权力，我这个厂“专案组”组长的权力已经架空。然而在群众看来，还是造反派在掌权，出头的还是我。

在深挖“阶级敌人”时，是党员干部去翻查档案，把“深挖”的对象定在许甡的头上，认定许甡是漏网的地主，对许甡的审查就开始了。

一天，许甡说头昏，我一想不对头，马上把医务室的医生叫来，一量血压很高。我对另一头头说，不能再打了，不要打出人命来。这时在楼上办公室“遥控”的党员干部得知情况把我喊去，问怎么回事？我把医生检查的情况谈了。我们几个都感到不能再搞下去了，否则要出人命的。想不到两星期后，宝山五角场地区通知我们，说许甡夫妇双双自杀了。那天我到现场去看了，夫妇俩原先是想投河的，但河水太浅了，只及腰部，他们两人就在河边的树上捆上绳索，半在河边、半在水中吊死的。

那党员干部说，许甡畏罪自杀，对抗运动，死有余辜。

四人帮跨台，文革结束，厂里进来了工作队，说我逼死了两条人命，要我写交待材料。我对工作队说，翻查档案材料不是我，把许甡定为“深挖”对象不是我。自杀是发生在两星期后，这两星期中，是地区里弄造反派对他进行审查逼使他自杀的，这责任怎么能由我一人来负呢？

后来厂里工作队把我的材料送杨浦公安分局，意图很明确，要把我先抓起来再说。分局的人找我，我把前后经过说了，分局表态：依据不足。没有把我抓起来。后来厂里贴出布告，说上级公司党委决定，把我“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二年”。直到满了五年，才撤消了这开除决定。

许甡夫妇死了，他的子女获得了一纸平反书。这个头头受到一纸不伦不类的行政处罚，而其他一直隐在幕后的责任人呢？

他们仍在台上风光，而且比以前更为风光。

在文革中惨死的冤魂，倒底该向谁去索取天理公道。

惨死的资本家

在那年腥风血雨的夏天，被造反队直接打死，死得最惨的是一位资本家。

从布机上织成的灯芯绒坯布，先进入割绒车间，状如灯芯的绒条是用刀片割出来的。在五十年代用手工割，把一匹布两头绷紧，一个女工手持特制的刀片，沿着布匹的经线把绒条逐条割开成形。一天要来来回回走上几十里路，劳动是原始的、劳累的。

小老板们只要有一定长度的场地，无须什么设备，只要招上几名女工，就可承接坯布的加工业务。在五十年代中期，这些分散的小工场合并起来，组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割绒厂，最后并入我们厂。

这些小老板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性非常高，凭着国外的割绒机器的照片，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设计和制造出我们国产的割绒机，经过不断摸索和改进，这些机器的车速、质量、单位产量均超出国际水平。我厂后来又从西德进口了一台机器，洋机器面对国产机，只能望“土”兴叹，于是这台洋机器被扔进了废铁堆。

在这群小老板中，有一人身材高大魁梧，皮肤白晰，微胖的脸上，流淌着汗水。他身穿一件园领的汗衫，尽管汗衫已旧，背上还有一、二个小洞，还是洗得很干净。他每天拉着“老虎车”把满车满车的布送来。

这老虎车现今的年轻人是看不到了，它比手推的“劳动车”（北方称板车）窄和低，它是铁制的，连轮子也是铁的，唯有手捏的把手是木制的。它盛行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小老板每天用这原始落后的工具，把我们车间要的坯布从割线车间或仓库送来，繁重的力气活使他汗流浃背。

文革开始后，他从供销科的位置上被强制到下面干重体力活。他言语不多，埋头干活，也很小心，除了有关工作的话，其它的话我没有听他说过。有时计划同生产实际有矛盾，其他几个工友就要发点牢骚，提提意见，而他从不附和，只顾在旁浑汗，等待生产组长重新安排。他是不敢有怨言的。但听人说，他年青时，脾气很倔。

有一个造反小头目向造反队头头们献计，说我厂没有一个能容纳全厂二、三千人召开大会的会场，何不对全厂的几十个资本家再进行一次抄家，把抄来的钱造一个会场呢？愚蠢的头头们一听有理，马上行动。

第一个抄家目标就指向了他，气势汹汹的造反队抄不到钱财，硬说他把钱财转移了，逼他交出来。他实在没有钱财可交，但为了年迈多病的老母少受惊吓，被逼无奈想出一个下下策，把一张只有二元钱的存折涂改成二仟元来蒙混过关。

造反队头头拿到这存折，兴奋异常，那献计的小头目得意地说：“我说是吧！第一个就有这么多钱，全厂大小资本家都抄上一抄，造会场的钱就足够了。”

拿这存折去银行，露底了。这下惹恼了头头们，把他抓到造反队，进行拷打。

那天我上夜班，半夜十二点半是夜班工人吃半夜饭的时间，那个与蔡姓头头沆瀣一气的刘姓党员，带着一脸的奸笑，从车间外进来，把替他顶岗工作的小周喊走。小周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跟着他走，到了造反队办公室，他才知道是要他去摔“大背包”，摔那资本家，小周对资本家看了一眼转身欲走，那刘姓党员拦住他，要他动手。

这时我们一批去食堂吃半夜饭的人走过大楼，从窗外看到了这打人的一幕。因为我同小周交情还不错，我就立在窗外看他如何。

小周为人正直，一看是叫他做打手，掉头就走。这时在旁打累了的几名打手和头头也一起把他拦住，哄叫着要小周露一手。小周没法走了。

那资本家经过白天和这半夜的拷打，早已疲惫不堪，见又进来一位彪形大汉要动手摔“大背包”，他深知“大背包”的酷烈，简直怕极了，他马上跪下来，对小周哀求：“我有高血压，你放了我罢。”小周一听，犹豫起来。这时那刘姓党员，对着资本家喊：“你装啥死，起来！”那资本家只得站起来。姓刘的又逼小周道：“他装死，没有高血压的，他这身坯比你还结棍，摔几只背包笃定！”那小周迟疑着没动，那姓刘的又凑在小周耳朵边说了几句，小周终于跨上一步，把那资本家双臂一搭，只听资本家说：“求求你，我有高血压。”话还没说完，人已被摔起来，小周乘势一弯腰，那资本家的身躯随着小周的手臂一起落向地面。等那资本家爬起来，还没有立稳，第二个相同的动作，又利索地把资本家摔下，资本家一点声息也没有，很快被连摔四、五个“大背包”。小周放下资本家，掉头就走。当他从里面出来，我迎着他，一把拉他向食堂走去。

我一时不知用什么话来同他说，我们默默地走了几步，他转身双眼定定地看着我，脸色铁青、呆板，半响才说：“是刘师傅叫我去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一听他有高血压，我就慌了，就想走，但刘师傅不让我走，我只得摔几只背包就走。不过每次摔他，总是很快弯腰用手托住他，不使他直接落地，不然的话……。”他摇了摇头，又是定定地看着我。我对他说：“等会那坏种再来喊你，你千万不要去，人命关天，出了事当心一泡烂污全撒在你身上。”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去的。”

我们很快买了饭菜，在吃饭时，同桌有人问他话，他一直铁板着脸一声不啃，很快把饭扒光，掉头就走，连自己吃的碗和盆子也忘了拿。待我吃完，我把我们两人的碗筷一起投入食堂门口的一只大水池里。（那时食堂的碗筷都是公用的，吃完后各自把碗筷投入门口的水池，由食堂工作人员洗净和消毒后再用，所以水池里漂浮着油污，十分肮脏。）

我从另外一条路回车间，但是不时有人传来消息说，残酷的游戏还在继续。到了快天亮的时候，车间里再也没有人出去看了。大家在昏昏沉沉的时光里，在隆隆的机声中，麻木地工作着，大脑似乎冻结了，什么都不去想，熬过天亮前最难过的时刻，等候下班时间。

下班后洗了澡，我到食堂去吃早点，吃完早点，照例把碗筷送到门口的水池里时，只见那资本家踉踉跄跄地走来，弯腰在那洗碗的水池里，一掬一掬地双手捧起那漂浮着油污的肮脏的洗碗水喝。

人们都惊呆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敢上前说上一句半句同情的话。

他平时一直洗得很干净的汗衫，今天已是污秽不堪。本来微胖的脸庞，也瘦削苍老不少，憔悴不堪的脸，泛出一层不正常的潮红。他双眼失去了光亮，呆滞的眼珠，失去了转动的机能，睁得大大的看着前面，他在立起身来时，对我定定看了一眼，又弯腰连喝了几掬水，缓

缓地抬起身子，摇摇晃晃地向外走去。

他人走远了，门口的我们半天没有动弹，看着他的身影逐渐离去。

想不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就在这天的下午，他被活活打死。

据说，那天上午他乘人不备，逃出了厂门，不敢回家，逃到他姐姐家。造反队还是把他从床上抓走，他哀求造反队头头说，他头昏，再也吃不消打了，让他休息一天，待身体好一点再来厂，你们再打吧！

在那样凄惨的哀求面前，如狼如虎的凶神恶煞们，并没有立地成佛，还是把他抓回厂，几个“大背包”后，他终于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四人帮”跨台后，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工作队进厂，在追查这起打人致死的案件，原来对这负有责任的造反头头们使出混身解数，逃过了追究，仅仅把一个在造反队什么都不是的、一个刚学会了摔跤手痒的青年，指为替罪羊，判了二年徒刑。

这个资本家叫戴源生。

党委书记也不能幸免

在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声浪中，造反队头头飞扬跋扈，要整谁就整谁，这是造反以来权力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已经“靠边站”，失去权力的党委书记下放到车间劳动。劳动么，流点汗，体验一下工人的辛劳也罢了，但是挨整的厄运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每天下班后，在回家路上，有一章姓青工时常与他同路，有时也一路闲谈。这青工一时言语不检点被头头们抓住把柄办学习班。实际上，这是造反队头头们蓄谋已久的阴谋，企图通过这章姓青年达到打击陷害党委书记的目的。在我被作为“支联站”头头而被拷打逼问时，就曾诱使我供出党政干部是“支联站”成员，以达到把他们从政治上搞臭，彻底打倒的目的。

我昔日的战友丁胜成，已完全投入了蔡姓头头的怀抱，积极向造反队的权力圈内钻营，在这场陷害党委书记的阴谋中，成了头头们的得力干将。这个小人策划设计了一场“隔壁戏”，设下圈套：

他们把章姓青年置于一室中，故意使他能“偷听”到隔壁办公室内头头之间的商议，说如果章再不招供就把他送公安局，又假装同公安局打电话联系关押之事。吓得章姓章青工立马把一切都招认下来，在他们的诱使和逼供下，章“招”出了所谓同党委书记的“反革命言行”。这些头头拿到这样的现行反革命的材料如获至宝，又把一位原副厂长和原党委秘书拉到一起对党委书记采取“革命行动”。

在“忠不忠看行动”，大跳“忠字舞”，大贴“忠”字表忠心的年代，为了表明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心，表明自己在“阶级敌人”面前的同仇敌忾，显示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责任，连这位副厂长也“义愤填膺”地批斗党委书记，拉头发，打耳光。

在这人人自危的年代，谁都要表露自己的“赤胆忠心”。这位一厂之尊的党委书记，被他过去的同僚和点头哈腰的秘书呼来喝去，揿头，拉头发，打耳光，“触及灵魂”，一点也不顾惜过去的情谊。路线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私情。

这样的政治气候和这样的心态，大概是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

“宝像”风波

在我们车间，更衣室都在车间的上面，男子更衣室在车间的中间部分，是钢筋水泥隔层和砖墙，分内外两间，全车间一百来号男工在这里分三班更衣。在内间有人在更衣箱门上贴上了几张“宝像”——毛主席的标准像。

一天夜里出了事：

最靠里面的更衣箱上的“宝像”被撕坏扔在地上。

这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恶毒攻击。出事的那天正是我们夜班，下半夜这一消息在忐忑不安的气氛中传布，人们不禁提心吊胆，预感到一场“排

队”摸底、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风暴即将到来，人们在心中诅咒着这作案的人害得人们不得安宁。

事件出在我们车间，又在我们班上，那个蔡姓头头脸无四两肉的脸上透出一股抑止不住的高兴，只见他在车间中飘忽不定地窜来窜去，在他的一些心腹之间窃窃密议。从他们喜形于色的得意样子，一场借题发挥，打击报复的阴谋即将实施。

经过两天的密谋策划，班上的大部分男人被通知开会。

人们按时来会，没有一人缺席！谁都明白，缺席将为自己招来麻烦。

主持会议的竟然是蔡的心腹，一个姓刘的泰兴人（他既不是党员，又没有造反队的职务，竟然主持这严肃的查找阶级敌人的会议），按常规，出了这样的事，该是保卫科的事，而且厂造反队头头也应参加。但今天现在这样的会，仅是车间的蔡姓头头及其一伙在主持。

一看这样的势头，心里就明白，我又要遭殃了，我的冤家必定要借机对我下手，所以必须小心翼翼，迎接风暴。

那姓刘的泰兴人还从来没有当过官，这回神气十足地开口发话，大放厥词，威胁作案者赶快坦白交待。他说完后，要每个人把在发案当夜的经过说一遍。

人们小心地把那天的经过说了一遍。轮到我，我努力把那天夜班的经过尽可能的说得详细，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同他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样可以相互证明我们不在现场。

极度小心也是徒劳的，在后一天开会时，那两个坏种张开血口，说我在前一天的叙述中漏洞不少，有作案的时间，就是作案人。

预料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这时的心情却放松下来，异常的镇静，定下心听那两个坏种讲。一面听，一面努力搜索他们讲话有什么破绽，有什么地方不合乎逻辑，并快速进行分析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我努力告诫自己要冷静，要讲究策略。

在坏种讲话稍有停顿时，我插话讲：“我不是作案人，希望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时间拖得越久对破案越不利，会把真正作案的阶级敌人放过。我抱着这样的态度，请你们也抱着这样的态度，爽快地把所谓我的作案情况向革命群众摊出来。”

姓刘的说：“我们知道你的资格很老，要想摸我们的底吗？”

我针锋相对地说：“你说是我作的案，请问是在什么时间作的案？”

姓刘的泰兴人哑口无言，对蔡头头看，姓蔡的有些尴尬，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得说：“好，你不愿交待，我来指一下，你是在吃半夜饭前几分钟上楼的，就在这时作案的。”

他讲得煞有介事，使本来就令人恐惧的会场，更是静得出奇，人们意想不到，竟然这么快就短兵相接了。

那天我在吃半夜饭前确实上去过（这是我的习惯，去衣箱里拿饭菜票，每每在 12 点 15 分到 20 分上去拿饭菜票），那天也是这样，因为时间早，上面空无一人，我的衣箱在外面一间，拿了饭菜票就下来了，里面一间的情况当然不会知道。

我镇静地发问：“你一口咬定我在这时作案，你是凭什么这样血口喷人的？”

姓蔡的面露凶相：“你有作案的时间，有作案的动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情况。”

我的气一下往上冲，我有点不冷静地说：“姓蔡的，你这是在故意打击报复，你在我的身上做文章，却放走了真正的阶级敌人，你这是在犯罪！”

姓蔡的说：“有人看见你撕宝像的，你还想赖？”

我好不奇怪，竟然还有人“看见”，我说：“把你的证人喊出来吧！”

坏种说：“好！把证人喊来。”他对坐在边上的那刘姓坏种说了一句，刘下去喊人了。

人们一下屏住呼吸，等待证人的出现。

可笑的女证人

证人立马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很明显他们早就布置好了），证人是谁？我一看差点要笑出声来。

这是位几年前刚从泰兴农村顶替进厂的乡下姑娘，我笑这两个坏种实在是计拙技穷。

这刘姓坏种人已到中年，他老婆比他大好几岁，看上去更为老相，所以他同乡下姑娘勾搭上手，这乡下姑娘也竟然到了痴迷的地步，这样的臭闻早就在车间中传开，再加他老婆在厂浴室中碰到那乡下姑娘就当面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这样一闹，更使全厂都知道。有天这对男女在上班时传递纸条，约定时间地点幽会，不小心被蔡姓坏种截获。如果这事以乱搞男女关系处理，厂里有先例：在大会小会批斗后，政治上将抬不起头来，经济上被扣减工资。然而，他们臭味相投，物以类聚（蔡也有类似桃色新闻），传纸条的事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从此这姓刘的就死心塌地跟着蔡走了。

今天，这两个坏种把这位乡下姑娘抬了出来，怎不令我好笑呢？这一乐，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姓蔡的头头得意地说：“现在证人来了，给你一个机会，你还是主动坦白交待的好。”

我冷笑一声：“既然有证人证明是我作案，还是请你们的证人谈吧！”

姓蔡的脸也歪了，气哼哼地说：“好！林爱华你就把看见的情况向大家揭发吧！”

姑娘朝姓刘的瞟上一眼，像背书似的说：“那天夜班，12 点一刻时，你披着棉大衣，双手插在裤袋里，走过我的车子时，同我讲了几句话，后来你就上楼去拿饭菜票，拿好饭票，你就进里面扯宝像，撕了扔在地上就下来去吃饭了。”

拙劣的陷害，愚笨的证词。我听了笑笑说：“你说完了没有？如果没有说完，现在一起说完。”

她说："全说完了。"

我一下把声音提高说："大家都听着，现在请她再说一遍。"

她倒很乖很老实，又照说了一遍。

我像西方电影中的法庭上律师那样提问："你是看着我撕宝像的？"她说："我亲眼看见的。"我又接着问："我上楼的时候你在哪里？"

她答："我在我自己的车子岗位出布的地方。"

我高兴地说："好！大家都听到了，她在楼下，而且她是女的，不可能跟着我上楼进男子更衣室。而我在所谓的作案时，她是亲眼目睹我作案的。现在我请问林爱华，你的眼睛竟然比 X 光还凶，能穿透厚厚的钢筋水泥的楼板和砖墙，看到我在楼上更衣室作案？"

人们不禁哄笑起来，会议气氛顿时轻松了。

那两个坏种，张口结舌看着我。我不禁一笑，乘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说："就算你林爱华有 X 光一样的眼睛，请问你为什么不当场把我抓住，而要等人家发现了，今天才来揭发呢？"

我对做记录的人说："请你把刚才的对话，详细作好记录。"

我又对蔡说："你这是明显的在报复我，我跟你没完！我还是要喊上这么一句：坚决保卫四清运动成果！你这样把水搅混，放走了真正的阶级敌人，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也可以怀疑你，你也有作案的时间和动机，或许你就是作案的阶级敌人。"

有人喊了一句："时间到了，上中班了。"人们一哄而散。

坏种的阴谋失败，后来的追查与我无关。

在我后面倒霉的是一位刚进厂不久的小艺徒，他姓薛，父亲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家中就他一人，他拿着微薄的艺徒工资，每月去一次去提篮桥探监。就凭这一点，他被怀疑是作案人。

这个刚出校门的小孩，那见过这般阵势，被吓得自己对自己也怀疑起来。在高压下，他竟说不清那天上楼几次，从二、三次渐次加到七、八次，语无伦次，吓得痛哭，随着坏种们的问话，他迷迷糊糊地顺势回答，被折磨了几天。

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疑点渐渐集中到一个绰号叫“老克拉”的身上。

疑点指向“老克拉”

此人四十来岁的年纪，肥头胖脑，崇“洋”，月亮也是外国的园，凡舶来品总是好的，凡中国货没有好的，这是他的信条；凡过去的总是胜过现在的，今不如昔是他信奉的准则；在没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牢骚话，落后话就数他多，思想还真“反动”。他有点好色，但没有到“包天”的程度。

他在工友面前装出一付什么都懂的模样，拿腔捏调，装腔作势，处处表现他的迷洋好古，又很会察颜观色，所以人称“老克拉”，他听了也很得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群众慢慢地把疑点集中到他身上，不是没有道理的。论思想落后，没有人能望其项背；论工作吊儿郎当，没有人超过他；憎恨共产党、毛主席有其思想基础；论作案条件，他的更衣箱紧贴那出事的衣箱。所以，如果他想作案，只是举手之劳。

人们对作案人的憎恨也是合情合理的：作案人撕了毛主席像，于大家一点好处也没有，反倒害得大家日夜开会，排队摸底，鸡犬不宁。所以就在头头排定的会上，逐渐自发地把疑点引向了他。

自那次我把姓察的阴谋揭穿，当场嘲笑了他们的“女证人”后，蔡就不再让我参加追查活动。但我的好友铁牛却还被叫去参加追查。

我对铁牛说：“你是政法学校出来的，你要运用你所学过的专业知识，发挥你的才能，

把阶级敌人彻底揭露出来，不能再让蔡这样为所欲为地折腾下去。他迟早再会把火烧到我的头上，再累及你和其他好友，上次已经有把你们一起拉出来陪绑的苗头。所以我郑重请你出山，利用你现在参加会议的机会，尽快把阶级敌人揪出来。”

他答应道：“你说的有点道理，让我考虑考虑。”

几天后，有消息传出来，“老克拉”承认了作案的事实。我碰到铁牛，问他是这样吗？铁牛只说了一句话：“是他！我对他步步进逼没有让他喘口气。”铁牛有点得意地说。详细情况他一点也没有透露给我，这个谨慎的人！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然高兴。

我高兴，蔡可不高兴。

在“老克拉”承认后，他把“老克拉”单独留下，递上香烟，送上香茗，一改直呼其名的习惯，亲热地称他老丁长老丁短，“推心置腹”交谈起来，说本来是怀疑谁谁谁的（指我），现在想不到是你老丁啊！

“老克拉”心领神会，第二天就翻供，后来干脆就借故不来厂里参加学习班。

他不来，蔡就把我拉去学习班，妄图利用学习班中的心腹之人再次把火引向我的身上。这时成了蔡的帮凶的丁胜成，得意非凡，对我发动进改，在蔡的面前尽情表演。我一时怒不可遏，把这伙人骂了一通，怒气冲冲地管自走出了学习班。

在后来的学习班上，那“老克拉”在事实面前不得不重又承认了作案的事实。但结果却令全厂瞠目结舌：

造反队并没有对丁作出什么处理，轻松地放过了他。事过境迁，他照旧发他的牢骚，放他今不如昔的厥词，吊儿郎当做他的染缸工，过他“老克拉”的生涯。

又一起陷害老干部的“宝像”案

这种结局不止一起。请看：

割绒车间的原支部书记是一位南下女干部，很能关心工人的疾苦，深得工人群众的爱戴。造反派夺权后，她当然也“靠边站”，不当干部下放劳动。

在这车间有一名五十多岁的工人，姓娄，生得獐头鼠目（大概是娄阿鼠的××代孙吧），老头眼看造反头头一一当了官，好不眼热，他一心一意要当官，奈何没有人赏识。越是没有官当，越想当，他在头头前点头哈腰，处处、时时努力表现自己。但官运还是没有亨通，人们看了他这副“急相”，就送了他一个雅号：官迷。他听了一点也不恼，反倒挺高兴，高兴什么？总算有了一个“官”字，同官字相傍了么。

在这造反的年代，人们都说：胆大好做官。他，娄阿鼠的后代，贼胆还真大呢！他看到我们车间的撕宝像案，触发了他的“灵感”，他竟然也制造了撕毛主席宝像的现场，然后向造反队报案，说他亲眼看见是前支部书记，那位南下干部撕的。

一场骇人听闻的陷害老干部的闹剧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审讯逼供没日没夜的进行。这位南下的山东老干部，面对毫无根据的诬陷，坚贞不屈，以山东人的硬朗，同这娄姓小人和造反头头们展开了斗争。头头们在逼取口供时，不断用体罚折磨他，又屡次召开批斗会，在会上拉头发，揿头，强逼下跪，企图迫她就范。

批斗会上，制造这场假案的“官迷”，唾沫飞溅，言之“凿凿”，而下面的群众却反应嘘嘘。人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位对共产党忠心信仰的老党员、老干部，绝不会干这种违反常识、违反逻辑的愚蠢举动。造反队越是批斗得凶，越是激发了群众的不满。

女干部正义在胸，坚不吐口，保持了做人的尊严，更受到群众的爱戴。在群众的不满声中，造反队中的一些头头也感到难堪和尴尬。

在旷日持久的逼供和批斗中，愤怒的群众逐渐把疑点集中到这个“官迷”身上，娄阿鼠一系列反常的言词和行动，让人们看清了这个“官迷”的丑恶灵魂。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讨伐声中，这个“官迷”的丑恶行径暴露无遗。

真象终于大白，而这个一味讨好造反队的“官迷”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和惩罚，对于他真正破坏“宝像”的行为，却没有去追究他的“罪行”，对于他诬陷女干部的罪行，更是只字不提。

而无辜的女干部却在精神、身心、肉体遭受了摧残之后，我厂的造反头头却连说一声对不起都用不着。

1970 年底，各级党组织全面恢复，造反头头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他们在老干部上台执政下，开始逐渐失去权力，有的开始转为挨整的地位。我在厂中的冤家对头已经失势，市专案组也不再找我，长达三年的审查结束。

我过起正常人的生活。

第二十九章 反思“社会灾难”

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三十多年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的文革烟尘早已落定。弹指间，亲自发动它的伟大领袖已经逝去二十八年，邓小平从 1979 年开始扭转乾坤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总体上步入了“小康”。当我们享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享受着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发展和安康时，不能不惊讶地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的陌生。

对历史的陌生是危险的，就像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骇人暴行的陌生，使我们深深忧虑。

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解放日报》2003 年 12 月 18 日第 5 版）。”人们常说，历史往往是相似的，它的成功和失败都是相似的。重复失败，力当避免。而避免重复失败，则必须对历史进行反思，找出它之所以失败的根源。否则，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仍会重复失败。深刻的反思，往往带来历史的大进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人类成立了“联合国”；由文革带来的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反思，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市场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因此，反思历史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

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失败有大有小，大的失败，当称之为“灾难”。对失败的反思最重要的是对灾难的反思，人类应当建立“灾难学”。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灾难，有的是天灾（自然灾害），有的是人祸（社会灾难），有时是“天灾人祸”（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天灾，依靠自然科学的力量；避免人祸，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文革是一场使中国向野蛮倒退的社会灾难，它使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经历十年浩劫，比抗日战争还要长二年，如果把从 1964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算作文革的“序奏”（因为“四清”打击的目标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就长达十二年，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间的总和。在和平年代，文革的破坏后果，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多么严重的刑事犯罪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因此，这场文革社会灾难，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文革不是凭空而来，它是建国十七年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必然结果，而它的登峰造极，又使极左的大厦轰然倒塌，使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所以，社会灾难又是可以化作人类社会进步的养料的。

我们应当对社会灾难作最深刻的反思。

社会灾难和绝对权力

世界上巨大的社会灾难总是由“领头”人物发动的。发动灾难的领头人，有的怀有邪恶的野心，有的可能出于良好的愿望。但无论是由邪恶野心开始或者由善良愿望开始，在灾难之初，人们总是很难意识到灾难已经来临，因为社会灾难总有动听的借口或美好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被说成是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绝大部分的民众不是思想家，都会被那些真心或假意的目标蛊惑起来跟着跑，就连最善于思考，最严谨，产生过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前都没有识破希特勒的野心。而被这些领头人控制下的地方，理智的力量则处于弱小或非法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左右局势。二战时，德国的正义力量只能采用暗杀的手段对付希特勒；文革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用“手术刀”粉碎“四人帮”，法定终止。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人能够发动灾难的局面呢？

因为他拥有了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的获得常常来源于领头人特别的出类拔萃。他的经常的甚至是“一贯的”正确、英明，导致人们对他的狂热崇拜，使大部分人的头脑停止思考，听他一个人摆布。当这个人还有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使他很容易成就一件好事，但在他失去自制力时，绝对权力便使他很容易干成一件坏事。在文革中，“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以往“党中央、毛主席”的排列成了“毛主席、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连人大和政协的“举手”和“拍手”都成了多余。可以想像，如果毛主席在六十岁时就发动文革（毛主席发动文革时是七十三岁），文革恐怕就不是十年，而是二十多年。

看来，要防止社会灾难，必须防止绝对权力。

民主不是说有就有的

防止绝对权力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案是现成的——民主。

这未免太空洞。因为在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前夕，主席与他的儿子做过一次深刻的谈话，他在谈到共产党如何防止跌入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的腐败怪圈时说：

那就是民主，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

愿望是好的，原则是对的，但实际上很难。文革前，“整风”旋即变脸为“反右”；彭老总上万言书立刻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上海市革会成立后，联司、临时工再造王洪文、张春桥的反，立刻被扣上“攻击新生革命政权”的大帽，为首的投进监狱。改革开放后，政治上逐步开放、宽松，但是民众对腐败案件的举报却战战兢兢，大多使用匿名信，在许多反腐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腐败力量手眼通天，正义力量却处在“地下工作”状态。

看来，民主，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政府，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是为什么呢？

民主和种群竞争

物种进化和社会进步有一个共同的规律——种群竞争。狼的存在使鹿机警、善跑，而鹿的矫健又使狼敏捷、强悍。为保护鹿而消灭狼，鹿很快会退化。自然界的这个浅显道理，使人类睿智地建立了种群并存、竞争的民主政治体制，用来保持政府的高效与廉洁，保持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规律是无情的，谁遵循，谁得益；谁违背，谁受损。使中国经济产生奇迹的市场规律说到底是企业间的并存、竞争；之所以把微软拆成两个，就是不让它过于强大从而产生垄断。没有“天敌”的种群必然退化，官僚主义、瞎指挥、腐败、漠视人权、暗箱操作、绝对权力，就是退化的迹象。只有种群并存、竞争才能带来民主，也才能带来种群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对官吏的管理，无非是倡廉和肃贪，但即便明太祖朱元璋用严密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锦衣卫）对官吏监控，贪官仍“朝杀而暮犯”。至于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更是迅速腐败。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贪污、腐化极少，但漠视人权、瞎指挥并不罕见。文革中，夺了权的造反头头迅即重蹈农民起义头领的覆辙。改革开放后，经济连年高速发展，腐败成了“头疼大事”，每年都有不少高官被杀、被关，这恐怕就是老百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

每个社会都会有贪官污吏，但是，贪官污吏太多是不正常的，种群退化一定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其实，绝大部分腐败官员本可以不腐败，因为邓小平同志说得好：

体制好，坏人很难犯罪；体制不好，好人也会犯罪。

希 望

巨大的文革灾难已经离我们远去。我幸运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建设上遵循了客观规律——市场化。我更加高兴地看到，我们国家在政治上越来越开放、宽松，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成熟，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具有了现代意识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依法治国已被定为治国方略，从 1979 年以来，短短的二十五年中构筑了基本法律框架，现代法治理念在逐步被接纳，保障人权被提到重要地位。从朱镕基总理开始，重大事故得到报道，2003 年，温总理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03 年底，温总理提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我从电视上看到农民兄弟高高兴兴回家过年时，激动得不能自已。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今天，我写下“希望”这两个字时，与三十七年前心中对文革“企盼”的心情完全不同。今天的希望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国家正在大踏步前进，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地覆天翻的变化，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上的市场化成熟之后，必然迎来政治上的民主化。

到那时，文革的灾难将全部化为中华民族成长的养料，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2004 年元月